本书以历史为骨架，从哲学观念和文学作品以及禅学中去揣摸祖先们思想与情感的发展历程，这其实也是人性在情与理两方面发展与制约的过程。从这种揣摸和回顾中，我试图能从里边找到些有用的东西，一是有助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富强，一是有助于习禅悟道的人。是否科学是否讨人喜欢我不知道，但写此书只是希望能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此而已。

历史、艺术与禅韵

——中华文化与文明的脉络

见君/著



建议上架类别：社科类

ISBN 978-7-5017-5911-8

9 787501 759118 >

定价：48.00元

历史、艺术与禅韵

——中华文化与文明的脉络

见君/著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艺术与禅韵:中华文化与文明的脉络/见君著. 一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3

ISBN 978-7-5017-5911-8

Ⅰ.历… Ⅱ.见… Ⅲ.文化史—中国 Ⅳ.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5750 号

出版发行:中国经济出版社(100037·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乔卫兵(电话:010—68300010)
责任印制:石星岳
封面设计:华子图文设计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北京市联华印刷厂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张**:27.75　**字数**:426 千字
版　　次: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书　　号:ISBN 978-7-5017-5911-8/ F·4761　　**定价**:48.00 元

前　言

历史是有生命的，也就是说她是有血有肉、有脉搏有心跳的。

因此，大凡讲历史或是回顾往事，与其说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记录与记载，还不如说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的发展历程，否则弄出一个编年表或是把诸事件依次排列出来就成了。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的发展，是有其精神产品为代表的，这就是文化与文明。因此，大凡讲人，与其说是讲人的生老病死，还不如说是在讲文化与文明的生成与延展。文化与文明不但有物化的精神产品，还有非物化的精神产品。讲文化与文明，与其说是讲物化的精神产品如何生成与延展，还不如说是在讲人的非物化的情感、情结、哲理与神韵……的冲撞、交织与流动。当我们把这些东西掺在一起讲时，就有了我写的这本大拼盘式的书，一个十足的大杂烩……很难说它是个什么东西，说它不是个东西也成。依我说呢，它只是历史、艺术（以文学为主）、哲理与神韵"三合一"的杂谈罢了。

说到哲理与神韵，最影响中国人思想与神韵的莫过于儒、释、道、法四家了。而在这四家里：

儒家为显法，法家为隐法——这是政治与权术的真实。"阳儒阴法"、"儒表法里"，嘴上喊着王道，骨子里使着霸道，即是证明；

释家多传于上流，道家多俗于民间——这是文化与世俗的真实。达官贵人吃斋念佛，草民百姓画符驱鬼，"学而优"不但"则仕"，还由信五毒升格为信佛教，即是证明。

那，从哪里来看中国人的思想与神韵呢？

我决定从"禅韵（禅宗的哲理与神韵）"这儿入手。因为中国人并不像西方人那样，动不动就整出些理论体系或是鸿篇巨制，我们没有理论体系、没有鸿篇巨制，我们有的只是款款的闲谈和恬淡的"禅韵"。我不是在哗众取宠，也不是在故弄玄虚，我只是觉得好玩，喜欢谈论这些……有意

思。如此而已。

为什么选择了"禅韵"?

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从儒家、道家、法家的立场来看历史的人已经不少了,其著作更是多得五车、十车、百车、千车……都拉不动,我没资格也没能力从此入手,更没兴趣沿着这老路再走一遍;二是我认为禅理、禅思、禅趣、禅韵对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影响极深,她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至今我们也没能全搞清楚。于是,我"试图"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奢望"从这缺口看出去,能看出点儿什么名堂来……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只是当我把看出来的东西攒在一起时,不经意间,就拼凑出了这本书。

我并不想教导诸位应该怎样,我只想在一种闲谈的气氛中把我胡乱看出来的东西讲出来。什么理论与体系、学说与公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品味到历史的情感与神韵。或者说诸位在看此书时,伴随着诸位的是一种愉悦与轻松……这就足够了。

一、历史的回顾与禅思

这个百年要结束了,人们除了忙于应付电脑的"千年虫",也在静静地回首往事。往事往矣,只留下深深的思索与淡淡的苦辣酸甜;往事往矣,沉重地凝结了几代咱中国人的血和泪,又如此地轻轻逝去……似水流年。

西方人曾说中国是一个睡狮,可这个睡狮是如何醒来的呢?

首先是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中国有了洋务运动。当这条路行不通了,就又有了变法维新。再往后,是西太后默许的拳打脚踢加咒语的义和团,早先还有太平天国遵上帝旨意办事的洪秀全。紧跟着洋人狠狠地教训了中国人,圆明园之火、北洋水师之没、菜市口之斩,以及揩干了义士的鲜血后正襟危坐著书立说的曾国藩曾文正公……这一切说明不能这么醒。当这一切招术都失败后,这个满清贵族建立的国家,这个建立在红红绿绿之旗上的国家终于走向灭亡。

中国之大幸,有了孙中山先生,他带领人民建立了中华民国。可是当五色国旗代替黄龙之旗后,并不能就说明国家富强了,醒了么?这还需要再猛醒、需要怒火与呐喊。

"五四运动"是继承洋务救国、维新救国、政权救国后的又一番冲动,

她的旗帜是"文化救国"之"新文化运动"。随着海外赤子的归国，人们看到了德先生（Democracy）与赛先生（Science）。当这由洋文洋话翻译过来的"民主"与"科学"响彻神州大地时，全盘西化就在这古老的土地上开始了艰难的耕耘。中国人看到了希望，中国人嗅到了春风，虽然还背负着三座大山与历史的沉重。今天，我们回首往事，不得不承认我们醒得并不彻底，我们只学到了富强的皮毛，并没有学到它的精髓——克先生（Commodity）商品。没理由去责备"五四"的先烈们，路要一步一步走，这是必然。

但"九·一八"的炮声、二战的硝烟，没法子让中国人走出这富强的一步。因为民族危亡就在眼前，没法子。你要醒，人家不要你醒；你要富，人家偏要你贫。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随着马列主义的胜利，中国人终于站起来了。民族危亡消除了、解放了，中国人觉得调子明快了、步子轻柔了，全盘西化结束了、更加强劲的全盘苏化随着《山楂树》和《一条小路》开始了。泱泱中华大国用热烈、用纯朴、用激情走上一条苏联模式之革命大道……回首往事，往事回首，路漫漫其修远兮。路漫漫，是指当真理与谬误参差于一处时，呈现出眼前空间的茫然；其修远，是指一切都需要中国人亲自去走去品，呈现出时间上的沉淀。

于无声处，中华儿女不乏人杰。是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找到了富强之本——商品。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尘埃落定，让我们为本世纪做个小结。从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鲁迅到毛泽东、邓小平，中国人终于找到了物质文明的关键——市场经济。唯物史观的真理性在于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物质极大丰富的必然，这原本是马克思早已讲明的，但我们找它找得太苦、寻得太难。不管如何，我们中国人终于找到了。

可是，从精神文明的角度看，又如何？当我们挣脱了封建小农意识后、走过了西化之温情、尝过了苏化之生猛……我们终于有了克先生后，我们还剩下什么？

龙应台先生在《百年思索》中写道：

> 全球化的力量越大，本土化的欲望也越高；西化越深，回归传统



的向往越强。现代化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两边使劲拉出的张力，在二十世纪末，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犹豫、所怀疑、所思索的是：如何走向自己。

非常艰难，因为，在一百年努力西化的道路途中，中国人抛掉了太多自己的东西。

……

一百年后的今天，钱穆惊慌万分地说："今天我们对传统的旧中国，已经可以说是完全无知了。那么对以后的新中国，我问诸位又有什么理想报负呢？那么我想要发财，便赞成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我自问发不了财，便赞成共产主义社会。怕只有这两条路了，还有第三条路吗？

……

这一百年间中国人抛掉了多少自己的东西？这个过程，称之为集体失忆、自我清减，也不算太过吧。

所以，可以回到十九世纪第一个提倡"自改革"的龚自珍。他的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灭人之教，必先去其史。"

依我看龙应台先生之虑虽然有些道理，但钱穆先生之言实属悲观。他们所推崇呼吁的旧文化运动和徐复观的新儒家运动实在盲目得很、表面化得很。"文戏上床，武戏上房"一类急救章似的方略，实属不快也光，但不算是高招。在这个时代要有板有眼的先养点什么"浩然正气"，不怕别人把你灭了么？我倒是欣赏龚自珍先生的话，先看看自己的历史，研究一下咱们的国土、资源、天文、水利等硬件，再研究一下咱们中华民族的民风、国情、人性、民俗等软件。把自己有什么资源、有什么储备搞清楚后，再谋求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特色之路，但这必须符合"知识经济"的市场化与高科技化，这是板上钉钉的硬指标。因为我们吃过枪炮、吞过屈辱、啃过理想之草。

对历史的回顾，不外乎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个方面来审视思考其政治与经济，因为历史原本就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这二者缺一不可。但我们研究历史的人至今所持的观点仍是偏颇的很，仍是认为

物质的文明、经济的发展是百分之九十九的重要，而精神的文明、人文人性的张扬只是随声附和的附属品，是经济的影子。在认识存在与意识这个辩证关系上，我们太喜好存在决定意识这个定律，太不愿意汲取文革这种意识束缚存在的教训，忘记了辩证的双方只有势力相等才能成为辩证，忘记了列宁说的：在超出认识论这个范畴时，物质与意识也是相对的。换言之，这里已经不存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了。

而西方的文明重理性、重物质利益、重科学、更重强权。如今他们不少人开始知道少了什么——只要这世间还有个“情”在，人类和众生都不会如几何与数学一样的理性十足。这么个简单的道理，西方的某些人总是没弄清。中国人讲感情讲精神，但百余年的屈辱使我们不得不拿起科学与理性，事到如今，我们还不捡起阶级斗争使我们丢掉的东西么？

经济增长是渐变型的，是量变模式。只要我们有耐心，再过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富国强民是肯定的。西方国家走这物质文明之路用了三百年，而我们在五十年后即可达到那时的先进水平。

但精神文明呢？人口增长、环境污染、官员腐化……这是清华和北大在98年总结出的中国十大问题的前三名。这前三名啊，本是人的问题、素质的问题。千年植树，不够一斧伐之；百年树人，就怕一朝受贿。随着广告生病、跟着时髦做人，这如何教育出精英？怎么解决人的素质问题？怎么解决官员腐败问题？在存在和意识的辩证中，于经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先解决意识问题，就谈不上存在。社会，是人类的社会，历史是人类的历史，一切岂能离开人？

禅思，即止观也。让我们静下心来反观我们这百年，难道不是这样的么？

倘若我们的视野再扩展些，上溯和回顾这千年历史，又能有些什么感触呢？

2000年所带来的一切话题，原本是打圣母玛丽亚在耶路撒冷的马槽里生下耶稣基督时算起的，这和咱中国的纪年不相干。自1949年我们与国际的纪年法所接轨，一切显得简单易记且少了不少帝王名号的避讳和禁忌，好事一段。简单之处必有繁杂，于这个千年结束，中国人也学着外国人弄起了“世纪人物”、“世纪经典”和“千年人物”、“千年经典”……

当然，最热闹的还是外国，美国《时代周刊》选评出了这个千年对世界





最有影响的人物是——成吉思汗;这个千年对人类发展最有贡献的是——印刷术;而对人类发展最关键的是——西方的文艺复兴。

也就是说,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人在这个千年向人类贡献了游牧民族的剽悍与记载全部人类文明的技术,只此而已。而西方的贡献却在于促使人类文明发展的人性之解放、张扬与复归。

东方文明的含蓄和深沉,是西方人所难以理解的,所以偏颇与不公允就在所难免。而对于西方文明来讲,文艺复兴确实有她辉煌的功绩。在这个千年的中叶,欧洲出现了一个高人,叫马丁·路德(MARTINLNTHER,1485-1546),他大胆地发起了宗教改革运动。为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他首先对政教合一的社会化宗教发难。宗教,原本产生于农业经济的封建社会初期,它把光明与希望用信仰化成美丽的彼岸,天堂之门24小时向愿意进去的人敞开着,圣徒彼得接纳着人间所有的信徒和向善的成员。为达那彼岸的天堂,人们要于繁苦的劳作之余不间断地净化自心,终生地修炼。这种宗教模式给生活注入了理想与安详的内涵,是封建社会初期所欢迎的。但一切随日月流转而流转,随作物荣枯而变迁,好景不长,当西方经济走向商品化、封建的农业生产关系已经陈旧、政教合一的罗马教廷和君主强权再也无法维系社会的稳定时,宗教的理想模式已经束缚了实惠模式的发展,于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发生了。

当理想与情感被抛在一边,实惠与理性被奉为经典时,就产生了马丁先生的"因信称义"。它的意思说白了,即:只要人的心中有上帝,那做什么都是对的。这显然是打着上帝之旗,施行公然的反叛。它保留了美好光明的天堂和彼岸,打杀了一切戒律与修持,一切显得简单明了——只要心中有上帝,那此岸则等于彼岸,而生活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物质利益而战。

这种为自由竞争服务的实惠模式和宗教改革,实际上使宗教成了空壳,只有在婚礼和葬礼上人们才用它来强调一下人与人的关系和给逝去的人以美好的寄托。在平时,人们大可不必在意什么宗教什么上帝,个人奋斗成了生活的准则,自由平等的竞争和市场经济成了唯一的经典。这一切为资本主义的血腥发展、为封建社会的最终灭亡做好了观念上的准备。上帝再也不会谴责勇于进取而不加修持的人们,只要他心中有我。

随着人性的复苏和精神的解放,文艺复兴随之而起,资本主义原始的掠夺随之而起。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领域里有了笛卡尔、尼采、康德、

黑格尔，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在人类学上有了达尔文；生理学上有了巴甫洛夫；心理学上有弗洛伊德和他的学生荣格、马斯洛；在自然科学上有爱迪生、爱因斯坦……这一切不能不说是源自这个马丁的功绩，不能不说是文艺复兴的硕果。

但是美国人很有点自大和傲慢，他们只承认文艺复兴而对马丁·路德不屑一顾。如果美国早建国那么千儿八百年，而且马丁先生是什么加州牛仔堂马氏正宗谪出第十八代孙，我想这个千年的伟人定是马丁而非成吉思汗，而文明的复苏定是马丁而非什么文艺复兴。

说起宗教改革，着实让咱中国人自豪。比马丁·路德先生早上七百年，咱们也有这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马祖道一（公元709年—788年）。当时，正是中国的唐朝，盛唐时的禅宗由六祖慧能传于南岳怀让，怀让传于马祖道一。马祖开创了"即心即佛"的宗风，挣脱了一切宗教的和世间的束缚，提出了"行处坐卧皆是佛为，屙屎撒尿皆为正果"的禅的人生观与世界观。这就缝合了宗教与人性、修持与自由、守戒与洒脱的裂隙，是人性的最彻底的解脱。可以这么说，"即心即佛"的思想是人类思想史上最辉煌、最豁达、最任情率性的解放，是对封建社会极端情绪化的反抗。可马祖道一毕竟是中国人，他的血液中不含有侵略、竞争、扩张、掠夺与血腥。所以在他深思熟虑后，又提出"非心非佛"，把一切又引入出世的空无之中。他不可能引导中国人在黄土地上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他不能想象让人性去干自由竞争的买卖……但他意识到人性对于理想的追求是人类发展的动力，虽然这个理想是什么他并不清楚。

总之，"即心即佛"是善良的中国人在一个农业国、在封建社会里对人性进行探讨的最高成果，它同时也是禅宗的最高境界。但是政权与宗教都不能容忍这匹敢于踏杀天下之马的道一，不能容忍"即心即佛"这对人性彻底解放的禅之魂，于是在耀眼的火光闪过之后，禅宗反而建立了森严的丛林清规，自我解放的思想只停留在一种临济宗的思潮和禅的公案中。

公案啊公案，这让后人左右难参的东西，简直成了一门学问，这哪里还有禅的半点影子？禅的根本是悟道，悟道的根本是明心见性，是对人性的反思、品味与把握。当这一切成了一种技巧或方法后，全然是一种无味的小玩闹、小伎俩，禅宗的灭亡已不可避免。





二、禅与智慧

在讲禅是什么之前，还要讲一下禅与智慧。因为这个题目是从生理学角度上看问题的，与人文艺术不相关，所以也提出来放到前言中了。

习禅可以获得智慧，这似乎是各界的共识，所以有的大德认为禅的精髓在于般若。

般若，是佛教中的一种空、无的观念。在习禅的人中，凡悟到和体会到空与无后，即悟到和体会到生死如如、一切圆融无碍，于是此人就具有了“般若智”。这是一种大智慧，是一种大神通，叫“根本智”，也叫“无所得”之智。有了这“根本智”后，此人相应地也就具有了“后得智”，也叫“无尽得”之智。而这“无尽得”之智就是“观照般若”、“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等等等等一切智慧之源之合称。

真有这么神？

真能打坐三年就可以不识字而考上北大、清华？可以搞高能物理和航天飞机？

怕是不成，那叫大妄想。

可坐禅而得的“般若智”到底是什么？还要从当代科学的角度去看才成。

（一）禅与思维

一提起思维，大家都不陌生。算数学题、写情书、坐那儿发呆都算思维，于是有必要先给思维分一下类。

钱学森1983年在《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构》一文中，对思维是这么分类的，即：思维学含有“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接）思维”、与“灵感（顿悟）思维”三种。

1. 抽象思维。抽象思维是指纯理性的形式逻辑与数理逻辑的思维，它是非A即B、非B即A的排它性思维。这种思维步骤严密、直趋结论，是线性的。从生理看，它是大脑皮层工作的结果。这种思维无疑的是当代科学与文明的主力，但同时我们又要看到，它并不是万能的。在人类所有精神与心理活动的领域内，它只占领了应得的一份，它留下余地给了形

象思维和灵感思维。它太紧张太严密太理性了，人们毕竟还要有轻松的艺术欣赏、愉悦的感情宣泄、生生闷气、发发小脾气。例如当今日益的国际化与信息化，理性至上的管理风格已被更具人情味、更具人与人情感的模式所替代。说到底，人活于世必须要繁衍，这就离不开情。有情，就有艺术；有艺术，就必有形象思维。

看来悟道产生的“根本智”实在与抽象思维无关，所以要考上北大、清华也与坐禅无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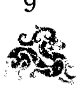
2. 形象思维。形象思维是艺术的思维。它是含摄二元即A即B的非线性的思维方式。这里不存在结论结果，只存在现象，让你喜怒哀乐地动情的现象。在艺术范畴中形象思维是亦情亦理的辩证体，这与禅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儿，只是一个应用于艺术一个应用于宗教罢了。

形象思维并不是什么低级与原始的思维。从理论上讲，逻辑思维是建立在概念上的，而概念本身已是抽象的、间接的、语言性的东西。这样看来，逻辑思维必然地也是非具体的、非直接的和非感受性的。所以在逻辑思维的领域里，一切都可以用文字、公式、数字等等符号来表示，但绝不可以用美、生动、活泼来表示。例如一个NBA的投篮高手做了一个投篮动作，球儿划过一道美丽的圆弧而落入篮网中。逻辑思维的用处是判断计算出球手的力度、出球角度、室内风力……而形象思维只是十几年训练得来的一种感觉，这就是两种思维的差别。一个可说、一不可说；一个是抽象的计算、一个是十几年的训练；一个是抽象的分析、一个是亲自去投篮。

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二者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从生理上看也是如此。人的左脑是以逻辑按步骤来处理生活中的复杂事物，而人的右脑却按感觉来模糊地体验生活中的复杂事物。凡是受过理工门类高等教育的人，他们的左脑要比右脑发达；而搞艺术、体育或形体技巧门类的人，则左右脑比较平衡。

现代医学和心理学研究的成果是：左脑具理性和逻辑性，它们听语言重其义而不重其隐义；右脑具情性和感觉，它们注意语调、表情和身体语言。

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看来习禅所增加的形象思维的智慧，怕是和“般若智”相去不远吧。



3. 灵感思维。灵感思维也叫直感、直觉思维，其实是一种潜意识的思维，它是在人们考虑问题时处于一种茫然的状态，突然一个想法、一个梦的提示而产生了答案。我们俗称来了灵感。它没什么道理，但又确确实实存在着。当很多人问钱学森老先生灵感思维是不是不存在，是不是迷信，钱老先生回答的很幽默：这说明你还没有体验过灵感思维。

那灵感思维有没有生理上的依据？

有，这就是脑干、海马回（HIPPOCAMPUS）和杏仁核（AMYGDALA）。

脑干，指环绕脊髓上端的部分。

杏仁核，指位于脑干之上，近脑边缘系统之下的部位。它共有两个，分居脑的两侧。

海马回，大脑的边缘部分，它与杏仁核组成了原始的嗅脑的主要部分。

灵感思维，不是发生在左脑的逻辑思维、不是发生在右脑的形象思维，而是大脑的边缘部分。我们的感觉神经大部分是连接到大脑皮层的神经元，但另有一小部分是经由丘脑和杏仁核这些边缘组织相连接。这个连接方式原始得连动物都有，其表现出来的是动物也具有的冲动、愤怒和惧怕。在人的身上，这个连接通道也负责大脑来不及处理的危险和冲动，同时也是人类灵感思维的通道。现在人们大力炒作的 EQ（情商），指的就是灵感思维，而古德们修行所得的“根本智”、“般若智”，很大一部分也指的是灵感思维。

灵感思维是否是原始而应遭淘汰的呢？

加拿大科学家邦格说：**“光是逻辑是不能使一个人产生新思想的，正像单凭语法不能激起诗意，单凭和声理论不能产生交响乐一样。”**

那还缺少什么？

爱因斯坦称赞哥白尼时说：**“必须具有罕见的思考独立性和预见性。”他在称赞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时说：“对隐秘的事物具有这样一种预见性的理解力。”**

钱学森说：**“预感是综合性的。人脑的综合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请不要轻视灵感思维，不要认为非科学的东西必然是坏的。你去问问打过仗的将军们，他们有没有过灵感？你去问问下棋的超一流棋手，他

们有没有过灵感？你再去问问你的母亲，在你小时候她老人家身上与你身上发生过灵感没有？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武断地概括一下：逻辑思维是理性的产物，它发展出科学；形象思维是情感的产物，它孕育出艺术；灵感思维是创新的源泉，是预感的大本营。

习禅，大大激活激发了人的灵感思维。就像电影里的"意识流"一样，当人们在以理性思维为主时，这种潜意识之流是阻断的和枯竭的。但一当理性思维淡去，这种潜意识流则自动升起，它不由人控制地产生人们原本意想不到的联系与想象，灵感思维产生了。佛教里常说的"有心求是妄想，无心求是感应"，就是让你干涸和淡化一切理性的思维，当你把追求灵感这个念头（思维）也去掉后，灵感才能产生。求灵感，只能求来魔，要真想有灵感、真想悟道、真想成佛，那就请把一切放下，连放下也放下。佛来放下佛、魔来放下魔。

大乘佛法的般若空观，就是要求你放下一切意识，由"悟前修"修到"入空寂"。把善恶、美丑、好坏……一切经验、模式、框架全放下，如此进入一个空无的状态。这是一种训练，这是一种方法。学会了"进入空无的状态"和"一切放下"的方法十分重要，因为在今后的生活中你已比他人多了一种"般若智"，你遇到问题可以慧根萌发、灵感来临。

哲学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最终极、最绝对的东西，它只告诉我们如何去分析去处理问题。而当代哲学家们说：**"怎么做都对，做就是了。"——费耶阿本德。还有的哲学家说："当理智不能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意志就加入进来了。"——詹姆逊。**

我想我们习禅的目的，最起码在"怎么做都成"和"意志加入进来"时，能尽量地正确些使成功的概率大些。这么说话好像没什么底气，并不像大师们说的一学禅就无所不能了。我没那么胆大，我是实事求是。因为禅确实也没告诉我们什么最终的道理和咒语，它只让我们去体验生活，然后一切回到空无，在空无中以灵感去悟生活——于是你是佛。说到底，它也只是告诉了我们一个方法。

就先讲这么多吧。思维不是万能的，但它又是万能的，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了。





(二)禅与情感

以上讲的是禅与三种思维。

下面讲一下禅与三种情感方式。

从心理学上看,人的情感依其强度分为三种:激情、热情与心境。

激情——“强烈的具有暂时勃发性的情感或情绪”。看来,这种情感方式强烈而短促,它常常充溢于诗歌和短小的音乐作品以及标语口号中。在习禅的过程中除悟道的时刻会有这种体验,其余的时间不多见,也不应该多见。因为止与静,首先是指心态心情上要平静。

热情——“对一定事物而生的某种深厚、坚定的情感”。这种情感方式浓度与时间长度都适中,它常沉浸于散文、音乐、绘画、歌舞等艺术门类中。在习禅中它也不常见。

心境——“一个人所具有的一种持续性的和一般性的情感或情绪状态”。它浓度小但持续的时间长,当它以某种情感能量弥漫于一个人的整个心灵中时,此人便表现出一种宗教般的品质——毅力与执著。房山云居寺的刻石经之人、刺指尖以血抄经的僧人、一生豁达通脱的人,都是这种情感持有者。而习禅悟道的人,在他们明了生死这个道理后,他们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心灵,他们一生沐浴于这美好的心境之中。

时常有人给我介绍什么大师什么传人来相见,话不投机,这大师和传人丢下一句“悟性差”就怒容满面,扬长而去。最近又听说咱中国全“悟性差”,人家扬长而去以至于过了国境,去了外国。真不晓得大师在外国心境可好些?流着中国血的全身可否在外国弥漫上幸福和安详的情感呢?

修行人,不从自身上修,不把自心修到“入空寂”,如何成佛?别人悟性差与尔等何干?

(三)禅与精神境界及长寿

1. 关于精神境界。习禅的人都知道修行有三个阶段:平常的俗人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修行入门上了正道的人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悟了大道的人是“看山只是山、看水只是水”。我们管这叫习禅的“精神三境界”,并简化成:“是山、不是山、只是山”三个层次,以便我们讲述。

这三个层次到底各是什么风光呢？请原谅，这需要各自去品，我无法讲清。只可以打个比方。马斯洛对心理学的贡献是“层次需要说”，他的“生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相当于咱们“精神三境界”的“是山”的层次；他的“爱的需要”、“尊重与被尊重的需要”相当于咱们“三境界”中“不是山”的层次；而他的“自我实现之需要”相当于“只是山”的层次。

清末民初的大学者王国维曾十分形象地将文学创作比喻为人生三种境界：

(1)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2)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3)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王国维的“人生三境界”是指搞文学创作的人所经历的三个层次，其实这和“修行三境界”是一回事，和马斯洛的“心理需求三层次”也是一回事。只要你理解了就是一回事。

再不懂，我也没办法了，只能另举一例。

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句话对不对呢？如果我没知识没文化，小学上了三年，那这句话对我来讲实在是比鸦片还毒，害了我青春再害我一生。我再有想象力也是“张豆腐、李豆腐，枕边想出千条路，明朝仍是卖豆腐”。村东头张寡妇昨天瞧了我一眼……镇上卖烧饼的孙二娘穿得露着半拉奶子……这种想象力没多少用处，对于我这挑豆浆贩豆腐之徒来说，知识远比什么胡思乱想重要。还是老老实实磨豆腐卖豆腐，赚下点银两上个科技业大，两三年后毕业了，有了知识了，再弄点想象力，搞个即冲即食的“速食鲜豆腐”。诸位看如何呢？对没知识的人先别谈想象力，对有知识的人再谈想象力。对又有知识又有想象力的人，你问他哪个重要？爱因斯坦说后者重要，我说先弄清他是哪个层次的人最重要。对高考的人讲知识重要，对院士讲想象力重要。知识加想象力是天才、是大师，否则只是贩卖知识的匠人，这就是层次问题。

刚才所举的贩豆腐的顺口溜原本是咱禅门故事，是说一个僧人沿街乞食，至一豆腐摊前，这卖豆腐的小两口正吵架。男的说：“忍一忍，再干几年就会好的。”女的说：“什么？还忍？跟你结婚几年了，招牌换了几回，还是穷卖豆腐的。”僧人一听，大悟，也不饿了，总结道：“张豆腐、李豆腐”，他的意思是说：卖豆腐的说到底只卖豆腐而已，跟招牌没什么关系；修行



人只修身不修心，怎么修也没用。“枕边想出千条路”，千条路是下一层的事，在这个层次里只有一条路。“明朝仍是卖豆腐”这一条路即：老老实实卖豆腐、老老实实修行去。是这个层次就说这个层次的话，如此而已。

当今我们都讲知识经济，可是我们的知识多是陈旧的，很少有创新的东西，这也是层次问题。我们耽于逻辑思维，不耻于或者说害怕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我们无形中受的束缚太多。如此，知识再多，也是书呆子一群，于实际没什么用处。

在纯理性的层次中，有这样一种诡辩术——即逻辑上正确但实践上错误的东西。今举出，希望执著理性的人猛醒。

古希腊有个兔子永远追不上乌龟的诡辩。说的是龟兔赛跑，乌龟从起点 O 先跑出一段距离 OA，于是兔子再从起点 O 起跑开始追。当兔子追到 A 时，乌龟也没停下，爬得再慢可也是在爬，所以不管多少，它肯定已爬了一段距离 A——A1，于是兔子再从 A 跑到 A1，而乌龟已爬到 A2，兔子再追到 A2，可乌龟又爬到 A3……这样看来，兔子与乌龟的距离依次为 OA、AA1、A1A2……AnAn + 1，这无数无限接近的小段，使兔子永远追不上乌龟了。

还有一个更妙的诡辩：一粒谷子落地没有响声，两粒谷子落地没有响声，三粒谷子落地没有响声……依此类推，一整袋谷子落地根本不会有响声。这个理论让偷粮食的贼首先骂你是书呆子，否则他怎么被人抓住的呢？

思想中的真理和事实上的真理往往不是一回事儿，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让人们不要耽于逻辑思维这个“看山是山”的初级层次。世界大得很、境界多得是，往前看往上看，还有“不是山”、“只是山”的更加美好的境界啊。

能蓦然回首吗？那是最高境界的天之华！

2. 关于健康长寿。习禅可以长寿，有的人半信半疑。

人寿命的长短，主要取决于遗传基因，也就是 DNA，脱氧核糖核酸，这没有错。这是先天的条件，我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力。剩下影响人类寿命的因素还很多，例如吃、穿、住、身体锻炼的状况、生理心理的健康程度等等，这些都已被人们所关注。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心情、心态。一提起心情心态，大有迷信之嫌，有的人会问：“难道我天天笑就长寿么？”

这显然受相声影响，不过笑比哭好这却是真的。还有人问我："你说心情好就长寿，这是唯心主义，难道我想长寿就长寿?"这位显然是来抬杠，真该给他两丸"去疯散"去去邪气。

有的人心宽体胖，凡事嘻嘻哈哈不上心，这种人长寿；有的人吃得下睡得着，什么事撂爪就忘，此人也长寿。但工作紧张的人都难长寿，凡事爱钻死牛角尖的人也不长寿，凡事爱算计爱计较的人更加的不长寿，为什么?

近几年医学的发展终于在"生理心理医学"上找到了确凿的理论根据。

日本人春山茂雄在《〈脑内吗啡〉与健康》一文中做了阐述，我们在此只简单的介绍一下：

> 人在生气和发怒时，大脑会分泌出一种叫"去甲肾上腺素"的荷尔蒙。这种物质其毒性仅次于自然界中的蛇毒。它使人衰老，早逝及导致疾病。
>
> 人在精力充沛的工作时，大脑会分泌出一种叫"多巴胺"的荷尔蒙。这种物质激发人的热情和干劲，但分泌过多，能量消耗过头，依然会造成早逝。这也就解释了出类拔萃的天才人物英年早逝的生理及心理的原因。
>
> 心宽体胖的人，万事不用心的人虽然长寿，但一生平平难以有什么大的作为，更何况谁又能一辈子不发怒不生气？好在人还有一种本能，即在愉快时能分泌第三种神秘的荷尔蒙"B——内啡呔"。它是一种"脑内吗啡"，可以激发处于热情工作的"多巴胺"以激情方式发挥出10－20倍的功能作用。它具有类似杠杆原理那样的增强、放大的效能。
>
> 要使自己多产生脑内吗啡——"B——内啡呔"，就要学会缓释紧张和愤怒的情绪，学会遇事往好处想的"利导思维"的方式。佛门的舍得、儒家的吃亏是福、禅门的空无观，正是"利导思维"的产物。自古以来，悟道的禅僧大德高瞻远瞩洞察事俗、豁达乐观敬于佛事，他们具有感化人心灵的魅力，而这正是脑内吗啡的作用。
>
> ［春山茂雄］



医学界对这一研究成果欢欣鼓舞，春山茂雄接着说：

"豁达乐观的人一般都长寿，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这些人对疾病具有强大的抵抗力。这也是脑内吗啡的作用效果。他们即使感染上艾滋病毒，大概也不会像一般人那样发病。免疫力得到提高，治愈力自然也随之增强。"

春山先生语惊四座，连艾滋病都有可能治愈，还不打针不吃药，听一两个相声段子就能"治"好，这实在是相声行当的喜讯，普天下患病者的福音了。是否真有那么大效力？春山先生只以"大概"二字一掠而过，似乎有点儿不那么……这是不是叫"春风过驴耳"？我看不是，咱们是人，对春风总应该充满希望。而更令人欣喜的是："心灵所思考"的东西已不再是抽象的纯思辨的概念，它确确实实是物质化的"作用于身体"的东西。这个结论已不容置疑。

说得不错，唱得也好听，可关键是怎么样才能让人真的从心底里愉快起来？一听相声乐了，相声完了又烦了，如此的乐法，并不能使自己的大脑分泌脑内吗啡。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如何处置？这当然不是春山先生能解决的问题，当代医学、心理学、哲学、都没讲。

可禅却讲了，它把这作为一个"密"没有直接告诉你，需要你自己去修、自己去悟。

这一小节我们讲了思维的三种形式、情感的三种形式、精神境界的三个层次和禅与长寿。希望诸位能修得豁达、长寿，能体验到人生的最高境界，能多些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

三、禅是什么

既然是讲"禅韵"，那就必须讲清楚禅是什么。

禅是什么呢？

禅，其梵文为"禅那"(DHYANA)。鸠摩罗什译作"思维修"，玄奘大师译为"静虑"。

它在传统佛教中是个什么位置呢?

大家常说的达摩面壁九年、禅僧入定……这个使精神集中思想专一的面壁和入定就叫禅。但严格说起来它并不是禅,或者说它并不能解释清楚禅的所有内涵。

"禅"亦称"禅那",梵文称三昧(SAMADHI),亦作三摩地、三摩提。它含有"定"的意思,属于诸种"三昧"中的一种,称禅定。传统佛教有多种"三昧":念佛三昧、一行三昧、禅定三昧、数息三昧等等,也就是说有多种"定"法。而禅定一法在众多定法中含有止与观的因素,这是它的特殊之处,因此称得上"静虑",即先静而后虑之意。

"止",梵文为奢摩他(SAMATHA),讲的是心绪平定,万念归一;"观",梵文为毗钵舍那(VIPASYANA),讲的是思维活动,它多含联想、想象等纯主观因素。"止,而后观",实在是咱中国人的传统。老子在《道德经》中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观其复。"看来佛道两家对止观一法都没有异议。就是现在的广告,也止观起来,什么风动、竹动、心动。于是快去买什么保险入什么股……如此心动之禅,如此止观之法,定会造就不少更加胡说八道的"广告弟子"。"广告弟子"什么样?"跟着明星学做人,随着广告学生病"是也。

所以,要说禅就是止观,怕是太牵强。要说禅门含有止观一法,还是说得通的。止观只是禅门里的一个法门而已,万不可倒过来认为禅宗是止观法门中的一种。看来禅的重点在于入定,以止观法、以观心法、以念佛法……来入定。这些具体的方法并不重要。那好了,入定干什么?有什么用处?入定要开悟!要明心见性!于是习禅的目的是"明心见性",禅就是知人性的一种修行的法门。

看来这个结论就比较正确了。至于修什么功法,怎么修才能开悟而"明心见性"呢?这就不是前言可以讲清的了,我们放到正文中去说。

在本世纪初,日本人铃木大拙先生发起了禅宗复苏运动。他认为古代的禅具有"禅的超历史性",可以医治现代人心理上的种种疾病。而与之唱反调的是胡适先生,他认为禅具有"禅的历史性、时空性",所以不具有医治现代人心理疾病的功能。孰是孰非?说到底,二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铃木大拙先生是个修行人,他看到禅具有培植人的德性和明了人的本性的功能,所以他认为禅是超历史性的,任何时代的人都需要习禅

以颐养德性，以明心见性。而胡适先生是个文人，他考据的本事非同小可。他看到禅宗作为佛教的一个宗派有其成长、发展、成熟和消亡的过程，所以他认为禅宗具有历史的时空性。也就是说禅在当今作为一个整体的思想体系它不可能复苏，它过时了。

二位的见解都没错。禅宗作为宗教派别具有历史必然性，也就是了解禅宗，必定要了解历史，这就是本书为什么要花很大篇幅去讲历史的原因。而禅（不是禅宗）是以明心见性为目的，对人的本性进行研究和品味的"学问"，所以必然含有超历史性的东西。我们当代人不妨拿来看看，有用的就用，无用的就弃，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本书在介绍具体禅法的同时，再把禅的各门各派不同的研究成果也一一列举出来，供诸位习禅悟道的同修参考。

本世纪50年代，西方人对中国的禅兴趣倍增。这种东学西渐情况的发生大约有三个原因：首先是西方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研究禅，以图在这两个学科上有所突破；其次是社会学学者和哲学家研究禅，试图以反科学、非理性和直觉引导人们回归人性和大自然；再其次是巫术者试图用禅来开发功能。在此我们对这三种情况不做评价，大家明了什么是禅以后自有正确的看法。只是如此这般的一炒作，一闹腾，禅的身价倍增。连同明白禅的人和不明白禅的人全飘飘然，咱们老祖宗留下的遗产，成了无所不能的国宝。它沾上了超历史性的人文因素、非超时空的历史因素、心理因素、哲学气味、反科学桂冠、巫术之嫌……一切更加迷乱复杂起来。

世界上大凡迷乱和复杂的事情，不外乎有三种情况。

第一，原本极简单的事物，因其简单才为复杂提供了可能，于是就渐趋复杂了。例如，$1+1=2$，只因这个算式十分简单，所以复杂到各行各业都研究它。音乐家认为两人合唱其音量小于2；农夫明白两匹马拉车其合力小于2；战士们明白战场上和战友并肩作战其效果大于2；管理者明白两个人闹意见则 $1+1\approx0$；社会学者说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将等于3个个体（绝对符合计划生育国策）……而原本极其复杂的 $\pi=3.1415926$……因其复杂，所以只是简单的用于圆周率，并没有太多的人再去研究它。再比如达摩禅，它简单得只有"二入四行"，所以日后的禅宗传人才能把它复杂到五门七派三宗。

第二，大凡沾上"情感"的事物，因其情感的非理性而使一切显得艺术

化。于是用纯理性的逻辑去看这艺术化的事物，定然是毫无头绪的迷乱和失去纹理的复杂。禅本身就是一种“合情合理”的修持行为，禅的开悟是以理性与情感相结合为基础的，并以悟到这个结合为最终目的的——明心见性的开悟。这是良心的奥秘，是精神生活的最高准则。人类的历史本身就含有人类自身的思想史，人类的文明本身就含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人类的意识形态除了科学、哲学，必定含有艺术、宗教与人文。凡牵扯到人的事情，全复杂，没有一清二白的事。除非已盖棺论定……不敢翻案的例外。

第三，一个事物如果它是一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那么它必然是复杂的。所谓系统，是既具有两维平面的网络性，还具有三维的立体及系统与系统间的层次性和外延间的关联性。

拿禅为例，先看看它的平面网络性：禅所具有的止观、动静、色空等两边（两端之意），则本身就呈现出平面的网络性。谈止必须注意到观，谈观也必须有止。止观不二、不着两边、含摄两边即为禅。同理，谈理必须注意到情，谈情也必须注意到理。情理不二、不着两边、含摄两边即为禅。它的外延界限是不允许超越出人之情理，但其所涵可以说是无限大，虽然它有个外延。

再看禅的立体层次性：习禅的境界其本身就有“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只是山、看水只是水”这么三个层次。同时，从禅宗由如来禅发展到祖师禅再至分灯禅（也称传灯禅）也可以看出禅的层次性。层次性的外延是不能超出宗教的束缚，这个束缚看起来也很大，但其所涵仍可以说是无限大。

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到底什么是禅呢？

禅——是一种向内心反省和修习的方法。它以开悟为标志，以明心见性为悟道，以好好做人为最终目的。

禅宗——以此方法为法门的佛教的一支。

禅学——研究此禅法的学问。

禅，因含有情与理的因素，所以它是情与理的辩证统一，这和艺术极相似。要悟禅道先悟艺术是释迦牟尼倡导的，也是本书以讲艺术影射禅道的道理。

禅，因含有网络性和层次性，所以它必定是一个系统的辩证统一。科



学家们管这种辩证统一叫做：一个层次内物质所具有的“自组织现象”。换言之，谈禅论道只知禅是不成的，还要清楚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人文、艺术。只有这些因素相互契合，才有了历史。

历史是真实的，不是理论。

真实的东西必然是组合成的。

所以本书力图讲清历史、人性、艺术，进而讲清这个大系统中禅所处的位置，同时也力图讲清这子系统自身的问题。

禅，在理性方面的显现，就是“见地”和文字性的公案、灯录等文字资料与论著。

禅，在情感方面的显现，就是非文字性的体味、体验和大量的故事、比喻、诗、画……

禅，在艺术领域中显现出禅境、禅趣、禅味……一切是寒山远钟、清净悠然……就连朱熹的“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也吸收了禅的见地和意境。

作为一种审美情趣，禅既有宁静致远之境——这人们所共识的；同时也有道在通流之意——这常常是人们所忽略的啊。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谁能说这不是禅？

禅，在人格人品中，流露出一种风骨。它是透过一个人的感情而让人揣摸和感受到这后面的理性的气节和绝不退让的无理性的个性，“达摩面壁图”及文天祥的《正气歌》就是这种风骨的典范。

禅在人际关系上，太强调对个性的追求，所以禅宗丛林要立下清规，让你无条件无道理的全部接受。即使这样，禅僧们也难改太潇洒的脾气。“宁带一千兵，不带一百僧”就是个证明。走江湖的僧人们总似独往独来的大侠，未见有成班成排成众的。

禅在成长过程中，有农禅和文人士大夫禅之别。

禅作为人文科学的一支，确实存在着超历史性……

以上罗嗦了这么多，讲的都是“禅是什么”。要简单说，一句话：“禅是学做人、做明白人的修行法门。”要仔细地说，惨了，需从历史、人性、艺术、禅韵慢慢道来，希望诸位不要烦。

前言就到这里吧，留下很多问题要到正文中去讲。

所谓正文，无非是以历史为骨架，从哲学观念和文学作品以及禅学中

去揣摸祖先们思想与情感的发展历程，这其实也是人性在情与理两方面发展与制约的过程。从这种揣摸和回顾中，我试图能从里边找到些有用的东西，有助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富强。是否科学是否讨人喜欢我不知道，但写此书只是希望能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此而已。

我并没那个本事告诉诸位应该怎样；我只是试图告诉诸位我们的祖先曾怎样过。

祝大家万事如意！

祝同修学而有成！

一九九九年七月六日



目录

前　言

第一部分　从远古到春秋

第二部分 从战国到东汉

第三部分　从魏晋到盛唐

第四部分　从中唐到南宋末年





第五部分 元、明、清(至鸦片战争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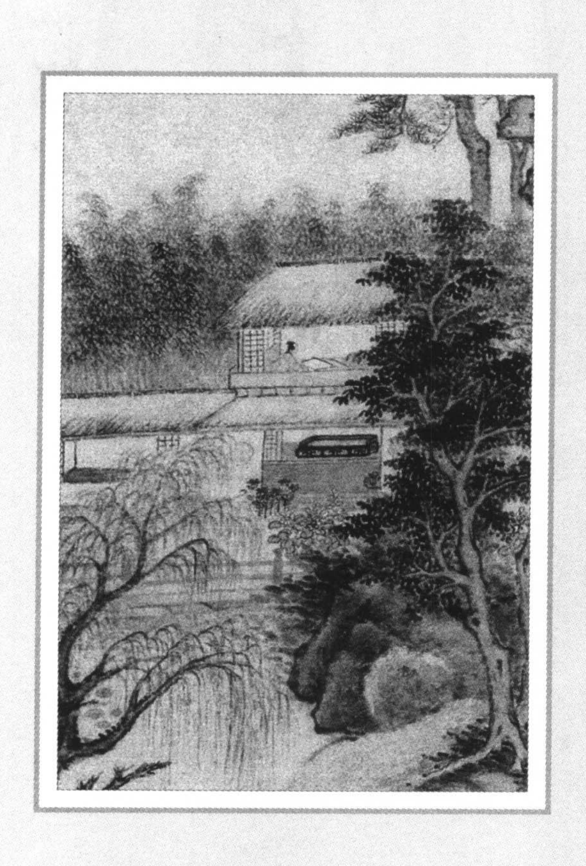
结束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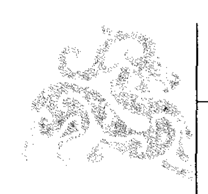




第一部分

从远古到春秋





第一章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天地人是什么？源于什么？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人们，至今。

中国人自有自己的解释，叫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大意是先于宇宙生成时，已有了个叫盘古的汉子，另有一把巨大无比的钢斧。盘古闲得没事，抡起钢斧乱劈乱砍，于是混混沌沌的宇宙变得清晰起来，上升者为天，下降者为地。大概盘古砍得太累，不是“侃”得累，那时还没第二个人能和他侃侃家长里短。也许是闲得太累，于是死去而化为众生。而另外的说法让女士们大大地欢迎，叫女娲造人。是说有个女神人，她人首蛇身，样子有些怪怪地，但本事大得很。纣王因言语调戏她，被她派了九尾狐变的美女毁了江山社稷，所以在此咱们也多恭维少挑刺儿。话说女娲完成了补天的伟大业绩和形象工程后，闲来无事，用黄土捏了个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人，此人居然活了。于是女娲高兴起来，不停地捏下去……人类诞生了（那兰眼白皮的和黑皮白牙的，这儿可没捏。大概那一片归上帝管）。后，女娲因工作过于紧张、操劳过度而英勇牺牲，死后其身化为山川河流、百草众生。

以上讲的是神话，太艺术，不能认真。但绝对是国货，一丁点合资的痕迹也无。

讲得最正经的是老子，这不是神话。老子正儿八经地认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也就是说有那么一个混合物叫“皇太极”，它像鸡蛋黄和鸡蛋清搅匀了一样说黄不黄、说白不白。皇太极嘛，就这个样子，谁要是不信，那你拿个样子来看看？所以，它就是这么个不叫东西的东西。一





日，在某个缘由下，这皇太极由“道生一，一生二”生成阴阳二气。这一会皇太极变成黑白各一半的阴阳鱼或八卦图了。再“二生三，三生万物”，忽啦啦有了人有了万物。不管你信不信，老子是这么认为的，道家也是这么看世界和宇宙的。

佛家讲得不算正经也不算神话，佛家讲得极玄而又有学问，叫“缘起性空”。诸位起码文科上到大三才能明白什么是“缘起性空”，挺深的学问和道行，但说白了就是“无中生有”。你爱信不信，释迦牟尼如是说。

禅宗讲反观自性，真去观一下什么都没有。这叫观到最原本最真实的“性”了。性空，才生万物，才有人。这个说法离真实的理论相去不远，于是西洋人对东方文化行注目礼，羡慕得不成。咱中国人也竟有人伸引出去，说是祖宗们有特异功能，可以于天地大定之法中一路地观上去……只要“止”得够火候，那“观”得就可看见 200 亿年前宇宙的大爆炸。真让人脸红，这也算是修行人讲的话？“不绮语”乃佛门之根本戒啊，千万别拿没文化当什么个性去媚雅、去现眼！

总之，佛教认为天地人源自空；老子认为天地人源自道；神话认为天地人源自神。

到了 20 世纪，物理学的两大支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其他科学家们的“量子论”，它使我们终于有了一个科学的看法。爱因斯坦认为一切应归于一，这和老子的思路完全相同，也就是一定有个“万物的理论”。他在玻尔的“波粒二象性”的基础上试图把物质的存在与能量、时间与空间、相对论和量子论归为一。但他并未成功。

直到 1969 年，霍金和彭罗斯用数学方法解释了看不见的黑洞，解释了大爆炸的原理，同时描述了于空无中喷出的粒子，这东西被称为“霍金辐射”。这一回真的是无中生有了。霍金部分地把相对论和量子论结合了起来，向“万物论”迈出了一步。

霍金在他的著作《时间的简史》中讲述了宇宙由爆炸的“奇点”至宇宙膨胀到一定程度，引力使之内塌，形成了一个“大危险点”——“奇点”，于是造成了时间的开端和结尾。在爱因斯坦和霍金的理论中，“空间与时间、物质与能量是融为一体的。”

好了，这理论实在高深，咱智慧太少，只能理解到这里。

小结一下：宇宙是由空无中生出的，包括时间与空间、物质与能

量，所以一切物质与能量必然占有时间与空间。在我们把时空看成不变的常态的情况下，物质不灭、能量守恒。而物质的形态从低级到高级有层次之分，即：无机物、有机物、植物、动物、人；能量的形态从低级到高级也有层次之分，即：体力劳动、情感活动、思维活动。而这一切的天地人、物质与精神（能量）全归于“万物论”的一，又归于“奇点”的黑洞似的空无之中。

说点题外话。我真的十分敬佩爱因斯坦和霍金这两个人。虽然他们不是佛门中人，但我敬佩他们的才学与见识，更佩服他们在人格上的坦诚。爱因斯坦《在哥白尼逝世410周年上的讲话》中说：

“要令人信服地详细说明太阳中心概念的优越性，必须具有罕见的思考的独立性和直觉，也要通晓天文事实……”

而霍金说：“关于宇宙来源的研究介乎科学与宗教之间，而我要站在科学一边。”

我们这些习禅悟道的当代人，要明白宗教信仰是一回事儿，真正的习禅悟人生而去好好做人是另一回事儿，我们站在何处？

一、远古与上古史略

约在150～200亿年前，有了宇宙、时空、物质、能量。

约在50亿年前有了太阳系、有了日月及九大行星，也就算是有了天与地。

但何时有的人呢？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170万年前有了元谋猿人、50万年前有了蓝田猿人、40万年前有了北京猿人。这些都是考古所证实了的，算是已弄明白了的事实。至于由类人之猿何时何地因何缘由就变成了类猿之人，却一直没弄明白，怕是太遥远之故吧。有人说是外星人把地球上的猿变成了人，这又算是20世纪的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的翻版。只是这一回女娲造了几种肤色的人，不止是黄种人。说这是神话，理由在于是谁又把造人的外星人由外星之猴造成外星之人的？难道另有外外星人与外外星猴？再上溯怕是回到上帝那儿去了。此类神话别说科学，连宗教的边都有沾不上，只是当代神话。



后来有科学家给非洲大猩猩查了一下 DNA，惊异地发现其遗传密码有 98%与人类相似。惨了，人类再也别神侃了，再也别和什么外星人去攀亲戚了。人就是由猩猩变成猿进而变成人的，人的娘家亲是动物，是猿。

科学家们进一步推测，这变人之猿可能全部来自非洲中部，约在300～400万年前由猩猩之一族慢慢变成了猿人。看来时间与地点已经确凿无误，只是为什么猩猩非要变成猿尚查无实据，只有猜测而已。猜测，难免门派众多、说法各异，咱们就略去，不再费那个精神。

至于非洲的猿人如何遍布了世界？世上如何有黑、棕、黄、白四种肤色的人？这一点上科学界的猜测较一致，所以简单地介绍一下。科学家们说随着非洲中部原始的猿人人口增加，猿人们不得不分出部分猿到较远的地方去生活，这就形成了迁徙。留在当地的猿人自然成了黑种人；沿非洲中部北上，经埃及、伊拉克、伊朗到印度一带，在这些地方定居的人，因气候不似原驻地那般热，所以慢慢成了棕种人；凡仍在迁徙的猿人，经缅甸、泰国到中国的黄河中上游，天气进一步寒冷，所以在此地定居下来的人慢慢变成了黄种人；仍有继续冒险者，经河西走廊或西伯利亚往西，一直到达欧洲大陆的人，因冰天雪地的洗礼，加之穿得多、在室内的时间多而见太阳少，所以成了白种人。这里从亚洲的黄种人中有一支过白令海峡到美洲，算是黄种人的分支。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从非洲迤迤逦逦地到欧洲，因气候逐渐变冷，猿人们就一路的掉毛掉色，完成了人类散居非、亚、欧、美的任务，创造了适应环境的四色人种，同时促使了猿进一步向人的进化和靠拢。

以上的结论，乃专家所言，我在此只是抄袭。凡有不服气的人，去找古人类学家，与我无干。

我在本书中，把远古和上古时代定在公元前 2100 年，夏朝成立之前。

在远古和上古这段历史中，依中国人的习惯分为三皇时代与五帝时代。

(一)三皇时代

这个时代依中国的神话是从开天辟地至黄帝，它从已有考古证实的170 万年前至公元前 2700 年。三皇指的是天皇、地皇和人皇，这里具体

的纪年和国土、劳作方式等等统统不可考，太神话了。

依较科学的方法，这段历史分为两个时期：

1. 170 万年前至公元前 5000 年，为母系氏族时期。据考古的发现，10 万年前的丁村人、山顶洞人还处在旧石器时代，而 1 万年前后，中国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

公元前 6000 年有裴李岗文化；

公元前 5800 年有磁山文化；

公元前 4800—公元前 4300 年有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半坡氏族和河姆渡氏族都属于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处在黄河中游，而上游有马家窑文化。

母系氏族的建立，约在 7000 年前，这时居住在黄土高原的人已纯粹是人了，绝无猿气。母系氏族是中国人的第一个社会形态，人们开始原始的农业，兼营第二产业：饲养和狩猎。此时生活定居，有了房舍村落，有了纺织、制陶，每个人都知有母，也算其乐融融。没娘的孩子也不会像棵草，因为氏族公社包吃包住，生有居室，开会有场所，死有公共墓地，真是挺不错的事儿。

2. 公元前 5000 年—公元前 2700 年为父系氏族时期。这个时期的代表是良诸文化、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

父系氏族，产生一夫一妻制，男耕女织为主要的劳动模式。家庭的出现，代表了私有制的出现，私有制的根源在于有了家庭。于是其乐也融融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贫富分化、占有奴隶、劳动为大家一变而成为劳动为私人。这一切已预示着原始氏族社会的瓦解，奴隶社会的诞生。

（二）五帝时代

这个时代由公元前 2700 年—公元前 2100 年。在这 600 年间，是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

五帝，指公元前 2600 年的黄帝、公元前 2500 年的玄帝、公元前 2400 年的喾帝、公元前 2300 年的尧帝及公元前 2200 年的舜帝。

黄帝，是姬姓部落的首领，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黄帝部落生活在陕北和甘肃东部一带，和黄帝同期的还有炎帝。

炎帝，是姜姓部落的首领，号烈山氏，也就是神农氏。炎帝部落生活



在陕西的岐水，原为姜水。黄帝与炎帝两个部落在发展中产生冲突，于阪泉（河北涿鹿东南）大战一场，后以黄帝得胜，黄炎结成同盟而结束冲突，所以姬姜两姓一直有密切联系。

史称黄炎联军曾在涿鹿大败蚩尤，这就是有名的涿鹿之战。此战以黄炎联军大胜告终，从此，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慢慢形成了以黄帝为主体的华夏族，黄帝被称为"人文初祖"，而华人自称"炎黄子孙"。

这一段历史对中国人很重要，它使中国人五千年至今都有着"民族认同感"和"地域认同感"。不管你在世界各地，凡遇到中国人都亲，都有"我们本来是一家"的心理。凡是中国人不管你生活在哪个国家，都要回黄土地看一看，因为这里是大家共同的根。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民族具有这么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地域认同感"，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当然，杀熟也必须是老乡才成，也必须是有某种认同感才成，这另当别论。总之，上述两种认同感至今竟然是越来越浓厚、越来越强烈，这是祖先留给华人的传家宝。

《史记》以黄帝、颛顼、喾、尧、舜为五帝，禹为夏朝的开国之君。尧、舜、禹都是禅位而不是传位，禅位就是禅让。到禹死后，儿子启即位，禅让的事儿就再也没有了，都变成传位了，只留下"禅"，变为几千年后佛教中的法门。

二、夏、商、周史略

公元前2100—公元前1600年为夏，传14世、历17王，凡471年。

公元前1600—公元前1100年为商，传17世、历31王，凡496年。

公元前1100—公元前771年为西周，传11世、历12王，凡330年。

（一）夏王朝，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

夏王朝的活动中心在今天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的地区。

夏，原来的部落叫夏后氏，姒姓。

夏，已初步的有了官僚机构，即：牧正管理畜牧业、车正管理造车、庖正管理膳食，同时已经有了专业的军人、军队、刑法和监狱。

夏朝最后一个王叫桀，他是中国第一个有名的暴君。我们成语有一

条叫“桀骜不驯”，这个“桀”字就是由这位暴君给咱中国人留下的遗产。夏桀好色，宠妹喜。为得妹喜的欢心，大兴土木、扩建宫室而不顾人民死活，造酒池肉山寻欢作乐、奢侈荒淫无度。有一个大臣叫关龙逢，对桀的暴行实在看不下去，多次进宫劝谏。夏桀大怒，把关龙逢处死，从此再也没人敢进谏了，关龙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因言得祸的正直的大臣。没人进谏，夏桀耳根子清净了不少，腐败得以继续发展下去。

公元前1600年，“商”的部落兴起。于这个世纪中叶，商灭夏，桀被流放，死在安徽巢县西南，当时叫南巢的地方。夏亡。

夏朝为中华民族所贡献的，主要是夏历。夏历指的是古历法，约等于月亮历，也就是阴历。

因为中国是农业国，所以我国一直沿用两种历法——夏历（阴历）及农历。如今人们都认为阴历即农历，二者是一回子事。其实不然，阴历以月亮的升落为依据，叫月亮历。它对于潮水涨落和人体生理周期有直接关系，它适用于渔业及人的生理调节，但它不适用于农业，而农历才是为农业而特定的历法。农历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它就是以24节气为基础组成的历法。如：立春、谷雨、惊蛰、清明……这就是农历。如果诸位细心算一下，会发现阴历与农历相去甚远，但农历和阳历却差不了一两天。例如每年的清明节都在阳历的四月四号或五号，而每年的阴历年，也就是春节则差得远了，有时在一月十几号，有时在二月二十几号，前后相错近四十天。而农历与阳历只差一天，最多差两天。

近代，中国人引进了阳历，就是太阳历，于是咱们中国的年历上有三种历法并存：阳历、阴历、农历，只是农历已经化成节气一并归入阴历这种叫法之中去了。

如果说黄帝让中国人有了“民族认同感”，黄土地让中国人有了“地域认同感”，那夏历（阴历）则让中国人有了“时间认同感”。每当农历的清明、阴历的中秋、春节……全世界的中国人都会办同样的事儿：祭祖、赏月、包饺子……放爆竹、串门拜年……舞狮子、划龙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地方例外。

历法、农业、黄土与黄种人，就是这么掺在一起，难扯难分。老外们不懂，他们很难理解中国人这五千年的文明与感情。规定禁放的人或许也不太懂……



(二)商王朝，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

商的第一个君主叫汤，也叫商汤、成汤、天乙、大乙、成唐、唐。如今汤姓与唐姓不知有无瓜葛，应让《百家姓》摄制组去考证一下。

商汤建都于亳，几经搬迁，于公元前1400年君王盘庚迁都到殷。殷，即河南安阳小屯村，所以商朝在迁都后也称殷商。后，帝乙时商迁都到朝歌。

商朝的最后一位君王就是纣王，纣王这个人聪明能干、气力过人，但他穷兵黩武、独断专行。他宠爱妲己，整日和妲己在离宫“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寻欢作乐。对于反抗和不满的人，他发明了“炮烙”的刑法，对于劝谏的人更是残酷地杀害以让耳根清净。他的叔叔比干拼死上谏，纣王不但不听，反而火道：“你讲了这么多道理，很像圣人。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挖出来我看看。”于是下令挖出了比干的心。就这么一个暴君，自然是众叛亲离了。后，周武王伐纣，纣王兵败朝歌，自焚于鹿台，商亡。

商王朝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是青铜器和甲骨文。

青铜器，是红铜与锡、铝的合金。因色泽为青绿色，所以铸造出的器物称青铜器。冶炼和铸造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它终于使人类摆脱了对石器的依赖而进入“青铜时代”。冶炼和铸造技术在人类文明史上，怎么夸耀也不过分。说它比今天的计算机、电脑都伟大，也不是言过其实。因为它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纪，并为铁器、为人工合成技术、为化学、为铸造……开了先河，为人类改造自然打开了一条新技术、新思路、新观念及新理想之门。

单就铸造“司母戊大方鼎”来讲，其制造的难度和技术的精湛以及组织的困难，就令今人也感兴奋。“司母戊大方鼎”1939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呈长方形，高113cm、长110cm、宽78cm、重875公斤。要制造它，需70个熔化铜的坩埚同时熔化铜汁而一起灌铸，这70个坩埚的熔铜、运输、浇灌等等，需三百多人共同协调工作方能完成。这样难度的技术工作，在今天也是要颇费心思的。

甲骨文，是刻在乌龟壳或牛的肩胛骨及一些兽骨上的一种象形文字，它的用处在于记载占卜的结果和卜兆。

甲骨文，是中国人第一种成熟文字。

《易·系辞》中说："上古结绳而治"。就是说在甲骨文出现之前的远古上古时期，人们是用不同长短、不同颜色的绳子，在上面依一定的间距打出不同的绳结来表示不同的意思。例如要出门打猎，用红绳子，预计三天必须回来，那就打三个结。然后每天解开一个结，到第三天结解完就必须回家了。这显然不如甲骨文方便准确。

甲骨文虽然与如今的汉字相去甚远，但大多数汉字是由甲骨文演变来的。虽然甲骨文以象形字为主，但用指事、形声、会意、假借、转注等方法去构字也已开始运用。如果说黄帝是中国人的"人文始祖"，那甲骨文则是中国人的"文字始祖"。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小篆统一文字，使所有的中国人有了"文字认同感"。这种文字的认同，其基础正是源自殷商的甲骨文。如今，在我们赞叹中国人总是有那么一种爱国的凝聚力、有那么一种民族认同感时，总是不知为什么，不知是什么原因产生的这种认同。其实正是同源的"民族认同"、同地的"地域认同"、同历（历法）的"时间认同"、同文的"文字认同"而久久沉淀产生的一种综合体。尤其文字认同，语音可以不同，但书写出的文字相同、意思相同，这不但加强了文字认同感，并对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周王朝，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奴隶制国家

周王朝是中国的最后一个奴隶制国家。

周的始祖叫后稷，姬姓。在周文王和其子周武王的努力下周灭了商，建立了周朝。《封神演义》讲述的是这父子二人灭商的故事。中国人常说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文治武功"，都是由文王武王这父子俩打天下和治天下演变而来的，而最受儒家尊崇的周公，则是指武王之弟。

周公、周成王治理国家业绩卓著。《史记·周本记》在记载成王、康王时说，当时国家繁荣、社会稳定，四十多年没使用过刑罚，被后人誉为"成康之治"。说了半天，周公到底施行了什么政策法规造成"成康之治"并让孔子崇拜得五体投地呢？简单地讲就是"三制一礼"。

"三制"，指等级制、宗法制、井田制；"一礼"，是指刑与礼。

1. 等级制。这是周公的魂，也是孔儒的魂。一切人、一切事都要分出等级和次序来，"排排队，吃果果"，"大小有序、内外有别"、"皇天厚土、爹亲娘亲"、"姑姨舅妈、婶子舅子"、"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书生儒士、婊

子戏子”……总之:“人分三六九等、货分甲乙丙丁”,“十字街头、婊子房里、泰和殿上、三家村中”概莫能外。在中国你想称老大,只有两种情况能让你得逞——生与死!你刚生下来,人人向你鞠躬致敬,长辈晚辈都向你笑,唱个小小的瘦喏:“好胖的小子!”或“好俊的丫头!”完了,这辈子已风光一回。下一回是你停在正屋的床板上,脸上盖块布,街坊四邻、七姑八姨、乡长里正、老少爷们都向你悲,唱个大大的肥喏:“早登仙界”或“速往瑶池”。又完了,没事了。

跑了题,书归正传。

等级制体现在人这方面,是人分四等:王为第一等;贵族,包括诸侯、卿、大夫、士为第二等;平民老百姓,也叫庶人、布衣,为第三等;奴隶为第四等。

2. 宗法制。宗法制是一夫多妻制的产物。妻所生的子女为大宗、嫡出。如贾政的老婆王夫人所生的宝玉,是正宗嫡出,名正言顺地承袭祖业,在荣宁两府呼风唤雨。贾政的妾赵姨娘,惨了,先就不能叫夫人,只能叫姨娘。她所生的子女叫小宗、庶出。所以贾环就算白给,在荣宁两府含垢受辱,狗屁一个。

宗法制是等级制在家庭中的体现。地方换了,魂并不散。

3. 井田制。井田制是把一块土地横两刀竖两刀切成井字形的九块。中间的那一块最肥最好最不易受到祸害的为公田,是为君王朝廷或奴隶主种的,其余八块分给平民和奴隶去种,而公田是这八块地的耕种者轮流或平摊来耕作。

很明显,井田制是等级制在生产资料中的体现。对象变了,魂并不散。

4. 刑与礼。刑,刑法;礼,即礼数。具体的什么刑什么礼我们不介绍,只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够了。也就是说刑罚不用于大夫及其以上的君王,不适用于第一、第二等人;礼数不用于庶人及以下的奴隶,不适用于第三、第四等人。

可见,刑与礼是等级制度在法律和道德伦理范畴内的体现。应用的范围变了,魂并没有散。

公元前 841 年,因周厉王逃走,周实行“共和行政”。是年中国有了逐年可查的历史,中国人开始自觉而系统地记载史实与年代。

西周最后一位君王是周幽王，他迷恋的女人是褒姒。褒姒很美，但整天板着脸没有笑模样。夏桀宠妹喜，为她撕绸缎、建酒池肉山、杀关逢龙以讨妹喜欢颜，最终亡国；商纣宠妲己，为她造离宫、造酒池肉林、发明炮烙、取比干人心，最后自焚鹿台。历史惊人地重演，幽王紧随夏桀与商纣，宠褒姒而"烽火戏诸侯"。这一回玩得太离谱，只为红颜一笑，拿军国大事开玩笑。于是在公元前 771 年被诸侯乱刀砍死于骊山脚下，再也玩不动了。

周幽王死，众诸侯立太子宜臼，为周平王。

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迁国都于洛邑，西周亡。东周开始，也称春秋。

三、春秋史略

公元前 770—公元前 256 年，史称东周。它历经春秋与战国时期，亡于秦。

东周传 25 王，历 514 年。

公元前 770 年—公元前 481 年，史称春秋。

春秋的历史，可以说是五霸争雄的历史，我们依这五霸迭起为线，来看这段岁月。

(一)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楚国原本是"南蛮"小国，并没有什么人把它当回事儿。公元前 704 年，楚国君自称楚武王，公元前 690 年楚武王的儿子继位，自称楚文王。敢自称是文王和武王，这显然是向东周王室叫板并不把中原诸侯放在眼里。后，楚国逐渐强大，建郢都、灭申国、息国、邓国，直接威胁郑、宋、陈、蔡等国。公元前 678 年，楚军攻占郑国的栎(河南禹州)。这就使中原诸国紧张起来，它们试图找一个国家当盟主，联合各诸侯国一齐抗楚。可谁当这个盟主呢？齐桓公就是第一任霸主。

齐桓公叫姜小白，公元前 686 年为逃避杀害他哥哥齐襄公的叛将的迫害，他和兄弟公子纠分别逃往莒国和鲁国。公元前 685 年，内乱平息，兄弟二人都争着回国当国君。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从莒国往齐国赶，而



管仲辅佐公子纠从鲁国往齐国赶。两队人马不期而遇，管仲一箭射倒公子小白，可是这一箭射到衣带的铜钩上，公子小白佯装中箭身亡。公子纠一伙见没了竞争对手，放慢了归国的速度，公子小白趁机星夜兼程先到齐国，做了国君，即齐桓公。管仲无奈，只有和公子纠再回鲁国去避难。为报这"一箭之仇"，齐桓公逼鲁国杀公子纠，并引渡管仲。"管鲍之谊"是说管仲与鲍叔牙原本在一起下海行商时就是好朋友，后来上岸从政各事其主。如今管仲有难，鲍叔牙真够义气，对齐桓公说："大王要想治理齐国，有我足矣。要想称霸天下，则非管仲莫属。"于是齐桓公不念一箭之仇，任管仲为卿，位鲍叔牙之上。

在管鲍辅佐下，齐国先改革国政，再亲近周王朝，以"尊王攘夷"来树自己的威信，扩张自己的势力。这就好比如今有的国家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办自己私事一样。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三十年，齐桓公亲自带领齐、宋、鲁、陈、卫、郑、曹、许的八国联军向楚杀去，到召陵（河南郾城）扎下大营。楚国派大臣屈完议和，齐桓公请屈完检阅八国的仪仗队，说："这样的军队，所向无敌。"屈完是个外交官的料，听完此话不卑不亢，答："楚国有方城、汉水为屏，岂能轻易言败。"其实双方谁也不想真打，都是做做样子而已。于是定下召陵之盟，声明互不侵犯，缓解了楚国的威胁，齐国声名大振。

齐桓公对自己一生中这最辉煌的业绩也自豪得很，自称"九会诸侯，一匡天下"。

（二）晋文公"城濮之战"，践土会盟

召陵之盟第二年，公元前655年，楚国灭弦国、黄国，楚国的威胁复出。

晋文公重耳，曾在国外流亡19年，出亡时43岁，于公元前636年即位，已62岁。长期艰苦的磨练，使他成为一代明君。

重耳在逃亡时曾去楚国，楚成王设宴款待重耳，并戏言："公子一日为晋国国君，将如何报答我？"重耳说："愿与楚国结好。如晋楚争战，我定'退避三舍'。""退避三舍"，就是打仗时列上阵后，主动先退90里，以表示还了对方的人情债。

公元前633年，楚成王派大将子玉率楚、郑、陈、蔡、许诸国联军去攻

宋都。宋向晋求援，晋文公联合齐、秦去打曹、卫，攻之必救。曹卫是楚之属国，以此可解宋都之围。楚成王听说晋国出兵，下令子玉退兵。然子玉一介武夫，只知杀敌立功、封侯荫子，哪里知道政治的机窍。于是于公元前 632 年晋楚之争，演出历史名剧“城濮之战”。

这是春秋时规模空前的一场大战，双方动用兵员近五万、战车一千四百乘、战马六千匹。晋文公在交战前想起从前“退避三舍”的戏言，于是兵退 90 里，于卫国的城濮扎营。众将士不解，狐偃是文公的辅臣，他向众将士解释：“理直气壮，理曲气衰。国君曾许诺与楚交战定退避三舍。不退则曲，则衰；退则直，则壮。”这个道理实在是古今中外之通理。如今有的国家穷也罢富也罢，穷的穷横、富的不讲理，一付无赖流氓光棍样，居然还处处想动动武、玩玩粗的，真不知怎么评价他们。一句话，没文化。子玉正是这种急功近利的人，于是后果不言自明，子玉兵败，怕楚成王怪责，负罪自杀。

城濮之战晋国大捷，声威大振。周天子特派大臣去慰劳晋军，各国纷纷与晋结好。同年五月，晋文公在践土（河南原阳西南）举行盟会，周襄王也到会，封文公为诸侯之长。

总之，城濮之战和践土会盟使晋成为春秋第二位霸主。

（三）秦穆公称霸西戎

有的史书把宋襄公列为五霸之一，实为勉强。而秦穆公虽说不是称霸中原，但其实力和霸气却足以威慑全国，让人不敢小觑。

永结秦晋之好，是咱们常用的口头语。这指的是秦穆公嬴任好曾在晋文公出国避难时收留过他，并待他不薄，同时还把自己的亲女儿许配给晋文公做了夫人。而晋文公知恩图报，在他有生之年中对秦国多次的挑衅总是报以宽容的、息事宁人的态度得过且过。秦国要向中原发展，就直接和晋国有利益冲突，在晋文公死后，这个冲突更加表面化和更趋激烈，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对狼子野心的秦国更是忍无可忍。公元前 627 年，秦国悍将百里孟明视率战车三百乘穿崤山出函谷奔袭郑国，被郑国贩牛的商人弦高发现。弦高报警，秦国见奔袭的意图败露，只得放弃袭郑而把小小的滑国劫掠一番。在秦军得胜回国途经崤山时，发生了有名的“秦晋崤之战”。晋襄公的伏兵把秦军的三百乘战车和三千余人一网打尽，并俘





虏了孟明视。后，在襄公之母（晋文公之妻，嬴任好之女）的干涉下，只好放了孟明视等三名秦将。放虎归山岂是上策？这“秦晋之好”早晚会成“秦晋世仇”，这是后话。历史就是这么生动地教育着后人：与狼共舞、与蛇蝎为盟、与奸人谈友谊讲诚恳，那就是活该自找倒霉。“秦晋之好”流传至今成为佳话，“秦晋世仇”却鲜为人知，中国人实在太善良。

三年后（公元前624年）百里孟明视再度兵进崤山，埋葬那三千将士，将势力扩展到崤山的东山口函谷。然后向西杀伐而去，灭小封国12个、辟疆土四百里，使秦国独霸西戎，成了春秋时期不讲信誉、好战斗狠而成霸业的一个例子。它算是五霸之三。

（四）楚庄王问鼎中原

统观春秋，主要是中原诸国抗楚；而战国则是抗秦。

春秋的秦称霸，位在西戎，并没参与中原逐鹿。而楚国随着经济繁荣国力日增渐为中原诸国所惧。公元前614年楚庄王王芈即位，此公陷入声色、不理朝政，下令“敢谏者死”。臣伍举来得绝，给楚庄王献上谜语一则：“有一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庄王一笑：“我知其意，你回去吧！”没把这当一回事儿。大臣苏从急了，进言：“臣愿一死换大王醒悟。”这回楚庄王真得就听进去了，上朝听政、罢贪官、反腐败、重伍举、任苏从……深得民心，国人无不称快。公元前606年，庄王北上攻打陆浑，这仗一直打到东周都城洛阳城外。庄王为炫耀武力，不但陈兵城下，还扬言要进城看看周天子姬愉身体是否无恙？周天子急派大臣姬满迎出城去打探虚实。于“闲聊”中楚庄王问姬满周朝的镇国九鼎规制如何？工艺精否？能不能拿来瞧瞧？姬满壮着胆子回答：“此事不宜过问。”只此问鼎中原一举，足以证明楚国的实力可以称霸中原，遂为春秋第四位霸主。

（五）吴越争霸与徐州会盟

春秋五霸有几种说法，有人认为去掉秦穆公，换上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但春秋之争岂止中原一地之争？秦、楚、吴、越非中原诸国，可这是中国的事儿。所以从更广的地域来看，这第五霸实在应让越王勾践承当。

吴王阖闾，重用孙武，孙武就是写《孙子兵法》十三篇的那位大战略家。公元前506年，吴任孙子为帅攻楚，一直打到郢都，威风八面。在春秋时代能这么大败楚国，这是第一次。后因国内动乱，阖闾不得不撤出郢都。平乱后，吴王攻越，越王勾践大败吴军，阖闾受伤死于撤军途中。其子夫差继位，不忘杀父之仇，每日令随从大声斥责自己："夫差！你忘了越勾践杀父之仇否？"每次夫差必正色答曰："不敢忘！"公元前494年，夫差大败越军，但他不听谋臣伍子胥的话，没杀勾践也没灭掉越国。勾践在谋臣范蠡和文种的策划下，到吴国当了三年臣仆，所说的"卧薪尝胆"、"含垢忍辱"指的就是这段历史。勾践被放回国后，励精图治、富国强兵，每日大声自问："勾践！你忘记会稽败后之辱否？"公元前473年，越勾践举兵伐吴，灭吴国，将夫差流放海岛，夫差羞愧自杀。灭吴后，勾践领兵北渡长江、淮河，在徐州（今山东滕州）召集诸侯国会盟，自己做了霸主。

这段历史中国人都非常熟悉了，下边说点儿传说。据说西施本是范蠡的小蜜，但为了国家的兴亡，范蠡把这浣纱女通过越王而献给吴王夫差，施的是兵法三十六计中的美人计，夫差果然中计亡国于美色。当越王勾践徐州称霸时，范蠡早就看出勾践是"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之徒，于是劝文种隐退。文种不听，范蠡无奈，只有和旧情人西施二位私奔去了齐国，文种后来果为勾践所害。而范蠡和西施听说在山东下海做起了买卖，生意挺红火，老俩口儿日子挺甜蜜。中国的成语"端木生涯，陶朱事业"，是说行商取利也是君子之道。端木指孔子的学生子贡，陶朱公指的就是范蠡了。

以上，是远古至春秋的大略历史，挂一漏万，只求诸位原谅。浮光掠影、不求甚解，有时也算是悟性。









第二章

黄土地

——中国人思想与情感之源

这一章所讲的内容并不多，不再分小节。

这一章很重要。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摆脱了每日不停劳作的状况，劳作以求生存占据人类全部生活内容的时代过去了。首先有部分人可以挣脱出来，从事人性中于情于理的非体力劳动。随着时代进一步发展，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渐多，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其工作量也减小，有了一定的闲暇，于是文学、艺术、哲学、宗教诞生了。这是一个民族人性萌芽之始，是这个民族思想与情感之初。

中国人人性萌芽之始，始于三皇五帝。而思想与情感之初，则初在原始的图腾崇拜和巫术。其始其初并不是源泉，源泉是生我们养我们的黄土地。

中国人对黄土地有一种说不清的痴情，至今中国人仍是这世界上少有的爱土地、爱劳动的民族。大凡有中国人的地方，总会长出绿色的庄稼，这一点世上无人可比。其二，是中国人留恋故乡那一片蓝天、一片热土。海外游子只要他第一次回国，一下飞机一踏上中国的这块土地，都有一种莫名地激动，眼睛总会不由得潮湿起来。第三，中国人爱和平、憎恨战争，这显然和农业有关。中国人从骨子里喜欢老子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喜欢陶潜的桃花源。中国人看外国就像《镜花缘》中的小人国、直肠国、两面国……

当人们的生产方式定位于农业，当人们情系黄土地，那么情感与思想之源就产生了，人性之花会随之而发芽、生长，绽放出五颜六色的中国人

的文明之花。从理论上讲，一个模式建立后，它就具有了生命力，所有其他的政治、制度、史哲文理、风土人情、习惯习俗……都将为这个模式服务。而农业经济、黄土地、吃苦耐劳这三个毫不相干的东西组合在一起，成为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模式，这个模式使中华文明延续了五千年，至今。

一、原始社会的图腾与巫术

原始的巫术其礼仪和规制是什么样的，现在已不清楚，但图腾崇拜是无疑的，它留下了可考的线索。中国人原始的图腾是太阳，太阳是一只金凤凰，可以使农作物茁壮生长。慢慢地在崇拜的图腾中又加上了龙，因为龙可以下雨，有了土地、阳光和雨水，丰收不成问题。于是丰收之时感谢龙和凤，缺雨时求龙王，天涝时求凤凰。在巫术的礼仪中，原始人以狂热的情感和虔诚的希望充溢于肃穆整齐有序的仪轨之中。人们透过严肃和理性把内心激动的情感表达出来，这是无序的情感情绪与有序而规则的理性第一次完美地结合。

这种情与理、无形与有形的结合，使巫术礼仪的美就是这么原始、粗糙而生动。赤裸裸的情感加之简单的工整酿成了魅力无穷的野性和原始感，抒发了人们对令人敬畏的宇宙和莫测的未来的臣服心，以及这种巨大的臣服心下那不屈的理想与人性的伸张——对不可知力量的一种干预、希望与臣服……这就是艺术之源。

看来巫术礼仪属于原始人类的“政府行为”，而民间艺术则是手拉手一起跳舞了。最具个人创作的“艺术”是山洞内的壁画和陶器上的纹饰和鱼。至今，咱北京也有大爷大妈穿得红红绿绿地随着锣鼓点儿跳秧歌，既不怕天热、也不怕天冷，既不怕得高血压、也不怕噪音，美在其中。可以想象中国人有滋有味地跳秧歌和看别人跳；不能想象立交桥下中国老爷们屁股沟夹块布成双成对地玩相扑，同时旁边若干男女老少三教九流都在看。没这回事！大陆的农业文明与岛国的渔业文明源头不同、审美观不同、审美情趣亦不同。

二、奴隶社会的占卜

随着原始社会进步到奴隶社会，“政府行为”的巫术礼仪慢慢地由崇

拜图腾开始演变，人们渐渐地惧怕感和臣服感少了，希望多了。当臣服感和希望不相上下、不分伯仲时，占卜诞生了，甲骨文也随之诞生了。

乌龟壳为甲，牛的肩胛骨为骨，放火上一烧裂的纹，慢慢成了文。纹路是个“×”，要预测的事多是不妙，所以成了“凶”字；纹路要细小且横平竖直，则“吉”。我看烧成粗大的“×”远比细小的“吉”容易，所以流传下成语叫“凶多吉少”。玩笑了，一切是我猜的，只是想让众位轻松一下。但“美”这个字就不是胡猜的了，一类文豪认为它从羊从大，大肥羊就是美，这倒挺实惠，文化与饮食相结合了；另一类文豪认为这是“大”人物正头顶“羊”头骨在主持巫术大礼。虽然沾上神神鬼鬼之气，但我认为这是对的。中国人实在喜欢很严肃、很喜欢正儿八经地正对镜头留下“美”的影子，如那巫师一般。所以历代君王画像、祖宗遗容、天安门前留个影、到此一游之小照，全如头顶羊角的大巫师般地严肃、正派而正经，正得让人肃然起敬，最后连通缉犯人也如此地照……中国人很少有蒙娜丽莎那样侧脸去笑，让人觉得无限妩媚……中国人很少有拿破仑那样侧脸去画像，让人觉得挺有人情味。

实在是巫礼和占卜创造了中国的字和中国的美，但巫礼和占卜使中国人的情感和理性得以生长和发展。

三、封建社会随着诗歌和宗教而诞生

随着《诗经》的诞生，儒家与道家的诞生，中国人才蹒跚地步入封建社会。看看欧洲的基督教、中东的伊斯兰教、印度的佛教，再看看欧洲的《荷马史诗》、《圣经》；中东的《一千零一夜》、《古兰经》；印度的《吠陀》……一切惊人地相似。

只有当人类对希望和对自己情感的重视战胜了对大自然的臣服和惧怕后，解决了这个观念问题后，人类才能解放出来，进入新的社会。存在与意识的辩证法，就是这么生动。从哲学的意义上讲：创新的本质是意识对当前存在的一种否定，这里不能讲存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否定着存在；稳定与发展是存在限制着意识，这里可以说是存在决定意识。

奴隶社会的巫术、到封建社会的宗教、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为所欲为，是束缚逐渐淡化之路。但西方人走的是死路，人类还是要走理想之路，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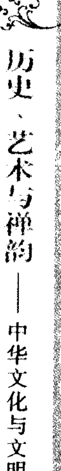
忘了地球承受不了任何一个民族的为所欲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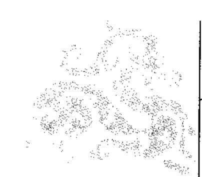
说得跑了题，再回来。

宗教把人们从神话和鬼神中解放出来，在个体劳动的农业社会里它扮演着精神领袖来统一人的思想并起着安定社会的作用；诗歌把人们从图腾和占卜中解放出来，让人们在封建社会的劳动之余可以崇拜和歌颂一下人类自身。

当人们一本正经地向什么挂羊头念咒语的大师磕头时，哪里有“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来得更具人情？更有人性？《诗经》昭示出人类从信天向信人的转移，贵族开始养士，鸡鸣狗盗、引车卖浆之徒可以为宾，“法”、“命”之书和钟鼎铭文从神坛上走下来，开始记述人间凡人俗务、大事小情……这是人性的解放、历史的必然。它为战国的诸子百家的产生，为百家争鸣的繁荣做好了精神和心理上的准备，让人瞠目结舌的变革即将发生。

前边讲过中国人具有民族认同、地域认同、时间认同和文字认同，而这一章讲的黄土地的认同是一种美的认同、宗教与艺术的认同，为了简单易记，我们称之为“情与理的认同”。这个认同感使中国人具有了相同的宗教气息与相同的泛宗教的审美情趣。





第三章
宗教的诞生

人类的进化是理性的进化。当原始人呐喊着用弓箭刀矛追杀猎物时，实在用不着太多的理性分析与逻辑推理，而当社会发展到有了哲学、数学、医学与自然科学，同时这些学科都需要慎审的理性分析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时，新的文明萌芽了。

我们把进化定位在理性上，把文明定位在逻辑思维的模式上，是否偏颇和欠缺了什么？我们忘记了情感与情绪，但由理性和情感组成的人性中，情感发展得最慢最缓，可以略去。猩猩与猿并不会哭和笑，只有愤怒、欢喜和平淡，而人类喜怒忧思悲恐惊，哭、笑俱全。从这一点上看，人类的情感也在发展。然而情感这种生理上的发展太缓慢，用原始人和今天的人对比一下，可以说它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约等于一个常量。

如果我们去听《黄河大合唱》，所有海内外华人都眼含热泪、心在呐喊、热血在沸腾，这和原始人裹着树叶兽皮手持刀矛追杀狗熊，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引发人们情性的外部条件不同，也就是胡适先生论禅时讲的“禅具有历史的时空性”；而引发出人们内部情感的兴奋、生理上的紧张、心理上的激动都相同，也就是铃木大拙认为的“人文与禅有其超历史性”。说得再简单明了些：人性中理性是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的，人性中情感被诱发的外因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但其情感本身基本不变。

换言之：变化的是人的理性（结绳记事到有了计算机）和诱发人的情感的外因（追杀狗熊到进音乐厅）；不变的是人情感的紧张感、激动感。

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不是什么谁变谁不变这种枯燥无味的东西，我们

关注的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谁是推动这种发展的最积极的因素？是变化着的理性？亦或是不变的情感？

理性的变化，呈水涨船高，所以它反而对发展最无影响，它太显保守。

不变的情感，它对外因的诱发源是喜新厌旧、永不知足的，它追求着新的刺激，它追求着新的感觉，所以，它才是对历史发展最具影响的积极的推动力。简言之：理性具排他性和保守性；情感具强烈的欲望及积极性。

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其图腾是理性的，其崇拜是情感的。当情感不满足于理性的束缚时，当它厌倦了所崇拜的对象时，图腾被冲破了。

奴隶社会的巫术占卜，其术与卜是理性的，其恐惧与希望是情感的。当情感不再满足算个什么命占个什么卦时，巫术占卜被冲破了。

封建社会宗教诞生了，宗教的礼仪、仪轨、教条、教规是理性的，它用与人为善、仁爱、仁慈使人远离恐惧获得幸福与安静，用来生来世、轮回再生、地狱天堂满足人的希望，而爱与希望是情感的。当情感不再满足什么仁爱和天堂，而是要实惠、要占有，后，宗教被冲破。

资本主义社会法律法治诞生了，法律条文与法规是理性的。一切为了占有，占有是情感的。但占有就要竞争，竞争就要公平，公平要有法律保障，因此法律成了情与理的一切。呜呼，这就是资本主义，善与爱没了。释迦牟尼说："纯情即坠，纯想即飞"，当一切情与理都在为情与欲服务时，这个"坠"将毁灭全人类、毁灭地球。所以，在当今这个世界上，一切以西方文明为最终的文明时，后果不堪设想。何去何从？仍需有识之士发大智慧去深思、去探索。

话题扯远了，再回到宗教上来。

西方的文明之源在欧洲，欧洲人对土地和农业的留恋远不如中国人这么情深意切。他们除农业外还有渔牧和商业，外加海盗式的抢掠。商业要求自由平等地进行公平竞争，这就使欧洲大大小小的封建公国之间充满了分裂与吞并，这反映为战争，因为战争的实质就是财富的扩充。当竞争与战争搅得欧洲不得安宁时，宗教产生了。欧洲的宗教团体用仁慈博爱平息战争，用自由平等维护竞争，用政教合一、宗教的社会化使欧洲的诸小公国成为一统。这显然为欧洲从奴隶社会步入封建社会以及为封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但中国和印度是亚洲的两个农业大国，其商业行为极不发达，同时又



都产生过政权上的大一统。中国有秦王朝一统天下，印度有孔雀王朝的一统天下。农业国不需要竞争，大一统不存在欧洲样式的各小公国的分裂。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不含有平息战争和维持竞争的功能，不存在维系诸公国于意识形态上一统的功能。换言之，它不必承担政权不统一而带给它的责任，它完全可以转而向注重内心安详平静、注重灵魂解脱这些方面发展。因此，佛教的教义并不把仁慈与博爱放在首位，而核心则是转到宣扬“众生皆有佛性”、“修到彼岸离苦得乐”、“积德行善不坠轮回”这些社会伦理功能上去了。

很显然“众生皆有佛性”为打破种姓的等级制、为争取人人平等立下了功绩；而“无生法忍”、“修身修心”这些观念为封建社会长期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总之：欧洲的宗教倡导博爱、仁慈和政教合一，其功能是息战争、保竞争、统一欧洲；亚洲的佛教是倡导平等、忍耐和灵魂解脱，其功能是解放奴隶、保护农业生产和注重心理平衡。

从理论上讲：多邦国的政治体制的不统一，必须要有一个形而上的东西来使它们统一，否则无法共同生存与进步，其典型的例子就是欧洲。它过去用同一宗教来统一零乱的诸小邦国，如今用欧盟和欧元来统一多种经济模式与不同语言。而中国特色则是政治上的大统一，这种模式必须允许形而上的思想领域里的开放，否则将走入死地，其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唐朝的昌盛与明清两朝的衰亡。显然，“一统”的封闭与“多元”的开放是对立统一的，纯粹的一统与封闭就统死了，纯粹的多元与开放则是一盘散沙……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那蒋介石先生的一个领袖、一个思想、一个国家的道理诸位总该清楚吧？苏联变成独联体诸位总还记得吧？换个角度讲：让中国全部自由开放……什么都彻底地民主，那是阴谋。君不见美国的南北战争，哪儿民主得任南方独立？再看看日本不承认侵略中国、台湾弄什么台独，最讲民主的美国哪听得进中国十三亿人民的呼声？

禅宗的功能和对心理上的研究是第三部分要讲的内容，后面再说。

（一）印度的佛教

佛教产生于印度。

印度，地处印度洋北面，是南亚次大陆的温热潮湿的国度。暖湿的印

度洋洋流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是多雨而物产丰富，印度人在这个湿热的环境里自然是想得多干得少了。吃的东西挺好弄到，种地也容易，不必那么细心去耕精心去耘，这一切造成印度多思想家、多载歌载舞的艺术家。干活要出汗，思想不出汗，怕热就少干活多想事儿，多唱唱说说侃侃，实在是很实际又很近人情的事儿。再不成玩玩蛇、念念咒、发个狠试验个什么物件，也算没空调、天儿又太热给热出来的嗜好。

至于记录和书写，就更加简单和容易，找个过了火的树枝在大一点儿的树叶上即可尽情地写，本来善思辨的印度人这一回加上了啰嗦繁冗的文风。善思辨，源自印度人追求“神我”，从而形成“婆罗门教”；善书写，则产生了古印度宗教哲学的三部经典著作：《吠陀》、《净行书》和《奥义书》。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真是“望梵行叹”、无法比拟，中国人用石头或青铜刀在甲骨或竹子上一笔一划艰难地刻着字，印度人用炭条在贝叶上一篇一篇地写；中国人要言简意赅、陈言务去，连标点符号全省了，印度人文风华丽，陈言不去，不厌其烦地辩。于是我们只有四言为主的《诗经》，人家出了煌煌的文学神学巨著。

这个巨著即《吠陀》，通称四《吠陀》。它含有《梨俱吠陀》、《夜柔吠陀》、《娑摩吠陀》和《阿闼婆吠陀》。这四部《吠陀》从哲学上讲，是说人的灵魂不死，“原人”是造化人及万物的神；从其内容上看，多是祭祀与赞颂神的意思，这与中国的图腾崇拜和巫术占卜文化大略相同。

继四《吠陀》后印度出现了两本有名的著作：《净行书》与《奥义书》。

《净行书》否定了“原人”和“神”，认为主神是“梵”。这本没什么进步之处，但该书认为人性中的我与梵是一回事，“梵我不二”，这就历史性地大大地前进了一步。神即我，我即神，虽然这个“我”是指不死的“灵魂”，但它终于摆脱了对外在的神的崇拜和恐惧。

《净行书》已有因果报应的观念，这个观念规范着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这种规范意味着奴隶制后期人们对外力之神的崇拜转向自我规范的崇拜。谁能说这在当时不是一个进步？由信神到信人，由神管制自我到因惧怕因果而自我检点，《净行书》描述出了人类进步的历程和足迹。

《奥义书》在神我不二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向人的内心挖掘，它肯定了人可以成神、神人不二。但它已不满足止恶扬善的因果报应说，因果

报应充其量让人下一世仍是做人，恶贯满盈的人下世做畜牲，如此而已。而《奥义书》指出一条高于因果报应的做神之路——修炼。修炼可以“返还梵净”以达神人合一之境界，而修炼的内容是苦行、禅坐与瑜伽功。

作为宗教，它必须具有宗教形式、修行方法和诱人的彼岸三大因素。到《奥义书》的时代，这修行方法与光明的彼岸已具足，宗教形式就呼之欲出了。

奴隶社会时的印度，是“种姓制度”，它依“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而分为四个种姓等级。只有一等的婆罗门姓的人才能成为贵族，从而接受文化教育，而前三级种姓的人才能修出世的婆罗门教，才能天人合一的成为神。首陀罗种姓的人生生世世为人为奴。

印度当时的习俗是把人的一生分为几个时期。

1. 净行期：20 岁之前要由出家人培养成人，接受教育，训练；

2. 家居期：20 岁时还俗回家，结婚生孩子，担当起应尽的社会义务、家庭责任；

3. 林栖期：约 40 岁后，抛妻离子进山潜修；

4. 遁世期：约 50～60 岁，在修行了 10～20 年后，道果圆成，不再参与世事。

当然，这种习俗，不适用于首陀罗姓。

总之：种姓的限制、年龄的限制、高深难懂的理论限制，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定将瓦解；随着封建社会的诞生，一种全新的理论即将诞生。一种无种姓差别的、无年龄要求的、浅显易懂易修行的宗教就要呼之欲出了。

公元前 565 年，释迦牟尼降生，一切成熟了。

公元前 530 年 12 月 8 日，释迦牟尼成佛，时年 35 岁。

公元前 485 年 2 月 25 日佛涅槃，享年 80 岁。

佛教诞生了。佛在世时讲法 49 年，讲经三百多次。

（二）中国的百家

在中国，一切都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

奴隶社会的中国也有等级制：王、贵族、庶民和奴隶，而文字多掌握在巫师、王、贵族和士大夫手中。当奴隶制的群体劳作不再适合生产力

的发展时，随着“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狟兮”的深沉的吟唱，一家一户个体劳动的形式开始出现。“不素餐兮”的君子们，发现要想富国强兵就要解放奴隶使之成为个体劳动者，也就是成为平民，因为只有平民才会主动地开垦荒地、积极耕种。于是解放奴隶的浪潮出现了，信巫信神的日子已过去，相信人和人的积极性成为中国人的观念。从此，中国这块土地上再也没有出现一个管理天地人的至高无上的神。玉皇大帝、佛祖、道祖……不管谁有多大仙气和道行，谁也没真正的统一中国，真正统一中国的是皇帝，是人。据说他是龙种，但难道这就不算是人了么？

在黄土地上种出庄稼，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没地震没山崩没泥石流，风调雨顺、龙凤呈祥、诸神归位……此为天祥；

没有战乱、不闹蝗虫，官吏清廉、皇上英明，外加地痞死尽……是为地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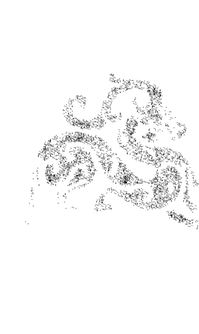
上述条件具足后，人们仍需脸朝黄土背朝天一锄一锄地耕、汗珠儿一滴一滴地掉……这叫人勤。

天祥、地瑞、人勤是农业经济的绝对条件、必要条件。只有如此，方能养活得起家小、交得起租税、有脸面对乡里乡亲……天哪！人们热爱这生我养我的黄土地，但黄土地又牢牢地拴住了中国人。

但中国人是绝顶聪明又绝顶顽强的，当他们身背重负、脚踏黄土，仰望天穹、心中吟唱……曰：“乐土乐土，爰得我所”时，你猜这样不屈不挠的精神迎来的什么？不是出埃及后的宗教，而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是东汉产生的道教、东汉末年引进的佛教和明中叶因理学脱变而为教的儒教。其余的谈玄、方术、庄老、黄老……统统只是一个思潮，而没有形成组织形式、修练方法、光明彼岸三要素具足的宗教。





第四章
艺术与人性

一、西方哲学家对艺术和人性的讨论

“艺术——用形象来反映现实但比现实有典型性的社会意识形态”。

“人性——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感情和理性”。

——“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

一看这题目，这如巫师挂个羊头般严肃的定义，就感到很不艺术很无人性地扼杀了诸位的业余时间。诸位挣钱不多，谁都愿买本书消遣和休闲一下，谁愿意花钱买个罪受？谁愿意让人按在椅子上一二三四、ABCD地讲人性、讲艺术呢？

毫无办法。栗子烧熟了，香味出来了，必定要取出来吃。“火中取栗”就这么先玄而后美。大凡学艺术和研究人性的人，都要经过很不艺术、很无人性的科班教育。“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诸位凡舍得受罪的就闭住气、耐住性子、往下看，凡舍不得受这样罪的就翻过这一章。

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们在艺术的定义上争论不休，大家都知道于日常生活和文章中提及艺术这二字时，它的含义是什么。但若要指出所有的艺术活动、艺术经验、审美主客体、艺术作品……还要把它与其他事物区别开，定义出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征，这简直是一件比盘古开天地还难的事儿。

海明威说：“创作的目的全在于向读者传达每一种感觉、视觉、感情、地点和情绪……找到了产生感情的东西，找到使你激动的行动。然后写下来，要写清楚，叫读者也看得见，产生与你同样的感觉。”

海大人描写了艺术创作的模式，但没敢涉及艺术。我年轻时胆子却大得出奇。一日在上理论作曲课时，我突发奇想，对教音乐理论的教授说："怒！因为含蓄，会显得更强烈。但这不是喊叫，艺术不是喊叫！"那时的大学叫"农村业校"，老师全是由五七干校调来的"臭老九"。我此言一出，教授们一个个居然全没听见!？依然不动声色地继续分析革命歌曲（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的曲调、和声、配器、唱法、向京剧如何移植……我大感没趣，自知毫无艺术细胞，从此不敢过问艺术焉。

列夫·托尔斯泰说："整个人类生活，无处不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艺术作品——从摇篮曲、笑话、模拟表演、室内装饰、日用品、衣着，到教堂设施、建筑物、纪念碑和仪仗队。整个人类生活，完全都是艺术活动。"

依托先生的解释，艺术即生活，饭桌前合家大小的笑语言谈、议论时事，床笫间的莺声软语全是艺术了。想想也没错，中国的理学家最是道貌岸然的两面派，他们强调"吃不言，睡不语"，把艺术从生活中彻底地清除了出去，于是一切全没了趣味，具足了"天理"。弄得中国人的饭桌前只剩咀嚼声、床笫间只有咬牙打呼噜声。中国只有满汉全席而没有边吃边聊的鸡尾酒会，看来毫无艺术的生活也存在着，所以不能说艺术即生活，应该说艺术即生活中含有情感情趣的那部分。

托尔斯泰显然对我们的见解不以为然，他认为何必把艺术捧得那么高呢？他说："我们习惯于把艺术理解为只是那些我们在影剧院和展览馆里、在建筑和雕塑上、在诗歌和小说中所看到的东西。"

总之，托氏认为艺术这玩意儿实在稀松二五眼，只要桌前有欢笑、床前有细语，那生活即艺术。不知这个结论让影星大腕儿失望否？让五音不全者、色盲者兴奋否？

美国的批评家爱德蒙德·威尔逊则属另一类理论家。这是令大腕们兴奋认可和令音盲色盲失望的那一类理论。他说：

"艺术作品无异于招摇撞骗。但由于读者受到（实在性）的妨碍和迷惑，因而天真地把艺术家所描绘的图画当作世界的真实图解而接受下来。艺术家苦于未能发现宇宙中的和谐和逻辑，这使他惊惶不安，倍受刺激，于是他便构造出艺术品，为自己提出一套逻辑与和谐；而读者也渴望和谐与逻辑，于是便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艺术家给予他的东西，并假定艺术家的权宜之计是毋庸置疑的启示录，艺术家于是便成了一种圣人。"

说了半天，威尔逊认为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圣人的职业，是人类情感与理性的一种需要。简言之：艺术是人类生活的一种需要。

因关于艺术争论的时间长、派别多，咱就不一一列举了。西方的争论结束在莫里斯·威茨手里。他在《理论在美学中的作用》一书中写道：

"美学理论试图去定义不能下定义的东西，这从逻辑上说是一种徒劳无效的尝试。我们论证的问题……是，艺术具有不满现状、积极进取、变化不息、标新立异的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得任何确保艺术具有可以被界定的一套属性的尝试在逻辑上成为不可能的事。当然，我们可能试图封闭艺术这个概念，但这样做……未免可笑，因为它预先封闭了艺术创造的条件。"

威茨这位先生挺有意思，依他的见解任何曾发展、正发展和一直到将来仍在发展的东西都无法定义，一律说不清楚。这有点儿维特根斯坦的风格了，凡可言说的我们就说，凡不可言说的，就请闭上嘴。

难怪，这些洋人没学过老子的《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阴阳二气相冲以为和"、"道在通流"……明白了这些咱们就可以完整无误且无漏地给艺术下个定义：

"艺术，是对生活中人类情感与理性辩证地存在着与发展着的形象的描述"。

完了，就是这个样子。凡可言说的就是这个样子，剩下的就是不可言说的部分了。

同理，什么叫人性呢？咱们不再介绍西方哲学家的讨论，咱们照葫芦画瓢，照方子抓药，说可说的：

"人性，是人类生活中辩证地存在着与发展着的情感与理性"。

同理，什么叫"人文科学呢？"依然用咱们的老法子：

"人文科学，是对生活中人类情感与理性辩证地存在与发展着的逻辑的描述"。

至此，前言中的四个问题（什么叫历史？什么叫人性？什么叫艺术？什么叫禅韵？）咱们已全回答了，这实在是挺累人的事儿。

二、人性的原本属性与发展的五个特性

在上一章"宗教的诞生"中，我们论及人性中理性是随外因变化而发

展变化的，它的变化，说明它自身具可发展性。相反，人性中情感是不随外因而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很微小，忽略不计），它的这种不变化，是它自身的固执，也是人类作为有机物要求一种稳定而具有的特性。

佶屈聱牙的哲学用语，实在令人讨厌。说大白话吧：

人性中的理性不具改变客观世界的欲望与冲动，人性中的情感具有改变客观世界的欲望与冲动；

再简单点儿，水一点儿：理性是消极的、有序的；情感是积极的、冲动的、无序的；

略微文一些，则：理性是社会的维系力，情感是历史的推动力。

情感，含情绪、心境、情欲，它是一种"欲"。"欲"的喜新厌旧、向上意志、永不知足既是积极的又可以说成是贪婪的。对人性是善是恶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人性中情与欲是善是恶的讨论。简言之：人性是善的？恶的？修行人应该修成纯情感的阳？还是纯理性的阴？

禅宗讲"明心见性"，这才算参透玄机、悟脱生死。那大师们悟到的"性"是什么属性的呢？书上没讲，大师们没讲，就算讲了，诸位也不信。因为他们都说"人之初，性本空"。

《三字经》是儒家的童蒙经典，上面白纸黑字地说："人之初，性本善"。也就是说人性的属性是善的。只因为"性相近，习相远"，才造成每个人的个性、习性不同，于是有成王的、有成贼的、有该歌颂的、有该枪毙的……

"性本善"的说法和重后天习惯的培养，实在是给儿童一个美好的未来与明天，给童真幼稚的心灵带来希望与七色的光彩。在那个社会里只要灭掉人欲、别胡思乱想、好好学八股，则前程似锦、仕途坦荡。没考中秀才、举子也没关系，问题定然出在"师之惰"或"父之过"那儿，于原本性善的儿童没关系。好一个性善的流派，扼杀了上千年中国人的灵性。

讲"人之初，性本恶"的大有人在。生理学家从人在生理上的追求是无止尽而至贪婪着眼，认为性本恶；心理学家从人的喜新厌旧上看到了人性本属恶；人类学家从人与动物同亲同源看到了人性是动物性的恶；中国的法家一直就把人性看成是恶的。

把咱们人类自己说成是恶的，然后呢？西方有的哲学家就引申出人本应残暴、血腥、吃别人，中国的法家定出一系列的刑具和刑法。





小结一下：

佛家说“性本空”，所以能修成佛。

儒家说“性本善”，所以要存天理之善，灭人欲之恶，去掉坏习气。

法家说“性本恶”，把人进行“有罪推定”，所以先抓人，再审，再定案。无罪的释放，给你平反，你要感恩戴德，否则再把你抓起来，定你个藐视长官的罪。

资产阶级的部分哲学家说“性本恶”，所以宣扬人应该吃人、该霸道、该不讲理。也因为“性本恶”，他们的制度对反腐败和对执政党的监督很有效，同时他们的司法反而是“无罪推定”，没有证据不能定罪。

墨子不言善恶，只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只此而已，然后打住。

孔子创儒家，原本没讲什么善与恶，他认为纯人性的讨论，无意义。因为讲人性，是讲个性的人性还是讲共性的人性？孔子站在治国的角度上，不谈个性的人性，只讲共性的人性。他用“仁”与“礼”把个性的人性装入一个共性的网络中，一开始就把人性的讨论置于共性的束缚之下，把共性的外延作为个性的外延内去讨论人性。显然，这种做法一开始就不是个正确的研究问题的法子。

看来如此的争论下去，毫无意义。我自己习禅多年的经验是：凡一个问题左右为难，陷入矛盾之中时，这说明你“身在此山中”，你要检查你的立脚点了。只要你跳出来，只有当你“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时，才能看清你要看的问题。

孔子的思路不能算错，它从共性中去看个性，但他不应该依共性去打杀个性。共性是稳定的，个性才是最具创造性的啊。中国近千年的停滞不前，正是以共性打杀个性的结果，何况当这个共性也停滞后，一切就只有落后挨打的份儿了。

社会是个网络形的系统。系统，则有它的外延与限度。让我们跳出这个网络，站在人类社会的高度上看一下人性的属性。

人性有两个特点：“发展的全方位性”和“发展的无止尽性”。

1. 人性发展的全方位性。这是指一个人具有向无数个方向发展的可能。例如一个人也许喜好音乐、钓鱼、静坐、篮球、玩电脑等等；在社会这个范围内，更是有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普通劳动者、围棋大师……人性的全方位性，造成了社会的全方位性。越步入文明，这个全方位性越分类精

细、越枝叶茂盛，也叫多元化。如果说人性和社会是个圆，圆心这个点是人性的属性与起点，那人性的属性就应该是O点，是佛家讲的空与无。

“人之初，性本空”，从这个空无的圆心可以向四周无限地发展：善与恶、阴与阳、好与坏、积极与消极……多元化的社会、多重性的人格都由此而生。

2. 人性发展的无止尽性。这是指在欲望的推动下，每个人都永远向上地去进取、去努力生存。这种向上的意志本没有错，当它超越现实社会所设定的限度时，就变成了贪婪。作为一个社会网络，它对人的共性总会有一个宽容度，使人性在网络这个空间里可以辗转腾挪，如此，这个社会是稳定的。一旦这个宽容度没了，人性在这网络中动辄得咎、手足无措，惨了，这个社会变得极不稳定，变革与革命定将发生。无止尽性使人与社会呈现出这种相互作用的层次性关系。

所以，讲一个人人性的好坏，实在空泛得很，要用“动机”和“层次”这两个方面去看才成。法律讲“动机”，是指出了被告原本是往全方位中的哪个方向发展了。如一个人是要做好事，想往善的地方发展，但却帮了倒忙，一切成了坏事，那就不能说这个人人性恶，法律可判他无意犯罪，但道德认为他善、无罪。法律也讲“层次”，“正当防卫”而杀死了恐怖分子与“过当防卫”杀死一个小偷，同是杀死了人，但层次不一样。前者无罪，或许还是英雄；后者有罪，逃不出法律制裁。

纯思辨性的讨论极易陷入乏味和枯燥，我们不妨打个比方。一切都好比一个平静的池塘，当你往池中投入一粒石子，那人性的讨论就产生了。池塘的水面原本一切空无，这叫“性本空”。投入石子“嗵”地一声算是“人之初”，人性随着圆形的波纹向四周扩展是人性发展的全方位性；这种扩展将无限地继续下去，叫人性发展的无止尽性；波纹呈现层层环状，叫人性发展中呈现的层次性。

还有什么没纳入这“投石入水”的比喻中呢？还有，石头对水的冲击代表的是人的情感与欲望，它是发展的动力；水面的张力是这动力的反动力，它束缚、克制和削减着波纹的发展，代表的是人的理性。

那共性指的是什么呢？共性是指很多石头投入池塘，它们的纹与波相干涉，激成大的波浪向四周发散激荡。

社会指的是什么呢？社会是指这池塘。池塘越大、水越多、池越深，

那这个社会对人性的宽容度越大。这时无论个性的波纹、共性的波浪都无法击溃池塘的堤堰，社会是稳态的；相反，池塘小、水少、池浅，那这个社会对于人性的宽容度就小，此时投入一块大石头或是一大批小石头，惨了，激起的波浪定然冲垮堤岸、漫出塘堰……社会的革命和变革来临了。

所以：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源于两个方面：

（1）社会宽容度大——池塘大、深、水多。

（2）人性的冲击杂而小——石子小、少，投入水的时间不一致，形不成大的波浪。

同理：社会的改革与突变也源于两个方面：

（1）社会宽容度小——池塘小、浅、水少。

（2）人性的冲击大而集中——石子大、多，同一时间入水而形成巨大的波浪。

我们给这一小节简单归纳一下：

人性的原本属性：人之初，性本空。

人性发展的五个特性：情与理的辩证存在、情与理的辩证发展、发展的全方位性、发展的无止尽性与发展的层次性。在这里，情感为发展的动力，理性为发展的制约。

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相互共存，共性制约个性、个性有时能引导共性。

社会与人性的关系：社会宽容度大，人性冲力小，则社会处于和平稳定的发展；反之则变革与革命来临。

三、人类发展的一个模式

人类的发展，无非是人性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为了表述方便，我们还是用人类的发展作为研究的对象，这样简单明了。

说起人类的发展，先要说人类的进化。上个世纪，当达尔文描述了猿到人的进化模式后，人的来源被科学地证实了。在神造人的假说彻底归入艺术类的神话中去时，人们接受了“进化论”这一科学的论点。也就是现存的所有生物都是渐变的，慢慢地、适者生存地进化而来的。这个科学论点甚至波及到哲学领域中，人们一厢情愿地认为量变到质变也是纯粹形式上的量的叠加，如此渐渐地、慢慢地、适时地“进化”到质变。在其他

门类的科学中也是如此，分子在量上叠加形成聚分子、再叠加生成有机物……一直这么加出人类。

本世纪中叶，人们逐渐发现达尔文先生可能遗漏了什么。因为单靠进化、单靠简单的量的叠加，有的物种是说什么也不会进化成现在的样子。“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实在是让人们集思广益，并无法把皮匠协会进化成国家的精英或联合国的智囊团，这里面始终存在着“质”的问题。当“量”很少时，这个“质”的特性并不明显。而当“量”积累到一个诱发“质”的阈值时，其“质”便脱颖而出，产生质变。这个论点似乎更能解释皮匠不论是一个、三个总还是皮协会，而天才不论是一个、三个毕竟是智囊团的区别。但假说终归是假说，在没有科学的证据之前，谁也不敢妄下定语。

在恐龙灭绝的问题上，进化论更显出它的无能为力。既然是适者生存，为什么一下子全灭了种、灭了族？

科学发展到今天，很多学科的疑难问题是其他学科帮助解决的。“功夫在外”是咱中国人早已知晓的诀窍，在对当代遗传学的研究中，科学家发现人类的DNA并不是按想象中的那样百分之百地进行“复制”，而是在复制的同时，“人为”地造成百分之一左右的“变异”。这是人类的进步还是退化？是好是坏？

本世纪80年代，生物学家在南美的大森林中对一种大白蝴蝶进行了多年的研究，这个“变异”的作用终于在蝴蝶身上找到了结论：变异是为了种族的延续。

原本很健康很正常的白蝴蝶，每次会养育出千千万万个下一代。这些下一代多数是健康的复制出来的白蝴蝶，和它们的爹娘一样白。但每一代中总会出几个不太健康的变异出来的红蝴蝶，一般来讲这叫“病变”，是让人讨厌的畸形。这些红蝴蝶颜色太鲜艳，在森林中酷似一种毒蛾，所以也没什么动物愿意招惹它。它的生命力和生殖力都很差，但是代代都有这么几位，就是不绝种。

一年，南美原始森林中流行一种毒菌，这一下给蝴蝶的世界带来了灭顶之灾。全部的白蝴蝶都死光了，只剩下那几只红的，病病歪歪地居然对这病毒有先天的抗体，就这么活了下来。第二年，这几只红蝴蝶养育了新的一代，这一代仍然是像它们爷爷奶奶那样白得可爱，仍然只有几只像它们父母红得如毒蛾。第三年，大森林又回到原来的样子，满世界是白蝴

蝶，少有的几只红的，在没人的地方飞着……一切好像都没发生过。

真感叹大自然造物的绝妙！科学家们在惊叹之余，悟到了遗传的奥秘：人类，每代都会有变异的"返祖"或"畸形"，这是物种的需要。医学界巴不得捕杀掉变异，好使咱人类的后代个个儿都克隆得如施瓦星格或费雯丽，最起码也要如成龙或张曼玉，绝不能出变异。作为一个家庭，变异的下一代显然是痛苦的，孩子有"病"有"遗传性缺陷"，当父母的心都碎了。将心比心，谁也不会去祝贺这父母，说您的孩子担负了种族复兴之希望。但"种族的意志"为了不灭种，必须这么残酷、这么无情。进一步的研究，人与人的异性之爱，也是"种族意志"的一种暗箱操纵，种族为了防止退化和灭绝，它在极力寻找能产生最大变异可能的异性为配偶。它通过直觉、气味、形态、人的气质等因素，让你一见钟情地爱上一个与你差别很大的异姓。换言之，水稻的优良品种，是父系与母系这两个品系相差越大，这杂交出的子系越好。所以人与人的爱情，由"种族意志"给你门不当户不对地指定下了配偶，它是月下佬，用红线把你二人拴住，咱们如何跑得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女人一坏就来财"……这些俗语，不能不说有一定道理。

在非洲的一个小部落中，百分之六七十都染有艾滋病病毒。按理论推测，时至今日这个部落应早已灭绝得一个人都不剩了。但当科学家们再去看时，这里仍是人丁兴旺……几代人下来，在这个部落中居然发现已有 20 多人具有了先天免疫的遗传基因，依然是代代有百分之六七十人染有艾滋病病毒。

变异使种族延续，绝对的复制将是一场天灾人祸，将是种族灭绝。而变异的成分越大，在应付危机时越可能产生质变。由猩猩到猿、由猿到人，在漫长的几百万年的时光中，变异完成了突变的质变，超稳态的复制使黑猩猩们依然在非洲的丛林中吃果子，继续着量变，继续着进化论的小打小闹的适应。

看来，变异是质变的因子，量变的叠加和环境的变化是诱发质变的外因。世上出现的白乌鸦、白狗熊，都是无诱发外因的常态量变时异变的例子。

"突变论"弥补了"进化论"留下的空白，"进化论"加"突变论"的组合阐释了人类发展的模式。

用“进化＋突变”的发展模式看人类社会，可以分为“稳定期”与“变革期”。

稳定期，意味着进化，是一种漫长的建设和积累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社会的宽容度很大，网络足可满足所有共性与个性在全方位和无止尽发展上的需要。

变革期，意味着突变，是一种较短时间内的旧网络被打破，新网络的建立。在这个时期里社会的宽容度早已很小，网络束缚人类的发展已很久，人性在共性和个性上都无法容忍这种束缚，于是质变的因子被诱发，产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最终，旧的网络系统被打破，新的更加宽松的网络系统建立起来。

用政治经济家学的角度去看社会的发展，则生产力如同人性的发展力，生产关系如同社会的网络系统。前者为动力，后者为秩序和力的协调。

推而广之，一切事物的发展都呈现：

进化—突变—进化……

稳定—变革—稳定……

量变—质变—量变……

哲学上叫：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据说在越战期间，一次美军与越共遭遇。双方马上各占据一个高地，隔着一大块稻田真刀真枪地打了起来，枪子儿炮弹你来我往十分激烈。忽然，从两高地间的稻田田埂上走来 7 位越南的僧人。他们身穿黄色的袈裟、戴着大大的斗笠、双手合十默默地穿行于硝烟之中。这时交战的双方都不约而同地停止了射击，战场上立即安静下来，只有丝丝的硝烟和呛人的火药味弥漫在山谷间，慢慢地淡去……

当这 7 位僧人终于全部安全走出视线后，可以想象，一切又是枪林弹雨、炮火硝烟。

并不是这 7 位僧人有什么神通、念了个什么咒、使了个什么法，使双方一下子枪停弹哑。也不是这 7 位胆子忒大，吓得双方都停了手。这实在是人性所显示的面子和虚荣啊，谁也不愿意让对手看见自己这么残忍地去杀害手无寸铁的僧人，谁都想告诉对方自己还有人性和良心。这是人类追求和平的人性在战场上的显露，虽然很短暂，但这是希望。

求和平、求发展是美的，战争作为政治的最后手段毕竟不是人们希



望的。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人性需要的是发展与和平。

这一章比较乏味，谢谢诸位能耐着性子看完。咱们连同前言所讲的内容，一并小结一下：

(1)四个问题：什么叫历史、什么叫人性、什么叫艺术、什么叫禅韵。

(2)宗教必备的三要素：组成形式、修行方法与光明的彼岸。

(3)中华民族的六个认同感：民族认同感(同源)、地域认同感(同地)、时间认同感(同一种农历、阴历)、文字认同感(同文)、情理认同感(同一种情感与理性的模式)与习俗认同感(同一种风俗习惯)。习俗认同感在文中没有讲，因为它是慢慢形成的，无法用一个典型的事物为标志来讲。

(4)思维的三种方式：逻辑思维、艺术思维与灵感思维。

(5)情感的三种形态：激情、热情、心境。

(6)精神的三层次：

心理学三层次：生存与安全的需要、爱与尊敬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修行三境界：是山、不是山、只是山。

王国维人生三境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7)人性(事物)发展的五个特征：阴阳辩证、道在通流、发展的全方位、发展的无止尽、发展的层次性。其中，情感为发展的动力，理性为发展的制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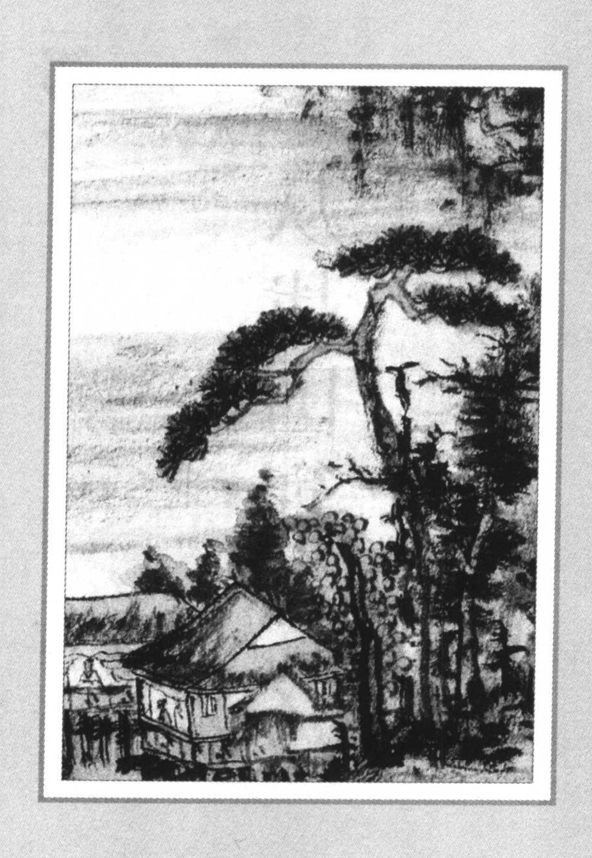
(8)人类(事物)发展的一个模式：进化与突变、稳定与变革、量变与质变。

(9)两个关系：共性与个性、社会与人性。

从第二部分开始，以上的很多概念要用得着。无奈，只有在前言和第一部分中匆忙地罗列出来，虽然啰嗦和枯燥了些，但希望诸位能喜欢，能咬着牙看下去。

第二部分

从战国到东汉





第一章 秦时明月汉时关

公元前481—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期。也有的史学家以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为战国开始。这样公元前481—公元前403年为春秋向战国过渡时期。此书我们以第一种说法为准。

战国期间的公元前256年，东周亡于秦。

公元前221—公元前207年，秦。中国的第一个封建王朝，传2代、历2帝、凡15年。

公元前202—公元6年，西汉。传10代、历12帝、凡208年，其西汉前有四年的楚汉相争。

公元6年—公元25年，18年的王莽和更始政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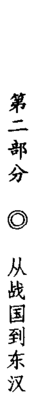
公元25年—220年，东汉。传8代、历14帝、凡19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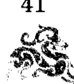
一、战国史略

公元前403年，晋国分为韩、赵、魏三国。加上齐、秦、楚、燕称为七国，战国的序幕徐徐拉开。

作为奴隶制最后瓦解和封建制度的逐步确立，是以砸碎旧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建立起新的适应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为标志的。显然这在人类发展模式上是“突变期”或称为“变革期”。这种变革，在中国的战国时期是以三个国家的变法来实现的。

先是楚国的吴起变法，后有魏国的李悝变法，最后是秦国的商鞅变法。





前两个变法，过早夭亡，并没有多大效益。而较之楚魏，秦国的变法虽然也以商鞅遭车裂而归于失败，但毕竟变法的内容能较彻底地执行下来，对当时的社会和诸国的影响最大。

秦国虽然有三百年前百里孟明视西征之伟业，秦嬴任好也曾称霸一时，但嬴任好死后，他的继承人居然把悍将孟明视和贤臣“车家三良”统统为嬴任好陪了葬。落后的意识形态再一次使刚刚走上富强的秦国回归于蛮夷的愚昧之路，致使秦国又走了三百年贫穷、腐败且落后的老路。

公元前 362 年，秦孝公嬴渠梁即位。

公元前 361 年，秦孝公广发征贤求能之文告，他认为只有人才，才是改变国家命运的关键。这是位首先从信神、信祖宗悟到信人、信人才的国君。只此一悟，使秦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人的历史上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公元前 359 年，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开始了他的大胆的变法。

商鞅(公元前 390—公元前 338)，依旧习亦称公孙鞅或卫鞅，原是卫国公族身份，这是贱民一类的庶民。商鞅崇尚李悝、吴起的法家学说，认为以“刑名之学”方可治国于富强。为达到他变法的目的，也就免不了使用一些“雕虫小技”。商鞅立一木柱于南门，出布告声称谁能把它拿到北门去则赏黄金十两。有一个不信邪的青年壮着胆子当众把木柱扛到北门，果得金十两。一时满城轰动，都打算第二天也去南门扛木柱。但第二天的南门已没了扛木头的布告，而是一纸可让全国全民繁荣富强的变法条文了。

商鞅变法，具体项目多达十几项，但最精彩的是：统一度量衡、建立三级政府组织、建立村中十家一什的组织、建立新的赏罚制度。

统一度量衡，使共性范围内的个性便于用物质进行交流，使国家与个性的人性便于管理和协调。显然这是在封建社会个体劳动者与中央集权的统治者之间建立起了一个网络系统，是理性化的杰作。

建立三级政府组织，是封建社会政权机构的基础。村为单位，若干村为一乡，若干乡为一县，而各县直属中央管辖。显然这是网络系统理性化的、秩序化的方正与完整。

在基层单位的村庄，十户为一什，有连保和相互监督生产的职能。这是该网络最底层的一种以小单位的共性限制个性的组织。以免个性“全方位发展”得成了盗和“无止尽发展”得成了闲散游民。

新的赏罚制度旨在打击贵族奴隶主的势力，逼迫其为国家富强出力。新制度规定，凡游手好闲无正当职业者，一律作为奴隶送到边疆垦荒，这里自然不管你是贵族还是奴隶。而检举犯罪和作战有功之士一律全有重赏，也不论你是龙胎凤种亦或打地洞之老鼠儿孙。很显然，这个新的赏罚制度是饱含情感的理性条文，它极大地煽动起平民和奴隶们的情感情绪。这种情感情绪表现在作战上是以死相拼，死了也值了；表现在劳作上是一种欣喜的心境。商鞅的法规是一个十分宽松的网络系统，在人性的发展上为全方位发展、无止尽的发展留有足以富国强兵的宽容度；在共性与个性、社会与人性的关系上，用严厉的赏罚、相互的监督、统一的度量衡、中央集权而建立了一个新的封建制度的网络。虽然它很不成熟，但它很新。

从商鞅变法后的效果来看，它使秦国人民在道德观、荣辱观、人生观上产生了质的变化，完成了“突变”所要完成的任务。秦国步入了一个非奴隶制体系的新的“进化期”。在短短的 19 年里，意识形态的超前引导着秦国成了继魏国之后的第一个头号超级强国，为秦统一中国在政治、经济、人文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 338 年，秦孝公逝世。贵族反攻倒算，商鞅遭车裂之刑。儒家站在变法后富强的国土上一味地鼓噪，大力宣扬变法者的下场、反复证明法家是亡国之说，把儒家的三纲五常、仁义礼乐吹得天花乱坠。这实在是把宗派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之上了，尤其在“突变期”，这种适应“进化期”的超稳态理论一下变成阻碍社会前进的误国理论，是一个看上去挺不错、挺美、挺具人情味的绊脚石。通过商鞅变法的最终失败，我们还可悟出一个道理：治民难，治吏更难；改变一个制度易，改变一种观念难。

马克思曾有一个土豆、麻袋的比喻。这个比喻是说在封建小农国家中的个体劳动的单元（一家一户的个体劳动者）为土豆，而土豆要集中在一起就离不了麻袋，就是离不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机构。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人口的增长，这土豆定会越来越多。只要社会还没发展到以商品经济的自由平等为网络系统时，这麻袋随着宽容度的减小到装不下土豆而不得不加厚加紧，或干脆限制土豆的增长。封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其形象的比喻就是如此地生动。

其实在土豆为个体劳动者，麻袋为官吏外，还有个皇帝，这是绳子，他们是三者的关系。绳子与麻袋也就是帝王与官吏之间并不是铁板一块而



没有矛盾:绳子只想扎紧麻袋,并不管你装了多少土豆;麻袋只想着多装土豆,涨得越满越好,管你绳子扎得上扎不上。几千年的五百多位帝王,不乏有较明白的君主,他们的"智慧"和"明白"只在于:为了扎紧涨得合不拢嘴的麻袋,不得不去从麻袋中挖出一些土豆,也就是去"查抄"。查和坤,抄出白银两亿两,这还是和珅家产的几分之一。崇祯也干过这等事,显然这种做法激化了帝王与官僚的矛盾,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同时这种做法的结果,促使官僚对人民更加疯狂地搜刮,逼得人民造反,聚众山林河泽,抗捐抗租,直接危及社会的繁荣和安定。

书归正传。

公元前 333 年,中国历史上以人为主角演出的最激动人心的"合纵连横"的"话剧"开场了。秦国依靠变法而富强,于公元前 340 年秦孝公在世时大败魏军,在孝公死后十多年间多次攻魏,迫使魏国受割地之辱。在这种情况下,六国急需联合起来抗秦,一如齐桓公大会诸侯以抗楚。苏秦以三寸不烂之舌到燕、赵、魏、齐、楚六国,说得口吐白沫,使六国信服,决定合纵抗秦。秦国马上慌了神儿,正好张仪前来推销连横,秦惠王嬴驷马上委以重任,派张仪游说六国。张仪不但有三寸不烂之舌,还比苏秦多了行贿、许愿、挑拨离间的伎俩。于是三次合纵均以失败告终。楚国的屈原就是被张仪离间了君臣关系,后愤而跳江的。

秦昭王四十三年(公元前 264 年),秦国重用能人范雎,定下远交近攻的战略。

秦昭王四十七年(公元前 260 年),长平之战,秦军大败赵括所率的赵军,生俘赵军 40 万人,除留下 240 人回赵以扬秦国之威,剩下的全部坑杀。范雎又是魏国人,与商鞅老乡,与商鞅的命运也相同,都是不被魏国重用而到秦国为相。商鞅使秦富强,范雎使秦走上统一中国之路。

公元前 256 年,秦灭东周。

公元前 247 年,嬴政继位。

公元前 233 年,嬴政重用韩非、李斯,这二位仍是法家人物,于是秦国如虎添翼。

公元前 230 年,秦灭韩。

公元前 227 年,荆轲为燕国而见秦王,"图穷匕见"刺秦王,不遂,被剁为肉泥。嬴政越发加快了统一的步伐。

公元前225年灭魏，公元前223年灭楚，公元前222年灭燕，公元前222年灭赵，公元前221年灭齐。中国大一统，绵延260年的战国时代结束。

二、秦朝史略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

嬴政号称“始皇帝”，他除了规定“皇帝”二字是专用语，不准别人使用外，还建立起一整套封建社会的政治网络系统，即制度和体制。这个体制即：朝内设丞相处理全国政务、设太尉主管军事、设御史大夫管监察。在地方政权上，设40多个郡。郡有郡守、郡尉、监御史。郡下设县，县有县令、县尉、县丞。县下设乡，乡下仍是十户为什、五户为伍。户，则是男耕女织的个体家庭了。

从秦始皇所立的郡县制可以看出，这是中央集权的政权。这种政治制度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但是由皇族、外戚、功臣等组成的世家、豪族和贵族地主，形成了世袭的门阀制。门阀制虽然对皇权没有直接的威胁，但它的形成加重了对底层人民的盘剥，拉大了贫富不均的距离，隔断了平民走上仕途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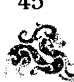
奴隶制在封建社会作为主体已崩溃，但奴隶却从秦至清的整个封建社会中并没有完全消灭，门阀、世家都有供役使的奴隶。

秦始皇的功绩，第一是统一了中国。这使民族认同、地域认同、时间认同的中国人更加的具有凝聚力。同时在中国人习俗的认同中，更加注入了“一个大中华”这样“一个中国”的认同。

第二是郡县制的建立。这种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在中国一直沿袭了两千多年，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三是统一文字。这使原本具有的文字认同感更加的突出和鲜明。如今，不论在世界何处，只要一见中文必然知道这儿有中国人，哪怕他已入外国籍。而汉文与汉语总会把当地的华人们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社区。

第四是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道路规制。这在华人所具有的习惯认同、情理认同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如今，只有咱华人言谈话语中讲“华里”、讲“尺”、讲“市斤”。一提起银角子、大子儿、铜板、大洋……这简





直比美元、英镑来得耳熟和亲切。

秦始皇的功绩，第五点是修万里长城。长城的修建，防御了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保障了内地的生产发展和生活安宁。从这个角度看，修长城的功绩实在大得很。孟姜女哭长城确实让人同情，但从国家的角度看这个长城保护了多少人的生命？两千多年来，使多少内地的女人不再哭被杀、被掠走的男人？

在秦王朝短暂的15年里，最有名气的事算是被儒家恨得牙根痒痒的“焚书坑儒”了。

公元前213年，儒家门徒淳于越在咸阳宫的宴会上再次提出实行分封制取消郡县制。他援引商、周统治了天下千年的例子，说这是分封制的功劳。丞相李斯反对厚古薄今，建议始皇将秦史以外的诸史书一律烧掉。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除医药、卜筮、种树的书外，一律焚毁，此称“焚书”。

公元前212年，为始皇炼仙丹的侯生、卢生二人在骗术要败露时，提前跑了。临走还扬言：“始皇太残暴，有长生不老的仙丹也不给他！”这二位一跑，连累了所有炼丹、寻仙的人和一大群儒士。秦始皇闻知二位的留言，立即派人追查对朝廷有异议的人，共查出460人。始皇帝一怒之下把他们统统活埋了，此为“坑儒”。假若侯生、卢生二位真有千年不死的仙丹，怕是至今仍活在世上。他们俩怕炼丹术被揭穿，一句话就坑了460人，又全算在了始皇身上，真算是够黑心的。只是不知他们心里羞愧否？如今还打算再用炼丹术坑多少人？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

这次农民起义最有意义之处，在于他们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反对世袭的贵族门阀制。后果如何咱们不讨论，咱们只说这种具有原始意义上的追求公平竞争的思想，就是到了今天施行起来怕也难上加难。如今在咱们中国门阀制是没有了，世袭制也没有了，但在人们的观念里像“文化大革命”那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或什么优势论、自豪论……依然存在，这东西一时半会儿扫不干净。特权，尤其是世袭特权，是当今中国最大的顽症。虽然这也叫中国特色，但它是“性本恶”的那种。

公元前208年，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失败。

公元前 206 年，刘邦占咸阳。赵高杀秦二世，立子婴为秦王。子婴深知赵高这个宦官的为人，于是杀赵高降刘邦，秦亡。

三、西汉史略

说起西汉的历史，首先是“约法三章”和“刘邦其人”。

（一）“约法三章”和“刘邦其人”

1.“约法三章”。楚汉相争时的公元前 206 年，刘邦先项羽进占咸阳。按原先刘邦和项羽的约定是谁先入咸阳谁为帝。但刘邦势弱，自知称帝必招致灭顶之灾，于是他听取了樊哙、张良的意见不杀子婴，不动国库和宫中的财宝，废除了秦朝的苛刻法规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后兵退咸阳，驻扎在霸上。

当项羽到了咸阳后，在鸿门设宴招待刘邦。我们常说的鸿门宴，意指暗藏杀机的宴会，就是从此流传下来的。在宴会上项庄要求舞剑以助酒兴，实是要杀刘邦，刘邦人称沛公，“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说的就是这时的场面。而项伯为了保护刘邦，也舞起了剑，成了双人表演，挡住了项庄下手的视线，刘邦趁机逃回霸上。

项羽在鸿门宴后，解除了对刘邦的戒心。他率军进咸阳杀子婴、烧阿房、掠珍宝、屠市民，自此人心大失。汉中父老无不想念刘邦，想念他的“约法三章”。这为刘邦坐天下打下了牢固的群众基础。

“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就这么个简单的章法，深得人心，其主要原因是建立起了封建社会的新的人人平等的人权观念。而被儒家鼓吹的周礼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那个章法是王室贵族杀个人简直很正常，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可奴隶制的观念如何能适应封建制呢？“杀人者死”才是全新的更加尊重人、更合人性的啊。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虽然并没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平等、杀人者死，但“杀人偿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王法面前，人人平等”这些口号却是深入人心、深得民意的，不能不说刘邦的思想在当时是超前的。

2.“刘邦其人”。中国历代开国皇帝中只有两位是农民出身，他们一个是朱元璋，一个就是咱们要讲的刘邦。



刘邦(公元前247—公元前195)也叫刘季,江苏沛县人。他原是农民出身,后来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流氓混混儿。他耽于酒色、不务正业,好结交狐朋狗友、终日混迹乡里。这个人虽然有不少毛病,但他思路敏捷、见多识广、朋友多门路多。在楚汉相争时,他手下有张良、萧何、韩信等一批人才,同时他也善于听取他们的意见,所以最后的结局是楚军四面楚歌、霸王别姬、乌江自刎,而汉军则"天下定于一",刘邦建西汉。我们如今说的"汉语"、写的"汉字"填写表格时的"汉族"及"汉人",全要归溯于刘邦建立的这个封建王朝。

(二)文景之治与无为而治

刘邦称帝,为汉高祖。这时的中国经济萧条、人口稀少,大臣们外出只有牛车可乘,刘邦的马车,找不到四匹毛色一样的马。在这种情况下,刘邦实行的是老子的"无为而治",政府口号是解散军队、解放奴隶、减赋税、免徭役、奖励生育。

到了汉文帝(公元前180年)时,汉朝出了名臣贾谊。他呼吁:"居马上可得天下,不可于马上治天下",于是力倡"驱民而归之农"、"粟多而财有余"为治国之本。再加上文帝生活节俭、鼓励农耕,国家渐有起色。

公元前157年,文帝死景帝即位。他上承"无为而治"之宗,下启"休养生息"之旨。在他去世时(公元前141年),国内上至中央下至郡县仓廪全告盈满。存粮之多以致生霉,存钱之多以致虫子蛀断贯钱的皮绳。"陈陈相因"就是说年年增加新的粮钱,弄得搬不动、翻不开、层层叠叠,使旧的更加腐烂。

西汉初,尤其是文、景这39年,史称"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显然是由"无为而治"和"休养生息"得来,这里面"休养生息"的内涵是爱民而不扰民,不去干预老百姓在人性上的发展。"无为而治"的内涵并不是啥事全不干,吕后专权、匈奴入侵、和亲安邦……样样事情都要有为。无为的内涵是人为地加大社会网络的宽容度,以求在困难的经济状况下,最大地发挥个性的潜力,尽快使国家富强起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你会发现轻税薄赋、鼓动生育、提倡农耕……实实在在是煽起人性中"欲"的火焰。我们在事物发展的五个特性中已讲过,不再重复。当然,这种无为和休养只是急救章,一旦人性的发展填满了社会网络的所有空间时,就该想想办法了。景帝并没意识

到“任何一个好的政策只因它是适时的，才是好的。因为时间是流动着的，所以那个固定的好的政策不可能永远地好下去”这样一个道理，而历史再一次证明了这个真理。当汉初的困难时期一过，富裕生活开始后，无为的政策已经是时过境迁，想当年的好政策招来了“七国之乱”。

（三）刘邦的分封制与“七国之乱”

奴隶社会施行的是分封制。即把国家分成若干份，除君王留下一份以外，其余的分与有功的大臣和亲属。分封制产生了君主与诸侯的矛盾，周灭亡于分封制，实在给后人印象太深。

秦始皇建立的是封建社会的郡县制，即把国家以县、省、中央分为三级，一切集权于皇帝手中。但秦王朝只存在了15年，垮掉得太快，令人目不暇接来不及思考，而儒家又趁机反反复复、唠唠叨叨地说这是不分封的结果，这让刘邦有些左右为难。面对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刘邦来了个土招儿：“肥水不流他人田”，为同姓分制。他认为陈胜、吴广一呼百应的起义源于京城外没有自己亲信的封地，如果全国遍布刘姓的诸侯封地，一则可相互驰救，二则造不成一呼而全国四面八方都响应的局面。于是刘邦再三重申“天下一家”，“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景帝即位后，虽有文景之治，但人性发展冲破了这原本已宽松的“无为”的网络，各诸侯王开始坐大，心存反叛。御史大夫晁错看到了诸侯王对中央的威胁，提出削藩。公元前154年，景帝下令削夺诸侯王的封地。吴王刘濞首先作乱，打出“清君侧”的旗号。“清君侧”，就是说君王身边有奸臣，要灭掉奸臣，保护君王，这显然是个假口。但信奉老庄的景帝实在是对政治斗争知之甚少，他听信谗言，派人把晁错腰斩于长安东市，并宣布赦免七国反叛之罪。但七国的叛军扣押了景帝的大臣，刘濞自称东帝，叛军攻陷棘壁，睢阳告急。至此景帝才略略领悟了政治之道，深悔冤杀了晁错。错一错二不能错第三次，景帝重用周亚夫，历三个月，平七国之乱。这次平叛，打击了诸侯的势力，从此诸侯王不得掌管国事成了明文规定，暂时解决了中央和诸侯的矛盾。

（四）“秦皇汉武”的汉武帝

公元前141年，景帝死，16岁的刘彻即位，为汉武帝。汉武帝在位54





年，是汉代皇帝做得最长的人。

秦皇汉武的功绩在于：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了中国，第一次建立了郡县制；汉武帝则从根本上瓦解动摇了分封制，巩固和健全了郡县制。从此"两千年之政，皆仿秦汉之政"指的就是二位在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上。

在封建的社会制度下，有五大病毒：诸侯割据、外戚专权、宦官专权、奸臣弄权、外患不已。

而削藩就是要防止诸侯割据，这一回汉武帝吸取景帝和晁错公开削藩的教训，他十分高明地悟到政治与人性的关系，所以玩出了新的招法——"推恩令"。

"推恩令"就是废除封国的土地只能传给嫡出长子的规定，降旨恩赐所有嫡出庶出、大宗小宗、长子次子都可继承和瓜分封国的"祖业"，人人平等、人人有份。从诸侯各王来看，他们既爱大老婆，更爱小妾小蜜；既喜欢长子，亦喜欢次子，更喜欢小妾小蜜生的子，所以不反对推恩令。从诸侯王的家属们看，除大老婆和嫡出长子不高兴外，所有人都皆大欢喜地称益"推恩令"，人手一份的产业实在是天上掉比萨饼的大好事。所以这个政策施行起来一点儿也不费力气。但封国就那么大，一代一代地分下去，这诸侯之王也就被自然地削成了门阀世家了。你想啊，一个西瓜原是一人吃，往下只传一人，仍是一人吃。现在好了，一传十、十传百……不用多，三代下来，这个西瓜起码几十人吃，这个诸侯王实际上名存实亡，只是个土财主而已。明着削藩不成，推恩令式的削藩人人高兴……这不禁让人想起庄子讲的"朝三暮四"的那群猴子来……咳！在对待物质享受这个角度上，人比猴也强不到哪里去。

封建社会五毒中的外戚专权、宦官专权，虽有吕后的"吕氏春秋"，有秦二世时赵高的"指鹿为马"，但帝王们认识得还不深，所以汉武帝倒没太在意这些。

奸臣弄权，实是皇帝们能不能从谏如流的问题，但在汉武帝时也不突出。

外患，在西汉时主要是匈奴人侵，这一回汉武帝不能不用心了。对付外患封建帝王们一般是有四件法宝可供选择：打、谈、和亲、宗教输出。"打"是一直都打，从筑长城就可以看出中原人在抗击游牧民族的袭扰时多取守势；"谈"，也是一直在谈，直到南宋丢了半壁江山也还在谈；"和

亲”，是把皇上的妹子或女儿嫁给番邦、匈奴什么的，昔日对手一朝成为自己的妹夫、女婿，再加上多多地给嫁妆，好了，边界上起码和平二三十年；“宗教输出”，是清朝才有的事儿，咱们到时候再说。汉武帝的功绩不在于“谈”、“和亲”和防御性的“打”，而在于创造性地发明了“屯田”、“军垦”的“移民实边”的积极的打法。从今天的眼光看，游牧民族的袭扰好比游击战，你来我走、你走我来，抢了就跑不打阵地战。中国人发明的游击战，实在是从匈奴和单于那儿学来的。以往的抗袭扰是重兵出击和重兵屯守，前者叫“大炮打蚊子”，后者叫“支付不起巨额军费”，所以都不实用。而汉武帝发明屯垦解决了这两个难题。屯垦的原则是亦兵亦农、边耕边战、边守边耕，国家给住房和生产资料，如有被掠被扰，其损失国家补一半。这好比给屯守的士兵和边民们上了保险，这保险公司不是假冒的，是国家开的。如此二三十年下来，边塞充实，非以往可比。

在“移民实边”的同时，武帝的“打”法是主动出击，汉代的卫青、霍去病、李广等诸将军都是名垂青史的名将。

同时汉武帝独尊儒术，重用董仲舒，这个我们放到后边讲。

总之，汉武帝使西汉步入鼎盛。

西汉末年，皇亲国戚等世家霸占土地，使社会矛盾激化。

公元6年王莽篡位，西汉亡。这个王莽可以说对政治一窍不通，法家不法家、儒家不儒家，奸亦不奸、雄亦不雄，治大国不似烹小鲜那样小心、那样注意政策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而是如火爆腰花似地烈火猛烧着、小鱼勤翻着、炒勺狂颠着……朝令夕改、一会儿一个主意、一会儿一个政策……哪里还见什么小鲜？早成了一锅鱼酱也。政策如此，老百姓如何过活？

公元15年，绿林起义。

公元16年，赤眉起义。

公元25年，刘秀建东汉。

四、东汉史略

（一）刘秀与光武中兴

公元25年，刘秀称帝，为光武帝。所谓的“光武中兴”，即指刘秀在位



的二十多年中东汉由乱到定、由弱到强的这个发展阶段。

首先，刘秀用了10年的时间击败了赤眉军的残余势力，在公元36年战争平息；

其次，裁减军队、解放奴婢、大力鼓励生产劳动；

第三，精兵简政，裁掉官吏达90%，减小了冗员、制止了官僚作风、缩减了政府开支；

第四，统一货币，使经济秩序得以整顿；

第五，剥夺封国兵权与参政权力。

一系列的措施，使东汉经济得以恢复，人们得以休养生息，人口增加……这一切来自刘秀建立的这个比西汉专制得多的集权王朝。

（二）门阀豪族的兴起

人性的发展是全方位的。大凡是先想着升官，最好当皇上；如果此路不通则去行商，最好发大财；再不中就搞艺术、修仙术、钻科研、培养子孙，或干脆沉浸于酒色之中。我讲的是那个时候的事，与如今科技新秀、艺术大师、烹饪大师、企业新星毫无干碍。

同理，当封地的贵戚豪门失去兵权与权力后，诸侯割据拥兵自重已不可能，想当皇上的希望自然也成了泡影，于是众位走上致富之路。再加上封地随子孙众多逐渐瓜分得没了气候，也使分封制的性质发生了质变，质变体现在中国就是产生了豪族门阀。请诸位仔细分辨一下，他们是无权但有势有钱的一群，不同于有权有势的那一群。

门阀豪族的特征就是不择手段而贪得无厌，人性在发展上的无止尽性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济南王刘康，家有奴婢一千四百人、良马一千二百匹、良田八百项、宅院成片。他们兼并自耕农的土地，使国家税收困难，实在是让皇上为难；他们聚族而居，利用宗法制建立起一个核心，然后广泛吸收农民成为“徒附”；他们组成“部曲”的私人武装，在自己的庄园外建立土围子，也就是在庄外有高墙、墙外有深沟、沟上有吊桥、墙上有碉堡、庄内有望楼……俨然自成一“国”了。这种封闭的门阀庄园完全不同于西方敞开式的花园般的庄园模式，诸位请看《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乔家大院就略知一二了。

门阀制的诞生，直至盛唐才从大的气候上消失，但其游魂怕是一直游荡到清末。

（三）外戚、宦官与小皇帝

东汉中、后期，封建社会五大病毒中的诸侯割据因削藩难成气候、奸臣弄权和外患不已也不突出。但外戚专权与宦官专权随着封国的衰亡，逐渐露出峥嵘的面目。

为什么有外戚和宦官的专权呢？这两种现象都是由两个相关的因素造成的：一是大权集皇帝一人；二是当这个皇帝是个小孩子时，一切闹剧就发生了。其发展规律是：当皇帝小而无法亲政时，母亲也就是皇后必然拉自己的娘家人来帮着掌握权柄。时间一长，大权旁落，一切归外戚据有——外戚专权。等孩子大了，懂事了，这权也要不回来了。此时只有两条路：要权不成而被害；或从自己的"朋友"、"哥们"、"可信赖的熟人"中组织力量夺权。而皇上从小到大能有谁是朋友、哥儿们和可信赖的熟人呢？只有时刻不离身边的宦官。一旦皇上靠宦官夺回了权，自然重用他们——宦官专权。

外戚专权最突出的例子是梁冀。

安帝时外戚邓氏掌权，安帝长大后利用宦官李闰、江京罢黜邓氏。安帝死后，132 年顺帝立，梁皇后的父亲兄弟掌权，141 年梁氏掌权的正是梁皇后的兄弟梁冀。144 年顺帝亡，两岁的冲帝即位；145 年冲帝亡，8 岁的质帝立。这个 8 岁的小皇上是个明白人，对梁冀十分反感。一次在宴会上质帝看着梁冀说："这是一个跋扈将军"。只此一句话，质帝被梁冀毒死，立 15 岁的桓帝。15 岁的孩子，比 8 岁的孩子成熟得多，他绝不会冒冒失失地说"跋扈"二字，他会忍会等，会暗中积蓄力量。150 年梁太后死，159 年梁皇后死，撑腰的人没了，娘家人合该倒霉了。桓帝在单超等五名宦官的帮助下，率皇宫警卫一千多人包围梁府。梁冀与妻自杀，其家属及亲信党羽全被捕杀，罢免有关联的官员三百多人，朝廷的官职几乎全空了，可见梁冀的爪牙有多少，外戚的权力有多大。

（四）清议与党锢之祸

"清议"，是指文人士大夫议论时政、评论人物，从而形成一种风气的称谓。清议的形成，首先是办学发达，学生人数众多造成的。顺帝时兴建太学一千八百五十室，桓帝时洛阳的太学生三万多人。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人

仕之途，唯有“举荐征辟”，其标准以声誉为先造成的。因此太学生们力争好的名声，敢于直言不讳、敢于针贬时弊、敢于冒犯权贵。年青人本就热血满腔，加上书生意气，这是造成清议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三点，是太学生的举荐由门阀世家来承担，无形中入仕的官员和没入仕的学士都成了门阀世家的学生。师生关系自然非比一般，这就造成入仕的官员学生有权、未入仕的学生有嘴、门阀世家有钱，这三者又都是有头脑的知识分子，是权钱与媒体的三位一体的结合物。不用说，这师生一伙组成强有力的集团，是清议的基础和保障。这个基础与保障被称为“党”，其成员叫“党人”。例如“东林党”，即指东林学院清议的学生们的总称，其具体的成员叫“东林党人”。

“党锢”，指朝廷对“党”的禁锢、限制和残酷的镇压。

帮助桓帝清除外戚梁氏的五位宦官，除单超在160年死去，其余的四位霸占朝纲，成为外戚专权的必然替代物——宦官专权。他们性情怪戾、穷凶极奢，这自然成了清议的对象。于是宦官们借政府之手对党人进行不留情地镇压，造成东汉在桓、灵二帝时有名的两次党锢之祸。

显然，“党锢之祸”不仅是反对宦官专权或外戚专权，它还是人民对剥削压迫的一种反抗，同时也是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批评。而隐藏于最深处的，则是丢了权力的门阀世家与当权者的明争暗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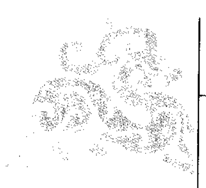
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势如烈火卷地而来，士大夫、世家与宦官、皇帝的矛盾成为次要矛盾。为全力对付黄巾军，党锢宣布解除。

东汉末年，桓帝、灵帝时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反抗的一条路可走。这时社会上流传一本道教的《太平经》，经书的内容涉及平均、平等、反对不劳而获，这就深为广大人民所欢迎。184年，巨鹿人张角依《太平经》创立太平道。184年3月5日，张角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头裹黄巾爆发了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

早在143年，张道陵创五斗米道。从正统的道教传承看，太平道是农民为起义而创的组织，还算不上道教之始。而五斗米道从教义、教规、教条、理论、行为、传承上，都堪为正宗道教之始。所以道教的第一个正式的组织是五斗米道，道教的祖师是张道陵。该道奉老子为始祖，张道陵被称为张天师。

五斗米道亦称“天师道”，215年兵败于曹操手下，后流向民间和士大夫中间，经岁月雕蚀最后演变成道教的正一派。

220年，东汉亡，中国进入“三国时代”。



第二章

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

战国时期，是个人才辈出、百家争鸣的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辉煌的年代。如今让我们深思的，不应只是自豪的回忆与不绝的赞美，我们更应研究和考察一下人才的种类和产生人才的因素。

一、人才的种类和人才的培养

（一）人才的种类

人才不是一个笼统而模糊的概念，人才是要于实际中办事的，所以有必要给人才分一下类。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上看，人才的种类分为三大类型，即：建设人才、军事人才和改革人才。因时代不同，所以对人才的需求也不同；因国家情况不同，所需的人才也不同；因单位情况不同，所需的人才也不同。当人才的种类与时代的脉搏、国家的国情、单位的实情相符，那么一代人杰诞生了；不相符，则是天大的悲剧。更可悲的是：一旦这些人才坯子们干上坏事，那他们产生的破坏力是成千上万的"臭皮匠"们所办不到的，他们毕竟是人才，不是庸才。

1. 建设人才。这是社会和平稳定期所适用的人才。这个时期，是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社会网络系统的宽容度大，人性可以全方位发展和无止尽向上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是质变刚过去的量变时期，一切需要稳定而有秩序有步骤地发展。这个时期的人才细分下来有政治人才，如孔子、孟子、汉武帝；有经济人才，如农家许行、贾谊；有人文人才，

如墨家墨翟、文学家屈原;有宗教人才,如道家的李耳、庄周……。之所以有政治、经济、人文、宗教等人才,一是和平建设与社会稳定这二者的需要,二是人性全方位发展的需要。人性中最有活力的情与理可以在多个领域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人们可以去当官、去行商、去当艺术家,实在是喜好清静的人,还有出家一途。不论是官吏还是文人,去当和尚绝不是丢人的事,搞不好还可以干出点儿名堂。而官吏一类的人,其实是管理者,所谓清官、父母官,指管理型人才。只要能理顺土豆、麻袋与绳子三者关系、自己清廉、能秉公办事、重用有农业技术的人、对人民有同情心,这就算是好官了。

可以说这类人才并非多么难得。

2. 军事人才。这是国家和民族处于危机或威胁下所需的人才。这类人才能马上使国家处于战争所要求的状态:整齐、秩序,可以使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敌外辱。他们能煽动起人民爱国的昂扬情绪、能巧妙地利用这情绪为保家卫国服务,他们能使人性在和平发展时期的全方位性归于求生存的单一性,一切简化再简化,最后归于一点——军事化。他们掌握了战争的诀窍和技巧,打仗对他们来讲是再熟悉不过的业务。兵家的孙武、孙膑就是这类人。这类人显然产生于战争年代,由战火与血腥才能考验和培养出来。

可见这类人才得来不易,且成本太高。

3. 改革人才。这是国家处于突变期的人才。突变期,是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严重矛盾的时期,是社会网络系统的宽容度已全无、人性在发展的全方位和无止尽上双双受阻的时期,这个时期是量变诱发质变使社会进入下一个层次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任务是砸烂旧的网络、建立新的网络,这个时期呼唤的是革命。法家的秦皇、商鞅,纵横家的苏秦、张仪都属这类人才。

改革人才是最难寻觅的人才。说这类人才最难得原因有三。

其一,因为没什么先例可寻,所以改革人才必须要有创造性,思维的三种方式(逻辑思维、艺术思维、灵感思维)在他们身上必须全部具足。因为想象力、胆魄、预见性是创造性的根本,所以胆大、敢想、有预见能力是这类人才最突出的品质。

其二,是他们必须博古通今,知识渊博,同时又有实践的体会。咱们

在“精神三境界”中讲过，只有理论的人是口头禅，真正去实践的人才能进入“看山不是山”的水平。而突变期的改革人才是要那种从理论与实践中悟到“看山只是山”的高层次的人。

其三，是他们必须具备清醒的头脑，要有“宗教三要素”（组织形式、修行方法、光明的彼岸）般的组织能力、行动方案与要达到什么目的的设想与许诺。正是因为以上三点的困难，所以这类人才多是有一个小班子，有一个核心集团。这个小集团既团结，又人才荟萃。例如刘邦，他本人虽然是个地痞，但他懂得如何用人，他手下有经济学家、政治家萧何，有军事家韩信，有政治思想家、军事家、心理学家张良，加上他本人原本就具有背信弃义、忍辱负重、出尔反尔、实用功利……的品质。于是他和萧、韩、张的才干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激励，最终战胜了孤家寡人的楚霸王，登上皇帝的宝座。

据老人们说，要成大事的人必有三个人才辅佐。“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加一个，从而形成一个“四人帮”。人多了太乱，人少了形不成班子，总以三至五人为好，而四人为最妙。例如刘备有关羽、张飞、诸葛亮；毛主席有政治家、外交家周恩来，军事家朱德，经济学家、政治家刘少奇……虽然这里有说书和演义的味道，但四至五人组成坚强的核心，是改革人才要实现自己的目标所必具有的班子。这东西说好听点儿叫范式共同体，说中庸点儿叫沙龙小圈子，说难听点儿叫反革命集团。

（二）产生人才的三个尊重、一个培养

战国人才辈出，约略地可分为法家、儒家、墨家、道家、阴阳家、兵家、农家、纵横家、名家、杂家、文学家十一类。如此众多的涉及诸方面的人才在短期内雨后春笋般地成长出来，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每个时代都在呼唤人才，但千呼万唤不出来……难道战国这二百多年有什么诀窍么？

其实无非是：解放思想、加强培养。

解放思想，首先要做到三个尊重：

1. 尊重人本身。原始社会的巫礼巫术，以人做牺牲。这种社会尊重神、尊重祖先，解放的是神和祖先，却拿人不当人。所以这里只能出半人半仙的首领和代表祖先的酋长，不可能有人才出现。

奴隶社会的占卜和巫礼，人只能是听任卜筮的结果，尊重的是卜辞和

诚心，这也不容人的头脑中有什么独立思考的能力或产生什么新思想的“邪念”。当一切纳入宗教式的礼仪和载歌载舞的激动之中后，人的情与理的外延已被限定。这时只能出巫师，不可能出人才。

封建社会的诞生，由尊重神、尊重祖先、尊重占卜之术、尊重什么咒语什么功法，一下转为尊重人。这种转移造成人的思想的空前解放，尊重人终于成了现实。

问题是：尊重人是尊重人的什么呢？重人的体力？那是原始人的标准；重人的技能？那是劳作所必备的，或是什么大巫师、大天师要必备的，依靠技能修不出人才；重人的情绪？你不是说情感是人性发展的动力么？其实动力并不等于灵魂，猪八戒并不是孙悟空。所以，尊重人尊重的是人的思想、人的理性。当然，在尊重人的同时不能有出身歧视、国籍歧视。

战国就是这么个时期：赳赳武夫、奴隶草民、引车卖浆、鸡鸣狗盗都可以为士，上宾的谋士更是靠推销自己的思想而活得挺不错。只凭侃大山就轻裘宝马，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于是百家的出现也是以前没有的……可见重视人的思想比重视人的技能更为要紧啊。

2. 尊重人的创新。尊重人的创新，意味着打破旧的思维框架、思维模式、思维习惯。

我们常说解放人的思想，其实指的就是这个。这个解放比所有关于人的解放都要难得多。有的人，你尊重他，让他放开胆子想，他死活也想不出什么新的招法。有的人却可以，招法百出、花样儿翻新。问题在哪儿？问题就在自己身上。敢说、敢想、敢讲真话只是人品在道德层面上的解放，是忠臣型的人物；敢打破框架、敢逆向思维、敢于直觉思维则是创新层面上的解放，是大智慧者、是真正的人才。

商鞅，一位古人，他没走要多打粮食就逼奴隶多干活的老路。他反向思维，不但不逼奴隶，反而解放他们，使他们成为平民，再向他们收租；汉武帝，不走晁错削藩的路，反而“推恩令”，让你们自己去瓜分藩封；邓小平，不走“甩开膀子拼命干”的路，反而让土地承包……这些人才，都是思想真正解放的人杰，是真正的思想家，是大家。马祖道一倡“即心即佛”，如果人人这么自信、这么勇于创新，中国何愁不强哉？

所以，最难的这一条叫尊重人的创新。

3. 尊重人的流动。人才有三种类型，前边已讲过。而国情不一样，

有的人才不适于本国或本单位,势必就产生了人才的流动。魏国地处中原、物产丰富、国势强盛,魏国国君只需要保守的人才,不需要军事人才、改革人才。而吴起、商鞅、孙膑、范雎、乐毅都是魏国人,魏王不加重用,他们只好到别的国家去了。“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人挪活,树挪死”。如果魏国重用他们,那统一中国的将是魏始皇建立的大魏帝国;如果魏国不让他们出境,既不给护照也不给签证,惨了。这几位只有唱唱山西梆子、吃吃刀削面、开几个羊肉泡馍馆儿、粉皮儿摊子。胆子大的再出些“商鞅牌”变法酒、变法药什么的去变着法子坑人,再也无封侯拜相、纵横捭阖的伟业了。没有流动,也就没有了人才。

4. 人才的培养。三个尊重上边讲了,尊重人本身、尊重人的创新、尊重人的流动。而一个培养,是说人才的成长是要专门下工夫、花力气不怕费钱的千年大计。道理人人都懂,不再重复。

相传姜子牙姜太公在帮助武王灭商之后,向周武王姬发要了一块封地,告老还乡安度晚年,并教化人民。他要的封地在山东,因为离政权中心太远、太偏僻,所以古称天尽头,也就是齐天之地,遂称齐国。齐国一直重教育,连孙悟空的老师须菩提也在这儿定居。后范蠡携西施来齐,边行商边赞助教育事业,没闲工夫看蚂蚁上树、长虫过河。这重人才、重培养人才之风气在齐王田辟疆手里更加焕然一新。他们在首都临淄的稷门附近办了一个国际性的“高知识人才开发区”——“稷下馆”。学子们上学受人尊重,不交学费反而国家发给高额薪奉,毕业后全分配到各国任要职。孔子、孟子、孙子、墨子这些人,不是齐国人,就是稷下馆的门生,这简直是山东人的骄傲,是教育界的楷模。姜子牙可含笑九泉了。

有了人才的三个尊重一个培养,诸子百家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开演了。

二、儒家略述

诸子百家,是新思潮乘着想象力、理性携裹着情感而产生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飞舞盘旋……冷得如青铜器之鼎、热得如战场之血……在兵马俑的方阵中,充溢着那个时代的灵与肉、魂与形、情与理、生动与方整。

儒家以孔子为代表,满有人情味地用保守和稳定编织了一个网络系

统。这个学说与其他的学说本是不分伯仲，随百家的辉煌而辉煌……当余辉渐去，它又绵延萦绕近250年，到了西汉中叶才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可以说这是一种社会的沉淀。中国人之所以选择的是它而不是其他，这可能是个谜。但这绝不是偶然的，它太有人情味、太有魅力、太适合中国人的种种认同感……

沉淀下来的儒家，一直经营了两千多年，其中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怎么叫人说得清？

（一）孔子与四书五经

儒家一脉，源在孔子（？—479年），其后是孟子、荀子、董仲舒和朱熹。

儒家的经典是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和五经：《易经》、《春秋》、《诗经》、《书经》、《礼经》。

孔子生前并没写下什么著作，在他死后门徒们把他的言论编纂起来而成为《论语》。孔子的思想其主观上是"崇古复礼"，为达其礼而宣扬的乃是"仁"。在春秋的诸侯称霸和战国的七国纵横来看，孔子是反对战争、希望和平的。他是个思想家、教育家，他对政治并不熟悉，充其量他只是个"建设人才"而非"军事人才"、"改革人才"。他憧憬和向往周成王在世时的"成康之治"，他没有别的例子可寻。但他强烈地希望安定、和平以便施展自己的才华。这本无可非议，于是他在检查了战国之乱和成康之治后，认为"治"在于有"礼"，"乱"在于无"礼"；周亡在于君王不"仁"，只要有"礼"、"仁"，则成康之治重现、战国之乱复平。他的希望是好的，他的思路错了。说他不是个政治家、不是改革人才就在这里，他没意识到周礼已落后了一个时代，没意识到战国的乱是必然的，由量变到质变的社会转型期，不乱何为改革呢？

总之，孔子以追求和平安定为出发点，以落后了一个时代的成康之治为楷模，用礼与仁试图把社会规范回奴隶制中去，这就是孔子的思想核心。

"礼"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仁"是一种情感上的行为。作为大思想家、大教育家的孔子，揭示了人性在发展上的辩证。秩序方正是共性、仁爱仁慈是个性，这情与理的统一有它的超历史性。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要有

仁与礼的统一，任何人、任何民族都要有仁与礼的辩证。孔子触摸到的是人性的本质，这是他的伟大之处。按咱们禅门的话说，叫明心见性，开悟了。但同时，孔子把人性"全方位发展"定在向后看齐，一切以"克己复礼"为方向；把人性的"无止尽发展"定在不能越过"礼"的门槛上，完了，根本不是他的理论有没有宽容度，而是完全的不合时宜。他只看到改革的"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及变法的血腥和毫无人性，这种零乱与冷酷，是孔子预见到了的。但他没有预见到当蝴蝶破茧而出时，那蝴蝶将比蛹更加美丽、更加生动，它将畅游于蓝天下、嬉戏于百花中。他难以忍受的是蛹破茧时的痛苦和躁乱，他大声呼吁蝴蝶应回到那安静、祥和、稳重、方端的蛹去，回到茧中去，挂于树枝之下、随春风摇曳，其乐也融融；沿树叶爬行，餐饮有时、作息有度、其意也融融……

当时代是变革期时，没人要听孔老二的仁与礼，打倒孔老二砸烂孔家店是质变的破旧的必然；当时代是建设期时，人们重拾孔老夫子的仁与礼，用新的内容去改写仁与礼，于是社会稳定前进，这是量变的守规矩守方圆的必然。当我们把仁与礼从具体的国策中抽象出来时，它是对的，是社会的相对真理；当我们一味地用旧时的仁与礼实施于今世时，厚古薄今的保守性、破坏性也一览无余了。

有的专家认为"儒家并不形成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它只作为一种观念概括和统摄人的行为，从而显示出一种无理性的逻辑"。说儒家不是完整的哲学体系是对的，因为仁与礼只含有哲学的辩证气息，它只是涉及人的人性，并没有太多的涉及政治、军事、政权、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其他领域。说儒家是一种无理性的逻辑，也对，这正是中国人"亲证哲学"的特点，是中国人"情理认同感"的特点。中国人没人愿意听长篇巨制的论述和道理，一切只看你实用不实用，一切只看你是冷冰冰还是有人情味。我觉得专家们太爱用纯思辨的哲学角度看儒家，这样一来根本就理不出个头绪，一切是是非非全成了"无理性的逻辑"。如果我们站在中国人特有的观念上看儒家，那么儒家并不是什么哲学，而是一种具体可行的"法门"（方法、原则），即："儒家是一种用人性发展的亲身体会，把仁与礼从体会中抽象出来输入到社会中，试图以此稳定社会和统摄人的行为的法门"。正因为它源自体会而非推理，所以显示出"无理性的艺术般的逻辑性"。说通俗些：哲学以理性的逻辑思维指导人们；儒家用情与理的辩证艺术地

去指导人们。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出发点原本不错，他创造的仁与礼的模式原本不错，但时间错了，不应用在改革期，而应用在建设期；内容也错了，不应用奴隶制的周礼，不应一味地讲过了时的仁。

从历代儒家对孔子学说的运用来看，都偏执于守旧，执著于复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以己度人的品质问题，以这个“仁”之心去复周礼、拜祖先、灭人欲……有统治者的阴谋伎俩，有呆秀才的瞎哼哼，有真名士的干着急。好的理论好的模式并不一定有好的结果，这也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例子。

孔子是个人生经验十分丰富、且极有智慧的圣人，在他提出“仁与礼”的理论之后，曾周游各国。他的青年和壮年并不是没做过错事和尴尬之事，圣人即常人，没必要为了反儒而抓个什么不放，也没必要为崇儒而否认什么陈蔡绝粮、杀少正卯。周游和挫折使孔子更加成熟，孔丘 63 岁回家乡鲁国，一心一意从事于教育事业。在岁月的磨砺后，孔子在仁与礼的基础上提出“以仁为本、以忠恕为行为准则”的新的内容。“礼”的成分退了下来，“忠”的成分升了上去，热爱自己的国家、忠于自己的君王远比不论三七二十一，一律打杀、一律回到周礼来得现实而进步。换言之：不论自己的国家是周的礼、春秋的礼、战国的礼……不论何种制度，只要是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亲娘，那就无条件的忠于它吧，这叫“忠”；而“恕”，则是请原谅他人的过错，当然这里也含有对自己过错的忏悔。人老了，知天命了、耳顺了，早已不惑了，讲出忠与恕的话实在是人生的体验。这里哲学的气息进一步淡化，而人性的情趣更加浓烈。

在农业经济的国度中，收成好坏、收入的高低并不仅仅取决于耕作得是否努力，它还取决于生产经验。而农业的生产经验又是几十年从实际的农业耕作中对土地、作物、气象、地理等等复杂的因素中摸索出来的。这些经验多集汇在老人身上，人们不再信神、不再信什么巫术后，自然地把崇敬之心转移到老人身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指的就是老人身上有宝贵的经验。这种崇敬老人经验的观念一旦具体地落实到伦理道德中，孔子就把它规范成“孝”，而“孝”被固定成习俗和伦理的条律时，理性和情感再一次辩证地结合在一起，加入了中国人“习俗认同感”之中，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了。

综上所述：孔子以“仁”为本、以“礼”为律，创造了儒家。在这个儒家范畴中，以“忠”和“恕”对待社会和他人，以“孝”对待老人和农业生产经验，一切的“义”、“气”、“三纲五常”、“理学”、“心学”，都是后人加上去的东西，孔老夫子没那么多的杂碎。

对于孔夫子本身复古和保守的思想感情倾向，诸位应予以理解，应取其模式、弃其内容。绝不能依其复古的感情倾向、思想倾向走下去。可惜，儒家的后人竟全是这么走下来，直至全部崩溃。

（二）孟子的浩然之气及荀子《周易》之儒

孟子（公元前389—公元前305）名轲、字子舆，山东邹城人。

公元前320年，孟子见魏王，魏王问他这么老远来见我，有什么利于我国的见教呢？孟子脸一板，严肃地说：“大王为什么言利？只要有仁义即可。”照孟子的意思，一切战争都不能要，一切要以民为本。亏得魏王没听孟子的话，否则魏国亡得更快更早。孟子为什么完全彻底地反对战争呢？就在于他深深地同情无辜的人民，他反对战争是一种无理性的极端情绪化的结果。他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为了反战，将军处死，连开荒的人都要受罚，因为这些人言“利”而不言“义”。

“义”，是孟子在儒家的礼与仁、忠与恕、孝与悌之后新加入的内容。从反战的角度看，“义”的核心是“人本主义”。孟子由孔子的“复礼”走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人性论，从人性论出发，孟子第一次提出“性本善”并由此推衍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连皇上和国家都成了次要的，民本为先、为贵。再涉及到伦理道德范畴，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孟子的重人本、性本善，使他先反战，再引申出“重义轻利”。当与孔子的“仁”接轨后，则产生了“仁义”的概念，这个概念孟子解释为：

“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大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为了“仁义礼智”，君子应轻命而重道，轻利而重义。为了达到“仁义”之道的高级境界，所以男子汉大丈夫全应：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显然，孟子不是政治家，不是军事人才和改革人才，他是大思想家、心理学家、人文学家。上边的一段话中国人全会背，与其说是治理国家的国策，不如说是个人修养的标准。孟子实在是建设时期的人才。

修养成重义轻利的君子实在很难，要做到见义忘利的仁义之士也不易。为了鼓励人们都去这么修行，就必需有个光明的彼岸。我们在“宗教三要素”中讲过：组织形式、修行方法与光明的彼岸是一个宗教（或准宗教）所必备的要件。孟子的学说作为儒家一派，不必再去建立什么组织形式，而修行方法已经由饿、空乏、苦……等等行为去完成了。那结果呢？修了半天，丢了挣大钱和当官的机会，耽误了发财和泡妞，得到什么呢？这个东西不回答，见义忘利就不可能执行。于是孟子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我善养浩然之气。”换言之，走修炼“见义忘利”的修行人，其修行的结果是得到“浩然之气”，也就是“荆轲刺秦王，白虹贯日”的贯日白虹之“气”。很重实际、很重实用的中国人，在这一点上飘渺得很、轻飚得很。两千年来的中国人为“正气”、“志气”而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文天祥是“天地有正气”，岳元帅是“怒发冲冠”之气，辛弃疾是“气吞万里如虎”之气……

再三重申，孟子实在不是政治家，是个教育家。当中国人面对侵略者时，孟子的浩然正气使我们不怕牺牲，我们从心底里从骨子里就知晓天理昭昭，知晓和体味到气贯长虹的境界。我们看梅，品到“唯有花枝俏”，品到“只把春来报”；我们看竹，品到虚其心，品到气与节；我们看松，品到“雪压青松松更青”……我们可以“义无反顾”地迎着敌人的刺刀，因为“义”让我们浩气长存；我们“义不容辞”地反对卖国，因为“义”本是无理性的堂堂正正，除非他没了人性；我们“义正辞严”地维护我们华人的利益，因为中国人永远不相信有邪可压正的事情。可歌可泣的浩然正气，是中国人的魂。

从战国的诸子看，并没人讲到气，当然孟子除外。连道家的老子也没讲气，而只讲“道”。然“气”之一字流布下来，就与三教九流的中国人结了缘：修道的人有仙气、念经的人有佛气、玩气功的人有周天之气……这也就罢了，算是一种习俗吧，因为中国人还有什么官气、贱气、侠气、贼气、死气、霉气……叫个什么什么气，原本无大碍。但非要说我的这个“气”能修

成“炁”，于是就如何如何了，可上通天下彻地、七千年传的秘诀方可修成、八百辈子冒出一个全才人物才能读懂，这就眼见得是胆大不要脸的主儿了。我宁可信周总理身上具有的气贯长虹之浩然正气，不信别的什么炁。咱们修行人可翻翻古籍和先贤的著作，真有在孟子前讲过修炁或气的事情，我也马上入你的什么班什么会。只要在孟子之后讲什么什么气的，免谈；讲炁的，请勿打扰，没工夫陪你玩。

自中国人有了重义轻利的志气、浩然正气，这个概念就流溢沉浸于各个领域中。孟子原本是以“气”治国的，可事与愿违，当这气流入道德领域中，再从道德观中渗透出来升华为中国人的审美观，“气韵生动”就成了中国人首要的审美情趣与审美标准。这个情趣与标准的特征是：于有限中呈现无限、于有常中求永恒，有秩里的无秩、理性中的情感、静中之动……外国姑娘说中国小伙子是热水瓶，里边热外边冷。好，这就算是气韵生动的广告吧。

荀子（公元前313—公元前238）名况，字卿，也叫孙卿，赵国人。

此人的弟子们在西汉初年整理出《易》、《诗》、《礼》、《乐》、《春秋》，他的学生有法家李斯、韩非子。

荀子此人兼融了儒家与法家的思想，他参透了《周易》，看到了人性是阴阳辩证地发展，所以不拘于儒之一家或法之一家。他承认在事物的发展中会出现超越，于是提出“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荀子很深刻地理解到推动社会发展的是人性中的欲，所以提出“性本恶”说。由性本恶出发，引申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是，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总观战国时期的儒家，由孔子的“仁与礼”走上“浩然正气”和《周易》。孔子试图用一个网络模式整理好国家秩序，以实现和平；孟子试图以重义轻利索性去停止战争；荀子只讲《易经》，言下之意是该乱则乱，该治则治，儒法两家分别用来对付大乱与大治。从哲学上看，儒家走到这里，原本没什么错。但孔子遗留下来的复古思想和思周的情结却严重地干扰了儒家的理论，使儒家顽固不化地走上一条保守的因循守旧之路。

（三）董仲舒的四时五行

儒家一直不景气，到秦始皇坑儒后，更加衰微。



秦的统一，使人们确信法家是立国治国的法宝。但秦的突然灭亡，又使思想家们重新整理思路，看问题出在了何方。此时的儒家，又开始唠唠叨叨地讲“焚书坑儒”。其实秦始皇坑杀的四百多人，原是道人和炼丹的大师占多数，本应是“焚书坑道”。如今儒家一揽子全算成坑了彬彬有礼的儒家，如此的伎俩，其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因为坑了儒，国家无人治理了，所以秦很快就亡了。把自己的命运说得越惨越容易引起同情，加之这种不厌其烦的唠叨最能迷惑人……于是儒家的转机来了。

贾谊，这个汉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是个建设时期的人才。他在他的著名的《过秦论》中写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也就是说打仗、立国的攻伐要有法家，而安居乐业的守住天下则与之相反，要用儒家了。很显然，荀子的“阴阳辩证易经说”和儒家没完没了的唠叨，深深地影响了贾谊。

汉初，刘邦索性甩开儒家法家的纠缠，不研究什么易经八卦的辩证，走上“无为而治”的老子之路。

汉文帝刘恒，其妻窦皇后干脆信奉道家。

汉景帝沿着道家的“无为而治”走到“七国之乱”，这条路也不通了，人们再次回到非儒即法，非法即儒的旧思路中来。

公元前 141 年，刘启死，汉武帝刘彻继位。这位当时才 17 岁的大男孩再次任用儒家，于是儒家一派时来运转。这时的儒家的代表人物即董仲舒。

董仲舒的儒学乃是经历了儒家失败、法家先胜后败、道家由方术至“无为”，这三者杂糅在一起的儒学。这是一种在儒家“仁、礼、义、气”的基础上，加入法家的重视人“欲”的主观能动性，以及道家天人合一的无为框架而形成的一种儒学。这儒学的称呼是：天地人合一的“四时五行之儒家”。

董仲舒认为：“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

“四时”，即春夏秋冬四季。“天地之气，合而为一”，是称赞孟子的“浩然正气”乃日月之精华、天地之祥瑞；“分为阴阳”，依仿“道生一，一生二”，也是歌颂周公周成王其祖周文王、其父周武王，一文一武、一张一弛……又符合了《易经》的“太极生两仪”，即阴阳也；“判为四时”，即四时相继，乃不误农时之意，“春种，夏管，秋收，冬藏”，不识农务，非中国人也，这又符

合了“两仪生四相”的易经之言。

“五行”，指金木水火土，它们具有相生相克的关系。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这种相生相克的关系是通常的说法，但当董仲舒把它引入新的内容时，其意义就大不一样了。董仲舒把五行分成三组相生相克的事物，即：“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以其天之序也。”

中国人讲阴阳五行，本源自上古。卜辞中有东西南北中之五方、有酸苦甘辛咸之五味、有青赤黄白黑之五色、有喜怒悲恐惊五情。这里古人用“五”这个数字讲方位、讲感受、讲颜色、讲情绪，都表示了一个全面的意思。董仲舒以古人的习惯称谓，填进自己新的内容，这就有些别有用心了。中国人喜欢古，“借古讽今”、“厚古薄今”本是儒家的作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乃是儒家的口头禅。但“托古而树己”、“打着古人的幌子办自己的私事”，却大有起义军的风范或卖假酒的方略了，什么“黄天当立”啊、“陈胜王啊”、“石人一只眼”啊，全是起义军托古的法子，而“太后御酒”、“乾隆密制”、“李白陈酿”、“曹操烧刀子”……这些“古董”酒真是好听、难喝、价钱贵、广告多。

说得跑了题，再扯回来。董仲舒的“四时五行”儒家陈酿是：

“……夫木者，农也。农者民也。不顺如叛，则命司徒诛其率正矣，故曰金胜木。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众，则司马诛之，故曰火胜金。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过度失礼，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穷矣，故曰木胜土。”

虽然这里面少了“水”，但显而易见：皇帝管司马、司马管司徒、司徒管草民、草民一急了就造反，于是管皇上。如此锤子、剪子、布，环环“相生相克”，从而为绳子、麻袋、土豆的网络系统正了名，溯了源，并找到了理论依据。我敢说如今任何一个造假酒的人都没董仲舒胆子大，你造的假酒能坑人两千年么？能坑杀亿万人么？不成吧！但董仲舒能。从开天辟地，从有了天地人，就有四时五行，就有锤子、剪子、布，就有绳子、麻袋、土豆，就有儒家的天理，于是草民就是为官、为吏、为皇上种地的，天经地义；官吏就是上听命于皇上，下诛杀造反的草民的，天经地义；皇上就是管官吏，外加吃喝玩乐的，只是别到夏桀、商纣、周幽的“酒池肉林”的地步，也天经地义……儒家这马屁拍得舒服而不觉，令历代君主乐得不成。当“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在汉武帝手中实现时，儒家的保守性、复古性和腐朽性就开始腐蚀中国人，这也是天经地义地真实不虚和必定无疑了。

董仲舒的“四时五行儒”仍是以“礼”为其核心，尤其是对皇上、对上级要彬彬有礼、进退有方、言语有度……低眉顺眼、曲膝弓背……这实在是儒家的看家本事及累积下来的习气或是本能，同时也是让皇上心气顺畅、龙心大悦的高招儿。汉初刘邦立国，金殿上刘邦面对的是与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小兄弟，实在拿不起架子、抖不起威风。而这班小兄弟实乃流氓出身，一点规矩全无。他们在金殿上大呼小叫、舞刀弄棒、称兄道弟，弄得刘邦挺尴尬。于是儒家出来圆场，叔孙通弄了一个学习班，大讲“朝仪”，把这伙流氓训练了一番。毕业后，这帮铁哥们全四爪着地，口中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一回刘邦乐得差点儿背过气去，坚信自己祖坟风水好、冒青烟儿、长蒿子。如此这般，儒家想不受重用也难。

尊重一个人和拍一个人的马屁是两回事儿，谦虚和唯唯诺诺是两回事儿。而对至高无上的皇帝，再弄出“至低无下”的什么礼节，你说是哪回事儿？

别管这是哪回事儿，反正是皇上与官吏的事儿，是儒家开始受宠的事儿。百姓呢？也就是受人压迫但逼急了可以造反而克皇上的草民呢？惨了，只剩下老老实实种地这一回事儿了。

中国的百姓，只要有吃有喝、老婆仍在，那就天下大吉，并不理会谁当官谁当皇上，并不在意谁克谁。干活出力、流汗……这是天经地义的。虽然逼急了就“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但毕竟是百年不遇的特殊，没人怀疑这儒家的四时五行对不对，也没人怀疑锤子剪子布。天啊，这正是中了董仲舒假酒的毒。

总之，董仲舒的“四时五行儒”上承孔子的“仁礼之儒”、孟子的“义气之儒”、荀子的“易经之儒”、道家的“无为而治”、法家的“重视人欲”，下启程朱的“理学之儒”。他的儒学已经把人为的一种理论比喻成大自然的规律，成了“天理”。天理嘛，与“教”相去不远矣……儒家此时已开始向儒教“进化”……罢了，再好的天理也是不变的，不可逾越的。而人类是发展的，历史是发展的，这个天理最终会由合理走上不合理，由稳定社会走到扼杀社会。两汉到盛唐还可以说儒家是贡献大于破坏；中晚唐到宋元可以说是五五开；而明清两朝则彻底地掏空了封建社会，使之走上灭亡。

（四）朱熹与理学

汉亡后，魏晋南北朝，人们听厌了儒家的唠唠叨叨，实在是烦了、厌了，于是全去谈玄说妙。因佛教的输入、道教的诞生，在盛唐时产生了禅宗，于是人们一改谈玄说妙，全去谈禅论道。这显然对儒家是一个不小的冲击，而拯救儒家者，正是朱熹。

佛家，以其真空生妙有的学说，贯穿宇宙万物和色受想行识，它给了中国人一个空无的“本体论”和“缘起性空”的“因果论”、“缘起论”。

道家，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来描述宇宙，用阴阳的二气冲，给了我们中国人一个“系统论”、“辩证法”。

朱熹，模仿佛与道，上承董仲舒，给中国人弄出了一个“心性论”。他不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创立新的学派，而以“凡是儒家的，都是合天理的”，一厢情愿地弄出“理学之儒”。

“心性论”建立在荀子的“性本恶”的基础之上，它认为人的心与性是贪欲的代名词，所以要“去掉人的贪欲，追寻人类的真理”。这理论实在是“正确”得无懈可击。于是再把这美好无瑕的理论推导一下：“去掉人的贪欲”等于“灭人欲”；“追寻人类的真理”等于“存天理”。于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就诞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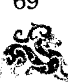
“灭人欲”还好理解，凡是你想要的、希望得到的，全可称为“欲”，全在扑杀之列。想吃饭、想成家、想要媳妇、想要儿子……好，一切是皇上给的活路，才有饭吃；朝廷给的户口，才能成家；祖宗让你传宗接代，才允许你娶老婆；宗族让你继香火，才准你生儿子。生女儿不成，白给，为完成“香火”这一“天理”般的大事业，请继续生……七仙女、九凤凰后，也要有儿子才收兵。不成就纳妾。

总之，一切并不是你想要什么才有什么，而是皇上赐的、祖宗命令的，这叫“灭人欲”。

“存天理”是什么呢？朱子说：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此理之流行，无所而不在。”

说了半天，天理就是三纲五常，“存天理”就是遵纲守纪。



“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就是君、父、夫说什么都对。说煤球是白的，那臣、子、妻定然地不能不遵纲守纪，必须也说是白的。事实是一回事，那是小事；遵纲是一回事，那是大事。只遵事实而说煤球是黑的不成，不遵纲纪不存天理那就事大了，大过地震、海啸、蝗灾、洪涝……大过天地毁灭。

“五常”也称“五伦”，指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些关系，存天理就是摆正这五种关系，别妄想造反、犯上。完了，董仲舒的草民造反克皇上给“灭人欲”灭掉了，锤子、剪子、布的布，不能克锤子了，只有干等着挨剪。游戏完了，到头了，谁都出锤子，没人出布，只剩下锤子和剪子，也就是只剩下皇帝和官吏的游戏，草民死定了。这样的理论不是毒药是什么？其实它比毒药更毒，它外包装是“天理”，也称“天理牌假酒”，喝一口必死无疑。

当儒家彻底地成为儒教时，朱熹走得可比董仲舒远得多了。“存天理”的实质是“存伦理、守纲常”，这种无人性的伦理观就引申出一系列让秦皇、汉武、孔子、孟子、张天师、达摩老祖都吓出冷汗的玩意儿来了。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先就把社会底层的妇女逼上死路。贞节比生命更重要，是理学的奇谈怪论。死了丈夫遭了强暴，没人替你声张正义，反而逼你悬梁跳井，如此就正义了，就天理浩荡、流光溢彩、荫及子孙、福泽万代……了。邪恶的“性行为”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功能？比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还厉害？“耶斯！”众位不信就看看那些烈女牌坊、贞节牌坊去。

“君子小人之大辨，人禽之异，义利而已矣。”显然大家都到了君子国，人人谈义方为人；小人谈利就是狗、是畜牲。君子不爱财，只是不知道君子为什么没饿死？他的伙食费哪里来？最可气的是什么传说中和演义中的武林大侠，个个全没人味儿，站在山之巅、松之下，一脸严肃地喝西北风，钱、财、名、利、色……这些玩意儿全与大侠无缘。没钱当然没饭吃，但功夫深，只吸氧服气就成。这在门里叫吸天地之精华……够损的，全宇宙的精华都让他们吸去了，草民吸什么？本来就吃不饱，这回连西北风都不让喝了。这种人物，老百姓居然爱看，真是儒家流毒匪浅。好人一个个一脸严肃、坏人一个个表情生动；好人一个个金刚怒目、坏人一个个眉开眼笑，当然是奸笑、淫笑。但好人不会笑坏人会笑，这已然有天壤之别。金庸先生悟到这里面的诀窍，于是创造出一大批也吃饭、也会笑、也有情的

大侠，这些大侠不光喝西北风就饱，仍是敢哭、敢乐、敢爱、敢犯错儿的人。韦小宝有老婆七位，郭靖有情人若干……当冷剑热血加师兄师妹代替了喝西北风的大侠后，武侠小说大放异彩。

连吹牛不上税的小说、大侠都怕理学，何况活生生的人乎？自然万物是开放性的，人性也是开放性的。依天理依自然，则“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是朱熹说的。但朱老夫子更是把遵纲守纪被说成是与自然规律一样的不可改变，这一回朱先生不认账，变了脸，宗教味儿就出来了，儒家从此成为儒教。儒教的艺术语言是：“万物静观皆儒教，遵纲守纪与人同”、“等闲识得东风面，灭欲存理总是春”。

真不明白的人和真明白装糊涂的人共同把好端端的儒家弄到了极端。极端就是没有退路没有前路的悬崖之边缘。可是忠与孝、敬业与爱国在民族危亡时放射出最终极处的光彩，这光彩乃是中国人不屈的魂。所以，还是要全面地看这儒教、看这“理学之儒”。

关于理学先讲这么多。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关系我们放到中晚唐分析中再说。

三、道家略述及儒道模式的建立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公元前571—？）。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原是周守藏室之吏，也就是周朝图书馆的资料管理员。春秋末年，周室衰微，所有的“周之典籍”被王子朝这个人拿到楚国去了。资料没了，也就不再用什么管理员了，老子下岗，骑青牛一匹回老家去。西出函谷，被关令尹喜强行扣下，非要让他写出道家的秘密和诀窍。这一回真是秀才遇到兵了，老子无奈，连夜写下五千言的《道德经》，然后出关落荒而去，“莫知其所终”。

老子在职时是管资料的，所以孔子曾向老子请教周礼。孔子是要以周之礼施“克己复礼”而创立儒家，老子却回答说那东西（周礼）早已朽矣，看来孔子是白来了一趟。老子比孔子大20岁，他看出这个壮年后生定然碰壁，于是很自嘲地指点孔子。老子说：“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显然这潜台词就是：战争年代，你一个搞教育的和我搞图书资料



的都生不逢时，倒霉一辈子。当然孔子没听懂，或许根本不在意。

"得其时"与"不得其时"每个人在一生中都遇到过，顺心的事与不顺心的事每个人都经历过，但真地懂"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不多。真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学会"利导思维"，也就是挨了打要学会"这叫儿子打老子"，反正是遇到倒霉的事多往好处想，这样可以增加脑内吗啡、益寿延年也。是不是有那么点儿阿Q精神？是！不过我倒挺喜欢阿Q，真君子都有些阿Q之气。韩信不就是受过胯下之辱么？一味地只知"拿得起"，一味地讲积极的人生，全然拒绝"放得下"，这是"跟着电视剧学艺术，跟着广告学做人"，那将落下了一身的毛病——气质性偏执。

世人多认为老子的道家思想是消极避世，这种肤浅的偏见何时了？讲一件事、一个工作、一段时间的精神状态，可以要求人们积极、认真、敬业地去干、去做。但是要讲人生啊，你能让一个人一生中不喘喘气？听听音乐？放松放松？休闲休闲？《人生》这电影中周里京演的那个高加林，进县城文化馆叫"得其时"。好，乐，拼命干。被人挤兑回村，巧珍也嫁了出去……还要重回一镢头一镢头锄地的生活……惨了，"不得其时"了。怎么办？怎么积极上进？我看别天地爹娘地寻死，想开点儿，先老老实实种地，蓬累而行地过日子，机会总会有的，面包总会有的。如果不甘心，总想把黑白说清楚，三天两头去告状，每天蹲在县委大院门口不走，这叫不懂"放得下"，早晚被送到精神病院。

我们中国人的教育方式是：只许爱因斯坦一天24小时研究相对论，绝对不许爱因斯坦拉什么小提琴"玩物丧志"、"浪费青春"，我们会教育姓爱的小子：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拉琴？这不是会不会工作的问题，这是对待革命工作的态度问题。其实爱因斯坦忽一日在看蚂蚁打架，怕什么？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叫一张一弛的弛，千万别认定爱因斯坦堕落了，退步了……千万别把人生的一切都献给"执著"与"向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要仔细分析的，人不能跟豪言壮语过一辈子。

其实这还是从生理上讲，如果从心理上讲，只知向上而不知松弛则更加危险。我们在歌颂英雄、劳模、先进知识分子时，统统只讲他们如何如何地废寝忘食……如何如何地没有"人性"加班加点而不休息……如何如何地老娘死了也不管不顾不回家。大肆宣传这种非人性非人本的做法，在战争年代、某个任务前、某一时段内是可行的，但它于正常的生活中、于

广大的人民群众中是不可行的。我们的宣传总是不想让人信，我们一边大讲破除迷信，一边却在制造新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习炼得又能辟谷又能不倒单的、从石头缝中蹦出来的神。

可是实际情况呢？我们出了几个爱因斯坦？我看出了不少废寝忘食的陈伯达和康生。

我们太愿意歌颂某一个极端，以牺牲人性来证明着什么，这种作风何时了？

我们中国人太喜欢赶潮流、争上游、凑热闹。太喜欢吹个什么第一、炒个什么热点、弄个什么形象、搞个什么工程。我们的心态是：升官发财就大吉大利；贬官折本就晦气得到了家。我们老故弄玄虚地讲什么"平常百姓"啊，"平常心"啊……反正是一成了名人，满嘴的"平常心"，两月没人采访他就变成"我是知名人物"、"为什么没人理我"了。

当廉价与时髦产生了耀眼的光环后，这个光环必定很短暂。虽然你可以只在乎曾经拥有，但这种拥有却是极庸俗、极无趣又极无聊。因为这不是用平常心酿造美酒，而是不得不用平常的心勾兑的假酒。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话我并不反对，"让一步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这话我也赞成。世上本来就存在着舍与得、阴与阳、前进与后退、积极与消极……谁能只追求一边而拒绝另一边？

又扯远了，书归正传。我在《走上原本真实之路》中详细地介绍了道家，所以在此就简而又简再提一笔，不做详细的分析介绍。

老子的"道"，含有"事物（包括人性）的本质"和"事物的发展"两个内涵。"事物的本质"即事物的存在与运动是不可分的，"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即指事物的能量和运动是奇妙的，看不见但感觉得到的；"常有，欲以观其徼"，即指事物的存在是看得见的，它浩瀚而无限。"事物的发展"，就是我们前文所讲的"事物发展五特性"，即：阴阳性、通流性、全方位性、无止尽性和层次性。

阳阳性：《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认为事物发展是因为它含有阴阳两个成分。阴为理性，为负，负是背后的意思，这是人性中约束发展的东西；阳为情感，为正，"抱阳"的意思是人的情感好像人的胸怀，是抱小孩的前胸而不是背小孩的后背。所以"抱阳"是情感、是人性发展中的动力。



"负阴而抱阳"是强调万物组成的阴阳性，同时也是事物发展时本身所具有的动力性与约束性。

通流性：《道德经》第五章："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大道存在于天地之间，它像风箱一样，一拉、一推，风都会汩汩流出。所以一阴一阳、拿得起放得下、前进和后退、战争与和平、得势与失势……实际上都是大道在发展，在流动。

无止尽性：《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道是一阴一阳、一左一右、彳亍于亍地轮流变化而行，且永无止尽。所以道也叫"周行不殆"，永远没个头。

层次性：《道德经》第四十一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大道是阴阳、进退、舍得所组成的，凡一听此理则顺其自然、勤恳不懈地去工作、去生活，这叫具平常心而不怨得怨失的上士；半信半疑的为中士；大笑这是保守、消极、避世的是不具平常心的下士。事物发展有层次性，人也有"成熟"、"不成熟"、"拿没文化当个性"这三个层次。

总之，老子在春秋争霸的时代里，只强调事物发展的静、虚、善、和平、安定这一面，当然这是一厢情愿和不合时宜的。但他的初衷是反对战乱、向往和平。出于这个目的，孔子是以周礼和仁爱来制止战争；老子大声疾呼别忘大道还有止、阴、静的一面，希望人们停止战争。可是大道既然是两面的，它必然有与静、虚、善、和平、安定这一面相对立、相反动的实、恶、战争、混乱的那一面。从个人情感来讲，老子饱受战乱而下岗，他实在不愿强调那一面。他说："多言数穷，不如守冲。"他宁肯自己一个人去打坐，也不愿讲那一面的道理。这是他私人情感所致，但不能说他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前文讲过，人类发展具有："进化——突变——进化……"这样一个模式。当改革与革命即将发生时，像屈原这些"上士"们大声疾呼："操吴戈兮披犀甲……魂魄毅兮为鬼雄"，决心战死疆场也要打出个输赢来；纪晓岚骂道："朝无才相，泽无才盗，巷无才偷"，连个偷儿、毛贼全没了灵气，实是恨铁不成钢；龚自珍叹曰："万马齐喑究可哀"，已有些失望；高尔基呼喊着："让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吧"那是算准了希望就在前边……而在突变

后，人们又“不择手段”、“想方设法”地要回归和平与安定。孔子捡起“克己复礼”；老子祭起“无为而治”、“虚极静笃”；杜甫老先生“白头搔更短”；韦应物高歌“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

哪一位大师能说话中规中矩，那这一位大师定然是没人情味的人，或是道学家。“饿了吃饭，困了眠；痛了喊娘，穷了哭天”这有什么错？这是最高的禅的境界啊。但这世上总有程朱理学教出来的毫无错误的人，他们永远正确、绝对正确。他们会说：屈原老先生，您的爱国热情可以理解，但公开宣传暴力，就不妥了，一是影响青少年成长、二是破坏国际秩序、三是宣传死后有鬼，这不是迷信么？还有，第四是不跟政府合作……当然纪晓岚先生希望中国快出艺术大师，快出人才，出发点不错。但是不是太急了点呢？古人云百年植树，千年树人嘛，事情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龚自珍就太悲观了，高尔基是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国情，不懂得中国特色……

于是乎也有人骂老子是“贵族统治者的帮凶”，庄子是“流氓、巫师加没有居住证的盲流”。“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小心，千万别让道学家听见，否则他又来了：“……这个分房嘛，不可能人人都有。大家要发扬风格、相互体谅，不要搞小动作、不要背后发牢骚……更不要用死来吓唬人，啊？！”天啊，我什么都有没说，不成么？

人生是艺术，艺术即人生。有情有理才叫生活，修行人千万别执一端。如果有人看完此书大呼上当，非要找我理论理论，那就请他先回答一个问题：夜半，孩儿不睡，亲娘曰：“宝宝，睡吧！要不睡警察就来了！”请问当娘的这么“吓唬”下一代对不对？教孩子说谎对不对？污蔑人民警察对不对？这么个活法儿合不合天理？

依着老子呼吁“虚极静笃”的路子，道家的后人全都失却了李耳的情绪和希望，只捡起虚与静，做出天大的文章。当情与理艺术地融合而一的《道德经》成了纯阴（纯理性）的教材后，教出一大批学问家、批评家、道学家；当《道德经》成了纯阳（纯情感）的教材呢？那就修出一大批进安定医院的病人和妄想成吕纯阳的“大师”、“巫婆”、“神汉”。

道家之路可谓玄之又玄。

道家的发展，约略分为两支：退隐和方术。



1. 退隐,“老庄哲学”之路。“老庄哲学”在战国时期、汉初至文景之治时期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极有影响。它造成归去来兮的退隐、无为而治任情率性的行为和玄谈的时尚,当然,还造就了一大批不与权贵合作的汉子。在佛教流布于中国后,老庄哲学和大乘佛法发生碰撞,从而形成新的产物——禅宗,可以说禅宗是道家和老庄这一支的终点。

“老庄哲学”以《道德经》和《庄子》为经典,充满对和平、安定的希望,他们情绪化地大胆引用神话来寄托精神上的希望。这种美好,实在是感动了李白,李白的诗中就索性以神话来描写未来。我看不能说这是虚无主义,作为艺术,是允许这么希望的。

在日常生话中,老庄哲学这一支对物质条件要求不高,似乎粗茶淡饭全无所谓,只要饱了就成。他们崇尚自然,对现实的低标准要求和追求自然无为的心态,使得他们在精神上对未来有个美好的高标准。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结晶。庄子说:“鸭子的腿短,你给它接长了,它幸福么?仙鹤的脖子长,你给它截短,它自在么?所以顺其自然,随其所缘才是最幸福的啊。”显然,于物质生活中满足现状,培养高层次的精神境界,是这一支的特点,也是禅宗的特点。

非要说这一支太避世,那就随缘吧。你让庄子、陶渊明、谢灵运干什么去?当兵去?当官去?我看逃回家,写出点儿留传万世的东西,也算是挺不错的事儿。

2. 方术,“黄老崇拜”之路。要想退隐,那是雅皮士的勾当。没文化没知名度本来就隐着退着,进一趟县城再回来,不叫回去来兮,叫“刘姥姥进大观园,开了一回眼”。而“黄老崇拜”就是嬉皮士的行藏了,它上承巫术占卜、下启神仙方术;创炼丹吸气之修行大法,开算卦相面之糊口行业。风水、八卦、祝由科、摸骨、测字、奇门遁甲……纸糊的神像、铁做的嘴,没本的买卖、四处跑的腿。没文化,没关系,能侃就行;没资本,没关系,能装就成;没门路,没关系,能骗就成;没传承,没关系,编个就成……如此的嬉皮,竟然流传久远,真是气死了正宗的道教。

这一支的特点:①无见地,即没有理论,有也是东佛西道乱拆兑出来拼成的;②修行的方法不对,只是三脚猫似的伸伸腿、喘喘气,全无理论指导和层次的要领;③目的不对,佛道的修行,只是修出个常人,圣人即常人。而此类的修行,却是要修出个半仙,要修出个超常的能人,说白了即

"非常人",亦或叫"不是人"。

汉末,道教正式成立。张道陵的天师道,遂成了正一派。

时至辽金,王重阳创全真教。此派以出世清修为主,倡"全神练气、出家修真",不以什么外在的金丹为本了。此时,黄老这一支终于由外道的方术走入修心的正道,归于宗教了。

黄老,黄即《黄帝内经》,老即老子的《道德经》。

凡以此两部经典为旨,修心练身的,为正道。凡自创什么功、什么法,自寻个千年前的经典,例如昨天刚出土,今儿让他得到了的经典,依此来练的,"玄之又玄,众祸之门"。

以上是道家一派于两千年的梗概。

当然一切仍在发展,尤其是"老庄哲学"与"禅"。当这一支在文学、美学、艺术领域中驰骋时,那是美的享受,是人生经验中最高级、最终极的体验。

而儒家与道家二者的结合形成中国文人进而儒、退而道的做人模式,当"海棠富贵"图挂在堂屋里时,可以想象他书房里挂的多半是"寒江独钓"。这就是中国人。

四、法家、墨家与兵家

(一)法家

法家的代表人物是李悝。说是代表人物,只是因为他于时代上比其他人略早罢了。法家不似儒家与道家有那么一个被公认的领袖或祖师,因此也没成为教。法家与道家、墨家不同,因它主张性恶论,所以与儒家针锋相对。

从形式上看,法家重以法治国,他们明明白白地建起前人所没有的"盗法、贼法、囚法、捕法、平籴法"等法律,以形成新的、适合封建社会发展的网络系统。他们是改革时期的人才,是政治大家。他们并不一味地反对战争,但他们绝不复古,这也与儒家针锋相对。

在其内容上,法家重"霸道"。这是改革时期富国之道,它从人性的角度上赤裸裸地利用人的"欲"这个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实用和功利地不



近人情地刺激它，让它推动国家走向富强。如：斩敌首级可进爵，开垦荒地可由奴隶升为平民。这明明白白告诉大家守法而立功就有自己的利益。而儒家重“王道”，这是建设时期富国之道。它控制人的“欲”，使之转向仁、爱、礼、义，使之涵养浩然之气、顺天理。这对生产力发展全然无用，但对稳定社会却功不可没。

从人性的情感角度看，法家以法为律，不近人情而显得冷。人与人、人与社会一切关系全依法联系着，没了人情味，有点不似人间。在一家一户的农业经济中，这种方法太像军垦的兵团，它适应突变时代、战争时代，太不适合和平建设时代。因为那时的农业毕竟是个体小生产者而不是军垦的大生产。只有社会发展到商品经济，在市场的驱动下，以自由贸易、公平竞争为规则时，法律才显出必然性。个体农民只要不造反、不犯法、种地交税，够了，别的地方不需要什么法律，只需好好种地。

秦汉的统一，法家在和平建设时期渐渐不敌儒家，这实在因为法家太冷儒家较暖而更有人情味的缘故。法家重视人欲，似乎显得暖，但它是利用欲去无休止地创造财富，驱使欲遵纪守法，功利和实用地剥去了情，只剩个欲。这就“外暖而内冷”了，这在漫长的建设时期是让人讨厌的事情。儒家不重视人欲，只讲礼、义、气，似乎冷。但在实际的生活中，你要以不同态度对待他人、家庭、官吏、君王……一切显出一种秩序下的温情，欲少但有情……于是外冷却内暖了。当然我是说理学前的儒家。

从法家一脉看，有管仲、慎到、吴起、商鞅、申不害、韩非子、李斯。

秦的灭亡使法家在中国一蹶不振，彻底败北。虽然有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有明朝的张居正改革，但都敌不过守旧的儒。让老百姓的“欲望”伸张出来，虽然是冷冷地、悄悄地，那也是君王官僚们不乐意看到的事。所以，法家的改革必然被“国家利益”这“光明正大”的招牌硬硬地砸死。因为国家是帝王官僚的国家，所以国家利益就是帝王官僚的利益。

当然，历代统治者都是阳儒阴法的，他们都表面上赞颂着儒家，底下使用的仍是法家，这是后话。

而今，邓小平领导我们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这本是中国人的富气。真怕再有什么人祭起“国家利益”这金字招牌，把老百姓的“欲”全横扫下去、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大脚。当然，脚上的鞋不能是耐克，而应是草鞋，这才正统。

（二）墨家

讲得家多了，就显得有点儿乱。先小结一下：

法家，以理性去鼓动、刺激、怂恿人的情感欲望以达改革；

儒家，以情感去引导、控制人的理性去服从一个古时的规范，以达灭欲与稳定；

道家，讲了四句话：事分阴阳、辩证共存、悟此为道、有道德生——道德之经也。

墨家呢？一句话：组织起来，用“尚贤”和“兼爱”为旗帜，力争摆脱另册的地位，为加入社会主流的正册而努力奋斗。

墨翟（公元前468—公元前376），也就是墨家的老大——墨子。

墨子、鲁国人，山东“稷下馆”即“人才大学”的毕业生。这个学生不一般，是个非儒、非法、非道、非农的奇才。他既是“人才大学”的毕业生，本身也是个小手工业者。在农业经济的社会里，小手工业显然是非主流的一群。他们游离出锤子、剪子、布以外，是皇上、官吏、农民都没当成一回事儿的人们。

鉴于这种不让人正视的社会位置，鉴于让儒家斥之为“小人哉”的嘲讽，墨子挺身而出，为这群身怀技艺的小兄弟们正名。墨子首先提出“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在为农民争利益的同时，也让裁缝们地位提高了。显然“寒者得衣”与“饥者得食”并肩提出，其味也苦、其意也深。墨子发了狠，说：

“……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

也就是说人与兽的区别在于依赖自己的劳动而生存者，为人。否则“不生”。只差光说仁礼不干活的儒家是畜牲，总算不愿太翻脸。社会对待这一群人是不公平的，尤其儒家对造个什么云梯、发明个什么器械、弄了个什么大厦、做出什么服装……统统不古得很，所以反对得紧。而道家也趁火打劫，管这些科技发明叫“机心”。例如鲁班，本是当时一流的木匠，世界一流的大师；造兵马佣的工匠，一流的陶艺大家；铸青铜剑的人，世界少有的冶金专家……这些人都被贬为操屠龙之术、哗众取宠的人。迫于守势，弱小者必联合，于是墨子组织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组织——“手工业者联合会”。这就是我们常说



的"墨党"。墨党第一次有自己的组织,老大是墨子,头目叫"巨子",成员叫"墨者",法规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刑"。除了老大、墨党、巨子、墨者、"墨规"外,还有"墨馆"、"墨语"、"墨友"。手工业者因其工种,在社会上必然会有极大的流动性。每到一处,则先找"墨馆"、讲"墨话"、认"墨友",于是互不相识的"墨者"当下成了生死之交。墨友们相互帮助、共存共荣,处处有地方住、处处有饭吃、处处有朋友……如此活法,不亦悦乎。比如,有个山东齐国烧砖的匠人,因为山东的长城修完了,要到陕西秦国去,在动身时就有墨友告诉他秦国某人是哥们,可以去找他。再让这个齐国墨友给秦国墨友捎些土特产去,齐了,工作有门了。你想哪,长城是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经过了多少国家?要修多长时间啊。所以山南海北烧砖的人全成了哥们……这就使墨党的人重义气、重许诺、重行规、重尊卑(即师傅、师兄弟、徒弟等的座次与关系)。

到了中唐,禅宗大兴。禅僧多为无寺的行脚僧,在江湖间走动。当百丈建立丛林清规后,墨子这"党派"般的组织形式又移植到宗教的禅宗上来。方丈、知客、僧人、袈裟、饭钵……一切仿佛是老大、巨子、墨者、墨馆、墨语的翻版。

在宋、元、明、清,因经济的发展,人们于社会上流动频繁,于是有了帮会、道门、会馆。"墨"字去了"土"堆儿,丢掉"土气","洋"得成了"黑"字,有了黑道、黑店、黑话、黑衣人(贼也)、黑道道友……显然墨子是禅宗的僧团组织、黑白两道的帮会组织的头儿,是他们的祖师。

为什么这么肯定地说墨子是僧团和帮会的祖师呢?因为他不同于孔子。

孔子是宗法制的祖师,他把同姓、同源、同血缘的人按大小辈分组成团体;而墨子用仪式、仪轨组成不同姓、不同血缘的人的组织。不论你姓赵钱孙李还是王二麻子,也不论你男女老幼、祖籍爪哇、任何工种,只要服我们老大,遵守门规,行了,燃香磕头拜把子,"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一伙原本没任何瓜葛的人,永结金兰之好,遂成莫逆之交,同是"墨党"的人了。

"党"字,繁体字为"黨",里面原本就含有"黑"字,这就是告诉你创建"党"的祖师爷是墨子。而且这"黑"字还是"党"字的基础,是根。你说这

不是墨子的功劳么?

又跑了题。为争取墨党的地位,墨子在政治上的口号是“尚贤”与“兼爱”。墨子认为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能当官,这叫“尚贤”。儒道二家再有德行,却没才干,既不会烹饪、也不会裁剪、更不会造鹿台、筑长城,所以不应当官。可见墨子这德才兼备的武器,实在是对着儒家来的,搂草打兔子捎带上道家了。“兼爱”,则是“兼相爱,交相利”。锤子、剪子、布要相互以仁相待,但这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谁都要用我们墨党制造的东西,都要和我们“交换东西”——拿钱买衣、造房,这叫“交相利”。相交,则要平等,所以“兼相爱”,这显然是商业经济所特有的公平、平等、自由的最原始的萌芽。用物质交换的平等性获取政治地位上的平等,是墨子的目的和希望。

古往今来,凡倡“尚贤兼爱者”,大多有不被社会赏识,反被社会歧视的隐痛。

有的专家认为墨子是博爱、平等、大同的首创者,甚至是反世袭的先驱。专家们的话肯定有他的道理,只是太现代了,太理性了。只有品尝到墨子的酸楚,才能真正明白他提倡这口号是什么味啊,不要老讲道理,要知道这里边的味道。生活不是一种趣味么?

除了“尚贤”、“兼爱”外,墨子第三个口号叫“非攻”。即战争是不好的,和平是人人所希求的。但只要是反侵略的战争,那一定打到底。不进攻别人,并不意味着不打仗,打仗对墨党来说并不是灭顶之灾,反而是好事一桩。各种刀枪、车仗、云梯、军服、器械……甚至棺材全离不开墨党的双手和技艺。再说了,军火买卖从古至今全是大于贩毒的头号交易。以希望和平为前提,但不反对战争,是“非攻”的本质。所以墨子只提非攻,不提非战。

总而言之,在以农业经济为主体,以儒家思想为独尊的社会里,墨家的地位永远不可能入正册,甚至入不了副册,只能是另册中的一家。墨家为争取地位的提高,相应地重视劳动技能、重视平等,提出不尚空谈、尚贤、兼爱、互利、非攻等口号,同时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墨党的墨者们杀敌勇敢、不惧生死,深受各界人士称赞。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他们结成墨党,重义气、重许诺、勇于帮助他人,他们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鼓励自己……

从另一面看墨家,那些显得有点儿过分的自尊和难以规范的义气,都造成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总之,社会上一切未入主流的派别、团体和



力量，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走着墨子的道路，至今。

(三)兵家

我对兵家的了解不多，只知道孙武著《孙子兵法》、其子孙膑著《孙膑兵法》。而兵家还有司马错著的《司马兵法》。

《孙子兵法》是讲实战的著作，至今流布于世界各国。美国的军界和商界都很重视这部书的思想，因为两种力量相对抗，必定会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能指导人们战胜对手，这就是兵家所讲究的对象。

有的人认为老子也算是兵家，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要从政治、战争、商业竞争都是两种力量相生、相冲、相克、相融这个角度上看，可以认为老子也算大半个兵家。在政治上，有的人养敌兵以自重；有的人依对手的存在而显示自己的价值；有的人非要把对手消灭干净；有的人只让对手臣服……在这里战争和政治显得分不清。

兵家是一切以现实的胜负为目的，理性、功利而冷静，政治是一切以现实的政权为目的，亦理性、功利而冷静。孙子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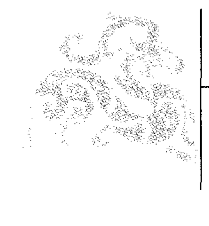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

《孙子兵法》一开篇，孙子就警告君王与将帅千万要理智和冷静。当代科学一般分为三类：基础理论、应用科学、实用科学。孙子在讲兵法这门科学时，涉及了这三大类，可以说是含有了“兵法基础理论”、“应用兵法”、“实用兵法”。在“兵法基础理论”中，孙子强调战场、双方、两国的实际情况和作战经验是十分重要的，战争的性质更是决定胜负的因素。在“应用兵法”和“实用兵法”中，孙子则强调表象与本质的区别、战争性质的区别。这是对单纯从战争论战争中超越和升华出来的一种艺术，孙子说：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总之：从高层次高境界俯瞰战争，艺术地处理两个相对立的关系是《孙子兵法》最精彩之处，是孙子对战争艺术做出的最杰出的贡献。

第二章就讲这么多吧。讲流派，十分乏味，真感谢各位能咬着牙看下来。



第三章

灿烂的文化与情感的悲凉

从春秋、战国到东汉，中国的文学艺术真是灿烂辉煌。从时间顺序上看，有孔子整理的《诗经》、屈原和宋玉的楚辞、庄子的散文、司马迁的《史记》、汉乐府与汉赋。当然还有儒家经典、诸子经典、政论文、文学批评等等，这些我们只有遗憾地略去，因为本书实在负担不了文化的厚重，只能蜻蜓点水讲点我略懂的东西。

这个时期中国人的情感与审美情趣，似乎总显得有些悲凉的味道。《诗经》有"勿食我黍"的无奈，楚辞的悲壮自不待言。好容易有个可以御气而飞的庄子，但逍逍遥遥地游，却总伴随着天马行空之凉和独往独来之寒。司马迁的《史记》本是纯理性的纪实，鲁迅先生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它也是饱含感情倾向的。当你读到《魏公子列传》、《李将军列传》和血淋淋的正史时，其情其感被理性的文字深深地压抑于字里行间。那种"不带主观臆断"的史实，真为让人震撼和不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天啊，谁说这里没有主观的情感？虽不言，其情其性早已悄然地汇成蹊，汇成了人们走出来的路。至于汉乐府则是民间山野小调，农夫民妇的低吟小唱了，但这恰恰是最乐观的东西。这种乐观在众多文学巨作中，其本身是一种凄凉缝隙间的欢笑。"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讽刺揶揄时的痛快淋漓，也只是小家碧玉式的一时快乐。至于汉赋，则是大家手笔的产物了。铺张扬厉的颂歌、粉饰太平的用心，总让人心里不踏实。就好像听到"保修三年"、"售后服务一辈子"那么高兴而又不踏实。善于"劝百讽一"的司马相如实在比采桑女胆小而无光。晦涩无奈的文人





啊，胸襟再大、眼界再广，那笔触也透着一丝悲的凉气与壮的夸张。

一、《诗经》与古风

《诗经》是孔子整理出来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共收入了我国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 305 篇。孔子看来被这三百多首诗迷住了，所以连带的认为周之礼、周之情也必定不错，从这种情感出发，创立了礼与仁的儒家。这是我玩笑之言，诸位别太认真。

《诗经》可以说是中国人思想与情感之源。由此源头产生和引发了诸子百家、唐诗、宋词、禅宗……这个脉络我们放到后面讲，这里先给诸位通个消息。

《诗经》包括风、雅、颂三部分，其中以"风"最能反映人民的真实思想和真实情感；"雅"太显虚假与呆滞沉重；"颂"就太庙堂气与宗教气了。

〔关雎〕 周南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此篇是《诗经》第一篇。

只要是中国人全知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虽然而今成了靓姐傍大款，成了"大腹君子，幺妹好逑"，但祖宗们男的追女的，天经地义。

比、兴乃为诗之必备、艺术的必然，它使人们感受到一种形象和境界。"杨柳岸，晓风残月"怕是跟人家有河、有洲、有鸟、有一米脂婆姨在捞什么水里的菜，有一绥德汉子在岸边草丛中偷看那儿学来的。情景交融，冲击着理性，直到"辗转反侧"地睡不着，人性由此绽放出光彩。

〔氓〕 卫风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

乃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小伙子假装买丝，勾搭上人家良家妇女。这姑娘也真爱上他，让他找个媒人来，秋天结婚。看来孔子推崇的周朝女子，原也是开放得紧。私下里相上一位大老爷们，然后找个媒人打个马虎眼，成了。但老了老

了，女人成了黄脸婆，这小子竟又另觅新欢，把结发老伴扔在家，一个人去OK厅、去按摩、去找三陪小姐。想当年“信誓旦旦”的场景依然在眼前，“呜呼！我并不是恨什么你背叛了誓言啊，我只感叹我一生中的爱情，永远地离开了我的身边。”

谁看了这诗，也要骂那个假装买丝的人实在是个混蛋。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是一种关系，是个情字。一旦情没了，也就没什么可留恋和珍惜的了。但愿他们有个孩子，为了孩子，忍了吧。

〔硕鼠〕 魏风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插队时，队里有一位50年代从城里被赶回村里的右派，挺有学问的人。一日叹曰：“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赶巧让生产队书记听个正着。这个书记年轻有为，高中毕业当了几年公社的秘书，然后下来当生产队长，估计干上三年必然调回公社。三年的抓革命促生产，人均收入从每人每天（十分工的劳力）0.08元连抓带促地到了0.02元。更巧的是这高中学历的书记，其靠山犯男女关系的错误，被调走。看来我们队这书记不只干这三年，怕是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两分钱一天的日子仍要“抓而促之”地过。这书记听了右派的吟唱，总觉得这“三岁贯女”是在影射他，于是记恨在心，足足地“肯顾”修理了这右派三年。后，此右派再叹曰：“六岁贯女，适彼乐土”。好在该书记终于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锤炼，直接调到外县当副县长去了，所以本该加罚的六年修理至今未能兑现。

《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风格，对中国人影响很大。这不但体现在文学艺术上，主要是奠定了中国人直接倾诉思想与情感的艺术模式和审美格调。李白的夸张、杜甫的苦吟、白居易的诉说、苏轼的禅趣，都源自于《诗经》之魂。夸张得直、苦吟亦直、诉说也直、禅趣也直，连“言简意赅，文以载道”的文，也直。直得朴、直得真、直得委婉、直得美。今人大多失却古人风范，签个房地契或什么合同，要一字一字地去扣、去品，或干脆找个律师帮着看看，否则一不小心就上当受骗。简而直的东西也有，例如：“LM洗发水，一流。”不能说不简不直，但就是不能信，谁知这是一流脱发水？还是一流枯发水？人家只让你去洗，一洗，则后果自知，“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到时头发脱光了，就再也不上当了。



《诗经》一节，就讲这么多吧，老跑题儿，打住！

二、屈原与楚辞

屈原（公元前340—公元前278），湖北秭归县屈坪人。他的《离骚》、《九歌》、《天问》、《国殇》等二十多篇著作，饱含了他的理想和情感。

在《国殇》中他写道：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他没有去分析战争是否必要，什么是善与恶、什么是正义与非正义。他那情绪喷薄而出，非理性地挟带着古巫术、神话而宣泻出来，那么固执而美好，那么绚丽而醉人。

《离骚》中他写道：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在《招魂》中：

"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唯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烁石些。"

——屈原在这里有对时空的描写和感叹，有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和否定。当他对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前途尤其是社会对人性的压制感到彻底失望后，他带着一身洁白而去了，给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一片耀眼的斑斓。

人，只要有理想，哪怕这个理想很简单且粗糙，那它就不是现实，否则就不叫理想了。理想总是人性的向往，而现实总是显得功利且龌龊。当这理想与社会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相一致时，谁也没权利去批评它，人们只有仰视和赞叹。

中国的方块字实在是来源于巫术的卜辞，它塑造了中国人情感的雏形。当梁山泊与祝英台化蝶飞去时、当苏轼问广寒宫是否太冷时、当李清照"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时、当毛泽东"吴刚捧出桂花酒"时……这巫与鬼神简直把中国人的情感带到了不可言说的心灵之巅。这是人们在人生中极难遇到的一种终极体验，它美好得那么多彩那么极致，乃至到了不可思议、言语道断的境界。这里不容什么人去分析、去做学问。谁要是有

这种体验，谁都会承认人生是无限的、情爱是永恒的、生活是美好的。

屈原作为诸子百家中的"学"，有人认为是"小说家"，是最具情感的一家。他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手笔，开创了中国诗歌的各种流派的先河。甚至可以说《诗经》和《楚辞》简直是为中国诗歌的言情抒怀打下了奠基石。

五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诗歌和希伯莱（亦称以色列）诗歌是这种抒情风格，而印度、埃及、希腊（罗马）则是长篇的叙事诗的风格了。在前边我们提到中国人是刻在竹上写诗，不似炭条在贝叶或羊皮上来得简单和快捷，这当然可以说是一个方面。但最主要的内因怕是《诗经》和屈原楚辞的影响了，它们使得我们的叙事诗不那么为后人认可。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诗》等等，而《荷马史诗》与《吠陀》也绝不会产生在中国。

随着端午节的赛龙舟和吃粽子，中国人继承发扬了屈老夫子的固执、理想和感情。神话与历史、现实与人、神与兽共舞的画面，伴随着铿锵的节奏、深沉的鼓声、仰天长啸，展示了气韵生动、琳琅缤纷的中国人的情感和浓烈不屈的中国人的魂。

三、庄子与清轻之游

庄子（公元前369—公元前286），名周，宋国人。他的著作现存《庄子》33篇。

如果说屈老夫子使中国人产生了向外在世界的追求和向往，那庄子则是使中国人知道向内心的追求和修炼。这两种追求不应武断地讲谁好谁坏，这种幼儿班式的分类和评判我们听厌了。我们也劝解大家不要这么简单地分类和评判。

中国人向来有自己的两件法宝，独善其身的老庄哲学与兼济天下的孔孟儒学。"君子得其时则驾"时，就读"学而优则仕"的书、画"富贵海棠"的画儿、花前月下地饮酒、先天下之忧而忧地去忧上一忧；倘若"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时，就"松下问童子"的书多读、"独钓寒江雪"的画多画、对影成三人地饮酒、后天下之乐而乐地去乐上一乐。真可谓进退有方、伸屈有度、胳膊上立得马、肚子里撑得船。当然，这是全套"拿得起放得下"的拳路，非太极大宗师难以学会的。有专家说，若不是中国人有老庄哲学



在释缓着人们的心理和情绪，那中国五千年的文明肯定也如其他古老文明一样会断流。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如果总是只有紧张没有松弛、总是跟破狗皮一样绷着，不断不破才怪呢。我看这位专家说得好，但我也肯定这位专家不得烟抽。

庄子首先反对“人为物役”，喜欢“恍洋自恣以适己”。从哲学意义上讲，就是要求人的本性回归，而不被劳动所异化。

他在《胠箧》中说：

“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为乱于上关；钩饵网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

——所以劳动及技术都要不得。那他的理想国是什么样子？庄子没有正面回答，他认为这个问题一般人是不懂的。

他在《逍遥游》中以蜩与学鸠笑话大鹏的故事做了一个比喻：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一句话，学鸠与蜩，岂知大鹏之志？庄子并没有太笑话和轻视蜩与学鸠，他只是认为“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如大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儿，虾有虾路蟹有蟹路，有爬的、有蹦的、有上树的、有下海的、有飞九万里的、也有飞上十几米然后“以头抢地耳”而已的。庄子总结说：“此小大之辨也。”

那庄子的大，要大到怎么个活法儿？总不能老比喻讲暗语吧？无奈，庄子终于道出了自己那“不为物役”的理想国。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而年谷熟。”

——因反对劳动，所以不劳动不得食，只能仙得吸风饮露。然后整天游四海、穿五洲，鞋儿不破、帽儿不破、身上的羽衣也不破。但这里庄子也有点儿犯嘀咕，一点儿东西不吃，老喝西北风，还要世界各地乱跑，怕是不妥，体力是否不支？粮食是否要吃？但不劳动怎么来吃呢？看来只有发仙功“其神凝”之法，于是万物都不生毛病，五谷丰登了。这法子如何？反正现而今仍有发功的大师、出气的半仙那儿“其神凝”，口中再念念有词，于是乎这个“××功班”，“××法门”的徒子徒孙的钱已入大师腰包，使诸门大师没收入没工作却丰登了。看来庄子绝不是这蒙吃蒙喝蒙爱情的

主，他没那么多领导欲和名利欲。

那庄子讲了半天，其实质性的东西是什么？庄子在《胠箧》中愤然道：

“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这简直是无情的讽刺与揭露了，丝毫也没了仙气，这才是作为人的庄子。所以说庄子的思想境界是对当时社会的否定，而对未来理想国是什么样，他也没谱，只好与老子一般瞎猜了。老子弄出了鸡犬相闻的小国，让后人抓住把柄，笑了两千年，谁也没体会老子对现实社会极端的否定和情绪化的憎恨。庄子没接受教训，弄出个喝西北风再神凝的仙人，让后人抓住把柄，学了两千年，只知装神弄鬼，谁也没体会庄子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人性解放的向往啊。

所以庄子反对“人为物役”并不是目的，其目的是对人性的歌颂，是让人的思想境界和审美情趣超脱物之后，神凝于自然的风与云啊。不要对庄子要求太高，那个时代是人类刚能脱离繁重的体力劳动而初步涉及精神领域的时代。庄子敏感地意识到一个网络、一个理论和为物质丰富而劳动，这三者都会压抑人的本性，这已是可以得诺贝尔奖一般的天才了，不能指望他能说出人类两千年后什么样、千年虫怎么治。再说了，咱们当代的人谁又是能说准两千年后什么样？两百年后呢？连 50 年前谁都没料到有“千年虫”，何必嘲笑庄子乎？这世上没有算命先生，没有先知先觉，没有救世主！

“人性本位论”，这是庄子的精神核心，也有人叫“人格本体论”。他和老子不太一样，老子是阴阳辩证的本体论，称为道，以解释宇宙、万物和人。而庄子的道则以人为本，注重精神上的自由与解脱。

以上是庄子的思想内核。因为庄子是以反观为手段，所以可称是禅宗源头了，这话儿放到禅密时再讲。反观，则不外乎一观心、二观身。观心成仙，上面已讲过；观身可长寿，这可是两千年来后人所津津乐道的。庄子在《养生主》中讲“心斋”、“坐忘”，“至人之呼吸以踵”、“缘督以为经”……明确地指出静坐的方式和感觉，要返观至忘、至龟吸、至督脉通。当任督二脉通了，则修得离仙人不远了。如此这般使返观一法有了生理、心理和理论上的步骤及依据，使人们在追求个性解放的同时具有了个体的价值。这与儒、墨、法家从网络从关系和利益中确定个体的价值是不同的路数。那些路有仁义法气的繁杂、有帮会团体的热闹、有国家利益的招





牌;这里没这些东西……那有什么?

屈老夫子是爱国单干户,他有热血与激情;而庄子是爱己单干户,他这里只有轻而清地仙游。

屈原的坚毅与固执是种火山喷发的美,不惧死的美;庄子的坚强与豁达是轻风冷月般孤独之美,是爱惜人生之美。

四、司马迁与《史记》

热爱黄土地的中国人比西方人确实实用得多,农业生产使那些不着边际的幻想无法生根。我是说和西方相比而言,中国人没有上帝与门徒们那么多故事、没有佛祖与罗汉们那么多言教、没有宙斯、爱神、海神……那么乱的关系。中国人的神仙只是人类帝王制升到大气圈外罢了。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依儒家坐次而坐,依仁义礼智信而行。织女要嫁牛郎必须经老妈认可,七仙女下凡也算私奔,一切如人类般的没有生气。而佛祖来自西方,所以在有佛教后,就在天宫出西天门若干光年那儿给安排了一处度假村,叫灵山,把佛门的人全安置进去,衣食自理,好自为之……爱干什么干什么,没人管没人问。只有玉皇大帝办不了的事,如整治不了孙悟空,那才派熟人去把佛祖请来,反正是专款专用、专事专办、完事走人。

这是仙界了,那人界呢?

实在是仁义的网络太密太紧,除了老子的小国寡民外,庄子的成仙外,再也没什么好的创意和设想。虽然有桃花源,也只是农业国;虽然有小倩小翠的狐媚,却也是书生们为中举而旁生的插曲,一切全是不实的。实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重知识是后人的粉饰,学傻了才是皇上高兴的事儿。

往后看实在是让中国人气短了,但往前看却是中国人所长。这第一位就是司马迁,而往前看的巨著就是人类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司马迁(公元前 145—公元前 87)字子长,夏阳人(今陕西韩城)。在公元前 104 年至公元前 93 年,共 11 年写出 52 万字的《史记》。

《史记》对后人的影响是巨大而又潜移默化的。

从文学上讲,其故事化的手法和紧张场面的描写与运用,使人物传记饶有波澜,使人物形象历历在目。这为中国的传奇文学、通俗小说、散文

等的发展，都起了典范的作用。同时口语化的描写、人物对话的精湛、民谣俗语的运用，使后人在写作方法和文章风格上都受益匪浅。

从史学上看，班固以下的史学家无不对司马迁推崇备至，力图做到司马迁那样“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这种用人物传记表达历史上的人事变化和社会变迁，辅以若干表格和专题报道写历史的方法，两千年来被史学界奉为圭臬，中国的“正史”一直没跳出司马迁《史记》的这种体例之规范。

但更为深刻的影响，远比文与史来得隐蔽和幽深，这是从思想上看《史记》对中国人的思想与情感所造成的影响而得出的结论。

《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而“究”与“通”后的“天人古今”之“一理”是什么？是对主网络的维护和歌颂。我当然也是一家之言，敢这么讲，早已有了被千万人口诛笔伐的心理准备。

为什么说司马迁的《史记》是对封建社会里政治、经济、人文、宗教的那一套主网络的歌颂呢？他不是很历史地、很真实地记录了暴君与明君、贪官与清官、大侠与大盗、压迫与被压迫、人民与英雄等人物么？他不是很客观而冷静地写史么？

我说不是的，《史记》的写史是有很强烈的感情倾向的。司马迁的斥暴君、反贪官、憎战乱是为了颂明君、迎清官、盼和平而去斥、去反、去憎。司马迁在熟读历史之后，对人民的苦难深表同情，站在这个立场上他希望国家稳定、人民安乐而君主开明、官僚清廉。这个理想是美好的。于是他揭露统治者的丑，歌颂人民的反抗，树立一大批忠君爱国的英雄和为官清明的官僚，如《魏公子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李将军列传》。在这里司马迁并没有触动和批判封建社会的网络系统，反而是在修补和加强这个系统，于是根底里的儒家入世和道家出世就潜伏于字里行间和行行色色的人物中了。尤其是以往正史和官诰文书所不耻记述的“侠”，在《史记》中则堂而皇之地入了《游侠列传》的正册。大侠、刺客以“义”与“气”，这孟子和墨子所称颂的品质执行了实际修补网络的任务，成了修补网络的工匠。他们具体地执行反贪除暴而维护小人物的任务，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了仁与义对于君主和官僚是必备的素质。人民的“官逼民反”源于绳子和麻袋缺仁少义，而不是人民的错，更不是网络本身的错误。他的感情倾向热烈而鲜明，但终归是在肯定了土豆、麻袋、绳子三者关系的



前提下，用侠去修补之。如果实在修之不及，乃民反也。反，是反具体的君与官，再重迎请另一位清明的君与官。

于是司马迁的《史记》给两千年来的中国人留下了很奇特的遗产：

(1)忠君爱国，一切以维护和平为主；(2)儒与道并用，使人格具有伸与缩的双重性；(3)用侠去铲平社会上的丑恶和不合理；(4)用官逼民反去修正封建网络的偏差。

正是这些遗产，使中国人具有了以下四种品质：

其一，造就了中国人外冷内热的性格。中国人一谈政治就有条有理，极冷静且一套一套地，或干脆莫谈国事；而人与人交往则彬彬有礼有度有节。但国家真有危难，则人人热血沸腾、视死如归。而他人真有危险，也是人人古道热肠伸手相助，最起码会陪着流几滴眼泪。

其二，对先人的褒奖歌颂在中国人心中十分神圣而不容置疑。人死后有个谥号，即对你生前所作所为的概括总结，也叫盖棺论定。倘若你多做好事，死后被称为“明公”、“圣主”、“德女”、“贞烈”……那简直是光耀门庭、福荫万代了，可谓祖上坟头冒青烟，且要再冒千千万万代。重名声、名节而流芳百世，这是中国人之传统，当然写入国家正史为上。如不然，写入县志或地方志也不坏。再不成有个碑、有个坊也算是名正言顺了。像武则天立无字碑，也算是个碑。外国人就不理解，人都死了，又无话可说，立什么碑？他们不知道中国人要立碑，旨在入正册，旨在让后人知晓，而碑写什么、有无字，则另当别论。这种“留于后人评说”的“生前身后”事，是中国人解不开的情结。干好事的认为早晚是“留取丹心照汗青”，干坏事的人就偷偷摸摸难以见天日，而好坏的区别在于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是否有益于网络系统的巩固。凡此种种，其根就在司马迁的《史记》这里。

其三，讲孝义。在生活中对“孝义”的宣扬也是为了网络系统的巩固。如果孝义的儒道思想和国家利益冲突如何处置？换言之忠孝不能两全时怎么办？这就要看你的道行了：如能求其全，仍入正史为后人称颂；如为孝忘义或为义忘孝，那骂名就跑不了了。有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其片头的歌词里有一句叫“哪怕千秋万代留骂名”，这句词很说明问题。要不你就遵祖制，大家一块烂下去，既正义又留美名；要不你就违祖训，豁出去干一场，但正史上必留骂名。中国人从没怀疑过这个正史是否应是这么个“正”法儿，因为从老祖宗司马迁那儿留下来的正史就是“仁义忠孝”四

全之史，两全都差了点儿意思，更何况只有一全呢？

其四，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大侠。不论是真的英雄救美还是假的英雄救美，反正一个小女子被一大老爷们救，就是大侠风范。于是乎只要有几个人对付一个人，也不论是流氓打架还是警察抓贼，大老爷们都应该帮助弱者……哪怕一块被弄进局子，那也侠得很！

改革之难、变法之难难于造反，造反尚且有“官逼”之因，为正史认可，但改与变却大逆不道了；改革之难、变法之难更难于侠，大侠的无政府主义地游、流氓式自由主义地杀，乃除暴安良，为正史认可，如从根本上去变动一个制度，哪怕只是稍加修改，亦为正史所唾弃了。鲁迅先生说中国的礼教是吃人的历史，不能不说很有道理。

不管怎么说，死后能入祖坟，能留美名，这是中国人所追求的；让后代子孙一提起自己能自豪而不脸红，这实在是中国人情之所结；能在什么地方救一个小女子，这简直是每个男人日思夜想的……这些情结深且隐、外冷内热地融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中。

当把一种理性的思想和一种情感的倾向二者辩证地埋藏于“正史”的字里行间之中时，那这影响力岂是一两句话能讲得清的？这是一种理性的美、一种含蓄的美、是情感深深禁锢于大山之下的美啊。

但这正是司马迁的高明之处，也是《史记》的伟大之处。回首往事，中国的儒道与禅的流布，中国人的思想与情感的形成，多大程度上受司马迁潜移默化的影响？谁能说得清？

咱们智慧少，还是“留与后人评说”吧。

五、生活之音的汉乐府

人的思想和情感是呈全方位性的。其具体地就体现在百家诸子的形成和《史记》中的内容繁复庞杂。儒家之仁义气节、道家之个性逍遥、法家之无私为国、墨家之帮会团体、屈老夫子悲愤孤独之歌、司马迁重名节之史……连人的情爱和婚姻，都有君子与淑女之恋、公主与小姐和番、父母与媒妁操纵下的“美好婚姻”、不守妇道私奔月宫之冷……

但人的思想和情感又是呈层次性的。当诸子百家和《史记》把那些可以提纯与升华的思想和情感抽去之后，剩下的思想与情感如何处置？当



司马迁和后代史学家把可以入正册的思想和情感拿去入了正册之后，剩下的情感与思想编入何册？换言之，不那么"仁义气节"的品德、有些世俗味儿的逍遥、有些私心的为国、亲朋好友凑不成帮会的"圈儿"、不够去死的悲歌、不够入大侠的见义勇为……以及算不得君子与淑女的恋、没嫁外国人的婚、没经媒人和老爸老妈同意的姻……这实在有太多太多的东西放到什么位置？真感谢汉朝，给咱们汉人留下了副册或另册的"乐府"，使这些东西总算有了"葬身之地"。

这种提不起来的情与理及不入史的情与理，也呈其全方位性，只是不够层次入什么"家"或"史"罢了。

汉乐府民歌有138首，现存有34首。这里仅就其具代表性的几首加以赏析与品评。

其一　东门行

出东门，不顾归。未入门，怅欲悲。盎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

——这位"东门"先生穷得可以，无衣无食这日子怎么过？办法总要有啊。

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

——东门先生拔剑要出门，干什么去？是造反？是杀富人？是自杀以成仁？是去找帮主？是弹剑而乞？还是去电影厂扮个武打替身挣点零星散碎银两？没提。但东门妻怀抱小东门赶紧止住老公的行动，并劝说他别去，咱们家认穷了。

"咄！行！君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东门先生怒了，非要走，并厉声厉色地说再不走就迟了。

这篇诗歌讲的是下层人民生活之苦，其穷途末路之感是明显的。但为什么穷？此东门先生干什么职业的？以后怎么办？此诗都没讲，只是那么原始而不假修饰地撷取了一小段生活场景给了我们，真实而动人地像纪实片，真实而动人地让人无法提炼和升华，这才是生活，是人性最真挚的部分。

其二　战城南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不论是为保家卫国之战而死，还是为扩大领土之战而死，只要是为了国家利益战城南而死在城北的，是不论怎么说也应歌颂的。但是民歌就是这么提不起来，愣是真实地“死了没人葬，让鸟儿吃了”，全无遮掩地转述给大家。更不上史书和不值歌颂的，是“郭北”先生死了还在埋怨鸟儿，说死人不会走，肉反正都是你的，你急个啥？

……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郭北”看来既没文化，又不知国家利益，更不晓得人才之重要。呜呼！早上出战，晚上就死了。这么一个大活人，草草地就完了。无字无碑，全无动静……别说当忠臣，连个可以去梦想一下的机会和可能全无，就这么一会儿，死了。

这是真实的人性、真实的情感啊。人性的情与理有无限多的层次啊，怎么可能全被百家与正史垄断、买断了去呢？当可以说、可以颂、可以记的东西越是耀眼，那些不可说、不可颂、不可记的就越是这么真实可信，这么感人泪下啊。

其三　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对狗男女真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了。不惧不合百家、不怕不上史书、不恐天打雷劈下十八层地狱、不惊染上什么病……还有什么？就是这么爱得真切、爱得这么赤裸裸、爱得这么不高尚、爱得这么不合什么什么利益。爱就是爱……完了！没什么说的了。

与这位“上邪”女士相比，千年后的马祖道一显得胆子还小，“即心即佛”地宣扬“未敢与佛绝”。而一千五百年后的马丁·路德更比不上“上邪”女士，“因信称义”的宗教改革需“信”宗教的前提才能施行。而“上邪”女士哪里管你这些呢？“爱不爱”？你要说个“爱”字，好！尽管去爱，其他一切就平安无事，就算平安有事又奈“爱”字若何？

以上选出的三首乐府，是对生活的艰难、战争为国和婚姻三方面的涉及，我只想告诉诸位中国人的情感与思想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其丰富多彩远不是百家千家正史歪史可穷尽。这种非主流的、非正统的、非网络所承认的东西，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而显出自己的轨迹，逐渐走上人类精神文



明的正史地位。这是人类进步的必然，也是文明原本就是多元化的必然。

我这小册子不是研究中国文学史和诗歌史的，那是真正的学者的事情，市上亦有不少这样的书。我只是指出正统网络和主流的局限性以及人性的无限性。这种无限性从《诗经》到《乐府》到《古诗十九首》到《唐诗》、《宋词》、《元曲》、小说、白话文……是文坛和人类精神文明的动力。它于一种艺术形式中从幼稚而走向成熟，然后消亡和僵死，再从另一种艺术形式里重复着……重复着……诗歌、小说、戏曲、连环画、电视……当我们深思这一切，可以理性地感谢"东门"先生、"郭北"先生和"上邪"女士了，因为我们在今天的电视剧中常常见到他们……是他们创造了百家和正史，是他们让我们文明到如今。从美学上看，这种美是那么真，那么令人冲动，那么让人感慨万分。

书归正史，言归正传。乐府只是汉时其音乐机关从民间搜集上来的诗歌，加以谱曲，供大人们消遣的东西，完全登不得大雅之堂。而汉赋却是实实在在的登堂之作了。

六、粉饰太平的汉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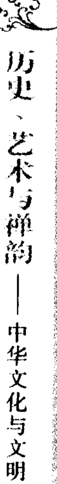
人性是情与理的辩证，它在方位上和层次上有无限发展的可能。这种发展是与物质文明的发展成正比的。从原始人共性的巫礼和个性的洞穴壁画，到汉时就发展成共性的歌颂和个性的单唱独吟了。这共性的歌颂也是人类人性的需要，宏大的场面、众多的官员，大家共唱个什么曲、共诵个什么赋，实在是震撼人心的感受。如同大家听一位播音员在朗诵歌唱祖国的诗篇，也是一种妙不可言的享受。我想大赋就是应这种需要而诞生的吧。

从枚乘的《七发》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这种共性的歌颂简直是到了极端。夸张的语言、铺写的过繁，极尽能事地假设有那么个楚国叫子虚的先生和齐国叫乌有的先生，二位吃饱了喝足了相对大侃汉朝的气魄和声威。这在民思安、国思定的时期确实有意想不到的鼓舞人心的作用。但这一路夸下去，就极容易出圈。好比报纸的这"道德版"上报道移风易俗，讲××地方办喜事不再铺张，而以旅行结婚喜事新办；但同是这一份报纸，那"脱贫版"上说又有个××地方，原来穷得娶不起老婆，

如今科技致富了，小伙子不但娶了城里的仙女，还摆了40桌酒席以志庆贺……云云。当代人尚且一不小心走了板，况且司马相如乎？于是这侃山侃到贵族的享受如何如何、宫闱的骄奢如何如何，这就显得真是子虚乌有了。当然司马相如可能是先哄皇帝高兴，再加以规劝，这叫“劝百讽一”，反正专家们如是说。

因篇幅所限，我们不再详细介绍。这带有正面的歌颂共性的作品在过去的中国很少见。汉赋的出现是中国人感情世界里另一个方面的体现，是一个国家内人民相互认同的一种一致性和同一性的歌颂。从美学上看，这简直是种对繁杂的认同了，算是不厌其烦的美了。

从上一节和这节，我们介绍了诸子百家以及《诗经》、屈原、庄子、《史记》、《乐府》与《汉赋》。我们花了很大篇幅和力气来学，因为秦汉时期正是人类的人性走向成熟的时期。中国人如此，世界上各族人民也大略地在这个时期盛开了文明之花。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索、耶和华、穆罕默德、释迦牟尼……他们和中国的这些人杰大德们一起，奠定了世界文化、宗教、哲学、伦理、文学的基础，使人性中理性和情感第一次从繁重的劳动、奴隶制的压迫中解放出来，赫赫然形成了人类文明史中光辉的起点，形成了人类成长过程中人性开始复苏的起点。





第四章

佛教的成长与传入及与西方宗教的比较

一、佛教在印度

在上一部分，我们介绍了古印度的一些地理、民风的概况。而《吠陀》、《净行书》和《奥义书》三部具宗教思想的著作，使古印度形成了繁多的以苦修为主的原始宗教。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婆罗门教，它和种姓制度中婆罗门种姓是第一等级贵族种姓相连的。问题就在这里了，社会上等级的建立是权力与阶级压迫的产物，这个压迫的性质一旦引入普渡众生的宗教里，众生皆有佛性的理论将化为乌有，一切成了佛性亦有等级差别了，婆罗门教即是这种贵族才能修的东西。看来时代在呼唤一种众生平等、众生皆有同一佛性的宗教，于是佛教诞生了。

释迦牟尼公元前 565 年出生于尼泊尔，公元前 530 年 12 月 8 日成佛，年届 35 岁，后创立佛教，说法 49 年，讲经 300 多次。于公元前 485 年 1 月 25 日涅槃，享年 80 岁。

佛祖在世时，所有教义与佛法全是口传心授，并没有文字的记载，所以称为佛的教诲。在佛去世后的当年，佛教届进行了第一次结集，出现了《阿含经》中的《杂阿含》。这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本文字的佛经。我们讲佛教的发展，即从这里开始。

我在《原本的真实》一书中讲佛学概况时，采用了印顺先生对佛学的分类法。即把佛学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

原始佛教与小乘佛教。

小乘的成熟与大乘初期。

第一个大乘教派的建立。

第二个大乘教派的建立。

晚期大乘佛教的真常系。

作为佛学研究，这种分类法有其优点，但今天我们讲佛教的发展阶段，则该法显得过细过碎，难以给人一个整体感了。所以我们采用三个阶段的分类法，不以具体人物思想变化为主，而以佛教主要呈现出来的三种性质，或说是理论上既独立又相关、又依时间顺序凸现出来的三个体系来讲。

第一个阶段：小乘有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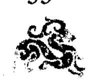
小乘有系：其生成与成长时间在公元前 485—公元 250 年，在这七百年的时间中，小乘不但发展到成熟，而且孕育了大乘佛教。公元 250 年，龙树大菩萨建立了第一个大乘教派空宗，所以我们把这第一阶段的结束定在公元 250 年之前。这个结束并不是小乘教的终结，小乘教一直流传至今，请诸位佛教界人士和同修大德们别误会。

小乘教因对所有原始宗教要有一个融合统一的目的，所以不免显出继承上迁就的遗憾。更因为封建社会处于生成和成长阶段，人类文明只是刚刚起步，所以小乘的“有”，就“有”得美好、神圣与充满希望了。

小乘教讲“空”，主要是讲空间的“空”。如房屋越大、越空，而房屋再大也空不过天空。夜观天象，其情感体验上的空才真地让人不知所措，这种对无限空的体验，正是小乘“有”的核心。所以诸位千万别走叉了，认为：小乘既讲空，怎么又讲有了呢？

其实，当有了“空无边”这种体验后，门里人说：这是进入了空无边的境界。依这个境界修持，即得罗汉果位。弄来弄去终是以空为手段，而有个修持法、有个修持的结果，即果位，这就是小乘“有”系。这是此系的见地（理论）、修持（法门）及目的（果位）的全貌。

因为对原始宗教的迁就，所以此系不但是“有”个果位——这是人们修持的希望啊，否则费心劳神弄出个“无所得”，那谁还修啊？而且此系重禅坐、重戒律、重苦行。当然这是和大乘的两个系统相比较而言。各类书籍对佛教的介绍实在太多，所以我们只是简而又简地点一下，剩下的全略去。





第二个阶段:大乘空无系(大乘般若系)。

这个系统其特点是"无",所以叫大乘无系,也叫大乘般若系。

此系生成于公元250年,由龙树大菩萨创大乘空系为始,至公元500年左右,产生唯识的真常系为止,其间有250年与小乘共存共生期。

般若系的特点,是一切皆空。这个空就不是什么空间的空,而是理论上的一种"根本空",也叫"毕竟空"、"究竟空"。

空到什么程度呢?《心经》中说:

"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

佛在说什么呢?佛说一切皆空,连修个什么菩提、得了什么果位全是空的、幻的,修了几十年,真的发现什么都没学到,一无所得……白费了不少心血精力与年华,好了,这叫得了大自在,即真的得了佛的境界了,这就是般若系的精髓。世上修行人都会背《心经》,知道这个"毕竟空"、"根本空",但真能理解的人却不多。有的人认为佛只是这么一说,是让我们打掉某种执著而故意讲空;有人认为这是"空"的一边,事物还有"有"的另一边,佛是在告诉我们不要忘了"空"的那一边,所以讲"根本空";还有人认为这是练功时进入的一种状态,一种一切皆空皆无的状态。哪个才对?何去何从?

其实讲"毕竟空"和"根本空",总是要下很大的决心。因为人们一般不会真的理解,误解的太多,且理解肤浅的太多。误解误用者,走入断灭论,去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反正一切没了下世的报应还怕什么今世作恶?还有的误解误用的走入狂放不羁去了。理解肤浅的认为只是把一切看淡些,什么名利权势全是生带不来死带不去,别太认真。更是有的英雄豪杰不惧死,"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空得舍身舍命让人肃然起敬,但这都不是佛的本意。让我们把眼光放大放远些看看,看宇宙生我们有个什么?看200亿年后宇宙毁灭有个什么?地球刚生成有个什么?我们人类社会及人的思想与情感只是近万年来的事啊。知道这个你才能真正明白"空",这才是般若系的本意。

但问题接踵而来,当我认真地讲"人之初,性本空"时,有多少人理解呢?所以还是讲"人之初,性本善"更入世些,更易让人理解些。把讲"根

本空"的话留给悟道的人说吧，他们才能真地明白其含义是指人性具有发展上的全方向性与无限层次性啊，只有"空"作为原点才会在欲的推动下依情与理走上基础的"食与色"，再随人类物质文明的进程逐渐走上方向的多元化与体验的层次化。深思之：其实不论个性与共性、善与恶、隐与显、直抒与婉约……都只有建立在"空"上才有可能，如果人性本质是"善"，那么其发展方向就限定了善的方面，否定了"恶"的另一面，不全方位了。当然，这个说法对世人对孩子讲更加有利，因为这世上悟道的人毕竟太少。悟了"空"以后呢？那你就真地明白了人性的特质，它是那么的可塑与充满活力。好人可以学坏，坏人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同时它鼓舞你上进，去追求你的理想，它让你认识到生活的美好……于是你去"渐修"、去你的习气、为他人多想想、做些对后人有用的事。这时你是佛，同时又是个常人。

般若系的理论就是这么真实，但同时又是这么惊险地容易让人误解误用。于是龙树大菩萨在宣扬般若的同时，亦大力推崇不空。使之形成空与不空的两端。而含有两端却不滞于其一的为"中道"。这种做法是否高明，那就见仁见智了。我倒认为欠妥，因为两端的辩证法是网络系统的特征，只是本性的表现才使情与理的辩证具有一种网络的特点，说本性最"原本真实"的本质是"空"，并不是空与有的辩证啊。"真空生妙有"是禅师的名言，在这里是最彻底的宇宙论、物质论。

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而这个本质是虚无。看来萨特一定学过佛教的经典，他用现代的哲学语言讲出了般若系的特点。

综上所述：人性，是以空为本体，以欲为动力（佛家叫"依缘"或叫"势"），按人的情与理的辩证而存在着并发展着……如此而已。

悟知此理为开悟，听懂看懂不做数，那只是文字禅、口头禅。

第三个阶段：大乘真常系。

小乘经典以《四阿含》为主，大乘空无的经典以《般若》为主，而真常系则以《楞伽》、《楞严》、《圆觉》、《妙法莲华》、《大方广佛》等经典为主了，这是当今世人见到的最多的经典。

在公元500年，由无著、无亲两兄弟把大乘般若发展到唯识学说，从而成为"真常唯心"的唯识宗，通常称"大乘真常系"。真常系甩开了"空"与"有"的辩证说法，把与开悟者所说的经典和与常人所说的经典不一致的地

方去掉，并以一种通俗易懂的下里巴人式的理论阐释人性。即：人人有个真常不变的人性，它叫佛性（也叫真性）。佛性是真常的、永恒的，只因为后天人们于生活中染上恶习，致使真理被埋没，光华含垢，所以佛性不显露。因此，修行只是去坏习气，所以要日日勤拂拭，除去污染后，即可见佛。

这可以用咱中国人简约的三字经描述为："人之初，性本佛。性相近，习相恶。学佛者，勤修炼。除恶习，即成佛……"

真常系解决了人人都有佛性的"有情有理的问题"；

真常系解决了人们修行方式方法问题，并阐述了其道理；

真常系说明了永恒的是什么这个理论上的问题，同时为人们带来了成佛的信心与希望。

但真常系难以解开"缘起性空"这个"空"的疙瘩。难道一切是"缘起性常"？有利即有弊啊，无亲、无著二位大菩萨为了解决人人天生具有的"真常"，不得不在八识上做文章。原本是由繁就简的真常系，不得已又滚到唯识的学问之中去了。没办法，不解释不成，"空无系"容易流入断灭论，但真常系极易流入灵魂不死的真常论。断灭论与真常论都是外道，不是正道，所以真常系不得不弄出一套让人一辈子学不完的学问。

当然，也可以简单地说：这个真常的、永恒不死的真性（即佛性）乃是——空！以空为真性，加上真空生妙有的"无中生有"，于是把真常系和般若系巧妙地嫁接起来了。

总之，由小乘到大乘空无，再到大乘真常，使佛教繁之又繁，琐之又琐了。繁琐之极，必导致她的消亡。当达摩携《楞枷》东渡到中国后，印度的佛教为挣脱这种窘境而走上密宗。谁知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堕入更加繁乱。因为理论、修证、见地三者要和修行人的下、中、上三种智相适应，这本身就不是一个理论一个派系可以解决的。试图以一个方法一个理论去讲法，而且是三种人都认可的法，那这个方法与理论就庞杂得成了密宗而难以言说了。

印度密宗在它流传到中国西藏后，不久因伊斯兰教的传入、婆罗门教的中兴而彻底消亡。

二、佛教在中国的传入

大约是在东汉汉明帝时，于公元60年明帝刘庄夜梦金人，认为是佛

的征兆。于是派蔡愔等18人去大月氏国求经。蔡愔于公元65年出发，因途中遇正往东来的两位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所以于67年迎回洛阳白马寺，并开始了译经。先译出《四十二章经》，藏于兰台石室。其实佛经早在此前已传入中国，只是不见正式的记载而已。

东汉时，中国的政权和儒道思想占统治地位，加上一个新的宗教引入还需一段消化时间，所以佛教在这个时期只是译经和流通，真正信奉的人并不多。

三、东西方宗教与艺术的比较

我们在第一部分里见缝插针地讲了西方人对艺术和人性的研究，以及精神境界三层次的划分。在这第二部分里我们也插入东西方宗教的比较。因为从第三部分开始，佛教和禅宗将成为我们宗教与人文部分的主要话题了，所以敬请诸位原谅，先耐着性子看下来。

（一）思辨与冥想之别

现在所讲的西方文明，是指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在奴隶制崩溃而封建社会诞生时，这里出了很多伟人，大思想家。如泰勒斯、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得。他们有些像印度的先贤们，善于思辨，喜好争论个问题，乐意开个什么辩论大会去讨论一种思想，于是在这方水土的养育下，形成了人类的哲学。而哲学的诞生，又使其向科学渗透，产生了原始的自然科学。当时的大思想家多是一半为哲学家一半为科学家。

中国在春秋战国这个封建制度形成的时期，并没有更多的争论和辩论风气。我们中国人个性很强，每个人于知识和生活中去思去品，形成自己的一家之言即可扬名立万了，所以我们有百家争鸣。但我们只限于讲出自己的观点，而不愿意与他人争个脸红脖子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为人处世的标准，使我们不善于争辩、不善于弄个“沙龙”让精英们坐在一起讨论问题。

从思想的对象上，我们没有从客观的事物中沿着自然科学的道路走下去。我们却是反观自心而形成道家、关心国家政治而形成儒家与法家、关心人民疾苦而形成农家、维护自己利益而形成墨家，只有兵家沾上军事



科学一丝气息。

在这个时期的文化上，古罗马出现《荷马史诗》，诗中歌颂的是英雄、是天神、是半人半神的超人。而我们出四言的《诗经》，诗中歌颂的是劳动人民及一些礼仪和颂词。

总之，西方人善思辨，重哲学科学，歌颂英雄；中国人善独思，重道德伦理，喜普通人民的感情。

（二）政教合一与封建大一统之别

当西方（欧洲，尤其是西欧）步入封建社会后，国家形态上是众多的小邦国，文化形态上是语言文字不统一，民族形态上对立性强、独立性强，欧洲从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封建帝国。而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生产形式是以农、牧、商并行，加之海盗式的掠夺。这种局面是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必须有某种因素把这些小邦国统一起来。如果政治体制和行政、民族、语言上不能统一，那只有在宗教上统一了，于是欧洲各国大都发展为政教合一的国家，他们在一个宗教下得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在当时西方信奉的是基督教，对付的是伊斯兰教，十字军东征就是众多小邦国的宗教联军。

而中国一进入封建社会，就形成了大一统的秦帝国。统一了文字与语言，这就使中国人有同文同语的认同感。中国人不论在海内外，一见方块字，一听乡音，那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同理，就是在国内，每省因口音和语系不同，也极容易造成异地的矛盾磨擦或同地的一种无理性的认同。可见秦始皇的功劳大哉，因此我们也就明白现而今推广普通话和规范字的意义了。

正因为有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因素，这个统一的因素是排他的，所以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形成政教合一的局面，从来没有哪个宗教能始终占着霸主地位。宗教只能附属于政体，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加儒道思想，这本身就排斥宗教。所以，在中国最大的是皇帝老儿，老二的是孔圣人，老三是关帝爷……什么佛仙大师根本排不上号。除非哪位皇帝想着长生不老信了某一位大师的鼓惑，册封了某位天师，那这个宗教或教派才算有了名气，才能招到信徒。

西方的教皇权力大得给皇帝加冕，皇帝要向教皇下跪；中国的宗教大师要千里迢迢地赴京接受皇帝的册封，要向皇帝作揖（可不下跪）。

另外，西方的宗教与政权有一个同一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和达到一个目的——物质的丰富。中国的政权和儒道都是为了政权的巩固和安定民心。换言之：工作是为了工作本身，生活的乐趣旨在生活之中。

（三）两种宗教文化之别

西方，因其经济的特点和物质利益的驱使，总是要去掠夺去霸占。从十字军东征，即可看出这种侵略性，而其宗教是间接地鼓励战争的，或者说不反对战争。

中国，因其农业经济使然，总要防什么匈奴、突厥、女真等北方民族的骚乱，一切为了保住地里长的庄稼。于是修长城、和亲、鼓励宗教在域外流行加上"不叫胡马度阴山"式的被动防御。中国的宗教全都反对战争，不论是什么性质的战争。

西方的战争总带有掠夺性和宗教色彩；而中国人则纯是为了土地和权力在窝里斗。比如贵族夺权、农民造反，都是在一个稳定的网络系统内"有礼有度"地捉对儿厮杀。打起来什么教都不信；打赢了的为王，打败了的为寇；为王的请僧道入京念经做做善事，庆祝一番；为寇的或是被杀或是遁入深山出家。看来中国宗教的祖师们也是和尚不好做、道士不好当，贼与官兵谁也惹不起。

中国人讨厌战争，只有生活才是意义的本身所在。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牛郎织女样式的男耕女织，其乐也融融……剩下就什么都不想了，梦里娶媳妇例外。

（四）勇于改革和因循守旧之别

中世纪末，马丁·路德的新教打破了一种规定性，加尔文随后创造了"任性"的新的资产阶级的规定性。二位的宗教改革迎来的是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萌芽。

而中国，禅宗师爷马祖道一创"即心即佛"，马上天下大哗。于是师爷又曰"非心非佛"，"任性"的新思潮刚升起就枯萎下去。明朝朱熹又弄出"灭人欲"的理学，清朝又出了文字狱……于是所有的思想都被一路地灭下去，任何创新的东西全不合祖制……直到让人家八国联军灭了一回。



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东西方在宗教、人文、思想、艺术等方面不同的原因。而这种种不同再沿其各自本身的道路发展下去，就越来越相距甚远了。

可以说：

西方人追求快乐，而这快乐是用追求物质这类外在的东西才能达到的。如地位、友谊、时装、车子、房子……

东方人认为快乐不是来自对物质的追求，而是对智慧的修炼和悟道。只有对人生的修与悟才能真正地获得自在与快乐。

西方宗教（自16世纪至今）是“因信称义”、“信仰得救”，只要心中有上帝，那干什么（只要不犯法）都无妨，都可以进天堂。其极端表现在外交方面，以强凌弱在西方人眼里是很正常、很应该的事情。这种观念打破了宗教的束缚，产生了自由竞争的原始资本主义，当然也使宗教形同虚设。

东方佛教讲与人为善，多做好事多积德。如果你不相信有下世轮回也没关系，只要相信因果规律即可。做好事别问收获，只去行善即可，那“挣钱不挣钱，不在前60年”，一路耕耘下去……然后是“老了老了拉他妈倒了”。已就已就，好即了，了即好。当然，佛教界和世俗界中真懂教义真懂禅的高僧大德则另当别论，这个我们放到后面去讲。

西方哲学强调认识客观对象，东方哲学强调认识主观自己，更深的是认识主观自己的认识。当然你要一时看不懂没关系，先得过且过，以后再说。

西方人认为：人应该征服自然，把天作为外太空殖民地，地作为自己的附属国。资源为我们用，万物为我们长……

东方人认为：人与天地为一物，和合一致是神仙。怎么可以去征服自然？怎么可以去月宫打扰嫦娥？下四海讨扰龙王？

西方宗教，教义清晰明白、容易普及，世俗化得很；

东方宗教没大专文凭就根本不懂。那么多故事、寓言……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禅的公案，我看最起码是文学硕士和历史博士才有希望研究明白。

西方崇拜的是理性，是逻辑思维；

东方信仰的是伦理与情感，是艺术与直觉思维，或是没任何道理和科学根据的“义气”、“正气”、“佛气”、“仙气”……

西方人强调自我。什么自我价值、自我信仰、自我力量……

东方人强调无我。什么大公无私、无私奉献、融化在集体中、无生法忍、无我相……

从审美上看：

西方人重写实、讲秩序、求精确；

中国人重精神、讲抒情、求高山流水、无言之美。

从哲学本体上看：

西方人认为自然界纯系无生命的物体，一切全为我用；

东方人认为天地万物都有灵气、乃一气生成。

从人性论上看：

西方人认为人的本性是贪欲，只要合法律，尽管去贪；

东方人认为人的本性是善，与人为善，乃有好报；

禅却认为人的本性是空。真空生妙有，一切随缘、一切如如。

四、近代西方人对宗教的再探讨

自16世纪马丁·路德率领着西方人改革了宗教，人们全然地对上帝失去了兴趣。然而当物质文明进步使人的生活都理性化、科学化后，生活变得有条有理但索然无味，人间失去了仁爱与真情，人们又把目光纷纷转向宗教，试图寻找已失去的伊甸园。

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1842—1910)，试图站在实用和功利的角度来解释宗教，他说：

“宗教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关于独一无二的神的存在的信仰体系……(但是)这个定义将会把世界上现存的许多宗教排除在外。我们也可以下一个将宗教与信仰、理性、感情、心理状态和社会结构统一起来的定义。然而，如果仅仅将注意力局限于一种可能性上，我们就无法了解什么是宗教这个问题。”

——詹先生为了难。宗教含有三要素，这我们在前文已讲过，但生活中有的人利用宗教的组织形式而成立个什么团体、帮会；有的人利用宗教的修持手法办个什么班自称大师；有的人利用宗教的彼岸，树个让人眼花缭乱的目标：成仙、长寿、益智、点石成金……



宗教原本是非实用非功利的，但它完全可以被很实用很功利地利用起来干点儿什么勾当。

宗教原本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但完全可以只信赚钱就能算是信仰。

宗教在创立之初是很出世的，即非生活化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已融入生活中，生活也离不开宗教了。也许你没意识到，但詹先生意识到了，且为了难。

他继续说：

“很显然，宗教是复杂的，包含着许多因素……宗教包含思想和观念，但它也包含传说、祈祷、仪式及其说明和制度。宗教远远不局限于在理智上认可一系列命题或教条，它还包括行为，及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信念去生活和行动。同时，宗教还有不同的表现方式：集体的、个人的；讲究仪式排场的，并不如此的；为革命作辩护的、为维持现状作辩护的；限制人的潜力的、解放人的潜力的，……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两种宗教……只有给宗教下一个不严格的定义似乎才有可能。”

——理性与实用的西方哲学家，要想弄懂亦情亦理的宗教，实在比满有人性味的东方大德们啃弯弯绕绕的西方哲学要难得多。詹先生实用地看宗教，其结果就不可能下个什么定义。但詹先生没白费力气，他让我们自己也大吃一惊地发现宗教原本离我们这么近，不管你是讨厌它还是喜欢它，但谁也离不开它。詹先生自然早已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干脆把宗教推出哲学的大门，再也不想掺合进这种讨论。

他说：

“宗教，是孤独的个人的情感、行动和经验”。

——省事儿了。詹先生照样去当哲学家，去讨论研究他那高雅理性实用的哲学，再也不会回头弄什么宗教问题了。

新实用主义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基督的本质》一书中循着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宗教哲学，改其“实用”的内容，融进“经验”的因素，走上一条试图使哲学同经验科学相结合，并回到日常世界之中去的道路。

他的结论是：

“宗教是人类心灵之梦。人本身并不像人所想象的那样存在于神之中；相反，神是人的愿望，是被想象为得到了现实并被转变成真实存在的愿望。”

——当宗教被说成是梦时，西方哲学家大哗，认为费先生不是理性的科学家，他的解释是反科学、是伪科学。如果上帝真的只是一种愿望，理性何在？历史的真实何在？哲学界和神学界一片嘘声，费先生狼狈逃窜，再也不碰这问题了。

看来以实用主义的出发点看宗教，一无是处。

实用主义哲学败下阵来，存在主义哲学杀了上去。

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布伯认识到：

"我们在经验中意识到的东西，是通过感官亲身得来的东西，或间接地从以往已经验到的那儿推理类比出来的东西。于是只有我们使用经验和理性的同时，才能对事物有所了解。所以，上帝不是猜和推理出来的，而是一种被体验到的实在——尤其对信徒来讲。"

——存在主义的特点是："一切存在着的东西，必然是合理的。"实用主义重理性的实用，排斥无理性的经验和情感，但存在主义认为经验和情感既然无理性地存在着，必是合理的。所以布伯大着胆子把"体验"到的就是"实在"的这个公式拉入科学殿堂的哲学中来。

要想说服和打动西方那些理性劲儿十足科学劲儿十足的哲学家，岂是易事？所以布伯发明了"三个世界"的层次说，以堵住众位大人的口。

布伯认为：

人们生活在三个意义上不同的世界里。

(1)在物理世界中。这个物理世界，是我们所遇到的我们必须与之相处与之共同生存的客观环境。它属于实在意义上的世界。

(2)在人的世界中。这个人的世界，是我们以某种"责任的道德职责的主体"出现。自然界只是舞台，而一切只是个道德意义的世界。

(3)在神的世界中。这个神的世界，是教徒们的一切与上帝发生联系或面对神灵。这是个神圣意义的世界。

——当布伯很理性、很科学地划分出三个层次后，便有了施展的舞台，再也不怕大人们骂他是非科学和反科学了。他向大人们解释道：

"一条河，他不单有饮水、运输的第一层意义，又有相思、寄情的第二层意义。同时，又有世界的完美、协和、神的美、神的灵性的意义。"

——其实布伯并没说出宗教是什么，恐怕他也说不清。他的层次划分，实际上是哲学、艺术与宗教的划分而已。面对认真、固执的反对者，他



仍是需要给宗教下个定义。

万般无奈布伯吞吞吐吐地说：

"宗教不仅是一种认识方式，同样地，是一种生活方式。"

——显然布伯已黔驴技穷。当他把宗教说成是一种方式时，哲学意义和宗教意义上的内容内涵就无从说起了，"世上只存在着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叫宗教"，是存在主义最终的智慧结晶，如此而已。

为了要给"方式"充填上内涵，为了给存在主义一派争回面子，"现代存在主义者"杀上阵来。

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继布伯的层次说，充填进新的内容，发明了"生活三阶段"说。他认为人生在生活层次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美学阶段、伦理价段、宗教阶段。

他写道：

(1)美学阶段。生活在这个层次中的人，深受感官刺激和欲望的影响。在这里想象力在起作用。他们追求快乐和新奇，但生活无法安定。因为事物总是在变化。这里没有或很少有道德规范，一旦他们认识到缺少这些，则可以上升为"伦理阶段"。

(2)伦理阶段。生活在这个层次中的人，少了人性上的随意追求，有了行为规范和恰当的行动，他们带着责任感去付出去行动，因为这个阶段是建立在道德法则之上，所以共性淹灭了个性。最终他会认识到，必须为自己做出选择而不是为道德做出选择。于是，他要不就停留在第二阶段，要不就回到第一阶段。而很少有人能"向信仰飞跃"达到第三个宗教阶段。

(3)宗教阶段。这个阶段的人，在向信仰飞跃之时要求他们做出某种承诺，要求他们在不知行为后果的情况下甘愿去冒险。他们要以不同于以前的方式去生活。

——克尔凯郭尔先生总算可以歇一下，喘口气了。从"存在着的，必是合理"的角度看宗教，如此而已。在克先生这里，上帝存在着，他存在于第三个"宗教阶段"之中；宗教也有存在的必要，因为上帝要在此栖身。这里有多少是正确的、多少是谬误，咱不去评论，而三个阶段的划分却充满了智慧与真实。

至于宗教应该怎么定义？怕是见仁见智。西方宗教咱不懂，不好妄

下结论。而佛教和禅宗的定义在前文已下过，不再赘述。

第二部分从战国到东汉要结束了，略作一小结。

本部分讲的东西不多，以下几点对诸位可能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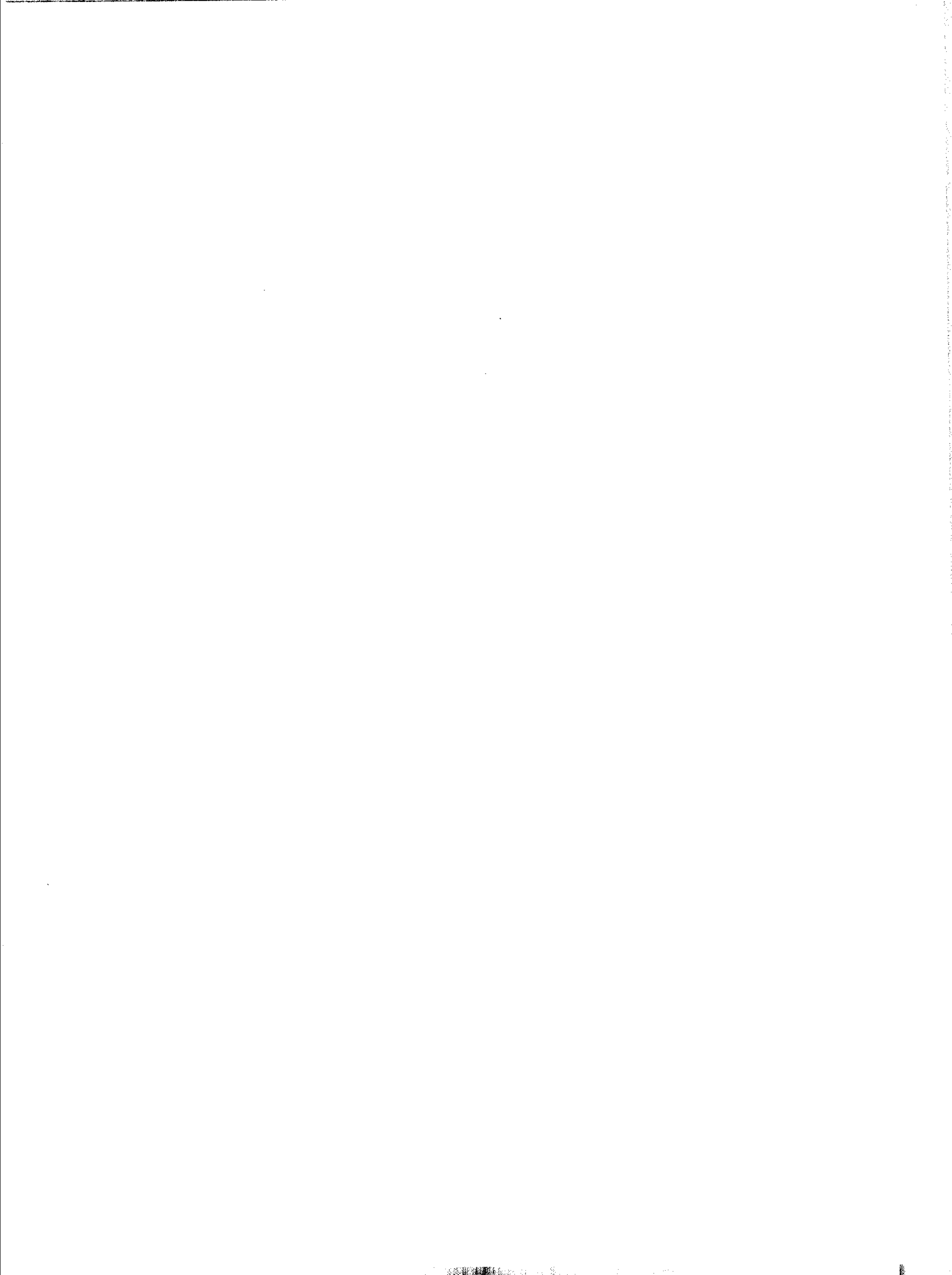
(1)封建社会五大毒素：诸侯割据、外戚专权、宦官专权、奸臣弄权、外患不已。

(2)三种人才：建设人才、军事人才、改革人才。

(3)产生人才的三个尊重：尊重人的本身及身份、尊重人的创新、尊重人的流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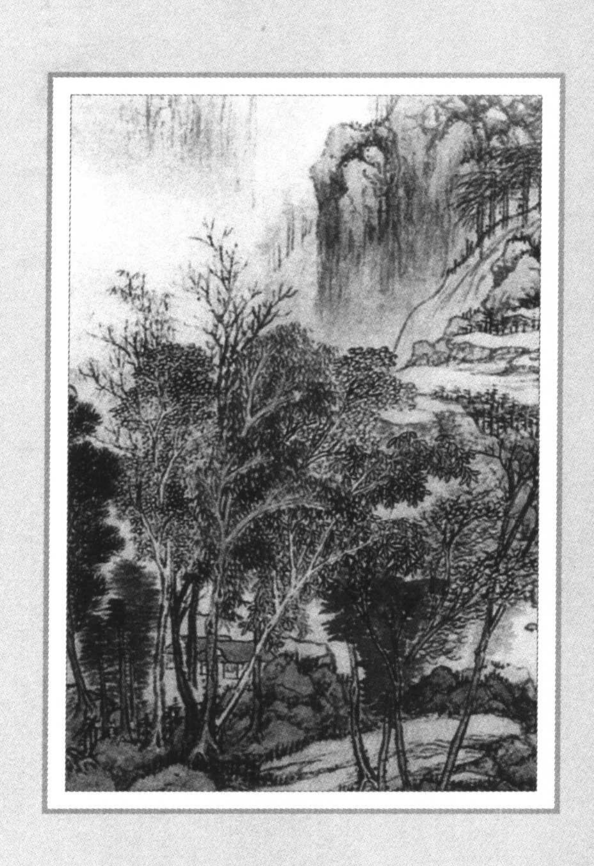
(4)对人才的培养：下大力气，不惜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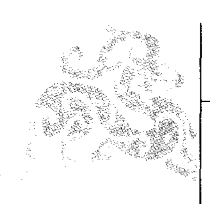
其次，对《诗经》的作用和诸子百家的作用，可以认为它们分别是中国人情与理之源。依源而知流，在进入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后，这个流也向全方位、多元化发展开来，形成中华文化的传统和中华的文明。



第三部分

从魏晋到盛唐





第一章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公元220年，东汉亡。

魏，指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分立时期，由220年—266年，凡46年。

晋，指政归司马氏的西晋、东晋。由266年—426年。

其中西晋由266年—316年，传3代，历4帝，凡51年；

东晋由317年—420年，传4代，历11帝，凡103年。

南北朝，指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南北朝由420年—581年，凡160年。

隋，581年—618年，传2代，历2帝，凡37年。

唐，618年—907年，传14代，历21帝，凡289年（其中包括女皇帝武则天）。

本部分只讲到741年，盛唐时期。

一、魏晋史略

东汉末年，公元184年，全国爆发了黄巾起义。这个起义是压迫与反压迫的性质，但如果没有组织没有纲领，任何一个起义都会流于山贼式的暴乱，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罢了。而黄巾起义其纲领，则是道教的《太平经》。不能指望封建社会的农民有多高的理论和哲学水平，这种用符水咒语解救疾病乃至苦难大众的做法，简直是出人意料地好用。再加上神乎其神的传说，什么张三是佛之转世，李四是老子之再生……天出华瑞、地



呈荣祥……好了，这种中国式的农民起义所需的纲领已是铁定的可行了。在组织上，所有起义、帮会、团伙全是墨子的徒子徒孙。立个什么颜色的旗、戴个什么颜色的巾、画个什么颜色的眉……烧香、磕头，认了非血缘的兄弟姐妹老少爷们，再排出大小座次……揭竿而起、聚山啸林，风高放火、夜黑杀人，平等平均、吃肉分金……弄好了打下天下，弄不好"风紧"、"扯乎"（大事不好，快撤），多数农民起义大都是这种模式和结果。

张角创太平道，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造反了 20 年之久，最后被镇压下去。

道家与墨家实在是农民起义乃至帮会团体的理论基础与组织原则了。依此，143 年张道陵创五斗米道，以施"义舍、义米、义酒"为手段，以物质上的平均主义为理想建立起大的"道场"，自封"张天师"，实为地方割据，经二十载于 215 年降曹操。但这五斗米道在民间仍有流传，后来成为道教中的正一派。

公元 220 年，东汉完结，中国分为：曹魏、蜀汉、东吴三国。史称"三国时代"，从 220 年--420 年，也称"魏晋"。

这整整 200 年，中国大地上又是连年征战、民不聊生。

（一）门阀制的诞生

在汉朝，已有的恶疾是外戚和宦官的专权。这两个篡权乱政的渠道逐渐被统治者所认识而多少有些防范。悄然而起的，则是皇帝们始料不及的士大夫阶层的形成与壮大。士大夫，则泛指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当时的知识分子是儒家的代名词，并不似今日知识分子还有文科、理科、工科等名目。汉朝的人才提拔是"推荐"制，推荐者多是门阀世家。前边讲过，西汉王朝自七国之乱后，公开削藩不成了，推恩令式的削藩让其子孙共袭遗产而使之衰弱。代藩国的衰弱而起的是世家地主、豪族地主、贵族地主的形成和壮大，这就是门阀。这些人本来在政治上没权力没地位，只是有钱的富户，有一定声望而已。随着封国的衰落，在门阀世家举荐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步入统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士大夫，渐而形成一定力量。"师以徒为贵"，想当年把他们从穷读书人推荐上来的老师们，自然渐渐坐大；"徒以师为荣"，越来越多的读书人争相投靠到有名气的老师门下……而老师即门阀的代表，如此门阀替代了封国、外戚、宦官，形成中国封

建社会网络系统的一支新生力量。这支新生力量到了唐的科举制就衰亡了，但士大夫反之更加茁壮，他们抄袭门阀世袭的制度，建立了一套士大夫门第制。即农民儿子当农民、乞丐儿子当乞丐、做官的儿子还做官、士大夫的儿子仍是士大夫。此流毒直到“文化大革命”，还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基本如此”的“革命”对联。可见这门第制度虽朽，但门第观念则死而不僵，或曰僵而不死。

书归正传。

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和壮大，是网络中的新的力量，他们常常与旧网络中的外戚、宦官直接冲突，造成“党禁”、“党锢”、“党争”……乃至“文字狱”。但也正是士大夫的形成，促成中国禅宗的诞生和发展，同时也使中国的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走上了辉煌与成熟。

（二）服药与清谈

曹魏末年，司马专权，两姓讨伐不断。掌权人的明争暗斗，直接影响到士大夫们的安危，于是明哲保身就成了避祸之道，这就有了魏晋士大夫的服药与清谈。

服药，有两个含义：其一是说明自己在家里忒忙，没工夫去串联搞什么自由主义的阴谋和小动作。只是在家里煽风点火、筑鼎炼丹、刻刻不暇、时时用心耳，工夫用在方术上了；其二是这药服下去，常是奇痒难忍、满地打滚，神志不清、虚汗满身，立需冲凉休息，将养身体。这实在是绝妙好招，大凡谈话谈到需要犯病时，立即就抽疯，马上要回家治病。是否真服了药？那要看话题是否涉及国家大事，只要是涉及了，那疯病立犯；未涉及，还好，仍可谈下去，这就是魏晋方术风和服药之根源了。至于一些中产阶级，原本不必学此伎俩的人，但要装富，也一般地突然倒于市，口呼犯病了。一如在马路边打手机，其实也犯的是闲病。原本无事，但招来若干人若干种眼光，引人侧目尔。哪怕让人骂一句“吃撑啦！有钱不去赞助希望工程？”心里也痒痒地痛快或痛快地痒痒了。

清谈，此风一直刮到清末，形成一帮叫“清流”的团体和人群。“清”乃老庄的标志，“谈”就是不干任何事儿，坐那儿神侃。二字合起来其意义就是坐那儿侃没影儿的虚幻的事儿，而且侃得一本正经、有滋有味儿。不是东山打过虎，西山套过狼，那也不成，连狗都不能打，你知道这是谁家的

狗？一点儿实的没有，只好是仙来神往了。谈神说鬼、论道讲佛、抄经画像、凿洞刻窟……全出在魏晋南北朝，这就不稀奇了。

清谈的内容，大多是《老子》、《庄子》、《周易》，称为"三玄"之学，而魏晋士大夫的清谈也称"谈玄说妙"。

当然，清谈为避祸，非认真地学道，但这种风气恰恰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推广和发展。同时又使佛与道相融合，促成了中国禅宗的诞生。感谢清谈了，真地还谈出了点儿禅与艺术，虽然很凄凉和无奈。

东晋末年，外戚专权，大肆制造冤狱，皇帝也一个比一个的痴。司马炎的儿子司马衷，身为王子，本是要当皇帝的坯子，听见青蛙叫居然问："它们为什么叫？是为公事？还是为私事？"听见有人饿死，不解地反问："没有粮食……那他们为什么不吃肉？"真他妈的混帐得可以。291 年，这混帐东西一上台，就引起八王之乱。他老婆贾南风可不傻，只是希望自己老公越傻越好，这样贾姓外戚成了掌权人。一言难尽的血腥，一点儿仁义礼智信全无。

（三）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从公元 304 年—420 年，中国形成分裂，史称五胡十六国，但仍算在东晋这时期内。

此时期的历史，实在没什么可说的，统治者个个混蛋加三级，少有几个明白人。

暴君首推后赵的石虎，嗜血又好色，一次征集美女就是三万人，如有不服不愿献出女儿妻子的，那就杀，仅 345 年为此竟然杀了三千余人。他儿子石宣被封太子，但父子二人因争王位闹翻了，石虎把儿子石宣绑住，先拔头发，再拔舌头，继而断手足、剜眼睛、用火烧死，同时连儿媳和孙子全一个不留。所牵连的宦官、官员达十余万人，一律流放到两千里外的兰州。

第二位乃是前秦的暴君符生。此公虽是瞎了一只眼，但随身携带刀锯斧锤各种家伙式，看谁不顺眼马上亲自动手修理。君臣大宴，谁要是不醉，就让弓箭手射杀助兴。符生一高兴，剥下驴皮看驴跑，剥下人脸皮让人跳舞；一不高兴，用刀锯杀其妻，用锤把舅舅砸得脑浆迸裂。这还不算完，让他折腾得朝野之中肯定不少人身上"少"了点儿零件，加之自己也少了一只眼，于是"少、无、缺、残"之类的话就成了犯上和反对国家的恶毒攻击了。一次他问太医人参的效用如何，这太医一不小心说："虽然少许，力

量却很大”。沾上了“少”字，于是就是骂皇上少了一只眼，下场定是被杀，不二价。后其堂弟符坚闯宫杀符生，这不能言“少”的日子才算熬到了头。

二、南北朝史略

公元420年—581年，南北朝时期，北魏统一北中国，南宋统一南中国，造成二者对峙，南北朝时代开始。

这段历史中没什么特别的事件可让我们记录，非要讲点什么，则是北朝的汉化与南朝的门第世家。

北魏原本是鲜卑拓跋部落所建成的帝国，其游牧经济使其文明程度很低，同族慕容部落也好不到哪儿去。这和当今武侠中什么慕容大侠的风范仪表不相干。拓跋宏的汉化是为了提高国家文明程度，其汉化中最有意义的是使用汉语汉字，改拓跋姓为“元”姓，迁都洛阳，使达官贵人多受汉文化浸染。而汉化中最糟的是拾起儒家的繁文缛节，建立冗大的官僚机构，再加上守丧三年的硬性规定。这三条使一个本来很朝气勃勃的改革走入未老先衰或者叫它未衰先老的境地。

南朝继承了晋的社会结构，门第世家日见红火。南京乌衣巷的王安家，乃是当时的“万王之王”。高等(门第)世家结合成一个集团，成为士大夫中的贵族，这种贵族唯一的职业是当官，依门弟和世家的高低确定官职的高低，平民百姓是不能当官的。官宦的世袭使官僚们走上腐败和无能，不可能有别的出路。

三、隋朝史略

公元581年，外戚杨坚(隋文帝)夺取北周政权，建隋朝。开皇九年(589年)灭陈而统一中国。604年，其子杨广篡位，改国号大业。大业十四年(618年)杨广被将士所杀，隋亡。这有点和大秦帝国一样，于纷乱中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轰轰烈烈且短命，这简直是为下一个强盛的大帝国准备的彩排和预演：秦后的汉朝与隋后的唐朝都是值得中国人骄傲的王朝；而汉前的秦与唐前的隋都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

就像很多帝国一样，它的第一代皇帝大都比较开明，头脑比较清醒。



隋文帝杨坚，此人总结了前人的历史经验，认识到怠惰奢侈必招大祸，勤政节俭方是为君之道。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就有了这么一位出了名的皇帝，他的勤政，是每日一上午都坐朝，午后把要处理的文件带回去审批；他的节俭，甚至到了车舆破旧了修修再用，不穿绫绮之服，不佩金物之饰，着布衣，佩戴一些不值钱的铜、铁、骨饰物。他病了，想找胡椒粉发汗，居然前宫后宫都没有。如今评之，这勤政历来有不少君王可以达到，而这节俭却有人大不以为然了。尤其当代的市场经济谁都不买商品，市场疲软，经济如何发展？那些精品极品卖给谁？道理一点儿都没错，1＋1＝2般地正确。但官员们都坐奔驰宝马、穿皮尔卡丹、抽极品烟、喝极品酒……连看病都要极品地看，百姓如何看？

（一）创科举与灭门阀

文帝勤政节俭的榜样，使隋初世风大变，这可以说是他的第一个功绩。

他的第二个功绩是严格立法，并以"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精神来立法，这就给国家的发展做了先行的引导和保驾的基础。文帝三次下诏，实行均田制，诏令规定：男子21年岁为丁，算全劳动力；一夫一妻为"一床"，是纳税的单位。这种税法，实在是高明而智慧的税法：首先，它鼓励了生产，男子21岁就业劳动，不可涣散游荡于世；第二，逼迫成年男子结婚后立家（与父母兄弟分家），只要是全劳动力的丁，不可三四个兄弟不结婚不分家，只交"一床"的税，从中占国家的便宜，这不合法。只有三四个兄弟分别成立三四个家，才合法。好了，只要有三四个家，就有三四个一夫一妻，也就是有了三四个"一床"，于是交三四份税。妙哉，富民强国之道也。不似当今的人，有一份上税的公司，下边再弄出几个不上税的黑公司，挣几份钱上一份税，挣下黑钱成了大款又没犯法。真搞不懂是隋文帝聪明还是当今人更聪明……"皮若不存，毛将焉附？"

隋文帝更智慧处，在于他不是治民而是治吏。他建立三省六部制，削弱了丞相权力过大之弊。三省为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在地方上实行州县两级，裁减了大批冗员，节省了政府开支。

隋文帝第三个贡献，是向寄生在社会上的毒瘤"门阀"开刀。他在中国首次推行科举制，使富贵与贫寒子弟均能通过科考进入仕途，杜绝了经

门阀推荐而当官之路，逐渐削弱世袭当官之门第观念，巧妙地抽去门阀势力这烈火之薪，使之渐趋自然熄灭。

可以说，汉武帝的推恩令和隋文帝的科举制，是中国统治者罕见的智慧啊。

（二）京杭大运河

杨坚的次子杨广，是第二代皇帝，这位仁兄就大不如其父了。前边讲过，中国古人有个"谥法"，它是正史中评价先人而冠之的"名号"。杨广死后被谥为"炀"帝，惨了。"炀"乃"逆天虐民"、"骄奢淫逸"之意。可见沾了"炀"味的人，其后世子孙定然地为自己炀祖先汗颜也。

留个好名声是中国人的传统，这里容不得当代什么什么家去说好说坏，也不是只讲奉献不讲自我价值那么简单。人生在世，上有父母下有子女，谁愿意自己的父母为世人谥为匪或鸡？谁又愿意自己的子女效法自己的"炀"气，子承父业地成为新一代的匪与鸡？情感问题容不得讨论和争辩，当情爱被放在水泥台子上解剖，当深情被肢解分类成"有私无私"、"有价无价"、"献出赞助"后……，这情感已被理性重新排列、选择、组合，全然失去了真谛，流入宣传之中去了。

书归正传。

隋炀帝干的一件大事，是人人皆知的开运河。从大业七年(612 年)看，大运河北起涿郡，南至余杭，以首都洛阳为中心，全长 5000 余里。运河旁边有御道、有驿站和离宫，遍插绿柳、水影天光、百舸流动、气象繁盛。虽然杨广是为了玩，但提供了南北交通的便利，加强了文化交流，繁荣了商品贸易，其功大焉。

杨广除了爱玩，还三次征讨高丽。沿运河至涿郡，整军备马劳民伤财，三次征讨无功而返，把他老爸穿布衣戴铜片几十年攒的家业败个净光，一个大子儿都不剩……弄得民不聊生，士兵逃亡，农民起义。这回杨广真是"炀"得可以了。他也自知无回天之力，于是心安理得地总结道："贵贱苦乐，没有一定，斩头也不算什么。"一句话，死了也值了。

不久，这话就应验了。公元 518 年，杨广 51 岁，自解巾带让叛兵勒死。

隋朝父子俩与秦朝父子俩惊人地相似：父辈是治国的法家、精英加兵家，子辈是玩主、庸才加嬉皮士。父子同缘但不同性，可见人性的差异大



矣，环境对人性的影响深矣。

遗传基因只是在人的生理和部分心理上可以复制，于思想与品德不沾边。不要说98%地克隆，就是100%地克隆，也绝不会克隆出一样的思想和品德。

四、初唐至盛唐史略

公元611年，王薄自称“知世郎”，揭开隋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公元616年，李密参加瓦岗军，这在《隋唐演义》中已艺术地描写了。

公元617年，李渊进占长安。

公元618年，杨广在江都被杀，李渊称帝，号唐。李渊谥号唐高祖。

（一）贞观之治

公元623年，唐统一中国，南北大定、尘埃落地。后，紧跟着就是皇权的争夺，这简直是封建世袭皇权制度下所必须上演的保留节目。唐高祖与赛皇后所生四子，除玄霸早夭，则是长子建成、次子世民、四子元吉，这三人在统一中国创立唐王朝的争战中都有战绩。但李世民却比其兄与其弟多一个智囊团，有学士房玄龄、战将秦琼、程咬金等人所组成的团结的班底。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兄弑弟、逼父交权、终登皇帝宝座，即我们常说的唐太宗。627年改年号为“贞观”。

夺权的游戏规则本身其规定性就是血腥而六亲不认，这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聪明才智的一部分。我们今人可以说东道西，但昨天的事岂是今天能全部说清的呢？粗看上去李世民也不是个好东西，其实呢？他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最明白的君主之一。看来只要是君主，那蟒袍下必掩盖着鲜血。既然是个共性的东西，我们就先不谈这些血是如何来的，只从他穿上蟒袍说起。

李世民小心谨慎地治理他的国家，不久就开创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光辉的大唐帝国。

李世民最优秀的品质是知道忠言逆耳而能克制自己去听别人的意见，这作为一个皇帝来讲是少有的优点。一个人，如没有这个优点，那他的智囊班子等于形同虚设，用不了多久，离心离德，再也没人提什么建议

了，官僚们再也不会为国家兴亡尽心，尽心也没用，反遭祸殃。于是一言堂的风气大兴、满朝内外一片歌德声，社会上下炼丹烧汞、谈玄说妙……这是老套路了。话说回来，除李世民能纳谏外，还要有人敢进谏才成，而大唐可贵之处是这个王朝中还真有魏征那么一批敢讲真话不怕触怒龙颜的高级官员。有敢说的，有耐着性子听的，这个国家还能错得了吗？

一次魏征进宫要见驾，李世民正在玩一只进口的高级宠物鹦鹉。听说魏征进宫，躲之不及，把鹦鹉藏在袖中，生怕魏征看见后奏上一本"君王玩物丧志论"，那自己面子就不好看了。谁知魏征见了李世民，尽谈些国事，没间没完，李世民只有耐着性子听。等公事毕，那鸟儿早已闷死在袖里了。作为皇帝的李世民只有摇摇头，叹口气，令厚葬之，全然没一点儿脾气。当然也有令他太尴尬而嗔怒之时，于是背后愤愤地骂曰："我早晚杀了这个乡巴佬。"怒气消后，也没什么事发生。

兼听纳谏，使君臣和谐而政权稳定开明、经济繁荣，史称"贞观之治"。

李世民优点不少，缺点也不是没有。挺聪明的一个人，竟然也信什么仙丹方术。只此一条缺点，就足以要他的命。

贞观二十三年(649 年)，一代明君终因要成仙，服丹而亡，享年 51 岁。

(二)中国唯一的女皇武则天

李世民死后，太子李治继位。李治又着了封建皇帝们的老道儿，太不成器。这和他爹他爷爷相差甚远。李治看上他爹的姬妾武"才人"，也就是武曌，后人称武则天的那位，立无字碑的那位。654 年武曌进宫，控李治于掌股。为了达到当女皇的目的，她诛异己、立同党，李治有病也不让人给他医治。683 年李治亡，武曌立自己所生的第三子李显继位，后又废黜，立年龄更小的四子李旦当皇帝。过了七年，她认为时机成熟，于 690 年再罢黜李旦，自己当上女皇，改号南周。

历来的统治者要篡夺皇位和保住这个皇位都是一个血腥的行为，而暴殄天理无非是两种策略：明白无误的镇压或蝇营狗苟的特务手法。嬴政、李世民为了夺权，镇压过；石虎、符生为了保住政权而残害过。当然，告黑状、罗罪名的特务勾当肯定有，或许不屑用之。可是历来的外戚专权就别具"风采"了。自己的皇上老公是死了或是不理政，自己弄个年龄越小越好的儿子当傀儡，召来自己娘家人和亲信，沆瀣一气、朋比结党，非常"理直气壮"地任



酷吏,“梦笔生花”、“无中生有”地造罪名,“依法依律”、“名正言顺”、“为国为民”地除异已……这种特务手法正是女人掌权惯用的伎俩。从整个历史上看,有吕后、有武则天、有慈禧太后,这三位是顶尖人物。

单说武则天,此女士更有创新。她手下最亲信最得力的酷吏加特务头子叫来俊臣,而来俊臣的传世名作即《罗织经》。

《罗织经》乃莫须有式的制造空穴来风之罪的经典,一如现在写电视剧的“枪手”,凭空能弄出百十来集的剧本一样地有想象力。这本书是《编剧大全》,指导后世特务们如何制造冤案及其基本规则,目的当然是整死好人了。具体步骤:先确定对象,其口号乃保卫国家,其罪名冠以叛国、谋反;第二步就是严刑拷打,这结果更妙了,打死了叫“畏罪自杀”,“文化大革命”时叫“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屈打成招了就更好办,真正地无中生出有来。第三步叫扩大打击面,“文化大革命”时叫“横扫”。让被告在口供中互相牵引瓜葛,纵横串联,点线面相呼相应。“找出一个人,带出一大片”地深挖猛揭,俗称拔起萝卜带出泥。于是一个个叛国的集团、无数个谋反的“一撮”就赫然摆在国人眼前。当然了,最后一步很要紧,也就是第四步,叫“盖棺论定”。把这“一小撮”的成千上万人排排队、理理清,量体载衣、量头做帽。使其口供与罪行相吻合、口供与罪行交相印证;丝丝入法网之扣、条条住不赦之纲;回目清楚、罪名昭彰,文字简练、事实清爽,程序完备、举国欢畅……当然,到底是谁真欢畅?后人自有评说。至于用刑的刑法,虽不是美式的七十二种招法,但却是正宗原味的中国招式。光上“枷”一项就有十种,曰:“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失胆魄”、“实同反”、“反是实”、“着即承”、“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原是酷刑,冠以美称,实乃中国人之创举。什么“凤凰展翅”、“玉女登梯”、“驴驹拔撅”、“仙人献果”……连狄仁杰这样的清官也险遭陷害,幸得一男孩拆穿了酷吏的把戏。但武则天弄明真相后,仍是贬了狄仁杰,并不追问酷吏之过。酷吏之间也相互吞噬,来俊臣把周兴“请君入瓮”即是一例。

多行不义必自毙。公元 705 年(神龙元年),大臣们发动政变,束武则天于上阳宫,同年立中宗李显,改回国号唐,当年十一月,武则天这中国唯一的女皇病重死去。

中宗又是个被女人挟制的庸才,公元 710 年终被皇后韦氏、女儿安乐公主毒死。二女士立 16 岁的李茂,称少帝。当年,李隆基与姑妈太平公主起

兵攻入玄武门，杀韦后、安乐公主，逼少帝下台，重扶李旦上台，为睿宗。

李旦和太平公主都是武则天的儿女，李旦就是683年—690年当了七年儿皇帝的那位。此公退养多年，不知是把人世与皇权看明白了还是胆子看小了，啥事都不敢做主，凡要下个什么结论的事儿，定要问：太平公主和李隆基同意否？他这个人满有人情味儿，既不愿害妹妹，也不愿害太子。如此两难如何处置？好在咱中国自有退身之法，真感谢佛道二家之法宝，庄老二人之秘诀。公元712年7月，李旦夜观天象，将有不祥降于帝星，说明白了是他再当皇帝则有灾。于是禅位于太子李隆基，自己筑炉炼丹，服气吞汞去也。712年李隆基登基，号玄宗，改国号为先天。

（三）开元之治

玄宗可不是手软的主儿，713年7月逼死姑妈太平公主，十二月改号为"开元"。有幸啊中国，终于结束了动荡，开始长达近28年的开元盛世。从李世民的贞观元年（627年）至李隆基的开元末年（741年）一百余年的积累，经"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大唐呈现了黄土地上从未有过的繁荣。大诗人杜甫是现实主义的诗人，写忧国忧民的诗见长，写歌舞生平的盛唐就欠了火候。但他在《忆昔》中颂曰：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公元627年—741年，这大唐盛世令一千多年来的中国人自豪不已。海外华人聚集地多名唐人街，可谓是华人对自己祖先曾经体验过的世界级超豪华的一种追忆。

放下这美好的追忆，书归正传吧，历史不能总停留在咱华人的一厢情愿里。

唐朝一直推行均田、府兵、科举、三省六部、州（郡）县两级等制度。这不能不算是托先人杨坚的洪福了。

在盛唐这段历史时期内，可圈可点的事太多，咱们只略提几则。

贞观十四年（640年）文成公主嫁松赞干布。

当时随文成公主入藏的有大批医师、乐师、工匠和书籍，有史、文、经、诗、植、艺、医、历法等内容。中原的文化文明、农业技术为吐蕃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当然现而今的中国公主、小姐们"上"嫁洋人，也是



为了学文明学技术,仿效先人,不可非议。文成公主带去西藏经文较少,成不了系统。以后土蕃王曾多次索求佛经,唐王朝因种种原因没予以理睬。而这时南北两条丝绸之路贸易频繁,印度的密宗流入西藏,该宗在吸收了汉人显宗和禅宗后,在西藏生根发芽,建立了自己的藏密体系。直到今天,印度密宗早已消亡,汉人禅宗则稍有复苏,但藏传密宗却一直深入藏民人心,香火不绝,至今鼎盛依旧。

第二件值得中国人纪念的,是唐僧取经的事儿了。

玄奘,俗姓陈名祎。贞观元年(627 年)混入饥民队伍中离开长安,历经千辛万苦于次年夏到达天竺。在天竺他朝拜了六大圣地,于 632 年进烂陀寺研习佛学,曾多次宣讲《摄大乘论》和《唯识抉择论》。他精通梵文,若干年后很多经文在印度失传,反是印度人取回中文的经典,再翻译回梵文的。而这些中文经典,尤其唯识宗的经典则差不多全是玄奘大法师由梵文翻译成汉文的了。

贞观 19 年(646 年),玄奘回国抵长安,带回佛经 657 部及许多佛像。此后他在长安大雁塔专心译佛经 19 年,还把老子的《道德经》也译成梵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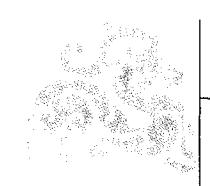
一时感慨插一句,“高僧不忌道,高道不忌僧”,连玄奘大师都能热爱和翻译《道德经》,可见是佛道本一家。但时下却不然了,学了点儿气功,就敢称自己是佛门或道门之人,是什么佛家或道家气功,是全世界顶尖唯一正宗的真功。于是相互发“黑气”厮杀“切磋”就难免了。呜呼! 佛道精髓安在焉?“与人为善”和“从善如流”都不如什么场、什么功正宗而值钱了。

玄奘大师长年辛苦,于 664 年圆寂于长安玉华寺,葬于河东府终南山下。他的《成唯识论》创立了唯识宗,又称法相宗,此宗远流日本。他的《大唐西域记》更是一部地理、人文、历史的原著。吴承恩的《西游记》以他为主角,实在是人心所向,是人民对他的肯定。

这个盛世时期,僧人的贡献尤其耀眼。有一行和尚制定的《大衍历》,有鉴真和尚东渡弘法,有日本来华学习的“遣唐使”。长安简直是世界性的商业、宗教、文化中心……

辩证法就是阴阳相冲相继啊,极盛已孕育了衰朽,物极必反是历史本身的轨迹。

我们这一节主要是讲公元 220 年—741 年,从魏晋到盛唐的历史。下笔近万言招人讨厌了,诸位见谅。



第二章

从建安七子到饮中八仙

我写这个小册子，主要是以禅来静观中国人的历史，及由此产生的中国人的思想和情感。题目太大，弄成浅说略说的一家之言；能力不够，又试图想说明一个问题，所以纹理杂乱就在所难免了。

在第一、第二两部分，我们都是分为四章来讲的。第一章讲历史、政治；第二章讲思想流派；第三章讲中国人由政治、思想产生的特有的情感，尤其表现在文学上的特点；第四章讲宗教和人性的发展。在这第三部分进入唐朝后，中国的思想流派已归单一。儒家为主，道释为附，所以这第二章就略去，因此从第三到第五部分都只有三章。即：历史、政治为第一章；文学、情感与审美为第二章；宗教、人文为第三章。尽量还大家一个简约和清晰。

此章略述一下中国人的情感发展脉络，当然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试图看清这个脉络。

一、建安的慷慨与正始的伤感

建安文学，指三国时期以魏国曹操父子三人为主形成的一种文学。其特点是具有一种慷慨悲凉的内在冲动，但又理性地同情人民和反映社会，这种色彩与风格称为“建安风骨”。

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指三曹、七子和蔡琰。

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



七子，指孔融、王粲、阮瑀、刘桢、陈琳、徐干和应瑒；

而蔡琰就是"文姬归汉"的那个写《胡笳十八拍》的蔡文姬了。

我们无暇过细地讨论他们的作品风格、思想、写作特点等等等等，我们只希望透过他们的文字能真正体会到他们真实的情感。

（一）建安文学

先说曹操，在《三国演义》中此公是奸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般地自私。拿现在的话叫只讲功利和实用，不讲奉献的人。一说起这种人，实是叫人有说不完的讨厌，只为自己想不为他人想的人，怎么数落他也不过分。但再深入地思考一下，他的那个只为自己想是为什么？亦或是说他的人生观是什么？他活一辈子为了什么？如果只为自己的私利，让人骂也就罢了，如果为了国家统一和人尽其才在奋斗，一生中只为自己的这个目标努力，不顾忌他人利益，如此，此人总还算有可取之处。隋文帝和唐太宗都是沾上血后才套上蟒袍的，大家不是也默认了么？所以杀不杀人，负不负天下是次要的。后人对曹操的贬斥一则是他要挟汉末的皇帝，这就犯了上，而深层次的原因是他居然敢和刘皇叔作对。请大家小心了，正统的儒家宗法思想、君臣思想在作祟。虽然蜀国兵败，刘备死于白帝城，那也不能以"败者贼"论处，乃是天时不对，地利不佳……虽败而犹荣，有个大大地"义"与"气"在，是个"义贯长虹、气浩千里"的大英雄。而曹操就是奸贼了，赤壁之败活该，烧了胡子与长袍怎没烧死？而且此贼忒不是东西，要不是关云长华荣道饶他狗命，如何能再张狂？退一万步讲，被人救命，则应"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回家后备上三牲六畜，定做各种大刀，买下千匹赤狗马、赤鼠马……双膝跪下来向关圣谢恩，发毒誓再也不犯蜀境，这样做才对。但这种事情世上少有，恐怕要拍电视剧《三国新演义》才有指望欣赏此景也。

何以至此？只因一个姓刘一个姓曹耳。

曹操此人的报负是什么？

他在《短歌行》中说：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作为一个大政治家，他根深蒂固地有儒家情结。希望国家统一，

希望天下如周公在世一样文明而有“礼”。虽然这“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是讲他爱人才、力图学周公吐哺，让天下人才归于他麾下这一“枝”。但从他所举的例子中不难看出在他深厚的情感之中，儒家情结理性地埋藏在最底层。也许他并没意识到，因为这是历史和环境、汉朝之儒与秦国之法作为古今之鉴后，在他潜意识里的积淀了。

他对人民同情，他反对战争。他在《蒿里行》中写道：

“铠甲生饥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

——他对道家方术大不以为然，对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似乎也有异词。在《龟虽寿》中他写道：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看来练成龟和龙也难免一死了。这儿咱别夸奖曹操是唯物主义思想家啊、是现实主义伟人啊……不是这般说法。只是曹操从心理上就讨厌方术丹汞那一套装神弄鬼的伎俩而已。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别倚老卖老。志不达，老又能奈我何？看来曹公是把志向放在年龄前，是更应让人佩服和更应具有的品质与资本。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天”与“养”，二者辩证。只要尊重这二者，即可以活到你该活的日子。

曹操看明白了生死，悟了人生的道理，于是认定此一生要立志干大事。当然，为这大事也就不怕负天下人了。其志向比起庄子就显得生动和热烈了，其气势超过庄子的九万里。

在《观沧海》中他写道：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壮哉！美哉！据说这是曹操赤壁大败，从关公刀下逃生后，一溜烟跑到青岛观海而作。我不知真伪，但我实实在在服了这位曹公，服他的胸怀与气度，虽然这里有一丝丝的凉意。不是他那理想凉，庄子的“天马行空”那种凉曹操没有。一个身为游侠，一个身为将军，其思想境界庄子凉而曹操热，凉的是二人都“独往独来”啊。真的有人能理解他么？怕是





没有。所以凉，凉得有时不堪回首。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董仲舒那四时五行的"儒"与秦皇汉武气象万千的法，实在是网络的两个端，用力地拉扯着曹操。这是有头脑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所必遭的磨难。当这种拉扯到了极限，人的韧性到了极限，其归宿必然地是借点儿酒，后，由外在的锋芒向回敛、敛、敛……到反观自心、自身、自性。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返观自心，原本青青也、悠悠也，看来曹操并没喝醉。什么意思？这属于禅了。每位都请在自己没完成一个事业或完成一个事业后反观一下自心，无非是曹操的"青青、悠悠"。当然也可以说是禅师们讲的"历历、如如"。这是人生的最高的体验啊，本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不可言说的事。曹操毕竟是个大政治家，在自己心性深处反观之后，只这一瞬的时间，他复又归于理性，说：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奸劲儿又来了，一闪的真性过去，戴着面具的将军又出现了："为了你这人才啊，我一直想你等你啊。"虽然这是真话，但这已是理性的加以粉饰后的真话了，情绪之极的点已经过去，"我就是"的体验派转变成"我说是"的表现派了。

佛说人的思想是一刹那、一刹那地在变迁，一点儿不假。

我们再讲得精简些。

曹丕说："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曹植说："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刘桢说："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

处在农业经济的前提下，处在封建专制与儒家礼义的网络中，当"四时五行"、"人生苦短"、"时不再来"种种观念冲击着理性的志向时，没逃于酒醉、没隐于山林、没烧得说胡话，就已是大英雄了。"穷而后工"，让三曹有此感叹，也是人生的一种终极体验。

当志向与命运冲突时，其深藏的是人性之灵气与网络之冷酷的冲突。

更为难以梳理的死结，即：志向源于对网络压抑的不满，而志向的目的是加强这个网络。这是一个悖论，是无法解开的悖论，于是建安风骨就呈现出感人的难以言尽的慷慨与悲凉。

总之，建安文学是痛苦的独立思考后的产物，是儒、法、道、兵，纵横诸家冲突、融合、再冷凝固化出来的文化精品。

（二）正始文学

自汉末的党锢之祸，魏晋的杀伐以来，这记忆犹新的历史渐渐磨去慷慨的悲壮与豪迈，现实社会总是摧残着人的报负和志气，清谈与道学使文人们走入崇尚虚无和伤感之路。这就是正始文学的特点。

正始文学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和嵇康。

阮籍在《咏怀》（八十二首选一）中说：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社会的动乱，已完全失去了宽容度，人们也完全失去了希望。作为文人在这种历史时期，连个呐喊的气力全无，只剩下彷徨，坐立不安地彷徨。阮籍、嵇康这些正始文人，虽胸怀汤火但终身如履薄冰，用现在的话说是有劲儿没处使、不敢使。这种心焦是知识分子对那个社会的憎恨和否定。对于阮籍这已经够了，不能鼓励他揭竿而起去造反，或是去当什么山大王。

综上所述，建安的慷慨，如果认为它是对社会还有希望，也很渺茫；而正始的伤感，则是这最后希望的破灭，现实的无情到了连一点的渺茫都无人施舍的境地。

二、“归去来兮”的陶渊明

东晋文人陶渊明，名潜，字元亮。他 29 岁出仕，报负无由施展，39 岁归田亲自参加劳动。

在他的诗句中，可以看见他每日的劳作情况：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他对自己从仕途上退隐下来的这种“不上进”、“不进取”而“颓



废”的思想是这么评价的：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他的“颓废”和“不上进”，把精力转向一种对大自然的品味：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真地这么悠悠然？非也！在《读山海经》中，他以古人喻今，道出内心深处的报负：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这才是诗人压在最心底里的悲愤与呐喊。这种呐喊并不是常人可以理解的，这是对人生意义所具的悲剧性的悲愤与呐喊。从哲学意义上讲，人类的最终极意义是什么？凡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的人，才能读懂陶先生的心灵……

陶潜先生生不逢时，只有蓬累而行也。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这种无法言说的痛苦，透过诗句透过这些似乎不含任何情感倾向的诗句表述出来，这，才是真正撼人骇人的悲痛啊。换言之，这也是陶先生明了了人类最终极意义以后的感悟……一如悟道一般啊。懂的人一笑，不懂的人也一笑。

我喜欢于平淡中看浓情，喜欢于浅笑中看深痛。我为一个人要隐藏的东西而好奇，更为他的隐藏本身而心动。说什么王谢堂前，说什么金榜提名。但愿遇上好时光，莫学陶潜那“木欣欣以向荣”……

在中国文学史上，历代的文人并不去批判陶先生，反而都歌颂他不与乱政合污，能坚持自己的志趣，走洁身自好之路，这恐怕和陶先生本是儒家有关。而历代文人们对沾有法家气味的曹操则没那么宽容了。当今的文学批评家，连儒家的那点儿宽容都没有，他们自视很高地评点陶先生，曰：“从他放弃理想而归隐看，具有消极避世的思想，这不值得学。”云云……把自己放在比前人都高明的位置上，其本身已值得商榷。让我们静下来反思，这难道不是我们的偏见么？我们现代的中国人，靠奋斗和革命才赢得民族独立和尊严，这是“突变期”的必然。而一切进入和平建设的

“进化期”时，人性的多样性发展就是繁荣昌盛、百花齐放的必然了。于工作之余或退休之后，该种花的种花、愿养鸟的养鸟、杀生的去钓鱼、不杀生的研究一下禅……这一切本是再正常不过的幸福生活。有了房装修好一些，有了钱置辆汽车，一切乃欣欣向荣之自然景观，真不知这些人性的追求在和平时期怎么叫避世和颓废？非要每天七个不平八个不愤地念念有词？非要到国务院上访处讲清楚谁对谁错？

极“左”的流毒不只在理论界啊……我们已被毒害过，今日去之不及，那就不要再捡起这玩意儿当什么高明的法宝，坑害自己再坑害子孙。

让我们沿着陶先生的思绪追寻下去，从《桃花源诗并记》中，可以品出他对理想国的描绘与假想，这种描绘与假想具有诗人气质般的美……

别去乱讲这是什么非现实的乌托邦，哪个理想不是非现实的乌托邦？晚点儿下结论，陶潜不是制订五年规划，而是在抒怀啊。让我们带着情感去品……

平淡平静的桃花源啊，溪流潺潺、落英缤纷，淡而愈深的美啊，把我们带进一种自由自在的意境……美得不可说，不可说……美弥散开，充溢整个心灵。

“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三、南北朝文坛的盛况

如果说第二部分从战国至秦汉是中国思想界的百花齐放时期，那这魏晋南北朝部分，则是文学上的百家争鸣了。

上边两小节讲的是魏晋，而这小节讲南北朝，此时的诗人首推谢灵运与鲍照。

文人们清谈，这虚无也总不能谈个没完。当连服药都成了社会之风气后，士大夫们的优越感就要另找出路了，否则还怎么能体现出优越感？一如现而今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暴发户，为一展有钱之气象，于是下酒楼斗富，拿钱码长城玩儿。当此举已不再那么“壮观”后，改为街上打“大哥大”，反正是哪儿人多他那电话就忙。而当小摊上的假大哥大足以乱

真，大哥大的名称也降为手机后，就改成开豪华车。有事没事，以车代步，连下楼为小蜜买根冰棍这几十步之距，也必掉头开车、买、再掉头回来。于是弄得城市不像城市，整天雾气沼沼地。大小真假官员、大小真假大款人坐一车，街上、胡同、房前、房后、树下、桥上，哪儿都是车，连上个厕所也得绕过几辆夏利、大发、212。再往下是什么？不得而知。但咱们知道的是南北朝文人经陶渊明的启发，开始作山水诗。这倒是让效仿者难以“傍雅”了。嬉皮士好当，雅皮士难学。媚俗只要脸皮厚，媚雅却怎么也得先学个三脚猫的功夫才成。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

梁齐的山水诗代替了东晋的玄言诗，是南朝诗歌发展上的重要变化。

在北朝，以“鼓角横吹”之势，以“风吹草低见牛羊”之开阔的视野为初唐边塞诗在气势和眼界上做了预演和准备。而南朝山水诗，则是为初唐田园诗情景交融之美先打好了写景之根基。

谢灵运(385—433)一生不得志，遨游山水以排遣对政治上的不满，他是扭转玄言诗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个诗人。但其才气就不好说了，所以咱不再举例。

鲍照(414—416)是使七言诗最终进入文坛之人。循其源，先秦的正统诗歌是四言的《诗经》，七言诗不入流，只在民间流传。到两汉，七言的民谣和谚语逐渐增多。到魏晋，有建安曹丕的《燕歌行》，是以七言写的乐府诗，还有西晋傅玄的《四愁诗》也是七言，总之是上不得台面的一道风情小菜耳。鲍照以其强烈的情感、顿挫的音节变化，使七言诗步入正统诗坛。

我并没学问去讲文学史，也没那胆子。我只依我的爱好，讲我认为的道理，所以请大家再次原谅了。

下举两例，以说明鲍先生之情感和他在音节上的雕琢。

拟行路难　(十八首选一)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

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在鲍照的时代，世上无路可走，除非与门阀有关系，能被推荐当官。在封建社会官本位的道路被门阀所霸占后，那文人们只能“行叹复坐愁”。学了儒家的诗书礼仪，无用武之地；学道家丹术仙功，玄谈已厌，于

是人性被网络被观念压迫得没一丝缝隙。压迫越深，反抗愈烈，鲍照明白了一个道理——“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性和人的志趣本不是“官本位”一条路，越步入文明，越应是多元化的多方向的发展。明白此理，告之后人，但自己仍是无路，鲍照也只能做到这一点。

从情感上看，中国人在儒家礼教的束缚下，一切外冷而理性十足，像这种直抒胸臆的东西不合时宜也显艺术手法不高。一如当代的一些通俗歌曲，热烈而直白，“爱你没个够”、“我的爱是一把火”……如此这般。更深一层次的艺术作品，一般是以平淡见真情的。这种直抒胸臆之法难以达这种顶峰的艺术层次。当然只是一般来讲，只有极具冲杀力的、极具情感情绪的作品，才能以此艺术手法达到最震撼人的艺术顶峰，这实在是少见的。屈原的《离骚》、曹植的《洛神赋》以及鲍照的诗，则是这方面的代表了。

再看另一首：

拟行路难(十八首选一)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

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

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这是讲真话、泄真情的极好的作品。至于他的思想性是什么，他的理想是什么，不值得大家研讨。只是说人性在一个重压下的扭曲畸形状态，这个状态足以让人振聋发聩了。屈老夫子固执地自杀，是一种悲剧式壮观的美；曹植老兄热恋着洛神，弄得自己郁闷不舒，是一种热烈被冷却后的理想之美；而鲍照的拔剑与罢官，情愿看孩子在炕上翻筋斗，看老婆织布，确实是一股饱含“气”之美了。这气难以上纲到义气、正气、节气……你说他没有理想？他学圣贤呢，叫你无法说东道西；你说他是冷点儿了？他有老婆在侧，儿子在前，说不上冷不冷、热不热。那这“气”是什么气？只是“孤且直”之一“气”耳。

总之，在魏晋玄谈之后，文人的情感冲破玄谈开始向四方伸展：有南北朝的民歌和新乐府诗、有讲究形式与对仗的骈文、有既有学术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的散文、有谈神弄鬼的志怪小说、有各种形式的文学批评……有专写色情的“宫体”诗、有对声、韵、调在诗歌上的研究与应用……一派生机勃勃。

从思想与情感上看：建安时期，人们仍怀有希望；正始时期，人们只有



无奈的彷徨；到了东晋，归隐的归隐、研究学问的研究学问；至南北朝，色情诗泛滥……各种思潮随着各种文体的繁荣而泛起……

这是文学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它为隋唐的诗文在内容、形式、技巧、情感等诸方面做好了全面的铺垫和准备。

四、隋唐（隋至盛唐）的风采

百花齐放，必定会有万紫千红。

百花齐放，是人性中情与理的不同方向、不同层次地各自独立地表现。

而万紫千红，则是这种独立从幼稚走上成熟的结果。

文化艺术上的繁荣，总是始于政治上的"乱"，而得益于乱后之定的宽容。

没有"乱"，政权专治且思想禁锢，那这个网络的封闭性不容你有什么百花；而乱后之定的定，如果不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开明，没有一定的宽容度，那百花也不能茁壮茂盛到紫与红，只是一红粉佳丽而已。

一枝独秀成么？只剩下一种花儿在那儿怒放着？我看如同样板戏，早晚是让人单调得发腻。再好的电视剧看上一个月也发闷，唐朝是个正面的好例子，而明清则是反面的教材了。

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一次出城作暗访，他要暗访的内容是本界雅典的执政官能否连任。这位长官口碑一直不错，连任应该没有问题。于是他问一个蹲在墙边晒太阳的老人，这老人听说本界长官要连任，大怒道："我听他名字听了三年，早听腻歪了，说什么也要换个新名字让大家耳目一新才对，这才符合民意。"

看来百花齐放才是春，一枝独秀那是贾府里怡红院中开妖花的海棠。

在人才辈出的这段历史中，我们只撷取几枝，简要地说一说诗歌表现出的唐人在思想和情感上的变化。倘若有幸能讲出美学上的意义，就算蒙上一回。实话实说，诸位莫笑。

（一）初唐四杰

隋及初唐，是诗坛百花向万紫千红的成长过渡期。

这个成长和过渡，表现在摆脱齐梁宫体诗浮艳呆板的气息，开现实主义田园、边塞之风。

初唐四杰指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0—684）。

王勃，少年才子。可谓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之士。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乃千古流传之精品：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寥寥数语，道出王勃有一股"好青年志在四方"的豪气。友情虽是人间最珍贵的东西，但面对三秦大地之辽阔，于通向全国之五津渡口前，为求仕途之游子，应割舍儿女情长，拼搏一番才是正道啊。至于友情，只要一个真，又何必再乎远在天涯海角呢？心心相通则如比邻啊。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能抛开父母远游，其气势与心胸是后辈诗人所不及的。

王勃的追求"上进"可以和鲍照、陶潜成一个大的反差。这当然是源于王勃没当过官，尚不知其味，年轻气盛之故。但更主要的是初唐的网络松宽，并承隋的开科举之制，这就为贫寒儒子们在官本位的系统内开了一丝窄窄的门。虽然窄，毕竟门已开，这真是值得年轻人抛父母离朋友去宦游一下的理由啊。

我们在这里不是弄什么文学赏析，所以只是信马由缰地说开去。

在古人描写生死离别之情的方式中，常常用两者之间的空间距离和两次相会之间的时间距离来描写此情。王勃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强调其情之真，把空间上的距离不放在眼里。

《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与王勃此诗的寓意相反，它是说因门第观念的隔阻，相距很近的情侣却如远隔天河啊：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这是说王母娘娘不让二人相会，惨了。虽然两人中间隔着个银河，但这银河又清又浅，根本不用"摸着石头过河"，蹚几步水就可以过去，可以相见说上心里话。但因王法所在，谁也不敢过，只能隔河眉目传情了。这是距离虽近实远的例子。

而王勃认为情为第二位的，男子汉大丈夫第一位的事情是干一番事



业，所以要先宦游去，而情么……只要永志不忘即可。

这又使人不禁想到宋朝的秦观，他也是拿时间的间隔来做文章，他在《鹊桥仙》中写道：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看来秦观是极重视情的质量，只要是久长之真情，那就不在乎一年才能见一次。他是把情"真"放在第一位了。

王勃最著名的散文，则是他的《秋日登洪府腾王阁饯别序》。在这篇赋中，很多词句都成了流传万世的佳句或索性成了成语。

如：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高朋满座、腾蛟起凤、渔舟唱晚、雁阵惊寒、时运不齐（济）、命运多舛、老当益壮、达人知命、东隅已逝、桑榆非晚、胜地不常、盛筵难再……

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

……

天晓得王勃对中国文学上做出了多大贡献。更可贵的是年轻气盛又不失老成，这在中国文史上实为少见。真可以说王勃这种人才，只能源于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同时又源于一个智慧的、肯用功又悟性好的、能博采众家之长的人身上。所以他是初唐四杰第一人。

从审美情趣和艺术境界上看，他既肯定了人间"闾阎扑地"、"舸舰迷津"、"雄州雾列"、"俊采星驰"那繁荣的物质文明；又歌颂了"睢园绿竹"、"邺水朱华"、"临川之笔"等精神文明，同时他又更深层次地描写出人性与这现实的冲突。哪怕再优秀的人才，再美好的现实，其网络系统必定会压制人性，尤其是人才的人性啊。因为他们是人尖子，是精英，他们追求的不是物质的满足，而是一种人生意境的追求。所以，"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君子见机，达人知命"、"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物质的要求、艺术的要求，这二者是下与中的层次，而最高级的"自我实现"的要求、"人格完整"的要求，才是"看山只是山"的层次，这种层次只有极少的人于极难得的机遇下才能完成。只此一点，王勃应知足矣。

我们的文学批判家，在赞美王勃之后，总加上一个尾缀：诗的内容开

拓得不够广。我并不反对专家的定论，我只是说这和王勃之年龄、阅历、志向有关。不能要求人家如徐霞客般地游、杜甫般地苦、李白般地闲。让我加一个尾缀的话，就是：能追求宗教般的高尚境界的人，必须有灵性、悟性。这个灵性与悟性是体验到虚与实、有与无、人生的有限与无限后，才能学到的。一个人是否有这种灵性，与年龄无关。

骆宾王，义乌人，最长七言诗。他的景与物写得很实，却有轻松闲暇的人情味。

〔咏鹅〕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他在写人的方面，深受孟子、墨子的义与气的影响。

〔于易水送人〕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杨炯与卢照邻不再介绍。

（二）陈子昂

陈子昂（661—702）字伯玉，射洪人。

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贡献，是以他为界，于此前的古诗称旧体诗，于此后强调格律的绝句、律诗等诗称新体诗。他在《修竹篇序》里，提出了诗歌革新的主张，标志着唐代诗风的革新和转变。

他的诗，有一种儒家传统下靠拢道家的情趣。仔细地体验，可以说是孤独的美，这和当时禅宗开始流行有关系。

〔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前不见古人”，乃是古人怎会有唐初的文明呢？无此文明怎有此种人？所以没办法效法前人，只有自己走出一条路。

“后不见来者”，乃是后人随社会进步，文明趋于高级，那又有谁能理解他的情感世界呢？可见真是空前“独”后的“唯我独尊”。

“念天地之悠悠”，老天本是这个样子啊，空广深邃，谈不上有情无情，但它又笼罩养育着万物及大有情。

“独怆然而涕下”，这是人类独有的情感了。它不是哭天喊地，不是拔剑拍案，不是缠绵悱恻，不是金刚怒目。对宇宙无限之体会，对人生有限



之明了……如此心境下放眼望去：幽州台尚人去台空，这满目可及的一切哪个不将归于空？只是早去与晚去之别啊……

你真的体会到这里，心灵将为之一颤，怎么能不让人落泪啊。

（三）盛唐山水田园诗人

到贞观（627年）时，大唐进入盛世。

科举制自隋创立，到此已近半个世纪。文人们从这狭窄的间隙中由此岸看到了彼岸，这是希望，也是无形的动力。南北朝时文学的百花齐放至此已趋于单一——诗歌。可能文人们都忙着应考，所以什么散文、文艺批评、志怪、游记、传奇全都趋于暂停的冬眠蛰伏状态。而文人们把全部创作动力，把自己的理性与情感都投入到短小精美的诗歌创作中来了。当然，我是说除了他们科举所必学的科目课程外的创作。

这一时期诗人主要分山水田园诗人和边塞诗人。同期的有李白和杜甫，因为杜甫是经过安史之乱的诗人，所以我们划到中唐去讲。

先说一说山水田园诗人。

此类诗人的形成，其外在因素是社会稳定、生活悠闲、读书之余有暇风雅与抒情。其内在因素是大乘佛教的流布与禅宗的日兴，尤其是承袭陶潜、谢灵运对大自然的审美情趣。

我们太习惯一谈山水田园，就归结到对政治上的失望啊、受老庄的影响啊……受了什么打击啊……中了什么邪了？我是说咱们中了什么邪了？有的人受了打击一辈子痴心不改、有的人天性爱田园、爱那清闲。就算挺上进的人，闲暇时咏山咏水、画虫画草不可以么？人性从种类上看有理性与情感，从伦理上看有善与恶，从强度上看有张与弛……一切都在生活之中，生活中这一切都辩证地存在着，此为生活中的人性，非是什么政治中的人性。

打住，何去何从大家心里自有公论。

山水田园诗人，其主要作家是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祖咏、裴迪等人。

社会步入文明，人类有越来越多的闲工夫，现在叫“休闲”。而休闲不是休息，不是简单的一种劳作的暂停。它终将走入休闲文化、休闲文明。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休闲文明，约略可以看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其物

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程度。例如下班后醉酒、赌钱、飞车；或是体育锻炼、听音乐、学绘画；也可能是消磨在勾栏瓦肆之中……孰好孰坏主要还不在于形式，主要在于其中是否具有一定的审美情趣和意境的追求。

感谢初唐山水田园诗人，他们继前人之发端，创山水之意境，品田园之情趣，可以说欣赏和赞美大自然，成了中国休闲文明中的一支。

它不同于下棋、钓鱼、种花、养鸟。因自然的博大，所以形成主观情趣因客观景致不同，而具种种色彩。

①如仙的空幽深远的意境。这种意境的塑造，以一种空、幽的景观，造成一种深远的感受，以此体会出大自然的神圣与博大、广懋与永恒，反衬出人的渺小、有常及命运不定。

〔山居秋暝〕 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鸟鸣涧〕 王维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日出惊飞鸟，时鸣春涧中。

〔竹里馆〕 王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②人间生活的温情意境。这种意境的塑造，以一种轻声软语的语调朴质地讲述一景一物，制造出一种很贴近人性的味道，以使人留恋于人间温情之中。

〔山居秋暝〕(下片) 王维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相思〕 王维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③对未来与未知的一种莫测难料的感悟。如：以对眼前具体细微的人物景致描写，反衬制造出一种不知即将会如何的滋味，使人产生尽在不言中的悬念，表达了担心之情和相依不舍的情趣……

〔送元二使安西〕 王维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



故人。

④平淡无为的意境。如：只是淡淡地写自然景象和人际往来，营造一种平淡的美，抒发了自然无为，没有痕迹又不知不觉的人间情趣。

〔过故人庄〕 孟浩然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春晓〕 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当然，这种类型的分别还很多，好的诗文也很多。我们只为说明寄情田园乃人性文明的一个方面而已，所以以短诗为例，不再浪费诸位时间。

（四）盛唐边塞诗人

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在重新审视儒家时，常常冠之以保守、落后而痛斥之，于是在突变与改革的年代就拆孔家店。但对于儒家那希望和平、在维护国家尊严和国家利益时那么忠君爱国，又常常冠之以愚忠的帽子或爱国志士之“桂冠”，于是在和平与建设的年代，在国家受外族侵略的年代则又重建孔家店。这显然是一种实用功利的做法，可这正是中国特色啊。

又走了板，书归正传。

盛唐边塞诗人，源自当时除科举入仕外，还有一条入仕之路，即：可以在抗击外辱的边塞军队中立功进而入仕。科举入仕与当兵入仕，给了文人文武两条路，于是就有走这两条路的文人。当兵入仕的文人于边塞处耐不住闲，无战事时就看着落日、听着羌笛，手不由得就痒痒，就武文弄墨，于是成就了此派诗人。当然，在中唐后，以武入仕没门了，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再也没能形成第二次边塞诗的高潮。虽然于国家危亡时不乏有文人气冲斗牛，但他们如耀眼的颗颗流星，没有形成流派，可惜。如：文天祥、辛弃疾、林则徐……他们星散于宋元明清的历史长河中，但与边塞诗人不同。

边塞诗人最有成绩者，是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

唐初的战争，是反侵略反骚扰的正义战争。身前是文明程度低下但骁勇善战的游骑，身后是渐渐走上富庶的父老乡亲们及自己的家园，于是

边塞诗就呈现出特有的色彩与情趣。

①誓言式的色彩与为国尽忠的豪迈情趣。

〔出塞〕(二首选一)　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类诗句，其文学上的造诣不要求有多高，它只要求是一种简单、明白、能表示决心的词句。当千万军人异口同声地高喊此句，那场面与气势足以壮军威、撼人心、摄敌胆。如同当今的"保卫祖国"之口号和军人们开会前的"喊"歌，其精炼、上口、简单是其要素，这些非艺术性的共性手法，正是此类"誓言式"诗与歌的关键。

推而广之，群众歌曲一定要如此这般，如果有哪位"大师"非要艺术一下，那定弄砸了不可。法国世界杯足球赛的"杯歌"只是"GO——GO——GO!"谁都万分激动、兴趣十足地唱，因为谁都会唱，谁都记得住歌词。而国内的艺术家显然要比人家"高明"多了，非要把某个甲 A 队的队歌填上这样媚雅的词："××你必胜，我们爱你，啊绿茵草地……你虽败也犹荣，依呼呀呼嘿……驰骋在场上你像闪电、你像风，呀呼依呼嘿……永远争第一。"完了，太艺术了，没人会唱。别管是输球或是赢球，在球场上一急，一句都想不起来了……那唱什么？总要让嘴头上有个东西唱着喊着才叫看足球吧！于是有了，群众自己填词：傻叉！牛叉！简单易记、琅琅上口、人人都会……就是不文明。

但这是谁之过？是那些大艺术家们的过错啊，他们怎么不看看边塞诗人的东西呢？

书归正传。

〔从军行〕(其一)　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只最后一句七个字，就是一个响天彻地的誓言。

②死的幽默与"轻生"。战争，必血腥，必死人。老子认为打了胜仗也要依丧事来办庆功会，以示隆重与极不情愿，因为那时的战争是诸侯国间的内乱。而面对外族侵略的正义之战，死就死得其所，死就是很轻易可以付出的一件小事了。





〔凉州词〕 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有人认为以最后七个字看，显得悲壮与凄凉。又有人认为饮酒以醉生，所以不怕死。差矣！这是一种很幽默的不怕死，很诙谐地对待人生，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啊。比"脑袋掉了只是碗大的一个疤"要美而且有味儿。不是么？我们这一代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被晚辈们讽为"文革作家"、"文革学者"、"知青一流"，我们耽误了十年的光阴，学问肯定比改革开放以后的人差得多。但我们知道好孬，知道味道。你品品这即将醉卧沙场的战士们，他们心底里想着什么？他们有家、有父母、有老婆、有孩子……他们的战友刚刚牺牲……谁愿意死？天啊！这是热血、激情、情感与理性相交织而生出的醉与狂，是爱家、爱国相交融后升华出的轻生与幽默。

当为国家存亡而献生的荣誉，透过血红甘醇的葡萄酒折射在人的心头时，醉的就是军人之豪气；笑的就是庸人之俗气了。这里没有眼泪，战场不相信眼泪。

这种居高临下的气势，幽默轻生的情趣，在后代文人诗中怕是少之又少。"饥餐"、"渴饮"过于生猛，"栏杆拍遍"过于无奈，"勿忘告乃翁"、"我劝天公重抖擞"……都失却了大唐风韵，惜哉。

③军人文人之间相互的激励。以情言志，有多种写法。但名垂史册、流芳百世，是中国人独有的荣耀。这作为信念根植于华人心里，就形成独有的一种意境与情趣了。

〔别董大〕 高适

千里黄云百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有人说，西方文明讲究人为自己而活着；东方文明讲究人为他人而活着。谁是谁非？爱面子，讲情面、场面，是中国人的"两碗面"，都说吃得很累，但又都要吃。依我看，只要是真的，吃吃又有何妨？真的为他人、真的自尊、自强、自重，有什么不对？一切都怕是假的，一边干伤天害理之事，一边说冠冕堂皇的话，还要使自己有面子？秦桧、汪精卫、康生都这么干过，没干成。

④对戍边生活平淡无奇式的描写。于风雪严寒中戍边，于烈日融金

中站岗，其艰苦难耐不言而喻。作为一名保家卫国的军人，他那丰富的情感与坚毅的理性随着岁月的流逝已不是豪言壮语可以囊括得了的。誓言的冲动后面是长期的平淡无奇，是日日相似、月月相同的紧张的心情、凡俗的生活与辛苦的工作。往日的激情已经化为一种淡淡的审美情趣……不论是对大自然或是友人，此情趣透过理性地直白描写而绽出朵朵朴素的小花儿。

这种平淡深远的意境，于后世诗文中亦很少见。它不浓不艳，非空非禅。但深悟此情，却可以透过平淡的自然景观看出那平静理性下蕴涵着不平凡、不平常的激情、热情，这是情与理辩证合一的美。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岑参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一个人，当他向外探寻时，总会探到无限的领域。天之阔、海之深、地之宽……四季轮回、年年相继，生老病死与代代相传、成住坏空与时空无限……这时，此人的心绪在无限深远的不可探索、不可探寻面前，就会很奇妙的转向，转回向内心探索探寻。岑参送友，武判官走远，山回路转不见身影了，那身影归于一片茫茫的无限之中。于是视线会从“天山路”的远处慢慢回收，沿着友人留下的足迹往回查看，一直往回查看。可客观世界是一片白茫茫，而内心主观世界呢？练功的人都知道“孤明历历，历历孤明”，也如外界一样啊，主客观、心内外这次是一致地茫茫然。胡琴琵琶与羌笛是昨日，昨日已过；刀光剑影与鲜血是明天，明天未到。此时又内外两茫茫，只留下一行马蹄印。他之所以不随友回京回家，因他是军人有岗位有责任。而生活总是起起伏伏，总是欢乐与悲凉相继，在这起与伏、欢与悲相互转换的这个点上，仍只有白茫茫一片。

所以细细地品，岑参此首诗与其说是写军旅生活，不如说是很好的参禅诗啊。

(五)伟大的诗人李白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李白是盛唐诗坛的代表作家，是正统文史所承认的、继屈原之后的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从浪漫



主义这个文学角度看，确实如此。他的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表现手法达到了高度统一。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从文学流派的角度看问题，而是从思想与情感看问题，那么就能更准确地理解他的作品和他人性的特点。

让我们先看看一般正统文史对他的评价。在文学史上，认为李白思想是复杂的，作为一个诗人，他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酒徒等人的气质。

——看来属于地道的无政府主义者。

他一方面受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要求“安社稷”、“安黎元”；另一方面又受道家、庄子的影响而遗世独立、追求绝对自由、蔑视世间一切。

——典型的进退自如，儒道合一。

他把“儒道侠”三者结合起来了，“功成身退”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人生如梦、及时行乐是他消极的一面。

以上是正史的评价，这当然不能说不对。但我总怀疑单从一个人的思想来界定一个人，始终是很危险的事情。思想原本很抽象，从一句话、一首诗上溯追出一个人的思想，再依此把这个人分析肢解成若干部分……这个方法咱们“文化大革命”时干过，大有来俊臣《罗织经》之遗风。

既然人性含有人的情与理，那为什么我们不从他的作品中去体味一下情感，再去了解一种思想呢？直接从思想入手，摒弃其情感情绪，怕是失之偏颇，也流于肤浅。一种思想只是骨，没有血与肉，这个思想如何成立？而一种情感情绪却可以不依什么思想而存在。一个小青年见一美少女，心为之一动，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思想，只是本能。当然，无思想支持的情感虽然能独立，却不长久和不高级。只靠着本能、反射或冲动就想成为大诗人的事儿，怕是不成。而情感的冲动与深厚的思想性相结合，才是诗人之所以是诗人的关键。

所以，看一个人，尤其一个有名气的诗人，必先揣摩其情感，然后方可说三道四。

书归正传。

咱们先把眼光移开，看看盛唐时长安发生了哪些与文人有关的事儿。

〔饮中八仙〕 杜甫

知章骑马似行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阔论惊四筵。

——这八位知识分子，有当小官的、有佛门居士、有书法家、有诗人、有纵横家。好了，在长安街头跳井的、追酒车的、摇摇晃晃的、横躺竖卧的、脱帽露顶的、旁若无人开牙大侃的，好不热闹，一派无政府主义之混乱景象。咱中国人连路上有个逗蛐蛐儿的都围上一圈人看，估计此八位爷身边不聚万儿八千人，也有五六百人起哄看热闹。在明清两代，此八位爷与围观的五六百人，必定被东厂西厂或大内高手擒去修理修理，拿一下"笼"。但在唐朝，此八位爷与这五六百起哄喝彩的人，加上杜甫，却是风雅之最，雅皮士协会的成员了。大唐其盛，盛在能容忍这一切，其宽容度也大得可以了。

据史载，唐初长安，一般的妇孺在汲水劳作和玩耍时都会随兴致吟上一首诗，可见唐诗如同民歌一样普及。同样，当时的诗人名人亦和市民一样，其行为举止也随便得很。并不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在装样弄个与民同乐的姿态"秀"一把，而是他们那时的身份如同草民一样，不需要顾及什么体面。为什么？这需慢慢道来。

从门阀贵族与非门阀草民的阶层划分看，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与鸡鸣狗盗之士、引车卖浆之徒同属草民这个档次，他们还未晋升到士大夫这个阶层。在此之前的士大夫，是指门阀门第的知识分子，而在科举之后的士大夫，原本应是"仕大夫"，是不论门第以科考中举入仕后得名的，但出于习惯，一律称为士大夫罢了。随着科举的施行，越来越多的草民知识分子因中举入仕而挤入上层社会，他们出于本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开始没落的门阀文人有所疏离。而门阀士大夫与中举的士大夫之区别，前者贵族气十足、后者市民气十足。如此一来，随自己性至或随自己兴致而载歌载舞、饮酒赋诗，就是新兴的中举的士大夫们的特点了。这里少了束缚，

多了任性，他们愿意以首都街道为舞台在这里展示自己的风采，愿意让民众围观喝彩……如果这时来个晋代服药的文人，以满地打滚而装高雅，这五六百围观者定然把他送到安定医院；但这八位名人别说打滚，任何一举一动都会博得市民热烈欢呼。以情感说这些新举知识分子们的思想，很简单，即：他们大声地向世界宣告——我来了！

如果说屈原是浪漫派诗人，那其必然的是贵族文化中的一支，而李白的浪漫主义就入世和平易近人多了。

如果说老庄是虚无孤独的思想者，那李白则是极入世的民间诗人，只是他追求的意境太高，沾上虚无孤独之气耳。

新兴力量，一般是无所畏惧的。所以李白在情感上绝不掩饰收敛，而是喷薄而出、一泻千里。在其情感的浓度上，他认为平常比兴已不能表达自己那难以言说的体验时，就大胆地采用夸张、极度幻想，甚至引神话为己用。在他情感要宣泄时，即以酒为引子，一切依情绪写作，不管这时皇帝老儿找不找他。这一切造成他的行为、思想和作品都具有叛逆之味与豪放之风。其实他只是他，何尝想弄个什么味儿，整个什么风儿出来哗众取宠？

随历史进步，门阀消亡，科举入仕成了唯一正途。竞争使文人们不得不依儒家法度收敛而中规中矩……到了宋明，又弄出理学……举子们全没了豪气，呆劲儿十足……长安街也再无这八位爷与那五六百观众之景矣。

下面以几首小诗为例，细品李白的思想与情感。

〔独坐敬亭山〕　李白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李白似乎在称赞敬亭山之美，实是对永恒的一种欣赏。凡永恒不变的东西，少了热闹或冷清，自然而然地不让人注意，一切随大道而兴衰变化。有限向无限的追求，有常向永恒的想往，永远是美好的。

〔长干行〕　李白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

——青梅竹马一词，源自李白这首长干行。这里只是李白对自己熟悉的生活进行白描式的记述，非什么浪漫主义艺术。但新兴文人那种自

信，那种什么都敢入诗的胆略，已使人佩服之致了。

〔将进酒〕 李白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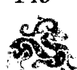
——此诗前两句，是对人生易老且终有一死的感叹，并且是全诗立论的基础。

第三四句，大有及时行乐的意味，一掷千金的奢侈。而且世人也常常于发烧之时，说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自己首先没搞清自己是什么料，更没明白人家李白是什么意思。

及时行乐，就是有一种危机，怕成饿死鬼那样的危机。于是撑死也不做饿死鬼，赶紧行乐去也……但李白讲的不是及时行乐，他是在歌颂一个东西。什么东西？

一掷千金，是功利性的行为。或为摆阔，或为搏得女人欢心。为赈灾一掷千金，就叫无私援助了，是同情心。而李白的一掷千金，是让你别在意金钱，那他在意的是什么？他为了什么事又及时行乐又一掷千金呢？

此诗名“将进酒”，“将(qiang)”，由“带领”的“带”推及与之相似行为，引申为“拿”。如“将酒来”就是对堂官说：“小二，拿酒来！”在此诗中它则含“带”和“劝”的意思了。为“带着××人喝酒”，或“劝××人喝酒”。既然是劝酒所说的话，后整理为诗，那此诗就有很强的针对性了。看来和李白喝酒的这位朋友是个固执死板的人，不知是因为下岗了？生活有困难？还是婚姻上失恋了？反正是大大地想不开。既有“万古愁”，那离自杀或疯了就不太远。对如此一位仁兄，李白在为他做思想工作，于是把他劝到酒馆来，开导他。因此，绝不能把酒桌上劝解人的话放到放大镜前审查一下，再查一下三代，定个莫须有的罪名。当你的好友得了癌，他又想不开要跳楼，你怎么说？你绝不能说：“跳呀！省了治病钱又为单位甩了一个包袱，省得家人操心，一跳了之，欠别人的钱也不用还了，多好的事儿！快跳啊！用不用我推你一把？”你多半会说：“放心！没关系，吃好睡好(及时行乐之嫌)，钱不是问题(一掷千金之诺)，女人还不有得是(玩弄女性之嫌)？好好活着(没有生活目标，没有革命的远大理想)……”人性原本如



此的事，真怕一些人又研究又分析又上纲。

李白通过人生短暂，劝其友珍惜人生的欢乐和可贵，对自己要有信心，要战胜孤独，要学会生活，这没什么不对吧？当然，这是较浅层次的东西。而深层次，则是李白在歌颂人的灵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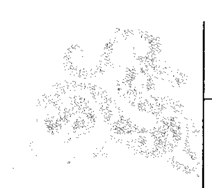
灵性，是人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根源。灵性这东西很害羞、很受情绪影响、很怕压力。它时常很娇嫩，常常需要他人为之鼓励和喝彩。一旦没有这些鼓励和喝彩，它就显得寂寞无主……长此下去，会枯萎。佛家管这灵性叫佛、叫菩萨……我讲的这些话，不知能有几个知音啊。

看来李白所劝的那位仁兄，正是这样一个极有灵性和悟性、品位极高、趣味极高的才子。但因某种原因不畅不乐，所以值得诗仙李白为他花钱劝酒，连卖了裘衣（赛特买的，正宗皮尔卡丹名牌）和宝马（高级豪华轿车，比桑塔那可强多了）也在所不惜了。

李白一节，草草写到这儿，真正艺术上的造诣我们放到后面讲杜甫时一并比较着去讲。

这第三部分第二章"从建安七子到饮中八仙"终于讲完。我们不再小结。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坛百花齐放的时代。步入隋唐，随着科举的稳定，文人们只在诗歌上先成熟起来。诗的形式虽比百花齐放时有所单一，但其诗所涉及的内容、其情感的丰富、思想的多端，堪称唐诗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艳。



第三章

禅宗的建立到六祖慧能

在中国的历史上，如果说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形成了思想政治上的百花齐放，《道德经》是其序曲；那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诸派就形成了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诗经》是序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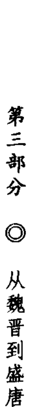
如果说秦汉时期几经周折，到了董仲舒那儿终于走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路；那么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百家到了初唐，经陈子昂而形成新体诗，仍可看出其源在《诗经》。

中国人的历史，就是这样步入文明的。起先以儒法的政治思想斗争为封建社会文明的开端，其线条粗而枝蔓少。当这个局势已定后，中华文明由思想渐渐吸纳了人的情感，于是文明进入情与理合一的时代，即共性与个性合一的时代。这个时代从建安文学起，止于盛唐山水诗与边塞诗两大流派。情与理的各式各样的侧重与组合，使艺术流派呈繁荣景象，然后渐归唐诗这一大家。

中华文明并没有止于此。在思想归一的过程里，可以看出的是政权的成熟与巩固；在艺术流派由繁至简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性情在文学中的地位从轻视到应有的重视。

思想与情感、政治与艺术都就位后，人类文明开始走入细微、细腻和更深更远，而分支亦越来越多。我们在此主要讲述佛教一支中的一宗，即禅宗。它的发生、发展与消亡，及它给中国人情感和思想上带来的影响。

上一部分我们讲了佛教的发生和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佛教仍是很弱的势力，简直与儒、道、法等教派不可同日而语。而人类文明迈过





"思想政治"、走过"艺术情感"后，那"信仰、意境和审美情趣"就是人类文明所要接触到的问题了。中国人的这个时机的到来，正在盛唐。

需要说明的是，我指的只是中国人在宗教这个问题上发展的脉络，并不是说没有其他的发展。文明的提高，其一是表现在其全方位的多元化上，如工、农、兵、学、商、艺、科、宗……全面发展；其二是表现在每一个学科内其具有的层次性。我们现在主要讲禅宗这一支的发展情况，是全面性中的一个面，是这一个面由政治、思想、文艺、情感为基础进而发展下来成为禅，是禅的兴旺与消亡的不同层次的事情。前两部分为禅宗的基础准备层次。

这一部分是禅宗诞生，即盛唐之禅。

一、达摩来华前中土禅法

一般说起禅宗，以达摩来华为始，所以达摩为禅宗初祖。这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本不错，有它自己的道理。但如果不依一个宗派的建立为始，而依这个宗派所持有的特殊修持方法来看，"禅法"则可上溯到东汉了。

在达摩来华以前的"禅法"，统称"如来禅"。

如来禅的特点是"依教修禅"。"依教修禅"，就是有师徒授受、有文字经典、有道场有传承。这显然不同于达摩的"祖师禅"(因称达摩为禅宗祖师，所以他所创的禅即为祖师禅)。祖师禅是"以心传心"、"不立文字"，而且没有长期固定的道场丛林，对传承也并不是太认真。只是后世禅宗弟子对道场和传承的重视和再建，才有了"禅寺"、"丛林"和"传灯禅"式的传承宗谱，这是后话了。

如来禅没形成宗派，它只作为禅法存在。而这"依教修禅"的禅法就因所依的教不同，而有四种禅法。

(一)安般禅

依《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等经典，传授数息修禅的法门，称安般禅。

数息一法，流传至今。所谓"一步一步天台路"，即是称赞"天台数息"法门的稳妥与渐进。此法门极不易"走火入魔"，深为中国人喜爱。释迦

牟尼也称赞数息一门为“船已扬帆，驶离此岸”了。如今体育、舞蹈、书法、绘画、中医等门类，都多多少少要求呼吸稳定，借此稳定情绪而达到聚精会神。

安般禅法诸经典的译者是安士高，安息国人（今印度西北部），于东汉末年（148 年）到中国洛阳，他是杰出的翻译家。在安般禅的禅法中，“安那”是梵语，为呼气的意思；“般那”为吸气的意思；“安那般那”就是出息入息，意在息的出入。这在当代不少气功法门中也经常使用。但非要往下走，修什么炼精化气、以气还神……则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二）五门禅

依《五门禅法要略》而专修“五停观”的禅法，叫五门禅。

五停观，是反止之道，行观之法。也就是说它不是让你静、定入空无，或返观自心、进入心无所住。它让你想、让你去思考，依靠细微深入地思考来使你的某种欲望停止。依佛门说法，人有五种坏的毛病，即：贪、嗔、痴、散乱、多慢。“贪”即贪欲，“嗔”即嫉妒，“痴”为无智慧，“散乱”是注意力不集中、神浮气躁，“多慢”就是我慢贡高，骄傲自大。为了使这五种毛病（或曰习气）去掉，就靠五种方法：以“不净观”去贪心、以“慈悲观”去嗔心、以“因缘观”去多痴、以“数息观”去散乱、以“无我观”去多慢。这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数息观、无我观合为“五行观”，其目的是“五停心”，停止五种恶心，而达佛的彼岸。此类法门就称五门禅。

在五门禅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不同习气和心态观念，有不同的方式方法，试图以一法就可以观停五心，怕是不成。那么我们当代的修行人就要明白，悟道容易修道难。悟解人生，才为悟后真修。真修之法有八万四千，依自己的毛病用相应的方法观停妄心，这才是正道。

有些修行的同仁，总不明白悟前之修和悟后之修的分别，常常被什么顿渐、定慧、不离这个……掺得一团乱麻。修戒修定为“悟前之修”。悟则为“开悟”、“开慧”，这时戒定慧具足，但还没完，没达彼岸。悟后之修叫“去习气”，叫悟后真修。

禅门讲“理需顿悟，事需渐修”。悟前之修，在禅门中算不得真修，只是为顿悟做的准备，此时讲定慧止观；而开悟就叫顿悟，它不是修来的，而是“可遇不可求”的，因此也叫“理需顿悟”。顿悟后才算是真正修行了，此

时讲定慧不二、行处坐卧不离这个，讲"饿了吃饭困了眠"，也叫"事需渐修"。

而以上讲的"安般禅"和"五门禅"只作为一种禅法行于世，至于每个人具体地是悟前悟后用此法修，则没定准，随各自师门传承各异而已。

（三）念佛禅

依《般若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修念佛而达禅定的法门，称念佛禅。

主张念佛禅的大师，是庐山慧远（334—416）。慧远于东晋 381 年人庐山，据说相约人山的有陶渊明和刘遗民等大知识分子。在 402 年七月，以刘遗民为首 123 人，立誓生西方而专修念佛三昧，成立庐山白莲社。这可能是墨派小手工业主们集团结党后，中国文人以宗教为目的而结社的首创了。

念佛禅，不只是口唱念诵、持佛号观西方，它的特点是以念佛而专一心，专一心而止妄念，止妄念而入于寂定，从而由定生慧。这显然是禅门中的"悟前修"的法门。流布下来，有了念佛而专一心，专一心而观想西方，以西方极乐世界为终身要达到的彼岸。这和由定入慧显然不同了。但这一支极易推行，所以形成至今香火甚旺的"净土宗"，也就是向往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方净土的宗派。

但世上的事情不总是这么简单。从禅的念佛禅中分出了"净土宗"，"净土宗"在历史的发展里吸收了数息与念佛，同时亦产生了向禅的靠拢。数息法门讲究"数、随、止、观、还、净"，即天台宗的六妙法门。而念佛法门亦"念、随、止、观、还、净"。这里是云门宗？净土宗？禅宗？

不管怎么讲，庐山慧远开结社第一人，并且是禅净合一的第一人，亦是禅门念佛禅和净土宗之初祖。

（四）实相禅

依《般若》、《法华》而修空观，以性空为实相的，称实相禅。

此禅法的代表人物是慧文、慧思、智觊。

此禅法实际上是龙树大菩萨《中论》的后继者。他们从"空、有"而不

着两边去取中，属大乘般若系(见第二部分第四章)。它不承认有个永衡不坏的"真性"，所以区别于大乘真常系。它认为一切皆实，真性即实相即空无。但这个世界是空色不二，空有共存，所以应不执于两边。这种《中观》为基础的禅，是混淆了万事万物于抽象的理论上的空无和具体的客观世界上的有，造成主观与客观、物质存在与思想观念掺杂在一起的讨论。其讨论的结果是不执著于物、亦不执著于思的"中"。显而易见，这个《中观》是出世的佛理对入世的生活的一种迁就，这种迁就造成它生命力势必很短暂，既不如"大乘真常系"，也不如"小乘有系"，在小乘之后生存了250年，很快地被真常系所取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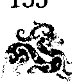
用科学的观点看，微观一切物质与精神，只是分子、原子或粒子的存在与运动。当这些粒子组成分子，当分子合成蛋白，当蛋白组成细胞，当细胞组成人，才产生思想、情感及人性。看来人是色、受、想、行、识的产物，而把人还原成细胞、还原成蛋白时，本是无我、无思想、无情感的层次。前言和第一部分，我们讲述了不同层次不是量的叠加，若干元素通过"自组织现象"产生活的细胞，若干(20多亿亿)细胞通过"自组织现象"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出人意料的人与人性。这个层次中可以有唯物唯心之争，而细胞层次、蛋白层次只是存在与运动之别。试图在阴阳两端里取个"中"，这个《中观》势必让人难以接受。不阴亦不阳、不好亦不坏、非空非非空……让人费解了，这也太艺术化。真正的中道，是在出世的理论上悟懂人生之无，然后在入世的实践中修炼去掉坏习气以达人生之有，不以空无之观办具体之事，不以具体生活之事论空无，这才是真的禅的目的，禅的精髓啊。

可惜知此者甚少。

以小乘有、大乘空到大乘真常的有，已经让人费解了。真能明白定慧不二、空色不异，只有靠每个人去自己修、去悟。不是我在这里说三道四可以了的。

二、如来禅必然要发展的原因

从猿在树上吃果子、到猿人下地吃生肉、再发展到吃熟食与五谷杂粮、至今吃山珍海味。再往下吃"牛鬼蛇神赶下台，王八蝎子爬上来"。是



否正确？不知，但我知道绝不应是端瓢凉水、啃着窝头过日子。同理，猿、猿人、原始人至当代人，其思想与情感在发展，其所关注的问题也在发展，这是文明的标志。

当人们对外界进行探索时，文明必然地会从生存、安全到稳定发展这么个顺序去探索。诸子百家在探索了社会政治及人的关系后，定独尊儒术为稳定态的理论，而法家为变动态的理论。以董仲舒为一个标志，宣告这个探索暂时结束。于是人们再超越这个探索，向内探索人们情与理的张扬，即艺术的探索。这个由政治向艺术的转移，其本身即是文明在那个历史时期下的进步。以李白为代表的盛唐诗人，在经过魏晋南北朝文学上的百花齐放以后，逐渐把这种探索升华结晶成了唐诗，于是唐诗也标志了一个探索的结束。然后人们再超越这个探索，把探索的触角伸向更深更远。

（一）对人生意义的追问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恐怕是人类最终极的追问。

禅是什么？禅的目的是什么？禅的精髓是什么？这都源于人生意义的确立。

价值观、劳动观、人生观、世界观，都建立在对人生意义的不同理解之上。

科学探索、星际探索、对物质的探索、对时空的探索……都是要对人生意义进行修正和补充。

哲学、生理学、心理学、人类史、宇宙史这些学科的研究，无非是对人生意义给予启示和某种指导、界定。

人性、人文、宗教、艺术等的发展，也不过是对人生意义有了某种理解之后，给予的阐释和发挥。

所以，当初唐至盛唐的一些人们在超越了儒法道、超越了唐诗后，开始了对人生意义进行探索的历程。在中国，这些特定的人群多集中在一个团体内，从而形成一个宗派，叫“禅宗”。禅宗认为人生的意义只有在了悟自己的心（思维、情感）和超越人的身心之性（含万物所具有的真性和人所具有的真如自性）后，方能有个结果。这个结果不可言说，不可述诸于文字，只可以心传心、以心相印。

于是在明心见性之后，才能建立起各种正确的观念，才能明了人类历史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才能做个到达了彼岸的具六种神通而无烦恼的佛、圣人——亦常人。

所以，禅，是力图了悟人生意义的一种探索，禅的最终目的即此。禅在修行上的阶段性的目的是达到开悟，开悟即是明心见性。禅的修行依“悟前修”、“悟”、“悟后真修”而分三段。按性质说，即“出世修”、“悟”、“人世行”三段。在禅宗的理论(即见地)上讲，是以见到无为前提的，而见到空无以后如何开悟？那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了，“向上一步，千圣不传”，“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为什么不讲？也没人解释。

综上所述，你可以总结出禅的精髓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既是般若的空、亦是开悟、也是明心见性、或是悟后真修。这一连串的关头处，根据每个人特点不同，修行的法门不同而各有侧重罢了。老以色为实的人，要以般若空为精髓，着力修炼；住于空的人，要以真空生妙有的色不异空为精髓，多体味其妙；让空与有弄得不知所措而取个什么不空不有之中的人，要体会出世与入世、理论与实践的区别；开了悟则流于狂禅的人，是“前悟已过，后悟不生”，这就要叫他去“悟后真修”，不悟言悟的人，一棍子打下来……。

所谓精髓，乃各取所需也。每个人最短缺的最需要的，不正是精髓的含义吗？禅本身即这么活泼、这么不着文字啊。以心相传，即是能感动触动你的心的那个东西是禅的精髓。想自杀的人去学禅，那禅的精髓乃人生之美；想成佛的人去学禅，那禅的精髓乃圣人即常人；想弄出神通的人，那禅的精髓乃最大的神通叫漏尽通(无烦恼)；想弄出大大的学问之人去学禅，那禅的精髓乃无所得。

真学明白的人，发现没什么精髓、没什么禅……没什么菩提……这是佛说的。佛还说：“本无佛可做”。

这样看来，达摩来华前的如来禅，多以能空、能静、能专一为能事。这虽然已有别于玄谈，但实是仍有避世清修之嫌，所以发展也是必然的了。总结一下，可以认为如来禅有以下缺点：①它缺少到达空寂后，再引导人们开悟的部分；②缺少对悟道前后不可言说部分的明确说明(这一段有多长、有什么特点、歧路是什么)；③没有讲明悟道后真修与人世的关系；④没有讲明“空”与“明心见性”的关系，同时没讲清明心见性后何以指导人

们去认识人生的意义。以上四点既是如来禅的不足，也是它必然要发展的原因。

当然，当今修禅的我们，也应思路清楚，要知道各个法门在讲什么，讲的是什么，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否则就极易流入不知所措，成了谁说的都对，谁说的都不对，但对在何处？不对在什么层次和阶段上？一概不知，一团糊涂。

因为这一段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小结一下，以利于往下的讨论。

（二）正道五步

正统的习禅悟道是把“出世修”、“悟”、“入世行”三段扩展为五步：

（1）用一个入门的方法，以达专一空寂。也叫“致虚极、守静笃。”

——我们叫它“悟前修”。

（2）长期地修此空寂，以巩固之，然后结合自身经历，体会众生的生生死死、万物的有限与无限。这第1、2两步都叫悟前修，也叫“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这是止观一派所特有的。而禅宗此第二步叫“入空寂”（但不起观）。

（3）在空与有、生与死的修持和体验中，因大机缘，忽悟人生意义最原本的道理，这就是悟道了。了知宇宙的真理为何，了知出世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也叫“开悟”了。老子称此时的风光是：“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所以，第三步叫“出世悟”。

（4）于见到宇宙这原本真实之性后，结合自身，顿悟人心人性，知晓人欲与真如自性、明了个性如何处于共性中、明了人生意义、明了如何做人。于是“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

——第四步叫“入世悟”。

（5）真的于生活中去修，叫“悟后真修”。此时行住坐卧不离这个，不离自己心性，不离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入世入俗地去掉习气、好好生活、做个常人，这叫真“修行”。修行修行，边修边行，此已是彼岸中事。也叫“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第五步叫“入世修”，或者叫“入世行”。

以上五个步骤，凡修行者皆不出其外，我们大胆地给它起个名字叫“正道五步”。不论修佛、道、禅或什么别的功夫，只要是正道，那不论顿渐、定慧、坐禅、行禅全不出这五个步骤。当然邪道除外，那个东西不值得咱们讲。

如来禅所缺的步骤很明显，它只有第一、二两步，所需要发展的，就是其他三步。

三、从初祖达摩到五祖弘忍

两汉魏晋南北朝，本是方术丹药玄谈成风。慧远通“三玄”之学后，发现这虚无渺茫实在只是虚无渺茫，并不是究竟，不论怎么说，世上的一切事情终要“返求诸己，归于一心”，所以弃玄谈而创净土禅。此一禅法虽是如来禅的范畴，但已有返求自心的苗头。

姚秦时，僧肇作《肇论》，以佛融合老庄思想，开创了自心乃是“般若无知论”和“涅槃无名论”。这个空无不是外界的虚无、不是空间意义上的空无，乃是人性本质的空无了。

（一）初祖达摩与禅宗

菩提达摩，南天竺（波斯）人，于南朝刘宋前（公元 478 年以前）到广州，后历游诸国、达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收慧可为二祖。

禅宗之所以是源于达摩而不是慧远，在于其禅法一改“依教修禅”之法，代之以新颖的“以心传心”的“悟禅”，这在禅史上称“祖师禅”。也就是说“如来禅”不是“正道五步”的禅宗之禅，只是一些禅法而已，而“祖师禅”才是正宗的“正道五步”的禅宗第一禅了。

禅宗门徒们，都是这样讲自己的传承的：一日灵山会上，众比丘云集，聆听释迦牟尼佛讲大法。佛忽拈一枝金色毕钵罗花，众比丘不知所云，只有大迦叶尊者破颜为笑。此一“破”字，乃是悟了一个道理，所以不是简单的开怀大笑、微微一笑。其“破”颜大有忘却人间一切规则、辈分、尊严之意，因为它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笑，不由人控制的笑。于是释迦牟尼甚喜，当众宣布说：

“我有涅槃妙心，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嘱摩诃迦叶。”

不管这事儿是否真有，只是禅宗弟子们敢这么说，已显出禅宗大有“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胆魄与气势。上千比丘，都不够学禅的资格，只有迦叶一人可承此衣钵，这简直使千秋万代的禅的弟子们自豪个够。同时禅宗的正宗地位，名正言顺地在所有大小乘宗派之首，也是无疑的了。事情还没有完，当众比丘散尽，佛祖唤迦叶至多子塔前，又授密语：

“我以正法眼藏密付给你，你当护持，传咐将来。”

此时只佛祖与迦叶二人，但迦叶仍俯耳上前，毕恭毕敬地听。佛说：

“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

此偈大家理解到哪儿算哪儿，咱们先不多解释。只这密语，说明禅宗既别于“依教修禅”，也别于“依法开悟”。所以禅的法则是：

实无一法相传，更无一法授人。以心契心、印证传人、亦称“佛心”宗。

从“依教修禅”和“依法开悟”到连修带悟全无教无法，可见达摩对佛教和禅法的改革有多大的跨度、多大的变动了。一个以心传心，把修证与悟道彻底从教与法中解放出来，这就是禅宗的特点。

在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僧人们大都钻进佛经的学术讨论、研究或注疏、注释中去了。疏于对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意义进行实践和体验。当他们用生命的全部去研究迷宫般的唯识和法相时，正宗教佛之路就向灭亡迈进了。“悟前修、入空寂、出世悟、入世悟、入世修”这五步早已无人过问，没人对此有兴趣。而搞佛学、争高低、释古籍、阐佛语、立文字、著教论……广收门徒、扩大影响……一下子使修行变了味，成了修行为著书、为扬名立万、为做出个大大的佛教的学问，正道早已丢失殆尽。

旧时的修成正果是要花费一生（或三生）精力的，这门学问看来只宜在能活千年的仙人中流传，难在只活百岁的人间传布。这世上有什么学问让你二三十年都学不会，此学问就有问题了。何况科学是积累性的，可踏在前人的肩上起步，而悟道却是非积累性的，每个人都要从头做起、从零开始，这怎么能不让人望而却步呢？

达摩的祖师禅，在沉寂了一百多年后，突然崛起。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旗帜，以简朴浑厚为风，在盛唐人们对人生意义是什么的需求下，烈火干柴般地燃遍中华大地，风行草偃般地广为畅兴。

据说达摩到东土后，曾与梁武帝说法，一句不合，自己“一苇渡江”西

去，到嵩山少林寺面壁去了。可见当时时机仍未成熟，禅宗还远远不能和传统的唯识宗、法相宗、天台宗抗衡。

又传说，达摩去嵩山的路上，遇一笼中鹦鹉。鹦鹉见祖师爷到，大喜过望，用鸟语求之："出笼计、出笼计、祖师教我出笼计。"其情其意真实不虚。达摩自然是神通广大懂鸟语的，见前后无人，上前密嘱密意："出笼计、出笼计，两腿一伸双眼闭，此是我的出笼计。"于是匆匆离开，径直奔嵩山去也。此鸟顿悟密语，遥见主人回来，立刻依"真佛法"两腿一伸双眼闭。该外国鹦鹉是主人高价买回来的，见它死了，主人痛惜万分，马上开笼拿出来仔细端详，看看是怎么回事儿……鸟儿抽个空子，扑楞楞飞去也。

听此传说者，大都称赞达摩的智慧，也有骂祖师是教唆犯的，当然也有夸祖师是解救笼养鸟之典范，实乃环保十佳人士的。很少有人悟此密意啊，这里处处是让人悟道之处啊。我也曾向不少人讲过这个故事，但绝大多数人只是一笑，或是面无表情……我知道我是白讲了。咳！人不如鸟，此是一例。

"死而后生"，是悟道的大诀窍。凤凰涅槃，也讲先死而后生方可成就大功德。"无生无我无念"的寂定，乃是暗喻如死一般，只有如此才"寂灭现前"，才有希望"忽然超出世出世间，获二殊胜"。

在这个世上，有些人没练过什么气功、道法。只是生活中偶遇不幸，濒死而又被救过来，这些人大都活得豁达开朗。为什么？因为从理论上他虽没死，但从人的经验上他已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于是把生死看明白了，看淡了，豁达了。修行也是这个道理啊，不是让大家都撞一回车、跳一次楼啊，而是让你把所有旧的认识、观念全放下，放得"两腿一伸两眼闭"，如死一般，这样才叫干净了（不是人死了就干净了，而是念死了，心就干净了、净土了、唯心净土了）。干净了，方有"出世悟"的影子。

"通达的思维，广阔的眼界，宽广的胸怀，高贵的气质"，此是悟道者的面目。

书归正传。

达摩到东土，只携《楞伽》而创禅宗。虽然达摩是不"依教修禅"、不"依法开悟"，但禅宗为佛教一支，必然要有个经典啊。所以诸位仁兄，这经典与禅宗的修，尤其是与禅宗的悟是个什么关系，要心知肚明。



不依教，只是去掉束缚与枷锁；

依一法，只是渐修中事，佛教的特点；

无教无法，讲的是如死如再生的顿悟，禅宗所刻意强调的事儿了。

达摩禅法，只是“二入”、“四行”。

“二入”，即从道理上入正道和行为上入正道。当然，正道就是依我们上边讲过的“正道五步”，以此达佛果。佛果是什么？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为人处世的标准和原则；“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是对自身修养进行培植的标准和原则。

二入是理入与行入。

1. 理入。“借教悟宗，深信众生同一真性，但因真性为客尘所染，不能显达。若要舍妄归真，则凝住壁观、无自无它、凡圣等一、坚持不移，更不随于他教。此即于真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为，名之理入。”

——这里讲“借教悟宗”，既说明了宗（禅宗）是教下的一支，又适当地拉开了宗与教的关系。说明“宗”只是借用“教”来开悟，而不是依“教”来修行。

“真性为客尘所染”一句，说明达摩禅所借的教，乃是大乘真常系之教。主为真性，本自洁净，“若要舍妄归真，则凝住壁观”一句，客为俗尘，它使真性蒙上污垢而不明。

修到这个境界，已与所借的真常系的教分道扬镳了。真常系的修证，是以去污垢的“时时勤拂拭”为法门；而达摩禅的修证，只是凝住壁观，什么污不污、垢不垢一律不用管它。

“……无自无它、凡圣等一……此即于真理冥符，无有分别……”

如此壁观，自然与真性相一致了。

“寂然无为，名之理入”，如此可直达“正道五步”的第二个层次的“入空寂”。而往下的“出世悟”，就不是理入这入门阶段的事了。

看来达摩借真常系之主客关系，推行的却是不扫妄尘而只去壁观的修证之路。壁观，就是找一个清静的地方一个人对着墙打坐。“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不必考虑那客尘怎么去掉、何时去掉，也不必研究真性是否是永恒的。只要调好息，不想事情，心如同墙壁一般地空寂而真实地存在着，好了，可以入道了。看来达摩也知道修到此地只是未开悟、未见道的入门而已，所以称之为“入”。

2. 行入。即四行。古人称“二入四行”。其实按咱现代汉语和习惯的说法，应叫“理入与四行入”。

四行入，指“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

四行显然是“正道五步”的第五个阶段“入世修”的事情。而第三步“出世悟”没讲，第四步“入世悟”也没讲。

四行入的具体内容我在《原本的真实》一书中已作过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多重复，免得招人讨厌。

（二）二祖慧可

达摩亲传弟子有道育和慧可。

慧可（487—593）俗姓姬，虎牢人。在未见达摩前已出家近 20 年，号神光。这位慧可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他不但博览群书，且善谈玄礼。不过于高谈阔论之后，静下来细细品味一下，不得不承认：“孔子、老子的学说，不过是礼术风规；《庄子》、《易经》之类，哪能言尽妙理？”可见慧可的慧根实在可以。儒家在维护一个社会网络，老子在讲清一个人性网络，庄子赞美人性的绝对解脱，《周易》则是只讲出阴阳辩证之法，八卦通流之形，然后什么都没说。这对于一个想追究何为人生意义，何为生死意义的慧可来讲，就大不以为然了。我们听过“春风过驴耳”的讥笑，是说驴子不识春风面。驴儿要的是青草与水，与你那万紫千红的春风本无太多关系。所以这世上有以春风为真谛者，亦有以青草与水为真谛者，春风与驴耳二者各行其便本无好坏。依此“法门”推导下去，有依然持咒念佛之“春风”，亦有非要寻青草与水的固执如“驴儿”的二祖了。

二祖听说少林寺有一胡僧，面壁九年不言不语大异他人，这就显得是不入大流不识春风之“驴”也似的人了。二祖却认为这种行为之下，必有真知灼见，于是在达摩洞外立雪三天。立雪即是下了三天雪，达摩于洞中面壁，慧可于洞外雪中肃立。达摩西来，所传禅法无人认识，和梁武帝谈话又不投机，可见沮丧多少是有些，这更让他决心把真传传与有上上智者。而慧可认为古人求道，曾有敲骨取髓、利血充饥者。为求大道，自己这点儿苦乃不及前人万分之一耳，于是二人开始一场见面的对话。

达摩说：“你立雪三天，有何事相求？”

慧可说：“愿和尚慈悲，开甘露法门，广度众生。”



达摩说："佛法乃无上妙法，我苦学几十年，足迹遍诸国而求之。你就这点儿微劳小效就想动辄取大法？除非天下红雪也。"

慧可立刻拔出所佩戒刀，断左臂。血染白雪，殷红一片，乃告达摩曰："天下红雪也。"

达摩见状，收慧可为徒，改神光为法名慧可。

我所讲的，多是传说，有人不以为然，这也无可奈何。正宗的《传灯录》又有多少真多少伪？《水浒传》、《西游记》、《包公案》、《说岳全传》又有几个是真的？这世上不但有春风与驴耳之分，且有驴的种种固执之分。伊索寓言中有农夫与驴的故事，是说农夫与驴行于山路，农夫怕驴跌下悬崖，故赶驴走里侧。驴认为这是歧视和压制自己的意愿，是轻视自己的驴权，于是乎向外挣扎。农夫向里拉之不及，驴终坠入深渊成驴皮一张。农夫向下望了望，拍拍尘土说："你终于胜利了。"

此种固执和二祖的固执本质上没什么不同，都在固执地坚持自己所认为对的观念。但结果大不一样，一位成了二祖，一位为皮影戏奉献了全皮。所以，当"固执"能诠释成"执著"二字时，色彩已有变化；当诠释成"追求"二字时，却是真的走向胜利的动力与保障。当经典古籍在歌颂一个追求时，这是"假做真时假亦真"；而旨在考证什么是真时，怕是成了"真做假时真亦假"了。

书归正传。

除了有二祖"断臂求法"的故事外，还有一个"求安心"的故事。是说一日达摩在拂拭佛前供案，二祖见前后无人，对师说："我的心不安，请师为我安心。"达摩边拭佛供，边头也不回地说："你把那个不安的心拿来，我替你安。"二祖沉默良久，答曰："觅心了不可得。"祖仍在拭佛供，告之曰："为汝安心毕。"二祖于是开悟。

客尘与真性，不可以像拂拭供桌与供品一样"时时勤拂拭"，因为供桌与供品是在"毕竟有"的基础上才成立的。有那么一张桌子，有桌子上的果盘、供品、烛台……作为一种比喻，真常系只是告诉你客尘无本性，它不是永恒而不可去掉的，只要你清扫拂拭，客尘就可以走掉。而学佛的弟子们在这个道理上全认了真，把比喻生生地套在修行上。神秀讲"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就是这一大类修行人不求真解的错处。

二祖为什么开悟？悟的什么？二祖悟到真性不是一个"毕竟有"的物

件，真性是一个“毕竟空”的“人之初，性本空”的“空性”，于是见了性。而种种菩提心、烦恼心、安详心、不安心，乃这个“空性”所生之种种心，这叫明了心，合起来称“明心见性”。因此，为了去掉烦恼心，只是返观自性即可，在自性之中，本无烦恼与菩提、本无佛圣与凡俗、本无种种心，只是一个空。这叫六神通的漏尽通。二祖因觅心而开悟，悟的是性本空与菩提烦恼全无根、全无常、全不真。这世上凡是见了烦恼就与之对着干，想把它扫干净，或是想分析出什么别怕烦恼啊、想法子转烦恼为菩提啊、试图以数息忘掉它啊、以咒语咒去它啊、或发泄出去啊、郊游啊、听音乐啊……通通是早晚为皮影戏献出驴皮之驴——拉不回头，只有任你走。大胆地向前走，别回头……当你彻底没法子走时，佛说“你终于胜利了！”为什么会如此？诸位听明白了没有？如还不明白，那我问你：“生心去扫，如何见到空？”

数年后，达摩想重返天竺。于是对众弟子说：“我要走了，你们都谈谈从我这儿学到禅的什么，有什么心得吧！”道副先答曰：“不执著于文字，亦不离文字。”祖说：“你得我之皮。”尼总执说：“这如同庆喜见到佛国，一见更不再见。”祖说：“你得我之肉。”道育说：“我所见的道是无一法可得。”祖说：“你得我之骨。”最后轮到慧可，慧可礼拜，依然一语不发伫立一旁。祖说：“你得我之髓也。”以心传心本无语言，师父要走，心存感激，行大礼以谢之足矣，何必说东道西？何必生那么多心？

见到本性，本性本空；明白此心，此心应善。

前者为“出世悟”，后者为“入世悟”。于是达摩传位于慧可。

让我们再看看“正道五步”。当达摩建立了第一步“悟前修”的壁观、第二步“入空寂”的悟前准备后，跳过三四两步，直入第五步“入世修”，也叫“修行”、“入世行”。二祖以明此性为空，大略的指出“出世悟”的方向；以人心应向善而大略的指出“入世悟”的方向。至此，禅的五步总算完整了。虽然它还很粗糙，有的地方亦不连贯。

这实在是值得庆祝和记念的事情。

二祖巧妙地把真常系中真常的真性解释为般若系的真空，把拂拭客尘改成“觅心了不可得”后，禅宗才从理论到修证、从见地到行愿完完全全彻底地独立了，成熟了。这和大乘般若系的空不同，但它含有空作为自己的本性。这也和龙树的中观不同，它没在“空”“有”之间找个什么“点”，好

竖起"中""正"之大旗，它超越了中观。它把"空"当出世之所悟，把"有"当入世之所见(而此见应趋向善)，使"空"与"无"不在对立的两边，而是"正道五步"中依次的"见性"与"明心"中，是"出世悟"与"入世悟"的通流。所以，一切的明心见性，都将流于"入世行"，规规矩矩唱戏、老老实实做人。什么空与无之争、净土与禅之争、修与不修之争全成了无任何意义的口头禅、野狐禅式的争论。

话说到此，谈些篇外闲扯，这回不是演义和故事，是着着实实的正史正经，请诸位正襟危坐、洗耳恭听。

人类的一切活动和学问，是为人类的"意欲"服务的。"意"乃向往，"欲"乃欲望。所以一切宗教、文化、哲学、科学、体育、休闲、工作、生活统统是"意欲"的表现。

为了更大的"欲"望，而人们的"意"则经历了试图摆脱客观世界对人身的支配这样一个阶段；试图到达摆脱客观世界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支配这第二个阶段。这就是我们常见的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人类的"欲"体现在对物质的占有，为了使这个占有能向无限多和无限深远去发展，为了摆脱物质世界对人存在的束缚，人们修盖房屋居住使人安全舒适、种地狩猎使人吃饱、建立一夫一妻制使人繁衍、敬老爱幼使人类能生生不息……在这个阶段被满足的基础上，人们开始为实现第二个阶段的目标奋斗：人们试图寻找和训练出一种不受客观环境束缚的自由解脱的精神世界，神话、幻想、宗教、艺术等的本质，都多少含有这种人之"意"，这种不受外界限制、向往自由之"意"。

实现第二阶段的"意"，可以有两种模式：

一、是老庄的理想模式。这种"意欲"的实现往往流于不现实，因为它本身即是非现实的。老庄理想国太"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怕是人们耐不住寂寞，也太难以实现。但这种"意欲"毕竟让人感觉很美好……这就够了。

二、陶渊明、谢灵运等田园诗人开辟了另一条路，这是现实中的路，是简单的回归大自然的路。这条实现"意欲"之路的特点是：它以原始的非人为的天、地为外因，唤起人们不加任何"追求"、"训练"、"倾向"的人的内因——朴素的思想与情感。于是天、地这外界的因素再也不限制人了，而是与人三者合为一体。

山水田园诗的成就，显然启发了修行的大德，禅师们通过调整自己的内心，使之不带任何倾向、情感和理性分析地去看大自然，于是这种超越客观束缚的精神状态出现了。

它是很难见到的“意欲”所能实现的第三个阶段——顶峰体验。

让我们稍息一下，小憩一下。

总结以上所言，可以整理出以下条理：

(1)当人们的“意欲”摆脱了客观世界对人身的束缚，使人类、国家、社会走上文明稳定，这以独尊儒术为标志，为第一阶段。

(2)当人们以恬然的心情去认识大自然，其意境和情趣使人们的“意欲”摆脱了客观世界对人精神、情感的束缚。产生安详、深远、永恒、温馨之感，这以盛唐田园诗为标志，为第二阶段。

(3)当禅师们以寂静去观心，发现情与理这人性本是空无，一切依种种外缘才生种种“心”。而人类要生存要进步，此心必以“性善”为基础。在明心见性后，以开悟为大智慧大神通的禅宗产生了。其见地、修持、行愿五步的健全，是以二祖慧可为标志的。这样，人类已探索到第三阶段。

简而言之：

第一阶段，以物质为基础，较容易到达；

第二阶段，在物质的基础上要有艺术感，每个人经过训练，总会或多或少地进入这一步；

第三阶段，是在物质为“资粮”、熟习《五明》的基础上才可以去办。“资粮”与“五明”是佛说的，好比物质与艺术(知识、文化、文明)。在这两个为基础后，要依“正道五步”去修，方可有这顶峰的顶端的人生意境和体验。

以此看来，禅的修行有助于人们认识客观世界、主观世界以及二者的联系。禅的积极方面也在于利于身心，利于情理的协调发展。

禅的消极方面是什么？这一点上二祖有何功绩呢？

首先，把修禅紧紧地绑在宗教的战车上，实是无可奈何的事儿。达摩与二祖都离佛教很远了，“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已是大胆得可以，但毕竟是佛教正统经教外，单独传下来的一支，不管怎么说也还是佛教范畴，还在宗教的战车上。只是“别”而已，容忍它走得远一些而已。这个现象只有马祖道一挣脱了宗教的影子，但没走多久。



看来这种消极也是必然。

反过来看，这可能还是一种积极，如果没有宗教的庇护，何来禅宗呢？一个人在当时的社会里不工作，每日修行，谁养着呢？文人们只到唐诗的第二阶段啊，外国的宗教与文化，都没到这第三阶段。所以还要感谢宗教这个消极因素，因为它滋养了禅、养育了叛逆。

其次，也是当代人都喜欢干的事儿。这种消极的影响，就是修禅为了"神异"，现在叫"神通"，叫"特异功能"。创净土宗的庐山慧远曾说过："菩萨无神通，犹鸟之无翼，不能高翔远游，无由广化众生，净佛国土。"连达摩也有"一苇渡江"之神通。在人类刚刚挣脱巫术方术，当人类由崇拜鬼神进而崇拜人时，讲一些神通以招徒众，也无可非议。以学神通而入佛门，不在社会上流浪、不在社会上作恶，对稳定社会功绩不小，怪不得帝王们并不反对宗教。其二，以死后有生而不惧死，这对尽忠报国有积极的心理作用。作用其大，诸位去品。那时的古人于法场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和革命先烈于法场说"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是一样的气贯长虹。再说了，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定然相信死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上帝的厨房里正缺御厨呢。

以上讲的是过去，现而今就不同了，非要习禅而修出神通？非以有无神通而评定某人是否登佛果？或菩萨位？那只有请便了。凡是找什么有神通的人去学禅，我看有些玄，你先看看《楞严经》中佛对五十阴魔的介绍，再不回头非要开什么天眼、穿什么墙，由你吧，"你终于胜利了"。

第三，习禅本是以心传心、各了佛事。最怕的是办什么班，大家一起静、一起讨论、一起开悟、一起成佛。这种什么"班"、什么"会"前人也搞过。北魏玄高，传授安般禅，但他"更着意于渲染禅的灵异神通"。这种"显异动众"的禅的路线，充满妖异气氛，聚合大批各色人等，再如墨家帮会那样，烧个什么、念个什么……。于444年，玄高被拓跋焘所杀，罪名是"蓄徒聚众，将为国灾"。禅的开悟本是很个性化的事情，怎么可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呢？历代大师们授禅几十载方有一两个真传弟子，从未见什么"大师"、"天师"收钱几千，教你个功或咒，于三天两早上凡交了钱的、真信的，全毕业成佛？哪有这等事体？当然，你没成佛是你没真信，虽然交了钱也不怨"天师"，怨你自家，这不是骗子是什么？《传灯录》、《指月录》、《宗镜录》上全没这种事情；佛说这种人"必遭王难"，这是佛在《楞严

经》上讲的，佛也说没有这种事情；只有当代一些文化水平不高、挣钱又不多、胆子够大的“大师”说有这样的事情。

达摩与慧可不谈怪异、不危言耸听、不在观心上强调共性，对体验提倡“各了于心”，这一切都为禅宗的发展开创了良好的基础。

在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534 年)，慧可因其“奇辨纵横，从者风靡”被正统佛教斥为“魔说”。于是他远离都市、深入民间，使禅法更加接近民众。也就是在 535 年，一个 40 余岁居士来找二祖，说：“弟子患病，请大和尚为我忏悔罪孽。”二祖说：“将罪来，我与汝忏。”这显然是效仿初祖开示他的模式。该居士沉默良久，对曰：“觅罪了不可得。”祖说：“我与汝忏罪孽毕。”看此居士没像自己当初那样恍然大悟，二祖接着说：“你当皈依三宝。”居士对曰：“今日见到和尚，已知僧是什么，但不知何为佛，何为法。”祖说：“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僧宝亦然。”居士说：“我今日明白了，罪孽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正如人的本心一样，佛法也是如此啊。”

性本空，此居士有这个慧根，很为二祖赏识。二祖亲为剃度，取法名僧璨，不久传法于他，为禅宗三祖。

(三)三祖僧璨和与之同期的楞伽师及傅居士

1. 僧璨。僧璨(约 495—606)得法时，正值周武帝毁灭佛法。三祖尊从二祖教诫，隐于山林，居处无常，深自韬晦，无人知其所在，积十余载。隋统一南北后，这个开明的隋文帝大力倡佛。因为他自幼在寺院长大，深受熏染，同时他看清佛教对社会有稳定的作用，尤其是战乱后大统一之始。于是佛教由此进入极盛时代，这和开科举而使诗歌进入极盛简直同步而一致了。

三祖生平与事迹，所知不多。但他的禅法因他著有《信心铭》而对后世影响很大。僧璨在《信心铭》中主要讲述的是由安静而进入“入寂空”的要领(见“正道五步”的第二步)。从达摩到慧可，对于如何进入空寂状况，都讲得比较简单，三祖在此讲得比较细。

三祖在《信心铭》中说：

“至道无难，惟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

——“悟前修”是以进入平静、虚静、专一为目的的。不论佛家八万四



千法或道家三万六千法或任何一项注意力集中的训练，都可进入这专一而心气平和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中，人们“色受想行识”的感受会渐趋淡去，随着你专一的程度和专一的时间的增加，这个感受就由强至弱至“虚极”。例如你聚精会神地下棋，那十几分钟后，什么有些渴、有些饿、牙有些痛等感受会消失。专一使你忘我，忘我即是“致虚极，守静笃”。

在进虚极之后，把这个专一的对象放下。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只有刚一放下的这个瞬间是“入空寂”的状态。但他不适应这个状态，他马上会去干另一件事情、去想另一个问题。例如你下棋，下到半截停住不下了就会进入这“空寂”的瞬间。当然不能因为是有电话找你或是什么原因而不下了，那样的话是念念相继而使你停止下棋，并不是你在有意地训练。

在修禅的训练中，“入空寂”要形成有意识的训练。当你放下你所专一的对象后，马上起念返照返观一下自心，看看心里有什么，然后尽量保持住它。这才是真正的“入空寂”。

平时我们过马路，猛然被一直驶过来的车吓了一跳，只这瞬间头脑中空白一片，这叫“自心现量”。《楞伽经》中主要讲的是这种功法，禅宗中不少棒、喝、吃茶去、吃饼去都属于“自心现量”的提示与训练。你向师父请教问题，师父当头给你一拐、或大喝一声、或说“渴么？吃茶去……”这都让你摸不着头脑，一愣，脑中一片空白！就是这个！

两个人的对话，是逻辑思维在活动在交流。猛然间跳出这个思维框架，如同下棋时猛然停住，怎么能不一愣而不知所措？当演员的全知道，台词与场面调度是早已重复了上百遍的，你已很熟悉了。但当和你交流的演员忽然改了词，而且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词，你的反应必定是一愣……此刻即是“自心现量”。只可惜在舞台上不是在禅房里，禅房里你要反观这“自心现量”时心里有什么？直“入空寂”了；而舞台上你于瞬间一愣后，马上会判断发生了什么事？是谁错了？怎么补救等等。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佛门叫“刹那”、“刹那”。于是好的演员会使人不知不觉地把戏救回来，这叫舞台经验丰富。但于习禅却又错过了一次机缘。

“平静、专一、虚静、放下、返观、入空寂”，这六步是“悟前修”的模式。不论你修什么法门，都是如此，只是有的人可直入返观而已。

咱们再接着看三祖僧璨的《信心铭》。

“……圆同太虚，无欠无余。良由取舍，所以不如。……心若不异，万

法一如。……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言语道断，非去来兮。”

——在“入空寂”后，要有长期的训练。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十几年。“入空寂”不是死住在里面，这就成了《金刚经》中长老须菩提所犯的“修空无”之歧路。“入空寂”的训练关键在于体会和认识这个“五蕴皆空”的状态。三祖讲的“圆同太虚”、“无欠无余”、“万法一如”、“言语道断”等等，都是自己对“空寂的体会”，一种见地上的认同。认同什么？不能多讲，属密。这种体会产生的认可、认同，会使你“突然超出世出世间”而开悟。

大家不信，可再看看《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

——“悟前修”、“入空寂”很长时间。然后：

“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一个体会五蕴皆空，一个认同度一切苦厄。

“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下面全是自己出禅定后讲述自己在禅定中的感受了。这里，先要有个“悟前修”专一致静的“行深”，也就是指修习了十几年；也指这一次入静长达几十分钟后，才叫“行深”。其次，“入空寂”后，要有反照，照见五蕴皆空。第三是认识了这个空寂，它就是彼岸。

书归正传，言归正史。

开皇年间，三祖已名声鹤起，前来礼拜者踊跃如潮，祖广为四众宣讲《楞伽》微妙教义。开皇十二年(591)，有一年龄14岁俗姓司马之少年谒见三祖，说：“请大和尚慈悲，教我解脱法门。”璨曰：“谁缚汝？”司马少年说：“没人束缚我。”璨曰：“何更求解脱乎？”少年言下立解。璨收之为徒，法名道信。

道信从三祖僧璨九年，侍奉左右，诚惶诚恐。一日道信问师：“古时佛的心是什么样？”师反问：“今天你的心是什么样？”道信沉思后曰：“我今无心。”璨曰：“你既无心，诸佛岂有心乎？”道信大悟。

后僧璨传法与道信，为禅宗四祖。

三祖僧璨在传承上上承达摩、慧可，丰富了“正道五步”之禅的修证；在见地上下启道信、弘忍，阐释了真妄不二、觉源于空的佛理，这对禅宗在理论上的成熟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祖往来山林、居处无常、没有建立一个修禅的丛林道场，实在是历史的遗憾。但他的入世，使这种遗憾转变成了对战乱和灭佛的考验，为禅宗在形式和组织上的成熟立下了不小的功绩。

2. 与三祖同时期的楞伽师。因达摩是携《楞伽》来华，加之达摩、慧可、僧璨又都没有专门的禅宗道场，所以有不少僧人无缘亲受三位祖师的教诲，只有学《楞伽》而习禅。这就形成了非传承的禅宗一支，史称楞伽宗，其僧人叫楞伽师。

《楞伽经》有十卷本和四卷本。十卷本译于513年，四卷本译于443年，达摩是携四卷本来华的。因该本的内容我在《原本的真实》一书中已有介绍，所以不再重复。

因《楞伽》属般若系的理论，同时在修证上又含有真常系的简化，所以在《楞伽》四卷本的开卷谒中写道：

"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华。智不得有无，而生大悲心。"

——开宗明义，讲世间生生灭灭这一切物质的生成与坏灭，只是空与华的转换。其背景与底色乃是虚无。所以智慧的有与无并不是什么关键，关键是要有慈悲之心啊。

"一切无涅槃，无有涅槃佛，无有佛涅槃，远离觉不觉；若有若无有，是二悉俱离，牟尼寂静观。"

——不要去想着什么有无佛、有无涅槃，不要追求什么觉悟与不觉悟、入空与不入空。当你把这两边的事全放下时，正宗的寂静就现前了。

看来《楞伽》的重点是放在"入空寂"这"正道五步"的第二步上的。这些话要是说给不曾修炼的人听，就会产生狂禅。他们依这几句偈，可以否认一切对生死的体验、对智慧与觉悟的追求和对成佛的修炼及对达彼岸的修证。这就是门外的文人、哲学家们常犯的错误。而对修行人来讲，当你抱着成佛、长智慧、达彼岸的信心来习禅，原本没有错。经训练也可以达"悟前修"的专一虚静。但要进入第二步的"入空寂"，怕是修个二三十年，越修越成了老参，怎么修都不对。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你初学时的那个信心与观念。坚信有佛的观念使你立入专一，但他却被挡在了"入空寂"的门前。"心中有佛"是说"悟后行"的事，是说你的信心。而心中空寂，把一切全放下，立入空寂之境界，是开悟前的必由之路。在此处心中仍抱着一个佛不放，这叫上岸不弃舟，如何进入空寂呢？空寂的定义不是

毕竟空么？不是一切历历如如么？

修到这个份上的人，你要知道原本无一佛可做，方是佛！

原本无菩提可得，方是得了菩提！

原本没什么彼岸，方达了彼岸！

原本没什么轮回，才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超轮回，成就正果！

佛与凡俗人的差别在这里。你要明白，我也不怕费笔墨，所以连篇累牍地说，不怕你厌不怕你烦。

佛认为一无所得的人是佛；

凡人认为得六大神通的人是佛。

佛认为一切空寂是菩提，是智慧；

凡人认为学会什么经咒是菩提，读会什么天书是智慧。

佛认为真经应是无字；

凡人认为真经要三藏七十二部，部部要三章十六节七十二讲，ABCD、甲乙丙丁、手指脚指、甲骨文蝌蚪文……

《楞伽》一书把"寂静"作"涅槃"，使"寂静"与佛性、法性、实相、真如、真性、如来藏等实相等同起来，这在佛教各派上讲是相同的，相通的，是共性，并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把"寂静"这出世悟前的门坎当作"入世行"的最高境界，当成人生意义的最终真理，就失之偏颇了。这就不是共性不共性的问题了。佛讲了《四十二章经》、《孝经》难道都"寂静"了去？

个中三味，在于《楞伽》是针对性很强的经。印度人好议论少行动，好争辩好空谈，同时固执地认为佛与菩萨是仙来神往无所不能的超人。于是人人可由"悟前修"而直接成佛，哪怕修得再苦再难，也值得。这是一种光荣，是异于常人的毅力与决心的表现。于是什么不倒单、辟谷、龟息、倒立三天三夜、埋地下三月二十天……但谁要说只有扔下这些才立入"空寂"之门，定然被当作大天魔诛杀之。作为达摩也挡不住这些疯狂地要成佛的潮流，所以只好携《楞伽》而来中国，躲开是非之地，找一些想成常人的人，传授大法，不断佛之祖脉真传。在这个前提下，《楞伽》就专门谈如何"入空寂"，其他的事情就略去不提了。

达摩来华算是高明。

中国人重实用、少言谈、重理通、少玄论。当正统佛教和玄谈把咱中



国农民和文人弄得万分繁杂无味时，这一切放下的理论，着实合咱口味，于是禅宗大兴。咱中国人有时也侃，云山雾罩、仙佛功能、气场气功……真的有人告之："你家麦子还不割么？"他会先拿起镰刀收麦子去，什么成佛成仙之事等收了麦子再说。文人则更加实用，科考后榜上无名，那七嘴八舌什么有弊啊！不公啊！然后上青楼下瓦肆、慨当以慷、此恨难忘。忽一人当街高喊："皇上颁诏，今春科考不做数，秋天还要重考一次。"你看，这些文人全如鸟兽散，急匆匆回家从尘埃中捡起书，一律闭上鸟嘴，做八股文去了。至今，咱中国人的脾气一点儿没改。一个不顺，那领导太坏、邻居不好，孩子太嫩、老婆太老，上级腐败、股票被套……于是叹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忽听小道消息说自己要被提拔，好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桃花开，领导是伯乐、邻居是善人，孩子挺聪明、老婆还水灵，上级挺亲切、股市好行情……马上去买点礼品，四处去忙……

中国人的议论实在是情绪化的事情，中国人的玄谈也是情绪地过一下瘾。

从《楞伽》的修证(不是见地)上看，它属真常系。但它又减八识为三识，使唯识的理论走上简化。修证随之减到三步：(1)守住自己"自心现量"的状态；(2)发大悲心；(3)继续证到佛果。而达摩的二入四行，正是楞伽这种简化的经典。不论什么佛不佛、果不果、空不空、有不有。只需(1)先壁观，入空寂；(2)去四行入，于是成果只在眼前了。

3. 与此同期的傅大士。傅大士名傅翕(497—569)，是梁武帝时代二大士之一。

傅大士的禅法，受僧肇《肇论》的影响，属般若系。至今流传的，是他有名的偈：

"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牛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对此偈有无数的名人大德作解释，都有道理，容不得我插嘴。我只认为这是傅大士对"一本正经"的情绪化之戏弄耳。禅宗之士，本有轻狂与不羁之嫌，这是解脱后的一种禅风禅骨。正宗经典尚可删减，对一些陈规旧习晨钟暮鼓，不免隐曲地嘲笑嬉戏。如果我们再拿这些嬉戏之言当学问，让生动活泼归回"一本正经"，不是太晦气了？

让我们换一个方式看问题，丢掉凡是经典都要研究研究的方式看问题不好么？

他在《还源偈》中说：

“还源去，何须更追寻。欲求真解脱，端正自观心。

还源去，心性不沉浮。安住王三味，万行悉圆收。”

他在《心王铭》中说：

“……水中盐味，色里胶青。自在无碍，所作皆成。了本识心，识心见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般若法藏，并在身心。无为法宝，非浅非深。诸佛菩萨，了此本心。有缘遇者，非去来今。”

以上论述，我们不再费笔墨去释译了。

傅大士本无师承，但其禅法与祖师禅默契。尤其是他的“佛在心内，即心即佛”的思想，为后世禅僧打开了另一方天地。当然，“是心是佛”并不是他先提出的，从初祖到三祖、从楞伽师到众居士，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时代“即心即佛”思想的已经成熟，这为禅宗达到它的顶峰做好了最后冲刺的准备。

（四）四祖道信——东山法门的确立和黄梅禅系的形成

道信（579--651），他常住黄梅县双峰山，所以史称双峰道信。他和五祖东山弘忍开创了黄梅一系的禅法，所以也称东山法门。这个法门大家不熟也罢，但“东山再起”一句，指的就是弘忍一脉的复苏与重振。这是后话，放到神会的“法统之争”时再讲。

在谈四祖之前，先要说一下马鸣菩萨写的《大乘起信论》。

《起信论》成书，大约在隋初，为真谛所译。但是原著是否是马鸣，仍有争论。那些是考证学的事情了，我们不谈。

《起信论》对禅宗最后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它将“出世悟”悟到的真性本空和“入世悟”悟到的人性（真如自性）本空统统归结于“善”和“一心”去了。这种归结的结果，使三祖的“空寂”为“真性”变为“一心”为真性，同时“一心”也就等于了觉、佛、真如、如来藏……。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所以一切众生也皆有“一心”，这个“一心”被称为“众生心”。

让我们小驻，回首一下三位祖师的观点：

达摩认为必须以壁观而入空寂方可进入“出世悟”，而“入世悟”只在四行二入中去办。



二祖慧可认为以见到真性的"毕竟空"为"出世悟",名见性,并依此体会到"心善"为"入世悟",名明心。可见心与性是有差别的。见性明心乃是修禅之不同步骤,最后归于向善。

三祖同于达摩,认为仍是要以"无心"、"空性"为真谛,也就是强调"寂静"为佛性,以此强调开悟前"人空寂"之必要。这是拿"空寂"这个进入开悟的门坎来针对只说不练的人而设的法门。

楞伽师们的理论也同于三祖,认为必须以"空寂"为真性的法门。其优点是为"出世悟"所准备的,其缺点是对"入世悟"尤其是"入世行"失之指导。世上一切修行如果只为了修行,这就成了循环往返的游戏。达摩、三祖与楞伽师,在深恶玩功夫、好斗嘴、喜争论的弊病时,下猛药把这些修行人从泥潭中拉出来,走入正道的"出世悟"。初衷本不错,效果也挺好,对症下药的法子。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众修行人已经知道"人空寂"了,可再往下如何?仍是明理者甚少。

傅大士开了"即心即佛"一扇大门,让人们看到了一线光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心"的定义是什么?心可作善作恶,心有千万般变化,《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讲的就是心。所以,只要走"即心即佛"的路,就必然要对"心"的内涵与外延做出限定,同时要把"心"与"性"是什么关系说清楚。当《起信论》把"一心"当作是真性、佛性、如来藏识后,就容易使"心"与"性"等同起来。为了防止这种错误,《起信论》以"一心"来区别"心",以此使佛教的修行变成了唯一的修心。

(2)"一心"到"无念",进入了"人空寂",完成了正道五步的前两步。于是"无念",在这里替代了"寂灭"、"空寂"。这就大大简化了传统佛教烦琐的心理分析,绕开了恶与善、染与净的争辩。

可以说,《起信论》以"一心"做真如自性,把真常系的真性本净替换成"一心"本净、"一心"无染。把真常系的去妄尘的拂拭之法,变成了"一心"无念的如如不动即是最妙的拂拭。这种转换代表了一种进步,避免了有的修行人练空寂而坠入顽空。同时以"一心"代替第一步"悟前修"的专一,以"无念"代替第二步的"人空寂",实在是咱中国人愿意接受的。一切修行变得简单易行,即:一心一意,此外啥都不想,就是佛。

但利之同时,必有弊。这个对"心"的理解,千百年来袭扰着修行的人们。尤其是把"一心"、"无念"即佛,再转变成"即心即佛",这个麻烦就更大了。

(3)《起信论》提出“若行若住、若起若卧，皆应止观俱行”。行住(处)坐卧，都可止观俱行。这个提法把坐禅扩大到生活，使处处在在全可修禅，这是禅宗入世化的口号。当然，坐禅易于修“悟前修”和“入空寂”，而生活中不离止观适合第五步“悟后修”，讲的是于生活中边修边行——修行也。

更深层次的道理是：悟道后自知哪个不是修？哪个不是定？这层意思要每个人悟后自去体会。真性何尝一分一秒离开过我们？定慧何需修？

总之，《起信论》以一心、无念、入世为要领，开创了大唐禅风之先河。

咱们再回来谈四祖双峰道信。

我们常说道信与弘忍是东山法门，是黄梅一系。东山与黄梅的说法，是有其特殊含义的。东山法门，指禅宗从此走上定居；而黄梅一系，指禅宗由《楞伽》转而奉《般若》。

下面就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

魏晋南北朝，战乱和灾荒引发流民。而以僧尼面目进行流动，既可逃兵役、又可逃赋税、更可以避灾祸。这样在流民的队伍里，就住往有大量的游僧。游僧居无定所，肯定不能按时辰上什么早晚课、进行礼拜办道场，连个烧香拜佛的时间和地点都没有定准。所以不论南朝北朝，游僧们多以禅僧为主。携一《楞伽经》，心里有佛，即不受任何时空限制，堂堂正正的游走天下。达摩不是如此么？何况还有二祖、三祖。

北朝，多为政治经济中心。所以北朝的高级僧侣，多在寺院内造作经像、讲说经教，被什么达官贵人支持与赞助，香火极盛，从而形成以“教”为主的“教门”。而下层僧人，凡挤不进寺院无门路定居的，只有南下一条路可走。

南朝，僧众大多无籍无寺。凡有福分找到一静处可定居下来的，则多则三五人、少则一二人，大家安坐自修。没精力没兴趣举行什么禅学班讨论天大的问题，只是各坐各的，成为“坐禅”。连个定居处也找不到的，只有流浪于山壤之间、丛林之内，进行一些短小不费时的“禅诵”。不论“坐禅”与“禅诵”，都是游僧之举，后来成为“禅门”特色。

教门与禅门，情绪对立斗争激烈，其程度简直胜过官兵与贼。凡政权与利益的斗争，总以利益最终分配完结而争斗终止。可宗教派别之争，那就不止是利益问题了，而是生死之争了，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也。



君不见国家与国家之争，为了什么边界啊、贸易啊，但总能结束，边界早晚要划定，贸易还是有贸有易。但两国是不同的宗教，尤其是宗教内不同的两派，更甚的是一派内不同的两支……这个仗打起来就成了死仇，没间没完，世世代代咬牙切齿地解不开了。

现在咱们知晓“禅门”源自游僧了。既然游僧产生禅宗，那“游”之气便为禅宗的童年注入自己的DNA。首先是“不拘一格”的洒脱，这洒脱之气源自每日的游动，实属无奈。其次是依《楞伽》而“口谈玄理，不出文记”，这种大谈神异显然与战乱有关。既有相信命运、相信神之庇护之趣，又有与叛僧叛军交战各方均无瓜葛之意。第三，修证之路不在朝朝暮暮的拜佛与谈经，心内有佛方是要紧处。这为以后的即心即佛打下基础，同时也为随心所欲放纵不羁埋下灾根。第四，《楞伽》倡渐修，游僧没那个时间与空间去时时勤拂拭，于是有渐修与顿悟的分野。虽然在这个时期顿悟一说还不够强大，还不够正宗，但已渐成气候。

说说东山法门：

东山法门最大的功绩在于——建立丛林。官禅多在京城郊畿立庙建寺，金碧辉煌、堂堂霸气。而丛林则是东山一脉的特色，于山林之中结庐为寺，能居住且实用即可。定居下来的丛林，近农田以劳作，多了犬吠鸡鸣之生活气息，少了夸张奢侈之排场，这就与庙、寺、堂、殿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截然不同了。但随时间缝合，二者相互融合，难以分辨，这是后话。

禅宗既然有了自己的丛林，气象为之一振。

首先，一改童年之稚气，由游方改为定居。道信在丛林中聚徒五百余人，定居三十多年，“禅门俊秀，归者如云”。到弘忍时，“四方请益，九众师横，虚往实归，月愈千计。”崇拜者众多，龙象辈出，成一繁盛景观。禅宗得以确立和传承，建丛林是主要的客观因素。

其次，游方以乞食为生，而定居后必将使吃饭成一大事，比礼佛诵经还大的事。不能比官禅，那是国家队，是事业单位，吃皇粮而专司佛事，可不理人间烟火，可不知谷米多少钱一斤。而丛林就要边劳动边习禅，禅与农、农与禅成了形影不离的概念。这又显出陶渊明式的务农风范，但不能“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而是“种稻梅山下，禾盛佛事稀”。

第三，日日劳作，玄谈说鬼就给累得没了踪迹。于是道信每劝门人曰：

"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莫读经，莫共人语。"

看来劳动与坐禅成了道信东山法门的主要"佛事"。一动一静，一阴一阳，不谈国事亦不争佛理。各修各的，免生口角。既不招兵灾，亦不怕人祸。无赋税徭役之累，有静坐参禅之乐，轻安也。

再说说黄梅一系：

东山的特色，直接生成了黄梅系。这个标志即——改奉《楞严》为《般若》。

四祖道信发扬祖师以《楞伽》"诸佛心第一"的传统，把它与《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融合起来，作《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这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了。

这个创举体现三个方面：

一者，吸收《起信论》"一心"、"无念"、"入世"的观念。以劳作与坐禅结合，体现出"入世"；以"闭门坐，莫读经，莫共人语"体现"一心"与"无念"。这是一种从形式到内容的合一。

二者，把念佛法门也吸纳进来，使念佛与坐禅无二。道信曾对法融、弘忍等弟子说：

"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一切法门悉自具足，不离汝心；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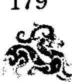
一个"心源"三个"一切"，是《楞伽》的"诸佛心第一"与般若"一行三昧"的结合，也是念佛法门中"一行三昧"的结合。道信的"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就更加使禅宗与净土合二而一了，这也叫净土禅。

三者，东山法门使顿渐相融，在承《楞伽》的渐悟之基础上突出《般若》的顿悟。道信在《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把习禅者分为四种人：

"有行有解有证，上上人；无行有解有证，中上人；有行有解无证，中下人；有行无解无证，下下人。"

这就为顿渐之分建立了客观的标准，凡"豁然得本心"者，上上人了。不同人有不同法门，所以有顿渐之分。

顿与渐，原是指"出世悟"为顿，"悟后修"为渐，叫"理须顿悟，事须渐修"。如今用在"悟前修"上，在"悟前修"中以人不同而分不同法门，其动机乃是接引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有教无类，本也不坏。只是让被称为下根



器的人有些灰心，这是后话。直到六祖慧能，这种把人分成几等的做法才有转变。六祖说：

“本来正教，无有顿渐，人性自有利纯。迷人渐修，悟人顿契。自识本心，见自本性，即无差别”。

把人性的利纯解释为人性本同，执迷的程度不同才有顿渐，这就免去了“先天性”、“人种论”、“种姓等级”之弊病。而到了后世大师，凡言等级者，乃是灭佛邪说；凡说“理顺顿悟，事须渐修”者，为大善知识。我是这么认为的，诸位自己品品对与不对。

但无论如何，东山一门强调顿悟，这是没错的。不论官禅农禅、读经务农、礼佛坐禅，凡此心向佛而一朝豁然得本心者，均开悟成佛。

总之，东山一门以双峰山的东山为丛林道场、以劳动坐禅相扶持、以渐修与顿悟相辅助、以出世入世相勾通、以《楞伽》《般若》相传宗、以念佛习禅不相异，并以“一心、无念、入世”为禅风，借《大乘起信论》开“心宗”之门。

据说唐太宗仰慕道信之德风，曾三次召他入京，道信三次以疾病为由而推辞。第四次，太宗脸面上下不来，令使臣召不来道信就领他人头来。四祖听旨后，引颈就刃，神色俨然，使臣空返。太宗闻听，愈加钦重，赐绸缎若干。道信不上京，除有不媚上之意，主要是不耻与官禅为伍也。

一日，四祖路遇一七岁小儿，见其骨相清秀乃问其姓。小孩说：“姓倒是有，不是常姓。”祖问：“何姓？”小孩说：“佛性。”祖大惊，请其母劝其出家，亲为剃度，法名弘忍。后传位于他，为禅宗五祖。

（五）牛头法融与东山弘忍

1. 法融。法融(594—657)俗姓韦，因住金陵牛头山，所以俗称牛头法融。

法融一系，原不明其传承。他并不是道信的弟子，但因其贡献卓绝，所以被禅宗弟子收编进来，排在四祖门下，与弘忍齐名。

据说（又是据说，请大家别见怪。禅史不比正史，非要一丝一毫的不差，那今生今世也别谈禅论道了。连正统的经论尚在争论，何况某人某事的记载呢？）贞观年间，四祖道信无意之中到牛头山，见法融端坐自若。祖问：“在此做什么？”融答：“观心。”祖：“观是何人？心是何物？”融无以对

答，起身作礼，问："大德高棲何所?"祖："贫道不决所止，或东或西。"融："还识道信禅师否?"曰："贫道是也。"融又作礼，乞心要。祖依自己早已悟透了的话儿，写成书的语句，摘捡要紧的四句答曰：

"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一切戒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自具足，不离汝心。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绝思绝虑，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缺少，与佛何殊？更无别法，汝但任心。莫作观行、亦莫澄心，莫起贪嗔、莫怀愁虑，荡荡无碍、任意纵横。不作诸善、不作诸恶，行住坐卧、触目皆缘。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

于是牛头法融荡荡无碍地彻悟，双峰道信任意逍遥地回山。

此虽是传说，我看还是信以为真的好，反正我信。

据说法融著有《绝观论》与《心铭》。

牛头禅法，在《绝观论》中一言以蔽之："虚空为道本，森罗为法用。"引申开，就是"以本无事为悟，忘情为修"。看来法融大师是从"出世悟"上看世间一切，所以"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而人在世上，必有不少俗事缠身，事情事情，中国人认为事与情、情与事是一回事，在心外为事，入心内为情。所以"入世修"只是把心中的情(事)修去。法融并不提倡真的去修什么，一个忘字就算最好的修了。按通俗的说法，就是别老记挂着什么，事情来了就来了，过去了就过去了。大有无为而"修"，自然而"忘"的老庄气味。只因所有事情、法门、观念都是虚空为本，所以在《心铭》中他说：

"菩提本有，不须用守；烦恼本无，不须用除。灵知自照，万法归如……。正觉无觉，真空不空。三世诸佛，皆乘此宗。"

禅学大师宗密，在对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以慧能为代表的南宗、和法融这一宗共三宗进行过精确的总结：

"北宗一切皆妄，南宗一切皆真，牛头则一切皆无。"

而各宗之所以不同，宗密认为这是修行过程中不同阶段所显示出不同特点，然后根据这不同特点才产生三宗。所以：

"诸宗所说，皆是诸佛之教也……若就行说者，初伏心灭妄，次信任情性，后休心不起。"

宗密认为，凡人习禅，先要进入北宗说的"伏心灭妄"，即"悟前修"这



第一阶段。然后进入“信任情性”，再结束于“出世悟”后的“休心不起”。宗密本在调和三家，但这种坐次安排就差之千里。“伏心灭妄”既可以是“悟前修”之功课，亦可以是“入世修”之功课。而“信任情性”本是“入世悟”的结果。情（心）源于性，性空而情（心）亦空，但信任空是“出世悟”之果，人还要入世，“入世悟”到情（心）向善，于是“信任情性”才有了具体的内涵。可以理解成——一心向善，莫记收获。

所以“信任情性”的南宗，乃是“入世悟”所悟到的，是于“入世行”中、生活和做人中去自觉履行的准则。说到“休心不起”，本是“入空寂”这“正道五步”中第二步的特色。但拿来依宗密之言放到生活中去，这就实在是悟道后的僧人每日没事可干的理论了。这个理论在战乱中不招惹是非是好，但让后人全去效法就大失禅宗之趣，失却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失去了对生命的体味，是坏事了。

总之，牛头一宗，提倡性空，依性空之理则不必起心去修，一个妄情即是修。所以一切是“无修不修，无佛不佛”。这种出世的般若理论为禅宗的形成做出不少贡献。

2. 东山弘忍。弘忍（602—675）大师虽然与牛头法融同是道信的弟子，但弘忍却是按承传的正宗的五祖。他承祖师的以心为本，“守本真心”是他的佛果，不似牛头一切以空为本。

以心为本，必有“修证”，通过修使心得到安宁，这是入世的必然。

以空为本，则不必修，一切全建立在空上，以空入世，就成了牛头禅的“一切莫顾，安心无处。无处安心，虚明自露”。“寂静不生，放旷纵横。所作无滞，去住皆平。”

弘忍要“摄守真心”，“断除妄心”。

牛头却“无心是道”、“无所挂记”。

接着说“守本真心”的弘忍。

五祖此人，文化水平不高，但他肚量很大。在他门下容纳了各种思想派别的僧人。除神秀、慧能这以后的南北两宗的大师外，还有法如、老安、玄赜……他们在日后形成嵩山禅系（法如、道安）、楞伽禅系（玄赜、净觉）、资州智诜禅系、南山念佛禅系等等。

五祖的大度，使丛林能吸纳各种禅派，同时就使各种派别得以发展。

他在理论上提倡：

"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四仪（行、处、坐、卧）皆是道场，三业（身、口、意）咸为佛事。盖静乱之无二，乃语嘿之恒一。"

这种该劳动时去劳动，该参禅时就"肃然静坐，不出文字"地去参禅，使丛林一派生机、一团和气。不同派别各自生长，同在五祖门下共沐佛光。如果没有弘忍，大家都要争个高下、辩个高低，那禅宗定然夭折矣。

弘忍一节，就说到这里。他对禅宗在理论上没多大贡献，只是沿守四祖衣钵耳。但他广开道场倡劳坐合一、渐顿相融、不择根机、容纳各派、坚持心宗，使禅宗离最后成熟只差一步。而完成这最后一步的大师慧能，就是他培养和造就出来的、亲传的禅宗六祖啊。

四、一代大师——六祖慧能

慧能（638—713）的事迹在《坛经》上有详细著述，我在《原本的真实》一书中也有介绍，在此就不再重写了。

慧能在曹溪弘法几十年，被称为岭南活佛，连王维都写有《六祖能禅师碑铭》。

慧能一派被称为曹溪法门，该法门的门徒很多，弟子"三五千人，说不可尽"。《坛经》上写直接受六祖传法是10人，《景德传灯录》录法嗣43人，立传19人。这里最为知名的乃是日后"江西帮"南岳系的南岳怀让，和"湖南帮"青原系的青原行思。江西南岳一系化出临济、沩仰二家，湖南青原一系化出曹洞、云门、法眼三家。禅宗的一叶五支花，即此五家。后世禅僧行走于五家之间，称"走江湖"。"江湖中人"本是指来回往返于江西与湖南这两大家之间的禅宗中人，后慢慢演化成黑白两道、武林中人了。

从禅学上看，六祖慧能承前启后，使禅宗有了崭新的面目；从禅法上看，六祖融会贯通大乘真常系与大乘般若系；从心与性的角度上看，六祖融会牛头法融的性空与《起信论》的"一心""无念"。以上这两点是从见地（理论）上讲的。

从修证上讲，他强调心性本觉，定慧不二。在顿渐两种观念的冲突中，他强调顿悟。这两点是从修证上讲的。

从行愿（入世修、入世行）上讲，他强调的是"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



住为本"。而从慧能所创的南宗的特性上看，它既具有外在的"忍"，同时又向内在的个人体验有所发展。

以上诸点，我们归纳一下，然后再逐条讲述。

从见地上：1. 融真常与般若；2. 通性空与一心。

从修证上：3. 定慧不二；4. 强调顿悟。

从行愿上：5. 无念为宗；6. 外忍内伸。

（一）融会发展了大乘真常系和大乘般若系

大乘般若性空系，产生于小乘有系之后。

龙树菩萨的《中观论》，实际上并不是彻底地建立了性空，它是迁就性空与色有的结果。因为彻底的性空，将造成宗教自身的危机。宗教的特点，必须具有今世之苦、修行之法与彼岸之光明这三点。通俗地讲，宗教必具此岸苦与彼岸幸福，同时要有渡河之舟这些要件。倘若此岸是空幻、彼岸是空幻、法门也空幻，甚至连个舟也无……一切皆无，那这个宗教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但性空又是确确实实的事情，于是在空与有、此岸与彼岸这两个极端之间，就建立了《中观》之舟。不可说有不可说无、亦有亦无。由此看来，龙树大菩萨实在是没有彻底地建立起"空观"，同理，也没有彻底地建立起"有观"。

我们当代文明使我们能详尽地体察性与心的区别。般若性空，是讲把人还原成细胞、再还原成元素后，在这个层次上看则一切性空。这里没有心、识、想、行等功能与特征。但是当元素组成细胞后，细胞组成人后，令人惊异地发现人具有种种元素和细胞本不具有的特性，其最明显的是——心。这个心可以思维（有了理性）、可知苦乐（有了感情），我们通常叫它是人性。看来万物"本真之性"无心无我，而一旦成了人，则"人心人性"有我有情。依正统的佛教原理，这种现象的生成叫"缘起性空"。是说一切原本的真实的空，但依一些缘由经种种组合，后，就一切原本的真实的不空了。这个"依缘而起"的理论，再详细说是十二缘起论。十二缘起的次序即："无明缘行、行缘识……"。是说由本空，生成直觉、潜意识和本能；由这直觉、潜意识和本能生成人心识……

这些理论就我们今天的科学知识来看，也算是有一定的道理。

真常系认为真性是永恒存在的，而客尘在经常污染它，所以此岸是蒙

垢之性，彼岸是光明无垢之性，修行是去垢之法了。在真常系里，性与心是什么关系显得含糊不清，它既然承认无垢的是真性，那染垢的心怕是属于客尘了。客尘显然是“一心”而与“真性”相去万里。

般若系认为真性是“毕竟空”的，你说它永恒也成，因为虚空永恒是成立的。你说它不永恒，是个“无”也成，一切的一切都属虚幻。佛与常人、此岸与彼岸、修与不修……全一回事。这个理论太透彻太生猛，龙树大菩萨没敢全用，只是部分地拿来以对付所有的小乘。

真常系与般若系在认定“真性”的常与不常、有与无上是有分歧的，但在对“心性”这一“人”的层次上，却一致地全不予理睬。

龙树大菩萨以无对付有，但他只走到中。

六祖以般若对付真常，却是以空为主流，只给真常的有留下一点点余地。

所以般若在龙树的《中观》和六祖的禅宗里是不同层次、不同光景。

般若为主流表现在：“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真常所剩下的一点点余地表现在：“何其自性，本来清静”。

如果说龙树是以常有去看空无，那么六祖则是以空无去看常有，二者是以心看性和以性看性的区别了。性本空无，尘埃自然无着无落，垢也就无从说起，但“自性”(小心了，不是微观世界中元素的本性，而是人的自性了)本来清静。后来呢？客尘无法染薰本空的真性，但是否可以染薰本来清静的自性呢？染了又如何？是否是时时勤拂拭？六祖没说。

六祖认为只要认识到般若之空性、认识到真常的自性本来也清静，就足已矣。再往下如何没讲。

显然，这种真常系与般若系的合一，必造成下面的问题。

(二)真性本空与《起信论》的“一心”合一

人，不能只停在出世修。出世的理论再好，如果到入世的行中行不通，那这个出世的理论就搁浅了。这也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六祖于出世的空无中，建造了一艘大船，它沿般若真空一直驰入入世的“心”。这样，《起信论》的“入世观”先是继承了下来，而这个本来清净的心只要“无念”，就契合了本性，心性如一了，这艘大船是前所未有的，它贯通了性与心的航线，使性与心在“空无”上保持了一致。



当然，六祖也只说是“无念为宗”。因为这艘船太巨大了，再也不能航行下去，只好到“为宗”这里止住。但是入世去生活，有那么多的事情要费心劳神，只是无念这个“宗”能应付得了么？这艘大船能掉头转身地周旋么？

不能，此是弃大船换扁舟的时候。所以此时理论上的“为宗”之无念，要换乘实践上的“无住”为本了。

无住，则是心生种种念，尽管去生吧，只要不执不住就算“自性如如”了。再说得玄一些，就是在“心”的层次上，以念念不住而呈现出如同真性的空无一般地“般若性”。真绕嘴，可又没办法，只有再啰嗦一下：

“真性”以空无体现出原本真实的般若性——无念为宗，这是理论的结果；

“心性”以无所住体现出原本真实的般若性——无住为本，这是实践的准则。

二者和合，管这个心性叫“真如自性”。

六祖在《坛经》中说：

“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

“如是一切法，尽在自性。自性常清净，日月常明。只为云覆盖……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遇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万象森罗，一时皆现。”

——可见换上一叶扁舟，仍有修与不修的问题。神秀在真常系的立场上要时时勤拂拭，六祖在真性的大舟上可以置修于不顾，但在心性的小舟上，也需“惠风吹散”客尘一般的“云雾”，修一字没说，但众位应心知肚明。这一点，就是般若系太出世，只要它入世，那早晚要遇到真常系这块暗礁。

“何其自性，本来清静”，先有个本来，后有个清静，这就是不得不给真常系留下一点儿地盘的结果。虽然一点儿，哪怕它只占百分之一，也要留啊。

“世人性净，犹如清天，慧如日，智如月，智慧常明，于外著境，妄念浮云盖处，自性不能明。故遇善知识，开真正法，吹却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在自性，名为清净法身。”

——这个世上只有牛头法融一人，开一艘有铁冲角的船，把船从真性开到心性、开到一切可行与不可行之处。所以七零八落，终归于“无情亦

有神”处搁浅了。

一个层次造的舟，怎可以驰到另一个层次而全无错处？还是六祖聪明，创心性一家论。

心性一家论即：

于出世的性空和心本静处（大河之中）——用“宗”之法这艘大船——无念为宗；

于入世的行住坐卧和心念之处（小河里）——改用“本”这条小舟——无住为本；

认死理儿的主儿急了，说：“你到底是无？还是有？有没有谱啊？什么才是你的根本呢？”好了，这一回该用上“体”了，你可以回答——无相为体。说我是什么都成，百无禁忌，说似一物既不中，不似一物也不中……

虽是一家，在不同层次中其法不同，妙不可言！你说是一家乎两家乎？一种法两种法？这要看诸位的悟性了，也就是看诸位是否有般若智慧了。

（三）定慧不二

上两条讲的是见地上的事。

而讲定慧，则既是见地更是修证上的事情。六祖在《坛经》上说：

“住心观静，是病非禅，长坐拘身，于理何益？”

——一棍子打杀了坐禅，是说“于理何益”。也就是不明道理，盲修瞎坐，只能招致生理上的病态。

“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乱自性定，心地无痴自性慧。”

——如来禅法与正统佛教，都讲究“勤修戒定慧，除尽贪嗔痴”。甚至细分可以一一对位：修戒以除贪、修定以除嗔、修慧以除痴。从禅的止观上看，止为定学，观为慧学。这些本是从“悟前修”到“人空寂”为“出世悟”做准备的修行，到后来学问就越做越大了。

六祖反对传统禅法和传统的定慧观，把以定生慧改为定慧等持，定慧双修。

六祖说：“此法门中，何名坐禅？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何名禅定？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



——大凡要开悟,要得大智慧者,必先过"定"之一关。这就使很多在社会上饱经坎坷、历尽风雨的人,无缘以沉思反思而悟人生,仍需修什么定。也使很多本无阅历、年纪轻轻的人,试图走一条有定必生慧的道路。常见什么功、什么班、什么师都在提倡"久坐必有禅"。更有甚者,是"有咒必有慧"、"有法必有神通"……这实在是为左门旁道大开了绿灯。而六祖认为完全不必依这个途径入开悟之境,一切以"不起念"、"不著境"、"外离相"、"内不乱"为悟道之"修"。当然,这要算是"修"的话,那这个无念、无相、不乱就是修。

在我们当今的诸位修行的同仁中,请各自参照六祖讲的修,看看自己的修,是否是无念、无相、不乱之修?还是守个什么与宇宙相通之念?冥想个与大自然相互采精补阳之相?住一个我就是佛的境?弄出匆匆忙忙著书立说招徒纳众之乱?

六祖以禅宗独特之修,打破了定慧分割的做法,绕开了由定入慧的途径,实际上是把"心性"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注意,这不是真性,这可是入世之禅的特色了。如来禅与传统佛教以其性为本,所以一切归于空无。而六祖在把"自性"与真性等同以后、把清静与真空等同以后,那一切修行由"正道五步"变成了两步:"入世悟"与"悟后行"。这种心佛不二的做法,导致了定慧不二,简化了修行的步骤,使禅宗的入世成为可能,使生活中一切的行住坐卧全可以是修行了。如此这般亦农亦禅有了理论基础,修行在不误正业的原则上去修,亦有了理论依据。同时智慧不一定要源于定,开悟可于 24 小时的工作、生活中全都能产生,这是多么美好的解放,多么有人情味的一宗。

正是如此,后世禅宗弟子也确实在生活中去悟、在生活中去修行,给禅宗带来新鲜、活泼、生动、豁达、最少有宗教味的新风。

总之,学禅宗的,完全不必开悟后再学,可先学起来,边学边开悟才是正道;

换言之:学艺术的,完全不必开窍后再学,可先学起来,边学边开窍才是正道;

再换言之:学 N 科的,完全不必弄懂后再学,可先学起来,边学边弄懂 N 科为正道。

再再换言之:看我书的,完全不必明白了再看,可先看起来,边看

边……

……越看越糊涂了如何？花自己的工资买书……最后弄个先看后糊涂？

本人声明：我与出版社本无关碍。

（四）强调顿悟见性

既然心性一家、空有一宗、定慧不二，那就不需要“悟前修”、“入空寂”、“出世悟”了。只在生活中（包括禅坐，参公案等修行之中）一个机缘全可悟道了，立入“入世悟”。这种带有解放和解脱性质的修行，是显而易见的进步。可同修们会问，这么简单是对与不对？好与不好？

我不想从理论上去论证什么，那样咱们这本小册子就成了禅学思想的专著。一则我没那么大学问，二则我也没那么多工夫，三则书市上此类书比比皆是，全是文人们写的煌煌巨作，请大德们各自去学，去费工夫。

我只能从我修行中得出一点儿心得和体会。

修行之事，原本有种种差别与种种目的。有的人饱受人间沧桑，有的人一路顺风；有的人天生聪慧，有的人生来迂执；有的人文化水平高，有的人文化水平低；有的人喜理性思维，有的人喜情绪办事……这还是从修行人的主观处看问题。从要达到的目的看，就更加繁杂：有想成佛的、有想异于他人的、有想健身的、有想弄懂人生意义的……

只要你是想弄懂人生的意义（人生观），只要你想明白生死的意义（世界观），那又何必拘泥于一法一禅呢？人生处处有芳草，人生处处有禅机，只要你按六祖所言，能把自己生命、心血、经历、理想予以静思，立可顿悟其诀窍也。

悟，此一字是“吾”与“心”，从“我”从“心”。要以“我”“心”去领悟，去品味。思，就是用小脑袋瓜子想，是理性范畴，而悟却是直觉范畴。直觉范畴的悟，只在“顿然”、“猛然”与“恍然”，所以称之为顿悟。

但话又说回来，年纪轻轻，一点人生滋味没尝到，二十几岁的年龄、大学中学的人生经验，中外名著中得来点儿体会，怕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和曹雪芹不说愁，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怎能一样？所以大多数人是老老实实地按正道五步去修，当真的有了“不惑”的人生体验后，方可从“入世悟”（也叫“世间悟”）到“悟后修（或行）”。也可



以说:40 岁前不学禅!

除我讲的“为了得到人生意义这一大事”和有无阅历这两种人外,其他的各种人和持各种目的者,全难学禅了。不论是顿是渐,连影子也摸不着。

六祖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这种境界,一悟即知,不可言传,只能意会。

“故知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

——佛与众生,差别只在一悟也。

“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顿教大乘,念佛往生路远。”

——一切以顿悟为界,不以其他修不修、定不定、垢不垢、净不净为界。

最后六祖总结:“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所以不立一切法。”

——以上所言,全抄袭于《坛经》,绝不是我在这里生编。悟,是亲自体验后,以一种直觉思维方式产生的灵感、领悟。这种境界具非文字性、非概括性和非抽象性。它活生生地产生于你的身上,是具体的,它让你明道、让你激动、让你不能自制……

既然悟属非文字性,咱们也就到此为止。

(五)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这三句话不是可有可无的话,它是禅宗“心性合一”的宣言。是正统佛教由如来禅所讲的“性空为宗”向禅宗的“心空为宗”的转移,是入世化、简约化、中国化的转移。

“心空”如何为“宗”呢? 只“无念”即可。

所以在禅宗这里,一切全有了改变:“缘起性空”改之为“缘起无念”;“真性真常”改为“清静心真常”;“真空生妙有”改为“无念之心生妙有”……于是“真性即佛”、“空性即佛”,早晚要变成马祖道一的“即心即佛”。

但是,在我们高歌禅宗这“心性合一”的同时,一定要牢记六祖是牺牲了“元素层次的性空”与“人的层次的心有”而产生的,为使“心有”向“性空”靠拢,使心“无念”而约等于性空而已。

1. 无念为宗。可是人真的能无念么? 有那么个学糊涂了的扁轮大

禅师，自己称赞自己："扁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六祖听后只是淡淡地说："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人不可能长时间无念。这个"无念"是立宗的口号，怎是你修行的生理上的程度呢？"一念断即死，别处受生。"是六祖说的。这个扁轮再这么修下去，死了不说，下世成个人都难了。看来要成外星人也，否则何为"别处受生"？

六祖对"无念"的解释是："若百物不思，常令念绝，即是法缚，即名边见。"

"何名无念？无念法者，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徧一切处，不著一切处；常净自性，使六贼（眼耳鼻舌身意）从六门中走出；于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即是般若三味，自在解脱，名无念行。"

——这显然是"道在通流"的一种说法了。"无念"，就是不住相、不住念，让思维流动自由耳。

从人的生理上讲，人处在"无念"的状态，只有一瞬间。如被惊吓、被师棒喝、一个出乎意料的结局……六祖以此证明有个"无念"的境界，以证明心与性都原本的空与静。只到这里，就不再追究，机锋一转，只谈无著与无住。所以我们习禅的人，千万别傻乎乎地学扁轮修什么念断的无念，知道人有这么个刹那间的境界，知道禅宗以此立宗——理论上的事儿——而实践上只习无住无相即可。

2. 无相为体。当无念作为理论上的宗旨后，当它一旦立住脚跟，那么无相与无住就一泻千里地生发出来，通流而起，不滞而去了。作为实践，不滞于一相，这不是把客观世界看成个无，对一切视而不见。这就陷入有了一个"清除有相，归于无相"的念头与行为了。"于相而离相"，也最好不要理解成"不把这些相当真相来对待，要把它看成一无所有"。这是以出世法往入世上套，如同扁轮修"无念"一般可笑了。

如果存心要去念头，修出个清净，使生活中的"无念而不念"，违背生理与心理，用"排除杂念"横在头上，这就叫走火入魔，同理"无相"也是这个道理。所以"无相"的真实含义是不住于相。

3. 无住为本。这是关键，一切念、相、境界都要不住。念来则来，念去自去；相来则来，相去自去；境界来了则来，境界去了自去……念念不执、相相不住、境界不滞……这就叫无住为本。

无念为宗是纯理论的指导；





无住为本是入世的实践的指导。

为本者，是做人的准则；

为宗者，是禅宗理论的准则。

做人，应使心灵不滞于任何思想，连诸多的情感如欲念、焦灼、喜悦、悲痛……都不要逃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无思想、无情感，这是死人，是泥菩萨；思想与情感住于一处，这叫执著，是死心眼儿。这个世界、这一回人生，有着无限多的思想与情感，你只有不执著，才能无障碍，才能无偏见，才能接受新的思想、新的事物，才能理解和体验新的情感。我是一个导演，我最怕的就是那种执著于自己的见解和情感而拒绝他人的见解和情感的演员。有自己的见解与情感本不错，错在固执地认为自己的对、他人的错。于是这戏怎么演也是他自己，而不是角色啊。如果你说"这只是你当导演的心得，与修行无关"。那我告诉你，人生如戏，这是佛说的。很多人大谈代沟，看不上新人类、新新人类，甚至看不上同代人中其他行业的人，这正是死抱住自己的东西而拒绝他人的原因啊。

每个人活于世上，其生理与心理上都是一种实际存在，这需要每个人去经历它、体会它，这才是人生。而不能抱着"不经历"、"不体验"，只一心念佛就成了。我说这叫完了，一泥菩萨而已。只有体会体验了世间的恩仇冷暖，才可能了悟人生啊，不是么？天天躲在斗室习禅，怎么能悟人生，悟生死？天天住在悲痛、焦灼、压力之下，只能悟出个魔，或是进安定医院，最轻的是落下个气质性偏执的病。

所以，不住是让你把注意力、把你的志向别放在这里啊，人生的意义也不在这里啊。禅宗的精髓、禅的目的都是让你从这些念、相、境界中出来，而进入另一个更高的层次。

什么层次？

彼岸！彼岸什么样？

看山只是山，看水只是水。

(六)外忍内伸

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第二十八品"不受不贪分"中讲道：

"须菩提，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

——佛说：若有个菩萨用无数的珍宝来布施世人；又有一个菩萨只是明白一切法门的真谛在于“无生法忍”——以无我的观念，忍耐世俗的烦恼与压力，才有成就的可能——那这第二位菩萨其功德大于前边那位菩萨啊。

这里不是学问，请大家不要分析，什么烦恼不是不理它，它自然走了么？怎么要忍耐呢？你越分析越坠入五里雾中，不得要领啊。佛是说成佛的境界在外！功夫在外！一切都不是修来的，一切都不是你认为的那样。

佛教讲忍，大乘的六度也有个忍，它们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只是为了忍？逆来顺受地活着？喘着？怕不是这么简单吧。

佛说“无生法，忍”，是为了达一个“无我的境界”。

儒家讲：“所就者大，必有所忍；所就者远，必有所待。”忍耐与等待，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事业。佛与六祖的忍与耐，就是为了达到“无我”的佛的境界啊。

六祖的南禅一宗，忍得如何呢？

慧能以卑贱的目不识丁的农民形象成为祖师，同出身高贵儒学传家的北禅相对峙，这意义就远在什么心佛合一、定慧不二等见地与修证之外。但又极出人意料，南宗一派一切反抗的精神与对封建政权、儒家意识形态这网络系统的对抗精神全无。在与北宗禅对峙的同时，对国家这个网络和儒家的独尊唯以“忍”为准。甚至更为过分的是，南宗一脉于神会以后，对中央政权攀附，忠于官府、愿做良民。后人认为是南北宗的争宠，因为南宗对北宗并无造反之意，只是争个主流地位。上述种种让人难以揣摸出路数的南宗，最后的结果我们看到了：南宗成为禅宗主流，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政治上最安分、生存最长久的一个组织，成了宗教中最正统、最稳定、最生动活泼的一宗，它是对中国人的艺术、思想、审美情趣影响最大的一支力量。有这样的结果，相当初怎么忍也不算过分吧？

其次，科举制的建立，使贫寒的知识分子可以升为士大夫阶层；禅宗的建立，使原本是边缘人物的流僧、农僧可以成为社会的高层人物。这两种新人物对社会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随着士大夫与禅师们的交流，在中国产生了禅门五家的盛景，于宋代产生了程朱理学……你不能不说禅门五家与理学含有禅宗的功绩，而这与南禅一派讲忍不无关系。



第三，慧能给我们指出向内心追求的一条路，这条路将走向人性“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因此，大凡搞艺术的人、大科学家，只要他们是大师级的人才，那他们都不在意什么条框、规矩、形式，他们已超越了条框、规矩、形式；他们都不在意在生活上对外界的容忍，他们已超越了这种容忍；他们也不在意自己是什么出身、哪儿的人，他们已超越了什么出身与什么地方的人。当他们全神贯注于舞台上、画笔上、计算机前时，忘我就发生了……再接下来，会进入神话般的轻飘飘……一切身不由己。这个状态是佛的状态、是佛的意境、是人生最终极的体验啊。

虚云大师自己回忆，一生中起码有三次这种境界：突然之间天上天下流动着佛号声、黄色的光溢满世界，层层旗幡、重重香雾……大师一人在此中滑行……一切无碍、一切是那么庄严……

这种境界一人一生品尝一次已足。而这一切“外伸”的功绩正是建立在“内忍”的基础之上的啊。

请诸位一定记住这句话：“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

在我们结束这一章、这一部分之前，是否可以这么说：儒、法、道三家，建立了人文的服务于政权的观念网络系统。这个系统以爱国忠君为特色，以稳定和平为原则，同时显示出了它的保守性与妨碍改革的复古性。

而诗歌和禅宗，开始了人性在这个系统内的探索。在情与理、束缚与解脱的辩证中，它们以极高的艺术境界和精神境界，把中国人的思想与情感带进了一个新的里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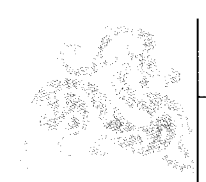
这一部分需要读者记住的，是禅宗的“正道五步”。

即：悟前修、入空寂、出世悟、入世悟、入世行。

第四部分

从中唐到南宋末年





第一章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公元 742 年，唐玄宗改元天宝，唐朝进入中叶。

公元 907 年，朱温废昭宣帝，国号梁，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

公元 960 年，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兵变，建立北宋。

在中国北方，916 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称辽太祖。

1038 年，元昊称帝，号大夏，史称西夏。

1115 年，阿骨打摆脱辽国称帝，为金太祖，国号金。

1125 年金兵灭辽，并兵分两路南下。

1126 年秋，金兵第二次南下，克东京，北宋亡。

1127 年，钦宗之弟赵构在南京立南宋。

1128 年，南宋定都杭州，称临安府。

1234 年，蒙古灭金。

1206 年，铁木真建蒙古汗国，号成吉思汗，史称元太祖。

1271 年，忽必烈定国号元，自称元世祖。

1276 年，伯颜在临安俘宋恭帝，南宋亡。

一、中晚唐史略

（一）中唐与安史之乱

中唐 742 年—820 年。

公元 742 年，唐玄宗改元“天宝”，历史上划此年为进入中唐的标志。



唐玄宗李隆基此人，在历史上颇有争议。他 28 岁坐江山，使开元成为大唐盛世。而 58 岁改元“天宝”后，把一个大好江山毁在手里。历来当皇上的人年轻有为而老了变糊涂的大有人在，李隆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 李林甫的教诲——学做马。开元之初，李隆基认为要重整大唐，必仿太宗，于是任用贤能、从谏如流。任贤与从谏这两点非常重要，因为：眼是否是慧眼，亦或是昏眼、老眼，是此人糊涂不糊涂的分界线；是能否从谏如流的分界线。任了贤能供起来，束之高阁，只许他接受香火，不准他开口讲话，或只能讲顺耳之话，那就成了任贤而不从谏，一点用处全无。换位思考一下，被任的贤能否诚心诚意地讲逆耳甚至骂娘的话，这不但是明不明白，简直严重到品质问题了。所以任贤是眼力问题，乃伯乐的范畴；而纳谏还要“从善如流”般地听骂娘，就是“明皇”的问题了，绕来绕去，责任仍在皇上这里。只可惜咱中国历来五百多位皇上，多是喜欢听顺耳的，如此哪里来骂娘的“贤”？只能招来歌德的“贤”。哪怕叛军已到京城外，也要听“只流寇十数人，不日将自散也”的话。江山好像其次，能讲好听的话才是首要要紧的任人标准。

扯远了，书归正传。

李隆基兼容了好与坏的两面。初当国君，任能人姚崇，姚崇力辞。玄宗疑而问之，对曰：“臣有十条治国建议，怕陛下不能接受，故而不敢复命。”他这十条建议是：“以仁义为先，不以刑罚为重；十年内不于边地生战争；宦官不干朝政；国戚不任要职；禁止营造佛寺；后妃不得掌权……”。没想到李隆基欣然接受，任其为相，创 29 年开元盛世。

开元 24 年，玄宗开始越老越糊涂。当张九龄劝他不要重用牛仙客做尚书时，他居然怒曰：“事情难道都要由卿家做主？”于是贬张九龄，任李林甫为相。到了天宝年间，李林甫已有了气候。他素以“口有密，腹有剑”名震朝野，一上台，就着着实实地给众谏官上了一课。他说：“今明主在上，洞察秋毫，根本不需要你们上谏。你们没看见那些御马吗？只是终日不做声，就有好料吃，但叫一声，立遭贬斥！”于是大臣们开始学做马，不做声、吃好料，一切是皇上英明了。

那这个皇上英明到什么地步呢？天宝六载，玄宗下诏求贤。这事想得本来不错，但李林甫连一个人也没招上来，而且玄宗居然相信李林甫所描述的什么“大唐之内，贤士已在朝内，野无遗贤”。于是这个明明白白的

好事，给办成绝不明白绝不英明的坏事了。这使我们想起李世民招贤，宰相封德彝说："不是我不尽心，实在是今世没有人才。"李世民怒曰："这算怎么说？帝王治理国家，都是取才当世，岂有到几百年前去借古人？只可说自己不识人才，怎么可以诬蔑一代中国人？"

太宗与玄宗，二者相差岂是人与人之别，简直如鲁迅讲的是类猿之人与类人之猿的差别，是悬殊到"太玄"之别也。李隆基在位45年，他自己本身也显出了一条由太到玄的轨迹。有人说"任何英明人物掌握无限权力如此之久，都会昏聩、堕落"，可能有些道理。

这个玄宗本已糊涂，越老越差劲，年届花甲，纳26岁的儿媳妇杨玉环为贵妃，并任其远房的纨绔堂兄杨国忠为相（继李林甫死后为相）。别说"从此君王不早朝"，这一般狗男女为官为相，就算你刻刻勤政、日日早朝又怎奈那些不敢张嘴或不愿张嘴的马呢？大唐盛世啊真好比是男女相爱的蜜月，"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2. 安史之乱。公元755年12月16日，玄宗与杨贵妃的干儿子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发动兵变，占洛阳为都，号"大燕"。后有史思明从之，史称"安史之乱"。

公元756年，玄宗一行逃出长安，途中有个叫郭从谨的老人对玄宗说："安禄山要造反，妇孺皆知，皇上您只因身边大臣阿谀取容，才不知道啊。"于是玄宗沮丧垂泪："我太糊涂了，后悔莫及也。"这一回真是来不及了，将军陈玄礼率兵众杀杨国忠，逼死杨玉环，史称马嵬驿兵变。玄宗只是无奈，众兵将山呼"万岁"。可见糊涂昏君与民众在情感上有多大差距了。

一个任贤，一个纳谏，实在是盛与衰的关键。

深一层说：人才代代有，慧眼常常无。

再深一层说：统治者为了统治，那找遍天下都无眼无才；统治者为了民众，只此心一动，便是慧眼与人才一见倾心之时。这里也有一只看不见的黑手啊……个中三味，诸位自去品评。

762年，早已赋闲的玄宗于78岁上忧郁离世。

756年，肃宗李亨即位，李泌、郭子仪平叛。

757年，安庆绪杀父安禄山自立为帝。

759年，史思明杀安庆绪自立大燕皇帝。

761年，史朝义杀父史思明。

763年，史朝义兵败自缢，安史之乱历8年，至此结束。

安史之乱结束后，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演愈烈。各节度使截留赋税、自置官吏、扩充军队、父业子袭……俨然成了一个个的小王国。其中以“河朔四镇”最有实力，中央政府无可奈何。

大历十四年(779年)德宗李适继位。这位皇帝本想有番作为，试图以武力削藩来扩充皇室权威。没想到不是引狼入室，就是惹火烧身。经奉天之难后，他简直成了斗败了的公鸡，一点儿锐气全无，不但不提削藩，且采取“姑息纵容”之策，力求各自相安无事。如果到此也就罢了，此老兄削藩削得谁也不信，尤其是对武将个个都怀疑有反叛之心。经此兄小脑袋瓜再三斟酌后，终于着了祖上的老道儿，把禁军(当时称神策军)交给自己身边最可靠的人——宦官来统领。好了，至此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专权，一切不安定的因素全已齐备，只差外戚来“锦上添花”了。谢天谢地，亏得这一次没什么娘家人来添乱。可能是杨国忠之戒就在眼前的缘故吧。

3. 永贞革新。贞元21年(805年)正月德宗死，太子李涌即位，是为顺宗，改元永贞。

顺宗为人宽厚，思想较开明。他以王叔文、韦执谊、王伾为心腹，起用柳宗元、刘禹锡、程异、韩泰等一大批有志之士，力图进行改革，这就是史称的“永贞革新”。

永贞革新以打击宦官势力为主，并宣布大赦、取消宫市、释放宫女和教坊女妓，下令免除欠税……此次革新革除了不少弊政，办了不少好事，但施行只146天。因为神策军的兵权在宦官手中，于是宦官弄权，逼李涌禅让，太子李纯即位，号宪宗，改806年为元和。王叔文被赐死，王伾病死贬所，顺宗在兴庆宫去世。而参与改革的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哗、陈谏、凌准、程呈都贬为南方边远各州任司马，人称八司马。

宦官的权势发展，其实早在玄宗宠信宦官高力士时已有端倪。玄宗授处理章奏之权于高力士，是公开的让宦官干政走上合法化。代宗时，取消了宦官监军的制度，可到了德宗那儿，因宦官曾保护德宗脱险于兵变，于是这个被取消的宦官监军制度又得以恢复。这就使宦官不但名正言顺地可以干政，并握以军权。尤其是宦官当神策军的统领，这既可以说是宦官直接在保护皇帝，也可以说这种“保护”实际上是一种“挟持”。这个德宗真是够混帐的，他这一缺德的宦官监军之制，足足遗害中华帝国一千余年。

公元814年，彰义节度使吴少阳死，子吴元济叛变。李朔乘大雪夜袭蔡州，平淮西镇，割据三十多年的淮西得以铲除，使河朔臣服。

宪宗可削蕃，但对日成气候的宦党却任由摆布。元和十五年(820年)终因服长生不老之金丹，药发而亡。宦官陈弘志乃此阴谋的主使，却逍遥法外。道士的金丹最多是成不了仙，也罢了；宦官的金丹却是要吃死人的，够狠了。

(二)晚唐与党争

公元820年—907年，史称晚唐。

宪宗死，宦官们拥李恒继位，为穆宗。改元长庆，时821年。

长庆四年(824年)，穆宗的归宿同其父，着了服金丹而亡之道。宦官们拥其子李湛即位，为敬宗，改元宝历，时825年。

宝历二年(826年)，敬宗为宦官所杀，立穆宗次子李昂，为文宗，改元大和，时827年。

845年(会昌五年)，武宗灭佛，是佛教史上一件大事。

1. 牛李党争。从821至846年，长达26年的牛李党争，为晚唐的衰老更加上一把虚火。

平民通过科举人仕而排斥了门阀世家的特权，于是门阀世家作最后挣扎。他们指责平民力量是“轻薄”、“浮滑”而不堪重任……此一派为李党，李德裕为首领。李德裕为绝平民入仕之路而还门阀之魂，甚至提出停止科考，上表认为政府官员必须由世家子弟担任。相反，以牛党的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平民派，却勾结宦官，毫不惧李党。两派以私人恩怨为动力，以击倒对方为目的，用大唐这国家政治为舞台演出一场党同伐异的闹剧。牛党“轰然而来”，李党则“轰然而去”；然后李党再“轰然而来”，这回该牛党“轰然而去”……如此反复蹂躏，大唐气数殆尽……

平民官员与世家官员的内讧，背后直接间接是宦官和藩镇参与的结果。而这种内讧掩盖了宦官与藩镇给社会带来的危机，分散减弱了人们对宦官与藩镇的认识，使宦官与藩镇得以苟延残喘，从中取栗……被当枪使了的文人啊，傻得可以。闹来闹去，其结局不言自明：牛党牛僧孺被贬，李党李德裕被黜。两个政客集团的重要人物全部从中央政府中被清除出去——如摔下悬崖之驴，他们终于胜利了。



详查李德裕的能力，其开明与振作是为人敬佩的，而牛僧孺的道德人品，也使人默然首肯。但只要一涉及党派之争，二位全都失去理性、瞪突双眼，非要弄出个胜负方罢手，否则就求个两败俱伤、粉身碎骨。文人的傻源自阉党的奸，如此而已。写到此，不由得想起当今的非洲。想当年殖民者只教给当地土著人如何依宪法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却不教他们立宪的原则与法治的目的，更不讲自由、民主、文明与国家独立。好了，直到如今，非洲各部落仍为自己部族的蝇头小利而仇杀不断，当代文明的影子一点儿也无……当今在我国是早已没有宦官了，我们的文人被阉党挑唆也不可能了……但"文化大革命"呢？我们是否被什么东西挑唆了？如今的腐败与无德，是否也是被什么东西挑唆了？

牛李的朋党之争，是门阀世家最后的反扑。在进入五代十国后，战争使衡量人才变为以军功论定，而土地荒芜又使门阀世家经济崩溃。从此，门第门阀才从中国历史上彻底消失。

2. 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宦官专权。宦官专权对于中国的影响，如果只认识到为私利而弄权术、控军队、挑拨事非……这恐怕还是失之肤浅。一个人的成熟，无非来自两方面：一是从书本上学习知识而增长才干，一是从环境中培养出见识与德性，也可通称为人的素质、修养。前者的有形，是来源于书本与知识的有形；后者的无形，是他所处环境、接触到的人及经过的事情有关，无形于不知不觉的熏染。前者相当于文科理科的学习，后者相当于艺术院校内的学习。常见过去的梨园行、武术行、禅宗的宗下，他们的学习要从小与师父和师兄弟们在一起，行处坐卧受师父的熏染、一举一动受艺术的沉浸。于十几年后，出师了，一举手一投足就是正宗正派、正味儿的师门风采，行内称"得真传"、"正宗传人"。三字经上的"昔孟母，择邻处"，就是怕孩子学坏，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是说这种无形的力量就是熏染的魅力。

不能想象让狼哺育大的狼孩，能有多高的智商；也不能想象让太监呵护而长大成人、朝夕相处、登基坐殿的皇上，能不受太监的熏染。

太监，作为残疾的男人，是痛苦而绝望的一群。他们被扭曲的生理与心理，造成出人意料的冷酷无情和狠毒阴险。当这些品质熏染给皇帝，那这皇帝就多少沾上这冷酷怪僻的太监气，甚至其思路都和常人不一般地怪僻而固执。

中晚唐的李氏诸皇帝，个个儿都显露出这种太监气——聪明、轻浮、任性、冷酷、固执。

中晚唐不断的兵变和农民起义，千篇一律地是官吏、将军们的腐败与贪婪。这显然是麻袋的问题。而作为绳子的李氏皇帝们又千篇一律地认为是刁民作乱，乃土豆的问题。他们任性固执地从不做自我检讨，不去反省一下自己与官吏，坚定而无情地镇压兵变与起义，用断子绝孙的手法对待自己的人民。不仅是对待人民，这种太监气与准太监气也威胁着士大夫们。当宦官把持朝政后，你如果尚有自尊心，尚不会献媚，尚不会吞下屈辱，轻则科考榜上无名，重则革官发配甚至丢命。

李林甫让官吏们做马，宦官则让官员们做狗。

皇上只信宦官不信任官吏，把人民当刁民，这实在是只有宦官才喜欢的局面。好了，那背后的黑手终于伸出来修理这个国家了……

公元860年，裘甫起义。

874年，王仙芝起义。

875年，黄巢起义。

黄巢曾参加进士科考，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只是不跪倒于宦官膝下，才落第回乡，被逼得落草为寇。既以为寇，那就玩大点儿，于是他号“冲天大将军”，而他要冲的“天”，就是宦官之天。王仙芝有“天补平均”的利器，而黄巢则用“等贵贱，均贫富”去打天下。

880年，黄巢在长安称帝，建大齐。

884年，朱温叛变，李克用镇压，黄巢在山东莱芜虎狼谷自刎。

904年，朱温进长安挟昭宗李晔，派军入宫对宦官进行彻底无情的屠杀。用太监的冷酷无情去对付太监，也算是一个创举。几百太监连老带小一个不留，并逼李晔传旨把派在外边监军的太监也一个不剩地杀绝，使长达149年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宦官时代“斩尽杀绝”般地结束。

呜呼！宦官的影响岂是只有皇上？当被害人以太监气去杀绝太监时，能说这些人没沾上“阉”气？

907年，朱温废昭宗，自称帝，国号梁。

壮哉大唐，悲哉大唐。

618年—741年，初盛唐历123年；742年—907年，中晚唐历165年。

让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唐王朝，以今人愿意听到的288（儿发发）个春



秋后，寿终正寝。

历史进入五代十国。

连年的战乱，使中原人民大批南逃。原来五岭山脉之南，是贬官流放之蛮地。韩愈的“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而兰关即指岭南。六祖慧能的父亲也是贬官到的岭南。六祖拜谒五祖时，五祖曾问：“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慧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做佛，不求余物。”五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葛獠，若为堪做佛？”把岭南人称为葛獠，实够狰狞恐怖，怪不得韩愈的马吓得都不踏岭南之地，不入岭南之关。然而唐末北人南迁，与岭南人混居，形成“客家人”。后随南方经济发展，这些原本时刻打算回北方祖籍的“客家人”，索性稳稳当当地“客居”至今，且往南往国外发展了。

二、五代十国史略

五代十国的年代，在 907 年—960 年。

五代十国，是中国从统一走进分裂割据的时代，这个分裂割据又促成了宋朝的一统。在这分裂的 53 年里，使人们看到藩镇割据给国家造成的瓦解与危险。所以从宋朝开始，在封建政权的网络系统里，集权与专制更加趋于高度化，使封建王朝走向成熟，同时也走向了封闭的超稳定态，从而失去了发展的可能。也可以说在走向成熟的同时，也就走向了衰亡。

五代，指中原地区出现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五个朝代，共十三帝，历 53 年。

十国，指南方地区与五代并存的割据各国。有前蜀、楚、吴、吴越、闽、南汉七国，它们是唐末藩镇的直接产物。稍后出现的有荆南、后蜀、南唐三国，共十国。

南方诸国一般都只求自保，努力发展经济远避中原战场。这使得中国经济中心开始南移，这种南移为以后的南宋打下了雄厚的物质、文化的基础。

朱温 907 年建后梁，是五代的第一个朝代。

朱温此人既残暴又好色。为防兵变，他把士兵们脸上刻上字，对逃兵是一律处死。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将军们，也常是因一点小事而被杀。他的好色与无耻最终也送了自己的性命，他巡视河南住在张全义家，就把

张全义的几个儿媳妇和女儿全都"召侍"了去。对自己的儿媳妇也绝不放过。于是其子恼羞成怒杀父自立。

公元923年，朱家的后梁为李存勖灭，建后唐。

公元936年，石敬瑭引契丹兵灭后唐，建后晋。

石敬瑭此人就是中国人万世唾骂的"儿皇帝"。938年，年龄47岁的石某人拜契丹的耶律德光为父，耶律德光时年才37岁。这个小父亲看老儿子石敬瑭一脸诚恳，于是封他为"大晋皇帝"。更为可恶的是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使中原从此无险可守，北方骑兵可直下江南。石敬瑭死后，其侄石重贵为帝，石重贵对耶律德光称孙不称臣。我看这个人怪怪的，有毛病。既称了孙子，又不服气，搞不懂这是什么战略或是什么智慧。耶律德光也不知道这个"装孙子"的石重贵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于是派人来问，石重贵答曰："翁怒则来战，孙有十万横磨剑，足以相待。"自称是孙子又不服软，古今中外盖莫有焉。连未庄的阿Q在儿子打了老子后尚有自喜的可能，而甘当孙子的石重贵被激怒的耶律德光生俘，这就没什么后路了，自喜不起来了。国破家亡，被逐北方不知所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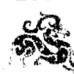
946年，后晋亡，刘知远乘耶律德光病死，占领中原。

947年建后汉。

950年，后汉为郭威灭，郭威建后周。

郭威这个人出身贫寒，在位三年进行了大胆的改制，对贪官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打击。这些措施深得人心，使唐末以来混乱的中原得以休养生息，走上安定之路。

954年，郭威病死，其内侄柴荣即位，为周世宗。在对南方后汉的高平之战获大捷后，后周因势而上。细品起来，周世宗不愧是五代时期最有作为的皇帝。说他有作为，并不在什么高平大捷这一两次胜仗上，而在于他能任贤与纳谏上。前文说过，这一能任贤二能纳谏，是开明与否的标准，因为那只黑手是受这两条标准调遣的。有这两条，那只黑手就让你成为煌煌之帝，如隋文帝和唐太宗；没这两条，惨了，黑手就让你"炀"一下、"玄"一下，不但国破家亡，连带着还要老婆上吊。周世宗曾让大臣各自写一篇《为君难为臣不易论》的论文，然后从众臣的论文中吸取精华，整纲纪、任贤才、俭节用、轻赋税、惩贪官、充仓廪……他还派人制《大周刑统》。这是一部较完整的封建社会的法典，宋朝的《重定刑统》就依此为范本。



好了，那只黑手来帮他了。

后周初期，因佛教的造寺与造铜佛像，占用大量土地、劳力，使铜币短缺。周世宗下诏清理寺院，回收佛像以铸钱。当然，立遭信徒非议。世宗亲砸佛像，并说："佛最讲舍己利人，只要于百姓民生有利，就是最大功德。铜像非佛，砸了炼铜有何不可？如舍我性命可利民，我也舍得！"

经周世宗多年经营，开创了中原大好局面，为北宋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

959 年，世宗逝，子柴宗训继位，才七岁。

960 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废帝建北宋，中国又进入一统的发展时期。

在中国南方的十国，我们不再详述，只举一两个小故事，以冲淡读史的乏味与呆板。

964 年，北宋灭后蜀，解帝孟昶全家到汴京。七日后，孟昶死。孟昶有一宠妃，号"花蕊夫人"，太祖一见动心，召入后宫。其弟太宗怒，认为这位"花蕊夫人"先克死后蜀，今又要克其兄，所以一箭将她射死。可怜这位夫人，代表中国妇女受了不白之冤也。

相传花蕊夫人曾写诗辩白："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只是这种辩白的声音在庞大的封建政权与礼教观念的网络中，实是一种绝望无力的细语。

第二个故事，说一说南唐后主李煜。

李煜，李璟之子，原名从嘉，字重光。此公是文坛巨子，词坛霸主。但一说当皇上，惨了，什么都不是。中国历代皇帝，有爱风月的、有爱诗词的、有爱江山的、有爱美人的、还有爱当木匠的，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只是李煜舞文弄墨绝不是业余的段位，从填词一项上看，绝对的正宗专业九段，应该说是超一流人才了。他的词我们放到第二节中去讲。

李煜爱美人，也是人所共知。他的妻子大周后皇娥，娇艳绝伦、通音律、善词赋，小两口朝夕切磋，不理国事，更不把什么忧愁放在心上。大周后患病死去，李煜又迷上其妹小周后。小周后不似其姐多文采，但围棋下得好，也是专业九段的伎俩。于是这二位传令卫士守住宫门，所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一律不得进奏，摆开棋盘天昏地暗厮杀起来。

李煜纵情声色，奇招叠出。后宫一宫女俏丽多姿，以帛缠足取媚李煜。李煜一见三寸金莲犹如打了吗啡，痴迷而不能自制。从此以后缠足

成了女性的一种美，遗毒千载。这实在是随李煜万古不朽之词而流布出的另一种千年畸形之害了。

978年，南唐亡，李煜被押到开封，成阶下囚。失意之处，信手写下名篇《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宋太宗不能容忍这思念故国之情，肚量也小得可以。人家已是阶下囚，何必斩尽杀绝？但宋家天下是赵氏政变过来的，不是从马上得来的，所以对什么思想思潮敏感得不成。于是在978年7月7日，李后主42岁生日，鹊桥上牛郎织女相会的好日子里，太宗送毒酒给李煜“祝寿”，一代词圣死去，小周后不久亦悬梁自尽。

这一回真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三、北宋史略

北宋，960年—1127年，传七代，九帝，历16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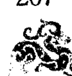
1. 陈桥兵变与杯酒释兵权。赵匡胤篡天下，演出了一场人间大戏，节目名称叫“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导演自然是赵匡胤，副导演就是弟弟赵光义和掌书记赵晋，帮闲凑趣的有苗有训，会看星相，识天机。好了，各色人等聚成四人帮，可以行事了。

序曲是世宗死，七岁柴宗训即位，孤儿寡母正是让人欺侮的好时机。

第一幕是苗有训宣称天上有两个太阳，于是上合天意，另有明主将替代幼主。

第二幕乃谎报军情，契丹南下，需赵匡胤领军北上。三军至陈桥驿小憩，赵匡胤酒醉躲开，手下的众演员在副导演的带领下上场，大呼“皇上幼小，为耳卖命，谁会记得我们的功劳?”有人应：“上天示命，应立赵点检为帝。这拥戴之功，富贵可保!”再有人索性鼓动曰：“说干就干，当机立断。”……于是分头准备。

第三幕，这可是全戏之核心了，高潮部到来。第二日晨，众将官趁赵



匡胤酒未醒彻，扶他坐好，把一件黄袍披在身上，三军跪拜，山呼万岁。

第四幕，结局。赵匡胤扭扭捏捏"被迫"坐上皇位，改国号宋，改纪年建隆，定都仍在汴京，安置柴家哭哭啼啼的孤儿寡女……北方什么契丹入侵的事儿黑不提白不提了。

落幕。靠雕虫小技，靠皇上弱小公然夺权。虽说兵不血刃也算积德，但要防止别人也弄个黄布往身上一披就"黄袍加身"，却要费些心思。赵匡胤从禁军小卒逐步升到将军，再至如今当了皇帝，所以对军队的作用深知利害。于是第二出戏又开演，名曰"杯酒释兵权"。这一回导演和主角是他一人包揽，肥水不流外人田也。

建隆二年(961 年)初秋，宋太祖赵匡胤召众将领赴宴。这回帐后没有像通常的那样伏下刀斧手，这太老套了，再说用杀的办法不是赵匡胤的作风，他用的办法是"哄"！你们把我哄上宝座，好，我把你们哄回老家。话说宴至酒酣，赵匡胤开言道："当皇帝很累很难，日日不能安枕。"众人疑，问："为何不能安枕？"赵正色曰："皇上这把龙椅，谁不想坐啊！"众人惊，环视左右好在没见刀斧手，也没见皇帝摔杯为号，但早已汗如雨下，诚惶诚恐地："陛下怎么这么说话？谁敢怀此非分之想？"赵匡胤不紧不慢地说："你们是我的好兄弟，你们当然不会。可有人往你们身上披一黄袍，逼你们当皇上，你们如何拒绝得了呢？"这一回更把众人吓得不轻，前一出戏黄袍加身就是这些人亲手干的，谁也保不定下一出戏是什么，是福？是祸？是赏？是罚？于是众人齐刷刷地跪下，求一条生路。赵匡胤说："人生苦短，转眼即老。毕生拼搏，为了什么？不就是升官发财，儿女富贵么？依我之见，各位不妨辞去军职，改作文职。建豪宅、玩地产，炒股票、养小蜜。三陪夜宴桑拿浴，日日都挣外国'T'。君臣不忌、上下相安，你搞你的腐败，我做我的皇帝，既有原则还省力气……各位以为如何？"众人豁然彻悟，磕头谢恩。第二日纷纷上折，或称有病或称父母衰老或称孩子太小，故而脱下军装换上西服，拿上去各地任文职的调令匆匆赴任去也。

赵匡胤，只一军校出身耳，耍一手好棍棒罢了。但长年的社会实践和对历史上藩镇危害的深层次思考，使他具有了高超的政治手段和能驾驭人性的用人艺术。自汉朝以来近千年的兵变与割据，只这一席酒宴就做了个了结。节度使的官职废了，藩镇的什么这个王那个王更不许存在。官员只有虚名，无实权。政权由中央特派"通判"掌握，军权财权统统由中

央直接管理。

综上所述，大宋在加强皇权专制方面，做了以下努力：

(1)改武官任职的高级长官，为文官任职；

(2)地方上县级以上官员直接由朝廷任命；

(3)地方上的精兵编入禁军；

(4)地方上的财权划由中央直接管辖；

(5)集中在朝廷的这些权力分多头管辖。

中央的政治机构，以政、军、财并列为三个系统：

中书省，管政事。执政的为相称“平章事”，但他不能总揽全国军、财大权。

枢密院，管军事。执掌军权的为“枢密使”，但他不能管禁军，只能把禁军分成三个系统，各有各的统帅。

三司，掌财政。其首长为“三司使”。

御史台，行使对百官的监察，最高长官为“御使中丞”。

而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及御史台，统统归皇上一人管。这样高度的集权，防范了割据的威胁但其弊也十分明显。

2. 高度集权之弊。首先是冗员与腐化。例如要调动一个官员，往往要经过数个部门，盖上几十个公章，行上几十份贿赂，方见消息，否则定然石沉大海。因为你那调函在任何一个门坎前都可能被压下，数月无人问津。如此繁杂的手续，使官员们渐渐学会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有非办不可的公事，那也要端起官僚架子，想着法子让公文畅游于各机构间。一个机构上百的官员，吃着皇粮干不了正事，人浮于事乱乱哄哄……但这正是赵匡胤要的。

其次，人无大志，得过且过。今日这里为官，明朝那里行走。任何规划、计划都费劲不落好……俗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瞎话，此流毒源自宋朝，但这也正是赵匡胤要的。

第三，最重要的弊端，是军事上的软弱。别说敌人进犯这种突发事件，就是要演习一下，军队都要级级上报，最后让皇帝老儿同意方可。还没完，同意后还要再报财政部门申请经费，做个预算，层层报上去，财政部同意后，再层层批下来……可各路兵马如何调度？于是做个计划，层层报上去，交通部同意后，层层批下来……层层报上去……层层……春天要演



习，等这层层批条全办妥，已立秋矣。所以史称“金兵已渡黄河，宋人议论未定……”你想啊，边境前哨发现敌兵，飞马级级上报，皇上惊闻烽烟，召集文武百官。管军的说将士们正在缺钱，吃了上顿没下顿；管钱的说一时半会儿银两无法筹措，可否先贷点儿款；管运输的说筹了款也运不去，管营造的不拨运输工具；管营造的说车辆早该修，前年就上表要钱修车买马，可你不给钱……皇上怒道：“无法子了么?”管营造的说：“可否议一下和?”管钱的说：“省了征税与加捐。”管军的说：“养精蓄锐以利战。”皇帝一想有道理……金兵可不是早都过了黄河。别说是兵，连老太太也都过了济南。这一回可不是赵匡胤想要的了，但这一回是你不要也不成了。

宋王朝就是以这无所事事而立国，以不求上进而设官职，以不求效率而建构政府，以儒家的保守教育官员……

宋朝如唐，以科举入仕，以推荐而由仕再进入权力的高阶层。如此这般，知识分子要有两般本事。先是读四书五经以入仕，再以结党攀附而获推荐入高层集团。于是舞文弄墨、吹吹拍拍、朋比结党、拉帮结派就不希罕了。有朋党则必有斗争，斗争的策略是以君子或小人来判定人。凡有分歧，不谈实质，全力去证明对方非君子乃小人而已方乃君子非小人即可。呜呼，天下事情怎么这么简单呢？该简单的敌军犯边复杂得头痛；该复杂一点儿的却又简单到非 A 即 B。如同“文化大革命”，什么革命、生产、好人、坏人、前进、后退……都莫问，张嘴先问：“什么出身?”

儒家的僵化，是以头脑的简单化为始，体现为无生气、无智慧的呆板说教，继而以国家丧师失地之辱、士大夫不知东南西北之呆为终，大宋气数休矣。

书归正传。

开宝九年(976 年)宋太祖赵匡胤突然病死，其弟赵光义继位，为宋太宗。

993 年，王小波起义，提出“均贫富”的口号。

从 997 年至 1067 年，是北宋中期。这时行政机构更加冗涨，腐化更加泛滥，加重了对人民的盘剥。

在对外抗敌上，北宋是一路的屡战屡败，虽然仍不乏有爱国将士。

3. 杨家将。爱国将士首推杨家将。986 年，辽国正是“主幼国疑”，宋太宗趁机发动第二次北伐。宋军兵分三路，而西路主帅是潘仁美，副将即杨继业。杨继业身为先锋，不到一个月连克四州。但因东路中路两路兵

马好大喜功，轻敌冒进而溃退，宋太宗无奈，令西路兵马退回代州。可是刚到代州，太宗诏书又至，让西路军马把收复的四州百姓迁回关内。一诏不似一诏，这皇上当得够糊涂。打下四州让退兵，退回来后再杀回去把百姓们都迁回来，这个仗没法子打。没辙，圣命难违。杨继业提出一个智取的方略，王监军讥笑曰："杨将军素号无敌，今面对强敌却退而避之，莫非别有用意?"你说与这种混帐东西有什么好说的？用这种人做监军，国家岂有不败之理？杨继业无奈，只好孤军北上，不久陷入重围死伤过半。当杨继业退回陈家谷口，本应在此接应的潘仁美却因惧敌早已逃之夭夭……追兵至，杨继业全军覆没，自己身负重伤被俘，后绝食三日而亡。

杨继业死后，其子杨延昭任高阳关副都部属，守边二十多年，战功累累。辽军闻风丧胆，并以"谁要是没安好心，打仗时当头碰上杨六郎"为咒人之语，可见他的威慑力。他的儿子杨文广也是边防名将，曾在河北、陕西戍边，多次向朝廷献出收复失地之策。无奈从太宗到真宗到英宗，每位赵氏皇上全都千篇一律地没有丝毫想收复失地的念头，真让杨家三代好儿女胆寒，亦令战死的英雄们死不瞑目啊。但人民热爱他们歌颂他们，在仁宗时杨家将的故事已是妇孺皆知。时至今日，杨家祠庙香火不断……这是中华的传统、是民族的希望，英雄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公元 1005 年，北宋与辽国缔结了"澶渊之盟"。这对宋朝是一个屈辱的和约，每年 30 万的岁币，使北宋人民又背上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在寇准的极力斡旋下，终于使宋辽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客观上使北宋得以恢复生产。

不管怎么讲，北宋的积贫积弱之国势，从此成为定局。

4. 范仲淹的庆历改革。庆历三年(1043 年)，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施行了著名的"庆历新政"的改革。庆历五年改革失败，范仲淹被贬颖州。支持他的杜衍、富弼、韩琦、欧阳修都被逐出朝廷，贬往边远地区。

庆历六年(1046 年)，范仲淹写下了《岳阳楼记》，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九百多年来一直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美德和境界。

公元 1067 年，北宋在一筹莫展中结束了它的中期。

公元 1068 年，神宗即位，北宋进入晚期。从 1068—1127 年，北宋历神宗、哲宗、徽宗、钦宗，而这一时期最大的事件，即是王安石变法。



“庆历新政”改革的失败，终于引起更加严重的社会矛盾。而变法与反变法，在朋党相争的网络结构里，马上变成支持变法的“新党”与反对变法的“旧党”之争。呜呼！当一个政府的政治经济行为潜移默化地变成党派之争时，一切衡量社会是否进步的标准，衡量是否是富民强国的标准，全变成了帮与帮、派与派之间的权益大小为标准了。拿国家大事当儿戏，以自己私利为最高目的，用儒家条律做武器，只要把对手打翻，打成小人，则完成了国家大业、保住了民族尊严、捍卫了领土完整、促进了繁荣富强……这是哪一家的理论？但千百年来，这种君子还少么？

禅，倡止观也，我的体验是：对于“止”，每每静思一件事，总是怕自己还未止到虚极、静笃，所以对自己所做出的判断，总是需要打翻了重来，长时间地再思索、再反思；对于“观”，也是每每检查自己是否戴上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是否于不知不觉中有什么情感倾向。这是我33年来习禅的心得。简言之：很多事情的解决不在客观事物那儿，而在于主观的自己这里啊。在我详查了史书、传说、教科书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论后，我认为把这一变法单纯归结于为使国家富强而产生的新旧观念之争，是失之全面；把变法归结于纯党派的利益之争，亦失之于偏颇；把变法归结于纯粹个人的利益与意气之争，也过于穿凿。这是三者结合的产物，也是人性弱点的一个写照。

从人的本性上看，人有贪欲（进取）而很理性的向上的一面，有虚荣（自尊）而很情绪的保守的一面。前者，从褒至贬，排列出它很有趣的发展轨迹：

利：生存→食色→进取→自强→向上与实用贪欲（纯理性化）。

而另一面也可以依此排列出轨迹：

名：生存→食色→尊敬与爱→自尊→自信与保守虚荣（纯情绪化）。

看来“熙熙为名而来，攘攘为利而去”原本是不错的，并不是什么坏事情。诸位静观《清明上河图》，谁不说这是人间繁华之景象、人气旺盛之瑞兆呢？让我们自思，谁又不是生存在这两条线上呢？

没必要去争论这“名利”两条线对不对，好不好。你非要讨伐这个说法，那先请您放下虚荣心，想想连饿三天后这个东西有没有道理。

这两条线大约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必须的基础阶段

利：生存→食色→进取……

名:生存→食色→尊敬与爱……

这个阶段是做人起码的标准。一个人没了进取心,不会尊敬人不会爱人,则非人也,不在咱们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第二个阶段——合理的适度阶段

利:自强→向上与实用……

名:自尊→自信与保守……

这个阶段,是为人在世应控制住的阶段。当然,要小心理性的功利实用倾向和情绪的保守倾向。

第三个阶段——过分过度的奢侈阶段

利:→贪欲(纯理性化)。

名:→虚荣(纯情绪化)。

这个阶段,就过分了,只有极特殊的情况下它才具有合理性。例如为了一个什么目标,而拼命地去创造财富,或舍命守什么名节。我不能举例,这是大家各自去品的事情,一举例则易造成误解。

世上的事情,妙就妙在这三个阶段的人,并不是以民众、官吏、帝王这三个层次来对号入座的。有唐太宗、隋文帝那样控制自己在"适度阶段"的帝王,而官吏、民众也有处于"过分过度"阶段的"驴子"。

寓言里说一只受苦受难的驴子,驮一袋盐过桥,不小心坠河。上岸后,盐化去不少,货物轻了,驴子欢喜不已。第二天又过此桥,驴子故意掉下河。上岸后,因驮的是棉花,惨了,重量又加重几倍。这是驴子聪明得过了头,可归于为利而贪欲的第三阶段。而前边讲的驴子与农夫的故事,驴子偏执地要走山路外边,不听劝不服拉,那虚荣心固执得不能让人碰一下,所以只有摔下山崖,这可视为情绪化过了头,可归于为名而虚荣的第三阶段。

大凡有两个东西摆在那儿,A与B,原本不相上下不分伯仲。但非要你说哪个更好一些,你其实也没在意,只是挺随便地说"A可能更好一些吧"。而另一人却与你相反,说B好。成了!这回有扛可抬了。你马上全神贯注上天入地找理由,证明A确确实实比B好。这回不是随便一说了,你很认真……但到底是A比B好,还是B比A好?我看是你那虚荣心最好!

所谓修禅而开悟的人,禅宗里叫"明心见性"。从"名利"是否适度这个角度看,明心见性是让你具有一种从客观环境中去调节控制自己"名利"保持适度的能力。唐太宗、隋文帝,从国家富强、江山永固的角度上,



时时控制自己，并很违背自己“意愿”地去任贤和纳谏，所以成为一代明君；杨家将、岳飞、文天祥，根据民族利益所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调节自己“名利”的尺度，以非理性而纯情感地献身中华民族，为万世流芳；司马迁与杜甫，在个人遭受种种打击后，为中华民族而放弃自己的恩恩怨怨，把“名利”尺度调节到一个相反的追求上，纯理性非情绪地完成了《史记》与《杜诗》，让中华儿女为之赞叹。

5. 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以国家利益民族兴旺为重，不惜自己性命去追求变法。司马光祭起儒家伦常之绑仙绳、帮派朋党之金砖、小人嘴脸之暗箭齐齐砸过去……

在宋朝，凡给皇帝上课（径庭）时是老师站着讲皇上坐着听，王安石认为从尊师重道上看，应让老师也坐着讲。“旧党”大臣吕海板着脸一副除恶务尽的虔诚样上奏道：“以牺牲皇帝尊严而长教师威风，乃不合君臣之份。”换成今天的模式就是某什么什么代表向政府提议曰：“以牺牲官员的利益去长教师的工资，乃不合时宜。”为除异己而满口经典，甘当奴才又一本正经，想当婊子还要立牌坊……这种人在中国也算不少。

有一天皇上问大臣文彦博，说人民都欢迎改革，为何你们反对呢？文彦博答曰：“陛下，你是用士大夫统治国家？还是由小民统治国家？”皇上赵顼老儿顿时语塞——脑子里定是一片空白，“入空寂”了，就是不知能否开悟？悟什么？悟：这个国家原是为官吏服务的，而不是官吏为皇上为人民服务的。

我们从这里还能悟什么？悟：任何一个理论，当它忽然很动听时，绝对而100%有道理时，那它可能已被人利用了。因为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其反面与不足啊，它不可能十分动听与百分百正确。也因为如此，邓小平才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意义在于：你要时时处处用客观环境的变化调整你的理论，而不是简单地结论为：“凡是”动听的就是好的。

中国有句古语，叫“雏凤清于老凤声”。是说有个神话，叫“凤凰涅槃”，凤凰是美好的，但是再美好的东西，过五百年也要衔香木以自焚，化为金凤啊。

改革开放，就是雏凤，是经过痛苦的涅槃之后的金的雏凤。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共600万字，编年史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的又一部有名的史书。在他亲自写的书中，要求帝王们要有伟大的胸襟，要善于听取不悦耳的意见——好理论。

但苏轼劝他不要撤销“免役法”时，司马光翻脸怒斥苏轼——坏的实践。怎么评价司马光这个人呢？只能说他执名已到了过分的阶段。从这个角度上看，他辛辛苦苦著《资治通鉴》和虚荣心让人碰不得，就能让咱们理解什么叫过分了。

同理，当新党变法，旧党从个人利益、党派利益、儒家经典、遗教祖训……乃至个人的虚荣、本党的脸面……出发，予以全方位攻击时，我们也就理解什么叫过分了，其结果也不言而喻了：新党必走麦城，王安石难有好下场。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简单地说有以下几点：

(1)建立政府贷款制度——青苗法，以使农民度过“青黄不接”；

(2)清查漏税耕地和理整田赋；

(3)建立公平劳役制度，颁“免役法”，规定每个成年男子有服劳役的义务(如申请免除劳役，则上交“免役钱”)；

(4)更新武器；

(5)改进考试科目和学校课程。过去科考，一考诗赋，二考帖经。帖经即《五经》的填空白，此一举显然是让举子们背熟五经，否则谁能于冷不丁地一句当中填上空出的几个字？这种考法与培养人才毫不相干，王安石下令一律改掉，改为考议论文；在学校课程上除授三经外，加地理、经济、历史、法律、医学。

显然，变法成功将给后世留下一先例，也不至于一片死气沉沉。

还有些变法条目，不赘述。

6. 程朱理学。变法失败后，儒家理学诞生。理学的创始人乃程颐、程颢二人，史称“二程”，“二程”理学经南宋朱熹继承发扬后，称为“程朱理学”。

理学吸收了佛家修行和道家修炼的方法，制造出“凡人，经严肃认真地读儒家经典，则可修成正果——圣人”这样一个成才模式。这个模式压制和否认一切情感、灵性、幽默……以苦行僧式的苦，以炼丹术似的无味去反复咀嚼前人吐出已一千多年的经，还要摇头晃脑有滋有味地读……真见了大头鬼。怕是连鬼都宁可再当鬼，而不想当什么劳什子“儒”、不想读什么劳什子“经”。

公元1102年，蔡京为相，与宦官童贯沆瀣一气，大宋江山更加危难。

公元1126年，金兵围开封，此年为“靖康”。



是年北宋的上任皇帝徽宗赵信和现任皇帝钦宗赵桓双双被围在京城内，金兵提出赵桓毁约，要求割让黄河以北的地区。赵恒本已接受，背上卖国贼的罪名也认了，可正巧这时出了一个天大本事的大师——郭京。据说此大法师自幼学术、密受高师指点，夏练南海、冬练昆仑……知阴阳、识八卦、通佛道、透旁门，更兼某日于川南深山老林，依缘拜谒诸葛仙翁，亲授“六甲法”可破金兵、擒元凶……一句话，修行几十年，专为解这大宋一难而重现凡尘。于是赵桓深信不疑，筑坛起醮、排童男列童女，竖彩旗焚高香、念动咒语、催动鬼神……后，命大开城门派若干附体中邪的士兵出击捉拿金贼。谁知出城的士兵反被贼捉了去，守门军士急急关门，金兵差点儿杀进城来。郭京再掐指一算，说：“这一回我亲去，必降妖孽于城下。”帝命士兵把他缒下城，好了，大法师一溜烟跑回深山修行去也，全无踪影。金兵大怒，陷城擒二帝，黜二帝为平民，连同皇族三千人，什么宦官、嫔妃、官员、宫女、驸马、国舅……一并聚齐，一乘牛车装上二帝，众人随车吱吱呀呀北行六千里外，喝西北风去也。

1135 年，徽宗死在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

1156 年，钦宗被迁回北京，完颜亮逼他赛马球。81 岁的老人跌下马，被践踏而死。靖康耻，耻在国亡，更在二帝被戏弄而死。

1120 年，北宋晚期，有方腊起义。其口号是“打倒北宋皇朝，以谋取农民生活的改善”。同期在山东境内还有宋江的梁山泊起义。

因为本书是以禅宗和汉文化为主，所以同期的辽、夏、金诸国则略去不述，诸位见谅。

四、南宋史略

公元 1127 年，钦宗之弟康王赵构在京即位，是南宋第一位皇帝，为宋高宗。

1128 年，迁都杭州，称临安。

1. 岳飞。提起南宋，第一件事要说岳飞了。岳飞（1103—1142）字鹏举，河南汤阴人。他原本是爱国将领宗泽手下一统制官，于金兵北渡时，在牛头山曾大败金兵，收复建康。他和在黄天荡与夫人梁红玉大败金兵的韩世忠，抗金将领张俊号三人，被国人称为“三大将”。试想以李纲为

相，宗泽为帅，统领三大将，那国土何愁不复？国耻何愁不雪？但赵家天下不喜攘外，只喜安内。外辱可以议和，以屈辱苟延保一条命，但内乱则是掉脑袋的事情。从这个思维模式看问题，赵氏皇帝们是绝不会让国家有李纲、宗泽与三大将这样的班子出现的。所以李纲在做了 75 天宰相后，被排挤出朝；宗泽在收复开封后，嘶喊三声"渡河！渡河！渡河！"悲愤而死。东京顿时百姓失声、城郭泣泪，赵构毫无表情，议和派松了一口气，暗地里喊一声好！

这么个混帐王朝，怎能指望他对岳飞等人有好的待遇？

岳飞治军严谨，身先士卒，以抗金报国之旗，收编了梁兴、李定、杨再兴、牛皋等义士与爱国志士。绍兴九年（1139 年），岳家军大败拐子马，杨再兴捐躯小商河，岳家军直逼开封，达朱仙镇。这儿离开封只 20 公里，40 华里。这时从金国"逃回"的秦桧与赵构密议，赵构听后大以为然，发十二道金牌令岳飞撤军。这十二道金牌既是圣旨又是军令，同时意味着不遵令则是反叛是叛军。朱仙镇百姓跪于岳家军马前，牵衣顿足："同是天朝民，相去一何忍？"岳飞垂泪："十年准备，呕心沥血，而今一日之内，尽为乌有。"

之后，岳飞怒填

〔满江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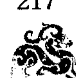
"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141 年，赵构、秦桧在临安论功行赏。升韩世忠为枢密使，提升岳飞为副密使，督促并一律解除他们的军权。同年秋，秦桧伙同万俟卨，诬岳飞谋反，捕岳飞、岳云、张宪入狱。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 年 1 月 27 日），杀三人于风波亭。岳飞临刑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是年 39 岁。

事后，韩世忠质问秦桧岳飞是不是真谋反，秦桧回答"莫须有"。

秦桧是南宋人，依江宁方言，此"莫须有"三字是"不见得没有"之意。但秦桧身为状元，这古代汉语想必在他那儿应当是当代汉语，所以这三字应是规范的行文、口语。以规范地解释，就是"不必非要有（证据）"。好了，时代前进了，人也学精了。来俊臣的《罗织经》尚须罗织一下，拷打一



下，事后要让“公”、“检”、“法”大家凑出一个卷宗来，以塞世人视听。如今不必了，“不必非要有什么”证据，看你是谋反就是谋反！这个气势与胆量简直比来俊臣进步了许多。

前人已故去，世界已千年。慎思之，仍有发人猛醒处：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如果其领导不怕外贼只怕内乱，也认为“外贼尚可割地或上贡而议和，内乱则死无葬身之地”，于是效法赵宋千方百计修理内部的精英和人才……那这个家庭、单位、企业、国家命不长矣。

反过来说，是什么使赵宋历代皇帝会有这么混帐想法的呢？是代代都有秦桧这样的吏啊。作为一个国家，最难在于治吏，而不是治民。民的素质低可以培养，老天闹灾荒可以赈济。但救灾物资是个吏就敢分、希望工程款是个吏就敢花……工厂工人说：“辛苦整三年，挣了三十万，买个兰鸟车，坐个王八蛋。”这样的吏当道，如何是好？

如果所有农民遇到的都是“夜住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之吏；所有工人遇到的都是兰鸟车中的吏；所有科研、事业、机关单位遇到的都是秦桧这样的吏……国家休矣。

作为中国人，只希望改革能彻底地进行下去。

书归正传。

李清照、辛弃疾、陆游等文人，我们放到后边去讲。

朱熹的程朱“理学”与陆九渊、王守仁的陆王“心学”，也放到后边去讲。

2. 宋朝对世界的贡献。在我们论及政治的腐败无能时，中国的人民发挥了特有的潜质，创造了不少人间奇迹。

(1)火药与火铳。在与外敌长期的抗争中，中国人发明了火药。1126年守城抗金的宋军就使用过“震天雷”，1161年的采石战役中使用过“霹雳炮”。具体这两种火器是什么样不得而知，但这是冷兵器向热兵器发展的证明却是确凿的。

管型火器的发明是1132年，守德安府的官军用竹打通内节，装入黑火药。一人持竹竿一人点火，使烈焰向城下敌军喷去，烧得敌军一片火海。大将陈规亲率这么有二十余竹竿枪的“火枪队”。此兵器具有了方向性和准确性，使火器又前进了一步。

1259年，寿春府守军发明了“突火枪”。它是在喷火竹竿内装入瓷

片、碎石、碎铁，用这些硬的子弹直接打击敌人。这显然比陈规“火枪队”那种只会喷火的竹竿又进了一步，是世界上第一支枪，名符其实的火枪。

后来蒙古人学到了火药与火枪的技术。北方少竹，所以他们以金属管子替代竹，造出世界上具有现代兵器意义的鼻祖——“火铳”。金属的制造，可以使规格统一便于大规模生产，枪管的口径可以控制，子弹可以标准化。同时因为金属承受的膛压远远大于竹子，所以射程、精确度也得以提高。

细说起来，中国人的四大发明应加上枪炮一项，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合为五大发明。

蒙古在西侵欧洲后，与中亚的科学家研制出巨炮，并使火药与枪炮技术传入欧洲。

(2)指南针。创造指南针的，可能是海盗。当初的指南针是于一碗水中放一稻草，把磁针别在草上以指示方向。此项技术由中国沿海路传到阿拉伯，再传入欧洲。

(3)瓷器。瓷器在宋朝进入鼎盛，共有三大名窑：景德窑，它由政府经营，也称“官窑”，“御窑”。汝窑，也是官办，瓷呈青色，有细的裂纹。哥窑在龙泉，这一系统细分为哥窑和龙泉窑。

其他不再赘述，只是提一笔：此时有纸币(交子)的发行、棉花的引进、纺织与刺绣高速发展、浑天仪……

总之，南宋的江南是繁华而富庶的鱼米之乡。

3. 繁荣与腐朽。史学家一致公认，南宋亡国源自其自身的四大弊病：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而前三者的形成是与第四者密不可分的。

前边刚讲完南宋种种之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怎么陡然一转又说民穷、兵弱、财匮呢？政治上的腐败无能，为何能造就两宋发达的物质文明呢？繁华而富庶的鱼米之乡如何能等同于民穷、兵弱、财匮呢？

此事需慢慢道来。

第一，从生态学上说。早在原始社会时，西安郊区已有半坡文化。从那时至唐朝的两三千年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以长安(西安)为中心的中原内地。而我们的生活无论是建筑、取暖、运输、机械、做饭全是以牺牲森林为代价的。可见从半坡时的建草舍与烧陶器，到大唐的繁华，我们用了多少木材？使多少森林变成了裸露的黄风蔽日的荒坡呢？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

百余里，隔离天日……”这三百余里的建筑群，使陕、川、甘、晋多少山全变得突兀了啊。当森林不再、水源减少、农田产量下降后，势必造成兵乱与不安，于是历史上有很多朝代迁都洛阳或以洛阳为陪都。

北宋，再往东迁定都开封。这种由西向东的迁移，是国都的迁移，更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迁移，是一路消耗森林资源、一路破坏环境的迁移，是生态学上的必然。

定都开封，躲开了资源问题，又来了水患问题。上游树林的砍伐造成黄河含沙量的增加。当黄河进入华中华北平原，水势变缓河道变宽，大量泥沙开始沉淀。河床升高，堤坝随之升高，居然成为地上河，百姓称为“玄河”、“天河”。一旦决口毁城镇、平良田……“水三水三”，老乡们讲得有理。一年决口，起码三年河道不定，南北翻滚，任其姿行，这三年就一粒粮食也收不到了。北宋期间，黄河三次决口北流，宋人三次力图使之回归东流故道。无奈河神不归赵宋管，固执地向北浩浩荡荡而去。1117 年，瀛州、沧州决口，淹死 100 万人，这是北宋灭亡的生态学上的必然。

政治家说北宋亡于贪，生态学者说北宋亡于河，其实还是亡于人。如果没有北宋时黄河三决口，那么节约的人力物力财力是否可以挡住辽兵与金兵？我看还是不能。

南宋，暂时摆脱了森林资源困乏之祸和黄河改道之灾，但又撞上了生态平衡之难。从 1127 年至 1276 年南宋这 149 年，因生活的安定，使人口增加了多少？以 20 年为一代人，增加了 7 代半。半壁江山，养着这么多男女老少，是不是太沉重了？这第七代到底是多少人我们不得而知。只知清初(1683 年)中国统一时，全国人口不足一亿。到鸦片战争时(1860 年)已增至 4 亿。计 177 年，九代人。第九代时人口翻至四倍，致使清朝的乾隆后，再也没了什么盛世。依此为一个约数，南宋 149 年，七代人，应翻三倍人口，是差不多的吧。这就够赵宋好瞧的了。

所以从生态学上看，表面上是桃红柳绿色、西湖暖风醉、水稻抽穗香、油菜花儿黄……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但深入内里看一下百姓们缴税后剩下什么，完了，“民穷”你就理解了。

第二，民富国强是一个综合的指数。一两件技术发明，某一方面的繁荣，并不能说明这个综合指数的提高，它很可能是畸形的。当有的人可以一顿饭花去几万元，而有的孩子因为交不上几十元的学费而辍学，那就无

法以这两点中的任何一点去评点是繁荣还是贫穷。

第三，宋王朝本身就是建筑在内安不攘外的基础之上，兵弱是赵宋王朝希望看到的。拥兵以自重、养敌以自重是赵宋王朝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于是宁可兵弱而以议和对敌，宁可受屈辱而不想兵强，是赵宋王朝制订出的“最佳”方案。真是偏安一隅、苟延残喘、得过且过、无所事事了。

第四，还是回到人的方面。“士大夫无耻”，是造成民穷兵弱财匮的根本。贪污腐化造成国家财匮，横征暴敛造成民穷。1130 年钟相、杨么的起义，就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而这支起义队伍正是爆发在洞庭湖这鱼米之乡，可见丰年民穷丰产财匮，富的是吏，无耻的是士大夫。

以上是对两宋，尤其南宋政治上腐败无能但经济上繁荣，可又是“民穷、兵弱、财匮”的一些分析。不见得透彻与中的，但从生态学、国家机构、综合指数、人的因素四点去分析，可能是解开谜底的一条不算全面的路。

4. 权臣贾似道。最后，讲一下南宋的权臣贾似道。前文讲过，封建社会五大病毒之一，即，奸臣弄权。

开禧三年(1207 年)，小人韩侂胄以私利而北伐终因失败被割去首级，金朝送他“忠廖侯”之称。此后，史弥远上台，丁大全、贾似道相继柄政，达七十余年。尤其是贾似道，南宋的灭亡和他有直接关系。他对外怯懦对内横暴，正符合了赵宋王朝的个性。

开庆元年(1259 年)，忽必烈正要渡江，而蒙古大汗病故，使忽必烈无心再战。贾似道既不思战，亦不思守，主动请和，私下许诺以江为界，并奉岁币 20 万两、绢 20 万匹。在蒙军撤退后，他又先毁约，杀掠敌散兵游勇 170 多人，埋下以后蒙军再侵之口实。1260 年，贾似道不言私自议和之事，鼓吹自己击溃了蒙军，弄了个天大的骗局把世人当小儿。后蒙古派人商议议和具体事宜，因这是贾似道私下议的和，怕世人知晓，所以扣住信使 16 年，这笔账当然蒙军又记在心上。

1267 年，蒙古对宋用兵。1273 年，元军破樊城。1275 年，宋军溃，贾似道逃到扬州。此时南宋百官愤怒、朝野激昂、要治罪于贾。在他被流放后，解押官郑虎臣与他有仇，沿路凌辱，在漳州木绵庵将他杀死。

当后人评论贾似道时，在承认其卖国误国后，很“客观”地肯定他的“才能”与“作为”，似乎江南多少年的太平，与他的乞和有关。我认为这种看法不妥，一个好的掌舵人，应知道什么叫韬晦，知道自己的步骤和强国



的目标。换言之，在外交上的容忍，是为一个强国的目标服务的。而贾似道虽然以乞和使南宋有了短暂的安定，但在这短暂中他并非如越王勾践那样想着强国，而是尽情玩乐。“朝中无宰相，湖里有平章”说的就是他……议和只是为了他能日日醉湖边……这叫什么策略？

假如说唐太宗告诉我们怎样管理国家，那么唐玄宗是在教导我们不要这样管理国家；而贾似道努力地使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人，哪怕他是地痞流氓都可以管理国家；南宋的最后灭亡，又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国家还不如不用人管。

5. 文天祥。南宋灭亡之际，中华民族出了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端，号文山。宝祐四年(1256 年)，他 20 岁时状元及第。但奸权当道，使他仕途不顺，在家赋闲 16 年。

德祐二年(1276 年)，文天祥起兵赴难，被派往元军谈判被扣。后逃出，参加抗元斗争。1178 年 12 月，在两年斗争后再次被俘。元军听闻他的大名，为收买人心多次劝降，并打算把他押解到元大都(北京)。在过珠江口外零丁洋时，他写下留传万世的七律《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元忽必烈在文天祥到大都后，曾亲自劝降，并委以宰相之职。文天祥答曰：“只求一死。”出于惧怕文天祥的号召力，七年后，1283 年 1 月 9 日，杀文天祥于大都。

一介书生，一位文人，有此骨气乃中华之特质。这个特质尤其表现在自己的祖国可能是千疮百孔、积弊丛生，但这是自己的祖国、是民族之根，为此而献出一生，是正气使然。这使我们更加理解什么是正气：正气浩浩荡荡、纳百川、吞长江，不论是个人恩怨、正邪忠奸，凡是我中华儿女，总是正气所容；曲直是非、善恶进退，只要是为我中华，也算是“杂然赋流形”。壮哉其志向，阔哉其胸怀，“于人曰浩然”，“一一垂丹青”。

1276 年，伯颜在临安俘宋恭帝，南宋亡。



第二章

从杜甫到宋话本

上一章主要是讲中晚唐到南宋的政治、经济等方面，这一章是讲这个时期的文学发展。我们试图从这发展中寻出一个脉络，以期能探索到中国文人的一些真实的思想与情感。

一、诗圣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是唐诗中现实主义风格的顶峰巨匠。他与李白齐名，并称李杜。

韩愈评价他们“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是一点儿都不为过的。体裁体裁，艺术体裁，是说一定形式的艺术样式、规范、体制。既然它是一个样式体制，那么其“制”其“裁”必将有一定的饱和的度与量。人的情感与理性是可以无限发展的，而体裁的“制裁”（度与量）将会限制这个发展。也就是当理性与情感充满这个体裁后，就饱和了，如果再发展下去势必就会超出了这个体裁的容量，是这个体裁所不能承载和容纳的。换言之，此时在这种体裁内已失去了再发展的可能。岂止诗歌，任何一种艺术体裁一旦被前人发展到了饱和，那它的发展就将被限制，后人于情于理上再也不可能超越前人了。出路只有一个：根据时代不同、内容不同想法子出新。这也算是一种超越，这种超越意味着新的艺术体裁的诞生，而非旧的体裁的因循。

体裁对情理的限制，说到底，是有限对无限的限制。





艺术样式与形式的出新，说到底是“喜新厌旧”的必然。

按此道理来看，李白使唐诗在浪漫与情感的发挥上，其浓度已饱和；而杜甫使唐诗在现实与理性的发挥上，其浓度也已饱和。真是不想给再写诗的后人留有什么余地和后路了，二位夫子够损的，逼着后人“改行”。从诗的样式上看，不论是绝句、律诗还是长篇叙事诗，二位也全弄到了顶峰，后人只有不同境界的开拓、不同气氛的营造和不同生活角度的开掘，全然失去二位曾占领的高度。那个时代的诗人真是背运啊，万丈的光焰使自己黯然失色。当然也有不信邪的，于是小的闪光、弧光、星光时而有之，但能承接光焰者，连白居易、小李杜也无此能力。当然，为曲填上词而变为宋词，是此体裁的冲破，是新的出路。

细品李白为何登上情感的高峰，后人为何难以超越呢？主要是科举所解放的新兴士大夫们毫无规矩、毫无惧怕的气度与品质。这种气度是新生阶层的朝气与实力的折射，目空一切的骄傲使他们略带无赖味般的豪迈，像初生的牛犊、似战国时的百家诸子，纵横捭阖全无禁忌。李白自述：“自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便是证据。

李白所处的年代，是文人士大夫的青少年时代。当初唐四杰、陈子昂、边塞诗人、田园诗人铺好一条道路时，李白自然而然地不辱使命，沿着这路走上顶峰，所以他是“诗仙”。既已成仙，肯定是高处不胜寒，后人不可能再沿这条路去超过他，只有另辟蹊径。

杜甫所处的年代，是文人士大夫的中年。此时外界环境已不再娇惯这些人，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使国家忙于自救，哪有余力去照顾这些已走过“新兴”的“老”士大夫们啊？中年么，即“而立”之年，此时的诗歌要由熔炼炉中取出，放到现实生活中去淬火、去冷凝、去定型。

中国美学界，认为中晚唐的杜诗、颜字、韩文，在诗、字、散文方面为中国千年的封建社会后期建立了样板，这是有道理的。样板，即是正统的标准，是只可学而不可超越的。可问题不在样板上，而在树样板的人上。儒家从骨子里就喜欢树立样板，好像没了样板他们就不知怎么活了……周朝之礼是个样板，这杜颜韩三位也是样板……树立样板好像是要大家向样板学习，私下里却是在树那个树样板的人啊……换言之：树周礼其实是树孔子自己，树杜颜韩是树美学家自己，而“四人帮”边喊批林批孔边立样

板，其实是把开创样板的祖宗打下去换上自己而已。

扯远了，书归正传。

当李白那高贵、雅逸、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贵族之美与豁达"无赖"之美搅在一起时，一切使人瞠目结舌难以效法，这就宣布了诗歌的情感一端已被占领——诗仙的山头。

当杜甫那平实、无华、整齐、规范、用字精准的方正之美与严整深沉之美结合在一起时，一切使人叹为观止难以言表，这也就宣布了诗歌的理性一端已被占领——诗圣的山头。

当然，这两个高峰是浪漫与现实的不同风格之别？是豁达与工整之别？是放逸与悲凉之别？任你划分。但我认为当一个人的灵性与情感透过情绪的不拘一格来泼洒成诗时，叫李白诗仙风格；而一个人的灵性与情感透过理性，一字一琢推敲研磨再镶嵌进诗时，叫杜甫诗圣风格。你说呢？

世上大凡艺术，无非是情与理的辩证。这种情理辩证会以情绪无序的冲动或理性的排列分别表现出来，而这也正是两种不同风格之源头。这两种风格在诗歌中走到极致时，你不是看见李白先生，就是遇到杜老夫子，或者在他们二位之间。这里没别的出路，要不就当个小李杜、小小李杜、小小小……要不就超越他们。而超越就是要跳出唐诗的范畴。

作为诗圣的杜甫，其作品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而诗人的情感与思想也必定是多方面的。这里还不乏情感与思想的矛盾、志向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首先，我们看看杜甫作品中少有的充满豪放与激情的作品：

〔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这是736年，杜甫24岁时游泰山而作。当年杜甫科举落第，但他年轻气盛之心不减，并没有把这当回事。他依然去游历，以开阔自己的视野。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句，可谓名句，其胸怀之宽广、胆魂之"狂妄"，也算是与李白不相伯仲，这怕是文人士大夫们还能再轻狂一下的尾声了。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喜闻安史之乱平定，杜甫欢喜若狂。漫卷诗书、放歌纵酒且青春作伴，这实乃是杜老先生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爱国爱和平之心跃然纸上，其情感的强烈也溢于言表。前一首《望岳》如果尚有“少年狂”之嫌，那这一首是真正的“老来疯”的代表。为国为民而疯而狂，是深沉了一生的诗人心灵深处迸发出的最真挚的情感，如火山喷发、如钱塘大潮不可抑制。初闻先不由自主的涕泪，这是潜意识的表现；然后意识到自己失态，抹去眼泪去看妻子……拿起书又读不下去……口出狂言要放歌！要纵酒！要还乡！这个乡乃是回到东都洛阳这个家啊，心情之切似长江之涛，穿三峡，直泄而下……美哉！可惜杜老夫子是中唐的诗人，是经历了战乱的下层的“中年士大夫”，这豪爽之气，只此一次再也难寻了。

盛唐士大夫们走入生活，从半仙之体坠落凡尘，这是个痛苦的过程。杜甫从《望岳》，走到《前出塞九首》，让人觉得多少有了些后顾之忧：

“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嗔。”

这比岑参的“雪上空留马行处”要多了一份“往前走，别回头”的自戒！自律！一个学生，本是要去做功课，身后有一凶神恶煞般的声音在相逼：“还不去写功课？老贪玩，你找打么？×××！”当学生关上门，再也听不到那声音时，自己喃喃地：“横什么？不用你催！”当他写完功课，发现逼他写功课的人在干什么？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头上何所有？……”

背后何所见？这个学子还发现：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边庭流血成海水……被驱不异犬与鸡。”

倘若以上只是杜老夫子所见所闻，那么这个冷淬火过程是不彻底的。只有当自己亲历了这繁华世界中的人生辛酸，才有彻底清醒的可能。所以此番轮到老夫子“罹难”了。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看来新兴士大夫虽然有知识，但没有门阀子弟的物质基础。无基础而天马行空，惨了，离太阳太近，小心那蜡做的翅膀是会化的。

“甫昔少年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

这是老夫子在评判自己才高八斗、学富五车。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而自己的才华学识，无非是要报国呀，并无为己的私念啊。可是好了，下场如何？

“此竞竞萧条……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这回老夫子报国之志成为泡影，为了生存还要放下文人的自尊心，去追随纨绔子弟……只为一点儿残羹剩饭，日日追随马屁股跑。这和盛唐时饮中八仙的什么“眼花落井”、“玉树临风”、“醉卧酒家”、“高谈阔论”……有多大的差别啊？尤其是杜老夫子，他内心所受的屈辱，世界观审美观被否定的痛苦，简直是难以言表的。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一切使他茫然，但愤愤然不知向谁发泄。

“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

既然不知向谁发泄，那肯定是孔圣人的错了，是他把我教育成这么失败的人……

“君不见宫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

情绪过后早无声泪垂血矣，满眼只是日暮、宫墙……真是自己老了？不对，是这个冷处理终于完成了。

杜甫不是李白，二人个性不一样。李白不会让自己陷入这无望的痛苦之中，何况还痛苦到泪垂血。他会走！老子骑牛、李白骑马、庄子御风，三位半仙不甘堕地，骑上自己的家伙什，一溜烟“扯乎”！进山修道或再去醉卧他乡，反正是“不知所终”即可，这叫“太白遗风”。只要不落风尘，什么酒都敢喝，只是别弄来山西的假杏花村就行。而杜甫不是仙，他是入世的圣人，他要靠自己的两条瘦腿去追人家的肥马。

人，只有强忍下“嗟来之食”的痛苦，才能反思人生啊。“不食嗟来之食”的饿死者，我赞服他的自尊，死得干净，死得留名；为“不食嗟来之食”而出世者，我们佩服人家的功夫，修好了能成仙、能辟谷。咱不成，少吃一顿两眼发绿，不吃又是上有老下有小，全等着咱吃了食好去挣些散碎银子……换言之，自己嗟一下可以让全家光明正大地不嗟！何去何从？有人体会过当爹的为了儿子厚着脸去忍嗟来之食么？杜老夫子追马屁股就

是忍……作为一个正派的人，这种痛苦是世上最大的痛苦啊。

人生在世，顺境是很容易使人走向情绪化的。一顺则轻飘胆大、自视很高，“春风得意马蹄轻”么，再加上“笑一笑十年少”，而且生理上也“轻气上升浊气下降”了。殊不知顺境很难令人体会到生命真实的底蕴。在这条似乎完全彻底地光明通畅的路上，失败就在前边。

而逆境是很容易使人走上理性化。逆境让人冷静、沉思、自我检点，“先止而后能观”，是逆境中优秀人才的特质。虽然“愁一愁白了头”，而且生理上也产生脑内的“去甲肾上腺”之毒素。但唯有此，才能让一个人头脑清醒下来，免得头涨得太大。

澳大利亚原无鹿，自引进鹿后，澳洲人想大量繁殖。可是狼的捕杀限制了鹿的饲养与种群的壮大，于是澳洲人组织起火枪队，把狼从澳洲彻底地斩尽杀绝了。过几年，再看那些鹿，个个没精打采，全得了富贵病。没了天敌使它们的繁殖率下降、身体素质下降，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又使它们只知躲在树下乘凉、睡觉、桑拿、三陪、养二奶……悠哉游悠。澳洲人还算聪明，马上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于是再引进专吃鹿的狼。这一回，狼族兴旺，鹿族强盛，一切又归欣欣向荣也。老子说这叫“道”。阳为顺、阴为逆，阴阳相继、情理相承、顺逆相间、一切通流，就是正“道”。没有逆境，何以成人？

安史之乱，使杜甫的思想、情感经过快速冷处理及长期天然冷却后，最终定了型。

〔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使杜甫思想与情感最后定型的，首先是爱国。就是这么一个让自己失望的政府，这么个国家，但是他的热爱之情全然超越了个人思想与国家的瑕疵。这是自己的国家啊，如果说儒家思想使中国人保守落后，但这坚定不移地爱国，却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与优点了。一个家、一个国、吵得要分家、乱得要打仗。一旦有外辱，兄弟齐心、国民舍命、儒士不怕死，偏偏皇上差了点意思……这是世界上其他民族少有的一景。

而使杜甫情与理定型的第二点，是爱家。国破、恨别之后，惦念自己的家乡亲人。大的环境已遭破坏，退而求其次，但小家的温暖也是少得可

怜。战火中连续三个月书信不通，让人想得头发白且稀。

而第三点则爱人民。从三吏三别中可以体会得到，不再多说了。

《春望》一诗，其描述的对象是顺"客观→主观→客观"这么一条线路写的。陷落的长安城，因国破而变得野草丛生，前两句写客观的外界景物；而第三四两句写花溅泪、鸟惊心，则是由外景向内心的收敛、转移，这种收敛与转移是一个人睹物思情的自然的心理流程；第五六句写烽火与家书，是因国破而生情、因生情而生的泪与心，渐渐地再落于一个可提供温暖与安定的家，这简直是一个人最后的希望了。家是一个国家的最小单位，是最能理解和包容游子的地方啊，可是别说回家以享天伦之乐了，连家书也已三月全无……。鲍照一怒之下可以归里"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己呢？只因国破，别说任逍遥了，连年龄也不知不觉地老了呀。所以这三、四、五、六几句，是写主观的情感与思绪。而最后七八两句却落在客观的头发白且稀，这近在眼前的客观事物上。

在艺术上，凡是真实感情流露，凡是经典作品，都有这么个三段式的一条线，即：

以外在的远景全景来描述环境，并以此为因→引起内心的情感情绪变化，再渐渐归于理性的冷静→最后只以一个具体的客观事物的近景或特写来终止。

这种写法较封闭和肯定，终止性强。像岑参的"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也是这类的排列。

相反，即：

以近景、特写来描述客观事物→到内心主观的情感情绪，再理性的升华为→远景全景的客观外界事物，并终止。

这种写法则有相反的开放性的收束效果。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回首烟波十四桥"、"唯见长江天际流"都是这种结构。而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影视作品，最后一个镜头停在一个全景上，男女主人公远去，镜头慢慢拉成大远景，机位升……于是出"剧终"，出职员表。

可以非正规的作一个小结：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为完全终止（音乐上的术语），它是封闭型的终止；

"多少楼台烟雨中"为不完全终止，它是开放、余音未尽型终止。



杜甫以完全终止来收束《春望》一诗，使你难以描述的澎湃心情最后落在具体的白头发越搔越短这么个俗之又俗的小事上，这收束使你没有可以再说下去和再想下去的可能。春望春望，只望一眼就苦不堪言，别再望了，这是完全终止的艺术魅力。这种艺术魅力源于人的情感之极致，造成主人公再也不敢触及此情此物的心理，从而描述出戛然而止的人的心理历程。这种终止不是杜撰和空想得来的艺术方式，也不是可以随处乱用的。真的把视线从满京城的荒草联想到国与家，再收束到自己的白发上，这种收束本身就是艺术。蒋捷的《一剪梅》中写道："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萧萧。"这整个上片写的是大全景。然后转入下片写内心："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最后把这沉重悲凉的心情，轻轻落在一个眼前的小景物上"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完全的终止。

我们常讲禅宗有三个境界，这三个境界前面讲过，其简称叫：

"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只是山"。

杜甫眼里的满城荒草，蒋捷眼里的江上之舟，楼上之帘，这就是"看山是山"的第一层次。

而花溅泪、鸟惊心、风又飘飘、雨又萧萧、流光抛人，则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这是一个出世的主观情感情绪的高峰，是第二层次。

但最高的入世的理性高峰是什么？第三个层次是什么呢？不是广袤的宇宙、浩瀚的银河……别再往大处去找，要反其道往眼前小处去找……于是找到了"白头"、"不胜簪"、"樱桃红"、"芭蕉绿"。大凡找到宇宙与银河的，为俗手；大凡找到小物件的，为高手。而这小物件能恰如其分地承载情感情绪的，为高手高手高高手。一如王维的什么"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种"只是山"、"只是水"的白话，在这里是参禅悟道后的境界啊。

以诗词看禅，也可以以禅看诗词，凡是什么"空手把锄头，桥流水不流"全是指"看山不是山"的层次。如果悟道了，则老老实实地"双手举锄头"去干活，干完活从"水流桥不流"的桥上走回来，然后吃饭、念经、睡觉，这才是"只是山"的境界啊。

中国人写诗词（别的艺术门类和体裁没有研究），以"樱桃、芭蕉"这一类见长，也写得好，而"楼台、烟雨"似乎只是美。真的品下去，以"樱桃、芭

蕉”一类结束的诗词，适于写一个肯定的、难以言表的情感；而以“楼台、烟雨”一类结束的诗词，适于写一个开放的、未定的思绪。“白云千载空悠悠”、“惟见长江天际流”……都是第二种方式，写的是思绪，引人深思。这种方式含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索味道。

当这两种方式建立起来后，写情感和写思绪就有了样板，形成诗词的一种模式了。

于是人们寻求着突破。

有一些诗词是半截子形式，把三段式中第三段生生砍去，而形成特有的、难以言表的、千言万语道不尽的感觉。如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类诗词小令，从小的景物写起，转入写情绪后，突然停止，不再写第三层次由内心的转出，不再写大的客观外景。它把大的外景省略了。这种方式实在是一种“别提啦”、“说也说不清啊”的心情写照。

可能是中国人太务实吧，凡以“樱桃、芭蕉”式结尾写的诗词，多写人之情感，很实际很感动人而且精品极多；凡以“楼台、烟雨”式结尾写的诗词，多写人的思绪，很有庄老味、士大夫劲儿，带点仙气，有朦胧的美，精品不是很多；而大多数诗词只在其间，不上不下半吊子、温吞水；再有就是砍掉“外→内→外”这第三层而形成“外→内”两段式的诗词，这种诗词有种怪诞、出奇、别致之味，精品少之又少，但很出新；更有的文人，干脆砍去三段式的中间一段，以从景到景满纸写景。如佚名的：“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飞入芦花都不见”。如张继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上一篇全是几片几片，最后不见，挺美的，但只是如此。张继的诗却是名著，中国人识字的都会。全篇具有色彩的只是一个“愁”字，你说算不算写心情？算吧，只此一字似乎太少；不算吧，谁都体会到全诗的愁……这就是第四种模式了，它的景物描写从大到小，第一段第三段都完整，属完全终止的“樱桃、芭蕉”式。把个“愁”字嵌入写景之中，只能算是砍掉了第二段，形成“一三”段式，可却是美得奇、美得险！这类作品更是少之又少，少之又少了。

扯得太远了，匆匆小结一下，好往下说杜甫老夫子。

小结：

①诗词一般以“外（景）→内（情）→外（景）”形成三段式。



注："情→景→情"三段式的排列不合比兴之法，所以极罕见。

②凡以"大、全之外景→内心→近、特之外景"的，叫"樱桃、芭蕉"式完全终止。这类形式易于表现一个浓度近饱和的情感情绪。

③凡"近、特之外景→内心→大全之外景"的，叫"楼台、烟雨"式，这类形式易于表现一种气氛、一种思绪、一种理想。

④凡砍去第三段的，以"外景（或全景或近景）→内心"形成两段式，都很奇、很险、很美。

⑤凡砍去第二段的，以"外景（或全景或近景）→外景（近景或全景）"形成两段式的，美于文字上，很淡、很平。如果你能把内心部分极力地浓缩后嵌入诗中，作为诗之眼而形成点睛的一笔，那将是美不胜收的。虽然如此，也显朦胧，因为你压缩得太狠。

当这四种模式被穷尽后，写诗词的招法也已被穷尽，由诗词进而改为元曲的日子就不远了。当然这是后话。

安史之乱后期，杜甫写了三吏三别。

从《望岳》的报负到《兵车行》、《丽人行》的谴责，再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吞下屈辱，这是一个阶段。而安史之乱时《春望》的爱国爱家到三吏三别，则是爱人民的内容了。平铺直叙的描述，把情感深藏在对客观事物的记录之中，这大有情感在声嘶力竭之后归于无望而平淡、漠然的味道。但这种味道不是麻木，而是如司马迁一样忠实地记录。穷而后工讲的就是这种心境吧？

〔无家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这时杜老夫子已经没有了情绪的描写，什么"花溅泪"、"鸟惊心"全没了。有的只是叙述。诗人告诉你他回到家乡，而家只剩下残垣断壁，这早已是狐狸的家了……连家都没了，可县吏听说我回来了，还来征兵。反正没了家，去就去吧，服兵役也没了牵挂……

三吏三别如史书般的风格，是极震撼人的。这种不假任何情感的渲染，不假比兴的描述，不做理论的分析，淡然地写下来、写下来……这是"欲哭无泪"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离艺术性最远，所含艺术技巧最少，声

调平淡、情节平直、人物简单……只有诗圣，才能在这类风格中写出不朽的名作，而不是中小学生的作文。所以三吏三别堪称杜甫从文人士大夫的轻狂走入凡俗，经冷却、冷凝、定型后，走上成熟的代表作。

乾元二年(759年)杜甫辞官，定居草堂。在他失望的情感中，美好的大自然又唤起他心灵中的希望之光。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而杜老夫子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却是在老人年迈多病的躯体里，泛起最后的希望。这希望美好得近似不可能实现，这希望遥远得如梦如幻，但这又是老人家真实的情感，宁可受冻而死，也愿“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老人的希望近于痴迷、近于癫狂、近于回光返照时的断断续续的呓语……这实在是催人泪下的艺术精品。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当他遭受了事业、国家、家庭、人民……这些一番又一番苦难的打击后，已经是欲哭无泪、不可言说了。政治家军事家宗泽，临死高喊三声“东渡”，这是一类人；而文人有自己的形式，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就是一种。可见年富力强而死于疾病、悲愤者，多是以“东渡”或“家祭”来言志的。但年老又多病的杜老夫子就不一样了，当年龄与生理上的打击也参与到一生所蒙受的打击后，这一切反而塑造出一种“大道通流”的泛宗教的境界，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理想。反过来说，大凡有这种境界和理想的人，多是一生坎坷的老年人。不能指望大学刚毕业就有如此的深沉，那是失恋后的麻木，是女友甩了自己看上了自己的哥们后的无奈。这种无奈是无法让那位哥们或女友下地狱，而自己并不想去。





〔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愁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其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是本诗之眼。当此诗如果是李白酒后所吟，那意味定然是一种胸怀与自然的交融；孔子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也只是一杯感叹人生与自然的美酒，醇而甘；可这是杜甫老年之作，多病与潦倒相缠绕、悲愁与霜鬓互交织、人世的艰辛与自然的规律共逼迫……其结果就成了不可言、不可说，非美非丑、非非美非非丑地对自然规律的歌颂了。自然，道也。生老病死、酸甜苦辣、春夏秋冬、秦汉唐宋……把灵魂寄之于天、融之于道这是个境界，无法用壮美、灿烂什么什么地来描述。

禅宗悟道后的境界不可言说也是这个道理。你不悟道，没生活经验，一听"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也懂，你可以理解成种种情感与思想，但你就是成不了杜甫。你悟了，可能大叹"师太是女人啊！"或惊奇地发现：风一吹，幡就动；风不吹，幡不动。如此而已。但只要你大赞"看吧！无边的秋日的森林啊……落叶萧萧而下；听吧！不尽的浩荡的长江啊……波涛滚滚而来"者，全是"说次语"，是装模作样的人，假的。"说次语"是学着说人家说过的话，是体会人家的情感，学习人家的境界，是学生向老师学习的必修课，是临摹！一旦出师，那才是你的东西了，你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悟后的话，都有它的独自的内涵，与悟前不同，与前人也不同。

总之，诗圣杜甫的一生，从《望岳》到《登高》，划出中晚唐诗人从半空落入尘埃的轨迹，从志向高远而壮烈到疑惑、到吞声受辱、到悲国忧民，继而"欲哭无泪"、"梦呓幻想"至"大道通流"。老夫子以经历的历史类型的多样(战争、和平)性，生命的相对长久，对艺术不懈的追求，而铺陈开一整幅人生创作三部曲。这是其他诗人难以达到的。不是因为经历的历史类型单一，就是自己创作的寿命短，或是理解体会生活不深……再就是没能坚持不懈地追求。

凡具足条件的艺术大师，甚至科学巨匠，都有这三部曲：

志向与报负→磨炼(学业的钻研或情感的冲突)与成熟→大道归一。

这个归一，中国文人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型，而科学家是"想象力比

知识更重要”型。怪了，能达到归一的人，全是老人，起码是55岁以上的男人，或50岁以上的女人，按现在的说法是退休年龄的人。是不是咱们的退休政策往后拖一下？

杜老夫子不是超人，是凡人，于大历五年（770年）冬，病死于湘江边的一叶小舟上，时年59岁。

真动情地读个什么和写个什么，是很累人的，弄得人头昏眼花。咱们也到此为止，结束讨论诗圣杜甫这一段。

二、韩愈和他的古文运动

儒家把诗字文三者定位于杜诗、颜字、韩文。颜字，是指颜真卿的正楷大字。中国的文字从甲骨文、钟鼎文到大篆，可以说很不规范。秦始皇统一文字，是统一在小篆之下，使文字规范、读写方便、交流容易。但小篆仍是太复杂，所以有了以后的草书、行书、楷书。楷书工整，易于识、读、写，所以它成了汉字书写的基础。看来立颜字可谓功垂千古，而立韩文，是指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而产生的散文文风，这文风的特点是：不尚空谈、陈言务去、文以载道、言简意赅，它的宗旨是表情达意。

中国文学，除去诗歌不谈，诗文的发展也是源于《诗经》，然后《楚辞》、《汉赋》。在有了司马迁的《史记》后，《汉赋》并没有马上走入司马迁的路子，而是于南北朝产生了绮丽浮艳的骈体文。骈体文也就是“四六句”，虽然不乏有好的作品，但油腔滑调的感觉实是招人讨厌。到了安史之乱前后，随散文、短篇的话本、白话文的兴起，反骈文随之呼声渐高。这场运动以提倡古文为口号，称古文运动，领导这场运动的是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

古文的概念，始于韩愈。这个“古”并不是非要古到甲骨文、卜辞那里去，而是以复古为口号，提倡先秦两汉的奇句单行的文体。古文运动显然是与六朝以来的骈文对着干，但它以“复古”为幌子却是一个高招。我们知道，政治上的变法是以改动古法古制为实质的，不论好坏，必招至儒家的反对；而以复古为口号的古文运动，却是儒家认可的，除了不能古到猿那儿去，只要是“复”、是“古”儒家一律欢迎。所以韩愈登高一呼，即有柳宗元（773—819）相应，古文终于压倒了骈文。



贞元时期,社会暂时稳固,给士大夫带来“中兴”的希望。从深层意义上讲,古文运动的发起者并不是简单地为个什么文体而战,实际上是为维护儒家的“君臣之大义”而战。

让我们回溯一下人类的几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首先发生的“双百”,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时代是战国,结果是儒家为主体,道家法家为附着或补充。

其次发生的“双百”,是文学艺术领域内的,时代是魏晋南北朝,结果是唐诗为主体,骈文、乐府诗、变文小说为支流或补充。

而第三次的“双百”,则是深藏于宗教内的禅宗了,具体内容,放到下一章去讲。但中唐佛道的发展非常迅速,佛教大乘真常系的入世,道家《太乙》金丹术的传播,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南禅一派生动活泼的景象,使儒士们感到一种危机。佛道二家之道源自“天之道”,而儒家礼乐只源自周礼,人为痕迹太强。这就要求儒士们在周礼建立起的儒家里面,找出一个合天理的理论,即孔孟之道,用以抗衡佛道两家的“天之道”。

这就是韩愈在极力的排佛反佛的同时,大力提倡古文运动的最深层次的原因。当然,韩愈老先生因排佛而被贬潮州,到潮州后接触到南禅,随后又对禅发生兴趣,则是后话。

古文运动并没找到一个可以击败佛家与道家的“道”,只是三百多年后,到了南宋朱熹手里,儒家才完成了理学这一浩大的理论工程。而再过近一百五十年的明朝,理学才在意识形态上真正替代了佛、道的“天之道”,以“存天理”、“灭人欲”的孔孟之道获胜而结束了这场斗争,这也是后话了。

古文运动在中晚唐虽然没取得原本的战略上的胜利,但在反对骈文、一改文风的战术上却是绝对胜利了,且使后代子孙受益匪浅。同时也提醒了后世儒士们,儒家必须再建一个天之道的体系,叫——天道。这个体系也叫道学。后因“道学”一词世人恨之厌之,一副假惺惺的样子,才改为“理学”。

古文运动,其内容主要是宣扬封建社会中绳子、麻袋、土豆的等级性,而这等级是天理、是天道。这个天道乃产生了封建国家的法权、教化、道德等绝对的原则与规范。韩柳二人还认为身为麻袋的吏,是人民的仆役,这是儒家民本思想的张扬。其实我们用历史唯物史观看,韩柳提倡的这

些都是正确的，是时代的产物。我们不能用现代的眼光去批判，而应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封建社会还没有熟透，还没瓜熟蒂落，就应该顺从自然规律，让其熟透了再改革再革命。

古文运动的特点如下：

首先，古文运动要求文以载道，也就是把散文与文学艺术区别开。它要求言之有物，作文是为了明一个理、讲一个道才作文。当然，这个道理即倡孔孟之道、反佛道之道。他在《原道》中讲：一个和尚的衣食，一年需三万余钱，超过五个人纳的税。这种僧侣人数剧增、寺院剧增、寺产膨胀，造成国家税收的困难。而且众僧侣不纳税、不服役，严重影响了国力。这些抨击是有道理的。

在《张中丞使后叙》中，他歌颂了南霁云抵抗安史之乱的叛军。在《送董邵南序》里，表达了对怀才不遇的董生之同情，对藩镇割据的憎恨。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中，揭露了权贵的奢华、追逐名利者的嘴脸。而柳宗元则是写寓言的大师，《黔之驴》讽刺了狐假虎威、仗势欺人的官吏。《捕蛇者说》揭露了赋税之毒，毒于蛇也。

其次，古文运动在语言上要求"文从字顺"、"陈言务去"。

例如韩愈的《师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寥寥四十多字，既说明师之重要，又说明了人非先天圣贤，必须学习方可解惑成圣。

〔送李愿归盘谷序〕

"太行之阳有盘谷，盘谷之间，泉甘而土肥，草木丛茂，居民鲜少。"

也是只用了二十余字，写清楚了盘谷的位置、景观和村落的规模。

第三，因为太强调文以载道，使散文从艺术中脱离出来。以这种手法写个议论文尚可，但要写个什么记述文、游记之类的，就含有一种高洁清远、寒江独钓的味儿。在美学上是一种清远空寂出世之美，这和儒道相济分不开。

先看看刘禹锡的东西：

〔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一看就知这是一篇有所指之作。

何所指呢？首先是冲着官宦之家门庭若市来的，刘先生用苔痕和阶绿说明自己这儿门可罗雀；其次是狠狠地挤兑了一下禅宗。禅师有禅房，禅房只老和尚一人坐禅也，《金刚经》一卷也，木鱼声也……小和尚端茶也、清静也。而大文豪家有鸿儒谈笑、有金经万册、有素琴叮咚（但不乱不吵不累）……好不热闹也。更有甚者，是往来无白丁，不是小学没毕业的小和尚，这里来的全是有文凭的，还必须是硕士以上，大本都不够格……这种高级知识分子聚会，是贵族的沙龙，绝对地蓬筚生辉，让古人在坟里都羡慕得要死：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绝了！维护儒家的心态实在此惟妙惟肖地反映了出来。诸葛亮的草庐让刘皇叔三顾，杨雄的草亭养育了伟人，所以连孔子都从牌位后面探出头曰："何陋之有？"

再看柳宗元的东西：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看来韩柳二人实是耐不住寂寞，不提也罢。

儒家的民本思想本是入世和温暖的，但文以载道的要求、陈言务去的标准，实在是过于偏激了。把文学限定在伦理观念、礼法观念内，成了直接为儒家服务的政治工具，实在失策得很。而韩愈老先生说的满嘴仁义道德，自己却实在礼崩乐坏得紧：贪名利、好姿色、攀权贵，完全口是心非的一套。这也为后世卫道者提了个醒，于是理学家们全然继承了这一套：嘴上嚷的是"存天理，灭人欲"，而背后做的却是"存人欲，灭天理"。

唐朝的士大夫的言行不一弄得连女人都瞧不起他们，如果某夫人拿先生讲的与先生做的来质问先生，那他老公定然哑口无言。可能……唐人惧内源于此吧？大唐初，太宗多次要赐美女给大臣房玄龄，但房兄总是不敢要。那时纳妾是国家政策认可的，但房兄惧内，说什么也不敢接下太

宗的赏赐。太宗闻知原委后，假装大怒，赏酒给房夫人，说："你再妒忌，就喝毒酒去死吧！"房夫人领旨，将毒酒一饮而尽。太宗见状，亦无可奈何，再也不提赏房玄龄美女了。而那毒酒只是吓唬房夫人的，实是醋。房夫人吃醋流传开来，这惧内似乎是一种不可多得的高贵病，一如魏人服药和大款路边打手机。唐末，王锋带兵镇压黄巢起义，随军有他的美姬，边作战边不忘欲海纵情。其夫人闻知此事后前来问罪，王锋大惊，问计于众幕僚："黄巢北上，夫人南来，如何是好？"一人正色戏言："投黄巢去也。"

咱也打住，给咱现在的男子汉大丈夫们留一点面子吧。

韩柳的古文运动只是暂时打败了骈文，到了晚唐五代和北宋初，古文衰落骈文又恢复起来。纠其原因：一是骈文与散文本是无严格的分界。二是古文运动以反骈文为幌子，实是倡儒。儒者，维护王道之为儒，说俗了就是傍大官。既然要傍，还是傍官员，那就离不开骈词俪句，歌颂形象与业绩么，怎么可以不用华丽的辞藻呢？所以骈文长命就是必然的了。三，以古文运动去对抗朝气蓬勃的禅，怕也是没弄清形势，这咱们放到下一章去讲。

但是，在审美情趣和意境上，古文运动使文人看到参禅一样的"独钓寒江雪"般地清峻高洁。不管如何，这种出世而不入俗，是士大夫个性的另一面。

同时，古文运动在文章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上开辟了新的领域，这带来了以文为诗、讲才学、好议论、求冷峻之风，同时为今后的唐传奇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下面，让我们抛开正统的历史与文学史，从中国人的思想情感这条脉络，看一下古文运动兴衰的意义和它产生的原因。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双百"，这里再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下这个问题。

中国人的第一次"双百"，产生于意识形态的领域。当独尊儒术成为定局后，这道家一脉以浩然正气、四时五行、易经八卦的形式渗入到儒学之中。因为人性是阴阳、进退、情理的辩证，不可能纯阳、纯儒、纯理性的这么单一，不能成了反人性的纯正、纯真、纯理性或纯情感。

中国人的第二次"双百"，产生于文学与审美的领域中。当杜诗成为"钦定"的样板后，这个诗圣也不得不让出一定的位置给道家味儿十足的李白。虽然不能平分秋色，但诗仙确实有自己的市场。

两次“双百”，均以正统儒学为胜方，为主流。这不能不让人有束缚和压抑之感，有一种欠缺之感。农业社会的人们太偏爱理性与实用，太冷落看似没用的情感、情绪。随着禅的兴起，孕育着第三次“双百”，而这一次将直接爆发在人性的情与理的领域中。是要“时时勤拂拭”地常常修理自己，还是唯我独尊地即心即佛，这个大辩论的序幕已经拉开。人性中最具灵气的生命力和千方百计压抑它的理性开始正面交锋。为了转移和缓和这个斗争，古文运动开始了。它在批斗儒家一些弊病后，归于儒家的重建，它同时给了人性中情感和灵性一条出路——寒江独钓。于是独善其身的退与兼济的进，在只讲上进只讲理性的儒家范畴内为老庄的道家留出一方“何陋之有”的“德馨”之地。古文运动试图以这种方法把人性的情与理彻底地纳入儒学之中，但是它失败了，它没有自己的理论，同时统治者还需要宗教，禅宗也正值青春年少。儒家试图用标榜“杜诗、颜字、韩文”来扼杀即将爆发在禅宗中的情理之战，怕是还不够强大。其实在古文运动开始之前，“双百”的战场早已转移到禅宗中了，古文运动无法阻止它。这种转移，这种文学文化的改革，居然直到 20 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后才得以施行，哀乐中国人。

三、宋词与苏轼

唐诗，在李杜之后，经刘长卿、韦应物、大历十才子，进入了白居易发起的新乐府运动。这是浪漫主义文学向现实主义文学的转向，参与这个运动的有元稹、张籍、王建。初唐以诗为主的文学格局被打破，暂归蛰伏的散文、小说、传奇又复苏并蓬勃发展起来。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要求用新题写时事，为定尊于李杜后的诗歌在题材上的创新上找出一条突破禁锢的路。他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他对时间与发展的理解，而他的《长恨歌》、《琵琶行》则是他试图用容量的增大、信息量的增加、情感的丰富来突破“旧”诗的框架与束缚。

总之，新乐府运动使正统的诗歌向人民贴近。但律诗的格律、平仄、规则是无法挣脱的，这个桎梏怕是诗歌必须承受的。这不是白居易的失败，而是说明了诗歌这种体裁有很大的局限性，它的宽容度很小，对叙事性、情节性、情感起伏转折等都难以处理。晚唐以李商隐、杜牧为代表的

诗歌，主要表现爱国忧民和爱情等内容，虽有小李杜之称，怕也是从审美到意境都比不上老李杜。继白居易后，晚唐也有新乐府派，如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人。但定于一尊的唐诗，毕竟到了老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悄然而起的词，以其更具市民意识、更具音乐性、更具青春的朝气登上文学殿堂。而到了宋明两朝，诗已走入僵死的说教，味同嚼蜡，年迈力竭，气数尽矣。

提到词，俗称宋词。其实原是歌词，它有许多调子，每调有一个名称（曲牌），并用一定的格式规定其韵和声调。它原产生于初唐的胡夷里巷，中唐时也有诗人创作了不少作品，但多是文人在儒学和唐诗的挤压下所作的非正统的调情小唱。其非正统的儒教性，体现在上承宫体诗、下开花间词；其非正统的唐诗格律性，体现在它不但突破了诗的格律，更体现在它不是正襟危坐的朗诵，而是于花前月下携妓品酒的吟唱。“梳洗罢，独倚望江楼”、“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等句，显然是不上大雅之堂的私情，这种低声吟唱的私情作品失去《孔雀东南飞》之胆气，也无《长恨歌》之切肤，实在像是偷情小品、外遇之歌。

南唐后主李煜，使词的内容转向社会。并在艺术风格上一改花间樽前小妇人曼声吟唱的风格，成为直接言怀述志的载体。柳永将内容含量短小的短调词扩展到长调词，亦称慢词。当经过几代人努力后，宋词达到了它的高峰——苏轼的新诗体：豪放词派。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

他生在北宋繁荣时期，30岁前以书房生活为主，这使他仕途通畅，政治保守，属旧党一派而文学上没有什么建树。在他贬官黄州后，客观上使自己走出“陋室”、离开鸿儒、素琴与金经，而结交了白丁，看到和体会到了社会真实的一面。也就是走出陋室，他才写出了著名的《赤壁赋》、《后赤壁赋》、《赤壁怀古》等作品。

苏轼一生的荣辱坎坷几乎都记录于文学作品中。他的著作有《东坡全集》一百多卷，遗留2700多首诗和300多首词，以及大量的优美散文。他是一个多产而又全面的作家，其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其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明朝有人把他与其父其弟共列入“唐宋八大家”，其书法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其画已失传。



不但文学上，在他被贬杭州时，他疏通西湖、修苏堤，使白娘子和许仙有个相遇之断桥，这功劳是人神共祭、万世流芳了。当然，连祭拜的供品也想到了，那就是东坡肘子，苏老夫子文笔好、口胃好……想必牙口也好，真全才也。

论及苏辛的词，通常被称之为"豪放派"。豪放派词在语言上一改花间词人缕金错采小家碧玉的风格，给人以清新朴素的感觉。在内容上，它改变了晚唐五代以来婉约派的情怀，突破儿女之情，成为遨游于自然、山水、古今人物的赞颂怀念之情；在形式上，它摆脱了宋词仅仅是作为乐曲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体诗。

大凡一个创新，必是形式新、内容新，最重要的是要有机遇，而这三项在苏老夫子这里全具足了。可见光有文笔好、口胃好还不成，还要机遇好才能成为全才啊。

这种在语言、内容和形式上的突破和创新，可从以下例子中体会到：

〔水调头〕 丙辰中秋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念奴娇〕 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倘若说苏轼只是领导了豪放词派的兴起，只是在宋词的语言、内容和形式上功绩卓绝，那完全和他本人所得到的认可和尊敬不相称。换言之，他仍然不会有这么大的名气。何况据文人们私下里评定，苏轼之词本不是顶尖的精品，充其量只是上品。但后世文人个个不言其瑕疵，一个劲儿地鼓吹其词的意境之宏大之俊美……为什么？

唐诗的意境在马上和田园；婉约词派的意境在闺房和花间；苏轼词的意境在天上和人间。"天上人间"是一种意境，也是一种心境。所以与其说是在称赞其词，不如说是佩服其人，这就是苏轼老先生折人之处了。所以，除了文笔、口胃、机遇，还要有意境啊。

李白之天上，是吊在高处下不来，一下来就醉；杜甫之人间，是踏在实地上不去，一上去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婉约派"躲在花丛里看天上人间，天上是"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人间是"落花人独立，微雨燕

双飞”；而苏轼却把天上人间打成一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苏轼这天上人间的意境，反映出他进退一如的心境，这就是他老人家的人格、品质、思想素质的问题了。进而为官，敢捋司马光的虎须；退而贬至密州，居然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再贬至杭州，则建苏堤，晚上一人在西湖边上溜弯，看年轻人搞对象……于是叹曰：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苏先生千古为人所折服者，在此也。胸怀坦荡、超然自足、豁达开朗，这是一般文人难以达到的。曹丕的《典论论文》开篇就是“文人相轻”，天塌下来都不管，谁要是说自己的文章差了点儿，顿时拍桌子骂起来，骂急了，“干你娘”都能抡出来。而苏轼怀着爱民之心，忠于职守，不以升迁为标准，不以褒贬为情绪，这才是文人的气概了。

北宋时禅宗进入成熟，这对苏轼老先生影响很大。他的《题西林壁》则是很好的一首参禅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夫妻吵架，你去劝。各说各的理，把你夹在当中，这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横看侧看的原因啊。禅的悖论也是这个道理，给你一个题目“狗有佛性也无？”做学问去吧。有佛性不对，无佛性也不对，谁让你进这个套？这个套是六祖传下的“对法”，本是让你钻进来，杀你个混天黑地，逼你跳出这“只缘身在此山中”之陷阱，逼你跳出夫妻之间的争论。一句话：“咳！想看庐山否？”“想看！”“好，坐飞机去。”“咳！想好好过日子么？”“想！”“好，住嘴，吃饭去。”

苏轼参禅，下了不少的工夫，据说主要是在任杭州知府时跟大和尚佛印学的。他的《定风波》则是参禅后的一种意境的描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日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禅宗的宗下讲大悟十八，小悟八十。依此词品此人，则苏先生起码大悟悟了十来回、小悟悟了六七十次吧。据说一日苏东坡自以为大悟彻

悟,急急写偈一首,内有两句:"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台。"八风,指讽、讥、吹、捧、嘲、骂等让人产生情绪的行为。八风吹不动,是苏先生说自己修行已到不为外界的什么褒贬所扰,"对境不生心"的意思。苏轼写好偈,让童子过钱塘江给佛印印证,他估计佛印一定大大地夸奖一番,并发下彻悟的禅宗毕业证书。谁知佛印看后,只写了"放屁"二字回复。苏轼见状大怒,驾舟亲自过江来找佛印。但寺院山门紧闭,上有一偈曰:"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苏轼看后,自知道行还浅,尚未炉火纯青,于是揭了偈回衙去也。

但是,让我们把所谓的豪放词人与所谓的诗仙比一下,谁悟得更透些呢?

李白是"天子呼来不上朝,自称臣是酒中仙",这个仙气实在有点儿"人来仙"了,好似闹市中的泼皮牛二,越是有人,泼皮劲儿越大;而苏轼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回首往事,酸甜苦辣,看明白了一件事情——"也无风雨也无情"。明白了这个出世的道理,那活于世上就"一蓑烟雨任平生"了。连竹杖芒鞋都是好东西,并不比奔驰宝马、别墅二奶差,各有其味也。所以苏轼不是"人来仙",而是参禅悟道后的"人自仙"。

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仙法,是耐不住孤独的法门,以酒为伴之法门。而苏轼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个仙法,不靠酒也不靠什么气,而是看破出世的空之后,又再入世,为个"情"字,早生白发又有何妨?酒么,还是祭给后人也能欣赏的永恒的长江和这明月吧。好一个看破红尘,更难得的是一个"情"啊。佛说,"我来这世上和有缘教化众生,只因为这一大有情。"可见苏老夫子被佛印的"一屁过江来"给骂醒了。禅的教学法如此活泼,而东坡居士的悟性也是上上乘的。总之,苏轼的词,不论他是否达到后世文人们认为的标准,只这一个悟性,就值得后世子孙佩服不已。

再看双百:

第一次"双百",产生了儒与道这入世与出世的辩证。这种辩证存在于两个学派中,各自为一方,即:孔孟之儒与老庄的空无。

第二次"双百",产生了李与杜这出世与入世的辩证。这种辩证存在于两个人当中,各自为一方,即:诗仙与诗圣。

第三次"双百",产生了高僧大德与苏轼,他们本身已真正地具有了出世与入世的辩证。这种辩证体现在他们自身上,即:宠辱不惊的惊人魅力

与豁达的人生。

美哉，东坡居士，美哉，宇正不阿，堂堂正正。

李泽厚老先生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是这样评价苏轼的：

"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入佛家，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里没有屈原、阮籍的忧愤，没有李白、杜甫的豪诚，不似白居易的明朗，不似柳宗元的孤峭，当然也不像韩愈那样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

李泽厚老先生也承认苏轼有"某种透彻了悟"，也承认"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但仍是加上一句"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这一句，正说明李泽厚老先生是文人，是美学大家而不是修行人。当他用理性的简单的"上进"与"退避"、"喜爱"与"厌弃"这种尺子去卡多样性的人和社会时，就显得粗暴和不讲道理了，不美了。一个悟道的人，常常是尝过了富与贫、盛与衰、信心与失望、美女如云与青灯黄卷后，才能归于朴质自然啊。一个悟道的人，可以像印光大师一样倡念佛的净土宗、可以像虚云大师一样持净土而忙于寺内事务、可以像弘一大师一样尊律宗而忙于整顿戒律、可以像达摩一样为创禅宗而面壁、可以像济公一样为个豁达而酒肉不忌。你说哪个上进？哪个不上进？

穷而后工与大学理工科之"工"，完全是两回事儿；

印光大师的念佛、弘一大师的守戒，也和老太太念佛、沙弥守戒，完全是两回事儿。

看透了人性，代表着人的成熟，是四十而不惑；

看透了社会，代表着人的成熟，是五十而知天命。

当一个人走上了辩证的高度时，会显得看似平淡大智若愚。他们不是社会的肯定者，也不是社会的否定者，他们是超越出来认识了社会后，再生活于社会之中的人；他们力所能及地为人民为人类做些好事和实事，让自己生活得愉快充实而颇有点儿意义；他们不是我们今天人们批评的封建社会的奴隶、帮凶，也不会是今天人们称赞的"起义壮士，造反英雄"。在辽金压境的北宋，让一个政府官员去造反，怕不算是汉奸，也算教唆犯。



亦或让他去歌颂大宋江山？赞美皇上英明？如何才又上进又不被后人批评？是学杜甫住草堂对呢？还是当个官修西堤兴水利对？历史地看苏轼，还他一个清白，否则我们的后人骂起我们来，如何处置？

"平淡"，源自看过了看明白了。大师们念佛与守戒源自念过了念明白了、守过了守明白了……

美国有一位驻前苏联的大使，当他离任回国时，记者问他离开前苏联，有什么最值得高兴的事。看来这个记者想套出一个既"上进"又"爱国"的说法。岂知这大使说，"我可终于不再看《天鹅湖》了。连同陪着接我任的新大使，我在苏联几年已经看了三百七十多场这个美好的、美妙的芭蕾舞。"

"自然"源自于认识到一个规律后，就顺这个规律去生活。庖丁解牛，是把牛都看透了，在他眼中无牛，只有一堆皮、骨、肉摆在那儿，一切只需要他用刀的刃把它们轻轻划开。这里没了怜悯、没了激动，不需打气壮胆，也没有上香念咒，自然到"豁"然一声，解矣。明白了，如何？办班去？出国去？不，真明白了，仍是解牛去。如苏轼、如印光、如弘一。

"厌世"，是想争个什么争不到，又不知自己吃几碗干饭，于是先厌了自己；

"退避"，是想过去又怕狗咬，于是去绕。绕也无路时，老子不去了。

让我们以苏轼一首诗结束这一段吧。

〔春宵〕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

苏老夫子在这诗中讲了很多东西，你去悟。悟明白了，你发现他什么也没讲。

四、理学与心学

（一）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我们在第二部分诸子百家的时候讲过。在此重复，实在是它对中国人的影响太大，也算是不得已。

当宋词发展到顶峰的南宋时，也是禅宗走到强盛时。这词与禅的联盟本就孕育了衰老。而这衰老，都是和理学的确立有直接的关系。展开历史的画卷，你会发现理学在明朝盛行时，正是宋词和禅宗的衰亡时，同时繁荣起来的是市民意识的拟话本，也就是小说。小说可以上溯到宋话本、唐传奇与佛教的变文。这一条线自变文开始就非常世俗化市民化。而明朝理学在高呼“存天理，灭人欲”的同时，连带地呼唤出了市民文学、通俗小说，言情与纵欲超乎寻常地“兴旺”，与道貌岸然的理学成了遥遥相对的两个阵地。

为何会有这样的局面，怕是一句两句讲不清楚，需慢慢道来。

朱熹(1130—1200)字元晦，是个绝对纯正的文人，学问很好，当官时也算个清官好官。他爱国，主抗金，辛弃疾称赞他：“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

他的主要成就是承程颢、程颐建立了理学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以“理”为本位、为基础，可以说是“理本主义”。“理”是它的本体论，也是汉董仲舒的“四时五行”儒之“变相”。四时五行，是物质世界客观存在的四季转换与五种物质轮回变化。反过来说：任何事物的正确性都是暂时的、相对的。可是朱熹把这层意思抹去，不谈真理的暂时性、相对性，只谈它的永恒与绝对。朱熹认为：“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绝对而永恒的存在与规律，“宇宙之间，理而已”是环宇中的最高准则。换言之，“理”生宇宙生万物，同时宇宙万物依“理”而存在而运行。这相当于西方哲学的绝对命令，或者干脆说它是“上帝”。这就是董仲舒儒学与佛教融合的产物，是对禅宗中悟道之“道”的借用。

至此，我们可以说这个理本主义是出世的理论，它对人们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如果要让这个出世的“理”学入世，那就必须在本体论的基础上引申出“人生观”与“道德观”，理学的毛病就出在这里。朱熹老先生站在董仲舒的“理本主义”的基础上，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宣布如下：

理学的人生观，是以孔孟的“食色性也”为基础的“性命之说”。

即：色为性，为了人类传宗接代，它合天理合人理——没错！

食为命，为了人类的生存，它合天理合人理——又没错！

理学的道德观，是“理本主义”引申到“性命说”后，扩展成孔子的“仁义礼智”，也就是伦理观了。如果进行一下换算，也可认为理学是以伦理



为本。它的实质即：具有“仁义礼智”优秀品质者为君子，为清气充溢；反之，“仁义礼智”差的，是小人，为浊气，臭不堪闻了。

如果说理学的“本体论”与“人生观”还可理解，那它的“道德观”与“美学观”就大错特错了。

错在了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其保守性上。

此时有两条路：为了维护这个食色之性命是用“仁义礼智”的道德观去束缚它呢？还是从爱护性命的角度去发展它？前者用一个网罩住它后，再镇压它；后者是承认它的合理性并鼓励它成长、发展。可惜，理学走的是第一条路。

理学家把人的“性命”看成是不变的，把人性具有的无限方向性和无限延伸性看成非礼之物，于是打杀了人性方向上和纵深上的发展，并以君子的称号定住这个模式。真不知理学家是否愿意从宋明两朝依清气修回到吃生肉住山洞的“猿人君子”去，也不知当今的儒家们是否愿意修回到宋朝那没汽车、没别墅、没医院的国子监里去。

偏执于建立网络叫保守，偏执于打破网络叫冒进。立足于双脚，着眼于前方叫悟者、觉者、佛！不拘于迈左脚或右脚、不驻足于左脚或右脚、左右左右叫进步。进步要眼睛看前方，凡是把眼光拉回脚下，挑起左脚正确还是右脚正确的争论，这种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糊涂虫。

辩证法的灵魂是超越，不是只在此山中的左顾右盼，一味地研究物质与意识谁好谁坏的人，先把眼光从地上拾起，放远点儿，真正体会辩证法后再来讨论。

话题已扯远，索性再逍遥地游一下。

佛教的禅宗里，对佛性和真性的尊重即是对人性发展的尊重。其全方位性体现在佛有三千大千种佛，有的头上放光、有的胸部放光、有的脚下放光……有千手千眼者、有三头六臂者；其无止尽性体现在佛的世界有罗汉、菩萨、佛三个等级，实乃是三种层次。而且个个法力无边、神通广大，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弄懂了这个道理的人为悟者，不懂的人只是迷信，如此而已。

书归正传。

朱熹先生在建立了“理本主义”、“性命论”和“君子”的人生观后，道德观也应运而生了。“以理节欲”的三纲五常成了老天爷定下的道德规范，

而朱熹只是发现了这个天理与伦理，非是发明了这个劳什子。依此理再深入到生活中，就成了“存天理、灭人欲”者为君子、为天、为清气；“灭天理、存人欲”者为小人、为地、为浊气。这就统领了孔子之礼、孟子之气、孔孟的食色、荀子的阴阳之易（八卦）、董仲舒的四时五行，一下子“理学”就“不可磨灭”了。当然，中国人开始倒霉了。寡妇为了个牌坊不是跳井就是死守，遭了歹徒强暴那是自家先水性杨花地风骚所致。去年不是有那么个女检察官对被强奸的女原告说：“一个女人，如果你不想被人强奸就不可能被强奸！”当时气得女原告傻了，喃喃地说：“你不也是个女人么？怎么能这么说话？”真该给这女检察官立个铁牌坊，上书“有口皆碑”。

理学残害了女人，更残害了艺术及所有喜爱艺术的人。在灭人欲的口号下，任何音乐、戏剧、绘画、文学全是下流的小人所好。我记得我小时候爱看小人书，惨了。长大也是非君子。后来听说有大儒者为小人书正名，改叫连环画了，于是我也是理直气壮地非君子非小人地成了“连环人”。至今又叫“卡通”了，急需大儒们再定个什么“理学之法”，总不能我们下一代都被培养成“卡通人”吧？这跟叫克隆人一样让人别扭。我不是在调侃，我是说理学的后患就是这么严重，任何人任何事，只要沾上小人的味儿，全完了，别说提干长级什么的，连人品都被否认了，可又不够下监入狱的格儿，只好让你臭死在街上。这种看人评价人的理学模式至今不是人皆有之么？所以外国人很奇怪，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大街上遇见女同事，要眼睛看着天相互问好。可到了没人处，两人又搂搂抱抱……五千年的中国文明，洋人哪里理解得了？深矣、奥矣、渊兮、妙兮。

朱熹，本是个不错的人，挺有人味的，为了争一个叫严蕊的妓女，曾跟台州州官唐仲友干了一仗。说起来这不算什么，因为当时官员招妓很平常。但非要言行不一地装出一副正人君子样，就让人觉得理学忒不是个东西了。

理学扼杀了宋词、扼杀了禅宗、扼杀了中国人的灵气、扼杀了一切产生“双百”的可能，使中国整个儿地步入封建社会的灭亡阶段。

可以这么说：理学，作为一个整体，如今已过时了；儒家，作为一个体系，如今也绝对过时了。



(二)陆王心学

心学,称陆王心学。

陆,指陆九渊(1139—1193),他字子静,号存斋,世称象山先生;王,则指明朝的王守仁。

简单地讲,理学,是把宇宙的存在和自然规律作为理,是善,而人欲与这个理是背道而驰的,为恶。这种区别理与欲的做法,势必使抑恶扬善的"存天理,灭人欲"成了真理。

而心学,认为心即理。心理不是对立的二元,而是一元。王阳明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心学是理学的延伸,是马祖道一的"即心即佛"反映到儒家的产物。禅宗的即心即佛差一点儿毁掉了禅宗,所以马祖立即又讲"非心非佛",其弟子百丈重建丛林清规,才使禅宗得以在宗教的法门下生存下来。而陆王心学却毫不在意地走了下去,以至于大有"认欲为理者有之矣"这境地。这种不信天地鬼神、不信清规戒律、以一心为天理的理论,接近了资产阶级的自然人性论,即: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情欲、需求、欲望。

李泽厚先生在《宋明理学片论》中说:

"由外在的宇宙观建立内在的伦理学,而最终竟又回归为心理——生理学,而使整个理学体系在理论上崩毁瓦解。伦常道德又开始建立在个人的感性欲望、利益、幸福、快乐的身心基础和现实生活之上,封建主义的天理人性论变而为资本主义的自然人性论,走了一个圆圈,似乎回到张载、朱熹所要反对的地方,实际上都是大大地前进了。它给人类留下了精神的收获和思辨的财富。"

——不管怎么说,李泽厚先生的眼光是锐利的,分析是透彻的。程朱理学发展到理学的分支心学时,这陆王二人已经使理学变了味儿,并把理学逼进绝地。因为心学是理学的分支,所以逼死理学同时也是心学自己的终结。这如同西方哲学中的"上帝死了",后,人也死了。

当然,心学的这种终结是凤凰涅槃,它造成明中叶的人文思潮泛起,对历代"我即苍天"、"只争朝夕"、"人定胜天"的精神是一种理论上的支持和情绪上的鼓舞。

更精微的理论,我们要放到禅宗一节去讲。

（三）理学、心学与马丁·路德

说一说理学、心学、马丁·路德三者在认识上的差异。

中国人认为天人合一，这个“一”是道、是理，所以天之理必是人之理。天无欲而人亦应无欲，因此灭人欲就是必然的了。理学的逻辑轨迹大致是这个样子。

心学认为：天人合一，人理即天理，天生了人，人有了欲，想必这个欲是老天制造的，是老天认可的，于是乎尊人欲也就是尊天理。

因此，理学以天理压制人欲，心学以人欲描述天理。

马丁·路德作为西方宗教的改革者，根本不去讨论天人是否合一，二者是统一还是对立，是用谁压制谁还是用谁去说明谁。他简单但有效地用“相信”二字把天理与人欲联系起来。“因信称义”就是“我相信上帝，上帝永远在我心中”。于是“我做什么上帝都会原谅我”，“上帝永远和我在一起”。西方人巧妙地躲开了宗教与人性二者的关系问题，把上帝供在教堂里，嘴里一边念着仁慈博爱，一边去掠夺、去开辟殖民地。

当今，我们看到西方文明的进步后，是否认为我们祖先太笨呢？非也，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人与人关系问题、民族问题等等，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西方文明，正视马丁·路德的是与非、得与失。因此我们也不得不重视“天人合一”，因为人是地球人，地球只有一个，人欲绝对不能大过天；反之忽视天人合一，一味强调人欲而去追求无止尽的物质利益，终将毁掉环境、毁掉地球、毁掉人类自身。

那天理与人欲到底应如何处置？

这可能是个世界性的难题。首先要相信天理的束缚性，更要明了人性发展的全方位性与无止尽性。在这个基础上，有节有度地依科技科学的发展建造网络系统，时时调节这个网络系统，发展这个网络系统，这恐怕是最明智的做法了。

理学从反面马丁·路德从正面告诉人类不要压抑自己的人性人欲，因为这里面有人类最宝贵的东西——灵气。灵气与自由相伴，一旦灵气被束缚，那人类社会将萎缩，一如明清两代的中国。

心学也从合理走入极端的不合理，从而告诉人们人性、人欲与灵气必须要适应和顺从大自然的规律，当不合时宜地强调心即理时，这个纯个性



的解放与自由将会彻底瓦解人类社会。自由是和责任相伴的啊，选择了自由就已经选择了责任。

简言之，看懂历史，以人类社会的"进化"、"突变"两种方式交替地解放人性，交替地改造世界，步入人类更高级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这才是悟道后的结论，也是人类明智的选择。单一地强调天理或单一地强调人欲，就如同单一地强调进化论或单一地强调突变论一样，都将给人类带来灾难。

五、宋话本

宋词，不论如何挣扎，总难以逃脱填词的"填"字。就好像语文考试的填空题，只需你填对内容，而这是最主要的。次而求之的才是填得美不美，艺境如何。至于能有什么激扬文字的思想思潮，怕是难了。作为一种简单的情绪宣泄都要冷静地先"填"后行……这实在是堵气窝心的事儿。

静观两宋，诗定尊于杜甫；字定尊于颜真卿；画，崇尚山水；文，以言以载道的韩文为范文；连从艳词中挣脱出来的词，在那狭小的空间里几经言情、言志、为文道情、形式主义等的折腾，怕是江郎"词"尽了。上天有风起云涌、危峰千尺、望而生畏；入地有莺声燕语、江西大晟、醉生梦死。当这些节目被穷尽后，戏已演完，强词夺理就显得毫无新意了。

黄庭坚、秦观、李清照、杨万里、陆游、辛弃疾、朱熹……直到"江湖词人"，在一连串的闪光后，词人们走到气衰力竭，成了"狷人"或"狂者"。

"狷人"者如姜夔，生活面狭小，对政事不关心，词填得精美绝伦无以复加，只这绝伦，就是衰亡的象征。

"狂者"如戴复古、刘克庄，生活面广，关心政事，词填得马马虎虎，一切是高谈阔论。只这用词去谈政，怕也是三十六计的最后一计了，下一步乃走为上。

试举两例，众位看看走好还是不走好。

〔鹧鸪天〕 姜夔

京洛风流绝代人，因何风絮落溪津？笼鞋浅出鸦头袜，知是凌波缥渺身。

红乍笑，绿长颦，与谁共度可怜春？鸳鸯独宿何曾惯，化作西楼一缕云。

——词填得美，也妙，但实在是有点儿难。“红乍笑，绿长颦”大似“胡同里钻出个小妖精，黑脸绿发血红唇，张嘴不是叉你妈！就是‘老娘面前你牛叉个甚！’”

据环保部门说，这是尾气污染造成的，空气等级为四级，反正要到十二级西北风，刮去这“西楼一缕云”后，那个牛叉味儿才稍有缓解矣。

也罢！也罢！放马军都山下，好坏善恶全莫怕，哪管马踏的是什么花。

〔柳梢青〕 戴复古

袖剑飞岭。洞庭青草，秋水深深。万顷波光，岳阳楼上，一快披襟。

不须携酒登临。问有酒，何人共斟？变尽人间。君山一点，自古如今。

——热，要有人间之俗气；冷，要有天上之仙气。这不冷不热，我还是找下岗又没再就业的酒友侃山喝酒去。

打住，宋词到此为止，不是我想到此为止，实是宋词自己到此为止。

换话题，不是我要换话题，实乃是宋话本这新生的艺术品类渐趋成熟，“题”本已换，不由得你的“话”不换。

话本，原是“说话人”的底本，“说话”技艺从唐代已出现，好似当代的“评书”，当然那时还很幼稚，到了宋元才成熟。话本可以说是上承唐传奇、下开元杂剧、明清市民小说的一种中间过渡性文学。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发展至今尚存，同时它又对戏剧、小说的崛起起了非常大的启蒙作用。

在宋朝，已经出现瓦肆（瓦子），这是各种民间技艺集中固定的演出场所，也可以叫它是小剧场、书场。我们常说的勾栏瓦肆，前者为妓院，后者为戏院。而成语和俗语里的瓦合瓦解，是说开演前众人涌来和散戏后观众散去的现象，至今“冰消瓦解”的“瓦解”，就是由观众散去引申出的消逝无踪之意。有了瓦肆和说话技艺，相当于有了现代的说书场子和说书人，虽然二者今已难以考证场子的地点和具体的说书人，但他们留下了说话人的脚本、底稿，这就叫“话本”。

宋话本有四种：小说、讲史、讲经和说浑话。其中讲经与浑话已不见流传，但小说和讲史却影响至今。凡是章回小说的章回结构，都是源于话本。每个章回的容量要适于上场说一回“话”的容量，每章前有连接上一



章的“入话”的诗词，每章中插入一些旁白式的诗词，每章结尾有总结性的诗句，同时结尾总在故事精彩有悬念之处。话本以故事情节取胜，以情节单线发展为主，这些都是适于“说话”艺术，适于在瓦肆演出的艺术形式，它一直保留至今。

现存的“小说”话本有两大类：

一类是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如《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还有一类以公案为题材，如《错斩崔宁》、《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现存的“讲史”话本有《三国志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全相平话五种》等。

话本其本身艺术成就并不高，但它孕育了后世的戏曲情节、市民小说和历史小说。元杂曲的很多雏形与素材取自话本，而三言两拍与话本“小说”的血缘关系更近，更加直系。《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列国志传》显而易见的是从话本讲史中脱胎出来的。

如果单从艺术领域内的承上启下看话本，可以讲它已经很令人侧目，可是再沉思，你可以发现它甚至在中国人的思想与情感史上也有巨大的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

拿文艺形式和人的成长做个相联系的比喻，那儿童像歌谣、青年像诗歌、壮年像散文、中年似小说、老年则是哲学、宗教或艺术。而人类的成长，是否也有这么个过程呢？

咱中国人走过四言的《诗经》、五言的两汉诗、七言的唐诗到宋词。虽然有楚辞、汉赋、乐府诗、韩文的分支，但当它们走到南宋时，人们成熟到不再甘于受什么格律的限制，不满足于几十字几百字的容量，最主要的是不满足于简单的情绪宣泄和一个道理的阐述。人们已看到社会网络系统、人际网络系统、个人自身的情理网络系统的冲突与和谐，人们需要把自己的感受和思考放到个人内心、放到家庭中、放到社会中、放到国家与民族中去考察、去反思、去检验。

显然，复杂与多元真让人愁啊，“只恐诗词与散文，载不动这许多愁”，那什么形式可以载这些愁呢？看来小说该应运而生了。

随着文学自身发展的惯性，宋词走入元曲，元曲以加入衬词来打破格律，但这个突破实在是小打小闹。元初文人们在失去科举的仕途后显得有些无所事事，于是一些人走进勾栏瓦肆与艺人们厮混，而厮混的

结果造成正统文学与“说话”艺术、“演唱”艺术一拍即合，创造出辉煌的元杂剧。

元曲是诗词的终结，元杂剧是艺术分支，它发展成独立的艺术门类——戏剧。而正统的诗文一脉，则发展成了小说了。在这种正统一脉发展而来的小说中，容纳了诗、词、赋、曲，加入了故事情节、人物、背景……也有了文以载道的“文”，甚至还有绘画。可以说小说是集诗、歌、词、赋、文、画的大成。这个大成之作，承载了以前任何文艺形式难以承载的人的思想与情感，是中国人的艺术与文明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标志。因为任何一家，不论儒、释、道、法……什么理学、心学……都不能把这个世界、这个花花绿绿匆匆忙忙的人生讲清，只有小说才有这个可能。它“平淡”地记载下人的一生或社会的场景，有时情、有时理，有时上、有时下……喜怒哀乐、人生人死、善恶忠奸、时分时合……

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前进。不论是《西游记》还是《红楼梦》，取经总要取回来，九九八十一难要一个一个地过，这就写出了一个人一个集团成长的过程。宝黛钗不管下场如何，死的已去、活的守寡、出家的已走……这也是社会在前进的必然。这种随时间的流动用情节用人物而呈现出的一切，是话本的特点，更是小说的特点。是承载人类思想与情感之舟，这应该是大家都认可的吧。

所以从佛教而来的变文，到唐传奇、到宋话本，为戏剧和小说做了准备，同时也为诗词的终结敲响了丧钟。

话本的这个点，连接了之前与之后的不同的艺术样式，更连接了由简单到复杂的人的思想感情。更准确地说，是连接了中国人封建社会由青壮年走入中老年的点，是成熟的点，是个里程碑，是个标志。

虽然它本身的艺术成就并不高，但这又有何妨呢？

这一章我们不再举例了，因为大段的摘引，还不如大家亲自去看。

只是希望我这标新立异之说，不要引大家反感，希望诸位能耐着性子，再忍一忍，接着看下去。





第三章

从南北分宗到默照禅

一、神秀的北宗禅

五祖的法衣虽然传给了六祖慧能，但一直到唐中叶前，神秀一宗仍是北方主要的宗派。

神秀（605—706），46岁到黄梅山拜五祖，他在五祖前"服勤六年，不舍昼夜。大师叹曰：'东山之法，尽在秀关。'命之洗足，引之并坐"。弘忍圆寂后，神秀迁到当阳山玉泉寺，前来拜师学法者"云集务委，虚往实归"。

久视元年（700年），武则天迎神秀入京，被"推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其名之盛，仅次于太宗对玄奘。神秀一支，被称为禅宗的北宗，亦称"官禅"。这就使达摩到弘忍到神秀的禅宗终于扬眉吐气，名正言顺地占有了宗教中的一席之地。向来被排挤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总算有了正统的名分，这是神秀的功德。

（一）造成官禅的种种因素

神秀的北宗之所以能有"官禅"的荣誉，实在是时机成熟了。这个成熟表现在社会、国家、禅宗的相互需要，以及北禅法门自身的性质上。

首先，是社会的需要。唐太宗死后，到武则天的这段历史，前边讲过，是社会不稳定的时期。土地的失去造成了流民，这些人在社会上盲目流动，有极大的破坏性。所以社会需要一个慈善机构去安置他们，而这正是禅宗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传统宗教以其学问和戒律对流民关闭了寺门，

而禅宗本无门可闭，从达摩到道信都可以算是准流民的游脚僧。遇到一寺，如果能住几天，就“挂褡”几天，这也被称为“挂单”。

“单”，即有这么个放蒲团的地方，它晚上可供躺下休息，修行时可坐在蒲团上习禅，这个地方叫“单位”。所以游僧们有了单位则暂住几天，人家消单了，那就接着走。遇荒山丛林，就结茅舍住下，叫兰若道场。实在来不及结什么舍什么庵的，于树下放个蒲团照睡照修行，这就是“放单”，是个体户自己的单位了。我看不是飞行员“放单飞”之意，而是天大地大，有一容单之位，处处可修行、可参禅之意。话说远了，再扯回来。

第二，国家的需要。所谓的国家需要禅宗，是说武则天从政治角度考虑的结果。她看到让这些流民东西南北地逛，实在不如让他们找个地方停下来修行。禅宗又不强调非要盖个寺，也会自己劳动可以自足，不要国家财政支出。况且凡僧人都要造册上报，所以对人口也有个控制。这么多优点，武则天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她扶持佛教、推崇禅宗、迎请神秀。要说她是否真信佛，是否真相信轮回，是否真懂修行的门道？我看玄，否则她怎能杀人不眨眼呢？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她的推崇禅宗的政策是对的。推崇儒家？儒士们只会歌功颂德，整日里女皇如何如何。或是碰上一两个古板的老先生，开口骂她女人篡权，那可就自讨没趣了。虽然有来俊臣的《罗织经》，但少惹事是没错的。推崇道家？每日炼丹走气？不但挑起宗教之间不悦，而且流民如何安置？推崇正统佛教造寺庙，则僧尼人数必增加，不上赋税还吃着国家，这种事业单位越少越好。所以这民间发起的、以流民为主的、不占国家编制又听使唤的北禅，实在是最最理想的人选目标了。

从历史的史实来看，她的政策也确实是成功的。这个政策为社会的破产者、失意者、为盗者、造反者开出了一个不小的天地。这个天地有吃有住，不上税且受人尊敬。当然要剃头和不能结婚，但这点代价比起兵乱、天灾、国税、官吏盘剥……太微不足道了。再说了，那个时代富人三妻四妾的娶，弄得男女人口失调，男人要找个老婆实在是比当和尚难得多。何况不用非得有什么大本文凭、六级英语的证明，能干活能坐在单位上不说话，行！好禅师。要是有俗家子弟来问什么禅机，好了，骂他一顿也对、不理他也对、自顾自去睡觉也对、说他有佛缘更对。反正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心传心，你明白了，算你有悟性，放下点儿吃的或零散银两走



人。你不明白，也好，回去悟，只缘你心不诚。当然留下些功德馒头、点心之类，也算造化。

拿没文化当个性，实在是禅宗开的头。此毒流传至今，所以大多数当代的大师多是没文化有个性者。你说这武则天多鬼，她把这些全看明白了，迎奉禅宗缓合了社会冲突、安置了流民、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并教导人多向善、少作恶、别造反、闷头修行……这实在国家最需要的啊。

第三，禅宗也需要国家。中国本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所以宗教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在政府那时阴时阳的态度里找个生存的方法。当然，有了皇权贵族及国家的扶植或承认，这实在是天大的好事，是活佛再世了。达摩因和梁武帝一句话不对，自己被冷落面壁了九年。虽然禅宗经二祖、三祖、四祖、五祖的惨淡经营，渐有了起色，但这起色只限于远离中央远离中原的江南，是蛮夷之地。所以武则天迎神秀进京，这意义就非同小可地大了。

也确实，要不是武则天迎神秀进京当国师，禅宗日后不会发展得那么辉煌，也不会对中国人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同时更不会有儒家理学与心学的产生。

第四，受人欢迎的修行法门。北宗禅的修行法门，是任何一个政府和宗教都认可和欢迎的。为什么？因为这种修行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择根机的方便法门；二是“息妄修心宗”的理论。

首先，说一下神秀不择根机的方便法门。武则天问国师神秀曰：“所传之法，谁家宗旨？”神秀答：“禀蕲州东山法门。”问：“依何典诰？”答：“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大家知道，这般若系的经典中，都是以空无为其见地和修持方法的。四祖双峰道信在完成禅宗持真常的《楞伽》向般若的《金刚经》转移的过程中，借用了《文殊般若》这一部经。文殊般若含有净土宗“念佛法门”的“一行三昧”，又含有与真常系大不相同的“性本空”、“毕竟空”。所以《文殊般若》既完成了禅宗经典向般若系转移的重任，又担负了“根机不择，齐速念佛名，令净心”的任务。也就是说不论文化高低、悟性强弱，只要口念佛号，统统往生西方。这就广开了佛门，使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全可修行成佛。这种把所有人一网打入佛家的方法，壮大了佛家，更是统治者高兴不迭的事儿。

其二，是“息妄修心宗”这个理论。这个理论是修行的僧人和统治者都欢迎的。神秀曾作偈：“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

尘埃。”也就是说人心本明净，只因妄念的打扰，所以造成人的贪嗔痴。于是修行的含义就是“各人自扫心头妄，莫管他人身与行”了。

先不提作为一种修行法门它是否正确，只是这种法门实乃是女皇武则天、玄宗或什么什么宗、什么什么皇全都乐意看到的。你想啊，三教九流诸色人等聚之山林，每个人都在想自己错在什么地方，或是每日只是念佛，一如背八股文，把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全耗在这里，这可真让统治者们偷着乐了，可以高枕无忧了。倘若僧人们如秀才一样讨论国家大事，比如：什么张庄的财主霸了张三的田，李村的村长抢了李四的妻，王二麻子和阿Q去县城当贼发了大财，孙家三少用20万元买了个收税的官，钱广那小子包的二奶奶与四奶奶打出人命来了……众人于激动处再喝点烧酒，乘醉念着咒打上什么旗去造反，这还了得么？所以这个“息妄”二字远比“明心见性”、“即心即佛”受用得多。当然是政府觉得受用得多了，于是禅宗被政府欢迎及大力提倡后，又加上了耀眼的政治光环。

综上所述，社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禅宗的需要及北宗的方便法门与“息妄”的特色，造成了官禅的兴盛。不要议论这官禅如何如何，只因这个兴盛，才有了安史之乱后南宗替代北宗的可能。

（二）神秀禅法的宗教性特点

为什么说北宗的官禅具有鲜明的宗教性特点呢？这又要一步步道来，挺费事但又不得不耐住性子来讲。

这约略的可分为三点：宗教对于人类的意义、宗教所必具备的要素、官禅的宗教性。

首先，宗教对于人类的意义。宗教对于人类其实际的本质的意义是什么？如马克思讲的，宗教是毒害人类的鸦片。这当然没错，马克思是站在历史变革的角度上看宗教的保守性和迷信性。但追溯宗教的起源，难道是人类为了醉生梦死才创造了宗教来麻木自己么？我们的原始人在没有产生阶级时，在猿人时就有了原始的崇拜与宗教，这恐怕不能说是统治者用以麻醉人民而创造了宗教，只能说是宗教建立后被人利用了。我们止而静，静而思，细细考察一下宗教的起源，到底是什么呢？

把思绪先扯开，功夫在外，从外说起。

继达尔文这个大胡子发现了进化论，写了人类起源，说明人由猴变



来，天下大哗，但终是无可奈何地认可了。因为科学是理性而严密的、正确的，人类刚收起自尊心，承认猴乃人的万古流芳的祖宗。又一个大胡子洋人巴甫洛夫弄出了个“本能说”，这一回没太让人吃惊，由猴变成的人经受了“非人乃猴”的打击，对这狗之本能以人的傲视予以认可。巴甫洛夫的实验是这样的，让一狗儿先看见红灯亮，然后再给它肉吃。红灯亮——有肉吃；红灯亮——有肉吃……于是狗依据本能，建立了条件反射。一见红灯亮，则口水四溢，兴奋得不成。哪怕没了肉，那状态也似见了肉一般地“幸福而光明”。而由动物演化到猿的这一支，远比狗更加的有了“抽象”力与想象力。天打雷，树林着火，烧死动物有肉吃，怕是猿人们也建立了条件反射，一听雷响和闪电，就如同见了烤全羊和烧鹅仔，兴奋得“幸福而光明”了。于是年年想日日盼，于是岩洞壁画上有了雷电的形象，可见祖先们对之崇拜得不成。后来有了火，祖先们则直接拜火。

如果说拜火教是人类的原始宗教，那红灯亮则是狗类的原始宗教。看来宗教并不是简单的鸦片，而是一种意欲或是希望啊。红灯亮，是狗意欲的理想，是它的希望，于是能让红灯亮的任何伸前腿后腿、立起毛、叫几声……只要能办成这灯亮一事，全是狗愿意干的，所以这叫为了理想而必须付出的行为，也叫红灯亮之“狗宗教”的仪轨、仪式。这一回成了宗教，虽然并不见得灵验，但只要去施行即可，它在表达自己的愿望。如果饲养员也略通这门教派，那就应该在狗行大礼时，按下红灯，给人家一点儿肉，别让人家怪急的。当一个小孩大哭时，母亲就给他喂奶……于是这小孩也有了教义——要想吃奶，必先哭。到了最后，哪儿不合意都哭，则是此教的滥觞。

原始人的图腾崇拜不是这样的么？

你说这是愚昧，不文明的表现。我知道，你说得当然对，如果一崇拜则风调雨顺，那这原始宗教早就不叫原始宗教了，它会进入科学殿堂一直正确到今天，再一直正确下去。只要冲着图腾念个咒，那么古人要的牛羊田地、当今人要的别墅小蜜、后人要的什么东西就全来了，还用人类去劳动去奋斗么？再说了，宗教其发展本身就是一种否定前者肯定后者的进步啊。我的意思是说：老兄，只明白原始宗教是愚昧的，这对于我们当代明白人没用，对于想批判个什么人的人有用。我是说你明白这么一个道理么？即——宗教，源于人的理想，更源于为了达到这个理想的具体的行为化！

综上所述，宗教对于人类其实际的本质的意义是：人类理想的表现、人类意欲的表现。它是为人类的意欲服务的。不是为挣钱、养家、买汽车服务的。当这种意欲成为一种超前的主观的模式后，称为信仰。

人可以不信宗教，但不能没有信仰，更不能心中没有神圣。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怕的人是正宗的流氓。

可以说：宗教，是人类信仰的具体化实在化。

第二，宗教所必备的要素。从目的性上看，宗教是为了达到人类信仰之目的而建立的，因此宗教是为活着的人服务的。那么，它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为活人服务呢？换言之才能成为宗教呢？

例如，狗教的红灯亮法门，它必须具备狗、肉、红灯与狗的叫、摇尾的行为。狗，是红灯法门的主体，肉是此教的彼岸，红灯亮是此教崇拜的图腾，狗的行为是一种修炼。拿狗做比方，实在大大地亵渎了什么，但赵州禅师说"佛是什么狗屎橛"？比我的比喻还过分，所以一切以使大家明白一个道理为准，百无禁忌。

拿人类的宗教来讲，为了达到为人类的意欲服务，它也必须具备以上四个要素，即：

宗教的主体——人，教徒；

宗教的图腾——偶像，佛，祖师；

宗教的目的地——彼岸，无烦恼的净土；

宗教的修炼——修证，仪轨仪式。

例如原始宗教的拜火教，其主体是人，图腾是火，崇拜火的目的是顿顿饭有烤肉吃，其宗教行为则是仪式、咒语或教徒们的修行。宗教的三要素在前言已讲过，在此只是重复一下。其实三要素与四要素是一回事，前者强调的是宗教组织、后者强调的是仪轨修持。

而当社会发展到两千六百年前时，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正规的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稍后的道教。

显然，佛教的主体是教徒和僧人，图腾是佛祖和禅宗祖师，目的地的彼岸是悟道后的境界，修证则有八万四千法。

第三点，官禅的正统宗教性。官禅的正统宗教性，正是表现在宗教四要素上，它具备了人、祖师、悟后境界和时时勤拂拭的修行方法。

再细致地展开，则：



讲述四要素的道理叫“见地”，是官禅的理论部分；

而是否开悟要由师父来印证，叫“证果”；

悟道后怎样去生活叫“行愿”。

作为宗教的一支，南北两派的禅宗有很多共性的东西。当我们要区别和认清南北禅时，可以把这共性的东西略去不表，如主体同是人，图腾同是佛或祖师。需要我们注意的不同要素在于彼岸和修证，当然还有组织形式，仍是我们前言讲的三要素。

官禅认为彼岸是个清净的世界，所以修证是个日日勤拂拭的净心；

南禅认为彼岸是个空寂的世界，所以任何修证都是多余的，不需修，只需悟。

南禅的问题我们放到后面去讲。

官禅，因为彼岸之净与修行之渐，造成教徒们在一生中都要小心谨慎地活于世上。说白了，他们生活的全部要义在于修。因为无妄念的人是没有的，所以修行是他们入禅门到圆寂的全部生活要义。有上根器者，悟了这个道理，立入彼岸；不明白的，一味在认真刻苦地练，那么他的一生也就是这么炼一生。有了如此结果，就使官禅有了一个潜移默化的变化：

修行的意义在于修行，彼岸只是个空想的永远追不上的机器兔子。

换言之，就像是演员们在舞台上的表演，表演的是过程，观众看的是过程。重要的不是目的，观众虽然也愿意看到结局，但艺术欣赏的主体是过程啊，而不是欣赏一个目的。

官禅的这种变化，使彼岸永远在你的眼前，除了到你死时、闭眼时，才修成了，到彼岸了。这简直是政府和皇上最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官禅受宠就一点都不足怪了。也许有的修行人认为我说得不对，不顺眼不入耳，要和我辩论辩论，虽然我看官禅也不入耳，但辩论，我欢迎。可必须有个条件，就是请亲自来。谁要和我辩论，请亲自来，我的这个亲自来，是说让个活人来，而且不是替他人代为辩论。只要符合这个活人来与我辩论的条件，我就敢与之辩上一辩，因为你的失败已经在我的前提下注定了。你想啊，一个大活人，看了我写的勃然大怒，生出种种心要和我辩论，这哪里还有个“明镜台”一般洁净的心？拂拭得还不够，仍需拿清洁剂再去使劲儿擦。辩论，是妄心的产物，更是大活人办的事儿。如此这般，凡壮起胆子要和我辩论者，先就不是官禅一脉的僧徒。

这里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活人能否做到绝对的净心？不能！相对的豁达和净心是存在的，也是可以修到的，但绝对的净心是活人难以达到的。苏轼先生“八风吹不动”已经净得可以，但仍是让佛印骂得“一屁过江来”，还没达到绝对的净。我刚一说官禅的彼岸与修证如何如何，有的同修就要讨伐一下我，于是我也要准备用电脑打出若干“放屁”的条子贴在自家大门和楼道处。

如何挣脱这种永远在修的状态和永远与彼岸可望不可及的状态呢？这就是悟，这是南禅的特色了，是后边要讲的事。这一节我们讲的是官禅的宗教性，所以先不说它。

宗教性，当原始人的拜火发展到如今的拜佛后，其中实用与功利的成分是甚少以至于无，只留下人们对自己信仰的信仰及自我肯定、自我发现的激动和欣喜。这已经是艺术范畴里的事情了，是一种审美的情趣。意即：人们对自己有如此的理想和信仰而深受感动，同时赞叹和崇拜自己居然有这么不可思议的理想和信仰……我可真是太伟大了。

我们常常为自己这渺小的人类能产生这么美的彼岸、创造出这么眼花缭乱的法门而惊奇而激动，惊奇自己的伟大和为自己的伟大而惊奇、激动自己的想象和为自己的想象而激动。当你把这种惊奇和激动凝结住，停格住！这就是当代禅宗的最高境界和意义。

真是可惜，当代人明白此理的少之又少，反而走上更加实用与功利。修行要成佛，否则不修，差点儿也要弄个儿子出来，否则不信观音。再不成就让我这次炒股能赚个百十来万……这是信仰？这是押宝。

心永远不可能绝对的净，彼岸永远不可能达到，这是宗教性的必然。宗教在步入近代后，它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距离。现实与彼岸的距离，净心与妄心的距离。这个距离随着你修行的越来越深入，则是现出无限地接近，但不会达到零！绝对不会，除非死。到卧佛寺去看看，那真叫“得大自在”——圆寂了。同理，真正的艺术大师到死时，才可称为大师。

现实与理想的距离既是艺术的本质，更是宗教的本质、信仰的本质。它也使人们从修“息妄”进步到对人心进行研究的南禅。

（三）北官禅的大致内容

可望不可及的理论在我们分析和研究它时，它是那么的悖谬，但在人



的真实的生活中，它又是那么的可行与美好。苏轼没达“八风吹不动”，只这“七风吹不动”已是大文豪了。进取自如宠辱不惊的人品，并不需要达到宗教性的彼岸，并不需要能追上机器兔子的狗。僧人日日在修，即是一种美好的人生，与何日得果无关。凡人心存理想或有个信仰，日日踏实地活着并追求着，不为世俗的坎坷牵扯进太多的精力与心血……这已经就是大圣人了，是佛了，并不能苛求他非要到达到自己的信仰与理想才算是成功人士。

请问，佛还能要求一个活人干什么呢？明白这个道理，叫彻悟。

北宗的官禅，为了给活着的人以成佛的希望，于是建立了自己的法门。再重复一次，我也不怕啰嗦，这个法门的意义在于你终身向往一个彼岸，去向它努力，用这种心态活在世上，就是佛，就是常人了……这是显宗最大的密。

一切的真理在于过程，而不是一个可以言说的道理啊。

人要一天一天地过日子，佛的日子也需一天一天地过。

不能再讲了，已经太白、太透。

“自心清净”是神秀的理论基础，是修行的起点也是终点，是此岸和彼岸所共有的。只是此岸多了妄念，这是真常系的特色。神秀说：

“故知所修戒行，不离于心。若自心清净，一切众生皆悉清净。”

这显然是宣言，是彼岸风光，也是修行的总纲。求成佛须向心内求，把自心的清净显露出来即是佛。如何显露出自己的清净呢？这就要“摄心”、“专念”，也就是观妄心为幻：

“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

这四句本是神会在《南宗定是非论》中将神秀禅法作的总结，也是神秀禅的特征。“凝心入定”是常练禅坐；“住心看净”是经常体验清净的境界，这两点凡练禅坐的人都可达到。而“起心外照”是说在你练坐禅时有意识地向外思索一件事。比如吧，你有意地想一下单位不分你房的事儿。这种起心外照，在门里也叫“作意”。“作意”的目的在于最后一句“摄心内证”。也就是“作意”想到不分你房的事后，立生烦恼。然后把意识再收回内心，看看这个烦恼心在何方？没了，跑了，找不到了……于是你感悟到妄念全是没根的，你再也不执著它了。对了，官禅就是这么修。

从本身修炼和体会中，神秀和他的弟子们创立了“五方便门”：一、总

彰佛体门，亦称离念门。也就是通过刚才列举的四句话去看净，使你的心远离妄念，反归本觉。二、开智慧门，亦称不动门。在你了知一切念为妄后，就再也不受它的诱惑，如如不动于无念的本觉中。三、显不思议解脱门。索性连产生想"思"一下想"念"一下的想法全修没了。四、明诸法正性门。当你学会了前三门，你不要怀疑，这是所有正道之法的共同的特点。五、见不异门。你再博览诸经，研究诸法，发现一切于此为不二，所有佛法到最后全是到看净而成佛的。这五门的前三门是知念妄而远离，见妄而不动，不思妄念；后二门是坚定你的信心。是否对，是否好，各位自去问自己的师父或自己去品，同是佛门一家的子弟，我修的和你修的不一样可以，但不许议论好坏长短，这是咱佛门规矩。你修此法不合适，也许我修此法颇有心得。你用它去修出世的法，也许我用它修入世的法。要依我写这本小册子的意思，最好是讲一个结果，那我就劝大家于悟后入世修时，再依神秀北宗的渐修法，此不失为上策。

总之，神秀的渐修法门是直承达摩一脉和《楞伽》经典的结果，从达摩的"捨伪归真，凝住壁观"到神秀的"住心观净"是北禅正统的理论。弘忍虽然喜欢慧能，传衣钵给他，但同时他又说："既体知众生佛性本来清净，如云底日，但了然守真心，妄念除尽，慧日即现……譬如磨镜，尘尽自然见性。"

难为众修行人了，何去何从？是跟神秀学还是跟慧能学呢？

还是上边讲过的老话儿：你把"渐修"看成是什么，而不是"渐修"能修成什么；你认为生活是什么，而不是生活为了什么。

转变一下观念再来思考。如果想不通，悟不明，没关系。有时不求甚解也是大有悟性的事儿，比死抠个什么理儿要强得多。禅宗的一个特色就是不要对着干，不行咱绕过去，说不定什么时候你就明白了。

（四）北宗神秀的弟子

北宗既是官禅，神秀又是国师，那弟子众多、人才济济就不奇怪了。"陛党七十，味道三千"。法嗣十九个，而以义福、普寂为首也。

义福（658—736），他的禅法是"练五门，入七净"。五门前边讲过，七净则是戒净、心净、见净、度疑净、分别道净、行断知见净、涅槃净。总之，义福是小心谨慎地沿神秀的"住心观净"发展下去，他"苦身励节，律行贞



苦”一显王家禅师的风采与人品。可以说国家需要的宗教、教义、修行法门与修行的榜样在此具足矣。

普寂(651—739),开元以后,普寂被认为是北宗正传,号七祖。连刘禹锡也说:“言禅寂者宗嵩山”,就是说少林达摩一脉正传到七代为普寂者也。普寂严格地继承了神秀的法门,他自立准则:

“心无所存,背无所倚;都忘禅睡,了悟佛知。”

开元十五年,那个先明白后糊涂的唐玄宗下诏亲赞普寂禅法:

“其始也,摄心一处,息虑万缘,或刹那便通,或岁目渐证。总明佛体,曾是闻传;直指法身,自然获念。”

这个唐玄宗,任李林甫、宠杨国忠、斥房玄龄、爱杨玉环、喜普寂禅……千秋功过,如何评说?

盛唐以后,出家逃遁、野游山林已不普遍,中央集权的强大已不再允许脱离政权控制的团体存在。对于那种与当权者有一定距离的群体,一般来说政府采用两种办法:一是以法家的杀伐法,把这些群体作为五毒而诛杀尽;一是以儒家的招安法,让它们为政权服务。从武则天到李隆基,二位全是以招进京奉为国师之法,使北禅成为官禅,这可是唐玄宗晚年办的唯一不算糊涂的事儿。

总之,北宗官禅在安史之乱后,竟然失传,极盛后之极凌乃至了无踪迹,实在是令人费解。柳宗元亦称:“今佈天下,风言禅皆本曹溪”,南禅的好日子来了。

二、神会与法统之争

神会(684—758),就是《坛经》中敢与六祖贫嘴的荷泽神会。他在六祖圆寂后曾北上云游,他有感于普寂被奉为禅宗七祖而不平,更为“两京之间皆宗神秀”拍案而起。

开元二十二年(734 年),神会在河南滑县滑台大云寺主持召开“无庶大会”,正式向北宗挑战,以顿派和慧能向渐派的普寂开战。这里面普寂以立神秀为六祖,而实是确立自己为七祖的地位;神会则以立慧能为六祖,实是确立自己为七祖的地位。于是这场辩论的焦点就是:慧能的顿派是弘忍心传,还是神秀的渐派是弘忍心传。

前文讲过，五祖法门本是“法门大启，根机不择”，这是禅宗由云游走上定居时初创禅院的必然。不论何等门派，凡劳动且坐单参禅者，均为东山门人。如此这般，一团和气，天下太平矣。一旦其中一门人打着五祖旗号被奉为国师，其禅法被尊为正统官禅，惨了，乱子来了。大家同在东山门下劳动与参禅，同样受过五祖召入密室“密来自呈，当理与法”地印证过，凭什么你是六祖七祖？凭什么你的禅法吃香的喝辣的，我就该一天三顿啃窝窝头呢？于是哄然而起，东山门下各路弟子撕破脸皮，以东山正传正宗正派自居，法统之争开幕。

看来，什么“看净观心”、“本来无一物”都比苏东坡老先生那“一屁过江来”还过分得多了。滑台大会后，南北二支“相见如仇”，为争夺正统地位，各自立碑作记、四处讲演、投靠权贵……甚至想一心将对方置于死地。神会就被北宗逼得“三度几死”。但神会这个人很顽强，不甘服输。天宝四载(745 年)，他趁普寂和义福先后去世，又东山再起，鼓吹南禅宗旨。无奈玄宗喜欢北宗，神会屡遭贬斥。

公元 755 年，“安史之乱”。在叛军攻占两京后，北禅僧人多投靠叛军，无一有节气者。而南禅的神会帮助郭子仪平叛，在“大府各置戒坛度僧，僧税谓之香水钱，聚是以助军需……代宗、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这回神会翻身的日子到了。神会为唐王朝平叛立了一大功，自然受到皇室重视；北宗为叛军张目，自然受到冷落。刘禹锡在《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中记：“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诏书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谥曰大鉴。”六祖之位有了定说，南北法统之争终以南禅获胜而告一段落。这次的东山再起终于不落了，而神会也给中国人留下个“东山再起”的成语。这里的“东山”指正统的东山弘忍的法统。

尘埃落定，我们后人细品这个法统之争可以看出它对中国人的种种影响。这些影响概括起来有五：①理学的建立和理学向心学的发展；②狂禅的出现；③文人士大夫情趣的转移、言情艳情小说的发展；④禅宗最后的完结；⑤禅宗在本世纪的复苏。

如果说中国文史上从远古至南宋有那么一些浪潮的话，那可以计为三次大浪潮(中小之潮不在论)。战国时的意识形态“双百”、魏晋南北朝时文学艺术与情感的“双百”和中晚唐两宋禅宗内意境与心理研究的“双百”。



三次浪潮，揭示了三个层次的辩证。

第一个层次：儒家道家与法家的辩证，同时也是儒家与道家的辩论。

第二个层次：诗仙与诗圣的辩证，亦是边塞与田园的辩证、浪漫与现实的辩证、苦闷与爱国的辩证。

第三个层次：法统之争，如果只知这是六祖七祖之争，不知就里，怕是肤浅且简单。这是心理上束缚与自由的辩证之争、个性与共性的辩证之争、有我与无我的境界之争……甚至可以说是理想与现实、社会与人生之争。

下面谈一下法统之争对中国人思想与情感的影响：

1. 理学的建立和理学向心学的发展。北禅之所以成为官禅，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宗教性的四要素（宗教三要素的伸展与变形，即：人、偶像，彼岸与修证仪轨）。神秀体现这四要素是：僧人、佛（祖师）、成佛成祖与渐修加礼佛的仪式。这个盛唐的产物，直接启发了南宋的朱熹，他依官禅之法把理学弄成了“官儒”之“教”——“儒教”。儒教（理学）的四要素体现在：一、文人是该教主体；二、孔子是该教的偶像，连皇上老儿也要跪在孔子牌位下，哪怕这牌位是塑料做的；三、儒教的彼岸是仕途之路，是千古流芳的入史册、立牌坊、建宗祠、衣锦还乡、扬眉吐气、祖坟冒清烟等；四、儒教的修证与仪轨更为阴险，修证则是“灭人欲”了，连夫妻之事都要言明“小人本不愿做，无奈为了祖宗香烟，只有豁出去了”，上床比上刑场就义都壮烈而凛然。当然寻花问柳等全非君子所为了，可是为了香烟死都不怕，所以为了香烟去纳妾、去超生、去偷情，则无伤大雅。仪轨，则是拜孔圣人，日日、月月、年年因地域不同，所搞的“献礼工程”的规模不一，反正是越大越好。

可以说神秀弄出了官禅，朱熹弄出了官儒。释加牟尼建立了佛教，而达摩改其为禅宗。同理，孔子只建立了儒家，而朱熹改其为儒教。官禅的口号是“时时勤拂拭”，官儒的口号是处处“灭人欲”；道家与佛家的口号是“尊天道”，儒教的口号是“穷天理”“存天理”；神秀要求“渐修”并“严于律己”，朱熹要求“劳其筋骨”和“自强不息”；官禅依附于政权，官儒同样依附于政权。

而南宗慧能之禅，发展到马祖后打出了“即心即佛”的口号。同时到了安史之乱后东山再起成为主流，陆象山、王阳明二位受其启发建立了心

学。南禅的四要素早已零乱破散，剩下"主体人"与明心见性的"顿悟"，"偶像"与"彼岸"已不见踪影；心学依法炮制，剩下了"主体文人"与"灵性说"，至于当不当官却不太在意。沿南禅之路，禅宗会很快瓦解，所以有百丈再建丛林清规；沿心学之路，儒教也会很快瓦解，所以很快地心学被淹灭于理学之中。心学毕竟是依附王权的，它没有成熟到独立或强壮到独立，当王权选择了理学时，心学就只有被人家吃掉、兼并掉一条路。所幸的是南禅并没有马上被正统宗教吃掉、兼并掉，直到宋末前它走的仍是一条辉煌的路。

2. 狂禅的出现。官禅，以定生慧，这就是把修行人置于戒律之下。南禅，不立文字、定慧齐等、顿悟成佛，把人性置于一切经典、戒律、修证之上。当然悟道的人有，但更多的僧人却是不知圣教为何物、不知修行为何物、不知正信为何物，只知张嘴说开悟。满寺满山满丛林的圣人，实是遍地野狐禅、文字禅、口头禅、狂禅。

此风流入社会，是个人都开过悟。成语的"恍然大悟"、"痴迷不悟"、"至死不悟"……就是这种人人悟处处悟的写照。文人们悟了"文章是歌颂比批评好"、农夫们悟了"不种地没饭吃"、官吏们悟了"银子是白花花地"、皇上悟了"偏安一隅也算是皇上"、歌女们悟了"唱"后庭花可以拿钟点钱，亡国不亡国与小女子无干。真不知哪个不开悟的混帐文人，说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你们怎么不放下笔拿起枪去抗金兵？一如今天只知抓妓，怎么就不知去抓抓国民经济？抓抓腐败问题？看妓女好欺负么？

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说："原夫佛说顿教渐教，禅开顿门渐门，二教二门，各相符契。"历代大师也说："理虽顿悟，事顺渐修。"我们也主张渐修与顿悟是辩证存在的，是行为与思维的辩证。用我前边讲过的"正道五步"来看，"悟前修"、"入空寂"和"悟后修"全应是渐修的路子，是官禅的特色。而"出世悟"和"入世悟"则是关键之处，这个关键之处应是南禅的路子，是顿悟的特色。儒家倡"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其意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为渐修，当功力积累到一定火候，由着自己的情感和灵气儿，一张嘴自己也会创作诗歌了，这是顿悟。所以顿渐二者，本是修行路上不同的关口，层次不同，所依赖的东西也不同。渐修依意志毅力、顿悟依灵感灵气，而顿悟又必依渐修的积累。无顿只渐为死修；无渐只顿是野狐，一如学与思的关系啊。



简单地小结一下：

顿渐二者，层次上渐修是量变，为先；顿悟是质变，为后。

所依者：渐修依日日的坚持、年年不懈；顿悟依量变的积累、依灵气儿、依悟性。

割裂二者后，凡渐修的人易流于枯禅；凡喜顿悟者易流于狂禅。

诸修行人戒之。

3. 文人士大夫情趣的转移，言情艳情小说的发展。在文学部分已讲过，官禅产生官儒的理学，使一种人文思潮变成了宗教，这实是让人憋气堵心的事儿。儒教在规定了杜诗、颜字、韩文后，以灭人欲又否定了一切情与欲。然后，南禅打败了官禅，心学代替了理学，使情与欲的描写泛起。明清两代的市民言情小说乃至专写艳情性欲的小说即是南禅与心学之滥觞。

仔细品味文人士大夫情趣的转移，不能不说是唐诗、宋词、古文发展的成熟造成的，是成熟带来了种种框架和限制。成熟本身就意味着毫无新意，成熟更意味着情感的渐趋枯竭而理性味儿逐渐霸气十足。理学原本毫无新意、毫无情感，而南禅以其新、奇、充满灵气和极具人情味崛地而起，于是心学也以儒家的面目与南禅相应相合……这些东西碰撞的结果，造成了杂剧与小说的兴起。当然由南禅的分宗到南宋末年，仍有 500 年的时间，但文学艺术上的演变，却是已酝酿开始了。认真地追根溯源，恐怕不能不追到神会的法统之争这儿。“即心即佛”的理论，是耶？非耶？善耶？恶耶？

4. 禅宗最后的完结。南禅的胜利，使禅宗呈现出生动活泼的局面，这对人性的研究、对人的心理上的探讨有益处，但是对儒教和佛教都是一种打击。所以正统的儒教与佛教在禅宗气势正炎之时，也在慢慢地发展，更何况历代君王对禅宗总是十分“关注”。元朝，蒙古人崇蒙密，禅宗被冷落。明朝，朱元璋本是僧人出身，所以制定出很多规矩来限制禅宗。清朝，尤其雍正，崇藏密。在他自己新创了一套禅法后，自觉得无趣，索然无味，所以干脆下令封杀，禅宗至此寿终正寝矣。

倘若北宋官禅在法统之战时胜利了。那禅宗顶多被冷落，绝不致被封杀，可是那将是更加沉闷的中国啊。

因为以后还要讲这个问题，所以在此我们只略微一提。把禅的终结

算在神会头上也许让人觉得过分，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实。

5. 禅宗在本世纪的复苏。如果说是神会的“东山再起”使南禅一统天下，那么他也是让南禅惨遭灭顶之人。但于本世纪初，却仍是他——神会，居然让禅宗再一次的“东山再起”了，大有“东方不败”之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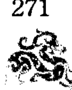
如此神奇之事，纠其根源无非是“官禅”的“宗教性”与南禅的“人性解脱法门”的区别。是神会的南禅对于人性进行的探索使南禅具有了起、伏、再起、再伏的特点。官禅作为宗教，已经整体地过时了，而时时勤拂拭地修心，作为一种培植德性的方法，万世流传，但它只是一种方法而已，它必须依附于一种理论才能成立。南禅，却是作为一种思潮，一种人性解放的理论而得以流传下来。

在本世纪30年代，日本的禅师铃木大拙首先拣起禅宗(当然拣的是南禅)。当今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造成了很多令人困惑的难题。例如：人与人的冷漠、人与自然的隔膜、人与自心的分裂。所以铃木大拙以南禅当药，要医治当代人类的文明病。他宣布：禅对人性的阐释具有超时空和历史的意义。换言之，只要人类还存在于地球上，禅就必然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不会过时。因为不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进化得多么先进，人自身存在的情感情绪并不会因为这两个进化而消逝。只要情感情绪存在，那么负面的焦虑、紧张、恐惧、困惑就会存在，就会困扰人的心。我们依这个“超时空”理论，看看当代的款爷、款婆是否和下岗的人一样有喜、怒、哀、乐？有焦虑、紧张、恐惧、困惑等情感情绪呢？如果穷与富本与人的情感情绪无关，那么可以类推这也和历史由穷到富的文明进步无关，于是可以认定铃木大拙的人性“超时空”论是有他的道理的。道理对头了，那我们的眼光就明白应落在何处了——在南禅的“人性解脱法门”上。

与铃木大拙相对立的，是胡适先生。他认为：“禅是中国佛教运动的一部分，而中国佛教是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只有把禅宗放在历史的确当地位中，才能确当了解。”换言之，禅宗的产生，应客观地放到中晚唐和两宋去看，才能真正地了解它的真实意义。

于是二位伟人，一个禅宗大师、一个文豪，二位开牙相互嘶咬对方，搅起禅宗在本世纪初的再一次东山再起。葛兆光先生在《中国禅思想史》中认为：胡适先生迂了，而铃木大拙先生是对的，他说：

“人怎么样生存是自古至今人们思考的老话题，古代人的思考并不一





定比现代人的思考浅陋或简单。科学技术、法律制度与生活习俗，它们无疑是应当日新日日新的，而焦虑、紧张、恐惧和困惑却始终如一。没有理由瞧不起古代人的思想，更没有理由认定这种思想是沿着一条不断向上的主轴向一定目标前行的。”

葛兆光老先生让人敬佩，其眼光独到、思路清楚、看问题洞彻根底，不愧是大思想家、哲学家。他接着说：

“知识，由清晰的概念分析与严密的逻辑思考而来，写在书上就能够代代相传。智慧却是由个人心灵的体认与感悟而来的洞见，每一代人都必须自己去体验。它并不存在叠加累进的问题，也没有终点站在遥远处。……这里没有‘落后’或‘先进’。……宗教自古至今都只有一个作用，建立信仰，而信仰都无等级。它超越时间而存在。”

科学，分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类，而“人文科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部分。我的这个小册子主要是讲“人文科学”，我试图告诉大家：“人文科学”中有不变的和变的两种成分，这是和自然科学不一样的地方。这种变与不变，导致了自然科学重逻辑思维、人文科学重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导致了自然科学重理性，丝毫不允许有情感存在，而人文科学重情感，情之所致时，总会看见上帝、老天爷、佛祖和良心。

书归正传。

我为葛先生的言词喝彩，妙不可言。

喝彩之余，却又生出一种困惑，是否问题这么简单？是否只是禅的历史性与超历史性这么个简单的问题让胡铃二位大战，让葛老先生出来评定？葛老前辈和我们是否上当了？

南北禅之争，是神会为了争七祖，所以你讲渐修，我偏讲顿悟。

胡铃二位之争，为了争个什么？二位堪称博士的头衔，总不会为蚂蚁上树做什么学问吧？读史、读古人诗词，都会为古人落泪，屈原、岳飞、文天祥都让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激动，这当然说明人性中情感部分具有超历史性，何至于在此大动干戈？所以我怀疑葛老先生和我都上当了，胡适与铃木大拙二位是在演戏，一个唱主角，一个唱反调，互为“托儿”。其目的是善良的，为了引起世人尤其傲慢的西方人重视和看一看我们东方文明。果真如此，胡铃二位也算功德无量；如果不是，二位真地各执己见吵起来了，那这铃木大师就悬了。胡适是文人，咱不敢评论，但依我修禅三十几

年经验，敢断定铃木先生的功力还远不如我。成佛是八风吹不动，苏轼是七风吹不动，我估计自己怎么也能算五风吹不动，而铃木前辈惨矣，能对付个三风四风吹不动、三步四步心不动、三两四两喝不醉……就不错了。

我敢自称五风吹不动，有我的理由，诸位修行人评一下看看是否称职：

从南禅对人性解脱所做的研究看，它具有超历史的贡献，这是屡屡东山再起的根本原因；

从南禅对宗教，对社会网络的破坏性看，它必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屡屡遭禁的根本原因。

当一个社会呼唤着改革开放、呼唤着新网络诞生时，南禅的"即心即佛"将是人们精神的口号，它已超越宗教的范畴，它是求得解脱的动力。中晚唐，正是人们要求改革的时代，所以南禅的发生具有时代性。

而当一个社会呼唤着安定和平、呼唤着现实网络的稳定时，南禅的"即心即佛"很可能是不稳定的因素，它也超越了宗教的范畴，它让人们在共性、国家安危、民族存亡面前显得走投无路，无可奈何。两宋时的禅宗门派繁多，每宗内支派繁多，正是这种各自寻求出路的表现。当理学的心学建立后，禅宗渐渐归于默照禅，这不能不说是安定时期南禅的必然结果。所以南禅的衰微，也具时代性。

综上所述，南禅本身的发生、兴盛与消亡具有时代性；但它内容本身、"即心即佛"的思想本身却是"超时空"性的。所以，铃木大拙讲的"超时空"性是指南禅的内容，也就是人性的全方位发展性和这个发展的无止尽性上，只有在"即心即佛"这个认识上，人们才能尊重这两个发展；而胡适讲的"时代性"是指南禅的产生与消亡，也就是何时提倡"即心即佛"、何时提倡"时时勤拂拭"这个时机是具有时代性的。

总之铃木大拙与胡适的一番缠斗，搅起了禅宗在本世纪的复苏，这个复苏，不能不说是神会给中国人留下的南禅造成的。

以上五点，是法统之争对中国人思想与情感的影响。因为有的问题后面将讲到，所以在此只讲这么多吧。

三、中晚唐到五代十国时南禅概况

六祖慧能有嗣 43 人，立传者 19 人，在这第七代南禅中，大约可分为



"岭南系"、"荷泽系"、"保唐系"、"永嘉系"。

(一)南禅第七代的大略情况

1. 岭南系。此系是原六祖的班底,在这四系中他们文化水平最低。该系强调劳动,不强调坐禅。在经典的运用上,他们不是强调般若系的空观,而是很灵活地强调"佛性不二"。这是个入世的口号,是有实际用处的口号。岭南一直是官军剿抚和官吏流放之地,是兵、匪、贼、流民当僧人较多的地方。在这种禅院里,不论你的出身为何,犯过法否,有前科否,一入禅门者佛性不二,这实在是心理上最大的解脱。如将军进澡堂子,衣服一脱,大家全一个样,谁是将军?谁是草民?全赤条条地,这叫佛性不二也。

看来此系文化水平虽不高,心理学的研究颇透,同时也为禅宗从论坛走向生活开出了一条踏实的路。

2. 荷泽系。此系的祖师就是荷泽神会,该系重视知见解脱。神会说:"知之一字,众妙之门。""空寂之知是人的真性。"

看来神会重视"入空寂",但是否能"出世悟"就不得而知了。

此系的理论前边已经讲过,不再重复。

此系与官僚阶层过往甚密,且文化水平也较高。王维就与神会私交甚好,并受神会之托,第一个为慧能树碑立传。而士大夫所喜之禅,也多指此系。

3. 保唐系。此系以无住为主,无住彻底地排斥北禅和传统佛教的各种禅法,宣扬白骨观、数息观和"观佛三昧",看来该系是绝不喜欢"修",一切以"悟"为禅僧的全部功德了。无住的做法虽然有些偏颇,但在当时却是让禅由神秘而进入生活的一个平实的法门。《历代法宝记》中记录无住的话:

"坐禅观中,见佛形象,三十二相,种种光明,飞腾虚空,变相自在……皆是自心颠倒,魔着系网。"

这般话,就是我们当今的练功人,也有必要认真地听一下,千万不要以走火入魔为佛事正道,千万不要相信"我就是转世活佛"的骗子!

无住要求门徒们:

"不入三昧,不注坐禅,心无得失,一切时中总是禅……活泼泼,行坐总是禅。"

显然，这是为南禅以后发展到"行处坐卧、不离这个"的入世禅打下了基础。它和"岭南系"的"佛性不二"一样，为禅的入世开了先河。

4. 永嘉系。永嘉玄觉(665—713)，此人就是在六祖处睡了一觉第二天即下山的那位。

永嘉大师，著有《证道歌》。歌中曰：

"君不见绝学无为闲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觉了无一物，本源自性无真佛。"

他这一系是由道场走上官场、由山林走上闹市走得最远的一支，该系将禅宗自觉地官场化，但也是当时文人士大夫最喜欢的一系。

因为第七代多处在与北宗争法统的时代，其理论直承六祖"顿悟"说，所以不再重复讲述了。

(二)南宗第八代与江西马祖、湖南石头

如果说南禅第七代产生了四系，但这四系只是做好了禅宗向入世转移的准备，做好了迎接主流霸主交椅的准备。真正有霸气的，则是新兴的江西系的马祖道一和湖南系的石头希迁了。二位是"江湖中人"的祖师爷，是墨子创立团社(丛林)的继承人，是大胆地宣扬人性解脱的大师。

中晚唐，因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牛李党争、兵变、农民起义……忙得统治者无暇顾及宗教。禅宗在夺取了正统地位后，也必然要分化出众多的门派。穷了要分家，富了也分家，本是中国的老传统了。不过穷了分家是谁也不愿说自己是穷根；富了分家是谁也愿意说自己是嫡系。同是嫡系的江湖二系在"出世悟"的基础上高呼人性的本能意欲——"即心即佛"，实在是黄土地上少有的亮点啊，不愧是名门之后也。

1. 江西禅系(亦称洪州系)。此系奉南岳怀让(第七代传人)为本系祖师，到马祖道一(第八代)手上，宗门大开。

南岳怀让(677—744)初见六祖，六祖问："甚处来?"曰："嵩山。"师曰："什么物，凭么来?"曰："说似一物即不中。"师曰："还可修正否?"曰："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师曰："只此不污染者，诸佛之所护念。汝即如是，吾亦如是。"

怀让的"说似一物即不中"，是他开悟时的体验，也是悟后的境界。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用科学的分析推理怕是不成，只有类比尚有些影子。



当门捷列夫为元素如何排列而苦苦思索时，累得他不得不松弛一下玩玩自己喜好的纸牌……插一句：此公好赌，但不是专业赌徒。再回来……就在此时，灵感产生了，元素也应像纸牌一样分成组，依电子的数量从少到多地排列起来。门捷列夫心头一动，元素周期表诞生了。当他在科学大厅宣读这个发现时，众科学家甚至他的老师都斥责这是伪科学、是反科学，是赌徒的产物。你让门捷列夫有什么办法呢？灵感来得毫无道理、正确得毫无道理，说似一物即不中。

而在《祖堂记》中记载了六祖对怀让说"马驹踏杀天下人"，这预示着怀让的弟子马祖道一将称雄天下。有神通？有特异功能？非也，此为经验也……果真，只因马祖，中国禅宗进入了成熟的辉煌期。

马祖道一（709--788），24岁受具足戒来投怀让。他每日不看经、不问法、独自坐禅。怀让问道一坐禅为了什么，道一答为了成佛。于是怀让拿一块砖在地上磨，吵得道一坐不下去，就问师父磨砖干什么呀？怀让答得也风趣，磨砖做镜子呀。道一不以为然。这时怀让正色曰："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得成佛？"道一无以对答。怀让接着说："如牛驾车，车不行，打车即是？打牛即是？汝为学坐禅？为学坐佛？"于是道一言下大悟。

怀让在说什么呢？大师说：磨砖既然成不了镜子，那坐禅怎么能成佛呢？车停住了，你是打驾车的牛？还是打停住的车？同理，你到我这儿当学徒，你是要学坐禅的功夫？还是要学成佛的本事呢？

看来江西一系早已把坐禅与学佛剥离开了，这种剥离，是禅宗最后脱离宗教的宣言；这种剥离，是人类从规范自己的行为向人类重视生活体验的跃升；这种剥离，是人类满足了生存这第一层次需求及实现了尊敬和爱这第二层次的需求后，向自我实现这最高层次需求的冲刺。不要小看"汝为学坐禅？为学坐佛？"这句话，前者只为活得身心健康、安详、愉快，后者却为了脱生死。质的不同，虽然貌似一致，但其精神境界却大不相同啊。诚然，坐禅如果是为了做佛，由此法门入手也未尝不可，但要明白它只是渡河之舟。

怀让过世后，马祖继位。一日打坐，一口痰上来，忍不住吐在了佛像上。弟子忙说："师父，您把痰吐到佛像上啦。"祖曰："这怎么了？虚空之中，到处都是佛身，请告诉我该吐到哪里？"可见马祖虽然打坐拜佛，只是为了应付宗教不得不装装样子罢了，形式主义而已。但只要不是形象工

程，不是为了升官而弄的业绩，咱们也就放他老人家一马吧。因为他的目的不是升官，而是成佛。

禅宗，当它由“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如来禅”、“祖师禅”到马祖的“即心即佛”，已完成了对前者的脱变，于是“传灯禅”问世了。

可以说传灯禅是以即心即佛为其理论基础、为其诞生的标志的。

下面，关于马祖的“即心即佛”、“非心非佛”和“平常心是道”分别谈一下。

①即心即佛（即心是佛）。首先：如来禅，正统的宗教气息浓厚，此类禅可以说是对如来佛的崇拜。大家知道，任何宗教的首领、老大都有神通，而佛教里的首领和老大分三级：罗汉、菩萨、佛。这里佛是首领之首领、老大之老大。所以佛的神通就大而无边，来无影去无踪地神，也叫如去如来。简称如来佛。如来佛想要什么，伸手就来；不要了，挥手即去。可佛经上释迦牟尼仍要自己去乞食、洗足、宴坐休息。咱不打岔，接着说。

祖师禅，从尊崇如来佛转移到尊崇自性，所以也可以叫“佛性禅”。自性能生万法，万法是伸手就来，挥手即去，神得亦如佛祖。所以“见性”成佛就是这类禅的达标标准。从达摩到六祖再到怀让，基本是这类禅。

分灯禅，则是从尊崇自性再转移到尊崇自心，所以也可以叫“佛心禅”。自心能生万法，万法是伸手就来，挥手即去，神得不亚于自性与佛性。其实，马祖悟了：佛 = 自性 = 自心。而一切神怪法力的传说只是一种比喻，于现实中去寻神通，准找不到，而自心所具有的神通，人皆有之。声明一下，这几节讲的东西，凡门外没修过的人可能看不懂。这没关系，你可以先品一品，然后问一下习过禅的人。不要马上急于批判什么，能真正驳倒即心即佛的理论还没有，你真能做到这一点，我欢迎。所以请诸位别急，不在乎这一会儿。

为什么说人人有佛性呢？比如：你现在看我的书运气，打算修理修理我。此时，你夫人叫你吃饭，说今天吃毒蛇王八宴。于是你那“运气”的心逝去了，想吃宴的心来了。刚要吃，居委会打来电话，你那儿子拿刀捅了人，现已被擒，派出所来人请你去一趟。于是吃王八的心也逝去，担心儿子的心占踞了你的全部情理空间。急匆匆下楼，迎面碰上你的女邻居，人家先热辣辣地飞过一个媚眼，开口说：“哟，大哥，急着干什么去？是不是嫂子又给你气受啦？别生气，晚上到我家坐一会儿……好么？我家那口

子又出差了,天好冷啊!"惨了,仁兄的心到了爪哇国。总结一下:运气之心、吃宴之心、担心儿子之心、想会会女邻居之心……种种心如去如来神得没边,你说这是不是等同于"真空生妙有"的真性?这是不是等同于如去如来的净饭王王子悉达多?

神性神通在于心,不在于行。

其次:马祖道一为什么叫道一呢?因为众徒弟们出身不同、经历不同、文化水平亦不同,这种潜在的不同常常造成种种争论。而这些争论表面上是对善恶的抽象的讨论辩论,但其实质并不如此,它往往暗含着对对方的侮辱与否定。马祖看在眼里,明在心头。他用树枝在地上划了一道,问大家这个"一"是长是短?众人哑口无言。只有一个"一",如何说长道短?再有一道才有比较啊,才可以说这一道长些、那一道短些。但只有一道……于是众徒弟们明白了师傅的用意:长短都是相对的,无长即无短,无短亦无长;敌我都是相对的,无敌即无我,无我亦无敌……对错都是相对的……正反都是相对的……修与不修都是相对的……。因大家佩服师父教导有方,故尊称马祖为道一。我这是玩笑,让大家轻松一下罢了,人家道一另有来头,并不是划一道就变成了"马祖道一"那么简单。

"达罪性空,念念不可得"是说学佛前的所作所为、为官为盗、出身贵贱、家中有无宝马车、瑞士银行有无存款……统统"不得道长,不得道短"。闭上嘴,各自修去!那可说的是什么?可说的即:只问想不想学佛。想,为道同者;不想,非同道也。同道,即道一,这是道一的真正来源啊。这种超越长短的理论,是解脱众人思想包袱的理论,是至今仍有伟大神力的理论。不是么?众位!不论出身是地主、资本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想抗日否?想,即同志也;不想,则非同志也。咱们的抗日统一战线不就是这个原则么?大敌当前还背着出身的包袱,抗战能胜么?能弄出即心即佛的境界么?即心即佛要求的第一条就是全身心啊,总怕被人家秋后算账,总背着出身的包袱,如何是好?

所以,这即心即佛的第二个道理就是让你放下包袱,学会在精神世界中去翱翔。

第三:提倡即心即佛,于人类有什么实际用处呢?首先要明确"即心即佛"在人类社会中的适当位置。于一个社会中讲,每个公民要遵纪守法;于一个国家中讲,每个公民有爱国爱民的责任;于一个家庭中讲,每个

成员都有尊老爱幼、维持家庭生活、安定的义务。而于每个人，除了工作、学习、休息以外，他还要有精神上的需求。这个需求反过来要求社会、国家、家庭能容纳他本人的精神需求。按照马斯洛心理学的"自我实现之需求"讲，这种需求"是一种想要变得越来越像人的本来的样子，实现人的全部潜力的欲望之需求"。看来马斯洛这位洋大人真是西方的心理学家，"欲望"的需求如何能全部地实现呢？无疑这是一条死路。除非你的"欲望"被现实打击得简直不算是全部潜力的东西，而是一种部分的、显而易见的东西后，方有实现一下的可能。而马祖道一的"即心即佛"也是一种中国式的"自我实现"之最高需求。这种需求与欲望无关，而是与人的"无我体验"有关，这是人类在精神领域内的"高峰体验"。所以，中国式的"自我实现"之需求可以这样定义——"这是一种使人明白人的本来样子，实现了人的全部潜力的无我体验之需求。"请诸位反思，每个人一生中总会有这种"无我"的体验。它是美好的，但很短暂，它让我们明白人生是多么美好，人的心是多么神通广大，而那个高峰的境界，灿烂得不可言说，不可言说。

即心即佛不是无赖和泼皮式的无耻，也不是人生退缩的借口，它是一种人生的境界。这实在用语言讲不清，佛说的六神通中最高级的"漏尽通"，即无烦恼的境界，正是即心即佛的一种人生心态啊。

总之，这是一种心态、是精神境界、是一种无我的体验。

②非心非佛。马祖早年倡"即心即佛"，大历贞元前后，也就是他生命中最后十来年，经深思熟虑后，又倡"非心非佛"。于是当代禅学家、思想家、文学家都认为这是马祖思想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是心性彻底解脱的"自然适意"之境界，这"非心非佛"大大地解放了思想，为以后的"平常心是道"而打下基础，是对"我执"的否定……云云。

惨了，惨就惨在这些文人没习过禅。当一个舞蹈演员忽一日在台上跳得如醉如痴……每一个动作都优美无瑕、畅快淋漓……她也感觉如行云流水，似神助一般、梦幻一般，这不是"即心即佛"的天女散花之舞么？这不是敦煌的仙女下凡了么？你问她的体验，她准会说太妙了、美得不可思议。你再问门捷列夫老先生："你如何从赌具的扑克牌那儿联想到元素的呢？"他老先生定会说："是上帝指引的。"这种非理性的艺术思维和直觉思维就是这么没道理，但它又决不是什么"功"、什么"场"、什么"能"这些

龌龊不堪的东西。

可“即心即佛”这个境界、这个体验太“可遇不可求”了，连当代都有人问钱学森直觉思维是不是迷信。钱老回答曰：“那你还没有过这个体验。”这也如同一位大学生拿着爱因斯坦的著作去质问他：“你怎么能说想象力比知识重要呢？你的相对论不就是知识么？”我不知爱老前辈如何回答，他一定被如此认真刻苦的学生问得没话说。天啊，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如何能混在一起谈呢？当你是研究分子原子的人，你能理解由这些小不点的东西组合成人后，居然有了思想与情感么？分子原子本没思想与情感啊。

所以，也有认真刻苦但人生境界很低的人来问马祖。

僧问：“和尚为什么说即心即佛？”

师曰：“为止小儿啼。”

僧说：“啼止后如何？”

师曰：“非心非佛。”

绝了，你一张口问，师父即知你根本不懂，所以胡扯一气，然后落在非心非佛这般若系根本空之中。谁让你玩学问，好吧！去玩吧！一切全无。马祖有个弟子叫法帝，他听马祖开讲“即心即佛”后悟道，于是谢师并去大梅山住持寺众。当马祖无可奈何地弄出“非心非佛”后，自己也很苦恼，苦于无知己矣。于是他派人去找法帝，这派去的人当然不知原委，以为是马祖要试试法帝的道行，他哪里知道这是马祖在找知音叙心声呢。

来人问：“和尚在马师处学得什么？”

法帝答：“即心即佛。”

来人问：“近来马师又有改进，讲非心非佛。”这句话是马祖让这位不明就里的捎话人必须讲的话，单看法帝如何答。

法帝说：“这老头子惑乱人没完没了，任你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

来人回禀马祖后，马祖暗喜，嘴上只说：“梅子（法帝在梅山住持，所以称梅子）熟矣。”

诸位，马祖总算找到知音了，那激动之下，势必老泪纵横。秀才遇见兵，怎么讲？讲什么？插队时，一日书记下来检查学习毛选的情况，正赶上宣传队排练，于是这位书记让每个乐手都奏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

我是拉小提琴的，那效果诸位知道肯定是不那么宏亮壮观而革命，于是我被划为中间派。美的是拉手风琴的老兄，没几天就革命地入了团。惨的是弹吉他的那位仁兄，整整干了两年道具和剧务。

当我们把“即心即佛”当作一种客观的思想产物来和修与不修、人心与佛性、此岸与彼岸、教徒与凡人、真性与贪欲……统统搅在一起进行辩论时，并且还要放到显微镜、放大镜下面仔细辨认时，那禅趣、禅韵、意境、情趣早已无影无踪了。

所以，“非心非心”是个挡箭牌，请你放下显微镜，请你停止开辩论会，请你歇一歇，别累着，我什么都没说。

真悟道的人，只管去即心即佛，你也熟矣。

不悟道的人，只管去修，先别讨论什么。

不修行的学问人，只管继续冷落即心即佛、高歌非心非佛之豁达伟大、自由解脱……如此而已。

③平常心是道。前边讲过“正道五步”，在此重复一下：

悟前修，入空寂、出世悟、入世悟、入世修(行)。

“即心即佛”乃是“出世悟”，悟到心如性、如佛。但用这个出世之悟直接去入世生活怕是不成，真的成了“贪欲心为佛”了。所以“入世悟”则就是悟到“平常心是道”。如此平凡平常稀松二五眼……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唱戏。

显然，“非心非佛”推导不出“平常心是道”的，因为它只是捍卫“即心即佛”的一面盾牌而已。而“即心即佛”与“平常心是道”是马祖道一“出世悟”与“入世悟”的两个标志。

那如何理解“平常心是道”呢？马祖说：

“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圣……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

这就是“入世悟”悟出的道了。

在生活中，一切“应机接物”就是道，就是平常心。常见国际体育赛事，教练们在运动员上场前总是不具平常心地教导自己的队员：“别紧张、要像平常训练一样、要有平常心……”惨了，把运动员说得没了平常心，又紧张又不自然。也许有教练说：“一定要得冠军！一定要为国争光！加



油!”还有的教练只是说:“记住动作要领,不要想其他的事情。对了,你渴么,我这儿还有从国内带来的矿泉水……”上边所讲的种种情况,哪一个更合于“平常心”呢?先别下结论,讲一个我所亲自经历的事情。1980年,我参加了电影《茶馆》的拍摄,剧中常四爷说了一句“咱大清国要完啊!”于是“二灰”(朝廷的便衣特务)过来抓常四爷。常四爷力辩:“我是旗人!”一个灰大褂(林连昆老师饰)说:“旗人?旗人怎么了,带走!”林老师演得一点儿没情绪、没语气、不阴险。业余时间我与林老师谈及此事,林老师说:“我演的清廷鹰犬,一天要抓几十个所谓叛逆、新党的人,不是为了国家,而是抓一个人有赏钱。每日抓得多了,所以抓一个什么旗人根本不当回事,于是语气、语调和眼神动作要显得很‘水’、很平常、很熟练、很心不在焉、像天天吃饭一样,在吃一道小菜儿……抓个人、杀个人都是一道小菜……习以为常了。”

于是我恍然大悟,我悟了什么叫平常心。

于生活中叫不造作,于奥运比赛这不平常的大事时要依习惯,这就是平常心。所以运动员越是把平时训练当成漫不经心的训练,而比赛时当成天大的荣誉之争,完了,非平常心也。而训练时漫不经心,比赛时也漫不经心,这叫平常心了,但成绩如何?可能各类运动不同,结果也不同。但这叫平常心是没错的,因为沿其习惯,沿其下意识去动作,本身不受什么功利、指令、环境的影响。如果训练时教练让你高喊“为国争光”,那到比赛时你也必依这习惯高喊“为国争光”,这叫平常心。猛地不喊了,一下子心里全乱了,不平常了。早些年上海有一个世界出名的跳高选手,每次跳之前要看见教练,成绩一直不错,创了世界纪录。我肯定这教练没学过马祖的禅,不懂平常心的诀窍。于是在一次国际大赛中,因为这运动员没有看见教练坐在何方,一下子全乱了套。你平常和运动员说什么,那多大的赛事你也说什么,别想着出新花样儿平添运动员的负担。我曾经上台演出过,但只是演个土匪的小角色,喊几句“带溜子喽”和“么哈么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打好脸穿上服装,坐在乐队席上演奏。到了要上场,放下家伙急忙上台,被人一枪打中了再“掉”下台来,拿起乐器接着拉琴。一切满顺的,好像演员这碗饭挺好吃。一次,要接待“首长”,几个县的宣传队凑在一起,不用我演奏,而专职演“带溜子喽”。这一回坏了,闲在后台没事,听着前台的锣鼓点儿,自己不知不觉地双脚打颤,抽烟、喝

茶、念咒全不管用。好在众匪徒一哄而上，夹杂在里面还可以，但我还没来得及喊“带溜子喽”，人家溜子早已带上来了。站在台上，我骂自己笨，这么一句台词怎么还给忘了呢？正想着，旁边一位一捅我，该我说“么哈么哈……”那一句，谁知心知肚明是那句“么哈么哈”，一张嘴喊成：“带溜子喽！”全场都一惊，呆在那儿，我也傻了，又补上一句：“这不是带上来了么！”演老大的挺机灵，忙说：“三爷，老八喝多了，净他妈乱说，我来对付这溜子。”在那年头儿敢篡改样板戏，这罪过有多大可想而知，于是我从此绝了当演员的念头，谁知反而当了导演。因为我真的明白我那个“带溜子喽”错在了什么地方，舞台上管这叫“鬼打墙”，它是由不依习惯不依平常心造成的。有此经历后，我深深地理解为什么梨园戏班子里规矩特别多，连什么箱子什么行头放在什么地方……都不能更改，不论是大戏台演出还是草台演出，都不能因为一些无谓的改动让演员觉得不习惯、别扭、而影响舞台上的戏。

诸位，禅宗似乎不讲修道，只讲“即心即佛”与“平常心”。孰不知这平常心却要求你在日常生活中于点点滴滴的细微处都要养成一个好习惯，这是悟道成佛的基础，是“即心即佛”的舞台，是平常心的支柱。

一切无章法，急时抱佛脚，如何是佛？

书归正传。

道一说：“自性本来具足，但于善恶事中不滞，唤作修道人。”

也就是“道不用修”、“道不属修”。道要悟来，修不来。悟得来，是顿悟之南禅的特点。所以，顿悟的理论是贯彻于“即心即佛”和“平常心是道”的。

如果根器迟钝，还是要修。马祖说：

“若不安禅静虑，到这里总须茫然。”

这是另一回事儿了。

接下来，谈一些由马祖的禅法带来的一些影响：

①讲一下“接机”。接机就是“接机应物”，原本是“事来则应、事去不留”的意思。但发展下来，成了分灯禅的一种交流和讨论问题的方法。比如：隐语、动作、手势、符号……最后是棒打与喝骂。这种“接机”革新了以往的持戒、入定、读经、仪轨的传统，使后世之禅发生了重大变化。把这种“接机”的讨论依文字记录下来，就形成了公案。

如：僧问："如何是西来祖师意?"马祖曰："低声，近前来。"僧便近前，祖打一掴……

又如：一老和尚初参马祖，问："如何是西来意?"祖云："礼拜著。"老僧才礼拜，祖便与一踏。

前者，僧人傻乎乎地低声近前听马祖传密语，吃了马祖一个好大巴掌；后者，老和尚依马祖之言跪下拜佛，被马祖一脚踏了个前趴虎……二位冤得可以。但谁让你们不具平常心呢？达摩来中国，实是在印度吃不开了，只有下岗来这里而已。依佛经上讲的是一回事，真的是另一回事，你要听哪一个？听假的去看佛经，什么达摩夜梦佛祖……什么让他东去传法……于是禅光瑞彩……要听真的就醒醒，挨了一巴掌一脚痛否？问你痛不痛？你是依经典回答呢？还是依这平常心回答？快！莫思考！思考便早已不是平常心了。

②"呵佛骂祖"之风。丹霞天然，是第九代呵佛骂祖的领头人，也就是烧佛的那位，也是后世雍正禁禅的原因之一。此公去参拜五祖，一入僧堂就骑在一罗汉像的脖子上。众徒大惊，告之马祖，祖出而视之，曰："我子天然。"不但没批评，反而说这个人多像我的孩子，那么天然(天真)。于是丹霞有了个别名"天然"也。

不管丹霞对与错，只这烧佛骂祖之风虽由丹霞起，却是和马祖的默许有关。

③百丈清规。马祖创传灯禅，有其历史原因、政治原因和自身发展的原因。

历史原因，主要是文人士大夫对禅的喜好，使禅从宗教性转向了非宗教性的境界追求与审美情趣追求。这在中晚唐形成了继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双百"，转移到人性研究的"双百"。"即心即佛"与"平常心是道"简直就是文学甚至所有艺术最高境界的内容与形式的简称。这个最高境界在中国就源自马祖道一，源自他创建的禅宗空前绝后的理论见地。谁要说禅宗与中国人没关系，实在是不懂禅宗、不懂历史了。

从哲学上讲，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真理。而马祖的"即心即佛"与"平常心是道"在社会与个人、情与理的辩证时具有真理的绝对性。你可以不需要禅宗，可以非议禅宗，但禅宗使中国人领悟了精神文化领域的最高境界，这个境界至今无人超越，全人类无人超越，这是事实。

退一万步讲，只能有与之比肩者，不可能有超越者。

奥古斯丁说："我在怀疑所以我在"，这是终极真理——因为怀疑来自"我"；

笛卡尔学着说："我在思考所以我在"，这也是终极真理——因为思考来自"我"；

马祖道一说"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更是终极真理——因为心与佛都来自"我"。

大凡来自"我"的，对于人性来讲都是真实的；

大凡能让"我"超越"我"的理论，从理论上讲都是不可超越的理论。

无法超越的"心"、"佛"、"道"之所以有此殊荣，因为它是一切超越的根本。

情之所致，跑了题，再回来。

至于传灯禅形成的政治原因，则是因南方的地方官僚多是被贬去的官儿……人家已被贬，怨气总要让人家出吧？再说了，喜禅总比喜造反强。于是中央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使禅宗处于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中。

而自身发展的原因，要说由初祖一直到神会这七代人的功劳了，尤其是强调农业劳作，使禅宗自身有了自给自足的经济力量，这是基础。而百丈怀海建立了严格的丛林清规，使中央政府完全可以放心了。

因篇幅所限，马祖的江西系第八代先讲到此。

2. 湖南禅系。石头希迁(700—790)，被称为湖南石头。

史称江西马祖、湖南石头为"并世二大士"。

石头希迁少年时代曾在六祖门下受法，青年时六祖过世，青原行思是掌门弟子，便担当起石头之师的责任。青原行思还派石头去南岳怀让处受教，在这两位"大师兄"的教育下，石头迅速成长。后得行思传承，与二位师兄遂成师徒名分。天宝初年，他辞别师父，到南岳衡山南寺东一大石头上结庐而居，因此被人称为"石头和尚"，开法讲经近50年。

其师青原行思，就是《坛经》上讲的"首众"。初见六祖，师曰："汝曾作什么来?"(行思)曰："圣谛亦不为。"师曰："落何阶级?"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师深器之，令思首众。首众，即是众徒之首席，是掌门大弟子，以后要承师位的人。而一个人，在一生中有当兵的经验，再有当将军



的经验，方能全面地理解人与社会。行思这两方面的经验和他很高的文化修养，都直接地影响和传授给了石头希迁。在石头立法后，他从师父行思身上学到的和从师叔怀让身上学到的东西进行了融会贯通，加上他的文化水平与天分都比较高，所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重辩证、重网络性”。

如果说马祖道一像是个骑在烈马上的将军，年轻气盛朝气蓬勃、勇往直前的话，石头希迁则是一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坐在司令部中的元帅。

作为一个元帅，他深知勇于冲锋陷阵的重要，同时也知道其弊。所以他内心深处很为自己的师兄马祖道一担心。在马祖踏杀天下人的时候，他默默地做着善后工作。相传，一日希迁读《肇论》，当读到“圣人融会万物为己”时，他找到了这个善后工作的理论依据——相互“回互”的《参同契》。所谓“回互”，是指要利用万物中刚柔、阴阳其互补的特点，避其对立的一面，促其相互相乘、共存共生的一面。更不该利用辩证的双方其相斥的特点制造出争斗和矛盾。当然，这里有提醒马祖师兄讲法莫太激烈和尖锐的意思，但更多的是为江西一脉来补台。

如何才能做到“回互”而共生避免争斗而共亡呢，希迁撰写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本辩证的书籍《参同契》。

《参同契》的“参”，是参悟的意思；连同“同”字就含有了共同参与的意思。共同去参悟，悟到什么才能“同”归于“契”呢？“契”当默契讲，当一种“共识”、一种“共同的认同”讲。换言之，人类应该悟到一个什么共识呢？那就是：整体与个别的辩证、情与理的辩证、人与自然的辩证……。例如：人与草地和羊与狼，是相互共存的，不要人为地杀狼，这样反而使羊的数量也会减少，一切是依自然规律合理地存在着。再如：一味地强调渐修将泯灭人的灵性；但一味地强调顿悟又将瓦解宗教和社会。不要只看到它们相互的矛盾，应该看到它们相补的融合，这样你就与大师希迁“同契”了。其实希迁并没讲更多的禅法，他只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看问题的方式——辩证地回互方式。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留给世人的永恒财富就是辩证法。方法是永恒的，理论是相对的。如果说任何的真理都是相对的的话，那辩证法作为一个看问题的方法，却是绝对地正确。其正确性在于它容纳了所有对立的东西并使之统一于宇宙的“一”之下。因为只是“一”，没有别的“同属和种差”，这就正确地让你无法说长道短了。

总之，石头希迁在《参同契》中再三的强调回互，实是对马祖道一的“即心即佛”深感不安。他在《参同契》中道：

“触目不会道，运足焉知路。进步非近远，迷隔山河固。”

意思是说：“当你看到世界上的物，却不知它的道理（辩证地存在于世上），这样匆匆忙忙去追求什么，那路如何能走得对呢？在这样的路上急行，根本谈不上离真理有多远多近啊，你是在谜团里滚，于大自然毫不相干啊。”看来希迁是提倡知一物A，必须再知道与其180度相反的另一物B。两物相比较相补充，看明白了这些，看明白了A、B的特点与共生性，才懂了B，才算真正看明白了A。希迁在书中反复用子母、根叶、本末、尊卑、明暗等相对应的东西作比喻，把六祖的“对法”捧上了天，实际不是歌颂六祖的那个东西，而是歌颂“明暗各相对，比如前后步”啊，他在用祖师的说法印证自己的“回互”啊。

希迁暗示马祖别走得太远，而马祖说希迁是“石头路滑”。二位师兄弟坚持己见走自己的路，也很宽容大度并幽默地认同对方。只此“和合二气”，就算是参得同了契。后世修行人要学二位祖师，坚持自己的路，又不要否定他人。千万不要乱讲自己的功法是什么“第一”、什么“盖世”。这个世上只有辩证法和“回互”是第一，可盖世，其余的什么法只是你那门派里的第一，莫红杏出墙去争“盖世”的第一。小心“受了风、血了崩”，还需要杨三姐再为你去伸冤。

此节小结。

至此，南宗第八代产生了分灯禅。代表人物和派系是江西马祖道一的江西系（洪州系）和湖南石头希迁的湖南系。

江西系以宏大的气势歌颂人的灵性，推动了踢打棒喝之风；湖南系以绵密的回互辩证容纳了北禅之渐修、南禅之顿悟，容纳了马祖的反宗教的“即心即佛”和正统宗教的戒定仪轨。

如果说石头希迁的“触目是道”发展了禅之理学，带动了后世儒之程朱“理学”；那么马祖道一的“即心即佛”和“平常心是道”则发展了禅之心学，带动了后世儒之陆王“心学”。

这南禅第八代呀，空前绝后的两位伟人。中国的禅宗至此达到了人类禅史上的顶峰，后世的禅只是其变迁和滥觞而已。随着五代的战乱、两宋的国防意识，使禅宗已是昨日黄花，人们关注的兴趣已转移，一切渐渐

归于寂静、归于深远……深得使人难以触摸，远得令人遗忘了。

（三）南禅第九代以下的传承大略

1. 江西系第九代概略。

七代　　八代　　九代　　十代

南岳怀让→马祖道一→百丈怀海→沩仰宗
　　　　　　　　　　　　↘临济宗

→南泉普愿

→大珠慧海

→惟宽、怀晖

道一之后，其江西系分成三类：百丈怀海为农禅，为第一类，他上承马祖的衣钵，下开沩仰宗、临济宗；第二类是大珠慧海的理禅；第三类是惟宽、怀晖的京禅。

①百丈禅师和他的农禅。百丈怀海（749—814），他承道一的农禅并举，使禅门得以自立；又制定丛林制度，使禅门得以自尊；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规定，使禅门得以自强。以上种种措施，减少了其师道一“即心即佛”带来的种种弊端和误解，使禅宗向正统的佛教靠拢。

他对农业劳作的理解是：

“行同于众，故门人力役必等其艰劳。”

他倡的禅法是：

“歇诸缘，舍身心，心如木石。”

此为“入空寂”之修行法门。

“汝等先歇诸缘，休息万事，善与不善，世出世间，一切诸法，莫记忆，莫缘念；放舍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无所辨别。”

显然在其师急风暴雨的“出世悟”之后，怀海又把大家拉回到“悟前修”、“入空寂”两步之中。这种把人性解脱的“即心即佛”拉回到“修”之一法，虽然似有倒退之嫌，但这是在为生存而战。以希迁的回互之说来看怀海，何进何退？何为进？何为退？如果诸位有悟性，可以看出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者应该做的啊。

百丈清规的内容因篇幅冗长，不再举例。但这是百丈为禅宗所做的最大的贡献，至今诸位去寺院的客堂，仍可见“清规”与“戒板”。

百丈的《清规》规定了禅门中僧人不分等级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制度，体现了农业社会的一种平均观念。但在宗教内部却有严格的等级和纪律："长老"负责演说佛法，也是一寺之主，在全部禅众中是唯一享有自己单间住房的人。但此单间精舍名曰"方丈"，以示其住房面积之小，没有超标，与广大僧众悬殊不大。僧众住"寮舍"内，每一"寮舍"十几人至几十人不等。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寮舍"的多寡和人均面积的大小。总是够每个单位上的人伸腿休息吧。每一"寮舍"设"首领"一人，一如学校宿舍的"室长"，禅堂设"维那"师负责监察和维持禅律……

同是农禅的南泉普愿(748—834)，此人在禅僧史上让人觉得怪怪的。他大力倡"向异类行"，就是学禅的人要向畜牲学习。他说：

"夫沙门须行畜牲行，若不行畜牲行，无有是处。"

他留下的公案是"南泉斩猫"。一日东西两序(在佛堂各排东侧和西侧的僧人)僧众为争一只猫吵了起来。东序僧人说这是我们的猫，而西序僧人说是他们的猫。争执不下，请南泉评定。南泉说："你们谁要是说出这是个什么东西，猫就算是谁的。可是不准说这是猫。"东西两序僧众哑然，南泉拿菜刀亲自把猫杀死了。且不说大师杀生，这个公案弄得后人乱注乱解，神神秘秘地。其实南泉是影射众僧人们：你们整天闹宗派不团结，嘴上讲的全是对方不合什么禅规戒律，可心里却是泄一派之私愤；你们摆到桌上大声讲的话叫"猫"，这样公正公开，可是心底里真正的不能公开的那个，不能叫"猫"的那个是个什么东西？假若明白了师父之心，东西两序双方认个错，同一师门下相煎何急？相互提携、回互共渡，那这猫算是保了命。可惜，此一班人悟性太差矣。南泉的"向异类行"，也是让徒儿们学一下畜牲，不计仇、不搞小动作、不要心眼儿，老老实实地活着。难道修行人连个畜牲也不如么？

②大珠慧海和他的理禅。大珠慧海，著《顿悟入道要门论》，突出了"心为根本"的命题，将南北朝以来争论最为热烈的"佛性论"彻底转向南禅的"心性论"。在他的《顿悟论》中说：

"圣人求心不求佛，愚人求佛不求心；智人调心不调身，愚人调身不调心。"

以上言语，当今练功之人应抄下来，背熟它。他的入世，比师父的"平常心是道"还入世，他倡"即凡即圣"，这一下成了"圣人即常人"了。只这

"圣人即常人",更应让当今什么大师什么法师们好好看看。

有人问大珠:"如何得神通?"大珠答:

"说什么神性灵通,去来无碍,往返无迹,这都是愚人自己心智的表现。对于取相凡夫尽可随宜为说,实际上心无形相,只是清净法身而已。"

看来大珠生在唐朝,要是生在当世,定让什么班什么会的徒众掐死。

③惟宽和怀晖的京禅。惟宽(755—817)、怀晖(756—815),他们这类禅派与中央政权较接近。他们倡导教、律、禅三用一体,成为江西系中最保守的一派。但惟宽的"狗子还有佛性不?"这个公案,曾轰动一时。拿这个公案反问惟宽,他说自己是觉者,无佛性。只有诱导不觉的人,才假设有佛性。

2. 湖南系第九代概略。

七代　　　八代　　　九代　　　十代

青原行思→石头希迁→天皇道悟→云门宗

　　　　　　　　　→药山惟严　法眼宗

　　　　　　　　　→丹霞天然　曹洞宗

因为第九代传人多是承传师父的思想和行为,并无其他建树。我们这本小册子以谈禅的思想为主,并非历代禅宗大师集和禅宗血脉正源,所以略去,请诸位原谅了。诸位有时间有兴趣可以翻翻《五灯汇元》即可。

3. 沩仰宗及其禅法(江西系第十代以后)。沩山灵祐(771—853)和仰山慧寂(815—891)承百丈怀海的江西系,建沩仰宗。

沩山灵祐为怀海之徒(十代)而仰山慧寂乃灵祐之徒(十一代)。

灵祐的禅风已渐近北禅(官禅),他教徒弟"理事不二"、"事不弃理,理在镜中",同时强调顿悟不离渐修。

而慧寂则承"理事不二"而倡"默照"。"默照"的意思是以无心之心、以无所得、无所悟而悟本来清净之性。

总的来讲,此一宗理论没什么新意,总以"入空寂"、重修与悟为主。

此宗往下,不再叙述。

4. 临济宗及其禅法(第十代以后)。①黄檗希运。黄檗希运(生卒年不详),百丈怀海之徒,是临济宗的创始人。

他的禅法直承马祖的"即心即佛",倡"心即是佛",而于"人世行"上倡"无心是道"。可以看出这只是马祖"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的另一种

说法。他说：

“此心无始已来，不曾生，不曾灭，不青不黄，无形无相。……超过一切限量……犹如虚空，无有边际，……唯此一心即是佛，佛与众生更无别异。”

他对“无心是道”解释为：

“供养十方诸佛，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何故？无心者，无一切心也。如如之体，内如木石，不动不摇，外如虚空，不塞不碍。”

所以他也被称为“无为道人”。

②临济义玄。临济义玄(787 866)，据说他的开悟师父是希迁，如此算来，希迁为第十代，义玄为十一代。这位义玄直承希迁与马祖雄风，以棒喝应机，素以峻烈著称。同时在毁佛、毁祖、骂僧、排斥经典上比其师和师爷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反对任何束缚：

“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

骂佛，乃是不甘于受佛教的约束；杀父母，乃是不为家庭宗法束缚。但深一层意思，是对政治腐败、道德堕落和佛学艰涩的情绪化的愤恨。而更深处，则是说练功之人于静定中不要受任何鼓惑。我们常说在练功中要“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即是除却五十阴魔的秘诀了。

义玄对临济宗甚至对南禅的贡献，在于解决了晚唐和五代十国天下大乱流僧徒然大增带来的问题——行脚方式的增加。这使义玄开创了适应这种方式的“参禅”、“应机”之法。“参禅”，是指访师问友、谈禅问道，当然也需混上一顿饭；“应机”，则是对来行脚乞食的游僧予以观察，并给以相应的对答。这就产生了“临济宾主句”的“三句三玄三要”和“四料简”。

“三要”：①要设法制止对方长篇议论；②主人的言行不可尽情表露，要话中有话，行中含机；③要善于截取对方的言行，权变应对。

“四料简”：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

还有被称为“四宾主”的“宾主句”：宾看主、主看宾、主看主、宾看宾。

及“四照用”：先照后用、先用后照、照用同时、照用不同时。

总之，义玄在人际关系和谈话方式上颇有研究，诸位谁是公关的，可找来参考一下，在此不多讲了。



义玄有一句名言：

“有时一喝，如金刚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金毛狮子；有时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

真是的，自马祖和希迁后，禅宗走入分灯禅，但实在已是“不作一喝用”了，没办法，诸位看得枯燥，我讲得也没劲。但这五宗说什么也要略略地介绍完，所以请大家再忍一下，说完这五宗，咱们连蹦带跳地结束这种无肉又乏味的剩了千年的干鸡肋。

③赵州从谂。赵州从谂(777—868)是南泉弟子，因在河北赵县(河北正定)弘法，不在江南，所以临宗此支与南方的临济宗大不相同。

河北，历来是战火不断。华北大平原的每次战乱都造成“铁蹄所踏，赤野千里”。人民生活常以树叶树皮度日，这僧人的日子就更加的难。赵州大师自谓：

“独坐一间暗室，唯闻老鼠闹啾唧，凭何更得有心情，思量念个波罗蜜！”

所以从谂大师“不习禅，不论义”，一切以“平常心是道”来修、来悟、来弄吃的好活下去。而他的平常心，因环境之艰苦，则：

“孤愤多于容忍、峻烈多于洒脱，质直多于文采。”

大师参透了政治风云，所以：“随缘任性、笑傲浮生”，大有燕赵之风也。

5. 曹洞宗及其禅法(第十代以后)。湖南一系，希迁传药山惟严(751—834)，药山传云岩昙晟(782—841)，昙晟传洞山良价(807—869)，良价传曹山本寂(840—901)。

细说起来，洞山良价创曹洞宗，与政治和政权关系较远，大有贵族似的孤清高傲之气。良价在《自诫说》中道：

“不求名利不求荣，只应随缘度此生……一个幻躯能几回？为他闲事长无明？”

因此宗的僧人文化水平和修养都很高，又是传承于石头希迁，所以《参同契》是此宗之宝，“回互”是此宗之根本大法。

良价最大的贡献，是在该宗的传承上创造了“君臣五位”法。

良价说：

“正位即空界，本来无物；偏位即色界，有万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

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带者，冥应众缘，不堕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故曰虚玄大道，无着真宗。”

“君臣五位”依《周易》的卦象，可以说成是：正中偏、偏中正、正中来、兼中至、兼中到。

君臣五位，本是讲一种回互的辩证法，是事物发展具有的规律。不要把它具体地理解成禅与政府的关系或主与宾的关系。“君臣”二位只是个说法，它们在辩证关系中是对等的，无主次之分的两个极端。我们今天学“君臣五位”，要学习它揭示给咱们辩证法，而真正懂辩证法的人，是从相对这两端之间豁然跳出来、超越出来的人。要学会“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不要“只缘身在此山中”去“远近高低各不同”地讲辩证，那种在此山中的讲法，是六祖砍杀不悟的弟子们的对法。在这里面争辩和耗费青春，是不是有点儿太无聊了？

路，要一左一右两脚轮流去走，知道这个叫明白了辩证法。

非要找出、辩证出是左脚功劳大，还是右脚功劳大，这个学问就不是想走路的学问了，而是研究那只脚有无脚气的学问。

6. 云门宗及其禅法（第十代以后）。云门一宗，创始于云门文偃（864—949）。

云门文偃曾拜谒雪峰义存和灵树如敏，而如敏是大安门徒，大安是百丈门徒，如此算来，文偃算南宗第十二代。

文偃禅法，则是有名的“云门三句”。这三句话就是：

“涵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

“涵盖乾坤”，是指禅宗内凡各种流派、各种思潮、各种法门无非是对“正道五步”的不同侧重、解释、强调和研究，这本是一宗之内的事。推而广之，人类的种种思想流派、思潮和法门，也无非是为人类服务的。这种用“回互”为纲把一切一网打尽置于自己囊下的方法，使自己非常主动地掌握了整个辩证的网络。因为任何一个理论都可以用相反的一个理论去否定它，也可以用相同的理论去肯定它，而这种关系就是回互大法。如此辩证回互的涵盖大法，使云门宗有了“擒纵舒卷，纵横变化”的本事，东西方全部的哲学史、宗教史、思想史……全让文偃大师一网给网进去了，文偃的本事可是不小。黑格尔的辩证法被西方哲学家称之为“理性的狡计”，咱们回互一法被称为禅学的智慧，好玩，有意思。



"截断众流",是制止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或思维路数,强迫它并使它改变。例如:一个人老用逻辑方式去处理夫妻关系问题,那你就"截断众流",强迫他改用情感方式去试试,这叫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再如:一个人下海怎么也挣不到钱,想来想去,都是合作者不好。你当即应"截断众流",让他改用看看自己有什么毛病的方法,这叫改变他的思维路数。

"随波逐浪",是要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层次、讲不同的法。

云门一宗,其涵盖之网,网住辩证的双方,这势必造成它的理论是:

"乾坤并万象,地狱及天堂,物物皆真现,头头总不伤。"

换言之,太极是真理;太极生两仪,这两仪也是真理;两仪生四相,四相也是真理;四相生八卦,八卦也是真理。于是八八六十四卦,万物万象全是"总在这里","理在事事,事事具理"。朱熹的"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即是云门的"总是理"之延展。而云门授法常用杖在地上一划,说:"总在这里";又一划,说:"总从这里出去。"

文偃的一划不同于马祖的"一道",文偃讲的是处处在在,触目是道;马祖讲的是大家都是修行人,莫说长道短。

文偃的"总在这里"造成云门一宗以平常心去生活,以平淡自然为最高境界。

文偃说:

"大用现前,更不烦汝一毫气力,便与佛祖无别。""除去着衣吃饭,屙屎送尿,更有什么事?无端起许多妄想作什么?"

如此如行云流水之宗风,再简约下去就得成了"好事不如无"!换言之:"一切总在'无'这里"。如此,即成佛也。

咱们后世文人和思想家,常常动辄就批评这是满足于自我享乐,这使我想起怀海门徒智常。寺内座主看不惯僧人老去干活,他认为僧人就该整日念经礼佛。归宗智常对座主说:"请座主归茶堂内吃茶去。"什么意思?闲者只管吃茶,别冲人家说长道短。你是座主,有闲阶级,那就干你那有闲之事去;你是电脑工程师、知识阶级,那就干你那软件去;你饿了,好,吃粥去;你是农民,好,干活去。

什么是禅?禅就是:有闲者吃茶,无闲者劳动。禅师们的语录中常有"后院吃粥去"、"吃茶去"、"干活去",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什么道理?虽然"一切总在'无'这里",但这个"无"字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干,而是该干什

么干什么，于是等于“无”。这也叫“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个“无事”就是不生非，别“无事生非”，正当的工作之事就是不生非的“无事”，大凡能不生非地生活着，即佛也。

7. 法眼宗及其禅法（第十代以后）。法眼宗的创立者，清凉文益（885—958）。

此宗起源于雪峰义存（821—908），义存传玄沙师备，师备传罗汉桂琛，桂琛传清凉文益。粗略算来，文益应是湖南系的第十四代了。因为宗脉传承本没有那么准确清楚，每代人分界也不清。有的人拜的师父原是师兄辈分或祖师爷辈分，所以从八、九代往下，实是只能估算了。

文益禅法是：“若论佛法，一切见成。”

此一“见”字同“明心见性”的“见”字，即是当今的“现”字、显现的“现”字。如此，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说佛法么，一切都是现成的。

具俗眼者，只识“粥饭智慧”。文益要求：

“奉劝上座，且明取些道眼好。些子粥饭智慧不足可恃。”

而这“道眼”，即是“法眼”。法眼，不是让你藐一目去看经典古训，而是用“回互”辩证的方法去从经典中、古训中看心境不二、色空不二。换言之，就是让你去看出世的个性与入世的共性不二。看后又如何？这有两种结果：

“一了千明，一迷万惑。”

前者是明白了，后者是不明白，如此而已。智慧者自智慧，愚钝者自愚钝，这是没法子的事儿。

总之，石头这湖南一系重辩证回互，马祖这江西一系重推陈出新。以下不再沿着宗谱讲，只择捡一些有名的大德略述一二。

四、两宋时南禅的概况

至两宋，凡禅宗已经都是南禅了。所以此节题目应叫“两宋时禅宗的概况”。

（一）两宋禅法的大略情况

两宋，是个准军事化体制的封建专制王朝。为抗“外患”，客观地需要南方经济发展。而官员冗多，被贬官、不得志者亦不少，他们很愿意接近



禅，这就造成文人士大夫喜禅，并使农禅向文人禅的转移有了客观的可能。而国家至上、忠君报国的思想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后，禅宗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了，一是走上三教合流的官禅型，直接间接地为政权为国家服务；一是走上默照禅。前者成了奔走权贵奉迎官僚的新贵之路，后者住在默照或什么"看话头"、"公案"之中，采取了不与权贵合作的态度。但在民族危机关头，守土抗战的禅僧有之、逃避不合作的有之、宁死不屈者有之。中国佛教的爱国主义传统尽管可以追溯很远，但它形成一个僧人的必备的人格标准、宗教的不宣之潜规定，却是始于宋代的禅宗。

宋代禅宗，主要是临济、云门和曹洞三派。

咱们着重介绍的四位僧人是明教契嵩、圆悟克勤、大慧宗杲和宏智正觉。

1. 契嵩和他的"三教融通"。明教契嵩（1007—1072），云门派传人。他阐述儒佛一贯之理，且把儒之伦理置于佛教戒律之上，对当时影响极大。但这也是禅宗和云门走上衰微的标志。云门之祖和湖南一系从讲《参同契》的回互、讲"理情不二"、"理法不二"……一直"不二"到礼乐伦常，成了儒家的口舌，气数尽矣。当然，契嵩倡导三教融通，正值宋仁宗抑佛，想必有他不得已的缘由吧。

具体到契嵩的禅思想，有两个致命处，即"正性情"和"孝在戒先"。

正性情：首先，"性"、真性，是诸法实相，是净与空（无私欲）的象征。依性可成君子，可成圣人。而"情"、有情、大有情，是"万有之始"。这句话可不太好理解，其实就是：因为有了"情"，才有了人类和万物。契嵩说：

"情也者，有之初也。有有，则有爱；有爱，则有嗜欲；有嗜欲，则有男女万物生死焉。"

一句话，人之本性不是无明、不是真空、也不是真常，而是爱和欲的原始物——情。这个理论很怪僻，咱不在此死缠烂打。

孝在戒先：就是孝乃一切宗教之根本。他说：

"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

真搞不清契嵩在讲什么？儒家尚孝，但忠孝不能两全时则要为国尽忠。一古脑地"慎终追远"？是非要追到猴那一辈去么？李世民杀过兄弟、杨坚灭过亲戚……这二位都是明君，他们都是杀在先、戒在后、孝在最后。不说那么远，只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让僧人们大大地不孝了。

于是有地方的僧人为了达到“孝僧”的最高佛果之境界，修炼得娶妻生子。鲁迅听说自己的佛家师父有老婆孩子，迅哥儿当时大疑，参修几年，一日大悟，曰：“和尚不结婚，哪来的小菩萨？”显然，契嵩这一回“回互”得走了板儿，连老婆孩子都“参同”地“契”入了佛门。

2. 圆悟克勤和他的《碧岩集》。圆悟克勤(1063—1135)，主张“融通宗教”。

宗，是宗通，指通透禅宗的理论与流派；教，指佛教的“言教”。“言教”含佛的开示悟人，但能流传下来的只是经书，所以其教通就是经文佛经的文字通、理通。当然有了文字，也就是可以“说得通”的事儿了。于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走上既有文字、又在教内、还能说会道的曹洞宗了。这次回互出了文字，辩证出了教义和言说，此门一开，考据考证注书立论……蔚然成风，连克勤自己也出了本考证气十足的文字禅之书——《碧岩集》。

我没有责怪克勤老祖师之意，我很赞佩他那种不与权贵合流的精神。克勤用自己的生命去著书，房山石刻从隋至清几十代僧人也是用生命在刻经，其行为其精神是宗教性的，是禅风禅趣十足的，也是咱中国人不屈、不懈、自强之象征。至于《碧岩集》写的是什么、房山石经刻的什么，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圣人祖师在告诉后人应该怎么活着、怎么做人，并不是告诉你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做人，也不是让你效仿他活着为了著书或为了刻经。

3. 大慧宗杲和他的看话禅。大慧宗杲(1089—1163)，倡“看话禅”。

宋朝的危亡，使宗杲对“默照禅”和《碧岩集》大为光火。老兄是血气方刚的汉子，于是批判“默照禅”，火烧《碧岩集》，他的爱国之心让人为之肃然。他认为：“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他把嬉笑怒骂当成佛事，实在是入世得前无古人了。我们根据他的个性和人品，则知他的“看话禅”的实质了。他的看话禅以赵州的“狗子无佛性”为话头，先看看宗杲大师自己怎么讲的：

“但将妄想颠倒底心，思量分别底心，好生恶死底心，欣静厌闹底心，一时按下，只就按下处看个话头。”

——国难当前，一切是非曲直先莫讲，请你放下所有的恩恩怨怨，看看自己的人性为何物？

大师接着说：

“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赵州云：‘无。’此一字子(无)，乃是摧许多恶知恶觉之器仗也。不得作有无会，不得作道理会，不得向意根下思量卜度，不得抽杨眉瞬目处垛根，不得向语路上作活计，不得飏在无事甲里，不得向举起处承当，不得向文字中引证……”

——大师不让你去猜、去想、去推测、去分析，当下品品自己忧国忧民之心，看看是什么？

按下五种“心”，远离“八不得”。要把话头当“活句”去参(“活句”，即：语中无语)。不要把“话头”当“死句”去参(“死句”，即：语中有语)。什么意思呢？大师是说我话中无话。可是大师极力围剿默照禅和《碧岩集》，认为“是事莫管”和“只管守静”不是禅宗的入世精神。在没有话外话地大骂不入世，大讲“菩提心则忠义心”的宗杲，他设个“狗子有无佛性”的话头，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只要你参，则一切归于空无。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好！大师让你尝尝他的内心之苦楚。话头是个二律悖反的东西，在里面只有茫然；爱国与权贵的误国是二律悖反的东西，在里面只有茫然。话头是活话头，既无话外话，也不得起五心、离八得中去寻。爱国是真人性，没什么道理可讲，既没能力去说服权贵，又没本事打走外敌——这是一种非理性可以了得的困惑，是无以言说、无法消除的烦闷。他自己说自己是：“觉得没把鼻、没滋味、心头闷。”寥寥十一字，是外人只能体验才能悟到的。说是谁都会说啊，但禅的境界是依体验达到开悟后才有的。有体验不去悟，那你就尝尽千般滋味；无体验只是悟，悟成个机灵鬼、大头鬼。

这种体验，简直是两宋士大夫普遍存在的。不能不忠君爱国，这是人之本性；不得不遁世避祸，因为头上有投降派与奸臣。于是来参什么狗有无佛性，这是残酷的现实所致。如此的饱受蹂躏后，宗杲大师的看话禅实实在在归到一句话“一切由我”。请大家注意这不是做人的目的，而是当时大师的做人方法，是“最终明确的行为”，是二律悖反的人性与现实冲突后的结果。大师是僧人，不是政府官员不是武将，不可能栏杆拍遍或怒发冲冠，不可能去变法或重整朝纲……于是就成了这么个禅法。看话头的具体方法即：

“现在事到面前，或逆或顺，亦不须着意，着意则扰方寸矣。”

一句话，宗杲的看话禅实在是大师入世而忧国忧民的产物。两难的境界造成大师“不必回避，但决不执著”的无奈之禅。当无法去忧忧国忧

民之“忧”时，他既不似杜甫去“呜呼”！也不似陶潜去“草盛豆苗稀”地种地。僧人是干什么的呢？参悟人生的，好吧！咱们既然不能忧，那就参狗子这王八蛋有没有佛性吧！——告诉诸位，凡是他的徒弟，绝不能说“我悟了，狗有(或无)佛性”！只要你敢讲，这一顿打你是挨定了。倘若大师正在那儿参，你附耳上来说：“岳元帅已打到朱仙镇。”我肯定大师立刻跳将起来，撞钟击鼓不再让众位参什么狗东西有无佛性，而是马上组织人批判默照禅、围剿《碧岩集》、大讲忠义爱国乃无上菩提、乃最最大佛顶首无上放光万丈摩诃般若波罗蜜。

可是赵宋王朝没有让大师去宣讲什么波罗蜜，几经“言”祸后，大师连参的劲全没了。在他最后一次流放回寺后，走上了农禅的道路。

农，即干活去；禅，则默照去。

残酷的现实活生生地把临济宗大师弄到曹洞宗去也。

4. 宏智正觉和他的默照禅。宏智正觉(1091—1157)，曹洞后人。南宋初期弘法天童寺，使之“寺尾几千间，无不新者”，至今天童寺仍是曹洞一宗之本寺。

正觉的禅法是默照禅，此法循七代大师永嘉玄觉，即：

“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

凭心而论，脾气燥和性子急的人去学马祖，脾气温和性子慢的去学希迁，这是禅宗为不同禀性之人开的不同之门，所以不可以在这里说长道短。

正觉关于默照禅法，解释说：

“照中失默，便见侵凌……默中失照，浑成剩法。默照理圆，莲开梦觉。”

此法只是自六祖以来提倡的观心一法，实属“悟前修”和“入空寂”的范畴，没什么可多讲的。但在南宋那个时代，不论世界天翻地覆、不论时事是非曲直，一切不论，皆以默照去应付……时辰到了去干活，干活累了再来默照……这个禅法就含有被政治所制的意味了。

此法安置了流民、减少了是非、发展了生产、繁荣了经济、稳定了民心，这实在是时代的产物。临济宗之雄风已逝，马祖的马全放于南山或去拉车拉磨；曹洞之回互一味地简单，只回，不互。回来种地、呆着、睡觉。《参同契》变成八卦算命、抽签或看相。

国之将亡，怎能指望再出什么高僧？怎能指望重振什么禅法呢？



(二)两宋编著的禅宗书籍

1.《景德传灯录》。景德元年(1004 年),法眼宗僧人道元编《景德传灯录》。

杨亿(934—1020)用了一年多时间修订成书,共 30 卷,成为有史以来第一部官修禅书,入藏流通。

《景德传灯录》,着重于禅的"接机"、"应机",这就突出了机锋和禅理,失去了历史感和宗教性,成为禅师语录集锦。这种语录体的出现实在是弊大于利的。世上任何道理,原本是一个网络系统中辩证存在的一方。强调一方,必然造成客观上对另一方的疏漏或否定。如果要讲清这辩证的双方,就要讲清整个网络;要讲清整个网络,那必先讲清它的时代性、历史性,以及这个网络与政治、经济、人文、宗教的关系。显然,这已是个体系问题了,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所以,语录体不能讲清一个思潮、一个体系,它有如战争时期所用的标语口号,它是指导人们具体在某个时期、某个领域内如何行动的短语。例如:"狭路相逢勇者胜",是讲两军相遇双方都没有退路又都出于意外的时刻,此时以勇、以猛、以突然性的出击才能有生的希望。这个时刻如果指挥员抱着经典战法的"两军相逢智者胜"去教条地研究研究,想出战略、战术、配置、梯队、后勤供给……命已休矣。

咳! 一言难尽的语录体啊……

2.《五灯会元》。临济宗李遵,撰《天圣广灯录》;

临济宗悟明,撰《联灯会要》;

云门宗正受,撰《嘉泰普灯录》;

云门宗惟白,撰《建中靖国续灯录》;

以上四灯与杨亿的《景德传灯录》,合称《五灯》。后,普济将五灯合一纂成《五灯会元》。

3. 公案与颂古。善昭(947—1024)作《俱胝一指》。

重显(981—1053)作《颂古百则》。

二位所作颂古,代表了宋朝禅宗走上舞文弄墨的文字一途。

两宋禅宗走上文字禅,实是源于善昭。他提倡"公案"、"代别"和"颂古"。

"公案",原指官府用以判决是非的案牍,就如我们所知的《包公案》、《施公案》等等。善昭用来规范僧人参禅的是非对错。这显然是以文字语言来印证果位了,失去了以心传心的特色。善昭的公案使禅宗到两宋已变了味儿,"说似一物即不中"的人的体验,变成了"了万法于一言"的语录和理论。

当然文人士大夫极喜欢这种方法。苏轼与佛印了元(1032—1098)的对机应答,即是苏轼喜欢语录,而佛印以"放屁"来否定语录公案。

参公案别称参玄。似又回到魏晋的谈玄,实在是历史惊人地相似。

"代别",是指小小的公案语录常常不能把意思表达尽,所以需要再用文字去补充去说明。如"狭路相逢勇者胜"一句,要再注上:"路狭而不能回避、不能周旋、两军又实力相若,如此方可施行此战术"云云。

代别,是代语别语的统称。看来只要一沾上文字,就有玩功夫的余地了,所以有公案后,意犹未尽再加上代别,意犹犹未尽,怎么办?

这就出现了"颂古"。

颂古,这是以韵文体对公案做一赞美的肯定性的总结。例如:在"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一公案上,当代别也讲了什么狭路啊、什么相若啊、什么云云之后,要再加上最后四句偈,曰:"狭路相逢兮,不可回转。两军相若兮,勇往直前。避我者生兮,逆我者死。血流成河兮,伴我凯旋。"自己编的,不怎么上口,只是向诸位说明一下颂古是什么意思而已。

4. 圆悟克勤的《碧岩集》。前文已述,不再重复。这是以颂古形式写的前人参禅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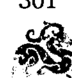
5. 宏智正觉的《默照铭》。前文已述,不再重复。

两宋期间,僧人著作不少。能有代表性的东西,我们只举以上几例。

本章和本部分都要结束了。

自中晚唐至南宋亡,禅宗走完了自己成长、壮大、成熟与衰老的历程。在完成了对人性人心的探讨后,给我们留下人性的冲动——马祖;给我们留下人性情理的辩证、个性与共性的辩证、人与自然的辩证——希迁。这是中国人的财富,是后人于禅学中再也难以逾越的高峰。

当中国人走过《诗经》之风、儒道之家、唐诗之辉煌、宋词之含情后;当中国人参透"即心即佛"和"回互"之后,中国人的思想、情感走向更加繁杂和深厚。



在元与清的外族入侵、明的守旧昏庸中，戏剧与小说担负起中国人的思想和情感。尤其是小说，它伴随着华人、伴随着黄河、伴随着中国人的情与理，与悠远的墨香和古老的宣纸一起，永远地记载下了先辈的智慧和情感。

本部分比较杂乱，稍微对大家有些用的东西，是“名利三阶段”和“诗词四种结构”。

A “名利三阶段”

第一阶段——基础阶段

利：生存→食色→进取……

名：生存→食色→尊敬与爱……

第二阶段——适度阶段

利：→自强→向上（与实用）……

名：→自尊→自信（与保守）……

第三阶段——过分过度阶段

利：→贪欲（纯理性化）。

名：→虚荣（纯情绪化）。

B “诗词四种结构”

①大外（景）→内（情）→近外（景）也叫“樱桃芭蕉式”。

②近外（景）→内（情）→大外（景）也叫“楼台烟雨式”。

③外（景）→内（情）也叫“无尾式”。

④外（景）→外（景）也叫“无腹式”。

试举一例：

①“樱桃芭蕉式”。蓝天白云与暖风、空气质量二级真清新。考了五分我真高兴啊，猴山的猴子熊山的熊。

②“楼台烟雨式”。猴山的猴子熊山的熊，今夏再也不能看你们。只因考试不及格啊，四级空气弄得熊也朦胧、猴也朦胧、山水全朦胧……

③“无尾式”。蓝天白云与暖风、空气质量二级真清新。猴山的猴们与熊山的熊啊，我考了五分，高兴！

④“无腹式”。猴山的猴啊熊山的熊，四级空气闷死人。不知你们缺氧否？三环路内外一片朦胧。

我的分类，乃兴趣所致。供大家一笑，轻松一下，莫当真。

第五部分

元、明、清(至鸦片战争前)





第一章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公元 1276 年，南宋亡，元立。

公元 1368 年，朱元璋逼近大都，元顺帝北逃，元亡。

1368 年—1644 年，明王朝传 12 代、历 16 帝，凡 276 年。

1644 年，清入关，陷北京。明崇祯帝吊死煤山，明亡。

1644 年—1912 年，清王朝传 9 代、历 10 帝，凡 268 年。

1840 年，爆发鸦片战争，中国从此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1911 年 10 月 12 日，孙中山推翻清朝，改国号为“中华民国”。

1912 年 2 月 12 日，清溥仪退位，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

同年，2 月 12 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袁世凯任总统。从此开始了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统治。

一、元朝史略

远在 1206 年，金国的一个蒙古藩属部落推举铁木真为可汗，称成吉思汗。蒙古国诞生了，它曾三次西征。

1218 年，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打到如今的乌兹别克、阿富汗及伊朗东部，成立了察合台汗国。

1234 年蒙古灭金后，1236 年第二次西征，征服了东欧的伏尔加中游、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建立了钦察汗国。因为当时日耳曼、波兰、匈牙利的联合兵团被击溃，所以欧洲震惊，称亚洲人为“黄祸”。



1252 年蒙古兵第三次西征，征服了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东部，成立了伊尔汗国。

蒙古兵团的西征给人类造成了什么影响呢？可能谁也说不准，依我估计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其一：黄祸的铁蹄造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为避黄祸，甲国的人跑到乙国、乙国的人又避到丙国，丙国的人逃到丁国……这种波及和人口流动，远大于蒙古人所建的汗国，它波及了多数的欧洲诸国。这种波及主要带来的是对欧洲中世纪愚昧落后的冲击，在随之的一百多年后，产生了欧洲的宗教改革，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运动。当然，一个革命和一个运动它的产生其原因是复杂的，简单化地看历史是不可取的。但这个革命和运动的原始起动的动力，不能不说和黄祸的威胁有直接关系。

其二：蒙古国是军事上的大国，但其政治经济都很野蛮和落后。可是骑在马上，呐喊着，驰骋在旷原上，这种军事大国的自豪给一些被侵略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苏联，在蒙古国衰落后，他们不忘蒙古情绪，学会了蒙古人的军事制度、战术方法和骠悍的作风。不论是哥萨克的哥里高利还是斯大林格勒之战的骑兵、库尔斯克苏德双方上万辆坦克的大会战、朱可夫装甲兵团向柏林突进……我们似乎能够听到口哨声、乌拉声……典型的就是保尔·柯察金，这简直是成吉思汗的影子。而重军事、重重工业、好侵占人家的领土……这种产业结构、金融结构和好当老大的作风，拖垮了前苏联。但黄色兵团的威风，实在是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这种情结不是说了就能了的。

公元 1276 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灭南宋成立元朝。

元朝的政治机构与宋朝一脉相承。据说这要归功于一个僧人，他叫子聪，海云禅师的弟子。子聪俗名刘秉忠，海云大师把他推荐给了忽必烈，好给忽必烈出谋划策。忽必烈在他当陕西河南地区的统领时，认为应该“马上打天下、马上治天下”，于是打算把耕地全放荒了，好长草牧马放羊，使整个黄河流域变成塞北草原。刘秉忠劝他万万不可，不可以马上治天下，要承旧制治国。所以忽必烈的汉化，僧人子聪立功不小。说得走了板，再回头说元朝的政治机构。

元政权如宋，设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宋朝的中央集权，是安内怕大臣作乱，而元朝在集权的同时，注意让地方政权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

忽必烈比较重视农业，设立了劝农司，提出“招怀生民、安业力农”的政策，还颁发了《农桑辑要》，推广屯田、兴办水利。在交通上，因为帝国疆土辽阔，实在不好管理，所以他极力修复京杭运河、兴办东南沿海至大都（北京）的海运，并设驿站制度，这些措施造福后人至今。

忽必烈对宗教采取开放态度，喇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存。他封喇嘛教的八思巴为国师、尊道教丘处机为神仙、让马可·波罗给欧洲教皇捎信问好，同时大力宣扬程朱理学。真搞不懂这忽必烈怎么想的，这可能和僧人子聪当他的顾问有关吧？天晓得。

他下的臭棋，是贵族统治和种族歧视。他的政权性质，是以蒙古贵族为主、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上层人物为辅的种族贵族性质。人分四等：蒙古人是第一等良民、其次是色目人、再其次是草民汉人、最劣是“南人”贱民。这种种族歧视，给元朝埋下了深深的祸根，并最终葬送了自己。

元朝值得一书的，一是杂剧、一是马可·波罗。元杂剧要归于文学类，放到下一节去讲，而马可·波罗，却是非要讲一下不可的了。

前文说过，西征使黄祸波及整个欧洲。这个波及虽然是战乱所引起的，但随着军队的脚步，要钱不要命的商人也小心地渗透过来、渗透过去。为了利而来去自如，也算如去如来的一级神仙。哪一级咱不知道，但总算是个财神是没错的。看来要成如来佛，下海行商也是一种修行法门。反正马可·波罗当了东西方交流的天使，这天使起码算罗汉级的人物吧。

马可·波罗 1254 年生于意大利的威尼斯，他的父亲本是巨商，一听东方有个遍地珠宝的中国，于是捎带上当地土特产，拜了门路，随出使外国的钦差一直来到中国见了忽必烈。忽必烈挺喜欢这高鼻子蓝眼睛的汉子，就给了他一块金牌，让他去罗马教廷问个好，再让教皇派些懂天文、地理的人才来，好与咱们中国人切磋切磋。1269 年，马可的父亲回到意大利，这时马可·波罗已经 15 岁。1275 年，马可·波罗随父亲带着教皇的书信来到中国，忽必烈把马可·波罗归于荣誉侍从的名册，称他是“大汗的仆人”。这一下好了，马可·波罗随忽必烈走遍了中国，同时还当了三年扬州的地方官。这使他比任何西方人都更了解中国，同时也积攒下大量的财富。在侨居了 17 年后，他和父亲、兄弟三人率六百人乘十四艘四桅帆船，从泉州登程回国。1295 年到意大利，此时已离故乡 24 年。

后来，马可·波罗富得成了“百万君”，又捐钱造舰参加了战争，1296

年被捕入狱。在狱中，小说家鲁思梯切诺与他关系不错，于是一人说、一人记，写下了震惊西方的《东方见闻录》，或称《马可·波罗游记》。后马可·波罗获释，1324年于家中去世。

游记中马可·波罗详细地记录了中国的繁华和富有，尤其是人们烧石头(煤)和黑色的水(石油)，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讲，这就绝对是异端邪说了，谁也不信。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随商人的往来，欧洲人认为此书是"可信赖的真理之录"。尤其"黄金遍地"使欧洲人眼睛发亮……这就使哥伦布动了心，一头撞到美洲。500年后欧洲人开着军舰，带着鸦片才一头撞个正着。柏杨老先生认为这是马可·波罗引来的"白祸"，白人之祸，当然是指鸦片战争。

我看这是报应。先是咱们黄祸打过去，教会人家怎么打，给人家提了个醒儿，于是人家的白祸再打过来。说归说，自己要强盛才是真的。

公元1351年，刘福通发起红巾军，起义的口号是"杀尽不平"。这个杀尽不平，显然不是简单的均贫富，而是具有强烈的反对种族歧视的民族斗争色彩了。

1355年，刘福通占亳州，建国、号宋，立韩林儿为小明王。

1355年，朱元璋投郭子兴后，郭子兴死，朱元璋为义军领袖。

1368年，朱元璋灭元，建明朝。

二、明朝史略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南京)登基。朱元璋即明太祖，又称洪武皇帝。

历代皇帝中，由一个平头百姓登上帝王宝座的，只有刘邦和朱元璋。一个在底层生活过的人，一旦当了皇帝，本应体恤人民、关心人民的生活，刘邦就算是个好例子。虽然过去只是乡里的一游手好闲的小流氓小痞子，但义气和大度是有的。汉家开国也杀了几个开国功臣，一是为数寥寥，二是怕这几个人功高震主，也能让人理解。最主要的是刘邦有政治头脑，使汉室大兴。可朱元璋这个人，出身要比刘邦那城市流氓好得多，他世代贫苦，是绝对的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他小时候给地主放牛，17岁时父母兄长死于瘟疫，于是不得不到皇觉寺去当小和尚。后因战乱，寺里把

他迁单了，他不得不当了游方和尚。苦出身、沐浴过佛恩、游方的经历……这一切使他对社会有深刻地了解，这就应该在当了皇帝后造福人民才对。可是恰恰相反，贫苦的生活造就了他极其实用和狭隘的心理，同时当和尚、游方、参加刘福通的白莲教起义，这一系列本应塑造出伟人的熔炉，却练就了他自卑的心理及不容人、嫉妒、反复无常等阴险奸诡恶劣的品质。他 25 岁起兵，41 岁继位，当天下大定后火急火燎地办了三件大事：杀功臣、造文字狱、任宦官。

（一）朱元璋办的三件事

先说朱元璋办的第一件事：杀功臣。

他这个杀可不是针对几个人，而是所有功臣一个不留。他儿子朱标问他这么做是否过分？他把一带刺的棘杖放在地上，让朱标拿。朱标不敢拿，于是朱元璋开始言传身教，用生动形象的教学法教育下一代："我把棘刺都拔掉，你不就敢拿了么？我现在杀人，正是为你拔刺，为你想啊。"于是朱标悟了当皇帝的大道，朱家辈辈都悟了这个道。

为了杀人，朱元璋胜过来俊臣。来俊臣有《罗织经》一部，朱元璋亲著《奸党录》和《逆臣录》共两部。战将徐达、郭英、周德兴等人，原是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啊，只有常遇春将军病死了，除他外，这些人全被杀尽，满门的杀尽。武将如此，文臣也没好到哪儿去，像陶安、刘基、宋濂、朱升全是为开国立了大功、出了大谋略的人……朱升就是劝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那位，这些人本是大知识分子，同样被他杀绝、身首异处。只有汤和是被他毒死的，落了个全尸。

功臣杀完，开始杀贪官。谁是贪官呢？除了少部分真的贪官，大多数是拷打屈招出来的贪官。惨了，这个反贪行动成了杀人游戏，每州每县的土地庙统统改作"皮场庙"。就是把杀了的贪官剥下人皮，里面装入稻草悬于庙前，以警官吏和世人。

第二件事是文字狱。杀完了文臣武将，贪官也杀得差不多了，弄得很多政府机构严重缺员。但杀性起了，哪里是一个放下屠刀可以了得？朱元璋不识字，但正因为这个不识字造就出一个畸形的变态心理的人。《孟子》书上有"君子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朱元璋看后大怒，我怎么看臣都对，哪怕看成臭狗屎，而臣岂能把皇帝我看成寇仇？于是把亚圣孟子的牌

位清扫出孔庙。杭州府学徐一夔在贺表上有一句："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看后大怒："光"是骂我秃，"生"是骂我当过僧人，"则"是骂我当过贼(白莲教红巾军)。于是这个徐先生马屁没拍好，一下丢了命。

他的身教，使他的儿子朱棣悟得最彻，什么十八大悟、八十小悟一路通晓底透。想当初朱元璋分封藩国，朱棣为夺王位，发动"靖难"以"清君侧"为名把兄弟们平掉。他共有23位兄弟，在他继位后，他冲兄弟们大开杀戒，这23位藩王、亲兄弟惨遭灭族十门。由九族到十门算是个新产品，第十门叫朋友门生。于是要灭的人除了他的九族，还要加上朋友之朋友之朋友、门生之门生之门生……这种杀人之法叫"瓜蔓抄"。人家是顺藤摸瓜，朱家是顺藤摸，摸着什么算什么，也不论是瓜是蔓沾上谁是谁，一个案件要杀上万人也不新鲜。

再说文字狱。文字狱要是单单体现在避讳什么字，也就罢了，更严重的是体现在八股文上。明朝科举分三级，县级的录取叫秀才、省级的录取叫举人、中央级的录取叫进士。而三级考试全以《四书》、《五经》为限，写出一般四句八段三十二句赞美儒家的文章来。这简直是在做"填诗"练习，不能思考，把背下来的《四书》、《五经》按格式摘章剔句修修补补填写进三十二句赞歌中，成了。弄对了直中状元，不对的名落孙山。一切知识都变成如何做八股文。这个禁锢不是"瓜蔓抄"地灭你十族，而是直接打杀了所有中国人。中国至明初，在世界上仍是大帝国、强国，而几百年这么"八股"下来，只有挨打的份儿了。

朱元璋办的第三件事，是建立黑白两道的对内镇压的专制机构。

朱元璋当过僧人，游过方，还参加过白莲教的红巾军起义，可以说他对宗教的力量和秘密结社以及墨家的什么帮会组织实在是有很深地认识。出于这种敏感或者说是过敏，他在自己的政权机构中也相应地设立了白道的"三司一卫"和黑道的"三厂"。

"三司一卫"，指管理各行政区司法的刑部、监督检举官吏的都察院和负责最终定案的大理寺，这叫三司，直接归皇上管。明朝开国时承元制，1380年废除，只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六部设尚书，尚书直归皇上管。一卫，指"锦衣卫"。锦衣卫其功能原本相当于御林军，是卫戍部队。但是朱元璋的锦衣卫却是可以抓人、审讯、判刑，具公检法三合一功能的军队，听着都哂人。锦衣卫比"三司"来头大，他们抓人省事多了，皇

上看谁不顺眼，可直接抓来拷打、判刑，没那么多司法程序，没那么多啰嗦事儿。而朱元璋的儿孙们承先辈之悟性，觉得光是白道还不足以对付人民，于是创造了黑道"三厂"。

"三厂"指东厂、西厂、内厂。三厂与三司一卫的区别是：三司的人员是政府官员，一卫的人员是军队，而三厂的人员则全是太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太监自己名正言顺的权力机构和军队，这实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黑暗的年代。皇上什么事都交太监去办去传达，于是太监的权力可想而知了。连想改革一下的张居正大人，也必是先勾结太监再去改革。而三厂抓人、打人、杀人，毫无任何司法监督和程序，他们是地道的特务组织秘密警察。人犯落在三司一卫手里，尚有活命的可能；落在三厂手中，必死无疑。

朱明王朝，就是这么神经兮兮地杀人和制人，而这个王朝历代的朱氏子孙也神经兮兮地当皇上。柏杨老先生认为这是"断头政治"，即如同一个无头巨人一样的政治，我看这是"变态政治"。为什么说朱氏皇上是神经兮兮地当皇上呢？为什么说它是"变态政治"呢？因为朱家王朝创造了大臣不认识皇上、皇上不认识大臣的奇迹。明第九任皇上朱见深，藏在深宫内阁里，从不上朝，从不召见谁。于是皇上大臣互不相识。第十任皇上朱祐樘当了 38 年皇帝，只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终使内阁大臣一生中有幸见了皇上一面。这深藏内宫不叫"深居简出"，叫"深居不出"。一辈子囚在皇宫内，也算是达摩祖师那面壁功夫的真传了。所以真够变态真够神经的。

怕出皇宫、怕人家集会、更怕歹人利用宗教干点什么。1420 年，唐赛儿起义，失败后逃逸。明政府怀疑她遁入佛门伪装尼姑，于是把山东、河北两省尼姑数万人一网打尽，押送北京拷打审问。只此一举，即知朱明王朝过敏的程度。真难为明朝的师太们了。

如果说宋朝的软弱是苟且偷安，那明朝的软弱全是朱氏父子的怪僻、过敏、畸形心理在作祟。

（二）明朝有名的两位太监

上面大略说了朱元璋办的三件事。下面说一下明朝有名的两个太监，魏忠贤和郑和。

因为朱氏皇帝不上朝、不理政，这内外联络又全靠太监传递奏折和批



示文件、指令，所以太监专权就顺理成章地自然而然。

明朝最有名的太监魏忠贤，怕是中国人个个知道的知名人物。

万历年间，顾允成、高攀龙、钱一本等人在无锡东林书院组织讲学，书院对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正是这个入耳与关心，使他们常常评议朝政，这自然引起朱明王朝注意。当时任何派别总有宦官为其代表，而东林人士的代言宦官是王安。魏忠贤当权后，斗下去了王安，攻击"东林党"为叛逆。东林党则骂魏忠贤为阉党，其实当初原本是文人之间的派别分歧，演变成了残酷的知识分子与宦官的斗争。

魏忠贤网罗重组了一个自己的组织，包括当时多数宰相和大多数政府官员。其中有兵部尚书崔呈秀为首的"五虎"，以锦衣卫都督田尔耕为首的"五彪"，以及中下级官员组成的"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他们先把东林党名将熊延弼以谋反为名抓住，再把其他东林人士以受贿的名目入狱，每三天一次拷打，不招即死；招即索还子虚乌有的贿金，直到倾家荡产。而对东林党的清算中扩大打击面，看谁不顺眼谁就是东林党，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官员惨遭荼毒。十狗之一的薛贞对知府刘铎说："生在这个时代，应当为自己前程着想，他人生死，关我何事？"

魏忠贤一面血腥镇压，一面为自己立祠堂，群臣百官无不献媚。有魏忠贤撑腰，宦官在明代成了有权有势的人物。历来在边疆守边的兵将，最最看不起宦官，可是明朝的边关将士们发现要升官只有拍好监军的宦官，如此败仗可以成胜仗、无功可以成有功。你说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什么仗？还有，政府派出的矿监、税监等宦官都中饱私囊、蚕食国家根基，无人敢过问……

明王朝有这么个病毒在身，看来是癌症晚期了。

而另一个太监，郑和，却是中国的一位海上使者，人民的英雄。

永乐年间，近 30 年的太平怕是中国明朝最美好的时光了。明成祖朱棣，就是发明"瓜蔓抄"的那位，好孬他还办了几件利国利民的事。一是把元朝时已不畅的大运河疏通，一是命编纂《永乐大典》，第三件就是派郑和下西洋了。

朱家皇上个个脾气怪怪的，先是朱元璋怕外来事物破坏我大明气脉，命令海禁，"一片木板都不准出海"。到了朱棣，此人一想：要是万国来朝，献上种种贡品也挺不错的，于是又派郑和七次下西洋。

郑和，本姓马，名三宝，回族人。其祖父和父亲都去过牙买加，他小时

就从父辈那里略知阿拉伯等国的一些情况。永乐三年(1405年),“三宝太监”郑和率翻译、工匠、军人、水手、医生两万七千余人,备航海图指南针(当时最时髦的高科技产品),乘四十余丈的大船62艘,从苏州出发开始第一次出洋。到了1433年,共出洋七次,历时28年,到了爪哇、苏门答腊、泰国、柬埔寨、斯里兰卡、印度、也门及非洲的索马里,经三十多个亚非国家。他每到一处,则宣读和平的“诏书”,和当地商人展开贸易。用中国的瓷器、丝绸、铁器换回胡椒、香料、硫磺、象牙等。那时有的地方很落后,是郑和带去的冶铁术、中医术使他们摆脱原始的生活方式。至今,在印尼的爪哇、泰国、斯里兰卡都有当地人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和平使者而立的碑、塔,有为他命名的三宝港、三宝井。

和平和进步,是世界人民所共同希望的。而带来和平和进步的人,不论哪一个国家,人民都会当成心中的神去崇拜他、纪念他。

(三)明朝有名的三位英雄

明朝的三位英雄是于谦、海瑞、戚继光。

如果给明朝简单地勾一下生命史,这可是命运多舛、大大不济的一个命相。但居然存活了276年(不算南明),这也算是个奇迹了。

这个生命史简略地说,即:

朱元璋办了三件事→朱棣起兵靖难→土木之变于谦之死→严嵩时代→戚继光抗倭→清官海瑞→张居正改革→东林党与阉党→闯王李自成进北京。

第一位英雄于谦。土木之变英宗被俘,是北方瓦剌人进犯引起。大宦官王振家乡离太原不远,在家乡他把搜刮的钱财置办了田庄和很多私产。当瓦剌兵犯太原,王振极力劝英宗亲征,实际上是想把财宝运回来。50万大军抵近太原,王振又怕大军的兵马踏坏他家的田禾,屡次更改行军路线,这个混乱就未战先起了。结果可想而知,英宗在土木堡被俘,王振被愤怒的军校以锤震死,史称“土木之变”。

1449年8月16日,兵败一事传至北京,宫里惊慌一片。于国家危难时,于谦临危受命,任兵部尚书。他加强军备,调山东河南部队护卫北京,立景帝(代宗)以防瓦剌人挟英宗以再犯。这瓦剌人抓了英宗,本以为抓了一个宝,一看挟而无物、战而不胜,只好把英宗又放回来了。景泰八年(1457年),景帝病死,英宗“南宫复辟”,也叫“夺门之变”。这一下于谦这

个救国的忠臣自然就倒了血霉。当时北京被围时吓得要迁都的徐有贞和被于谦斥责过的宦官曹志祥二人，对于谦恨得咬牙切齿，以“意图迎立藩王”为由力主杀死于谦。英宗是小肚子鸡肠的这么一个标准的朱家传人，当然巴不得有人出头以解心头之恨，于是一拍即合。同年于谦在北京被杀害，当时北京百姓人人痛哭，喊冤声震天，于谦叹息说：“这不是法律问题，千言万语，有何用？”景帝死后，没有葬在十三陵，而是被孤零零地葬在京西厢红旗西的一个小山上，与玉泉山遥遥相对。我在 1962 年时偶见此墓，破败凋零，砖石已毁，唯碑亭和碑尚在，上书“明景帝之墓”及于谦的碑文，现也不知道如何了。于谦的墓在何方，不得而知。

第二位英雄——抗倭名将戚继光。日本古时称倭国，而日本的浪人、流民、破产者组织起的打劫的海盗，自然的被称为倭寇。倭寇侵扰，最严重的是 1546 年后的嘉靖年间。当时东南沿海是明代经济发达地区，朱棣开海禁本使经济刚有转机，倭寇这一闹，影响自然很严重。戚继光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调到宁波，他召募军队，严加训练，鼓励将士们杀贼立功；针对倭寇用的是短兵器，善近战肉搏战，他发明了狼筅和盾牌以克敌之兵器、以十二人相互配合的鸳鸯阵以克敌之近战战法。

经过十一年的征战，到隆庆元年(1567 年)戚继光被调回北京时，东南沿海倭寇已平，戚继光功不可没。但就是这么个英雄，朱家父子没杀他就算积阴德了，在屡遭排挤后，戚继光愤而辞官还乡。万历十五年(1588 年)，一代将星殒落，让倭寇丧胆的老人，郁闷而死于家中。

第三位英雄海瑞。他就是妇孺皆知的“海青天”。以他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的性格能活着病死住所，实是比修炼成仙都奇、都难、都不可思议。海瑞的事迹史书与传奇都讲得不少，我们只讲他经过的三次大劫难。

第一次，嘉靖四十五年(1566 年)，世宗二十几年不上朝，每日起火烧汞炼丹，决心修成正果。海瑞上书批评世宗：“汉、唐、宋的方士没一个活到今天。陶仲文有长生之法，他也死了，陛下跟他学长生术，怎么能求得长生呢？”世宗大怒，叫道：“抓海瑞来，不要让他跑了。”宦官黄绵忙奏曰：“此人素有痴名，已买了棺材在殿上等着领罪，这个人不会跑。”朱家皇帝神经兮兮的劲儿就在这儿，世宗一听，马上来了神经的劲儿，他重拿出奏折看了看，喜欢上了，说：“这人倒比得上比干。”凡神经兮兮的人全是阴阳脸，一会儿晴一会儿阴。接着世宗又咂摸出些味儿：“可我不是纣王啊？”

于是不杀，先入狱。估计世宗仍是去服汞，要不怎么几个月后就死了。海瑞终于出狱，菩萨保佑，躲过了第一难。

第二次，隆庆三年（1569 年），海瑞在苏州任职。他先疏浚了吴淞、常熟，使太湖水可顺利泄洪。既而丈量清算土地，勒令乡绅地主退还兼并的土地。第三是大力推行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按土地亩数征税赋，减轻了人民负担。这当然得罪了地方官吏和乡绅，于是安个"庇护奸民、鱼肉豪绅、沽名乱政"的罪名把海大人才做了七个月的巡抚罢了。按罪名说本就让人可笑，叫什么"鱼肉豪绅"？怕是"鱼肉百姓"才够个罪名吧！这么荒唐的罪名也成立，实是明帝国之一景也。依次发展下去，应该发展成"庇护官吏，鱼肉皇室"才更精彩，按如今的行情讲，海大人的罪名就是"鱼肉贪官"了。海瑞的罢官，使当地百姓一路哭泣陪伴于离任路上，家家都有海大人的画像以供祭拜、供人们怀念和感激。实因海瑞名气太大，这一难也只罢官，没按什么厂什么卫的脾气把先生偷偷"办"了，阿弥陀佛。

第三难，万历十三年（1585 年），海瑞 72 岁，被任南京吏部右侍郎。这本是个闲职，但海大人仍是一如既往地整纲整纪、反腐反贪。提学御史房寰害怕自己的劣迹暴露，反而先上疏弹劾海瑞。这一次海瑞终因年老，病死住所。他死后，同僚们捡点他的家产，穷极潦倒，还是大家凑钱办了后事。在出殡那天，南京市民罢市，人民身着白衣为海瑞送丧，长江两岸尽为白色，长达百余里。

三位英雄，生长在朱明王朝可真是让人窝气。先有朱元璋拿没文化当个性，后是他的子孙们拿怪僻的个性当文化。于是扭曲变态的社会便扼杀了中国人的灵性和影响了人们的行为。历朝的英雄人物本轰轰烈烈，而明朝的英雄人物总显得没那么光照日月。

一个人，在他成长时看见有钱的人、当官的人都穿西服，于是他的一生的理想是有件西服穿。他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时装的变化，于是在他长大后总以西服为工作、休闲和睡服之精品，一统而实现了自己的理想。24 小时西服不离身则是他的个性，同时这个个性也是他的服装艺术和服装文化了。当朱元璋打江山时，人缘不错也挺讲义气，一如李自成的将军们进北京前，全没大毛病。但深埋在心底里的理想报负，尤其是对社会使他贫穷了半生而带来的一种变态心理，使他一旦得了机会便会加倍地向社会讨个"公道"，他要报复、要显示成功的自豪，决心每天"喝香油、吃油饼、娶七个老婆"

的誓言使之在山珍海味前、在上千佳丽前茫然而手足无措。这种茫然和无措使之自觉卑贱低下，于是“我是伟人，我不卑贱、我不低下”的反常心理，造成让人难以理解的行为和观念，这就是朱明王朝的特点。你说是小人得志？是嫉妒？是心胸狭隘？都不确切，他只是他，一种仍处在“看山是山”的人楞要充已是“看山只是山”觉者，只好野狐味满天飞了。

同理，朱元璋理解的儒家和文学，恐怕只是“之乎者也”和“灭人欲”为最高哲学经典，而类似乡间对联的骈句加“东家您真精神”似的歌功颂德怕是文学最高之境界。于是，“八股文”就破土而出，茁壮地生长起来。这实在是没文化的一种文化，是充满了“土洋土洋”味的文化，是“超前意识”、“最佳创意”、具有“新生带气息”的东西。怎么评价它呢？还是打个比方。如今不少厂家造假的名牌皮大衣，原本百十来块钱的事儿，但仿人家的样式、冒人家的商标、再摆到南八万（N0.1）的商场，一下价码与真名牌一样，上千上万了。可正赶上市场疲软，真名牌流血大牺牲，五折赔本儿七八百元卖出。假名牌一样做出大痛苦大跳楼状，三折甩卖。理由是库存多了、资金流转慢啦、急着要出国当什么洋人的总裁啦……四五百元抛出。你说这个大衣叫什么？人家韩愈那个叫“文以载道”，你这个叫“朱氏八股”。原本就臭，挤进名牌里也是臭，一同跟着摔下来还是臭。但有了这一番经历，其臭就加上了怪字。虽然朱氏八股又臭又怪了五百年，但名牌包装、价钱便宜，反正一年穿不了一回，有个场面上的事尽管穿出家门一耀门庭也是有品位的事。所以，如今什么“正宗十八辈五”、“御用”这类朱氏八股般的臭怪牌皮大衣仍是有人在穿，更是有人在造。如此看来，又臭又怪，是那个时代的不治之症。如今这病叫形象工程或达标业绩，其实这也是毒害整个民族的八股而已。

（四）闯王李自成

李自成，陕西米脂人。虽然“米脂婆姨绥德的汉”是样板，但李自成亦身材魁梧，浓眉大眼，很俊的一个后生。崇祯三年（1630年）李自成被逼起义，投奔闯王高迎祥。崇祯九年（1636年）高迎祥战死，李自成继任闯王。崇祯十一年（1638年）经官军围剿，李自成带十八骑突围，后伏蜇于商络山中。崇祯十二年，因张献忠降后又反，牵扯了官军兵力，李自成出山，兵进河南。河南正值灾年，饥民争相参军，同时参军的还有知识分子

牛金星、宋献策，知名人士李岩。这些知识分子马上给闯王出主意，打出“均田免粮”的口号。李岩编歌谣：“吃他娘，穿他娘，开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使闯王的军队大受人民拥戴。李自成在河南取得胜利后，攻克湖广重镇襄阳，改襄阳为襄京，自称新顺王。崇祯十七年(1644年)破潼关、占西安立大顺朝，改西安为西京。同年三月攻下北京。

李自成进京，只呆了40天。他手下将领多是饥民和走投无路的知识分子，被逼而反，原本不需要什么觉悟什么素质。可一旦面对权力、财富、美女，这就是素质问题了，不是谁逼着你施什么美人计的问题了。历来史书认为这是农民起义军“蜕变”了，好像原来素质很高，只是架不住香风毒雾这么一吹，才变霉了。我看不这么简单。是环境造英雄？还是自我约束自我塑造造英雄？

人性深度的贪欲，在被逼造反时是退而次之的事，命要紧，贪不起也欲不起，最根底的本能是求生。所以起义的英雄可以说是环境造英雄，是客观因素造成的。一旦进了京，命早已保住，荣华富贵又在眼前，于是本能的求生马上升级到本能的追求享乐。这其实也没错，站在人类历史宏观角度看，追求享乐的贪欲是造成如今物质文明的动力。但把贪欲置于一个具体的时空内，那此贪欲则是短视和丢命的东西。知此者为修养好，为知世理、悟世间，检点行为克制自己这样的英雄是主观因素造成的，叫自我造英雄，不是环境造英雄。中国古语是“时事造英雄”我认为片面，它太强调客观而忽略了辩证存在的主观能动性。“时事、识势造英雄”是正确的，是时间、事件这些环境因素以及审时度势、自尊自制各因素具足，才有真的英雄可言。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底，李自成退出北京，清兵入关，改年号顺治元年，清朝立。第二年，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为地主武装所杀，时年40岁。

三、清朝史略(至鸦片战争前)

这段历史，是1644年—1840年，共196年。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在白山黑水崛起。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1583年努尔哈赤被选为建州女真首领。1593年打败了叶赫、哈达、科尔沁部落。1616年他自称大汗，定都赫图阿拉，改称兴京，国

号大金。

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称盛京。

1627年，努尔哈赤攻打宁远，也就是如今的辽宁兴城，被明守军袁崇焕的西洋大炮击成重伤，同年死去，时年68岁。皇太极继位。

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废大汗称号，一如内地称皇帝，尊其父为清太祖，自己为清太宗。

努尔哈赤从小就往来于建州和抚顺间与汉人进行商品交易，所以他会汉语，更喜欢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书。努尔哈赤力主汉化的趋势，可能是他看到了元朝军事大国、经济弱国的缺点。虽然这是他的心愿，但这个心愿却是他儿子皇太极才办到了的。皇太极，乃黄台吉变称。他深受其父的影响，所以在他登基后，改国号、改大汗的称谓，同时依明制设置六部、都察院、理藩院。他还不顾族人的反对，大量招募汉降将，使之为自己的政权服务。于是，短期内，大清国迅速迈入封建农业国的大门。在这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大清国的优礼汉官的政策，正是这个政策使洪承畴这样有名的汉将都心甘情愿地降了皇太极。当然，明王朝的腐败、神经质与清王朝的优礼汉官，并不算是"曲线救国"之"汉奸哲学"的理由。我并不赞同洪承畴之降，但我佩服皇太极的眼光，更深恨朱明王朝的短视。

1644年，李自成怀着想当全国皇帝的雄心，着箭衣、戴白笠、跨下一匹乌龙马，踌躇满志，从德胜门进京。牛金星一心想当宰相，刘宗敏、李过一心要发财。于是尘埃未落定，大家就各干各的要紧事去了。李自成的要紧事是前明官员可以降大顺，但要先交十万至一千两白银，具体数额与官职大小成比例。一时间拷打、追赃、抄家……弄得人人自危。牛金星的要紧事是手拿一折扇，上有自己所书写的"内阁"二金字，坐在八抬大轿上颤颤悠悠地满京城地游，访名人、见老乡，辛辛苦苦地夜宴、桑拿、马杀鸡……这八股文出身的文人，到这时候也八股得可以，算是里外一致、表里如一。刘宗敏、李过、田见秀的要紧事儿是分宫女、占豪宅、包优伶，名目是"大力整顿京城的官吏私产和戏曲市场"。而宁远总兵吴三桂手握重兵，正与清兵打得难解难分，听到大明亡大顺立，本也想投降。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派已降李自成的降官左懋泰带着李自成的劝降书和一些犒军物品去招吴三桂进京。吴三桂问左懋泰："我父亲如何？"左曰："已被押。"吴说："我到京后，会放的。"又问财产如何？左懋泰说："已查封。"吴三桂说：

"我到京后，会还的。"再问爱妾陈圆圆，左答："已被刘宗敏抢去了。"吴三桂立刻翻脸："父亲既不当忠臣，儿自不当孝子。"于是反戈与清联手，引兵入关，当了卖国贼。这"冲冠一怒为红颜"实是和刘宗敏的"整顿"有关。

说得走了板，再看正史。满清，因主导思想是汉化，所以其官制仿明，设内阁、六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内阁设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学士，它的最高决策者是"议政王大臣会议"。1732 年雍正为了加强皇权，取消了"会议"而设"军机处"。满人在军事上的特殊地位，是清朝政体的特点，可以说清朝是满贵族为主的含各族统治者的联合政权。

满清的行政管理。清朝的行政机构为：总督是最高长官，辖一省或二、三省。巡抚是省级长官，辖一省。这二者都是军政一体的官职，由满人任职。省以下是府县，由知府、知县政之，知府以下多为汉人任职。它的基层是保甲制：十户一牌，设牌头。十牌一甲，设甲长。十甲一保，设保长。每户的人数、职业都要写在门牌上，迁徙要有报告。这种地方管制法，叫保甲法，其目的是所谓的"防盗"，而不是对劳动力进行的编制。所以保甲法连坐法是有利于社会安定的，但它不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生产力的发展。

满清的法典。清政府于 1646 年修《大清律》，1704 年乾隆时修《大清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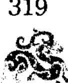
满清的科举。清朝科举除沿用明之科举外，还有捐纳和特科。

捐纳：是用捐钱、米来买官或获提升。

特科：有博学鸿词科、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这就是靠推荐和宣传炒作而出名的也可做官了。买官造成腐败，推荐造成结党，而炒作往往是宣扬理学的结果。这些弊端在前朝都有过教训，不知为什么汉化连这个也学了去。好在严禁宦官和外戚（包括宫内女人）议政谈政，确实是清朝没染上前朝的老毛病，这个汉化没学去，也算满人还明白。尤其清廷的皇帝们，大多数都精明能干，不似隋炀帝之暴、不似玄宗之昏、不似赵宋之弱、也不似朱明之怪。

清朝的军制。清朝的军制为：正黄、厢黄、正白三旗，由皇上管，其余五旗（正红、厢红、正兰、厢兰、厢白）归军事部门管，八旗兵全由满人充任。各省汉人编制的部队叫绿营兵。

清朝的税法。于 1716 年清朝实行"摊丁入亩"法。原来收税按丁摊派，这就造成男丁多而地少的穷人交不起税，越发地走向贫困。同时也有



投机者，虚报少报人丁、隐匿人口，以逃税。但不管怎么讲，在限制人口增长这一点上是有功的。当然，利与弊并存，这使地多丁少的地主富户越来越富而交税极少。“摊丁入亩”，是把人头税改作田亩税，显然这有利于人多地少的人，更利于人多而无地的人。而地多人少的地主，则极力反对。其实，凡是中国的开明君主，都在走一条尽量使贫富差距减小之路，因为贫富殊悬将带来政权的不稳定。削藩也罢、改革也罢都是此路。而历代的农民起义都提出“均贫富”的口号，也是对贫富悬殊的不满。“摊丁入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贫富悬殊的差距，但其弊端却是人丁暴长的恶性循环，越生越穷，越穷越生。其实，贫富差距和均贫富之战、田亩税和人头税之争，都是封闭的农业经济的产物。它们造成吃大锅饭的“平均”心理和“多儿女”的思维定式。当今，建国 50 年，我国人口从四点五亿翻了三倍，在人口增长过速的问题上，光靠说服教育、靠先进人物示范和榜样的作用怕是不成。光靠法律？还是参考什么田亩税？人丁税？这个问题回避是不成的，靠行政手段也有限。倘若再如此下去，过个十年二十年，中国人口将接近 25 亿。这里有个国土资源难以负担的问题，更有个人口素质下降的问题。知识分子和城市夫妻只生一个，农村生两个、边远贫困地区生四个五个……上大学的绝对人数逐年在增，而相对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我们眼光只看到这里，还肤浅。因为进入知识经济后，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成了生产力的主力，他们创造的财富如果和他们的收入成一定比例的话，无疑地他们将来是富人，是有资本的阶层；相反，农业人口增加了地没增加，就算农产品也增值了，人均算下来农民仍属于最穷的阶层。怎么办？如果采取削减知识分子的收入增大扶贫力度以减缓贫富悬殊，那会不会又造成跟满清“摊丁入亩”一样新一轮的人口增长呢？没钱都敢养四五个，有了钱会如何？农民意识的“均贫富”、“多子女”如何了呢？

当今，农业经济已过去、工业经济要过去、知识经济将来临。我们不谈“生态环境”，只 25 亿中国人挤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什么都免谈，治安就成问题。

总之，明清的历史，是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历史。1604 年，李自成在浴血奋战，英国暴发了资产阶级革命；1784 年蒸气机发明引起了工业革命，而中国正是田五起义；西方资产阶级蓬勃的朝气对应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和大清帝国走向衰朽的足迹。

我们这本小册子，只写到清朝的鸦片战争前。在清初至1840年的196年里，我们撷取几个人物和事件，以使诸位有个简约的印象。他们是郑成功、康熙、乾隆和白莲教。

（一）郑成功收复台湾

16世纪来，西方殖民者觊觎台湾。葡萄牙人称台湾岛叫"福摩萨"，就是说这是个美丽的岛。有此垂涎，就有阴谋与斗争。1640年，西班牙人与荷兰人在侵占台湾后双方发生战争，终是爱喝牛奶的荷兰人赶走了爱斗牛的西班牙人。荷兰殖民者在台湾姿意抢掠，激起台湾人民的反抗。清顺治九年（1652年），郭怀发动规模空前的反荷武装斗争，但被荷兰军队镇压了下去，这使郑成功下定了收复台湾的决心。自吴三桂卖国到清兵人关，使清兵直下中原，明朝官员大多投降。顺治三年（1646年），清兵入福建。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降清，郑成功苦劝无效后，决计"背父救国"。他以金门厦门为根据地，在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等地活动，策应南明王朝打击清兵。顺治十八年（1661年），西南的桂王永历政权已灭亡，而顺治也病死。一则复明已渺茫，二则清政权忙于治丧，于是收复台湾建立一个稳固的复明根据地，便出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同年三月，郑成功率2.5万官兵，乘200余艘战船冒雨出兵。四月三十日达鹿耳门，包围了赤嵌城。荷军派使者示意要谈判，郑成功看出荷军是固守待援之意，则斩钉截铁地回答：中国领土，自应相还，无判可谈。然后围城断水、外截援兵、致使荷兰盼援军无望，只好投降。五月，郑军围住荷军最后的驻地台湾城，炮轰城垣，断其粮草水源。康熙元年（1622年）二月一日，荷军总督揆一被迫在投降书上签字。

台湾的光复，结束了荷兰38年的殖民统治。这里郑成功的胜利，不是复明的胜利，它是中华民族的胜利，是中国人不甘外辱的民族斗争的胜利。

光复台湾后，郑成功在台湾推广大陆的先进生产技术，兴办学校、扩大外贸，一扫朱明王朝的沉闷与怪戾之气。康熙元年，郑成功病逝，儿子郑经子承父志继续与清廷对峙。清廷为封锁台湾，发出"迁界令"，从山东到广东沿海内迁30～50公里，烧民舍毁船只，严重地影响了沿海的经济发展。至此，抗清复明的性质已变成阻碍祖国一统、阻碍经济发展的割据性质了。康熙二十二年，清派兵进攻台湾，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投降，台

湾回归，沿海经济因“迁界令”的废除而得以蓬勃发展。

以上历史，令人沉思而得出一个结论：台湾问题远不止是个单一的问题，它是民族自尊心、祖国统一、经济繁荣的综合问题。某一个因素的不成熟，都是时机的不成熟，使回归祖国造成延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凡以种种理由去分裂祖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人，就是新的吴三桂、新汪精卫，是历史的罪人。

(二)康熙的功绩

顺治十八年(1661 年)正月初一，清世祖病死，爱新觉罗・玄烨继位，改元康熙元年(1662 年)。这时康熙还不满 8 岁。要是在过去的朝代，皇帝幼小必定会造成宦官专权或外戚专权，但满清却小心翼翼地绕过了这两个暗礁，一头撞在了摄政王专权的暗礁上。新的航道，总要有人去试航，总要为后人留下正或反的教训，而康熙的父亲顺治正是这么一个试航的前人。想当年清兵入关，摄政王多尔衮权势盛炎，根本不把七岁的顺治放在眼里。连见了皇上要行君臣之礼的规矩，都被多尔衮以腰痛而废掉，可见君臣关系何等微妙。好在顺治七年，多尔衮 39 岁去世，满清躲过大乱的一劫。顺治八年，皇上 14 岁时才清算了多尔衮“谋乱”的罪名。

到康熙时，是鳌拜代替了多尔衮，而他父亲顺治的角色轮到康熙扮演了。鳌拜在皇上幼小而摄政期间，造文字狱的“奏销案”，革黜江南官绅达一万三千余人。后鳌拜在康熙五年(1666 年)掀起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康熙六年(1667 年)逼康熙降旨把自己的对头苏克萨哈判了绞刑。这时另一个对头索尼已死，鳌拜视 14 岁的皇上为无物，跋扈嚣张不交摄政权。后康熙挑选强壮少年入宫与他一起练摔跤，鳌拜认为这是儿戏而没放在心上。康熙八年五月(1669 年 6 月)，在鳌拜进宫听召时，众少年一拥而上生擒鳌拜，永远把他监在狱中，而其党羽全部处以死刑，情节轻的予以革职。搬掉了摄政王，16 岁的康熙办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事。

首先，他立南书房，选翰林于内廷为皇上处理奏折，这种由皇上自己选人办公的方法，削弱了内阁的权力，摆脱了被动的局面，而雍正设军机处废“议会”，则是此法的延伸。

其次，康熙根据历代王朝的经验教训，毅然削三藩。三藩指云南吴三桂的平西王、福建耿精忠的靖南王和广东尚云信的平南王。三藩势力随

着清朝的逐步稳定而恶性膨胀，这早已被清廷所重视。康熙十二年(1673年)，因尚云信之父尚可喜年老多病，要告老还乡，请其子承袭其爵。康熙准其还乡，但要撤其藩，不许其子承藩业。吴三桂闻信，灵机一动想试试朝廷的意图，主动请求撤三藩。放到别的皇帝身上，也许会有种种曲折，而康熙一口答应，使吴三桂弄巧成拙。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作乱，云、贵、川、湘等省尽为三藩天下。康熙打起精神全力抄剿，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兵收浏阳、平江，后，吴三桂病死，二十年(1681年)清兵围昆明，吴三桂之子吴世璠自杀，三藩之乱终于平定。

一个人，以爱妾为由而卖国，又以削藩之由而"爱国"。一忽儿由明衣冠成清衣冠，一忽儿又由清衣冠换成明衣冠，拿国家当儿戏、实用得为自己私利服务，其后果必是为明、清等所有中国人唾骂。如果说因刘宗敏占陈圆圆还有一丝理解吴三桂的理由，那如今的三藩作乱则是一丝解脱的道理也无。中国自古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人挪活树挪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俗语，但这些俗语的外延是在爱国的范围内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一旦超越了这个外延，请小心了，并不是哪个人骂你卖国贼，而是我们的子孙万代、全体中国人骂你是卖国贼。"孩儿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以一己之私怨，把生我养我的国家当成敌人，这岂有好下场？英国人塑林则徐的蜡像，他们佩服这种对手。卖国者只是狗，洋人也看不起狗，他们的理论是：连祖国都不爱的人，还能爱谁？

再次，康熙统一台湾、平定准噶尔、与俄国大战雅克萨而胜，与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平等条约，造成中俄边界一百余年的稳定)，使中国进入"康乾"盛世。

(三)乾隆和他的南巡

康熙1678年病逝，四子雍正继位。雍正在位只有13年，于1735年病死。雍正撤"议会"设军机处，推行"摊丁入亩"和"火耗归公"，废除立太子制度，这些都是明摆着的利国利民之策。但大设文字狱，建立自己的特务组织，也反映出他心理阴暗和怪怪的一面。而他死后，他的第四子弘历，又是一代明君，他就是中国做皇帝达60年，"皇龄"最长的乾隆。

乾隆一生有两大功绩：一是扩展疆土(我们不谈，这和我们要讲的人文相差较远)，二是他的六次南巡。



乾隆的六次南巡，可不像隋炀帝去玩。他每次南巡随从仅三百人，而且费用均由内库开支，所经地方，不特别地修缮和欢迎，惟恐劳民伤财。虽然事实可能违背其初衷，但因牵扯国家安定的大事，所以南巡仍是利大于弊。乾隆南巡的借口，无非是视察江河以防水患、检阅军队以振军威。然而真实的意图却是笼络江南士绅、收买人心，力图减小满汉的对立情绪。

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三种基本模式的文化，即：农业经济模式的文化、商业经济模式的文化和游牧经济模式的文化。农业文化，则中国是典型，它创造了封建专制政权、儒家的理学思想和重伦理尊自然、朴质勤劳的文化特色与人文特色；商业文化，则希腊是其典型，它创造了资本主义的政权、市场竞争观念和自由公平、重法律、重实用的文化特色和人文特色；游牧文化，则蒙古是其典型，因为游牧的性质，使其停留在原始的生产方式上，无法步入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它创造了骠悍朴质的民风，少束缚、少框架、热情奔放、载歌载舞的文化特色和人文特色。

所以，满汉的民族冲突，除一定意义上民族情绪情结，其文化冲突要占很大部分。这些游牧出身的满人，给明末中国腐朽沉闷的政坛带来了草原上的勃勃新机。他们自觉地汉化，也算是积极主动泯灭民族冲突的善举。乾隆南巡时，满人游牧之气、新鲜之风已渐趋乌有，八旗子弟、王府儿孙一个个胸无大志、提笼架鸟、“您哪！您哪！”地成了社会闲人，吃着汉人的供奉、无所事事地消遣，这就又逐渐加深了满汉之间的矛盾。乾隆清楚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一方面仍推行其父的改革以削弱满清贵族的势力；一方面利用南巡谒禹陵、拜明陵、访孔庙、祭祠堂……一路地召试江南书生、蠲免钱粮……随兴趣为历代的汉人先贤、祠堂古迹提诗写匾。乾隆的这些做法，确实在缓和民族矛盾问题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清初的留辫子、“扬州七日”、“嘉定三屠”这种民族仇恨是不可能忘记的，它还需要更长的历史时间和历史事件去使其褪色。

乾隆的南巡，把康熙、雍正所积国贮消耗殆尽。他退位时也承认：“(南巡)劳民伤财，确实无益而有害。”而他的宠臣和珅在被抄家时，三分之一的财产已合白银两亿两千多万两。看来乾隆也似李隆基，晚年尽干些糊涂事。

满清贵族的统治，官吏的贪婪，使乾隆的南巡作用大打折扣。在几十年的盛世之后，民族矛盾、官吏盘剥、文字狱……这些终于酿成了太平天国前满清最大的农民起义。

（四）川楚白莲教起义

乾隆中叶，在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下的破产农民、手工业者纷纷逃入陕西、四川、湖北交界的深山老林，到嘉庆年间已达数百万。他们从事的工种是木厂、纸厂、铁厂、煤厂、盐井，而具体的工作是被称为“骡子”的搬运工及最危险最繁重的工种。生活没了希望，自然地就寄希望于白莲教。这次工业和手工业者结社，又让我们想起墨子，看来结社、结党是源远流长的传统了。白莲教是民间流传的秘密宗教组织，它借用佛教中象征吉祥的莲花、借用道教的术和咒语、如墨家一般地按一定规矩章程入教，其教义则是反清复明、平等平均，主张同生死共患难。这种反清的组织自然引起清廷镇压。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官府开始捕杀白莲教。而地方官吏却以捉拿邪教为由，更加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财，即：“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这当然激起更大的反抗。嘉庆元年（1796 年），大规模的起义爆发了。

嘉庆三年（1798 年），白莲教东乡白号首领王三槐被捕，嘉庆亲自审问他为何造反，王三槐答：“官逼民反。”嘉庆问：“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答：“惟刘青天一人。”可见当时腐败之广，人民憎恨之深。刘青天指的是四川南充知县刘清，他为官清廉，百姓心里有杆秤，都叫他刘青天。但也正是这个刘青天，诱降了王三槐，最后王三槐被处凌迟。

这次起义在历时九年、耗尽大清财富和气数后，终于失败。但是凡宗教形式组成的非宗教秘密组织，因其宗教性加秘密性，又有教规、帮规、行规，很难真正被除尽。嘉庆十八年（1813 年），白莲教的一支名天理教（又名八卦教）在北方秘密发展起来。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中华国土万里长，干柴烈火遍地藏。”天理教更有高人，因北方土地兼并严重，所以天理教出了高招，凡入教交纳了一定的“根基钱”者，起义事成后可以依“股”分土地。这真是最原始的保险业和股份制了。于是“拥者数万”就毫不稀奇，光看前些年炒股之风，即可猜出这个教红火的盛况。为了反抗民族压迫、反抗阶级压迫、更为了土地，义军所做出的大胆计划——直接攻打皇宫——紫禁城。他们深信有弥勒佛保佑，深信虽死也往生莲花丛生的西方净土。嘉庆十七年（1812 年），河南滑县一支名“人皇”的李文成所部，因泄密而李文成被捕入滑县县城，后被教众救出，并占

领了滑县。而北京大兴黄村一支名“天皇”的林清所部，不知“人皇”出了事，依计划派二百人分两路攻打东华门和西华门。以区区二百人打皇宫，真是只有信教的人才敢干的事儿。迷信得可爱，却失算得可以。因太监多产河北，所以义军里攻打两门的各一百人中都有太监领路。攻东门的一队因不慎露出刀枪而被关于门外，攻西门的一队顺利通过西华门于隆宗门前与卫队浴血拼杀。义军一度登上城墙，连发数箭，至今隆宗门上仍有当年箭痕。这场战斗，如果李文成那里的几万人能按时赶到，林清在黄村大本营里的人也能及时赶到增援这二百勇士，其后果可能真能攻入皇宫。但又如何？实际情况是：援兵不至，这二百人除少数撤回，多是被害。此一役杀官兵 41 人，伤 60 人，使宫内和京城一片混乱。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变颜变色，街头巷尾、戏院茶馆无不讲述天理教之神、之奇、之勇。嘉庆正在热河消暑，一听此事大叹：“汉唐宋明未有之事。”他怎么这么不明白呢？民族斗争如此激烈，可不是汉唐宋明未有过么？坐在火山上，势如累卵，自己还不觉得，大清可谓休矣。当然，事后天理教被镇压下去，天皇林清、地皇冯克善、人皇李文成都先后牺牲。但从白莲教派生出的天理教，依其自身的规律远没有灭绝。什么天地会、义和拳可以说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天理教再派生出来的准宗教组织，连太平天国都吸取了“融教入军”的经验，让上帝来保佑起义军了。

清初，中国人口五、六千万左右。乾隆六年(1741 年)，全国人口达一亿四千万。嘉庆十七年(1812 年)，全国人口三亿六千万。道光二十年(1840 年)，全国人口四亿一千万。

呜呼，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人口问题加上鸦片战争……中国进入了灾难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专制社会。

龚自珍说：“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时代呼唤英雄，英雄创造了新的时代，推翻满清建立一个新社会的暴风雨，就要来了。



第二章

禅的僵化与终结

在上一部分，我们讲的是禅宗从盛唐后的南北分宗一直到南宋的默照禅。很明显，随国家安危、国势强弱，禅宗从百家争鸣走向哑口无言。而在元明清三朝，禅宗走入“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的一种迷茫，走入“禅净合一”、“四宗合一”之路。其实说穿了，是禅宗走回有文字、有传承、有仪轨、有教义、有戒律……的正统宗教中去了。换言之，禅宗死了。

禅宗的僵化衰亡，是历史的必然。当儒家的理学与心学窃取了禅宗的精华后，人们对禅已不再感兴趣。但同时，儒道的成果、诗歌的成果、禅的成果，孕育和创造出了中国文学史上辉煌的一页——元杂剧和明清小说。可以这么说：有了意识形态上儒道两家的涅槃，才有了诗歌的兴盛；有了诗仙诗圣的涅槃，才有了禅宗的兴盛；有了临济和曹洞的涅槃，才有了更趋复杂的艺术形式的诞生——这都是不同领域中情与理辩证的结果啊。

至此，这种新诞生的更趋复杂的艺术形式已不是一个简单的抒情或简单的说理，也不是简单的赞颂什么、批判什么，更不是简单的阴阳辩证可以解释得了的，而是以平实、客观（看来是这样）地描写生活来揭示出庞大的、巨系统级别的社会的复杂性。

本来文学与审美我们是放在每一部分第二章讲，而宗教是第三章讲。因为历史造成中国人思想与情感的转移，所以我们在这一部分中也作一个调整：第一章讲史，第二章讲禅，第三章讲让人震惊又激动的文学，而最后以结束语结束全书。



一、元代禅宗的看话禅和“禅净合一”

元代，是蒙古人的贵族王朝。蒙古人重喇嘛教，这是唐中叶由印度密宗传到西藏再传到蒙古的。所以喇嘛教藏密一系，是佛教中最繁杂、最神秘、最保守的一支。正是由于它的繁杂神秘与保守，使之能长期存在于经济落后地区而极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在印度，密宗很快就消失了，它不适合封建农业大帝国孔雀王朝，也不适合中国的封建农业大帝国，但它极适合仍处在生产力低下、可耕地少、生活极端艰苦的西藏奴隶制帝国和游牧飘泊的蒙古帝国。可见密宗、显宗与禅宗三者，其宗教性和保守性呈递减，其适应性却是递加。这里所谓的显宗，指汉地的正统大乘佛教；而禅宗，实在是只有宗教的外壳，内里却是一种思潮罢了。禅宗正因为它最少宗教性和最少保守性，所以其命运最坎坷，但又气数绵长。因为任何朝代任何经济模式的人，都有人性中情与理的辩证啊……正如前文讲胡适与铃木大拙之争一样，人性的发展需要马祖的即心即佛，人性的存在又要求它对社会对共性有个《参同契》式的回互，当这二者辩证发展后，给历史留下一条清晰的痕迹——情与理的韵律。

说远了，再回来。密宗，需要绝对的诚信，否则是难以修持下去的。这种诚信要建立在一年四季艰苦的劳作、接触外界事物少、接触他人少的氛围中。蓝天白云一望无际的草原、戈壁、雪山……飘来的香烟味、法器声……远处于一片淡绿色中，突兀而出的金壁辉煌的寺院……朝圣的人们默默地跪拜，这是学密宗的先决条件。只有具有了这种氛围，才会油然而生一种崇敬和畏惧，才可能真正地诚信。

蒙人的崇尚喇嘛教，波及到对佛、道、儒、回、天主、犹太教等一系列的宗教保护政策。这种宗教政策，使“江南民贫僧富”，所谓“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而统治者和文人都认为“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天可怜见的，禅宗的影子都没了。

正因为蒙人信密宗，这就造成了对禅宗的冲击。除了喇嘛教、正统佛教外，参与剿灭禅宗的还有全真教的道教。道教正式地面对面地对禅宗发起攻击始于王重阳(1113—1169)，王重阳创全真教就是为了对抗禅宗，

他说:“禅僧达性而不明命,儒人谈命而不言性。余亦兼而修之,故号全真。”

说点题外话,轻松一下。

全真教出口伤人,连儒家也骂了进去,这显然与忽必烈的汉化造成了冲突。元十八年(1281 年),元政府以喇嘛教为首,发起对道教的清算。忽必烈诏谕天下,除《道德经》外,其他一切道教经典都要全部焚毁。当时全真教正和宋末存活下来的默照一派的曹洞宗争斗,这一下惨了,也别争了,道教一下子处于低谷。在元明清三朝,道教萎缩得变成了方术之教,阳气一直没缓上来。当然,这种打击使道教更加深入民间,结果是各种道门暗暗繁荣起来。更为幽默的是道教在被打击之后,经仙术的检察与考证,证明了“老子化胡”。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老子化胡”是说:你元政府同意存在的《道德经》,本是道家祖师爷老子所著。老子不是骑牛西去不知所终了么?好,我告诉你,老子一直走到印度,融化(合)在胡人(统指印度人,亦同达摩也)中,创造了喇嘛教和佛教。好了,如此按门里规矩一排辈分,道教应是佛教的“师兄”一级,弄不好是“师叔”也说不定。

以上是历史的真实,诸位莫以为我在胡编。

元政府崇教而斥禅,还体现在它的民族政策上。元政府把人分为四个等级,汉人排第三、南人排第四,而禅宗正是南人的强项。如此这般,学禅的人减少、习教的人增多。再加上元初无科举,没了文人士大夫这个来源,禅宗失去了新鲜血液,枯萎下去就是必然的了。

禅宗到了元朝,只剩下临宗与曹洞两支。很多大师都跑到东南亚、朝鲜(包括南韩)和日本去了,留在中国的禅宗,我们大略地讲一下。

(一)元北方的临济宗

元北方的临济宗,早已无了赵州的悲愤孤凉,反而与蒙古贵族关系密切,被元朝奉为“临济正宗”。这种官禅化、京禅化是禅与政治密切结合的产物。甚至把政治条件列入选僧的标准,使北方禅宗成了为蒙元服务的工具。可想而知,这时的禅宗早已失去了其趣其味。因为禅是一种思潮、是一种境界、是一种情趣,它负担不起为政治网络体系服务之重任。

北方临济宗的代表人物是印简。

海云印简(1202—1257),字海云,俗姓宋。

忽必烈问法于海云,海云说:

"信心难生,善根难发。今已发生,务须护持,专一不忘。不见三宝有过,恒念百姓不安,善抚绥,明赏罚,执政无私,任贤纳谏。一切时中尝行方便,皆佛法也。"

从中可以看出,印简的官禅,不是神秀北禅的官禅,他以规劝忽必烈为主,同时在保护佛教、护卫汉文化工作中,尽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我们不应责备他在禅的理论上没有建树,而应深深地钦佩他所做的实际工作。

印简对儒家不但不排挤,还尽力规劝忽必烈要以儒治国。他说:"安天下之事应请教儒家,不应垂问佛家。"他认为孔子之教,从三纲五常到治国平天下,其用心的程度比弘扬佛教教义为深。这种大度的胸怀、精辟的见解深为忽必烈赏识。

印简过世后至大二年(1309 年),忽必烈命赵孟𫖯撰《临济正宗碑》,谥印简为"佛日圆明大师"。

(二)元北方的曹洞宗

曹洞一脉,在金元之际重又兴盛,实是有它的历史原由。曹洞宗到了第四代的丹霞子淳(1054—1119)后,四传至天童如净。如净感禅界弊端丛生,世事不堪忍受,所以将曹洞一脉的信物都传给了日本僧人道元,任其将曹洞正传随道元挂帆东去。如今日本禅宗多是第六代曹洞宗正传道元所建,少有例外。而如今日本禅僧来中国礼祖,也是到浙江宁波天童寺,礼曹洞初祖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以及四祖天童如净。关于法嗣,因其复杂而多端,各派自有自己认为正确的传承,所以从曹洞初祖如何传至天童如净,天童如净又到底是算第几代,我们只依大略而言,错与对希望大家原谅,只是于此处生出争端来就没意思了。

道元携曹洞正传去日本是历史的真实,天童如净送走道元,返身上堂对众云:

"如今个个只管道云门、法眼、临济、曹洞等家风有别者,不是佛法,也不是祖师道也。"

"近年祖师道废,魔党畜牲多频频举五家门风,苦哉!苦哉!"

于是曹洞一宗在中国几乎灭绝。

到了万松行秀(1166—1246),曹洞门人北上,受金元游牧民族感染,渐渐生机勃勃,一扫在南宋时的陈腐呆板,而成兴盛之势。但是这时的曹洞宗却和以前的大不一样了。

万松行秀所代表的北方曹洞,倡:

"儒释兼备、宗说精通、辩才无碍。"

当圆悟克勤的《碧岩集》在南方受冷落之际,行秀之北方曹洞禅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行秀自著《从容庵录》,这是在耶律楚材敦请之下而作,是弘扬曹洞门风,诠释颂古之作。曹洞一门本来文化水平就高,这回行秀如鱼得水,他通过词典式的诠释,围绕公案附会蔓衍,涉及儒家经典和神话故事,深为官僚士大夫所爱。显然,行秀的历史功绩不在禅学上,而是在传播佛教知识和宣扬禅宗那摸不着头脑的公案上。

(三)元代南方的临济宗之一——高峰原妙

元代南方,全是临济宗。随北方禅由兴而衰,南方禅渐渐复苏。

南方临济禅可分为四系:

元叟行端(1255—1341)的之善系;

笑隐大沂(1284—1344)的居简系;

古林清茂(1262—1329)和昙芳守忠(1275—1348)的崇岳系;

高峰原妙(1238—1295)的祖先系。

这里最有代表意义、在禅学上最有建树的应是祖先系的高峰原妙。

据说原妙出家拜断桥妙伦为师,师问:"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原妙不能答。不久又参雪岩祖钦禅师,师问:"谁与你拖个死尸到这里来?"原妙不解,于是联想到"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参此话头,三日不眠。猛一抬头见五祖法演的偈:"百年三万六千朝,反复原来是这汉。"顿悟。于是他就以六则印证自己的学生:一则,彻悟的人本应解脱生死,为何命根不绝?二则,佛祖公案都是一个理,为何有明有不明?三则,大修行人当遵佛行,为何不守戒律?四则,太阳当空无所不照,为何被片云遮盖?五则,人人有个影子,寸步不离,为啥脚踩不到?六则,大地是火坑,为啥禅定不被火烧?诸位当师父的人,可依此问问徒弟,或干脆问问自己。

不扯闲篇了,书归正传。



高峰原妙，有“入门三关”和“入室三关”。这些所谓的“三关语”，只是启迪人参透生死，并没有更多的见地与理论，我们略去不表。

他的禅法是“参话头”，而“参话头”有三步：

(1)话头是：“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原妙的话头，不似赵州的“狗子有佛性也无？”而是“心归何处？”依佛教理论：万法唯心，心生万法。好了，既然万法归一的“一”是指“心”，那让万法都能归入的“心”，它再归于何处呢？其实二祖见达摩，也问“如何安心”？达摩让他把不安的心找出来，二祖答：“觅心了不可得。”所以“心归于无”是显而易见的中规中矩的答案。

真空生妙有，是禅的核心；而妙有都是成双成对辩证地生出，这是曹洞回互的根本和基础。如此而已，并无可参之处。“狗子有佛性无？”是把你塞入“有”与“无”两个相对相背的事物之中，让你茫然不知所措，这叫参话头。而原妙的话头不是在二律悖反的逻辑中参，它线性地指向“无”，实是不能叫“参”，只是一想即知的事儿。

(2)“疑以信为体，悟以疑为用。”原妙知道你怀疑这个参法是否对头，所以马上让你进入第二步：“生大疑”。

疑什么？疑“心真是空无的”？“真能生万法”？广义地讲就是疑有无佛、有无生死、有无轮回。原妙认为只有生了大“疑”，才能证明你真的信佛教，凡是真信佛教、诚信佛教的人，都要疑这个。而当你怀疑了，才有开悟的希望。这与西方基督教神学大师奥古斯丁的“我怀疑故我在”有些相通。

其实般若系经典讲空无，讲无有菩提、无有佛、无有法、本无烦恼可除是针对小乘“有”而成立的，一但用般若系来解释世界，连龙树大菩萨也犯难，他要用“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中观来弥补自己的不足。换言之，般若系用“空观”对付小乘“有”、用“有观”解释世界，实是中观一法的局限性与无奈。

大乘真常系索性另辟蹊径，不谈中观，只以一个真常之性与客尘之染来解释空的无和世界存在之有。

禅宗则利用般若系的“空”使你进入“入空寂”、“出世悟”；再用真常系的“有”去“入世悟”、“入世行”。显然这是把理论改作方法的一种大调和，如西方经院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用一个层次模式把基督神学、天主教经

院学、哲学一网打尽，统一在一个整体内。这种制止分裂的做法，不管怎么说也有进步的意义。

以上是佛教中几种大略的法门。

而原妙走的路就怪怪的了，他的修行理论是：

相信诚信生大疑茫然而悟道。

如果说参话头是利用逻辑上的二律悖反，让你茫然而"入空寂"，再因一缘由突然开悟尚有些道理，也有人依此悟道；那依原妙的参话头进入一个很理性的怀疑状况，这个怀疑的状态是否可以茫然而直接悟道就没什么道理了，也没有人能证明。只好看看原妙认为悟的是什么，再回头来讨论这第二步。

(3)无心三昧。原妙自述昔年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话题，疑情顿发，以至：

"废寝忘食，东西不辨，昼夜不分。……虽在稠人广众中，如无一人相似。从朝至暮，从暮至朝，澄澄湛湛，卓卓巍巍；纯清绝点，一念万年；境寂人忘，如痴如兀……吃茶不知吃茶，吃饭不知吃饭，行不知行，坐不知坐。情识顿净，计较都忘，恰如个有气的死人相似，又如泥塑木雕底相似。"

倘若认为这是悟后的境界，那可是差了十万八千里，拿参禅的一个过程当了目的，拿路边风光当了灵山宝刹。

参话头这个修行方法本源自南宋的大慧宗杲。宗杲以赵州的"狗子有佛性也无"这么一个应机的话，拿来创立了"看话禅"，上一章已讲过。这里有士大夫和僧人们忧国与爱国的痛楚，到原妙这里则此情更甚，成了南宋亡国而产生的一种情结。南宋亡后(1279 年)，原妙隐于天目山，于一石室中闭"死关"十五载，直至逝世。临终曰：

"来不入死关，去不出死关。铁蛇钻入海，撞倒须弥山。"

可见其严肃冷峻、个性刚烈了。他被誉为"高峰古佛"实是与他的气节有关。而他发明的"参话头"之法和"有气底死人"之境界，貌似"平常心即道"和"无心即道"，其实是大大地不同。前者是不愿醒来，因为国亡家破；后者是醒了以后再入世，不为事俗而费心。

从参禅的过程看，虽然"入空寂"和"入茫然"有相似之处，但确实是由空寂开悟易、由茫然开悟难。当然，有上上根器都也许会悟得更快更捷，但这是例外。我讲的话诸位可以去体会：我们人生中每个人都有"灵机一



动，计上心来”的时候，这个灵感突然闪现是以对某个问题的长期思索而无法解决为基础的，然后以松弛下来把思路引开后（入空寂式，也叫“无心求是感应”）才毫无准备地突然发生的。难道不是这样的么？当然，也有百般思索累得茫然一片（入茫然式，也叫“有心求是妄想”，妄想太过太重，累得发昏）突然一道闪电划开迷雾，灵感来了。从生理学上讲，“入空寂”式是暂时放下以往的思维模式，脑神经在松弛状态下产生新的不同于旧式样的兴奋与联想；而“入茫然”式是在以往的旧思维框架中，因问题不能解决而左突右撞，突然杀出一条新思路。前者的灵感来得较被动而神秘，后者的灵感来得较主观而辛苦。前者较稳妥，后者易走火入魔。当然，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也有以后者为易为稳的人，只是很少，祖师们说是上上根器者。谁知道呢？

退一万步讲，就算这种“生疑”至“无心三昧”的参话禅也是一条开悟之路，当然不能说是错。可是以“无心三昧”去“入世行”、去做人，就绝不是“平常心即道”、“无心即道”的意思了，这是大师情绪化的话，是情感的禅。

总之，这种参话禅我们理解，但无师指点就不可轻易地去学。

（四）元代南方临济宗之二——中峰明本

中峰明本（1263—1323）是高峰原妙之徒，他这个人比较实在，对当时禅门的混乱一一予以批驳：

“达摩西来，谓之单传直指，初无委曲。后来法久生弊，生出异端，或五位君臣、四种料简、三关九带、十智圆真、分立门庭、互相提倡。虽则一期建立，却不思赚他后代儿孙。”

对于他师父传给他的参话禅，他大力推崇。但同时他又说：“看话头做工夫，固是不契直指单传之旨，然亦不曾赚人落草。最是立脚稳当，悟处亲切。”言下之意是：“看话禅固然不是直指人心的功夫，但也没骗人入邪道。这是种稳当亲切的办法。”

万念归一，把这个一再放下，叫直指人心。而参话禅是进入思维的茫然，再入空而开悟或由茫然而直接开悟（前者是宗杲的“空中悟”，后者是他师父原妙的“茫中悟”），这二者都早已不是一个“放下”而悟道的心传了，换言之：早已不是禅宗了。

禅宗到此，可谓法久生弊，已与文字难舍难分。既然离不开文字，所以只好去“参话”、去“参语言”。

看来，从赵州的孤愤、到宗杲的看话头再至原妙的看话禅，一是离不开一种忧愤的情绪，一是离不开语言文字，也可以说这就是看话禅的两个特点。

明本除了推崇看话禅，更推崇“禅净合一”、“四宗合一”。这个意图显然是联合诸家，以对抗喇嘛教。而元末士大夫逃禅，净土盛行，皆因人间太乱。而明本一脉，把握了这个趋势，使禅宗“四宗合一”再“禅净合一”，把这个推销出来，实是时代的产物。

二、明朝，禅的僵化与衰退

明王朝，因朱元璋当过僧人、游过方、参加过白莲教起义，所以对佛教、对民间具宗教性的组织十分熟悉，对个中内幕和机窍一清二楚。于是在主张儒术治天下的同时，先后颁布几条政策性法规：

①朱元璋称帝第一年（1368 年），诏令禁止白莲社、大明教和弥勒教等一切“邪教”，以防左道乱政。

②在僧人剃度制度上严加规定。男子出家须 40 岁以上，女子出家须 50 岁以上。

③严格限制僧人与社会各阶层的自由交往。特别禁止僧人与各级官吏来往，要“合众以成丛林，清规以安禅”。

④严禁僧人娶妻成家。

⑤鼓励僧人退居山林、从事隐修。

⑥多次颁布诏令，把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等。相应的僧人也分为三宗，要求“各承宗派，集众为寺”（这寺院三等是：“禅”指禅宗、“讲”指宣讲佛教经典、“教”指祈福弥灾、追荐亡灵等各种法事）。

⑦严禁僧道四处游动。僧道诸修行人只宜“甘苦空寂于林泉之下”或“幽居静室”。

朱元璋种种禁令的后果是：切断了禅宗与群众、士大夫、官吏的联系；限制了禅宗在理论见地和禅法上的发展；制约了教内各种思想和流派的相互交流；造成宗教人士年龄老化、思想僵固。这一切都使禅僧纷纷转

向，兼作他业。

如此这般，禅宗一脉只有走入僵死。

（一）明初的由禅入教

经过宋、元两朝的政治打击，禅宗到了明朝已完全丧失原来的神韵气势，变成纯文字、纯教理的研究。所以这时的禅宗已不是真正的大唐之禅宗了，应称为"禅教"或"教禅"。最有代表性的算是呆庵普庄。

呆庵普庄（1347—1403）说：

"我等沙门释子……唤作无事人则可，唤作了事人则不可。八万四千法门，一千七百公案，须是一一参究，一一透脱始得。"

显然，一头扎进八万四千法、一千七百公案里去研究研究，再要透脱，本身就是完全彻底的"经学"之路。经学、经学，说穿了是学经也，于禅相去甚远，于悟道毫不相干。那么多经典、论著、事迹、公案、法门，积千年的佛教文献，实是够40岁才能出家的僧人学到"了"了。

呆庵普庄在《呆庵歌并序》中说：

"我此呆庵呆道人，不识世间秋与春，兀兀痴痴只么过，无荣无辱无疏亲。"

这显然契合朱元璋的"幽居净室"之禅了，既没工夫串联行脚，也无时间切磋佛礼。这种由禅潜移默化地变成教的做法，使禅进一步陷入僵死。大凡真的禅师，在不逢天时时也宴坐、也闭关，但他们只是一人所为，对自己的行为他们自己负责任，从不要求别人效法。同时他们会告诉你"一切皆空"、"我这里无有法"。这和普庄号召僧人钻入经教中孤芳自赏地"呆"，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啊。

（二）明中叶的义学

沿呆庵普庄的经学，再发展到明中叶，这讲经注经就十分发达了。

讲经注经也叫"义学"。义学、义学，乃从经典中研究其本义也。惨了，八万四千法、一千七百公案都要一一道出其义来，这可比只研究一下要再难上十倍。你想啊，光明白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要再著书立说整理出版……这个工程浩大了，反正僧人们又不能出门，只有在这没边没沿的书

海里滚。

曹洞宗的月舟文载(1455—1524)提倡：

“迷时须假三乘教，悟后方知一字无。”

这是钻透文字才达无我无念无相之禅的路。挺好听，似乎也对，但这个通宗通教的功夫要把“三乘教”全整明白了，如此才不迷？天啊，真不知迷的是谁？

自元代高峰原妙一气之下闭死关十五载和提倡参话头“一归何处”后，到明中叶就开始创造出“闭关”一法和对参话禅的兴起。

闭关，也称“掩关”。指在一段时间内足不出户，专事坐禅习定。这种方法自元至今，已形成一种“闭关默守”的特殊修炼方法，而以明中叶最为流行。也有明白的僧人，对此提出批评。曹洞宗的永觉元贤(1578—1657)就对闭关提出批评：

“余闻古之学道者，博参远访，陆沉贱役，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百苦无不备，尝未有晏坐一室，闭关守默以为学道者也。

“况关中既不受知识钳锤，又无师友策助，痴痴守着一句话头，如抱枯椿相似。日久月深、志渐靡、力渐疲、话头无味、疑情不起，忽然转生第二念了也。甚至身坐一室，百念粉飞者有之，又何贵于关哉？”

元贤的批评，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闭关一法至今，仍是释门中很令人尊重的一法。原妙本是由于南宋亡而闭死关，这个情绪化的法门引起人们尊敬和敬佩。但人们尊敬和敬佩的是他的人格人品，非是闭死关而悟道啊。可后人群起仿效，全不管是否悟道、是否究竟。这一回让人尊敬和敬佩的只是他们的毅力与坚强了，离正宗的禅不相干。我的佛门师兄就修闭关，三年只生活在一个室内设备俱全的空间。其他师兄介绍：入关一年，看书著论，于佛教和人生大有体会；第二年则突然醒悟，又哭又笑，焚其经论，看天下万物只一个无；第三年只是平平常常过日子，不看什么不听什么，该吃就吃该睡就睡，该礼佛时礼佛、该上香时上香……

因无缘与闭关的师兄切磋，所以不知他的境界和情趣到底如何。只知大多数人于闭关第二年就熬不住，冲关而出，疯了傻了的大有人在。原妙大师创下的闭关之法，如今看来实是弊多利少，这怕是大师没想到的吧。



看话禅，也是两宋之际宗杲悲愤之作。所以，真的纯正宗的看话禅，定要有国之将亡之忧和爱国与忧国之苦。这个苦是两难造成的无以言说的感受，拿到参禅一法中来，就显得内心矛盾之激烈了，所以看话禅的正宗很险，很不平实。而后人非要依法参下去，就先有高峰原妙的"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之绝顶，再继而有了明本推崇的"禅净合一"。到了明中叶，德宣（1512—1581）索性推崇"参话头与念话头"合一的"禅静合一"，彻底地泯灭了禅与净二宗的区别。德宣说：

"即心即念，即念即疑，即疑即心，心疑莫辩，黑白不分。爆然'叻'地一声，灼见一场笑具。"

这就把闭口不言内心参话头与开口念佛号结合了起来。很显然，开口念佛是净土宗，一边念佛，一边参和疑，那参的话头和疑的东西就必然与佛号有关。因咱们没修过这法门，所以不敢说东道西。但是把原妙很险的参话禅一下落实到极平稳的"参佛号禅"，也算是走得很远了，离原妙、明本的"看话禅"很远。

(三)明末禅宗的回光返照

明末，张居正变法失败，宦党争斗、农民起义造成社会上流亡人口大增，且进入"禅家者流"甚众。当然，大多数僧人为求生而不是为宗教信仰。"农禅并举"一度抬头，一扫禅坛乌七八糟的无谓争论，颇似晚唐五代的山林禅。

代表禅宗最后辉煌的明代僧人，是密云圆悟和汉月法藏。

(1)密云圆悟。密云圆悟(1566—1642)，崇尚农禅，倡边劳动边参禅，反对在无事中安坐修行。他说：

"老僧三十一上侍先师，参禅修道都在劳作里办。汝辈要安坐修行耶？老僧不愿丛林遗此法式。"

圆悟属临济一宗，所以始终与明廷保持一定距离。他有"老不奉诏，朝廷慕之"的口碑。

圆悟的禅法叫"一条白棒"。他总结自己参公案几十年的经验后说：

"山僧出家将及四十载，别也无成得什么事，只明得祖师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一著子。"

于是禅宗绕了一大圈，最终回到临济祖师那儿。他说：

“老僧生平不解打之绕，惟以条棒一味从头棒将去，直要人向棒头拂着处豁开正眼，彻见自家境界，不从他得。”

马祖的棒打，终于回来了。

“此是彻骨彻体，独超千七百则宗门。”

圆悟老法师，以棒打而使门人开悟，这个棒打的，实际是宋元以来禅宗的文字化、文化化、经教化和净土化。

禅宗本有自己独立的个性，泯灭这个个性试图与文字、经教、念佛相融合，都是该一条白棒抡圆了照脑袋打下去的什么什么“化”，打他个七荤八素哑口无言再说。宋朝的文人士大夫在禅宗的发展上有一定的功绩，但宋儒的繁冗学风也弄到禅宗里，则也具有了赵宋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偏安一隅的味道。直气得原妙一类明师去闭死关、参话头，这和岳元帅“痛饮匈奴血”、辛弃疾“栏杆拍遍”是一个法门。而后人也去学饮什么血、拍什么栏杆，怎么不让圆悟怒而奋起千钧棒，没头没脸地打将下去呢？活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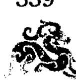
老法师不愧临济真传。

(2)汉月法藏。汉月法藏(1573—1635)重视寺院的经济建设，倡导农禅。在禅法上，法藏大师推崇参话禅，但他对“话头”作了新的解释，他说：

“所谓话头者，即日前一事一法也。凡人平居无事，随心任运。千思百量，正是无生死处。只为将一件物事到前，便生九种见解。所以流浪生死，无有出期。故祖师家令人于一事一物上坐断九种知见。讨个出格之路，故谓之看话头。”

大师是说，要参的话头，本是自己眼前熟悉的一事一法。把这一事一法用心去参，可以坐断各种知见，使你注意力集中于参上，这样才有人道的可能。

我们说，参话禅一法本是十分“险”，凡诸位修行人，可以问问自己的师父看是不是这样。而拿个前人的死话头让今人来参，这叫“险”上加“险”，走火入魔者众，入道开悟者稀。而法藏大师的功绩在于：他认识到古人的话头是他们把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拿来当话头，所以今人再参话头，就不能拿古人的话头来参，而是学古人用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来当话头参。大师为参话禅解放了一层束缚，这是法藏的功绩。打个比方，古人参“狗子有佛性也无”？那明朝的人就参“八股文有灵气也无”？而当今学参禅的人就该拿“股票有佛性也无”？来当话头参了。可以说法藏剥去了



话头的神秘外衣，使学人易于入手。

法藏也看到看话禅容易入偏，他总结出几种入偏的情况：

①有一等人，坐到身心空处，见个历历分明，便言是我本来面目……落于神我外道。

②又一等人见得空空，本来无物，身心世界荡然不存，以此为是，落于空亡外道。

③又一等人，只管于“本来面目”、“念佛者是谁”等话头上，讨个本性妙心，于是用尽肚皮里知见，千思万想，而不能离心意识去事上参究，……此类人用功既久，魔业已成，有人正言相劝，亦难醒悟……。

④又有一等于话头上参究日久，忽得前后际断，身心世界荡然一空，于是扫荡一切诸法……只求一味清净……此堕声闻禅也。或于话头见得无明本无，便陷溺“无处”……此堕缘觉禅也。

⑤又有一等人，参话头至紧要处，猛地有个省发，见得一切法空，一无障碍，若身若心，如空中声，如镜中影。在此空相中行履，如鸟飞空……堕在空静理上。

⑥又有一等人，于话头上透过知见，不为法缚，得口头三昧，机锋转语，买利快捷，但说得行不得。见地虽到而行处不到，……此即达体不达用之出格声闻禅。

其实以上六种出偏，诸位可参考《楞严经》中五十阴魔诸篇，后自知如何处置，恕不再多述。

总之，明末禅宗气象，日薄西山，小打小闹，毫无大家手笔。

明末的憨山大师叹曰：

“荆棘丛中下脚易，明月廉下转身难。”

是说这种夕阳西下之势，要想回转可是难了。也比喻人的观念，要想改变自己的一个固定观念或思维模式可太难了。我倒觉得总观明代禅僧，只此一句话是前人未言之言、未明之理，可算得上是明代最丰硕的成果了。

当然憨山德清大师主张禅与华严二宗融合，释道儒三教一致，这在客观上是扼杀了禅。但他在“入世行”中却讲出一定的道理，他说：

“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孔子，人乘之圣，故奉天以治人老子，天乘之圣，故清静无欲，离人而入天。佛，超圣凡之圣，故能凡能圣，无往而不入。”

他批评学人：

“各束于教，学儒者拘谨，学老庄者颠狂，学佛的人狭隘。”

在五花八门的现实社会中，各种教派有自己的功能，这一点上憨山大师是对的。别的就不讲了，实在是没太大的劲。

三、清朝，禅的终结

满清王朝，政治上是崇孔、倡理、尊儒，在思想统治上比明代还要严酷，在禁止文人结社、以文字治罪、禁锢人的思想等方面，可算是登峰造极。

清王朝对建寺和度僧都颁布过法律条文。

顺治十七年（1660年），清廷下令度牒免费发放，并可以师徒相传。这在过去是不成的，一个人要出家，就要有朝廷发的“僧人证”——度牒。这个度牒要有家人、乡里的同意证明或僧人的推荐介绍。同时在入寺当了“行者”后，要学习经典磨练心智，经过若干年的学习，还要考试才算“沙弥”，这时才发度牒，算正式僧人。《西游记》中孙悟空带发修行，叫“行者”，取了经回来后才真的算僧人有度牒。行者级的只是“准僧人”，算是个“实习僧人”。而顺治的度牒免费发放，造成是个人想出家就可以出家、想还俗就可以还俗，自由得过了分。

乾隆十九年（1754年），度牒索性被明令废止。这一回好了，连个证明全不需要了。雍正的“摊丁入亩”，以地产为收税标准，这一回没地的人出不出家全不用上税。真搞不懂清政府是怎么想的，是鼓励出家还是限制出家？没度牒不考试似乎鼓励出家，而只要你没土地全不用上税，出家在家一样，似乎又鼓励僧人还俗。当出家还俗来去自如后……我看清政府的这个政策是在鼓励大家努力成家生孩子，先把人口弄得多多的，养不起家小后再出家，当僧人当得有了些财产后再还俗去养家……

顺治重用的禅僧是“玉林通琇”，被顺治冠以“国师”称号。

清廷仍是重密宗。在对外政策上，顺治、康熙都发现西藏因信密宗后，再也不搬弄是非，而是愿意和政府合作并归顺大清。所以清朝历代皇帝更以尊崇藏密为安定国家、安抚藏蒙为首要任务，对不信密宗又屡屡造反的准噶尔以镇压。出于国家安宁的考虑，这本不失上策。雍正把雍王府改为密



宗的雍和宫，乾隆造承德外八庙以迎达赖，这都是上等的宗教政策。但对汉人的佛教就较严，而对汉人士大夫喜欢的禅宗，则开始了扑杀。

雍正十一年(1733年)，雍正给禅宗定了性，他说："无知妄说"、"外魔知见"是禅之弊。因为禅之一宗起源江南，江南文人多对清廷不满，文人又喜禅，……于是围剿铲除禅宗就成了雍正要紧的公事。当明令文人不能结社后，文人能聚集的地方怕是只有寺院丛林了。所以索性扑杀，留下三教九流都参加的庙会，那是另一个问题，而留下文人书生聚在禅堂论个什么议个什么，实在让雍正讨厌。于是雍正指责禅宗是：

"今其魔子魔孙，至于不坐香，不结制，甚至于饮酒食肉，毁戒破律，唯以吟诗作文，媚悦士大夫，同于娼优伎俩，岂不污浊祖庭？若不剪除，则诸佛法眼，众生慧命，所关非细。"

最后雍正钦定了禅宗如何才叫禅宗的内涵和外延，重订了"禅宗正道"或叫"禅宗正义"。

①宗教合一。雍正强调没有实际的修证功夫就永远不能开悟，而实际的修证功夫要建立在文学的基础上。如此一来，习禅必学"文"，同时雍正认为道教教徒同样可以明见本性。禅宗成了宗教，这是雍正的真实目的。

②禅净兼修。雍正认为净土法门是"正知正见"，他说：

"净土法门虽与禅宗似无交涉，但念佛何碍参禅？果其深达性海之禅人，净业正可以兼修。"

看来明中叶德宣所倡的"参话头与念话头"结合、元代中峰明本的"禅净合一"这些向文学靠拢的禅法为雍正所利用，以压制正宗之禅。

③禁止呵佛骂祖。雍正指出一些著名禅师不可以入编选的语录中。即：丹霞天然、德山宣鉴、大慧杲、高峰……他说：

"如丹霞烧木佛，观其语录见地，只止无心，实为狂参妄作。据丹霞之见，木佛之外，别有佛耶？若此，则子孙焚烧祖先牌，臣子毁弃帝王位，可乎？""如德山鉴，平生语句，都无可取，一味狂见恣肆。"

雍正真的没明白禅宗是什么，糊里糊涂把它装入佛教的口袋里，绝不让透出一丝触角来。禅，脱胎于佛教，但它的性质已不是宗教可以容纳和限制得了的，它是人们追求人性的张扬、追求精神的解脱、追求对旧的宗法网络、伦理网络的冲破的尝试啊。这是人性中最不守规矩但最有生命

力、最值得歌颂的力量啊。《孔雀东南飞》、《梁山泊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这些男女主人公哪个不似禅师一样试图冲破旧的束缚，还人性一个美好的可自由伸张的空间呢？

④贬黜颂古，创"雍正禅"。雍正对繁杂的文字颂古予以贬黜，其目的与其说是要还禅一个不立文字的本来面目，不如说是颂古源自宋明两朝而使他反感。所以在不立文字的招牌下，他自己创造了一种参禅法，即人们常说的雍正禅。具体怎么参怎么修没有记载，有记载的是他命十几位大臣于宫里闲房静室"参究"，自己亲自指导。于是这结果就不难预料了：

"自春至夏，未及半载，而王大臣之能彻悟洞明者，遂得八人。"

我看这八人早就悟了君臣之道和"参禅"之道。要是一两天就开悟，那太过玄、太过快，显得对雍正不尊敬。要是一两年还不悟他一个、半个人，一是让雍正失望，二是老吃素静坐，这些大臣也熬不住。斟酌的结果，是半年六个月开悟最妙——是"该开悟"的日子。而悟的道就更显得是从佛祖处取回的真经，不是无字真经，不是般若系的空无，而是"雍正真常系"了。曰：

"俗则居家，僧则秉教。为臣常忠，当子为孝。能尽伦常，即为玄妙。"

至此，禅宗彻底完结。

而禅宗的再次兴起，则是 20 世纪 30 年代铃木大拙和胡适之争为始的事儿，不是本书可以详述的。

在这一章，我们讲了元明清(至鸦片战争前)的禅宗发展概况。

这一时期的禅宗不论大江南北、不论临济曹洞，不是走入冷僻、就是走入教门。前者有闭关和看话禅，后者有禅净合一、雍正禅、禅儒合一。这不是禅宗的错误，这是历史的必然。

当封建社会走入兴盛时，于盛唐产生了禅，它是对人性的张扬。而那时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制度网络、儒家观念网络还有很大的宽容度，这使得禅得以蓬勃发展。

当封建社会走入成熟、走入腐朽后，这网络系统在收紧，而人性系统按照人类的进程仍在发展。这个冲突日益尖锐后，作为佛教一支的禅宗就不能承受这个冲突的重任了。能描写这种冲突、揭示社会背景、深究人性之本、宣扬人之灵气的载体，自然而然地从禅宗转向了戏剧和小说。







第三章

从《西厢记》到《红楼梦》

写到王西厢和四大名著之前，让我们驻步，先翻回头看一下。

如果说中国人的思想和情感从远古至宋末有那么几次辉煌的波澜，那无非指的是我国战国的“诸子百家”、魏晋南北朝及初唐的“诗歌”、中晚唐的“禅宗”。如果要给它们加个序曲，那就是《诗经》了。好了，我们把它们依顺序简化一下排列一下，就可以看出中国人思想和情感曾占领的阵地：

《诗经》→诸子百家→诗歌→禅宗。

这里面有什么有机的必然的联系呢？

首先，人性最有动力的那一部分，就是欲望的无止尽性。别一听欲望就觉得恶心和龌龊，欲望是全部生物界的一种本能，是向上的一种趋势，是一个人个性最鲜明的地方。从哲学意义上讲，这种无止尽的欲望，是“有限向无限的追求”和“短暂对永恒的想往”。从《诗经》中的“君子好逑”、“勿食我黍”、到法家的变法、到李白的诗仙、到马祖道一的“即心即佛”，都是以冲破陈旧的网络系统，使人的欲望得以伸张为目的的。它是神圣的、美好的、极富情感情绪的一面。

第二，人性中最具有社会网络意识的那一部分，就是对秩序、对安定的向往，它要求人性必须理性地去服从社会共性。秩序是全部生物界的一种自我规范，是群体要生存要发展的必然，因此也是社会要求一个人必须具有道德观念的原因。从哲学意义上讲，这种稳定和秩序的需求，是“量变意义上的积累”，是“承认阴阳（物质与意识）二者相互辩证存在共生

共荣”的一种“进化”。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到儒家的孔孟与道家的老庄、到李白诗仙与杜甫诗圣、到临济棒喝和曹洞《参同契》的回互……这些成双成对存在着的东西，以欲望为动力，以网络系统去建构，塑造出不同的历史阶段与文明层次。因为人性中必然有动力与网络意识，所以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是人类社会之必须，二者缺一不可。

第三，《诗经》、百家、诗歌、禅宗这四步曲，基本上由文人士大夫完成。虽然它们可能发自于民间，但劳动人民不能负担建构一个思想体系、一个艺术思潮之重任。可以肯定地说，在往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如果劳动人民没有更多的业余时间，那今后思想艺术的主流仍是由知识分子去发起、去主宰。

中国的文人，必须琴棋书画与诗辞文赋全通，方可称为文人，这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传统，不能光似明朝八股文好就叫文人，那是死文化。而琴有高低音域、棋有攻守战法、书有笔枯笔润、画有泼墨留白。于是咱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最重要的特质就是“阴阳相生、相克、相冲”，也叫“留有余地”。因为你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一端，所以在做事之前必须先想到并照顾到它的另一端，否则物极必反。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如果有的话，那这个绝对真理就是“世上真理只具相对性”。但要从禅宗曹洞一宗给我们的提示，可以这么认为：世上有个绝对正确的认识事物、生活、做人的方法——回互。也叫参同契，也叫辩证法，也就是八卦显示给我们的方法。

好了，我们已经用欲望、网络、文人这三点串起了诗经、百家、诗歌、禅宗的四步曲，可这有什么用呢？它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先别急，仍是要再分析分析。

《诗经》，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直抒情感的艺术；

百家，是哲学领域内意识形态的思想解放；

诗歌，是纯艺术领域内情感的宣泄与抒发；

禅宗，是宗教哲学（泛宗教、准哲学）中的思想探讨。

很巧，它们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了“情→理→情→理”的轨迹与印痕。

明了了这个情理转换的轨迹就够了吗？我们已经有了文人、欲望、网张、情理转换这四件法宝了。

还不够。因为阴阳相冲是需要一定空间的，所以当《诗经》的“在河之



洲"、到百家的七国纵横、到李杜的大江南北、到禅宗的西来与东渡……，可以看出其背景其视野是逐步放大的。很正常，因为人们的思想日趋复杂、情感日趋丰富、见识日趋宽广。

先把这五件法宝整理一下：文人、欲望、网络、情理转换、背景的扩大。至此，我们有了五件法宝，可以干点什么了。

咱们先看看咱们手头上的东西：元杂剧《西厢记》、明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清小说《红楼梦》。

第一，它们是文人所作；

第二，它们全是歌颂主人公欲望与理想的；

第三，它们都在与网络斗争或妥协；

第四，依时间的次序这五个作品呈现出："情→理→情→理→更趋复杂之情……"的特征；

第五，其背景由：普救寺→魏蜀吴之政坛→梁山→与西域各国→以荣宁府大观圆写出全国、写出三教九流、写出各色人等、写出风土人情……

我们只是想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所以尝试着把它们排列一下。也许这种尝试是错误的、失败的，是耗子药而不是螃蟹，但总是要有人先尝一尝、试一试。

如此就试出了下面的东西：

[情理回互发展表]

	序曲		第一幕：起、承		第二幕：转		第三幕：合
	情		**理**		**情**		**理**
第一层次	**《诗经》**	→	**百家**	→	**唐诗**	→	**禅宗**
第二层次	**《西厢记》**	→	**《三国演义》**	→	**《水浒》**	→	**《西游记》**
第三层次	**《红楼梦》**……						

"情理回互表"含有：文人、欲望、网络、情理转换、背景扩大五个因素。它的三个层次是紧紧相连的。

如果说咱们的推测有一定道理，那么就从《西厢记》到《红楼梦》依次展开，看看它们讲了些什么。希望诸位能喜欢这种讲法。

一、王实甫的《西厢记》

（一）元杂剧的形成与艺术形式

中国的戏曲艺术，可以说到了元朝才像模像样了。从戏曲这种说、唱、念、做的样式讲，它从原始歌舞、巫术、战国时的“俳优”、西汉的角觝（百戏）至唐宋的歌舞一脉发展而来。从它逐渐复杂曲折的情节、人物遭遇看，显然来自佛经故事的“变文”、唐传奇、宋话本。同时诸宫调的乐曲、曲白结合、傀儡戏皮影戏的舞台调度、戏剧结构，舞蹈的身段扮相……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才有了戏剧。可以说有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刘知远诸宫调》、《碾玉观音》、《错斩崔宁》、《唐诗》、《宋词》、即心即佛、《参同契》……后，才可能有这情理回互表上第二层次——“序曲”位置的杂剧。

杂剧可以说是第一个层次的总结和最高成就，同时也是第二层次的“序曲”。

杂剧的体制，是一本四折演一个故事段落，几本（通常四、五本）算一个完整的故事。“折”是音乐组织的单元，也是情节发展的自然段落。

杂剧的角色由“正末”或“正旦”独唱，其他角色只有说白，称“末本”、“旦本”。

杂剧有“宾白”，就是人物对白或独白。

杂剧的表演叫“科”，如做哭泣状叫“做掩泪科”。如今我们常说某某演员科班出身，这个“科”字就是指正规的表演之意。

杂剧的创作多是文人，如《窦娥冤》、《望江亭》的作者关汉卿、《墙头马上》的作者白朴、《汉宫秋》的马致远、《潇湘雨》的杨显之等。因元初废止科举，文人大多无出路，所以有机会接触戏曲的创作表演人员。而戏曲正因为情节和人物的简单而限制了发展，所以文人写戏、戏班子演戏、文人再捧场、另有在媒体工作的文人炒作宣传，齐了！元杂剧在蒙古人统治下的元朝，以汉人士大夫为创作骨干、以专业艺术单位为主体、以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以极具情感震撼的艺术魅力……诞生了。

（二）《西厢记》的故事梗概

唐朝，崔相国去世，夫人郑氏携女儿崔莺莺、丫环红娘、小儿欢郎及家



人扶棺柩回老家安葬。因孙飞虎作乱(藩镇割据之争),被阻于河中府(山西永济),无奈,只好在普救寺(浦关镇外)住下。一退休就没人理了,看来古今没什么差别,不用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

洛阳书生张君瑞(白马王子来了),父母双亡书剑飘零,想起蒲关上有一八拜之交的好友武状元杜确,于是打算去走走门路,以便能从边塞一路弄个前程。到蒲关必经普救寺,远远看见了貌美的莺莺,起了坏心眼,也借住进普救寺西厢房。两人同在寺里住,一来二去眉目传情,二人各自留心。

河桥守将孙飞虎有五千人马,听说老相国的女儿如今住在普救寺,就进兵河中府,围住普救寺,要娶莺莺为妻。寺里一团混乱,没了主意。郑夫人急了,说谁退贼人,以莺莺妻之。张生出招,献策投书去蒲关请杜确解围,而送信的是个喝酒吃肉爱打架的武僧惠明(《坛经》上追六祖慧能的那位,又到这里挂单儿),诸位该出来的角色一应俱全了。惠明出马当然没问题了,于是请来杜确、退了孙飞虎、定下张生与莺莺夫妻名分,一切平安。

谁知尘埃落定后,这郑老夫人反悔了约定。因为莺莺原是要嫁她郑家的娘家人,即侄子郑恒,所以老着脸不认账,让张生和莺莺以兄妹相称。当然了,张生一下子就病得玉树临风般地弱,莺莺也"玉容深锁绣帏,离恨千端,闲愁万种"地愁了。

一个生病、一个没精神,急坏了红娘。她见"一个笔下写出情,一个弦上传心事;两下里都一样害相思",同时恨老夫人悔约,实在看不下去了,索性给二位通风报信,搓合二人私会。这个私会约等于未婚同居,红娘的胆子可不小。当然,需经过一番"着急科"、"害羞科"、这科那科……千般蹂躏、万种坎坷,但二人终成事实夫妻确凿无疑。

郑老夫人发现后,拷问红娘(《拷红》一戏从这儿出),谁知反让红娘数落了一番:什么"言而无信"啊、"张生非慕小姐颜色,岂肯区区献退军之策"啊……"辱没相国谱"啊……反正是不如"成就大事……岂不为长便乎?"比苏秦张仪都能侃,绝对的"电视红娘"之祖师奶。

郑夫人无奈,只好答应婚事,但规定张生必须考上状元。于是有了十里长亭相送的戏:"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反正咱已不知唐时的科考是春天还是秋天,依这个北雁南

飞，永济的柿子都熟了看，怎么也得十一月底，怕是今年误了期也。戏，不能乱考证，要紧的是情节，是离人泪，是张生和莺莺爱得真、爱得铁。不似今人，一进北京就变卦。

半年后，张生中状元。因皇上派了公务，要再耽搁些日子方回。崔家上下、普救寺众僧全欢喜一团。此时郑家公子郑恒落榜来到普救寺，要依父母之约，娶莺莺。这郑恒鬼点子太多，谎称张君瑞在京城中状元后，被卫尚书家小姐抛绣球给招了赘。郑夫人真是老糊涂了，一听就信，又把莺莺许给他，让他拣日过门来。

此时张君瑞被派授河中府尹，是白马将军杜确的上级。杜确来寺等张生，张生回寺后，才知郑恒掀风波。一场对质，郑恒无颜，一头撞死。

当然，故事结尾是"张君瑞庆团圆"了。

依通常的说法，此剧的主题叫"有情人终成眷属"。

（三）《西厢记》之魂，情的张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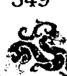
前边，我们大着胆子排了一个"情理回互表"同时讲了从《诗经》到《红楼梦》所具有的"五个共同点"，也叫"五点法"。现在咱们就拿这"一表五法"来分析一下《西厢记》。

第一，从"情理发展表"看《西厢记》。从表中可知，第一层次是《诗经》、百家、诗歌、禅宗；而《西厢记》在第二层次第一位，是和第一层次第一位的《诗经》处于相同地位。所以，它也是以直抒胸臆、以情动人的艺术方式打动人的，对人性中人的情感的张扬是其所长。因为它处在第二层次中，所以无论人物特点、情节、背景、艺术性上，都要比《诗经》高整整一个等级。

同时，因为它处在第二层次第一位，所以它开启了整整一个新层次的思想艺术之发端。作为艺术性的发端，是情节性曲折、人物形象鲜明、背景要求与历史真实很贴切，同时又必须是诗、词、赋、文各种文学形式的综合体；作为思想性的发端，是其辩证性。它已不是某种思想或某种情绪的单一的抒发，它要求有矛盾。一种思想如果说是左，那必须有右的思想予以冲突、调和；一种情绪如果说是向上，那必须有一个向下的情绪与之矛盾而冲突、调和。

下面一一细品。

（1）情节的曲折：这可以从故事整体看。莺莺与张生两情相悦，本是



很简单的事儿。但剧中安排了相遇、借住西厢、相会、白马救寺、定婚、称兄妹、诗琴述情、红娘引线、长亭告别、草桥夜梦、中状元、郑恒说谎、杜确迎官、双方释疑、郑恒死、大团圆。全剧起伏错落一波三折，这就奠定了第二层次的哲学、艺术绝不是简单一句话、一件事可以讲清的事情。它首先要求结构复杂、情节曲折，只有如此方能引人入胜。

一个简单的即心即佛，简单的参同契，一句入木三分的"落花流水春去也，换了人间"是不成的。

(2)人物形象的鲜明：张生张君瑞，在第一本第一折中自述自己的报负：

"……暗想小生萤窗雪案，刮垢磨光，学成满腹文章，尚在湖海飘零，何日得遂大志也呵！万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

想必这时的张生和杜甫登泰山一样"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盛与轻狂。但在普救寺看见莺莺后，立刻志向又变了：

"[赚煞]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空着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休道是小生，便是铁人也意惹情牵。"

惨了，年青后生见莺莺，什么万金宝剑啊、满马春愁啊，没用！只要你是人，不是泥人铁人，原子弹都挡不住这两情相悦。所谓人物性格生动、真实就在这里啊，理性和报负是一回事，情感情绪上来，怕铁人也动情。而情理的相互纠缠，正是这一层次所要求的。

小姐崔莺莺，在第一本楔子中时，是：

"[幺篇]可正是人值残春浦郡东，门掩垂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父亲刚去世，要嫁的郑恒口碑怕是差了些，这一切让莺莺无可奈何，一切都没了希望。无精打采地去正殿上香，远远看见张生，好了，一下子乱了方寸：

"(红云)那壁有人，咱家去来。(旦回顾觑来，下)"

临走临走，还要回眸生百媚地看张生一眼，完了，张生给吃定了。咳！人是复杂的，刚死了爹就想勾引男人……这是这个层次必须承担的重任啊。话说回来，我想王实甫老先生想当年定有这被哪位小姐吃定的经历，否则不会把这一招记得这么准、这么狠、这么清楚。

红娘，小姐的丫环。初见张生，张生就报上名字、籍贯、出身、婚否

……红娘怒：

“先生是读书君子，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君子‘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道不得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俺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先生习先王之道，尊周公之礼，不干己事，何故用心？早是妾身，可以容恕，若夫人知其事呵，决无干休。今后得问的问，不得问的休胡说。（下）

（末云）这相思索是害也。”

红娘简直是机关枪，把儒家理学的一套背得滚瓜烂熟，让张生也断了念头。然而在她发现莺莺和张生真诚相爱后，又搓合二人成了夫妻。事发，老夫人让红娘去叫张生。

“（末云）小生惶恐，如何见老夫人？当初谁在老夫人行说来？

（红云）休想小心，过去便了。”

这个张生胆子够小的，事倒如今，反怪红娘在老夫人那儿给说穿了。红娘气得埋怨：

“[小桃红]既然泄漏怎干休？是我相投首。俺家里陪酒陪茶倒搁就。你休愁，何须约定通媒媾？我弃了部署不收，你原来‘苗而不秀’。呸！你是个银样蜡枪头。”

红娘对张生这一反一正的两种态度，是以二人之情为准的。二人无情时，以理学拒之；二人有情，就替他们扛着，恨他们中看不中用。总之，红娘这个人物生动活泼招人喜爱，正因为把她放在这个戏的环境中才有这种感觉。单就她这个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就不如张生和莺莺了。张生和莺莺作为主角，人性中情与理的两个面全有反映，而红娘只有一个面。作为配角儿，也就罢了。而《红楼梦》中的晴雯就比红娘要丰富，她有红娘的一切优点，同时她内心的另一面在“宝玉探晴雯”时方才流露。她拉着宝玉的手说：“早知如今，何不当初！”这是她心底里藏了一辈子的女孩子的真话：早知如今让人冤枉咱俩，何不当初咱俩真好呢？红娘的角色差就差在这里了，她把自己藏得很深，大家不知道她心里的酸甜苦辣、不知道她的内心世界。

因其他人物更是配角，统统单一。这种描写配角比较单一方法用在戏剧（杂剧）中是可以的，它的任务只是为主角服务，并尽量不占篇幅。可作为文学作品认真地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地分析，就显单薄了。这也是这



个层次欠缺之处。

咱们看看中国人情与理的辩证在作品中的体现。该剧写了三个主要人物，我们可以壮着胆子下一个定论："艺术形象真实、生动、鲜明的人物，必是他情感与理性冲突的结果"。

这里面可能有以下几个情况：

①如果主人公没有情绪情感的要求，没有任何冲动，完完全全是理性的良民，那这个人连阿 Q 都不如，这叫枯石人，禅里叫枯石禅。连《祝福》里的祥林嫂，最后还有个捐门槛求下世做个人的希望啊，连这个希望都被打破后，这个人就完了，彻彻底底被摧毁了。

②如果主人公情的要求是正当的，理性的限制是过分的，那将会是悲剧。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杜十娘、牛郎织女、宝玉黛玉。

③如果主人公的情的要求是过分的，理性限制是合理的正当的，那将是一场捍卫真理的战斗。如某某犯法记、某某灭亡录。

④如果主人公的情与理最后归于协调、平衡。好，大团圆，《西厢记》就是这类作品，这咱们放到下面再讲。

(3)背景与历史真实的贴切。西厢记的故事发生在永济的普救寺。首先是真有这么个地方、真有这么个寺。它临黄河，距风凌渡渡口 60 公里，离蒲口渡口(杜确镇守的浦关镇)约 40 公里。此寺确实是武则天的香火寺，武则天又信佛，这一切让你相信。文艺界门里话叫"歪戏正拍"，意思是假的故事一定要放到真实背景中，确有其事似地去拍。当然孙飞虎的割据、唐朝科举、有钱或门第人家抛彩球招赘……这一切都尽量真实，使这故事生了真实可信的根。

(4)各种文学形式的综合。可惜，大家拿剧本一看便知，但咱们不能发本剧本，只好摘一小段，以飨诸位。

《西厢记》第三本张君瑞害相思杂剧。第三折：

(红上云)今日小姐着我寄书与张生，当面偌多般意见，原来诗内暗约着他来。小姐也不对我说，我也不瞧破他，只请他烧香。今夜晚妆处比每日较别，我看他到其间怎的瞒我？(红唤科)姐姐，咱烧香去来。(旦上云)花阴重叠香风细，庭院深沉淡月明。(红云)今夜月明风清，好一派景致也呵！

[双调][新水令]晚风寒峭透窗纱，控金钩秀帘不挂。门阑疑暮霭，楼

面敛残霞。恰对菱花。楼上晚妆罢。

[驻马听]不近喧哗，嫩绿池塘藏睡鸭；自然幽雅，淡黄杨柳带栖鸦。金莲蹴损牡丹芽，玉簪抓荼蘼架。夜凉苔经滑，露珠儿湿透了凌波袜。

我看那生和俺小姐巴不得到晚。

[乔牌儿]自从那日初时想日华，挨一刻似一夏；见柳梢斜日迟迟下，早道"好教贤圣打"。

[搅筝琶]打扮的身子儿诈，准备着云雨会巫峡。只为这燕侣莺俦，锁不住心猿意马。

不只俺那姐姐害，那生呵！

二三日水来不沾牙。因姐姐闭月羞花，真假，这其间性儿难接纳，一地里胡拿。

这湖山下立地，我开了寺里角门儿。怕有人听俺说话，我且看一看。（做意了）偌早晚傻角却不来，赫赫赤赤来。（末云）这其间正好去也，赫赫赤赤。（红云）那鸟来了。

[沉醉东风]我只道槐影风摇暮鸦，原来是玉人帽侧乌纱。一个潜身在曲槛边，一个背立在湖山下；那里叙寒温，并不曾打话。

（红云）赫赫赤赤，那鸟来了。（末云）小姐，你来也。（搂住红科）（红云）禽兽，是我你看得好仔细着，若是夫人怎了。（末云）小生害得眼花搂得慌了些儿，不知是谁，望乞恕罪。（红唱）便做道搂得慌呵，你也索觑咱，多管是饿得你个穷神眼花。

（末云）小姐在哪里？（红云）在湖山下，我问你咱，真个着你来哩？（末云）小生是猜诗谜的社家，风流隋何，浪子陆贾，准定挣扎帮便倒。（红云）你休从门里去，只道我使你来。你跳过这墙去，今夜这一弄儿助你两个成亲……

我想诗词文赋、说唱科白俱全，大家一看自知，不用我再介绍，显得啰嗦了。

说些题外话。《西厢记》在很长时间里被打入禁书，原因是宣扬情欲，于是后世正经文人的学问全用到诗词文赋的考据里。更有一类文人，在今天这么个年代里居然要钻进词或赋的创作里去，怕是走火入魔了。当词和赋是咱们先人当作最高文学艺术时，他们就走得很远很远。如今的人，大学毕业后再研究词赋，已比前人从小研究晚了十几年，等弄明白了

再去搞创作，怕是三四十岁的人了，创作激情已不适合搞这些。我看大家用现代汉语、现代语法写一些古代或现代的作品，来歌颂爱情，岂不是事半功倍么？

以上四条，是从“情理发展表”看《西厢记》。

第二，以“五点法”看《西厢记》也就是从“文人所作、欲望、网络、情理的转换和背景的扩大”这五个点看《西厢记》。

(1)文人所作。作者王实甫，想必是个文人。琴棋书画精通，偎红依翠全会；浅斟低唱加长醉，挑灯看剑志难遂。于是和戏曲界合作，写出惊世骇俗之作。如果没有文化艺术的功底，没有对情爱深刻的体会，怕是写不出这么好的作品。

(2)对情欲的歌颂。对情欲的歌颂，是对即心即佛的歌颂，不论你多么赞美爱情也不过分。

在人类的全部行为中，对欲的追求是人类进步的动力，而情欲更是主力。

(3)与社会、家庭等网络系统的妥协和共处。常见有专家批判：红娘那么能干，为啥要甘心为人做下人？张生与莺莺为何不私奔？凭什么非要张生考上状元才能成婚？这是人为痕迹的才子佳人等等等等。

于是我也联想下去：凭什么祝英台要死？为什么她不和梁兄私奔？织女为啥要回天上，她应该和牛郎死也死在一起……

一个人，除了具有个性的自然属性，同时他必须具共性的社会属性，这个人才是社会人，否则是神话中的人。张生和莺莺，在社会习俗认可的条件下去花好月圆，我不知错在了哪里。社会网络规范着人的理性，人的理性束缚协调着人的情欲，如此而已。这是社会与个人、现实生活与个人情感的冲突，古今中外都存在。人人一钟情就私奔？这个社会不乱了套？未婚的、已婚的、老的、少的……只要对了眼就双双“扯乎”？这种戏还是谁高明谁来编。

每个社会时代不同，它的网络宽容度也不同。人类文明总是以爱护人性中的“欲”而逐步放宽社会网络的宽容度。当今的人，张生一见莺莺，马上上前问曰：“小姐好靓！愿意让我陪您喝杯咖啡么？”莺莺回眸，心里乐意则说：“不好意思，打扰你了。”心里不乐意，喝道：“干你娘！走远点。”完了，挺麻利的，没那么多啰嗦。那个时代，郑夫人愿意女婿是个状元，没

什么不对。如今这个时代，不是也有若干夫人急着问："女儿，他是中国人？外国人？""他是老板还是打工仔？"当然不会问："他是状元还是白丁？"可这老板与唐时的状元有什么区别？诸位凡是有儿女的都品一品。当然，尊重子女的意愿是一回事，但作为家长要有自己的意见吧，你们说呢？我倒不想让我女儿找个什么老板，但找一个能考上状元的才子、找一个能有所作为的年青人何错之有？也许今后的事实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我有愿望，我希望女儿也有愿望。愿望、希望，乃心之所趋，这应该是佛啊！即心即佛之佛啊！佛，就是一个人活得有信心、有希望，办事也有信心、有希望，对他人也有信心、有希望的常人。人的一生虽然常常让人骗、常常受打击，可是受打击的是"我"的身体和对"我"的待遇，"我"的心、"我"对人生的希望任何人也打击不了！除非自己去摧残它！

美好的希望在社会里肯定会受到打击、压制和限制，但这又有什么？美好的东西永远是美好的、希望永远是佛、佛心则是悟道之心。如此简单，就怕大家不信。

所以，我们别批评王实甫守旧啦、为封建的才子佳人歌功颂德啦……王老先生费心劳神地让张生考上状元，让老夫人、莺莺、红娘连带着杜确、老方丈都高高兴兴地喝喜酒，观众也乐得半醉，郑恒也气得撞死……多美妙的事儿啊。好了，你这么一批评，非让张生落榜回来娶莺莺？成了，郑恒也不死了，非要依前约抢走小姐，老夫人急得休克，红娘大骂张生才疏学浅，小姐一羞上了吊，老和尚去念经，杜确去守关，大家边散场边骂编剧王八蛋……只有你在那儿点头曰："这才革命化。"

什么是艺术？艺术是人之意欲的歌颂。

什么是名著？名著是人类希望的赞颂。

什么是悲剧？网络系统压死这欲、这希望。

什么是喜剧？网络系统宽容和成全这欲和希望。

什么叫美？人的意欲在网络中茁壮成长。

什么叫丑？人的意欲和网络两败俱伤。

(4)情理位置的转换。《西厢记》，前有理性的禅宗，后有理性的《三国》，它本身属情感型。每一层次的第一个位置都是情感型，最后一位都是理性。所以每一层次的四个阶段都是以情感发端，结束于理性上。

再让我们看一下"情理回互表"你还可以总结出：



第一层次的哲学与艺术：无情节、人物少且表现人性方面单一，背景模糊，艺术形式单一、思维方式单一（如《诗经》）。

第二层次的哲学与艺术：有情节，但单线发展；人物多，主要人物才刻画出他人性的两个面，次要人物性格单一；背景清晰；艺术形式多样，思维方式多样（如《西厢记》）。

第三层次的哲学与艺术：情节复杂，结构宏大，事件平行展开；人物多，大多数人的性格都写出两个面；背景更加清楚，与大小历史事件联系紧密；艺术形式多样，思维方式多样，呈立体感（如《红楼梦》）。

话又扯远了，再扯回来。

（5）关于背景。因为在前文已讲过，所以不再重复。总而言之，我习禅的经验是：学会一个好的法门，将事半功倍。我学中文的经验是：学会用好的方法去看作品，将事半功倍。

刚才我们是用“一表五法”去分析《西厢记》的，繁琐了些，希望诸位能喜欢。

（四）《西厢记》对中国人思想和情感的影响

首先，作为杂剧，它是中国这块土地上诞生的更高一个层次的艺术。这里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一大批文人为此做出了贡献。

《诗经》的诞生，是源于人民的。杂戏的诞生，也是源于人民的，是文人与艺人与劳动人民三结合的产物。它的诞生，怎么说也不亚于《诗经》的诞生。杂剧艺术，开创出一个广阔而又崭新的天地，使中国人从容量极小的诗文赋、百家理论、禅宗思潮找到了合理的位置及再发展的可能。它上承第一层次的成果，下启了明清小说这恢弘的画卷。

第二，如果说关汉卿的《窦娥冤》是人民对不公正的呐喊、是愤怒，那王实甫的《西厢记》则给了人民以真情、以希望，或者是一个美梦，它影响了明清至今数不清的中国人。从《红楼梦》到《家、春、秋》、《雷雨》，中国人在顶着禁书的风险，小心地珍藏它爱护它。它使中国人明白了最美的、最值得歌颂的是什么——是情；同时也使中国人明白了怎么歌颂它——是情与理、个人与网络的辩证。这是从《诗经》的“君子好逑”、到《孔雀东南飞》、再到《长恨歌》所没有的理性与情感的结合，同时此情美得那么真、那么洁、那么温馨。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最终明白了人活于世要有情，要有义。这个情和义一旦上升到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就是马祖道一的即心即佛。禅门里讲爱佛、敬佛、要客气、不要伤害它，讲的都是要爱自己的心，亦即爱自己的希望、要敬自己的希望、要很客气地待它，不要轻易地刺激它和否定它。同时要如石头希迁一样，要明白情与希望要和理性相回互，要使个性与共性相《参同契》。

一个人，很想当个作家，很用功很吃力地写，日以继日、年以继年。他的母亲总会劝他："孩子，别累着，慢慢来，有的人早成才，有的人大气晚成。"只要此人还是这块料，那他一定会有成绩，因为有菩萨在保护他，这菩萨是他的母亲。如果一个人对他说："歇了吧，就凭你这料，当柴火烧还嫌湿，别想成什么作家。"如果此人真的不是干这行的料，这话尖刻些还算没走火入魔。如果只是一味地打击一个人的希望，那这个人是魔。因为你真的看出此人写作不成，可以劝，可以让他试试别的，但对他的希望仍要像敬佛一样地爱护，不要以灭佛之心去伤害一个人，因为你伤害的是他的心灵。

我们举过鲁迅《祝福》的例子，此处再来打个比方。如果祥林嫂急急忙忙地找到你，问："真的没有下世？我那十几块大洋的门槛白捐了么？"你如何回答？可能正人君子无可奈何地点点头，说："真的，那是迷信！"于是祥林嫂去砍门槛、去要饭……于除夕之夜绝望地冻饿而死。可如果你是个爱说谎的小人，你可能说："阿嫂，真的有下世，你别去砍门槛。这东家嫌你是他不懂，你再换个地方去打工试试。"结果如何呢？当然，鲁迅讲的是个封建迷信问题，是社会问题，我现在是在讲一个心理学上的问题，是人性之灵之希望的问题。

可能你还不服气："难道美丽的谎言比严肃的真实好么？"是的，在这里要好上千百万倍。一个人得癌，只能再活三天，但一直瞒着病人……于是难得一见的单位领导来看望他，说："好好休养，别的甭想。"平时一脸正经的工会主席来看望他，问："还有什么要求？"八百辈子不来往的亲戚朋友也来看望他，曰："气色还……可以……"我看这位老兄不瞎想才怪。好了，正在这时你来看望他，他把别人支开，单独和你在一起，紧紧拉住你的手，两眼真诚恳切地望着你，说："哥们，咱们相处三十几年了，一直亲如兄弟，请你告诉我这病是不是癌？还能活几天？"好了，看你怎么回答。你要

是个"正人君子",那你就是魔,因为他的身体有病,但心没病,希望之光在闪烁、生命之烛在燃烧。你严肃而真实地讲完,我敢说他那眸子里的那点神光一下子就散了,一切全完了。你要是个假菩萨,你可能编一个谎言:"没什么屁事,只是良性瘤,十年八年死不了。"只要这老兄不缺心眼,怕是这话他根本不信。从来看他的人们的语言、从特护病房的环境、一个个紧张的亲友、吓得走路都轻悄悄的孩子们……他越发断定你是假菩萨。因为你的谎言只是谎言,它不艺术,不美。而真菩萨会讲一个生动的美丽的谎言,连佛都掉泪的谎言。你会悄悄地说:"哥们,不瞒你,真他妈的玄。"他会问:"怎么回事?快说啊!"你悄悄地:"你原先不是住四楼九室二床么?结果化验室把他妈的九楼四室二床的单子给你弄混了,你本来只是个瘤,没什么屁事,可这一混,你们家和你们单位都接到了病危通知书,说是活不了三天两早上了,于是领导和亲友全来看你。"于是他撑起头问:"真的?"你仍是悄悄地:"咱哥俩我骗你干什么,三十几年的交情了,我骗过你吗?"这时他一定坐起来,连声说:"没有啊!""对吧!告诉你,今儿早上九楼那位真得癌的死了,人家家里人来闹,说什么只是瘤子,怎么没一个月让你们医院治死了?""什么?那位病友已死了?""别打岔!听我说。这时医院才发现是四、九、二的单子和九、四、二的单子弄混了。这不医院正开会,说是让你家里人受了精神伤害,所以就在出院前不搬出去了,以作为精神补偿,你老婆同意了。可是你还要装着是得了要死的癌,咱得占着这特护病房,否则人家有意见。"这时你再安排一个凶巴巴的护士进来,说:"起来起来,打针!告诉你啊,别以为没事了就可以抽烟,抽一支罚十块!"我想你是真佛是活佛,你说的是佛经——美丽的谎言;你崇拜的是佛——人性的希望与情;你信的是禅宗——又鼓励又回互着人之心。

《西厢记》难道不是这么个谎言么?王实甫难道不是个佛么?人活着不是为了个情、为了个希望么?

二、罗贯中和他的《三国演义》

如果把《诗经》作为第一层次的序曲,那这第一层次的第一幕就是诸子百家的争鸣。其结果是在近百年里最后定尊于儒家,以道家佐之。而《西厢记》算第二层次的序曲,那这第二层次的第一幕,就是小说《三国演

义》。其结果是在近五百年里，把中国人的思想品质定位于“忠”、“义”，而以正根、正宗、正名分为忠义之所归。换言之，忠于国家、义于他人。国家，是刘姓之汉室，他人，为同是君子之人。

如此评价《三国演义》，不是从文学、史学或什么什么学上看问题，而是以社会的发展和流动中，于滔滔的历史长河中去看问题的结果。也许我口气大得吓人，其实我是硬着头皮壮着胆子说话，我试图从历史长河中去看《三国》，眼花走板怕是在所难免，但我会尽量聚精会神地去看。

（一）《三国演义》的里程碑作用

今人常以某某是“封建脑瓜”，是“封建主义”来做口头禅。什么是封建呢？封，含有疆界、界限之义，又含有密闭、闭合之义。《说文》释曰：“封，爵诸侯之土也。”就是帝王把土地给侯爵，侯爵把土地租给人民，人民种地交租；侯爵只能吃自己这块封地的租税，不可跑出自己的封地乱吃别人封地的租税，这就是封的两个含义。建立在这种样式上的政治制度叫封建。

依马克思绳子、麻袋、土豆的比喻，封建社会就是以封建制度建立起的社会叫封建社会。它的模式是：皇帝是绳子，他束紧一个大麻袋，麻袋里有若干小的麻袋（小麻袋即是封地。封地随着历史发展而演变成地主、庄园主和其他庙产皇家领地等形式），及若干零星漏网的“耕者有其田的农民”。而这些漏网农民和小麻袋中的农民称为土豆，这就是封建社会。

什么是封建主义？封建主义是农民依附土地，土地归领主或地主所有，于是农民依附领主、地主，领主、地主依附封地领地。因这封地领地是皇上所赐，所以地主、领主依附皇上。简化一下，则：土地为一切的根本，农业为一切的关键，农民依附地主、地主依附皇上，这叫封建主义。

什么是封建意识？这种层层依附就叫封建意识。下层人要依附某个中阶层的人，中阶层的人又依附高高在上的皇帝，而这一切又是牢不可破地封闭着，叫封建意识。简言之，上尊下卑就是封建意识的魂。

儒家的理论不是君臣父子么？那君君臣臣是什么意思？

这是儒家作为第一层次的核心理论，它肯定和维系了封建主义的依附关系，肯定维系了封建意识的上尊下卑。

那父父子子是什么意思？



父父子子就是儒家的第二层理论，即宗法制。一切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全是建立在这个宗法制上的。宗法制说到底，是一夫多妻，而结发夫妻之长子有继承权，为嫡出。如果是普通劳动人民的一夫一妻，则要求妻子要生儿子方可承家业，多个儿子时以长子为承业的主要后人。嫡出长子继承家产的意义，是确保财产不流失到本血缘关系以外去。

书归正传。

我们讨论了封建与儒家，讨论了儒家的两个内涵意义：君臣父子——上尊下卑与父父子子。这和《三国演义》有什么关系呢？《三国演义》直接和间接地是歌颂忠与义。

忠，忠于皇上，这是在维护君臣关系；义，是为了刘家血脉，这是维护父子关系。刘备姓刘，查宗谱乃当今皇上之叔，这刘皇叔就理所当然地让关羽、诸葛亮去忠了；而刘皇叔的老婆孩子就是皇后和太子，于是不论是关云长千里送嫂还是赵子龙单骑救阿斗，都伟大得很。

既然是忠义之士，那肯定是君子，他们不爱财色、见钱不要、见女人眼不斜，他们一诺千金、天庭饱满、地阔方圆……关云长，正宗的忠义之相。

整个《三国演义》流传至今，刘备早已让中国人忘了，诸葛亮以聪明和忠流传万代，曹操一直在让人骂，成了略次于秦桧的奸人，赵云仍是一员猛将，蒋干仍是小丑……只有关羽，从忠义之士一路地上升，随朝代的更迭已升到“盖天古佛”。这实在是出乎罗贯中的意料了。

1. 盖天古佛关云长。要说《三国演义》有什么里程碑的作用，那就是关羽的忠义。这忠义于500年来，在中国人思想和情感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了中国人不解的情义之结。我所讲的里程碑的作用，是说中国人心理功能上的里程碑的作用，是儒家忠孝思想通过关羽使中国人敬佩、尊崇的忠义孝廉的品质，是这个里程碑。在此之后的500年里，中国人深深地埋在心底里的忠，反抗着满清政府、反抗着列强瓜分、反抗着日本侵略者、召唤着中国人“万众一心”“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而中国人深深地埋在心底里的义，使中国人不耻于为利忘义的商场、痛恨为利忘义的卖国贼、看不起能说能侃不担义务的小人；孝，使中国人敬老爱幼；廉，使中国人廉洁奉公……这些德行实在是中国人最津津乐道的君子德行，是气贯长虹的准关圣的品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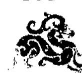
再引申，关圣还能保佑吉祥、避凶趋吉、抽中彩票、生个小子……反正

该他管的他管，不该他管的他也管。刘备和诸葛亮只是小说中人，关圣是中国人心目中人。关圣管陆地、妈祖管海上、观音管天上，直接管人的是谁？仍是皇上。海、陆、空、人全有了主人，说明了绳子麻袋与土豆的关系，证明了上尊下卑君臣父子是天理，这就是《三国演义》的作用。

不要去分析什么优点缺点、是本好书是本坏书，这第二层次的一切哲学和艺术本已复杂得要三天三夜方能理出个头绪，岂是一言就能蔽之的？

2. 万世师表诸葛亮。整个《三国》让中国人记住的第二个人是诸葛亮。诸葛丞相的祠堂至今仍在成都，武侯的万世师表使中国人念念不忘。人们怀念他，并不是因为他如何地丰功伟绩，六出祁山之败、街亭之失算、挑拨吴魏两家之阴……这一切并不抹杀人们对他的崇拜。杜甫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一切失败过错非旦不能减低他的光芒，反而让人更加敬佩。"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杜老夫子一言中的。因为中国人在这里反而不注重客观效果，却是重主观动机。丞相一生为国为民累死五丈原，实乃"一生谨慎，鞠躬尽瘁"的典范，这是中国人最最希望出现的官吏，也是中国人心底里深藏着的诸葛亮情结。一件事情，问心无愧地去做，辛辛苦苦地去做，那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海瑞这么做了，于是南京人身着白衣，沿长江连绵百里为海大人送丧。我不是瞎说，这是正史有记载的。周总理这么做了，于是北京人于寒风中戴着白花连绵十里为总理送行。我也不是瞎说，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中国人的美德，很大程度上是敬业地、勤劳地去做，只重耕耘不问收获，或者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天灾人祸而颗粒不收，是天之过，你种不种、耕不耕是你的责任。身在其位，干好本职工作是丞相万世师表的遗风，这就是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之一。

在三国问世之后，中国人、日本人、东南亚人……人们在深深地怀念丞相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以丞相为榜样塑造自己。西方人以实用功利为准，他们不理解东方人，不理解为什么一件事根本没成功的可能或可能性很小的事儿，东方人仍认真仔细地干着？谁知偶尔地竟然还干出了惊天动地的结果……西方人实在真不明白。其实东方人只是崇敬脚踏实地干，那结果本与他没太大的干碍；愚公移山只管去移，最后移得走移不走是后代的事；红旗渠要一锤一锤地凿，只要凿着，那总有一天会有渠。于是有了，有的让西方人困惑、让东方人心里偷偷地乐。



说实在的，忠义的关羽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丞相是《三国》给中国人心理路程上立了一块碑。我们当今的中国人，要学会忠于祖国、忠于职责、仁义他人、克己谨慎、多重耕耘、少谈收获、敬重先贤、鞠躬尽瘁就上承《三国》之风下启21世纪强盛之中华了。例如雷锋、孔繁森，我看这么去学《三国》才有意义。非要考证它与《三国志》的区别叫考据；非要论证愚忠、愚义、愚孝、愚干……的利弊好坏，叫无用的学问；非要告诉后人忠不可盲目、义不可草率、仁不可乱用、孝不能无原则、干活要先看收获……这怕是汉奸。最起码是鬼怪精灵。如康德的实践理性，这是绝对命令，这里只有无理性的服从，此为美德也。

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其规则，但这不是做人的规则。以忠义诚仁去做买卖，是名牌产品的品质；以劣假坑骗去做买卖，是"蒋干有限公司"的品质，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一时一代也许不显露，两三代人下来成了一窝贼，作奸犯科之徒，佛说"必遭亡难"。此理不可违不能违，非学驴子往路边挤，那摔成驴皮也算忠于自己的想法而鞠躬尽瘁，后人赞曰：驴儿胜了。这一回不是《三国演义》，是《驴脾气演义》。

这个世上很多事没道理可讲，凡能讲出道理的多是汉奸；这个世上很多事有道理可讲，凡不讲道理的全是早晚摔成皮之驴。

（二）《三国演义》的艺术形式与艺术成就

中国的文学艺术，多是和说唱有血缘关系。除《诗经》我们难以考证它是否是边工作边吟唱，这宋词、元曲显然是从唱而演变来的。杂剧也是要面对观众去演，而章回小说则是面对观众去说。这种说的艺术把它的"说"整理成文字，依每"说"一次的容量而截成一章一回，这就叫章回小说了。

面对观众去说的艺术，有它很独特的个性：

首先，它要求情节要单一，要一环扣一环地连贯下去，少枝蔓，尽量避免情节的平行展开。只有这样，人们才爱听，这个"说"才能说下去。张三讲完要让张三遇见李四，于是按下张三不表，且说李四如何如何；李四讲完要让李四与王五有关系，于是再按下李四不表，讲王五如何如何，这就叫连环式情节。如果张三、李四、王五一齐讲，那观众就产生视听上的混乱，这吸引力就远远地不如前者了。平行展开、多头齐进的情节发展方

式，只适合纯文学的小说。人们拿本书静静地在家里看，看不明白的返回头从前几页再看起。精彩篇章多看几遍，过场的戏就草草翻过，多头齐进的情节可以自己翻书给联系上，但这些手法在“说”的艺术形式上是行不通的。需要说明的是：结构简单并不是情节简单，不可把二者混为一谈。

其次，说的艺术要求在塑造人物时有一定的夸张度，这样观众听着才带劲。是否真实是第二位的，让观众不走开是第一位的。于是就有了“玄德看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之关云长了。观众为什么喜欢一定程度的夸张而不在意生活中的真实呢？因为大家花了钱聚在书场里人头攒动地是来听艺术的，不是看国际新闻，不是想知道真实，而是需要艺术！艺术让他们满足、让他们欢喜、让他们流泪……艺术的人物是极端的，好人全是君子，坏人全是小人。一句话，人们希望在这里看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们希望在这里看到一个简单的真理而不是很复杂的《参同契》式的真理。在一个广宽的背景上去讲一个结构简单、单线发展、情节跌宕、能让人痛快淋漓地发泄情感的故事，这种艺术就是章回小说的艺术了。

第三，这一点也很重要，叫“聚众效应”。

“聚众效应”是大家聚在一起听一个人讲演而产生的一种效应。这种效应极具情绪化和煽动性，这种效应排斥复杂的理论、排斥细腻的心理描写、排斥男女私情。这种效应为了达到人们情绪的饱满和情感的倾斜，它甚至允许神话和不着边际的“特异功能”、“宗教轮回”。我们有很多批评家认为三国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迷信，其实你要是和大家一起在书场里听到诸葛亮借来东风，你从情感上会相信这是真的，是丞相法术所致。在关公败走麦城后，你会相信“玉泉山关公显圣”，关公骑赤兔马于空中高喊“还我头来！”而“武侯显圣定军山”丞相对攻入蜀地的钟会说：“……汝入境之后，万勿妄杀生灵。”你一定会相信并感动地流下眼泪。哪个批评家也没胆量从书场中站起来说：“同志们，这是迷信，我们一定要用科学的眼光去批判这些封建糟粕……”我想你一定被重捶一番，被结结实实的修理一回。当然，文革时除外。

“聚众效应”需要夸张与神化，这是人们情感升华的需要。情感的升华，总会归于一种神圣……艺术本身就不排斥神话，因为它需要神圣，科学与艺术在对待神化上是截然不同的。科学不能有神话和神化、不能有

神圣，一切要冷静、要理性、要真实而公平；情感和艺术却永远离不开神话和神化，离不开神圣，一切要有感情，要有情绪，要有热情。

第四，章回小说和说书的形式，造成了思想的隐蔽性。

因为小说的情节太过起伏、人物太鲜明、故事中的悬念太吸引人，所以这忠与义的思想就随着故事深深地播在你的潜意识中。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种寓思想于故事之中的方法有什么艺术上的理论根据么？

有，不但有，而且还非常美，我管这种理论叫"艺术地解除逆反心理"。

二十年前曾和侯跃文一起拍片子，闲暇时论及什么样的相声结构最好，侯跃文说："二踢脚式的相声结构"最好。他说："我一上台，观众就知道这是相声节目，是要让观众自己乐的节目。于是大家表面上在鼓掌在欢迎我，可潜意识里却这样想——看你侯跃文今天有什么本事能逗乐我，你不是相声大师的传人么？于是我就用'二踢脚'的方式，先让你乐！使你觉得还可以，侯跃文还成，但也不过是这么两下子……正在你放松下来，逆反抵触情绪消失时，我这第二响响了，出人意料地响了，这次你才会从心底里乐出来。"多年后，我才从侯兄的谈话里悟出这心理学上的原理，它美不胜收，奇妙无穷。

什么叫"二踢脚式"的"艺术地解除逆反心理"的方式呢？现举一个土耳其的幽默故事加以说明：一个主人公，勤勤恳恳地工作，但仍是被解雇了，于是失望的要自杀。他买了毒药喝了下去，当然遗书早已写好。但没死，毒药是假的。他又愤愤然买了绳子要上吊，但绳子断了，这不像广告说的那么结实。他又买了刀子，往汽车下钻……都没死成。偶过清真寺，他听到真主的声音，于是幡然悔过，打自己耳光拔自己胡子，发誓好好做人。他用最后的钱去大饭店吃了一顿，谁知却被送进医院。大夫好容易把他急救过来，问他吃了什么。他说在全国最高级的饭店吃的烤全羊。大夫大吃一惊："天哪，你找死么？这最高级的就是最毒的，十个人吃过九个死，报上第四版早就登了，你不知道么？"

——这是解除你逆反心理的第一响。

患者说："唉，我只看了第一版的社论，还没来得及看到第四版。"大夫一听，命令立即停止抢救。病人问为什么呢？大夫说："吃高级餐馆的人是吃十个九个死，敢看第一版社论的是看十个死五双！你这回是真没

救了。”

……这是第二响，是出乎你意料的，在解除了你的逆反心理之时的最会心的一响。

难道“艺术地解除逆反心理”只此“二踢脚”一种方式么？

不，还有一种叫“说故事”的方式，它是用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把你弄得忘掉了逆反心理，正在此时，相声的包袱响了。马三立老先生的相声多是用这种娓娓道来的“说故事”方式来“艺术地解除你的逆反心理”。有一个段子叫《检查卫生》，说局长到下属工厂检查卫生，于是全厂大扫除……拖地擦玻璃……好容易局长来了，要先上厕所，尿急。厂长一听吓了一跳，因为厕所忘了打扫。还没叮嘱，局长早一把推开厕所门，“嗡”地一声两万多只苍蝇把局长愣从厕所推了出来。无奈，只有命人赶紧去打扫。不一会儿，厂长通知局长可以如厕了。局长一见一个苍蝇也没了，十分高兴，打算改成解个大手。厂长着急地说：“局长，要是解大手您可快点，现在是 11:40，苍蝇全去食堂了。一到 12:00 食堂关门它们就全回来了。”这就是“说故事”式的方式。

而三国的说故事方式，就是在你忘了什么思想、观念后，你的全部精力和情感已被人物和情节深深地吸引走之后，悄悄地把忠义根植在你的心底里。

以上四点，可以概括为：三国的艺术成就在于：

①故事情节的单线连环方式；

②简单的道理和人物塑造的夸张；

③“聚众效应”的应用；

④用“说故事”的方法“艺术地解除逆反心理”并把忠义这精神之核撒播在听众心底。

（三）用“一表五法”看《三国》

前边讲了“情理回互表”和“五点方法”，我们拿它来看一看《三国》。

1. 用“情理发展表”看《三国》。

A. 情节：《三国》的情节复杂，远大过第一层次的《诗经》、百家、诗歌与禅宗；也大过第二层次的序曲《西厢记》。它以关张赵马黄和诸葛亮扶刘备称帝为主线，曹操孙吴的魏吴为辅线，以魏蜀吴三分天下为故事的情



节骨干，三个元素交织在一起，其复杂程度可想而知。因篇幅有限，不再多写。

B. 人物：主要人物多是正面形象，但另一个面的描写也是有的。关羽的"降汉不降曹"、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都小心翼翼地写出英雄人物犯错误和骄傲大意的另一面。剩下像曹操、周瑜、刘备、张飞……都很恰到好处地刻画了人物情与理的两个面。

C. 背景与史实：《三国》产生在明，实际上有着中晚唐藩镇割据的影子，也是明朱棣搞什么"靖难"的影子。不管割据多么有道理，三国归一统是人们心底里的希望。《三国》第一回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这也是人民的希望。

D. 诗词文赋的运用：我们只看它开篇，即知中国小说的特点了。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调寄《临江仙》

2. 以五个方面看《三国》。

A. 作者：罗贯中，太原人，号潮海散人，他善于写"说史"的小说。今存他的作品除《三国》以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同时他也是《水浒》的编写者之一。

B. 对于人性中情和欲的态度：《三国》作为宣扬理性的作品，显然对情与欲是贬斥的，而一切以忠与义为光辉的榜样，这种偏激和缺陷是作品本身无法解决的。

C. 作品的网络性：既然缺乏情感性，那网络性必然就十分明显。皇帝要正宗地姓刘再开明贤明、文官要如丞相一般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武将要如赵云张飞一般勇猛、人人要学关圣的忠义。我看程朱理学的宣传，远不如《三国》给中国人留下的理学思想深刻。"存天理"就是"存忠义"，"灭人欲"仍是灭人欲，呜呼！几百年来，人们膜拜着关帝爷，也呼唤着心灵的解脱；人们敬重着丞相只重耕耘的鞠躬尽瘁，也常常实用而理性得不近人情……这就是咱中国人。

D. 情理位置的转换：继诸子、禅宗后，经过诗歌和元杂剧于情感上的

徘徊，人们又一头扎入一种理性的哲学讨论之中，这就是《三国》的真实面目。

当一切定位于忠义，一切定位于莫问收获只重耕耘后，也算结束了这种哲学观念上的讨论。下一个任情任性的东西将泼辣辣地喷发出来，这就是《水浒》，它将代替《三国》而呈霸主地位了。

情→理→情→理……这是咱中国人思想与情感的发展轨迹啊。

E. 背景的逐渐扩大：《三国》第一次把中国人的思想和情感用艺术的方式带入全国的政治背景之中。“高文典册”的史书，一下子变成了人人看得懂听得懂、人人可以评头论足的事情，这实在是妙不可言。虽然这背景只限于政治，它没有涉及经济和每个家庭，但这毕竟是个创举，是令中国人耳目一新的第一次。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的史册里，关羽秉烛读史、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义释曹阿瞒、走麦城……诸葛亮借东风、草船借箭、三气周瑜、八阵图、骂王朗、空城计……魏蜀吴三国相互利用、斗争、联合、用间、反间……在这广大的背景中，渐渐地让人感到忠义的可贵、忠义的永恒。

没有这么宏大的背景，这个忠义的思想绝没有《三国》这么深入人心。

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只有到此搁笔，虽然还有很多话想再啰嗦，也要以后有机缘再说了。

三、施耐庵和他的《水浒传》

《水浒》几乎和《三国》同时出现。当罗贯中著了《三国》后，也在编纂施耐庵的《水浒》，而最终成为《忠义水浒传一百卷》，这是《水浒》的祖本。看来罗贯中并没有意识到这两本书是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的书，但这两本书是畅销的话本书，这才被罗贯中看中，怕是实情。

中国人有句古训：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什么意思？人老奸马老滑，让越老越奸的人再看三国，怕是奸得以几何基数奸下去……这还了得么？中国全让这人奸了去？显然不成，所以不能看《三国》；而少年人气盛，爱冲动，青春燥动么，一看武二郎杀美貌如玉的嫂子，提着人头去自首，又曾景阳打过虎、啥地儿套过狼，成了，照着学，也要亲自显显手段了，于是敢上陕西偷文物、敢下河南挖古墓……这种手段，这种勾当……惨

了，全国的狼全被套了去，连一级文物在内；全国的古墓全被挖了去，不管姓叶赫……姓刘、姓赵、姓朱，还是什么兵马俑……所以少不看《水浒》。

《水浒》教人作奸犯科？偷坟掘墓？风高放火、月黑杀人？

还是先不下定论，用我们自己的方法看看《水浒》吧。

（一）用"情理回互表"看《水浒》

在第二层次的哲学和艺术的高峰里，《水浒》处在重儒家理学的《三国》和《西游记》之间，它其实是《三国》的孪生兄弟。没有《三国》就没有《水浒》，没有《水浒》也不可能有《三国》的辉煌。《水浒》如同第一个层次的诗歌，诗歌与诸子百家相比呈情感色彩，《水浒》与《三国》相比亦呈情感色彩。

我们知道，个性的情感是反对网络的束缚的，在文人士大夫的情感世界里对爱国忧民之情、对大自然热爱之情是以文学的形式艺术地表达出来的。屈原的楚辞、谢灵运的山水诗、李白的诗酒不分、杜甫的"恨别鸟惊心"都是艺术地展示了情感对一个网络的冲击。而对于非知识分子的人民及下层官吏，他们没那雅兴和闲工夫去弄什么"路漫漫兮"、"草盛豆苗稀"、"缺月挂疏桐"、"僧敲月下门"，他们在求生不能求死不能时，那最原始的造反情感伴随着求生的本能迸发出来，就成了毫无道理的勇气之美。这种毫无道理是让你无法形容才显出的毫无道理，你说是匹夫之美？是深思熟虑后的美？是纯情绪纯理性？都不对，因为它是求生的本能产生出来的，是被逼出来的气，不是什么大小周天之炁，不是什么浩然之气。秋瑾临刑前只留下几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也就是"天凉好个秋！"美得没道理，悲壮得没道理，而感动人也是这么地没道理。

仔细想想，真能感动人的美，哪个能说出道理？大凡能在英模事迹报告会上或是明星大腕谈艺术时讲出的那些道理，实是捕风捉影矣。连美的定义我们都无法下，那感动人的真正的美如何能"讲"出来呢？

我这里讲强调"没道理"，是让诸位少开口评论，多去品味。情感的事情、美的事情只需体会，不需分析、更不能评判；科学的事情，才需要理性要思维，要分析而不要体会。

在《三国》连篇累牍地讲忠义后，突然冒出一伙不忠不义的山贼草寇，还要给他们著书立说弄成世界名著，这一回就非要把这个没道理可讲的

造反之美给讲出道理来了。于是有了逼上梁山的"逼"。也就是说一百零八位男女好汉，原本是良民，被迫无奈才落草为寇。但是是谁在逼他们呢？是官吏！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凡大小起义和造反，都是贪官污吏的暴行引起的，可以说没有例外。而反贪官不反皇帝也就巧妙地避开了忠和义这个中国人难以避开的礁石，以"靖难"、"清君侧"的模式来"替天行道"了。梁山好汉齐聚之地叫"忠义堂"，堂前旗杆上挂一"替天行道"之旗，于是解决了名分上的问题，大可以名正言顺地杀人放火了。

其实，"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种美，远不需要什么忠义和替天行道的道理。人在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时，为了生存而造反是天经地义的应该！"天凉好个秋！"这本身就是大道、天道。一旦披上忠义的外套后，皇上下诏要招安，惨了，肯定要被招了去，否则就不忠不义了。这成了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除了被镇压以外的另一条路。

以求生存而造反，到被招安而回到网络系统，完成了起义军情感的冲动、追求，到冷静和无奈的历程。但这种冲动这种追求毕竟是美的，是人性的最具生命力的部分。

A.《水浒》的情节。作为章回小说，《水浒》同《三国》一样是以单线的故事情节而写出众多人物的。有些人物其经历写的非常曲折精彩，至今仍是各种艺术体裁用以展开情节的范本。如林冲雪夜上梁山、武松打虎、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李逵捉李鬼、杨志卖刀……。

B.《水浒》的人物。作者在选择要描写的人物上，是颇有心机的。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简直囊括了社会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有世袭贵族柴进，有高级政府职员林冲，中下级职员宋江、鲁智深，有纯粹的下层民众菜农张青，打渔的阮氏三兄弟，有乡坤地主卢俊义及市镇上打铁的、作假文凭的、小偷、开黑店的……这些人一一被逼得造了反，就反映出这是个共性的问题而非个别的事件了，可以说这是作者有意之举。作者第二个高明之处，是对人们从不愿造反到不得不造反这心理变化的描写，尤其是对中高级职员的造反，那心理活动就写的十分细腻精彩。因为写十个二十个本没什么家产的人造反，远没有一个有家产、有家室、生活挺不错的人去造反更有意义，是事半功倍的事情。这也是全书对林冲、宋江、杨志等人着力刻画的原因。

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只能这样简单地介绍一下，难以缘引小说的段



落，十分遗憾。

C. 关于背景与史实。在北宋的历史中，与辽的对抗是真实的。同时水浒地方的农民起义，方腊起义也有其事。在小说中第十六回讲的生辰纲，也确实是北宋时劳民伤财的一种赋税。它是把苏杭江逝一带的风景奇石连同金银珠宝作为上缴或走门路的礼品，不远万里运到京城，一路运输护卫其劳动强度大得惊人，扰乡扰民可想而知，这是当时人民所深恶痛绝的事情。小说把这些真实事件和高俅、童贯、宋江、徽宗等真实人物写进故事里，增加了其可信度。

D. 诗词文赋的运用。和《三国》一样，《水浒》也是中国文学艺术的集大成之作。

全书引首段，即有词、诗各一首。

词曰：

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

诗曰：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草木百年新而露，在书万里旧江山……

全书第一回，即有赋文以歌颂大宋锦绣河山：

话说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但见：祥云迷凤阁，瑞气罩龙楼。含烟御柳拂旌旗，带露宫花迎剑戟。天香迎里，玉簪珠履聚丹墀；仙乐声中，绣袄锦衣扶御驾……

古人的线装书，多是“绣像三国演义”、“全像水浒传”。有了画儿，于是诗词文赋画俱全了。

(二)用“五法”看《水浒》

我们几经使用的以五法看作品，在这里因作者、情感冲动的张扬、情理转换三项前边已提过，所以略去，只谈一下《水浒》和整个社会网络的关系及背景描写的扩大这两个问题。

《水浒》对整个封建社会政治系统、观念系统、人文系统无疑的都是一种冲击。这个冲击建立在“求生存”的基础上，显得毋庸置疑地正确和必

要。然而“官逼民反”的模式建立之后，反贪官不反皇上的理论使起义有了合理性，这是网络对人性的束缚，毫无办法。这个束缚在镇压不了起义军时，就以招安的形式扼杀人们最起码的人性要求，这是《水浒》给我们揭示出的最深刻的道理——封建社会对人性具有最彻底的、毫不留情的封杀和铲除的特性。因此，忠义的观念在这里成了最阴险的扼杀人性的帮凶。

当儒家观念发展到了理学、科举到了八股文、诗词文赋字都有一个顶峰的什么圣坐在头上、连小说都逃不出忠义的垄断时，呜呼！人性只有僵死和泯灭了。

金圣叹腰斩《水浒》，不知此兄看出了什么？要是看到农民起义胜利了，而斩去不光彩的招安，只能算老兄还有人性还有同情心；如果看到人民为生存而争，打着忠义的旗号最后被忠义害死，那他就不应腰斩什么，而是默默地把《水浒》留给后人。孰是孰非的忠和义啊，让人怎么说好说坏？还是“天凉好个秋”吧。

总之，忠义在《三国》和《水浒》中不同的作用，从理性和情感两方面都给下面的《西游记》做好了准备。换言之，我们停留在对《三国》与《水浒》中的忠义褒贬的讨论上是没什么意义的。当我们跳出来看，以《西游记》的背景去看忠义，怕是才有一定的意义。

《水浒》的背景，虽然从涉及的地域面积看不如《三国》广阔，但《三国》只是政治背景，在对家庭、经济这些方面描写的很少。而《水浒》把家庭引入小说中，扩大了背景自身。像武大郎与潘金莲、宋江与阎婆惜，这些家庭情况的描写是以前的文学作品所没有的，同时鲁智深在寺院里的生活、柴进庄园里的生活，这些描写也是以前的作品没有触及到的。显然，《水浒》为小说开拓了更广泛的背景。

总之，《水浒》以一百零八位好汉的造反谱写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可视性可听性极强。但它的深刻的令人瞠目结舌的含义在于：“忠义”不但从正面“灭人欲”地扼杀人性，还从背面曲折地扼杀了希望“忠义”能保护自己生命、寄最后一线希望于“忠义”的人。

当我们现在的影视艺术高唱着“该出手时就出手，哎哎呀呀”时，不知编导们是怎么看《水浒》的。有人说这是一群地痞流氓，不干活不生产、专以破坏治安破坏生产力为能事；有人说这是对封建社会的否定，是积极进

步的起义。当然，对于梁山起义军的受招安分歧最大，有人说这是宋江叛变了革命；有人说这是农民的无知与愚昧。不管什么理论，这“该出手时就出手”实在让人觉得别扭，而“哎尔哟……”这个衬词再加上“哎呼嘿……”就透出了流氓无赖之气……随之也就有了：下岗的兄弟别低头，手里拿着个小榔头。紧紧跟着大款走，该出手时就出手……哎呼嘿。

在《三国》、《水浒》的创作之后，明代的拟话本蓬勃发展，其主流是市井文化、言情小说及戏曲，有名的拟话本《三言两拍》和戏剧的昆腔兴起就是其代表。因为它们最终汇入清代的小说和四大声腔的产生、京戏的产生之中，所以不再做交代，见谅。

四、吴承恩和他的《西游记》

从我们列的“情理回互表”中可以看出，《西游记》处在第二层次的结束位置，它含摄了从《西厢》到《三国》再到《水浒》的艺术、情感、理性观念的种种成果，是禅宗的人性思潮的讨论在更高一层次上的体现。

（一）禅门两宗在《西游记》中的体现

中晚唐的禅宗以临济宗马祖道一的即心即佛和曹洞宗石头希迁的《参同契》分别宣布了有关人性讨论的结果：崇重人性的欲的追求、注重共性的秩序回互。前者的代表即心即佛，后者的代表叫《参同契》的辩证（情与理，个性与共性的辩证）回互。

《西游记》中最生动的主角是孙悟空。孙悟空代表了“心猿”，是心性的象征。全书前六回，大力歌颂孙悟空其实就是在歌颂即心即佛的精神。既然心是佛，那这个心不管如何也是应该歌颂的，所以悟空爱虚荣，就敢于自称齐天大圣；爱吃桃，就敢大闹蟠桃宴；爱开玩笑，就敢把太上老君的金丹全偷吃；不怕恐吓，就敢于领上众猴和天兵天将切磋武艺；不服输，就在炼丹炉里蹲出个大小周天的日子……只是这猴子太自以为聪明，惨了，栽在佛祖手心。你想啊，佛说：“你敢跳到我手心么？只要你跳进来，保证你跳不出去。”这猴子上当了，人家的手心岂是随便可以去的地方？那是人家的主场咱们的客场。换个位置，佛祖跳到你那一亩三分地的花果山水廉洞里，不是也难跳出来么？强龙还压不住地头蛇，何况往人家套里

钻，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看来即心即佛的“心”还是需要先修炼一下。正因为悟空没修炼过，所以仗着自己艺高胆大，愣往人家手心儿里跳，让佛祖一翻手心，五指化成五行山，把这猴子压了五百年。更可气的是这山上还有一道符，闪着金光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弥吽。没悟道的看这咒语是相信得不成，悟了道的看这咒语，是气得不成。尤其这悟空，五百年来每日抬头看它，真是气了五百年。因为佛祖的咒语说白了就是：“俺只是把你哄！”你说怎能让悟空不气？没法子，只有忍。既然输了，认栽！于是和师父去西天取经，成为斗战胜佛。

我们的文学家，特别喜欢悟空在前六回中大闹天宫的形象，其实那简直是《水浒》中招安前众好汉当草寇的翻版：每日吃喝玩乐、为所欲为，只是一个住花果山、一个在聚义堂；一个挂齐天大圣之旗、一个挂替天行道之旗，如此而已，没有本质区别。

我们的文学家又对取经的悟空十分惋惜，这和金圣叹看不惯受了招安的好汉们一样，这是怎么了？真的让孙悟空掌管天下？真的让宋江当皇上？好，退一万步讲，孙悟空当了齐天大佛后，他怎么管理天下？是否也让诸位学他去大闹？宋江当了皇上呢？招令天下人都反贪官不反皇上般地落草为寇？

临济宗马祖道一的即心即佛，我们叫“出世悟”悟出来的真理；

曹洞宗石头希迁的《参同契》，我们叫“入世悟”悟出来的真理。

你可以在艺术领域里、在精神领域里达到“自我实现”的即心即佛，化蝶也罢、化气也罢、孔雀东南飞也罢。但在现实生活里、在人类社会里你就必须重视网络，你就化不成蝶、变不成孔雀。你必须注意到网络稳定社会的功能，必须尊重每个人想化蝶、想变孔雀的创造积极性，于是大家全老老实实地活着，谁也别变蝶变雀弄得四邻不安。我们每个人只能是爱护自己的心愿、希望，只能做到这里，我们更需尊从社会规则、努力去做于人民有益的事情。换言之，以南禅对待自己的心性，以北禅行于世上。或者说：未成年上学时学南禅，成年走入社会学北禅。具体到工种上，即：搞艺术的学南禅，造导弹的学北禅。

好了，有了禅宗理论上的探讨，于是梁山好汉都参军去征方腊，这些人不是好斗么，让你们去以毒攻毒，两败俱伤；你们不是忠义么，那就让你们为忠为义去死。而孙悟空的待遇要好些，你不是输了么，好，去取经，把

你的聪明才智用在为人类除妖上。不谈《水浒》的后半段如何，只谈《西游记》的后半段，可以说吴承恩算是个有人情味的明白人。

据说吴承恩是个道人，对佛家十分反感，于是想作《西游记》把佛家嘲笑个够。没想到吴先生歪打正着，把爱护心性、尊重网络、用野性的心性去为人类服务——除妖降魔而最终成佛的历程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真要谢吴先生了，虽然悟空的成佛较不情愿，要九九八十一难地"渐修"，但神秀一派的"时时勤拂拭"也算正宗正道，所以火候到了也成佛。看来吴承恩吴先生身为道家，实乃佛家高手，禅宗官禅传人也。

很怪，这世上还有那么一位僧人文人，叫许仲琳。这位许兄见吴兄挤兑佛门，怒火万丈，也写了本《封神演义》来嘲笑道家。于是张天师在上，有太上老君、姜子牙等等等等人马，手持各种先进的制导兵器，什么自动捆仙绳、自动寻地专打敌人脑袋的金砖、什么一晃敌人就昏的旗、一听敌人就软的琴……乱打一锅粥……弄来弄去，这位许先生也写得走了板，推崇起道家的仙术及先进武器，成了身在佛门而实为全真教传人、老子之高徒的道家门人了。孰是孰非？算了，书归正传。

总之，《西游记》是对《三国》的理学、《水浒》的心学的总结，是用神话故事妥善地解决了个性与社会共性辩证共存的艺术作品。我们当今的中国人真应多学多看《西游记》，以从中悟出人生的真理和社会的真理，从中悟出临济宗和曹洞宗的真谛。

（二）《西游记》的人物

从明初至明中叶，政治气候让人沉闷，学术探讨更没有可能。当由《西厢》作为描写爱情的作品逐渐流入言情小说后，讲理的小说就多以神魔志怪的形式出现了。

吴承恩先生塑造的《西游记》的人物，是有喻意的。

首先，师父唐僧代表了佛教的形象，同时也代表着一种志向。这个志向是今生今世一定要取来真经，以解救人民。正因为有这个志向，才有了师徒四人的矛盾和矛盾解决的可能。

孙悟空，代表着人性中最有朝气的欲望。这个欲望是精神领域内的满足，所以他像一个人的念头一样，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想去东海看看、一会儿想去西天逛逛。于是吴承恩给了他七十二般变化和一个筋

头十万八千里的本领，以便让他能满足他的欲望。我们常说的心猿意马，就被具象成孙悟空和白龙马。因为人的幻想不怕刀斧不避水火，所以悟空也就没什么可避讳的。只是人这种动物太愿意自以为是，太乐意弄个小聪明，所以猴头不免闯出大祸：显示袈裟招了贼、撞倒人参果树、骗来芭蕉扇又被骗回去……诸位千万要小心，越是即心即佛地又来灵感又得意时，越是容易犯错误之时。

猪八戒，代表着人性中最基本的欲望和需求。他好吃、好睡、好色，这都是人之本性，没什么可指责的。同时他好扯谎以掩盖自己的错误，遇到情况紧急，他总是让别人先顶着，自己说是要解手，于是一头扎到草丛里去睡觉。可见忠心和义气这属于道德范畴里的品质他老猪是不想沾上的。但在他身上却有着个体农民身上的优点：第一干活勤快，在高老庄也是“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耙地，种麦插秧”，取经路上重活累活全是他干；第二个优点是憨直，他身上没有梁山诸好汉具有的城镇流氓气；第三个优点是从不向妖精讨饶，这也叫死猪不怕开水烫。只要被妖精抓住，总是劝妖精先吃猴子，再吃沙僧，说自己肉肥腻不好吃。但他从来不跪下求妖精饶命，精神尚属可佳。

沙僧，是道德观念的化身，他是在身上最挑不出毛病而又最无味的一个人了。武艺平平、忠心耿耿、少言寡语、好静不好动，一切美德俱全、一切生气全无。唐僧悟空最后成佛，八戒捞个实惠是净坛使者，而沙僧落个好名声：金身罗汉。上下金烂烂亮闪闪无一点瑕疵，就是无趣无味地和众罗汉们在罗汉堂入静去也。按佛门规矩，罗汉要成佛还要修三世，啥时候那无用却好听的品德和道德真的绝了根，真明白品德与道德是怎么回事儿了，再成佛吧。

说点儿题外话。一切世上流传的什么道德、品德、人性、良心等等观念，因其流传久远，成了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也因其久远，所以“法久生弊，水久生虫！”无法让人评论是非好坏。这里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学沙悟净，没那智慧也没那时间去分析去争辩，只是坚定不移地去执行，如此这般成不了佛起码也是金身罗汉；第二个办法是从修禅的方式去悟，真的“出世悟”了再“入世悟”，于是你自知什么好、什么坏、哪个是怎么回事儿了。最最要不得的是争论、辩论与分析，你开个会召集几个有名气的知识分子、大学者、大作家来讨论什么叫孝，该不该孝。好了，十个人有十个结



果，最后不欢而散。前几日电视里有个小节目，一个企业家回首创业的经历，最后的经验是为商也要诚。立刻，一位知名人士说："你在误导，似乎只有诚的商人才成名，其实奸而成名的人更多！"满演播室的人哄堂大笑。有的东西是不能争辩的，你认为行商和做人要诚，你尽管去诚！成功与失败了都不要往"诚"这个品德上挂勾；你认为行商和做人要奸，你就尽管去奸，是好是坏每个人心知肚明。开会辩论本身就有"聚众效应"，没人会在这个场合说"我们要学秦桧"、"腐败官员也是人，所以应该养二奶"……更何况在电视台的演播室内、镜头前，一下子全世界多少亿人能看见、能听到……这里有几分是真的？禅门传衣钵叫"法不传六耳"，师徒两人说悄悄话儿，说心底里的感受……于是你告诉师父："秦桧绝不能学！腐败官员也绝不能当！但这女人一事似乎不简单……"师父正色："止！止！此事妙难思。到了五十五岁再来接老纳衣钵也！"成了，证果已毕，传法已完，岁数一到自知女人怎么回事，于是成师作祖也，不立文字以心传心是也。

（三）《西游记》的情节、背景与文学样式

《西游记》一书也是章回小说，是话本演变成的小说。所以故事情节单线发展，与《三国》、《水浒》类似。

《西游记》的情节分两大块，前六回是歌颂即心即佛的大闹天宫；第七回开始是为取经而降魔除妖、为民除害、利益众生。于是在整书的高度上看，先歌颂人性的冲动，再描写这个冲动在社会网络中发挥出治国安邦的功能。显然这是道家与儒家、李白与杜甫、临济与曹洞、《三国》与《水浒》的结合。

从背景上看，除了历史上有玄奘大师取经这么回事外，人物则多是编的，但地点却多是真的。火焰山、通天河、灵山……都确有这地方。

诗词文赋外加绣像，本是中国章回小说的特点，所以不再举例。

我们不再死板的依"一表五法"去 ABCD 地讲，其实各项内容已讲清，只是以漫谈活泼的方式讲出来罢了。

综上所述，吴承恩老先生以神话故事去处理个性与共性，使《西游记》站在了比禅宗更入世的新的高峰。对心灵要爱护不要伤害，对社会要尊重要适应，这个道理在和平的"进化时期"是起码要遵循的。但是在山雨

欲来的"突变改革期"怎么办？人的心灵和生命受到轻视和践踏怎么办？这个吴承恩没有回答。而下个朝代的曹雪芹曹大师，在他的《红楼梦》中给了我们答案。

五、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

（一）曹雪芹其人和成书略述

作者曹雪芹（1715 年—1764 年），名霑，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当然，红学家们就这生卒年龄和名号上一直有争论。有的认为曹先生生于 1724 年，有的认为卒于 1763 年……有人认为曹先生不是字梦阮而是字芹圃……这争论一直弄了几十年，现而今也没清爽。从认定事实、言而有据、马虎不得看，红学家们都是对的，这叫学问。不对的是咱们，马马虎虎顺手弄一个年份就告诉读者曹先生死于这年，真可谓草菅人命。这种认真的学问与搞影视的稀松马虎之冲突我是习以为常了，所以只有再稀松马虎眼地草菅下去，不敢太认真。我没那个功底做学问。

曹家祖上久住辽阳，汉人，后随清兵入关。先祖曹振彦的儿媳妇即曹玺之妻是康熙的奶妈，所以康熙对把自己奶大的曹家就格外恩宠了。康熙即位，第二年就让曹玺任江宁织造，这是个外任官，是肥差。曹玺在任二十一年，于康熙二十三年病故。康熙还挺够人情味的，命其子曹寅继任江宁织造及两淮巡盐御史。那个年头管盐、铁、铸币、织造、槽运等职都是肥差，曹家身兼两职，富贵与显赫自不必言。曹寅其人很有才华，帮康熙刻《全唐诗》和《佩文韵府》，并于康熙南巡时四次接驾，皇上就住在曹家，曹府俨然成了隋炀帝南巡式的行宫了。康熙五十一年曹寅病故，其子曹颙过继给曹寅而继任。康熙五十三年曹颙病故，其叔伯兄弟曹頫过继给曹寅继任，曹雪芹即曹頫之子。雍正五年十二月曹家被抄而败落，曹雪芹当时十三岁。

曹家被抄后，曹雪芹举家迁回北京。他的青年时代怎样度过的，红学家们还没找到线索，所以等找到后方能有个交代。愿今后的红学家能为曹家正本清源，把生辰八字、住在何处、父母何时亡故等等等等都补齐归档，以了却一段争论和悬案。



曹雪芹晚年穷的“举家食粥”，而他本人又嗜酒狂放。据考证他当时住在京西，即现在香山植物园内正白旗村39号的“雪芹故居”。一日曹先生沿卧佛寺上溯，至樱桃沟之源处，见一巨石，似元宝状，上长一树，下有泉水潺潺涌出……于是灵感大发，写《石头记》，也就是《红楼梦》了。因那巨石像一个元宝，所以书中主人公叫宝玉，且口中含一块“通灵宝玉”。此石依在，诸公有暇也可去寻一番灵感。

曹雪芹绳床瓦灶、穷困潦倒地在西山著书，在他去世的前十余年，《石头记》的前八十回已传抄问世。书的后半部分已迷失，是高鹗续作。《红楼梦》流传至今，各种抄本繁多，我们看到的版本多是以庚辰本为底本，以脂批本为主要参格本，以程甲本为参考而补齐的版本。

以上是必须对诸位有个交代的资料，虽然乏味得很，但仍是需要了解一下方好。下面，咱们依咱们的习惯，看一下《红楼梦》。

（二）《红楼梦》对人性的张扬之一——宝玉、黛玉与晴雯

人性既具有发展层次上的无限性又具有发展方向上的无限性，而《红楼梦》在朝着爱情一支的发展上有所突破，它超越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一见倾心”层次；超越了“孔雀东南飞”反对的“门当户对”的层次；超越了《西厢记》才子佳人的层次，达到了心心相印的高峰。

1. 贾宝玉其人。宝玉生长在八大国公之一的荣国公贵族世家。他风流倜傥，才智过人，是荣府正根正枝正叶的嫡出子孙，看来这般天大的财富早晚由他继承。而他的同父异母（赵姨娘所生）弟贾环，则长得歪瓜裂枣，斜肩勾背一副上不得台面的样子，又是庶出，加上招猫逗狗，任性小气，这一世简直是为给宝玉当陪衬而来。

因宝玉酷似他爷爷，所以贾母爱成心肝儿，从宝玉身上她看到想当年自己的丈夫、看到了自己流金的岁月、看到了贾家一族的未来；而王夫人因为只有这一个独苗，稍有闪失不但失去自己的儿子，甚至秧及自己当夫人和早晚当上贾家之母的美好希望。有这二位抬爱，旁人谁又会不顺着来呢？看来宝玉深受贾府上下溺爱这是必然的了。只有不知趣儿的赵姨娘三番两次找事儿，横看竖看环儿比宝玉好，最后弄了个人见人厌。也难说，哪个娘不疼自己的儿子？但姨太太的庶出和环儿的“人物委琐，举止荒疏”注定了她不论是破口大骂、痛哭流泣、求神弄鬼，全都不会有一丝胜算。

在贾府高宅深院、长辈溺爱的情况下，宝玉所受社会环境的污染要少，而追求新奇、反对束缚、珍惜情爱、反对八股也就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生成了。

2. 林黛玉其人。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少年时失去双亲，孑然一身寄人篱下。她家虽是"世禄之家，也是书香门弟"，使她身上有一种浓郁的诗人气质。

林黛玉到贾府时，应是六七岁，这是红学家考证而来的。在贾府内狭小的生活圈子和寄人篱下的生活里，形成黛玉多愁善感与傲世孤高的个性，这是矛盾的综合体，是她这个人物的特征。从她天真单纯而言语无忌中我们既可以看出诗人之才气，也常常感受到语言尖刻显出的欠缺雅量、不讨人喜欢。

总之，她追求人性的自由、追求情爱的自由，这简直是她生活的全部。她以诗寄情以诗言志，用诗和泪写出了"题帕三绝"，再以火焚之，使我们从诗与泪的毁灭中看到了血。

3. 宝黛二人的爱情。本书爱情的男女主人公是贾宝玉和林黛玉。二人初次见面，宝玉就说：

"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一见钟情型的爱情。但二人远没停在这个层次上，在第五回时书中写道：

"便是宝玉和黛玉二人之亲密友爱处，亦自较别个不同，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息同止，真是言和意顺，略无参商。"

两个人就这么两小无猜耳鬓斯磨地成长起来。闹急了，堵气不说话，宝玉还参悟出什么，写下一偈：

"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

宝玉自已觉得满够彻悟的分儿了。黛玉逗他，问为什么五祖弘忍把衣钵传给"本来无一物"的慧能，宝玉不能答，自语：

"原本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

想毕，便笑：

"谁又参禅，不过一时顽话罢了。"

于是大家又合好如初……这么翻来复去地情感交流，二人真的有心有意了。



一日宝玉偷看《西厢记》，让黛玉抓住，黛玉也拿来细读。这种"粗俗过露"的书显然是他二位没看过的，于是：

宝玉笑道："妹妹，你说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林黛玉听了，不觉带腮连耳通红，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说到"欺负"两个字上，早又把眼睛圈儿红了，转身就走。宝玉着了急，向前拦住说道："好妹妹，千万饶我这一遭，原是我说错了。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教个癞头鼋吞了去，变个大忘八，等你明儿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我往你坟上替你驮一辈子的碑去。"说得林黛玉嗤的一声笑了，揉着眼睛，一面笑道："一般也唬的这个调儿，还只管胡说。呸，原来是苗而不秀，是个'银样腊枪头'。"……

二位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就这么传递着情爱的信息和审美情趣的信息。如今的少男少女们开个研讨会，都对宝玉黛玉指指点点，大约是说宝玉太脂粉气，黛玉太刁钻气。真不知这是怎么了？看一个人为什么不品味他的境界呢？为什么总着眼于鸡毛蒜皮的小地方？想如今要写《新红楼梦》，应是宝玉把《西厢记》递给黛玉说："你看看你看看，人家这么整才叫真爱情，过瘾！"黛玉看后说："咋地？这就叫真爱情，拉倒吧！"宝玉怒曰："咋啦？咋不叫啊？这跟咱俩不是一样吗？你算是倾城倾国，我算是无愁无病，正好一对！"黛玉顿时怒瞪双眼，上下钢牙咔咔做响，喝道："说啥呢说啥呢！谁他妈跟你一对？你传播黄色书籍还勾搭我，我报 110 让警察抓你！"宝玉一见，矮了半截："得得得，就算我没说成不成？看你急赤白脸的，这是干啥啊？就算我下世变个绿毛乌龟或大王八什么的，养在你鱼缸里整天逗你玩还不成么？"黛玉一笑："瞧瞧瞧，大老爷们，松样吧！人家一唬就流了蛋黄了，真是个银样腊枪头，假冒伪劣产品！嘿嘿嘿。"于是二人爱得更铁，更磁实。估计这《新红楼梦》其作者也是辽阳人，名叫雷九斤，字不沾，浑名"踏不得"，号"土地雷"。

书归正传，反正两个人越是好，越是拌嘴斗气。一次两人又为什么"金玉良缘"生了气，宝玉前去劝黛玉，黛玉将手一摔道：

"谁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的，还这么嬉皮赖脸的，连个道理

也不知道。”

一句没说完，只听喊道：“好了！”凤姐跳了进来，凤姐说：

“也没见你们两个人有些什么可拌的，三日好了，两日恼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

到了贾母处，凤姐向贾母汇报：

“我说他们不用人费心，自己就会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说合。我及至到那里要说合，谁知两个人倒在一处对赔不是了。对笑对诉，倒像‘黄鹰抓住了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那里还要人去说合。”

凤姐只知两人手拉手是“黄鹰抓住了鹞子的脚”，却不知两人心连心才是真的“扣了环了”。一次宝玉、袭人和史湘云闲聊，湘云劝宝玉学八股去科考。宝玉听了道：

“姑娘请别的妹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

史湘云很下不来台，袭人就跟湘云说，上次宝钗也这么劝宝玉，让宝玉抢白的更厉害。

“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到怎么样，哭的怎么样呢……”宝玉道：“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曾？若她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和她生分了。”而恰恰此时黛玉正在窗外，全听到了，于是黛玉：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叹者，你既为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之知己矣；……，你我虽为知己，但恐自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

我想一对少男少女，花儿一样地美。而他们心中的并蒂莲开放时，简直是天上才有的那种神圣与美啊……想当年佛祖拈花微笑之花，也不过如此，有谁能忍心扼杀他们呢？

可曹先生给我们讲述的这个爱情故事，偏偏是二位生离死别。一个人如果在生活中真的有此神交的异性朋友，怕是今生今世忘不了的。如果和这位朋友没能结成连理，也是世上最惨的事情了。

是清朝这个社会、是赫赫的荣国府、是疼宝玉如心肝的贾母扼杀了这人性中的最美的花。这最美的花，不论在人性的爱情方向、事业方向、品德追求方向，都是只有到了顶峰才会开放的。

如果有人说这二位的悲剧是必然的，因为二位太挑剔太认真了，可以



说是"活该!"那我们再看第三位人物的命运,她是晴雯。

4. 晴雯其人。晴雯10岁就卖给了赖大,后来嬷嬷看贾母喜欢这个俊俏灵利的小丫头,就讨好的孝敬给了贾母,而贾母疼宝玉,又送给了宝玉。可怜的小丫头就这么像个货物似地连卖带赠外加送,到了宝玉房中。可以说她的童年是"家道贫寒风飘絮,孤苦零丁雨打萍"。

但这丫头在逆境中由生命编织了叛逆的性格,这叛逆在于她的少奴性、求率真以及对爱情的息息相通层次的追求。

自从她到宝玉房后,她看到了自己人生的希望。宝玉这个主子不错,是她认为人品最好的人,也是值得为他牺牲一切的人。如能被纳为妾,则可终身免受流离转卖之苦……所以她爱宝玉,从心里就把他看成是一生中的"主子"。正因为如此,她才敢顶撞宝玉,也敢拼了命地为宝玉办事,"晴雯补裘"就是一例。她鄙视袭人对宝玉的作媚,她在宝玉前表现出一个姑娘爱一个男人的另一面——晴雯撕扇的一种"撒泼"。这不是恶妇人的无赖状,而是在心上人面前情感的"挥毫泼撒",是少男少女用情爱泼出的彩墨画啊。

但是她"心比天高,身为下贱",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嫉妒而封杀了。她的命实在太苦,真不如不到宝玉房中,免得成为这场情感绞杀战的牺牲品。

5. 晴雯,红颜薄命一知己。宝玉爱黛玉,是夫妻名分,在纳妾的范围里,他喜欢袭人。但随着相处的时间渐长,他开始讨厌袭人身上之俗,萌发了对晴雯之爱。可是正当他明白晴雯爱自己,自己爱晴雯后,一切都晚了。

晴雯与宝玉关系的明朗化,是通过一系列事件凸现出来的。

一次,宝玉不快,心中闷闷不乐,回至自己房中长吁短叹。偏生晴雯上来换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上,将股子跌折。

宝玉因叹:"蠢才,蠢才!将来怎么样?明日你自己当家立事,难道也是这么故前不故后的。"晴雯冷笑道:"二爷近来气大得很,行动就给脸子瞅。前儿连袭人都打了,今儿又来寻我的不是,要踢要打凭爷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时连那么样的玻璃缸、琉璃碗不知弄坏了多少,也没见个大气儿,这会子一把扇子就这么着了。何苦来!要嫌我就打发我,再挑好的使。好离好散的,倒不好?"宝玉听了这些话,气的浑身乱战,

因说道："你不用忙，将来有散的日子！"

袭人在那边早已听见，忙赶过来向宝玉道："好好的，又怎么了？可是我说的'一时我不到，就有事故儿'。"晴雯听了冷笑道："姐姐既会说，就该早来，也省了爷生气。自古以来，就是你一个人伏侍爷的……。"（袭人）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听她说"我们"两个字，自然是她和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酸意，冷笑几声，道："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别教我替你们害臊了！便是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事儿，也瞒不过我去，那里就称起'我们'来了。明公正道，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也不过和我似的，那里就称上'我们'了！"袭人羞的脸紫胀起来……

说实话，能让宝玉气得浑身乱战的，这世上有谁？无非是黛玉和晴雯！

到了晚上，宝玉赴了薛蟠之宴回来，看见晴雯睡在美人榻上，宝玉将她一拉，拉在身旁坐下，笑道：

"你的性子越发惯娇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过说了那两句，你就说上那些话。说我也罢了，袭人好意来劝，你又括上他"……"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他出气。"……晴雯听了，笑道："既这么说，你就拿了扇子来我撕，我最喜欢撕的。"宝玉听了，便笑着递与他。晴雯果然接过来，嗤的一声，撕了两半，接着嗤嗤又听几声。宝玉在旁笑着说："响的好，再撕响些！"

这就是《红楼梦》里有名的"晴雯撕扇"了。你说这一段是什么意思？是晴雯在解气？在宣布自己于怡红院中大丫环的地位？是宝玉有的是钱不在乎几把扇子？是宝玉娇纵丫环？都有道理。因为道理是分析出来的，可人与人的情感不是道理啊，怎能用理性分析出个结果呢？情感需要品尝啊！所以咱们去品。一品，你就能品出晴雯在为自己爱上的人而气他、而冲他撒泼，晴雯是激动而兴奋地在撕啊。这嗤嗤之声，在她听来是胜利的情歌。而宝玉在还一个情债，他觉得早上对晴雯发脾气是自己的错，于是任她性子让她高兴，也是理所应当的在还债。此时宝玉并没意识到晴雯深深地爱着他，也正因为这个没意识到，让他付出了遗憾终身的情爱债。

一次宝玉不小心烧坏了"孔雀裘"，第二天又要穿。全府只有晴雯会补，而晴雯正生着病。晴雯见不得宝玉为难，说道：



"说不得,我挣命罢了。"宝玉忙道:"这如何使得!(身体)才好了些,如何做得活。"晴雯道:"不用你蝎蝎螫螫的,我自知道。"一面说,一面坐起来,挽了一挽头发,披了衣裳,只觉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迸,实实撑不住……补不上三五针,伏在枕上歇一会。宝玉在旁,一时又问:"吃些滚水不吃?"一时又命:"歇一歇。"一时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她披在背上,一时又命拿个拐枕与他靠着。急的晴雯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罢。再整上半夜,明儿把眼睛抠搂了,怎么处!"宝玉见他着急,只得胡乱睡下,仍睡不着……

两个人的情感发展到这样,可以说晴雯是为了宝玉在拼命了。换一句武侠小说的常用语,叫肝胆相照。而宝玉事后看晴雯病的更重了,说:

"这怎么处!倘倘或有个好歹都是我的罪孽。"

看来宝玉太留心黛玉,而另有一块红玉在他身边却不知也。但他知道这一回自己的情债欠得更多更深了。

当晴雯最终被赶出荣府,于灯姑娘家奄奄一息时,宝玉来看她,她对宝玉才述说衷肠:

"……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的:我虽生的比别人略好些,并没有私情密意勾引你怎样,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太不服。今日既已担了虚名,而且临死,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晴雯拭泪,就伸手取了剪刀,将左手上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都与宝玉道:"这个你收了,以后就如见我一般。快把你的袄儿脱下来我穿。我将来在棺材内独自躺着,也就像还在怡红院的一样了……"

这时的晴雯,不但把一生都交付给了宝玉,而且把下世、来世也交付给了宝玉,其实她心里已知足了,因为她终于可以伴着宝玉的袄儿去了。虽然不是宝玉这个人,可是身为丫环,这宝玉的袄儿就是她情感的最高、最终的寄托。

宝玉此时的后悔是可想而知的,他在晴雯死后偷偷地独自为晴雯做了祭悼,并做《女儿芙蓉诔》。此时他才看清晴雯像火红的莲花,是自己身边的一枝艳红之玉啊!祭文中他写道:

"……自为红绡帐里,公子情深;始信黄土垄中,女儿命薄!汝南泪血,斑斑洒向西方;梓泽余衷,默默诉凭冷月……"

曹雪芹老先生又展示了这么一幅扼杀人性的画卷给我们,我们又说

什么呢？还有人说这是活该？是晴雯太刁钻？

(三)《红楼梦》对人性的张扬之二——贾政、宝钗与袭人

人性发展的方向性也是无限的，所以遵从圣教祖训以图荣华富贵本也是人性的一面。倘若宝黛晴三人太柏拉图，太离谱，那贾政、宝钗和袭人应是走儒术正途的君子淑女了。他们"存天理、灭人欲"地追求自己的目的，不管怎么说也是人性的一种张扬，不管怎么说也应该落个好下场。

山大王学习拦路抢劫的礼节，什么自报家门、宣布命令、讲明原因后果……也算盗亦有道，是人性之一种吧。虽然匪了些，但仍有人性在，因为你要跳将出来，横一把大刀，两目瞪圆曰："呔！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哇呀呀——呸！快点快点，各位快交钱，大人一千、小孩五百、女人八百，谁交谁过，有报销单！快点儿啊！慢交的小心加倍罚款。再说咱爷们的报销单是真的，有过路费、过桥费、环保费、超生罚款费、防火费、卫生费、节能费、还有保护大熊猫费，反正回单位能报销……"

是善是恶是邪是正都是人性的一种，所以先看下去。

1. 贾政其人与寒雪之泪。贾政，其实是假正经的谐音。这个人很无趣，但正统，反过来说，即：越正统越无趣。他和贾雨村、贾珍是一类人，当官效忠皇上，搜刮人民，四平八稳地承袭祖上，理直气壮地管教子孙。他们这些为官为吏的，都有"护官符"，就是官官相护的联络图。这图叫"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护官符"时时提醒官吏们对贾家、史家、王家、薛家要多多关照，同时这些官吏又相互通亲形成一个自成系统的网络。贾政是贾家长子，贾母是史家老太太，史湘云也是史家后代；贾政老婆王夫人是王家的人，凤姐和她是娘家人；薛蟠、宝钗是薛家的人，而宝钗的母亲薛姨妈又是王夫人的妹妹。这贾史王薛四家勾勾搭搭的关系，成了红学家研究的一门课题，可见复杂得可以。

在对待人民上，这个官僚层就狠得不成。大家看看乌庄头每年交赋税的单子就成了，可贾珍仍是不满意。

在对待皇帝上，这个官僚层是忠得没了谱，自己的女儿当了妃子，马上高出娘家人若干等，贾政也要跪下双膝。



……贾妃垂帘行参等事。又隔帘含泪谓其父曰："田舍之家……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贾政亦含泪启道："臣，草莽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今贵人上锡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幸及政夫妇。且今上启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恩，虽肝脑涂地，臣子岂能得报于万一……"

真该抡圆了给贾政一个大嘴巴子。自己亲闺女和你说话，那儿来的假正经？一个人的人性泯灭到如此"崇高"，就是假的了。

后来锦衣卫查抄荣宁府，贾政被革了职。在高鹗续书中让这位老兄再官复原职。宝玉考中举人后去当了和尚，老兄送贾母、黛玉等人的灵柩到了常州，天寒下雪，船儿冷冷地泊下。贾政猛抬头看见一僧一道和宝玉，追了出去……但雪茫茫的一片，全了无踪迹。

贾政掉下泪来。众人道："宝二爷果然是下凡的和尚，就不该中举人了。怎么中了才去?"贾政道："你们哪里知道，大凡天上星宿，山中老僧，洞里的精灵，他自具一种性情。你看宝玉何尝肯念书，他若略一经心，无有不能的。他那一种脾气也是各别另样。"说着，又叹了几声。

难得贾政会落泪，失去儿子之痛终于打掉了他的假正经。虽然只一会儿，但这是人性啊。可惜，老先生理学已根深蒂固，浸入骨髓了。

这么一个由封建社会与儒家理学塑造出来的人，竟被封建社会和儒家理学封杀，真不知寒天雪地里这几滴泪让我们后人猛醒否？让我们后人明白了什么？有谁还会毫无情感而一味地说"活该"呢？

2. 宝钗其人与活寡之大义。薛宝钗，豪门千金。她家是经商的，所以重利轻义是其性格中的一部分。既然有了功利的因子，也就决定了她的冷酷无情，宁可牺牲别人也要保全自己。小红和坠儿在谈私情被她撞见，眼看要败露时，她灵机一动说："颦儿(黛玉)我看见你了，看你往哪儿跑。"于是这个偷听人家说悄悄话儿的罪名就栽到黛玉头上了。

但是她也决不开口招惹是非，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谁也不得罪。于是这个一问三不知的人就得了个"贤慧"的好名头，当虚伪被宽厚端庄严严地包裹起来后，她终于得逞了。

她爱宝玉，她懂只要自己守妇道，那宝二奶奶的位子非己莫属。她会"无生法忍"，懂回互，她懂绝不能干"即心即佛"的事儿，要干《参同契》那

样宾主五位相互回互的事儿。所以她是《红楼梦》中最最正统，最最标准的正人女子。当然，有如此贤慧，就有了好报，真的当了宝二奶奶。而且这宝二爷竟中了举，看来弄个诰命夫人已不成问题。前程似锦只因点滴积攒，决胜千里只因帷幄运筹。可是她万没想到的是，宝玉走了，当和尚去了，所有的人都怕宝二奶奶顶不住，可是：

"看着宝钗虽是痛哭，她端庄样儿一点不走，却倒来劝我，这是真真难得的！"

这是她婆婆王夫人自言自语的话，不是我在瞎侃。而宝钗对这事也只是说：

"宝玉原是一种奇异的人。夙世前因，自有一定，原无可怨天尤人。"

这种"春秋大义"、"贞节大义"实在是脱俗得很、实在是让人浑身发冷得紧。

当代青年多喜欢宝钗。男青年喜欢她贤慧，是个理家的好手；女青年喜欢她就各种理由都有了，而"最科学"和"现代化"的一种理由是：宝钗是个好榜样，找个有钱的老公，怀了他的孩子就成了他家的人，然后气走他（死了更好），自己自由了，又继承了他家祖业，Good！可那个时代的女人要守活寡，要成为第二个李纨，这下面的日子怎么过？鬼才知道。有这么个故事。一女人年青守寡，死活把孩子拉扯大并考上了状元。皇上闻知此事，认为是妇女界之楷模、中华文明之典范。于是立牌坊、下旌表，让媒体再去炒作一番。可面对记者这老太太竟然不领情，她认为妇女不应守活寡。于是记者纳闷地问她如何能守呢？她说：每晚上床前吹熄了灯，拿300颗豌豆倒在地上，然后摸黑一颗颗捡起来，一个不能少。记者不信，问：就这么简单？老人说：我捡了三十年，就这么不简单。

什么意思？诸位去品。情感的事，别分析，去试试！去品！去捡一下豌豆。

宝钗信守理学，理学让她守活寡。

这种摧残人性的事儿叫贞节，倘若遇见个野男人而被辱，就必须去死，叫节烈。然后造上一个大大的牌坊，传下万世万代的芳名……我宁可给穿着宝玉小袄的晴雯立个"有情常在"的牌坊，不愿给宝钗立什么"寡气长存"的牌坊。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3. 袭人其人与欲死不能。花袭人，一听这姓就让人高兴。中国人本



对风水、相面、阴阳宅很在意，对姓则更加在意。男人，凡姓高、郑、司马、司空、东方、铁、冷……就大有来头！不是大侠也是老大；女人，姓花，那也如花木兰一样地透着有巾帼之气。鲁智深虽是大老爷们，沾上一个花字，只要不是色鬼，那花和尚的名头就成了禅门豁达的象征。看来百家姓第一位应该让给“花”，叫“花钱孙李，周吴郑王……”曹雪芹给咱弄出一个花袭人，显然也不同凡响了。

她是宝玉帖身大丫头，是“通房丫头”，因此她和宝玉偷试云雨情也不算大错。于是晴雯说她没过门就“上了头了”，黛玉管她叫嫂子；她温柔和顺，端庄而不艳，大度而通人情；她会做人，识大体，一心只为坐上妾的位置；她常常打个小报告、扎针、告刁状，也只为能一辈子伺候宝玉……再往后想：如果自己当了妾，那个正牌的妻是宝钗，那她自己这个妾就坐安稳了，如果是黛玉……那么难伺候的主儿，自己这个妾可不好当，所以她喜欢宝钗不喜欢黛玉，常常到王夫人面前说宝钗的好话、黛玉的坏话……让咱们局外人评一下，这是袭人一辈子的事儿，搞点儿小阴谋也合情合理。

总之，在她身上没有不合情理的事，要不怎么说是儒家理学培养出的下人呢，连宝玉踢了她一脚，一辈子落下咳血的病都没关系，主子打奴才也是应该的。

这个人物简直没味儿，不知让人说她什么好。于是宝玉出走了，她必然要节烈地去死才合理。但是自己只有其实却没名分，还没正式地被纳为妾呢，所以不能死在贾家。可自己已不是姑娘了，如何嫁人？让外人知道了，如何做人？所以只有离开贾家再去死。她哥哥花自芳把妹妹接回家——不接也不成了，呆在人家算怎么回事？——但又不能死在哥哥家。

“哥哥办事不错，若是死在哥哥家里，岂不又害了哥哥呢。”

只好听哥哥的嫁给蒋家，满打满算死在那该死的蒋家才好……

“岂知过了门，见那蒋家办事极其认真，全都按着正配的规矩。一进了门，丫头仆妇都称奶奶。袭人此时欲要死在这里，又恐害了人家……”

这个蒋家的新郎就是蒋玉菡，是《红楼梦》第二十八回中说的那个唱小旦的琪官。他和宝玉第一次相识是在冯紫英家的酒桌上，大家在行酒令时蒋玉菡无意说道：“花气袭人知昼暖”，而薛蟠认为他是喜欢宝玉的袭人，该罚酒……后宝玉赠蒋玉菡一个玉扇坠，蒋玉菡赠宝玉一条大红汗巾子。因宝玉与袭人的关系，所以宝玉把这红汗巾子又送给了袭人……后，

当蒋玉菡从袭人那儿看到这条大红汗巾子，方知自己娶了宝玉的女人，于是对袭人：

深为叹息敬服，不敢勉强，并越发温柔体帖，弄得个袭人真无死之所了。

高鹗写的这段不可信。那个社会作为男人没结婚先当王八，还对袭人“深为叹息敬服”，能有这回事儿？不管怎么说，还是信书上的吧。有一个好归宿，这一回真是袭人的造化了。但袭人欲死不能、要节无因、要烈无缘、要贞更无名，这就大大地破坏了“妇女春秋大义”，但这是谁害的她？是宝玉？是王夫人？是她哥？是蒋玉菡？

这不得不让我想起一个当代的故事：某个地区假货猖獗，人人都认为“要好过、造假货”！上级领导决定加大打假力度，特派贾主任亲自抓一下。贾主任从医院的老赵开始调查。老赵因长针眼在医院治得又得了痔疮，原因是钱某人提供的药品是假的，于是去调查姓钱的。一问，钱某人在高速路上翻车死了，因为孙某造的高速路是豆腐渣工程，于是调查姓孙的。再一问，姓孙的被撞死了，只因开车的李师傅买了周记车行的假刹车片。于是再调查姓周的，一问，姓周的正打官司呢，他儿子在幼儿园吃了假香肠，在医院抢救不及死了。人家死了儿子，只好先放一放，查那个造假香肠的吴记熟肉店。一进门，说明来由，这吴某登时大怒，定逼着贾主任调查一个姓赵的老板。因为他那儿产的裤子全是假货，害得他在大厅广众下裤子开线丢了脸面，定得弄他十万元的精神补偿。

贾主任记下事由，猛然想起赵某就是那个得痔疮的主儿，本是原告啊……

闷闷不乐地去吃饭，小心翼翼地要了二两山东白酒几盘小菜吃起来。酒足饭饱，猛抬头看见墙上写着：“正宗山东杏花村，不是山西杏花村，想当年慈禧逃跑时亲尝过，绝对御用。”贾主任一看，拔腿就往医院跑。饭馆小老板乐了，白捡一个皮夹子，打开一看还是打假办主任的。一转身看见小舅子进来了，乐得眉开眼笑地说：“你可真行，一身假公安的衣服，把打假的吓跑了，妈妈的，白捡他妈的一个钱包”。

谁在坑害谁？全地区都造假，谁都在坑谁，越坑越穷，越穷越坑。而全社会都在假正经地弄理学，谁在坑谁？谁都在坑谁，越痛苦越坑，越坑越痛苦。



这一小节讲的三位，代表了正统一派的人物。

他们的痛苦难道也能叫活该？

（四）《红楼梦》对人性的张扬之三——王熙凤与薛蟠

1. 王熙凤其人与临终托巧姐。凤姐，是南京王家之望族豪门，她爷爷管各国进贡朝贺事宜，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他们王家管的。所以凤姐的组织能力、指挥能力和商人气，显然是与这家庭环境的熏陶有关。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对她的评价是：说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她从小是"自幼假充男儿教养的"，官场、商场进进出出早已耳熟能详、习空见惯，这为她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凤姐嫁到荣府时，这百年望族的荣府已呈衰败。正好，她用自己的智慧、能力、胆量与魅力挑起荣府总管的重担，集财、经、人事诸权力于一身。她背靠老祖宗（贾母）、王夫人，周旋于各位爷和各位夫人小姐之间，成了家族中不可或缺的一只辣味的凤凰。

她的理财治家的领导能力管理能力，可在"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中看出：

（她）便又吩咐道："这二十个分作两班，一班十个，每日在里头单管人客来往倒茶，别的事不用他们管。这二十个也分作两班，每日单管本家亲戚茶饭，别的事也不用他们管。这四十个人也分作两班，单在灵前上香添油，挂幔守灵，供饭供茶，随起举哀，别的事也不与他们相干。这四个人单管酒饭器皿，少一件，也是他四个描赔。这八个单管监收祭礼。这八个单管各处灯油、蜡烛、纸札，我总支了来，交与你八个，然后按我的定数再往各处去分派。这三十个每日轮流各处上夜，照管门户，监察火烛，打扫地方。这剩下的按着房屋分开，某人守某处，某处所有桌椅古董起，至于痰盆掸帚，一草一苗，或丢或坏，就和守这处的人算账描赔。来升家的每日揽总查看，或有偷懒的，赌钱吃酒的，打架拌嘴的，立刻来回我。你有徇情，经我查出，三四辈子的老脸就顾不成了。……卯正二刻我来点卯，巳正吃早饭，凡有领牌回事的，只在午初刻。戌初烧过黄昏纸，我亲自到各处查一遍，回来上夜的交明钥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过来。说不得咱们大家辛苦这几日罢，事完了，你们家大爷自然赏你们。"

凤姐是荣府的人，因宁府的秦可卿死了，她过来帮助料理丧事。当着上百号人能一口气不打嗑巴地分派停当，这个水平就已经不简单了，没十年八年的训练怕是不成。最主要的是她能一下抓住事物的本质，看清管理一个大王府的关键所在，这才是她的真本事。当宁府求她去协理丧事时，书上是这样描述的：

这里凤姐儿来至三间一所抱厦内坐了，因想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第二件，事无专执，临期推诿；第三件，需用过费，滥支冒领；第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纵，有脸者不服钤束，无脸者不能上进。此五件实是宁国府中风俗……

针对这些弊端而去下命令施行政，这就是凤姐的领导艺术。即：

止而后观，观而后策，策而后令，令而后行。

先静下来，思考其弊，定出策略条律，下明晰的命令，再去施行。

今天，我们只知先止而后观，真应学学凤姐，把这门艺术施行到底。所以应学："先止，而后观。观而后策，策而后令，令而后行"。也可以简化成：

"止观策令行。"

这是个领导艺术，管理艺术的秘诀。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做，吾以观复。"

也是说"先止而后观，观而知复"，再往下老子说：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是说修道人在"止、观、复、根、静"之后，已从"悟前修，入空寂"到"出世悟"了，悟的什么？悟的"常与明"。于是拿这个"常与明"再"入世悟"，那"入世悟"悟出了什么？老子说：

"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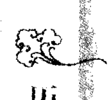
"入世悟"一定要悟到"容与公"，这样才可能去"入世行"。而"入世行"就是：

"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也就是"全、天、道"。

简化一下：





"悟前修"是：止、观；

"入空寂"是：静、命；

"出世悟"是：常、明；

"入世悟"是：容、公；

"入世行"是：天、道。

也可以说是：

"止、观、静；常、容、天。"

凤姐的"止观策令行"是领导艺术之秘诀，老子的"止观静，常容天"是修道艺术之秘诀。

凤姐如果像探春一样为了挽救荣府而管家，则荣府可能还有起色。但她却是为自己私利而管家，她见钱如命、贪得无厌，谁的银子都敢挣；她经营高利贷，让来旺媳妇当她的经济人，平儿当她的助手；她挪用月例（大家的工资）当资本放高利贷，一年收入一千多银子。

到"锦衣卫查抄宁国府"时，凤姐一共黑了多少银子呢？没人知道。书中说：

一回儿又有一起人来拦住王爷，就回说："东跨所抄出两箱房地契又一箱借票，却都是违例取利的。"老赵便说："好个重利盘剥！很该全抄！请王爷就此坐下，叫奴才去全抄来再后定夺罢。"

荣宁两府并没多少财产，只是凤姐的"两箱房地契又一箱借票"是违例的东西。可见原是政治斗争来抄查，但抄查出了经济问题，连累了荣宁两府，这个罪魁就是凤姐。

本来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弄到头是"反算了卿卿性命"。凤姐无子，只一女巧姐。因从她这儿抄出经济问题而连累大家，所以羞惭而病，眼见得一日不如一日，夜夜梦见鬼来索命、尤二姐来索命。于是命人找来刘姥姥，在病床前对姥姥说：

"不然你带了他（巧姐）去罢。"刘姥姥笑道："姑娘这样千金贵体，绫罗裹大了的，吃的是好东西，到了我们那里，我拿什么哄他玩，拿什么给他吃呢？……那么着，我给姑娘做个媒罢。我们那里虽说是屯乡里，也有大财主人家……"凤姐道："你说去，我愿意就给"……

正如薄命司中对凤姐的判词：

……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

世，终难定！

曹先生认为凤姐的命运是难以断定的，其实很易断定啊，这个社会连宝黛这种人，连贾政宝钗这种人全封杀了，能剩下凤姐么？

2. 薛蟠其人与重新做人。薛蟠，薛文起也，是宝钗的亲哥哥，在演说荣国府一节对此公的评价是：

“这薛公子的混名人称‘呆霸王’，最是天下第一个弃性尚气的人，而且使钱如土……”

本书第四回这个呆霸王一亮相，就是：既打了冯公子（三日后死了），夺了丫头（英莲），他便没事人一般，只管带了家眷走他的路。

这样的货色，居然一路的没事，反正有钱有权有势，总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书中说他：

人命官司一事，他竟视为儿戏，自为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

自薛大爷认识柳湘莲，便认为柳某人是一般的戏子，可以任人玩弄的。那个年代富家公子与男戏子搞同性恋似乎很时髦。而柳湘莲本是世家弟子，根本不是优伶中人，且拳脚又好生了得，齐了，薛大爷的这顿打算挨定了。一辈子没吃过亏没服过软的呆霸王，此时：

薛蟠便乱滚乱叫，说：“肋条折了。我知道你是正经人，因为我错听旁人的话了。”湘莲道：“不用拉别人，你只说现在的。”薛蟠道：“现在没什么说的。不过你是个正经人，我错了。”湘莲道：“还要说软些才饶你。”薛蟠哼哼着道：“好兄弟。”湘莲便又一拳。薛蟠“嗳哟”了一声道：“好哥哥。”湘莲又连两拳。薛蟠忙“嗳哟”叫道：“好老爷，饶了我这没眼睛的瞎子罢！从今后我敬你怕你了。”湘莲道：“你把那水喝两口。”薛蟠一面听了，一面皱眉道：“那水脏得很，怎么喝得下去！”湘莲举拳就打。薛蟠忙道：“我喝，喝。”说着说着，只得俯头向苇根下喝了一口，犹未咽下去，只听“哇”的一声，把方才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湘莲道：“好脏东西，你快吃尽了饶你。”薛蟠听了，叩头不迭道：“好歹积阴功饶我罢！这至死不能吃的。”

就这位薛大爷，喜新厌旧，纳香菱后又娶了夏金桂，还勾搭上夏金桂的丫环宝蟾。于是中了恶妇夏金桂的计，日日向老婆低声下气，这也叫恶人自有恶人磨。

当元妃死后，荣宁两府衰败，薛王两家跟着垮了下来。这时再打死





人，就没那么容易逃脱干系了。第八十六回，薛蟠打死张三，家中使尽了银子，案子翻了几次还是死罪。直到宝玉中举后，高鹗老先生才弄出一个大赦来，于是薛大爷终于回到家。此时夏金桂为了毒死香菱（原名英莲）而自己中毒身死，丫环宝蟾也被夏家领走。于是薛蟠自己立誓说道：

"若是再犯前病，必定犯杀犯剐！"薛姨妈见他这样，便要唔他嘴说："只要自己拿定主意，必定还要妄口巴舌血淋淋的起这样恶誓么！只香菱跟了你受了多少的苦处，你媳妇已经自己治死自己了，如今虽说穷了，这碗饭还有得吃，据我的主意，我便算他是媳妇了，你心里怎么样？"薛蟠点头愿意。

高鹗老先生终于让薛大爷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了。且不论高鹗的续好不好对不对，只是按他老先生的说法，这薛家也让这呆霸王弄得穷了，而"呆霸王"这个人已被封杀。过去的薛蟠已死了，那个任情任性胡作非为的薛蟠已死了。

在这一节里，我们又看了凤姐之死和薛蟠之死，这两个人都是大恶人，是让人恨的主儿。在这个社会里他们的命运和其他人一样，都一律"活该"地没个好下场。

（五）清王朝对人性的全面封杀

我们用三小节，列举了三类人。

第一类人是对封建礼教具有叛逆性的，代表人物是宝玉、黛玉、晴雯……展开联想，我们可以说这类人是道家的自然人、诗仙李白、讲即心即佛的马祖、私会的张生与莺莺、闹天宫的孙悟空与造反的梁山好汉……他们是心学家，但这类人的命运都令人掉泪。

第二类人是拥护封建礼教绝对忠于封建王朝的，代表人物是贾政、宝钗、袭人……展开联想，我们可以说这类人是儒家的社会人、诗圣杜甫、讲回互的石头希迁、守礼教的崔夫人、一本正经的唐僧、忠义盖世的关公……他们是理学家，可他们的命运也都让人不由得不同情。

第三类人是凤姐和薛蟠，他们具有资产阶级萌芽时的思想，他们对封建礼教不对抗也不拥护，能利用就利用，一心想着挣钱。换一个角度说，他们是十恶不赦的坏人。所以他们落得悲惨的下场本应是罪有应得大快人心，可是却不然，我们同样会为他们叹惜。

《红楼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近六百人，按行业分有种地的、做小买卖的、乡坤、地主、读书的、戏子、佣人、奴才、官兵、王爷、妃子、小姐……有谁落得个好下场？

按个性分，有温和的、暴躁的、奸诡的、光明的、随顺的、叛逆的……有谁享尽了人间太平？

按人性发展的方向分，有追求爱情的、有追求仕途的、有追求钱财的、有追求名声的、有追求平安的、有追求享乐的……谁又真的追求到了？

按人性发展的层次上分，在追求爱情的方向上有宝黛型的求神通、有宝钗型的求名分、有袭人型的求个靠山、有薛蟠型的求个性欲、有夏金桂型的求个刺激……；在追求钱财的方向上，有凤姐型的契据成箱、有薛家型的大手大脚、有坠儿型的小偷小摸、有刘姥姥型的只满足打个秋风……；在追求功名上有贾兰的苦读、有贾雨村的"护官符"、有贾瑞似的老师、有环哥那种求学法、有一班围在贾政身边大赞宝玉有灵气的文人……

《红楼梦》啊你太广博，你讲的人讲的事太多太多……但不论是即心即佛的还是讲回互的，统统被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啊……

《红楼梦》啊，你又太单一，你讲的只一件事——全部统吃！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啊……

曹雪芹啊曹雪芹，您这是怎么了？就不能"偶尔"地"漏网"一个半个，让大家有点儿希望么？

让人深思的是什么？

不是曹雪芹心黑，黑的是这个社会。

封建社会作为一个网络，它必定有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同时必定有一个为这政府服务的主流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儒家理学，是封建礼教。

而一个政权作为网络，其中央到省到县乡都有一定的宽容度、自由度，也叫缝隙，这样才有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但这时已一丝缝隙全无，对待政府成了不是拥护中央，就是反对中央，中间地带是绝对没有的。

作为一个观念，从个性到共性也必然要有一定的宽容度、自由度，也叫缝隙。这样才有即心即佛的灵性与法律民俗的相互"回互"。但这时也已一丝缝隙全无，做人的标准成了不是君子就是小人，中间地带是绝对没有的。

这种简单明了地划分，造成“纯忠君子”式的检验人的一种社会标准。一个人对皇上要绝对绝对地忠，叫纯忠；一个人做人要绝对绝对地灭人欲，叫君子。

好一个“纯忠君子”，拿这个标准，曹雪芹打杀了《红楼梦》中所有的人、及这些人的所有的追求、及这些人的所有的个性、及这些人的所有的希望……我看曹先生还是手软，让金圣叹或冷什么铁什么人写个《黑楼梦》，则能打杀天底下所有的人：关羽放走曹操是为不“纯忠”，杀无赦；诸葛亮错用马谡是太重人情而不“君子”，杀无赦；李白醉酒街头，杀！杜甫有反朝廷的什么“呜呼”的情绪，杀！陶渊明逃避社会，杀！敢唱什么硕鼠的人，杀！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有子无教、不孝长辈，杀！还有谁来着，不让儿子当皇帝，反而禅让的舜？尧？杀！盘古，拿个斧子什么都敢砍？杀！还有，定然没杀尽！听说观音菩萨为救矿工，而于河中沐浴，于是矿工们都跳出矿来看，矿井爆炸了，救了一矿的人……这可是泛黄啊，是故意裸体啊，杀！当然，张君瑞勾引莺莺，杀！莺莺不守妇道，沉潭……杀人的人因为杀人，自己也该杀！

一个伟人，准会干过龌龊的事，因此他才明白了人生，才成为伟人。

一个艺术大师，准会有鲜为人知的情爱，因此他才明白了人性，才成为艺术大师。

一个宗教领袖（佛道儒三家之祖，别的教派的人不涉及）准会有老婆孩子，因此他才知道什么叫做人，才成为宗教领袖。

一个恶人，因为自己龌龊，所以用“纯忠君子”去找他人的毛病，一棍子打杀众人。

一个艺术匠人，只知淫欲，不知什么是情，所以他一辈子在做！做画、做曲、做音乐……

一个呆道人，不知人生，只知练功，所以呆，咱不多讲。

我讲这些话，早已大逆不道。一日某个杀人犯说：“有这么个人说：只有做了龌龊之事才成为伟人，所以我杀人无罪，因为我想做伟人。”惨了，我成了教唆犯。

想做伟人而去龌龊，是借口；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事后发现自己很龌龊，是成熟。

明清两代，人们为了生活生存，努力地抬高“纯忠君子”，努力地争取

当上“纯忠君子”，所以人的观念就很纯、很正。正是这个很纯很正的“纯忠君子”观念，翻回头打杀了所有的人，包括这个政权。

曹雪芹老先生“嗜酒狂放”，于热泪和激愤中写的《红楼梦》要告诉我们的正是这“纯忠君子”的罪孽啊。

现如今，在我们看完《红楼梦》，擦去眼角的泪水后，学到了什么？最起码别学“纯忠君子”，要待人以宽，要懂得“莫以一眚掩大德”，要学禅师们的“不言善恶，各自去修”。

很多人热衷于他人的徘闻、隐私或不检点的事，然后斥骂一番、不屑一番，这就是受了“纯忠君子”之毒。请大家告诉他，除了十三陵的石人，哪个那么纯？那么正？那么君子？

有的修行人告诉我他的师傅如何如何不贪、如何如何不色、如何如何不淫……我回答说：“你师圣人也，吾追之不及，下世再学去。”而我的徒弟问：“您讲的是真的？”我说：“绝对没错。铜佛像尚有沙眼、木佛像尚有树芭，何况人乎？而他的师傅无错、无谬、无芭、无眼……不是人！木石也！我是人，如何学他师呢？”

总而言之，《红楼梦》告诉我们，当封建政权发展到清朝的高度集权专制；当主流观念发展到清朝的高洁度“纯忠君子”，那人性就全部被封杀了，这个社会也“大厦将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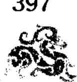
（六）《红楼梦》在中国人思想和情感发展史上的位置

依“情理发展表”看，《红楼梦》处在第三层次第一位。它与《诗经》、《西厢记》一样都是以言情而开创了一个新的层次，它本身就是这个新层次的序曲。

再用“一表五法”去研究《红楼梦》，似乎太烦人了，我们就随意分析一下吧。

1.“情感倾向”与心理描写的作用。《红楼梦》已脱离了说话艺术的话本，超越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种章回体的可以评说的半文字艺术领域，进入了纯文字艺术的小说领域。

在纯文学的小说中，它已不具有“聚众效应”，所以纯忠义和纯情感的渲染与夸张都显得单薄。它适于心理描写，适于人物动机等这些非情节性、非故事性的描写。这样“艺术地解除逆反心理”已由“二踢脚式”和“说



故事式”进而又增加了“情感倾向式”。

“情感倾向式”的“艺术地解除逆反心理”，是由文字描写人物内心感觉时，令读者产生情感认同继而消除了逆反心理的，它使读者的情感很快被全部吸引进作品之中。

这种方式产生于人们的同情心，对弱者的怜悯心。一个人做了坏事，这是很让人憎恨的，可是当他向你讲他的情感、讲他的酸甜苦辣时，你会不由地生起一丝同情。例如在凤姐临死前有这么一段描写：

凤姐心里更加悲苦。贾链回来也没有一句贴心的话。凤姐此时只求速死，心里一想，邪魔悉至。只见尤二姐从房后走来，渐近床前说：“姐姐许久的不见了。做妹妹的想念的很，要见不能，如今好容易进来见见姐姐。姐姐的心机也用尽了，咱们的二爷糊涂，也不领姐姐的情，反倒怨姐姐作事过于苛刻，把他的前程去了，叫他如今见不得人。我替姐姐气不平。”凤姐恍惚说道：“我如今也后悔我的心太窄了，妹妹不念旧恶，还来瞧我。”……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声也哀。凤姐当着人能如此否定自己，虽说是在梦里，也可算是实话，是她心里真心地忏悔。当读者读到此处，能体味到凤姐也是个人，是个女人。她没生个儿子，只有巧姐；她不让贾琏纳妾，她害怕漂亮贤慧的尤二姐生下一男半女的，自己的位置就不保了。她的心思只在保护自己，这是她的隐痛处。当我们知道了她的隐私，不由得也为之叹惜。虽然我们仍很恨她，恨她心狠手辣，恨她逼得尤二姐吞金自杀……

不再举例。

用心理描写给读者一个“情感倾向”，这就使得人们于同情中，不知不觉地消除自己内心的成见，而融入书中的人物中去，这是从艺术手法上看问题。而要从中国人思想情感的发展来看，这种“情感倾向”必然造成了人物思想的复杂和人物情感的复杂。从以上凤姐临终与尤二姐的对白，不难体会到凤姐于情于理的复杂心理。可以说《红楼梦》最终确立了心理描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这种确立也是中国人在情和理上走入复杂与辩证共存的必然。

2. 写生活——对生活琐事描写的作用。如果说《三国演义》等话本式的小说以“说故事”的方式把听众引入故事情节中，而把“忠义”、“官逼

民反”等思想观念根植于听众的潜意识中，那么《红楼梦》则开辟了一个仔细入微、不厌其繁地描写场景、人物、事物的方式，这种方式传达出一种潜信息，这个潜信息会于不知不觉中根植于读者的潜意识中。

这种方式我们称“写生活”。

书中说刘姥姥一进大观园，初见凤姐时是这样描写的：

……忽见周瑞家的笑嘻嘻走过来，招手儿叫他。刘姥姥会意，于是带了板儿下炕，在主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和他唧咕了一会，方过这边屋里来。

只见门外錾铜钩上悬着个大红撒花软帘，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红毡条，靠东边板壁立着一个锁子锦靠背与一个引枕，铺着金心绿闪缎大坐褥，旁边有雕漆痰盒。那凤姐儿家常带着秋楹貂鼠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平儿站在坑沿边，捧着小小的一个填漆茶盘，盘内一个小盖钟。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内的灰，慢慢问道：“怎么还不请进来?”一面说，一面抬身要茶时，只见周瑞家的已带了两个人在地下站着呢。这才忙欲起身；犹未起身时，满面春风的问好，又嗔着周瑞家的怎么不早说。刘姥姥在地下已是拜了数拜，问姑奶奶安。凤姐忙说：“周姐姐，快搀起来，别拜罢，请坐。我年轻，不大认得，可也不知是什么辈数，不敢称呼”。周瑞家的忙回道：“这就是我才回的那姥姥了”。凤姐点头。刘姥姥已在炕沿上坐了。板儿便躲在背后，百般的哄他出来作揖，他死也不肯。

就这么个相见，用了四百多字。从中我们品出凤姐的傲、平儿的卑、周瑞家的敬、板儿的生和刘姥姥的俗。但这是你品出来的，是潜信息，人家曹雪芹可一字没说，他老先生只是不紧不慢一笔一笔地写，所写那么真实而琐碎，这就是“写生活”。

当刘姥姥二进大观园时，有吃茄鲞一段，文中是这样写的：

贾母笑道：“你把茄鲞搛些喂他”。凤姐儿听说，依言搛些茄鲞送入刘姥姥口中，因笑道：“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的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刘姥姥笑道：“别哄我了，茄子跑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众人笑道：“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刘姥姥诧异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凤姐

儿果又搛了些放入口内。刘姥姥细嚼了半日，笑道："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告诉我是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钉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丁一拌就是。"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

就这么个茄干拌鸡瓜（鸡丁），曹雪芹借凤姐的嘴给咱们详详细细地介绍了制作的全过程。烹饪大师品出了一道美味的菜、穷人品出了富人生活的奢侈、哲学家品出了剥削、历史学家品出了饮食文明、红学家品出了甲乙丙丁种道理和 ABCD 条妙处。不管怎么说，凤姐的卖弄和刘姥姥的人来疯应是最浓的味道。这里曹先生也只字未提，他只是写出一段生活真实。

综上所述，对生活琐事（场景、人物、动作、事物等）仔细入微的描写，是由话本小说"说故事"到纯文学小说的"写生活"的进步。

"说故事"需夸张，"写生活"需真实；"说故事"以大侠英雄伟人为主人公，"写生活"以平头百姓为主人公；"说故事"要有轰轰烈烈的事业，"写生活"只是端茶倒水般的生活小事；"说故事"的语言简炼且有强烈的情感倾向，"写生活"的语言啰嗦平实，看似一点儿情感全无；"说故事"的背后总是隐藏着忠义侠烈大道理；"写生活"的背后只是蕴含着酸甜苦辣的人生情感、情趣、情绪与趣味……

3. 对生活与事件的勾勒渲染。艺术，说到底是讲叙情与理的辩证存在；哲学，说到底是讲叙情与理的思辨。

艺术既然是讲情与理的辩证存在，那讲的就是人，因为只有人才有情与理。一切艺术逃不出人的范围，拟人化也在这个范围里。美，作为艺术的一个因素，它可以是非人的。如秩序的美、方正的美、自然的美……丑，亦复如是。

可以说，艺术就是讲人，人的美与丑、人的情与理。

讲人，就要有人物、背景、情节、生活、事件……所以艺术，尤其是小说这门艺术，实际上是讲人物。讲人物在什么环境里、怎么生活、干了什么事。简称为"人物的生活"。

而事件，不论婚丧嫁娶、天灾人祸、地震台风、起义兵变……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我们可以简称为——“事件中的人”。

“人物的生活”和“事件中的人”是艺术的两件法宝。

“蒙娜丽莎”是讲人物的生活，“滑铁卢之战”是讲事件中的人；“五哥放羊”是讲人物的生活，“嘎达梅林”是讲事件中的人；“维娜斯”是讲人物的生活，“虎门销烟”是讲事件中的人。

杜甫的《望岳》、《赠李白》、《三吏》、《三别》……都是讲事件中的人，但串起来却是人物的生活。《三国演义》从“桃源三结义”到“三分归一统”讲了大大小小不少事件，串起来讲的是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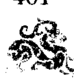
在《红楼梦》之前，文学家艺术家善于讲事件，善于用事件串成生活，从而写出人。但真正的描写生活，从生活中去讲人，却是极少见的，而且也绝不似《红楼梦》这么典型这么动人。《红楼梦》开创了从“人物的生活”去描写人的艺术之路。

从“人物的生活”去描写人这条艺术之路，其要点是娓娓道来。要像国画那样层层地一勾、二勒、三渲、四染，不要着急，不要全盘托出。不要：“这位大侠祖籍沧州、十八辈的武术传人、刀枪剑戟，不学都会……辗转腾挪，一看就知……髯子如钢针扎拉拉一大片，为人义气、爱打不平，东山打过虎，西山套过狼……见钱财从不眼开，见女人从不动心……今年四十有三，尚未娶妻……”

要学会以勾勒渲染，用零零散散的笔触从生活中慢慢把人物组合出来，凸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品出来，作者不要主观的主动地去讲。因篇幅的关系，我们不再举例，大家有暇可以慢慢地去欣赏《红楼梦》，每个人物都是这么妙不可言地勾勒渲染出来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

而通过事件去看“事件中的人”，本是话本的章回小说之长。“草船借箭”中，诸葛亮的沉稳、鲁肃的慌张、事后周瑜的愤然都让人觉得可信。而“抄捡大观园”，凤姐、袭人、晴雯、迎春、王善宝家的……这些人物都在表演，个个活灵活现，让人读起来书香四溢、其乐无穷。这是曹先生妙笔生花，一件事写出几十号人。

有的文学家把从“生活中写人”和从“事件中写人”认为是“多笔一用”和“一笔多用”。也可以这么讲，但我认为不确切，应该说这是从生活中和事件中这两个地方，层层地勾勒渲染人物。在生活中写人，是娓娓道来地



勾勒渲染一个人物；在事件中写人，是宏观大气的皴擦众多人物——有的人物是勾、有的是勒、有的是渲、有的是擦……亦或兼而有之，亦或对象是几个人、几十个人。

总之，用勾勒渲染去写生活、写事件，通过生活和事件写出一大批人物，这是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手法，是大手笔方可掌握的艺术技巧。

综上所述，当人们的思想和情感日趋复杂和精细后，是曹雪芹先生用《红楼梦》给我们立起了一座丰碑。这座丰碑是中国人情与理的人性之碑，是文学艺术之碑，同时也是哲学的预言。

作为人性的丰碑，曹先生给我们这些后生晚辈展示了什么？这就是人性在发展方向上的无限性和发展层次上的无限性。

作为文学艺术的丰碑，曹先生打破了章回体小说情节单一的结构，用“心理描写”、“写生活”和“勾勒渲染”写出人性中情与理的碰撞、写出了个性与共性的碰撞。

说它是哲学的预言，是因为曹先生告诉我们：当社会、当封建礼教全面彻底地封杀人性发展的所有方向和所有层次时，“忽喇喇大厦将倾”，这个社会这个礼教的丧钟就被它本身而敲响。

漓漓拉拉，这一部分写了这么多，让诸位讨厌了。谢谢诸位能耐着性子看到此。

这一部分对读者可能有用的东西：

说唱艺术的“聚众效应”。

一表五法：一表即“情理回互发展表”，五法为：作者、情感、网络、情理发展、背景。

两种止观：王氏止观：止观策令行。

李氏止观：止观静，常容天。

解除逆反心理三法：二踢脚、说故事、情感倾向。

纯文学的特点：心理描写、生活描写、勾勒渲染。

结束语

一、四个要讲清的问题

这本书终于要结束了，洋洋洒洒东拉西扯谈得很杂很乱。其实讲文学艺术讲禅韵，都是为讲人性服务的。而明白了人性也只是“出世悟”，也就是你知道了 2=1+1 这么个理论，它不入世则一无是处。

入世才可以谈活着的人性，而非人性之标本。活人性就必结合历史、必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奴隶社会时你谈婚姻自由？怕是部落的酋长先把你烹了去祭盘古或女祸。当今社会你讲“奏古之乐演天之礼”？先吃七天素，再焚香沐浴方可演奏“高山流水”、“昭君出塞”？怕是音乐厅外先办个斋七宾馆，再办个澡堂子和焚香寺……

看来人性的入世，是与历史和环境紧密不可分的。

（一）什么叫历史

历史，就是人类的物质文明史和精神文明史之合称。

人性，是随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而渐次步入人类历史的。如：对饮食的要求逐渐提高，呈现出饮食艺术；对起居的要求逐渐提高而出现车的艺术与居的艺术；对爱情质量的提高而出现心心相印的爱情颂歌；对人类探索世界的兴趣提高而出现了自然科学、哲学；对人自己人性的探索和研究出现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及艺术、宗教……乍看起来，似乎是先有了两个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后才有了人性的发展余地。这个理论也有它的道理，但是细细品味，人类为什么要追求两个文明呢？每日里喝山泉水、吃野果子，碰巧儿打雷闪电劈死了个牛啊羊的，大家还开一次荤。于是全部落的人围着火边烤全牛烤全羊边大跳野性十足且极现代的舞，不好么？反正是咱们的祖先不认可。他们追求喝矿泉水、XO；吃满汉全席或肯德鸡；欣赏交响乐和跳桑巴舞……于是有了我们这些子



孙。是他们的"欲望"推动着人类的物质文明的进程，是他们的"理性"健全着人类的精神文明的进程。可以说人性是两个文明的动力，而人性源自欲望。

刚才我们的定义是——历史，是人类的物质文明史和精神文明史之合称，现在可以说：历史，是人类人性的发展史。说白了，历史是人类欲望史。

给人类留点儿面子："人性的张扬史、发展史就是人类的历史"。

至此，我们肯定了历史与两个文明的关系，也就是历史与人性的关系。这也是本书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什么叫历史。

(二)什么叫人性

人的情感与理性辩证地存在与发展，叫人性。光讲道理不讲情感的人能不能与异性交往都成问题，那结婚生孩子就更不可能了，因为那都需要情，要有情爱、有父爱、母爱。

所以情与理二者都要有。

但谁多谁少？各占百分之几？什么时候哪个重要，什么时候哪个次要？这就牵扯到情理二者辩证的存在与发展。要亡国时没道理讲，一切要拼要抗争。秦桧讲议和的道理、汪精卫讲卖国的道理，都讲得天花乱坠，可我们不需这些道理，爱国只是情，是钟情，是情忠而已。没道理，只是情。反之法律只讲理不讲情。别说"因为他骂了我七次王八蛋，所以我才捅了他一刀！"这没用，总要有个理在。

情与理如八八六十四卦啊，乾卦代表情，坤卦代表理；乾为情、为阳、为日；坤为理、为阴、为月，二者随人性(也就是历史)的发展而在依序转动。物极必返、月满必亏，谁都有它的合理性，转动一圈叫一个轮回。老子的"道在通流"，就是说人性情理二者组成车轮，沿时间的长河一圈一圈地转动着，从而描绘出人类历史的画卷。

所以，人性："就是人所具有的情感与理性二者辩证的存在与发展"。

这是本书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三)什么是艺术

当社会观念压制人性时，人们呐喊出"硕鼠硕鼠，勿食我黍"这就叫艺

术，这类艺术叫“出水芙蓉”的美；

当人性之欲需要社会来规范时，人们歌颂关云长的忠义，怀念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希望三分归一统，这也就叫艺术，这类艺术叫“秩序方正”的美。

因欲的膨胀而贪污腐化，这不叫艺术不叫美，不叫出水芙蓉。因为这种行为一旦人人都效法，那将是种族的灭亡和人类的灭亡，所以只能叫“忘八伸头”之丑。

因遵循一个古训而不知实事求是，不知实践是检查真理的标准，这也不叫艺术不叫美，不叫秩序方正，因为这种理论打杀了人之欲、人之灵气，也就打杀了所有的人，连同他自己本身。人总要出气吧，喝西北风也要去喝吧，但这个出气和喝也算欲望啊，所以因循守旧也不是艺术、不是美，只能叫“散发着棺材瓤子味儿”的“老朽”。

艺术，“就是形象地歌颂人性于生活中辩证存在着发展着的情或理。”

因家族观念打杀了罗米欧与朱丽叶的真挚的爱情时，艺术愤然而起，歌颂这一段情、张扬人性于爱情上的美；

因希望过上更好的日子，使陈世美抛弃妻子儿女去娶公主时，艺术愤然而起，让包黑子索性铡了这喜新厌旧的东西，张扬人性于理性上追求稳定，追求秩序的美。

文戏上床、武戏上房？这种艺术家先就不明白艺术是情与理二者不可或缺的歌颂。

纯情不叫艺术，叫骂街、叫冲动；纯理不叫艺术，叫科学、或者是教条。

讲清什么叫艺术，这是本书要弄清楚的第三个问题。

（四）什么叫禅韵

人类的社会是一个网络，它是一个共性的人类集团。既然是集团，就必须有种相互辩证存在着的诸关系，我们叫网络。

儒家，试图用一种观念固定这个网络，所以它这个网络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僵死。

道家，试图用人性的欲望冲破这个网络，当时机尚不成熟时，它就走入了老庄的纯精神上的解脱。

中国人一直用儒家和道家这二者印证着人性中情与理的辩证存在，费力地、苦涩地证明二者是合理的。“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是以“生不

逢时”或“生逢其时”来被动地调剂着人的情与理。这是从人与社会，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来着眼看问题。

但这个理论系统很被动很模糊。

禅宗大师们，从个人身与心的体会出发，详查人性与社会后，以“即心即佛”宣扬了人性之欲，以《参同契》式的回互肯定了人性的规范和被束缚。“即心即佛”以三千大千佛之繁多肯定了人性中欲望的多方位性；以罗汉、菩萨、佛的等级暗示了在同一方位上欲望呈现出不同层次；而《参同契》式的回互则告诉我们在人性的方位上，有某个方向的发展必有另一个与之相反的方向的制约，这种制约是：这个方向上的层次、量级，必与相反方向上相同的层次、量级互为两端，互为对应，同时辩证地存在着，发展着。

同时禅宗告诉人们一种真正明了人性的修行方法，同时也是一种增加智慧、健身益寿的方法。

所以，禅韵，就是认识“即心即佛”和“情理回互”的相互关系与轮回方式，这是本书想尽力讲清的第四个问题。

总之，讲清什么是历史、人性、艺术与禅韵，是本书粗线条的框架。现在总结性的勾勒一下，希望诸位修行能有个总的印象。

因自己学识有限，所以不但这几个问题没讲清，同时也无智慧再涉及政治、经济、哲学、美学以及除文学以外的其他艺术。奢望能举一反三，抛砖引玉，但愿自己这砖不是茅房里的砖，又臭又硬又招人讨厌。

二、“一表五法”

在本书中我大着胆子弄了一个“情理发展表”，我知道这是很招人讨厌和反感的事情。既然诸位已看到这里，想必已反感得到了忍无可忍。可还要忍一下，听我做一个说明：

首先，看一个问题分析一个事物必定要有一个方法。绝对的真理不存在，但好的方法却是存在的。与其说学知识很重要，不如说掌握学习方法更重要，这当然是我的一家之言。但正因为我重视方法，所以我才弄出个“表”与“五点法”。其实学习方法可以有很多种，诸位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来总结，正确多少是次要的，敢于总结出方法就是创新。

“一表五法”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依据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五个特性，即：道生阴阳，道在通流和发展的全方位性、无止尽性与层次性。

（一）道生阴阳

首先，“道生阴阳”，是说宇宙万物具“时空性”。在微观世界里有个“波粒二象性”的理论，这是德布罗意在 1924 年提出的。他的这个假说是：“实物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通俗地讲是说一个基本粒子它既是实物的粒子，也必是能量的波。他的这个假说在 1927 年被科学界证实。

在哲学意义上说，就是：“物质的存在必然是运动着的存在”。没有不运动的物质，也没有无物质的运动。其实这里讲的“运动”就是“能量”、就是“力”，所以物质的存在必然是能量或力的存在。

“波粒二象性”扩张到物质世界，就是存在与运动的“阴阳相生性”；再扩展到宏观的宇宙，就是时空性。空间表述了物质的存在，以长宽高计量大小；时间表述了运动的进程，以年月日计其长短。时空在宇宙中的伸展，是全方位、无止尽的。

于是我们可以认为“道生阴阳”于微观世界叫——波粒二象性；于物质世界叫——运动与存在；于宏观宇宙叫——时空性。

（二）道在通流

其次，这个“道生阴阳”的阴阳，是不停地在转换，在发展着，这叫“道在通流”。可以说：“阴→阳→阴→阳→阴……”这种转换叫轮回，是大道发展的模式，一如你把汽车轮子看成阴阳鱼的图案，它的转动使汽车前进，也就是大道在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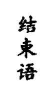
阴阳是存在，转动是运动，前为物质后为时间。

（三）发展的全方位性与无止尽性

除了“道生阴阳”，“道在通流”外，宇宙还在前进，在发展，这个前进与发展是全方位和无止尽的，同时，它又不是简单的原地打转，所以它呈现：

量变→质变→量变→质变……这么一种层次性发展。

原子核与电子组成不同的分子；





不同的分子组成不同的元素；

不同的元素组成不同的无机物；

不同的无机物组成不同的有机物；

不同的有机物组成不同的生物；

生物衍化成植物与动物；

动物衍化成人。

由“分子→元素→无机物→有机物→生物→动植物→人”的发展变化，是不同层次的跃升，也叫质变。光看到层次性和质变这两点还是不够的，还要看到量变和保证量变的条件。例如：为什么发展到了人，而原始的层次依然存在？或者说就算人类发展到了知识经济，那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市场经济就消失了？不会，作为基础它们依然存在。这种存在的必然性，是一种“自组织现象”造成的。分子里有原子核对电子的吸引力，有电子对原子核的离心力，二力平衡才使分子稳定下来。依这个道理，不同层次都有不同层次的“自组织现象”。

人，要有情感力的外求之力，同时有理性力的内束之力；社会要有激励人的求欲之力，也要有约束人的法律民俗的规范之力。只有这样，这个层次的量变才能正常进行，所以“自组织现象”是保证本层次内量变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

以上五个特性，是宇宙从微观到宏观都必具的五个特性。即：阴阳性、通流性、全方位性、无止尽性与层次性。

(四)发展的层次性

是什么东西促使宇宙的事物产生层次性的呢？

反正不是上帝，不会是有个超宇宙的神在导演着一切，而这一切是事物自身的特点决定的。

物质本身的吸引力使分子聚合，产生新的物质；人本身的欲望使有共同利益者聚合，成为团体、阶级、集团。物质原型的组合产生结构上的调整变动，而生成有机物、生物、人类；人类的团体、阶层、集团生成社会产生了人类历史。

当物质超巨型组合，压碎原子核结构后，生成黑洞，吸引力无穷大，最终导致宇宙收缩成一个点，而这个点内剧烈的运动产生爆炸，再形成宇宙。这是迄今为止，科学家所描述的宇宙。

人类社会呢？当一个社会稳定后，两个文明飞速发展。于此同时人们产生了新的欲望，要求新的组合形式，于是这个欲望冲破旧的组织形式（网络系统），新的社会形态诞生。

从上可以看出，物质的力是产生层次飞跃（质变）的动力；而物质在某个层次上的"自组织现象"是维持这个层次量变的保证。更深一层的看，它也是为下次的飞跃而在积蓄力量的保证。所以，离心力与吸引力并存，产生了质变与量变。

同理，人们的欲望是产生变革的动力；而理性的规范社会的网络，是在某个社会形态中能使之发展、使之繁荣安定的保证。更深一层地看，它也是为下次的改革而在积蓄力量的保证。而发展，呈全方位性和无止尽性。

大道理讲得太多，枯燥了些。

总之，即心即佛地歌颂情与欲这个动力，本是歌颂社会变革；情理回互的《参同契》，是在歌颂一种秩序、和谐与稳定。这是禅宗对人类的贡献。

因为社会的发展、物种的进化、物质层次的跃进，都具有量变、进化、和平安定的过程和质变、突变、改革革命的瞬间。

量变、进化、安定需要理性的回互；

质变、突变、革命需要情感的喷发。

当我们肯定：量变→质变→量变……

当我们肯定：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当我们肯定：和平→革命→和平……

当我们肯定：进化→突变→进化……

同时也就是肯定了：情→理→情→理……

所以依此理论和思路我弄了个"情理发展表"。我很笨拙地认为：两个回合为一组，即：

情→理→情→理……

其实并不见得好！大家也可以试着用："情→理→情"为一组，或干脆"情→理"为一组。不管怎么划分，只要能帮助理解就是好方法。

我弄的"情理发展表"，

第一层次是：

《诗经》→百家→诗歌→禅宗；
（情）→（理）→（情）→（理）

第二层次是：

《西厢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
（情）→（理）→（情）→（理）

第三层次是：

《红楼梦》……

（情）……

所谓的“五法”，则是以作者（或始作俑者、领导人）、对情感的态度、对理性回互（或社会网络）的态度、它所处的历史进程上的位置、它所要涉及的社会范围这五种方法（五个方面）来看问题。

应用在哲学思潮和文学作品上，就是：作者、情感、网络、情理发展上的位置和作品的背景这五点来看文学作品。

小结一下：

事物具五个特性：阴阳、通流发展、全方位性与发展的无止尽性及发展的层次性；

事物具有一个发展模式：量变质变量变……

五个特性，一个模式。

三、思维与心理的几个特点

其实这几个特点可以简称为“三个三”。

（一）思维的三种方式

第一种思维方式，是逻辑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是纯理性的，呈线性，是二元排它的，纯大脑皮层的工作方式。

第二种思维方式，是艺术思维（形象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是理性与情感相融的，呈非线性，是二元（多元）兼容的，它是大脑左半球与右半球发生联系的工作方式。

第三种思维方式，是灵感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具有禅宗悟道式的突然与直接，同时非理性。但这种思维方式必须有长期的理性思考为基础，

以突然松弛下来为契机才能发生，它具偶然性与随机性。“一分辛苦一分才”，天上掉馅饼的事没有。这种思维方式是脑干与脑边缘组织相互联通，当这种联通反应到大脑皮层后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工作方式。这种工作方式越产生的频繁，越接近神经病。它如药、如音乐中的和声，稀为贵。当这种工作方式不是由理性的思考引发的，而是由心情忧郁或强刺激诱发的，这就要去找医生了，因为这是百分之百的病态。

（二）情感的三种方式

激情的情感方式：它是强烈而暂短的情感喷发，浓度很高。常见于标语口号、诗歌、绘画等艺术品中。

热情的情感方式：它深厚且伴以冲动，持续的时间较长。常见于音乐、散文、影视等艺术品中或对它的欣赏之中。

心境的情感方式：它是持续很长时间的具有弥漫性色彩的一种情感体验。它力度小。常见于戏剧、小说等大型艺术品中或对它的欣赏之中。

（三）精神的三个层次

马斯洛的心理学把人类所需求的东西分成五个层次。其实完全可以减化成三个，即：

对生存、安全的追求；

对尊敬和爱的追求；

对“自我实现的追求”。

我们中国的禅宗大师也把人类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分成三个层次：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是对客观世界不加入任何情感的认定；

“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这是通过主观情感来观察客观世界的结果；

“看山只是山、看水只是水”，这是情感被深深地掩埋在理性中而观察客观世界的结果。

总之，思维的三种方式、情感的三种形式、精神的三个境界，我们称之为“思维与心理的三个三”。这么讲只是为了便于记忆，利于诸位修行和艺术创作之用。并不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



四、"正道五步"与两种止观

"正道五步"，是指习禅的人所必经的五个阶段。

它分为：

悟前修：八万四千法，法法归于一，万念归一（亦如科学家思考问题千思万缕无头绪）。

入空寂：把这个归一的"一"放下，松弛下来，进入空空荡荡（亦如科学家去睡觉或是去打球，松弛一下过于紧张的大脑）。

出世悟：悟到小乘的空无或是大乘般若系的空无。

入世悟：悟到大乘入世的常个什么、有个什么（亦如科学家忽然灵感来了，知道了问题的解决方法）。

入世行：做人去，过人的日子、干人的工作去。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而两种止观。

一是王熙凤教我们的"领导艺术"——"止、观、策、令、行"，我们称王氏止观。

一是老子教我们的"修道艺术"——"止观静、常容天"，我们称李氏止观法。

五、中国人的认同感

①同源的民族认同；

②同地的地域认同；

③同历的时间认同；

④同文的文字认同；

⑤同情理的情理认同；

⑥同习惯的习俗认同。

六、封建社会五大病毒

诸侯割据、外戚专权、宦官专权、奸臣弄权、外患不已。

七、人才

三种人才：建设人才、军事人才、改革人才。

产生人才的三尊重：尊重人本身及身份、尊重人的创新、尊重人的流动。

加强人才的培养。

八、艺术

(1)诗歌艺术通常具有的结构："楼台烟雨式"、"樱桃芭蕉式"、"无尾式"、"无腹式"。

(2)说唱艺术、舞台艺术具有的"聚众效应"。

(3)艺术地解除欣赏者逆反心理的方法：

"二踢脚"式；

说故事"式；

"情感倾向"式。

(4)纯文学小说的特点：

心理描写；

生活描写；

勾勒渲染(在生活和事件中对人物层层勾勒渲染)。

九、宗教三要素及四要素

组织形式、修行方法、光明的彼岸。

人、偶像、经论、仪轨。

十、展望未来

中国人的观念是天圆地方。别用天文学家的眼光去批判，而是去品：圆代表着无限，方代表着有限，即天无限而地有限。



太极图是圆的，所以无限大的宇宙里含有阴阳转换的道。北京天坛为圆、地坛为方，也是有限与无限的意思。最有趣儿的是中国的铜钱，外圆内方。大概祖先们在告诉我们：这有限（内方）的“大子儿”可以办无限（外圆）的事儿。于是“钱可通神”、“金钱万能”就透着有中国特色了，玩笑。

在中国最具佛教色彩的建筑是白塔。不是密檐塔那一类的，而是北海白塔、西四白塔寺那一类的塔。它下方上圆，它告诉人们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下方）可以对精神世界有着无限的追求（上圆）。

有限制才有艺术。画布的大小、画笔、颜色都在限制着绘画，但在这有限的画布上，你可以用一支笔描绘无限的事物以表达你无限的精神世界。音乐、舞台剧、影视……艺术的魅力就是寓无限的精神于有限的事物中，寓圆于方中。

佛教的白塔告诉人们的就是有限的人身可以有着无限的追求。它圆圆的塔身代表着天空，细小的塔尖代表着十三阶的精神层次，在塔尖顶上是日月的造型。这一切都是说无限的追求是以阴阳共存的心为佛——即心即佛。同时这个心是日月相映的——情理回互。

对无限的追求，是人类永恒的希望。

世界即将进入 21 世纪，一切冲突和对抗都呈现出文明的对抗。有的人要搞单极的霸权，有的人要搞多极的和平。搞霸权的要造一个方形的塔，上下左右东西南北都被权力封杀，活像口棺材，这怎么能行得通？我们中国人爱和平，求共同发展，我们希望世界上到处矗立着和平的白塔，处处呈现着生机勃勃和灵气飞动。这是一种即心即佛的美，同时又是对地球村这个大家庭的理性尊重。

我想这才是全人类所向往的乐园啊。

让我们为和平而祈祷！

让我们为天地人的和睦相处而祝福。

1999. 6. 30

见君　于南苑